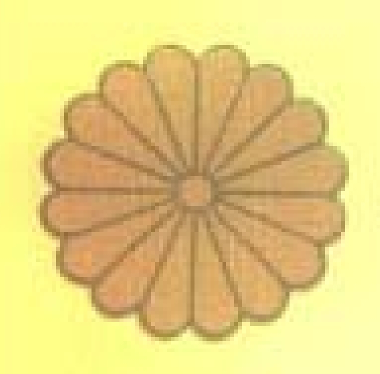
使日十年

〔美〕约瑟夫·C.格鲁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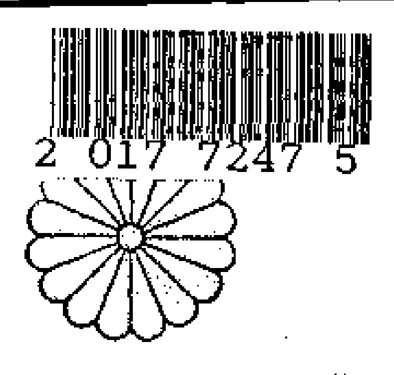


日本丛书·日本丛书

日本丛书·日本丛书

商务印书馆





日本丛书

使日十年

〔美〕约瑟夫·C.格鲁 著

蒋相泽 译

陈宏志 李健辉 校

商务印书馆

1992年·北京

TEN YEARS IN JAPAN

A Contemporary Record Drawn from the Diaries and Private and Official Papers of

JOSEPH C. GREW

United States Ambassador to Japan, 1932—1942

Simon and Schuster, New York

Third Printing, 1944

根据美国西蒙和舒斯特出版社(1944年第三次印刷)版本译出

日本丛书

使日十年

——1932至1942年美国驻日大使格鲁的日记及公私文件摘录

〔美〕约瑟夫·C·格鲁 著

蒋相泽 译

陈宏志 李健辉 校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北香河县第二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1294-6/K·244

1983年11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2年3月北京第2次印刷 字数 427千

印数 1 600册 印张 18

定价：7.90元

《日本丛书》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组译日本学术论著。三十多年来，已出版有关日本哲学、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及宗教方面的译著一百多种，加上最近所组新译，已初步形成系列。为便于读者研读，现汇编为《日本丛书》印行。第一辑选目，刊印前曾征求学术界意见，幸蒙赞许，但仍难称美备，深望海内外读者有以指正。

此次汇编出版前，曾对各书体例、译名略作调整，有几种系据原纸型重印，不及一一改订，尚希垂察。

编　者

1991 年 4 月

译者前言

约瑟夫·克拉克·格鲁是美国职业外交家。1880年生于波士顿。1902年毕业于哈佛大学，得学士学位。两年后即开始担任外交职务。1924年升至副国务卿，主持建立美国的外交人事制度。1927年出使土耳其。1932年调任驻日大使，直到1941年12月日美交战为止。1942年春，日美双方达成交换外交人员的协议，格鲁被遣送回国。1944年，再任副国务卿。1945年8月盟国敦促日本投降时，格鲁力主保持日本的天皇制，以便美国能在战后通过这个制度控制和利用日本。同年退休，1965年去世。

从20世纪初叶的日俄战争后，日本即成了美国在远东的主要竞争对手。美国反对日本独霸东亚，力图加以抑制。但另一方面，美国又想利用日本对抗沙俄，保持远东均势；同时还想把中国东北变成一个“安全阀”，将日本向太平洋和美国东海岸扩张的锋芒引向东亚大陆。因此，自1905年起，美国的对日政策即兼有抑制的一面和纵容的一面；斗争的方法亦有进攻的一手和退让的一手，两手交替使用。

1931年日本占领中国东北，严重危及美英法在中国的殖民利益。但在经济危机的打击下，在德国和意大利的威胁下，美英法对日本采取了绥靖政策，迁就退让，希望苟安于一时，并企图把日本这股祸水引向当时的苏联。

以沉着、圆滑、老练著称的格鲁是在“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二年被调到日本来的。《使日十年》一书，就是他在出使日本期间所记日记的选辑，也可以说是他对这段历程的纪略。

在开头的几篇日记里，格鲁就公然宣称，他“非常同情日本在满洲的合法愿望”，只是不赞成日本使用武力；认为东亚的现状可以改变，但应当用“合法”、渐进的方式来改变。这和后来英国首相张伯伦对纳粹德国讲的话很相似。无怪乎格鲁直言不讳，说他对日本也是实行绥靖，尽管他对“绥靖”一词作了一番辩解。可是，美国越迁就，日本越进逼。到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后，格鲁也不得不埋怨日本要把美国利益全部排除出中国了。

格鲁曾寄望于鼓励和支持日本的稳健派（即主张用略微温和渐进的手段进行侵略的一派），使其有朝一日取代极端派；同时又不要刺激极端派，不要给日本国内造成紧张局势，从而使军阀得以牢牢掌权。但是，稳健派软弱无力，军阀嚣张如故，美日矛盾亦趋于尖锐。到了1939—1940年，日本加速执行南进政策，竭力排除美英在远东的势力，并正式加入轴心国集团时，格鲁才比较清醒起来，他终于认识到“绥靖政策是一条死路”，“我们迟早会和日本发生正面冲突”。

《使日十年》一书反映了美日矛盾日益激化的过程，反映美国绥靖政策走向破产的过程。书中格鲁的日记是逐日记下发生的事件和自己的感想，许多细节是在正式文件中看不到的；日记之外，还转录了若干篇有关的公私文件，合成一册。此书对于我们研究30年代日美外交史、远东国际关系史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可以提供一些颇有价值的资料。

书中有几篇日记，如照录日本交通规则、日本人写的不通的英文书信等等，参考价值不大，有些不必译，有些不可能译，故略去未予刊用。

译文难免有错误，请读者指正。

目　录

序　　言

本书有其写法和目的，这两点都需要解释一下。

先说写法。我确信，要准确地记载历史，必须依靠当时的直率的评述，所以我在美国外交界服务的三十九年中，都保持一个习惯，即把当时的情报、印象和想法逐日摘记下来。这样作成的记录，优点中有缺点，缺点中也有优点。我们的决定和行动所依据的信念和设想，只有在诚实坦率的日记中才能找到它们的记录。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企求绝对正确，但是人人都可以随时把他的真实意见记下来。这些意见当然会改变，有些是因为情况变了，有些则是因为我们不断获得新的材料，使我们修改了原来的看法。

我在日本十年间记的日记，带有这类记录所共有的缺点，但是，如果说我作的判断因情况改变而常有修改的话，前后的实情也还是认真地逐日记录在案的。此外，我还认为，这种严格按照当时实情记下来的东西，自有其价值，同所记的判断明智与否没有什么关系。因此，有些意见，虽然后来因为我注意到新的事实而有所修改，也还是照录在这本书中。有些观点和预言，后来证明是错了，也仍然载入本书，直录不讳，和经时间证明为正确者一样。保存日记时，决没有想到有朝一日要发表。而且，特别是在驻日使馆这样的岗位上，在珍珠港事件前的那些艰难岁月里，我们不可能象在华盛顿那样纵览全局，我们对世界的看法不可能和在华盛顿形成的观点完全一样。观点产生于一个人的知识，更多的知识又扩大和加深一个人的认识，使其理解力更加敏锐。

我受过许多挫折，特别是在这样的一些时期：我与关怀和平。

有心做建设性工作的日本政府合作刚刚取得一点成就，即因政府倒台，换成反动内阁，希望又全部落空，就象遇到台风一样，瞬息之间成果一扫而光，尽管如此，我还是为和平奋斗到底。一个大使，刚到外国就职，即攘臂大呼“战争不可避免”，那就等于卷起铺盖回老家。我们的外交，是我们国防的第一线。只要可能，就必须守住这一线；要守住，就得做工作。就日本的情况来说，欧战一爆发，德国的初期胜利就象烈酒进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头脑一样，局势即露出了不祥之兆，当时我就向我国政府预报，日本可能会采取行动，还可能会是危险的、戏剧性的突如其来的行动。但是，我决没有完全放弃和平的希望，也没有停止为和平做工作。不那样做，就会损害我国外交的名声，而我则是外交界的一个成员。

这里还应记住一点。本书所收录的，不过是原来日记的一鳞半爪。过去十年的日记有打字机打的十三巨册之多，此外，我的书信、讲稿、会谈记录、有关剪报，也有若干册。原来的日记中有很多条并没有什么永久性的历史价值，重复的也不少。有许多则不适宜于现在发表。而且，因为日记是私人的、不供发表的记录，所以我还得为许多在世的同僚及其他人物的身分保密；假如透露他们的姓名，就可能会使他们为难，或给他们个人带来不利的后果。不过，这些删节并不损害主要情节。为了避免搅乱正文，我没有用星号和脚注，只是把日记原稿的一些条目和同时期的其他材料选编在一起，使之成为流畅的编年体记叙文。要把所有与情节有关的官方文件全文纳入日记，显然是办不到的，但这些文件有许多已经发表了，美国政府印刷局在1943年出版了两卷文件集，题名《美国对外关系，日本部分，1931—1941年》，大家都可看到。

再谈一下此书的目的。此书目的在于向我国人民——希望还有加入联合国的各国人民——提供一个比目前一般见解较为准确的关于日本问题的看法，因为，只有对日本和日本国民有一个正确

的概念，才能明智地处理一些困难问题，我们在军事上获得全胜以后，这些问题是一定得解决的。我上次写《东京报告》一书，其主要目的是要使美国人民了解日本军事机器的不可轻视，纠正一些谬误的想法，这些谬误的想法曾泛滥全国，总是低估日本这个敌人的生命力、战斗力和持久力。经过长达十年的仔细观察，我了解敌人，因此我担心，我们可能要走一段漫长而艰苦的路程，才能获得全胜。打如意算盘，有自满情绪，都是危险的。要获得全胜，要使敌人最后无条件投降，必须不断加强、加快我们的举国一致的战争准备工作，决不可有片刻懈怠。

日本军阀和军事机器的极端阴险、狡诈、残忍的行为和自私的背信弃义，几年来我们已经积有许多证据，我的叙述又提供了新的证据，证明日本军人的心理和气质实具有中世纪的特性。兵家有句基本的格言，叫做"了解敌情"。我的前一本书，我在全国各地发表的演说和广播，都是想陈述日本军人强大的实力和疯狂的决心，极端的残酷和野蛮。

现在有许多日本人并不想要战争，他们已认识到进攻美、英和联合国其他国家是愚蠢的，他们曾经尽力阻止军部极端分子进行鲁莽的、自取灭亡的侵略，假如现在这本书不能使读者清楚地看到这个事实，此书还是有一个目的没有达到。由于战时的愤激情绪和偏见，有些人将会否认日本国民中也有好人。可是这些苛求于人的人，十之八九对日本人都没有亲身的、直接的了解，他们不知道，有些日本人曾坚决反对同美国打仗，这些人逆流而进，力图挡住军人的自大狂和扩张野心的浪潮，为此他们曾勇敢地却又无效地豁出一切，甘冒被监禁甚至被暗杀的严重危险——事实上也确有几个人被刺杀了。

在战争中，日本人必须而且必定会忠实拥护他们的首领，必须参加战斗的人也定会战斗到底。但是，在处理战后的困难问题时，

我们必须了解和权衡一切因素。我的希望是，这些私人的逐日记录，也许能为将来提供一幅较广阔、较有用的图景，以便了解日本人作为一个民族的情况。

不过，首先还是要全部摧毁日本的作战力量；要使我们的子孙在下一代不致再打这种仗，就必须彻底地、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决不能让日本和德国再来威胁世界和平。侵略成性的军国主义，必须永远根除。

在完成这本书的时候，我不能不向三位人士表示感谢，这书是在他们的帮助下编写的：一个是尤金·H·杜曼，珍珠港事件前最关键的那几年，他任美国驻日大使馆参事，他是我的挚友，有久居日本的经验、成熟的意见，和对政治情势的敏锐的判断力，书中陈述的那几年的许多观点，都是靠他的帮助酿成的；另外是我的两个秘书，马里恩·阿诺德小姐（现在是达纳·W·约翰斯顿夫人）和纳尔逊·牛顿，为帮助我撰写本书所依据的日记，他们花了许多时间和精力，对此事关怀备至。

约瑟夫·C·格鲁

华盛顿

1944年1月

一、暗杀者的阴影笼罩着日本

(1932年5月14日—1933年2月15日)

本书所记之事，历时十年，在此期间，日本在内政外交方面都发生过一系列爆炸性的危机。这些危机，有的仍未超出政治范围。有的则采取暗杀和军事进攻的形式。1932年这一年就是以一连串政治暗杀事件开始的，5月15日犬养首相被刺，是这类事件的高潮。因此本书头一部分叙述的是一段表面平静的时期。只有这一回不是以暴力事件，而只是以日本承认满洲国和决定退出国际联盟而告一段落。

3 使日之始

1932年5月14日—18日。在芝加哥至旧金山横贯大陆的高级快车上

我们出发了。此番是去承担我们的第十四个差事，第四次出使。在我们这千变万化的生活中，这将是一场新的冒险行动，也许还会是最冒险的一次。五年以来，我们看到土耳其共和国从覆灭了的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中破土而出，披荆斩棘，艰难行进，获得了新生。现在我们又要进入一个大得多的舞台，在未来若干年也许是几十年中，全世界的注意力将会集中在这里。几乎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只有一件除外，那就是：日本放弃它在满洲的投资、财产、侨民和重大利益。它是一定要呆在那里的，除非一仗失败。现在令人感兴趣的问题是，它将采取什么政策和方法以对付国际上的敏感，用什么伪装来掩盖这些不愉快的事实。

确实有许多有趣的问题已经出现了。日本将满足于保住它在满洲的现有利益呢，还是象某些人说的那样，它的计划有囊括亚洲、建立庞大帝国之意，而以征服朝鲜为第一步，征服满洲为第二步？它能避免得了与苏俄和美国的冲突吗？最大的问题是，日本这样一意孤行，会不会终将碰到世界反对势力的坚定不移的抵抗；如果碰到抵抗，由此引起的冲突又将采取什么形式，是国内的革命，还是与外国的战争。那主要将取决于日本采取什么手段，而这也就是我们即将受权从它内部去观察的问题，我希望在今后能作长期的观察。

我要尽量保持不偏不倚的观点。一个大使，一开始就对驻在国抱着偏见，那就等于卷起铺盖回老家，因为他的偏见迟早总会让

人发觉，使互相信任的基础无从建立，而他又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完成有裨益的工作。另一方面，又总有过多地受到当地气氛的感染的危险。不过，我深知总统、国务卿和国务院的心意，这将有助于保持正确的航向。首先，我非常同情日本在满洲的合法愿望，但对它为实现这些愿望而采用的非法手段却毫不同情。

趁世界各国忙于世界大战之际提出“二十一条要求”，自1931年9月18日以来不顾《凯洛格非战公约》[①]、《九国公约》[②]、和《国际联盟盟约》[③]而在满洲和上海采取典型的普鲁士手法[④]，诸如此类，都是很难令人同情的。纯属中日之间的问题，情形特别复杂——如条约怎样解释，哪些条约是有效的，谁先违反有效的条约等——以至人们只好把这方面的情况视为技术上不能解决的难题。幸亏我们的立场是极其鲜明的：对中日之争，我们不袒护任何一方；我们维护的是国际和平条约和“门户开放”原则的不可侵犯性，而且我们关于这个问题的意见和我们所采取的立场都已经向全世界仔细表述过了，今后有必要时还要继续这样做。这里就讲这么多，作为后文的前言。

我赴任伊始，即闻局势鼎沸。《先驱—调查者报》有位记者在芝加哥车站迎接我们，送来该报5月16日的星期日晚刊，上有非

---

① 《凯洛格非战公约》，订于1928年8月，有四十八个国家参加。因美国国务卿凯洛格发起而得名。《公约》只规定国与国之间须通过和平途径解决争端，不诉诸战争，但如何实现这一要旨，却没有规定。——译者

② 《九国公约》，订于1922年2月，参加者为美、英、法、日、比、意、葡、荷、中九国。《公约》责成缔约国尊重中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遵守“门户开放”原则和各国在华工商业“机会均等”的原则。实际上是把中国置于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共同支配之下。——译者

③ 《国际联盟盟约》，国际联盟（成立于1920年）的章程和纲领。国联打着“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旗号，实际上不过是帝国主义列强奴役和镇压世界人民的工具。——译者

④ 普鲁士是德意志的一个邦，有军国主义传统。普鲁士手法，即全凭武力进行侵略扩张。——译者

常醒目的标题：**日本首相被刺身死；严重的反叛；皇宫处在危险中。** 这是第四次重大的行刺。军部简直就象脱缰之马，正在横行无忌，显然是想建立法西斯制度。不过，尽管报上那么说，我不相信天皇会有危险，皇室恐怕是应当受到普遍尊敬的。其中一定有些情节搞错了。如果最近这次恐怖表示——杀害犬养首相，向几处公共建筑物扔炸弹——是一群狂徒干的，我不知道这种激烈行动会不会对军部本身发生持久的影响。到时候将会得到答案的。

沿途各大车站——芝加哥、奥马哈和旧金山，都有摄影师和记者迎接我们并请求接见，但对日本、日本问题或有关我出使的问题，我当然是一字不提；我略谈一点土耳其的情况，一般也就可以客气地把他们打发走了，这总比一句话不说好得多。檀香山的一家报纸把我们逗乐了，它说：

> 格鲁大使是一个有教养的人，兼备美国人的机警进取和欧洲人的谨慎矜持的性格。他个子高，常带迷人的微笑，说话慢条斯理，既不是波士顿式的，也不是英国式的，而是二者混合的悦耳的声音。

看来有点象个大杂烩了。

在奥马哈时有个记者问我，你认为最近三十年来展现的突出的世界外交问题是什么，我立即答道："毫无疑问，建立一个国际和平机构。"他认为当今世界的主要危险因素是德国问题，以及一场俄日战争；对他的这种看法，我未作评论。

横渡太平洋

1932年5月20日。旧金山

请美国驻东京总领事加勒尔斯、驻天津总领事洛克哈特、他们的妻子、和格雷厄姆·小帕森斯吃便饭。小帕森斯是来当我的私

人秘书的，他是马萨诸塞州格罗顿镇人，耶鲁大学毕业，颇受我们格罗顿学校前校长皮博迪先生等人的赏识，又是美国大学生联谊会的成员。他很有前途，看来很热心学习，也热心助人。

乘大来轮船公司的“柯立芝总统号”于4时启航，加勒尔斯和洛克哈特以及日本总领事都来送行。纸片缤纷，欢声四起。送来鲜花之多、之美，为我生平所未见。

1932年5月20—6月6日。在“柯立芝总统号”上

航程相当顺利，起初风冷浪大，南下后逐渐转暖，风浪亦渐趋平静。自旧金山开船，开头四百英里航程显然一向都有这样的风浪。就头等舱来说，这条大船几乎是空的——头等舱旅客只有五六十人。23号那天，汽笛突然响了六下，船停了，放下一只小艇。原来是统舱里的一个中国妇女跳了海，丢下三个小孩。尽管我们的船在那周围转了大约一个多钟头，但再也没有见着她。

航行的头几天我就写了十五封信，拼命赶时间。还写了一些准备在日本用的演说稿，读了许多关于日本和满洲的资料。这次航行即使不能说令人兴奋，至少也是有用的。工作之外，有两项主要的娱乐活动：一是在露天游泳池里游泳——早餐前游一次，傍晚在甲板网球场上狠打两三盘后又游一次，这样可以很好地保持健康；再就是隔一晚看一次有声电影。

1932年5月26日。檀香山

到檀香山的头一天简直象盛大节日。5时半起床，这使我想起从前进入秀丽的那不勒斯湾时，我的女儿安妮塔和我常常很早起来观赏风光。6点刚过，我们的船迎着岸上乐队奏起的夏威夷欢迎曲的乐声驶进码头。我家里其余的人也确实被乐声闹醒了。檀香山行政长官兼贾德总督的副官罗斯少校同领港员一起来到船

上，代表总督欢迎我们，给我们戴上这里惯用的花环。到傍晚，颈上套的花环一定有十多串了，我们不时取下旧的，换上新的——所有花环全是各种香花编成的。

那天白天，海军司令官耶茨·斯特林上将邀请我们去参观海军基地，并坐一回海军水上飞机，但我们太忙了，无法接受他的邀请。陆军司令官则派副官带花环来欢迎我们。日本总领事也来探望、送花。后来我用无线电报一一致谢。

从檀香山到横滨的十天风平浪静，和暖宜人，只有一两天的雨雾是例外。从旧金山经檀香山到横滨这整个航程，这条船本来是可以早三四天走完的，但因要与走这条航线的其他船只行动一致，所以不得不放慢速度。

到达东京

1932年6月6日。东京

啊，多么美好的日子！向往、期待了多少个星期、多少个月的日子、到来时不负所望者，是很少的，可是今天却远远超乎意想之外。为怕错过一件例行手续，我早上4点45分就起床了，自己也觉得好笑。大雾弥漫，只看得见其他船只朦胧的身影。昨晚我们的船只沿着日本海岸行驶，雾笛尖叫了一个多小时后，夜间某个时候便在横滨的锚场停泊了。到5点半钟，船上乱了起来：乘务员使劲打门，把每个房舱的门都捶得砰砰响，扯着嗓子大叫，要我们起来去见检疫员，五分钟后，又重演一次。那些乘务员当然懂得用怎样最彻底的办法来执行命令，但我还是怀疑，不用这种该遭人揍打的办法，难道就得不到同样的效果吗？

不管怎样，我们确实在上午6时便见到了检疫员。其实艾丽斯和我们的女儿埃尔西（她们只睡了两小时）大可不必穿戴得那么

早，因为日本方面已派有专人来照料我们，他根本没有见着我们就和帕森斯查完了我们的护照。另一个日方人员检查了我们的警犬基姆，另外发了一张健康证明书，同时还有第三个人照管我们的行李。一切都办得安静而有效率，尽量减少烦扰。

7点钟船靠码头以前，欢迎仪式就已经开始了。昨天已有一批欢迎电报传来。今晨，各类代表接二连三来到舱前。来客中有几个是日本新闻记者和摄影师，最后是大使馆的出色的参事埃德温·内维尔和他的夫人。我们排列好让人照像，又让记者提问；我当然绝口不谈政治，可是我对一些简单问题的回答后来也被精心篡改为访问谈话纪要。英文《日本时报》以“格鲁先生接见记者”为标题，开头就凭空造出这么一段话，说是我讲的：“我写过一本书叫做《远东的体育运动和旅行》，但对当前的日本我却几乎一无所知。我希望，一俟正式就任新职后，便开始认真学习。格鲁夫人的母亲就是海军准将佩里[1]的女儿。……”等等，等等。好一个有来头的丈母娘！

我们终于和“柯立芝总统号”的阿林船长告别了，在蒙蒙细雨中驱车前往东京，但我却没有觉察到沿途的景色不佳，因为内维尔和我坐在一起，要谈的趣事太多了。到大使馆时，只见灌木成丛，草坪如茵，喷泉，鲜花，水池嵌以彩石，建筑物四幢，白色的房子装饰着黑色的铁制品，深陷在茂林之中——在这新兴城市的不大雅观的环境里，这里真是世外桃源。官邸在山脊上，俯瞰着办公处和宿舍，上下之间有茂叶密林中的石径可通。官邸内部，我们随内维尔夫妇查看了一遍，看了大客厅里的家具、窗帘和豪华的厚地毯，还有小客厅和更小的客厅，看了吸烟室及其精美的壁板、一排 8

---

① 马修·佩里(Mathew Perry，1794—1858)是美国海军将领。1854年，他率领舰队到日本横滨，迫使当时的日本政府与美国签订一项开放日本港口的不平等条约。格鲁夫人的母亲并不是佩里的女儿。——译者

排书架、一层层食橱(至少在这里已有足够的地方可以随心所欲地贮存东西,分门别类),看了凉廊、宴会厅、便餐室、衣帽间、七间卧室、四间浴室、熨衣室、缝纫室和贮藏室——埃尔西不禁轻轻发出高兴的尖叫声,基姆也在摇尾表示接受这个新环境——我便问艾丽斯有多少反对意见,她答道:“一点也没有,全是赞成。”

大家又到办公处去,路经游泳池。我和全体工作人员见了面,然后接见主要的美国记者:美联社的巴布,《纽约时报》的拜厄斯,合众社的沃恩,《日本广告报》的弗莱谢尔。聊了一阵,我谈到希望跟他们密切合作,这样彼此都有好处,请他们常来坐坐。陆、海军武官麦基尔罗伊上校和约翰逊海军上校告诉内维尔,按他们的规定,见我时要穿全副军装,我却传话回去:但愿他们忘掉他们的规定,因为那制服上的金边无疑会弄得我张口结舌,免掉那一套,我们的谈话倒会轻松愉快得多。

玛雅·林斯利·普尔和小帕森斯来吃午饭。玛雅在吃饭时自我介绍,我才认识了她。回想起来真有趣:1904 年 1 月,在科普利堂的一次舞会上,有人指她给我瞧,说是刚从日本回来的姑娘,后来当我请求介绍这位“刚从日本回来的姑娘”时,我却被带去找艾丽斯。

3 时,内维尔来带我到国会去拜会斋藤子爵,因为他不能离开会场去外务省接见我。他老了——我想已经七十开外了,看去老态龙钟,精神困倦。他说话吞吞吐吐,并且好象心事重重,因而精神不能集中,但他确实有名望;他以前是海军大将,做过朝鲜总督,现在由他来填补首相和外相的空缺,是要依仗他的声望(很可能是暂时借重一下),渡过组阁的难关。知道他忙着开会而我们也只能谈几句应酬话,我坐一会就走了;给他留下请求觐见天皇和皇后的照会、我的国书副本、召回我的前任卡梅伦·福布斯的文件的副本,以及拟向天皇献词的稿子。因为内维尔觉得送上献词稿好,我

们就这样做了。随后还拜访了比利时大使兼外交使团团长巴索姆皮埃尔男爵，相晤甚欢。

5时，艾丽斯邀全体工作人员偕同妻女来赴茶会，有六十五人之多。好大的班子！此处竟使我们能在到达的当天就招待这么多人，还有冷餐，多么好的场所啊！卡姆·福布斯的日本仆人都在忙着，办事十分精确；我想我们要全部留用他们。

宾厄姆和小帕森斯来吃晚饭。帕森斯要和我们暂住在一起，等宿舍里的房间收拾好后才搬走。趁最初的印象犹新，我详记了今天的日记，现在，谢天谢地，我可以在10点半钟睡觉了，而且要好好地睡一觉了。

报纸对新大使的评论

1932年6月7日

报纸真使我感到好笑。昨天《日本时报》引我的话说：我对当前的日本几乎一无所知，但我希望认真学习云云。我根本没有说过这些话，虽然我可能表示过在这里我有许多要学的。可是这家军国主义的、反美的《时报》还是什么也不管，今晚竟又围绕着那段所谓的谈话写出一篇长达一栏半的社论，用恭维的词句谈到我的"谦逊"，说我来到这里虚怀若谷，乐于学习。有些日文报纸就更加信笔由之了。《东京时事》评道：

> 新大使是个志在增进和平的外交家，格鲁夫人正是他的最适当的伴侣。在船上答《时事》记者问时，新大使以柔和的音调说道，局势的确是严重的，又说，至于日本的情况，他没有足够的了解。……大使阁下写过一本小册子，名叫《远东的开发与旅行》。格鲁夫人的母亲曾画过许多描绘日本风景的油画，新大使和格鲁夫人颇受这些油画的影响，因而对日本抱有

好感。〔黑体字是我用的。——格鲁〕

《中外商业》写道：

> 新大使是个运动健将。他身材高大，一双浓眉显现出他的特性。他仪态雄伟。他用外交词令说，除代表日本风光的富士山而外，他对日本没有足够的了解，因此不能回答所有的问题。显然，新大使是个有才能的外交家。

《东京朝日》的评论中有这么一段：

> 新大使身材颀长，精力充沛，高达六英尺。浓浓的眉毛，表明其人机敏果断。他写过一本小册子，叫做《远东的体育运动和旅行》。至于日本，其惊人发展已达到全世界无有前例的地步，而他对日本的认识，却很不完备，可能象童话一般。格鲁夫人很久以前曾一度访日，她藏有许多日本风景油画，是她自己画的。她喜欢到日本来，超过了大使本人。大使的女儿，有人看见她在船上冒雨散步，兴致勃勃。

《东京日日》写道：

> 新大使在船上接见《日日》代表，回答提问时说："现在来谈论满洲问题、圆桌会议等时事问题，真叫我为难。当前日美两国都处于紧张状态，小针碰一下，也会刺痛双方的神经。不谈那种问题吧，我倒想说，即将在美国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真是举世瞩目。我听说日本也正要派一队实力雄厚的选手参加，他们将会有精彩的表演。为了增进和保持各国间的友好关系，必须进行困难的外交活动，但在目前这个时候，体育交流却是比通常的外交活动更重要、更伟大的外交活动。"……
>
> 随新大使前来日本的还有他的第四个也是最小的一个女儿。

我一点也没有提到奥林匹克运动会，我的想象力迟钝，甚至根本没有想到奥林匹克运动会倒是个有用的话题，从这点也可以看出，日本报界的外交手腕，显然比我的高明多了。什么"紧张局势"，什

么我的"最小的女儿",当然我更是一字也未曾提过。

准备会见天皇

1932年6月7日

我原以为在呈递国书以前可能会闲着等待。殊知不然，今天已经很热闹了，我以往在任何地方所经历的繁忙日子也不过如此。幸亏我在7点以前已开始做事，9点已在办公处办公了。希望以后经常如此，因为确实需要督率馆员们遵守办公时间。

11点，来了宫内省典礼官手下的一位课长山形武夫。山形先生说，天皇将在6月14日接见我，皇后也要接见艾丽斯和埃尔西，接见以后，将回来更衣，三人再去与天皇和皇后进膳。山形衣着整洁，态度诚恳。

7点，内维尔给我看了他致国务院的电报，是汇报今天下午英法意三国大使及内维尔同斋藤子爵的会谈，在此以前，他们在我们大使馆开过预备会议，因为这里距外务省最近。意大利大使年序最长，当发言人，他把其他三人都同意了的话告诉兼外相：由于芳泽① 关于在东京召开圆桌会议的建议给传开了，中国人对此建议已有反感，因此他们认为，没有中国人参加而在东京召开这种会议，将于事无补。

不过，四国仍切望合作，并建议以后日本如再有提议，可由日本驻各该国首都的大使提出。斋藤答道：他个人认为，这个会议应当在上海举行而有中国人出席，但在任命新外相以前，他不想先作承诺，他期望下周能任命新外相，因此会议问题暂时不作决定。电告国务院：因我尚未呈递国书，故委托内维尔参加这次会议。从斋藤的话来看，南满铁道总裁内田伯爵似将出任外相。

---

① 日本前外相。——作者

1932年6月9日

英国大使弗朗西斯·林德利爵士于11时驱车来接艾丽斯和我去游叶山，埃尔西则与内维尔夫妇乘火车去。到达后在他们的日本式小平房里吃午饭，小屋濒临海岸，共餐者有林德利夫人、内12 维尔夫妇和伦敦《泰晤士报》记者肯尼迪的夫人。

给使馆人员的指示

1932年6月13日

10时，召集参事、秘书、陆海军武官、商务参赞及其助手、两个领事等使馆人员开会，告诉他们，我要把我们这一小群人变成一个尽量密切合作的集体，对他们当中的任何人，我的门都是经常开着的，有什么消息、意见或建议，只要他们认为是对我有帮助的，都可以随时来谈。我还要求他们，听到什么重要意见或消息，尤其是带政治性的，就写成机密备忘录送来给我，我对之亦将严加保密，特别是他们肯定会接触到我本人难以接触的个人和各层人士，因此这些备忘录将大有助于我纵观事物的全貌。我想知道各色各样的意见。我还告诉他们，我没有定期召开馆员例会的习惯，因为这种会通常都有点勉强，用处也不大，但是若有具体问题需要讨论，譬如，有什么评论时局的报告要电呈国务院，或有什么新情况我希望弄清楚，我将随时召开会议。

式部次官[①]之一的黑田伯爵来访，了解明天向天皇呈递国书的仪节准备情况。接着来的是《时事新报》记者某君，他到过满洲，谈得很有趣。他说，新“满洲国”的日籍官员根本不喜欢按日本政府的观点看问题，根本不愿意唯东京之命是听。又谓国联调查

① Vice-Master of Ceremony，皇室的掌礼次官。——译者

团[1]一直很谨慎，至今仍未表示任何态度。随后又来了美联社记者巴布，是我请他来的，因为我将在美日协会发表演说，想请新闻界人士对演说稿提提意见，特别是要看其中是否有可能被报刊拿去妄加渲染之处。他仔细看了，提了两三点小意见，说此外挑不出什么毛病，觉得不错。商务参赞巴茨也看了，与巴布有同感。宾厄姆提了一些很好的意见。真能使听众感兴趣的问题，如美国对中日争端的确切态度、满洲、《九国公约》、圆桌会议、胡佛主义等等，定会在舆论界引起许多讨厌的批评和争论，这些问题都得回避，回避了而又仍能使演说有内容，这就是件极难的事了。头次演说大讲我国的政策，向他们硬灌，我看没有什么好处，但我还是要强调美国对远东问题普遍的关切和忧虑，希望这一点能够深入人心。

有个日本政界要人请我在明天觐见天皇之前约见他，他告诉我，在去年冬天他赴美之前，天皇和日本公众都认为，史汀生先生[2]在满洲危机期间写的那些照会只是代表史汀生先生个人的观点，是按他本人的倡议起草的。这位日本外交家从美国回来后，告诉天皇，事实正好相反，致日本政府的照会，是在美国公众舆论，特别是教会、教育机关、妇女俱乐部和协会的舆论的压力下写出来的。这些团体的愤慨之情实际上是一般舆论的反映，是来自对大战的回忆，因为人们对大战记忆犹新。美国持这种态度，另外还有一个原因。美国曾创立国际联盟，赞助过国联，它虽非成员国，但上述美国团体仍觉得自己对国联负有道义上的责任，这种道义上的责任感又受到欧洲国家的鼓励，这些欧洲国家尽力想把重担推给美国挑。因此，史汀生的那些照会所具有的社会基础多于政治

① 1931年9月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东北后，国际联盟一直采取妥协纵容的态度，到1932年2月才派了一个以英人李顿为团长的调查团到中国东北来进行所谓调查。美国不是国联成员国，但也派了一个代表参加。——译者

② 亨利·史汀生(Henry Stimson, 1867—1950)，1929至1933年任美国国务卿。——译者

基础。他曾对天皇说，美国的教会和大学，实不亚于日本的皇室，举足轻重，影响甚大。他说，所有上述事实，他曾问过很多知名人士，都得到他们的证实，休斯、柯立芝、卡斯尔、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各大学校长等名人，对美国舆论都有同样看法。

这位日本上流人士说，他认为，觐见之前先知道天皇已经听过这些事实，对我不无用处，因为谈话中有可能触及这个问题，对我的妻子也将同样有帮助，恐怕皇后也会同她谈到美国的妇女组织及其社会影响。

我感谢这位特来关照的日本客人，他想得如此周到。我对他说，关于美国舆论，他和天皇说的那些话，就一般情况来说，是很正确的，至于美国的道义责任感，却不限于对国际联盟，主要还是集中在《凯洛格—白里安公约》和《九国公约》上。

7时，我把内维尔叫到使馆来，因为我觉得，最好还是把日本可能提早承认"满洲国"和内田伯爵即将被任命为外务大臣两事电告国务院。目下谣言纷纷，相互矛盾，舆论界在现在就承认满洲国这个问题上有分歧，但是内田正在和陆军大臣荒木将军会谈，很明显，假如内田确愿接任外相，他就会在军人的完全赞同下去干这件事。

不论结果如何，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军人正在明显地支配着政府，非经他们同意，一步也不能动。

觐见天皇

1932年6月14日

今天是了不起的一天。生活毕竟不过是一连串的跳栏赛跑，跳过之后，就会觉得那些栏架远不是象跳前所想的那样难跳。困难这种东西，你不敢去碰它，它就会折磨你，我们遇到的困难大都

是由完全不必要的忧虑造成的。

10时20分，皇家马车来到使馆办公处前，这里对这些马车和扈从骑兵队来说，比官邸前有较多的回旋余地。使馆人员全穿上整洁的礼服，照了像，照像时列成的队形还没有散，式部次官黑田伯爵就来接我们了。时值大雨倾盆，驾车员和骑兵中队长帽上的羽饰都淋得薰萎不堪，但大雨亦未能使车队的威风减色。10时35分出发。骑兵前导后拥，载送使馆人员的马车鱼贯随行。美利坚合众国的大使堂堂皇皇独坐在马车后座上，黑田伯爵对面相陪。沿途车辆行人已在警察的有效控制下停止行进，电车上、汽车上或街上偶尔有人鞠躬致敬，大使便脱帽答礼。 15

我们庄严地进入非常优美的宫前庭园，仪仗队肃立而待，号手吹奏一番，10时50分整，马车在宫门前停下。式部长官林男爵出迎，我在洛桑会议① 上见过他，那时他是驻英大使。他带路来到接待大厅，那里已是众官云集，斋藤子爵当然在内，还有其他显要。艾丽斯、埃尔西和使馆女眷亦随即来到。我们散坐了十至十五分钟，观赏这确实美妙的大厅，那些屏幛和油漆大门尤其值得欣赏。然后我即应召入见天皇，门口一鞠躬，半路再鞠躬，到他面前三鞠躬。

我读献词，由有名的译员白鸟译成日语——他是“外务省发言人”，时常发表相当重要的谈论；我呈上国书和召回我的前任的文件；天皇以尖而单调的声音读日语答词，由白鸟译成英语；于是“握手”如仪，天皇问了两三个礼节上常问的问题，尽管白鸟翻译的四个字我只能听见一个（已经告诉过他我的听觉不大好，但在天皇驾前，他就是不能提高嗓门），我还是尽最大努力作了机智的回答。当天皇说再见时，我便请求允许我引见使馆人员，他们依次进来，

① 1923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瑞士的洛桑集会，与战败国土耳其签订和约。——译者

每人照例三鞠躬，退出时又三鞠躬：内维尔、狄考福、特纳、华盛顿、宾厄姆、麦基尔罗伊、约翰逊、罗伯茨、巴茨、多德皆在被引见之列。我自己也胜利渡过了倒行退出这一关，觐见到此结束。整个仪式都进行得极为准确而庄重。

裕仁天皇年轻——我看有三十一岁，留小胡子，戴眼镜，说话时怡然微笑。他当然是穿着军装来接见的。天皇、秩父宫、高松宫三兄弟的样子非常相象。

见完天皇，艾丽斯、埃尔西和我立即入见皇后，再行一次礼——当然没有致词和递国书这两项，又向皇后引见了使馆人员和他们的夫人。皇后比在场的任何女士都更象娇小玲珑的日本妇女；她没有真正美丽的秩父宫王妃那么漂亮，但她表情优美，笑起来确是可爱。高木夫人当翻译，我听起来还是声音太低，幸而艾丽斯在场，每句话都给我重译一遍，否则我就怎么也回答不了皇后的问题。我想他们迟早会发觉，如要我明白作答，就得说大声一点。耳朵背，又碰上在日本宫廷，真是讨厌透了。

又象来时那个模样转回大使馆；我请黑田伯爵、骑兵队长和众馆员到我办公室喝了一杯香槟，但都是快速动作，因为从我上宫邸换早礼服到坐上我们自己的汽车去皇宫赴午宴，只能有七分钟的时间。12 时 12 分，返抵皇宫，到处站着与秩父宫两殿下、斋藤夫妇、牧野伯爵、林男爵、松平伯爵夫妇、及其他宫中官员闲谈，直到天皇和皇后驾临。我引艾丽斯和埃尔西参见天皇，旋即一同入席。

这次午宴远不如我想象的那样难对付；气氛固然肃穆，但天皇和皇后都几乎一直同我们谈话，没有什么拘束，只是他们仅讲日语，总得由对坐的客人翻译而已。进入这华贵的餐厅时，侍仆皆深深鞠躬，一如众人见到天皇、皇后之时——比欧洲人的鞠躬更深，而且鞠躬了好一阵。入席者约二十四至二十六人。秩父宫夫妇当然坐右边的位子。艾丽斯坐天皇左边，其下是内大臣枢密顾问官

牧野伯爵；我则在皇后左边，下面是高木夫人。埃尔西坐在两个典礼官之间。

酒肴十分可口，乐队隐在屏后轻轻吹弹。我觉得，这间屋子堂皇是堂皇，但不如接待大厅精美；死板的木器和厚重的帐幔未免太多；不过，那些安置在摆得很巧妙的矮松和花卉后面的豪华金屏，以及餐桌上的鲜花，还是非常引人注目的。艾丽斯觉得牧野伯爵和她谈得来，天皇的兴致也很高，容易交谈——自然是通过牧野的翻译。牧野确实是个大人物，但所有在座的哪个又不是？我们自然会跟牧野大谈起比尔·卡斯尔，此人是卡梅伦·福布斯的前任驻日大使。

通过高木夫人，我和皇后几乎谈个不停，高木夫人终于把嗓子提高到我可以听见的程度；皇后好象对什么都感兴趣，问到我的旅游、我们的历次职位、我们的体育爱好、家庭、当然包括安尼塔的十九英里游泳，还扯到博斯普鲁斯海峡从马尔马拉海至黑海的整个长度：这样一点一点的，差不多把我们的全部生活史都摘去了。宴后分散成小群；天皇通过白鸟和我闲聊，问了许多关于土耳其的事情，皇后则同艾丽斯和埃尔西谈。2 时正，林男爵走过来了，于是大家鞠躬的鞠躬，行屈膝礼的行屈膝礼，午宴到此结束。

一切都办完了，国书也稳妥地递上了，这大概也是一件快事；作为一个久经锻炼的老兵，我没有再象过去那样为这类事情所苦，但毕竟同样是一次跳栏。

回办公处后，签署致外交界各同僚的照会，其中致德国大使的照会我坚持要修改，因为内有“始终存在于我们两个使团间的愉快关系”一语，我不同意。这里为了一致，我也改了致西班牙大使的照会。内维尔问为什么不改致英国人的照会，我说，在 1812 年那个时候这里还没有我们两国的使馆。

大使正式开始工作

1932年6月15日

美国人协会的正副会长赫茨尔和泰特来访，说协会要宴请我，问我什么时候可以去。内维尔对我说过，他认为这事可以推迟到秋天，但协会的人却似乎要赶在美国人离城避暑之前举行，所以我同意7月1日前往。当然又要作一次演讲。出乎意外，泰特先生给我们送来一辆新的林肯牌大轿车，在我们的卡迪腊克牌轿车运到之前可以使用它；这辆车子本来是给故首相犬养订的，但在交货前犬养已被刺死了。

18

随后是美国商人协会的秘书哈珀先生到来，他要请我吃午饭。又要作一次演讲。试想，除了美国协会、美国商人协会、美国学校和美日协会之外，只是日本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选手队出发之前，我就预定要分别作三次演讲——大使馆招待选手时为福克斯公司拍电影要讲一次，日本人饯行宴会上要讲一次，日本报界饯别该队时又要作一次广播演说，这样的生活太不好受了；今后到相当时候一定还要作许多次演讲。哈珀是日本版画的鉴赏家和收藏家，我们很想看看这些版画，他不久就要把其中的珍品汇集起来。

后来又接见松竹合名会社社长大谷先生和导演三岛先生。大谷控制着日本大多数头等剧院，他来请我们去看星期五的一次演出，我们答应了。头一次看日本戏，一定会觉得很有趣。接着来访的是花旗银行的经理沃。

中午拜望法国大使德·马特尔，纵谈远东大局，他见解高明，合情合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曾在中国做过多年外交官。随后即赴皇宫，在天皇和皇后的来客登记簿上签名，又到秩父宫府签名。2时30分，往斋藤子爵处作递国书后的正式拜访，他在首相

官邸接见我，邸宅堂皇，花园瑰丽。他说，他曾与内维尔及其他三国大使会谈过，对我已无须再多说了，但他料想新外相很快就会派定。3时，访意大利大使马若尼，他的使馆设在一所很难看的房子里，房子却在一个很好看的花园里，园为树丛环抱，与世隔绝。一见面我就喜欢他，畅谈甚久。他的看法与别人无异，认为此间任何时候都可能发生任何事变。4时30分，访巴西大使阿麻腊尔；他说："那天我到你那座宫殿去的时候，你叫它做小平房；现在，在欢迎你来我这所小平房的时候，我却要叫它做宫殿。"

林德利要等他钓鱼回来才能拜访，德国大使也不在家，所以拜会各大使的事算是完了，但现在还得接见公使和代办，此后还要去看他们。除俄国使团和我们自己而外，有三十二个使团，这意味着共有六十四次互访，而且每次都得先约定，都得亲自出马，真真是活受罪。 19

一个大使就是这样开始工作的——靠自己的辛劳。午饭前赴东京俱乐部的鸡尾酒会，这是今天整天唯一的插曲，参加者有内维尔、修建过大使馆的建筑公司的雷蒙德和俱乐部会计主任秋本等。假如工作老是这样紧张，我真需要每天有一次酒会。

使馆人员响应我那天在会上的要求，已开始将他们写的机密备忘录送来。下面是比较有意义的几条的要点：

在大使馆的一次午宴上，某国大使馆参事发表过一种有趣的谈话，说将来俄日之间合作的可能性比打仗的可能性大得多。他暗示他自己的（大概也是他使馆的）想法是，日本很可能发生一场激烈的革命，从国际政治的观点来看，他觉得俄日联盟的力量是可怕的。

告诉我上述消息的人又说，最近有人散发过力主刺杀斋藤首相的传单。按他的说法是，许多人正在紧紧跟踪首相。他还相信，不惜对天皇下手的也大有人在，可能行刺，但更可能的是想把皇室

再度贬谪在京都。他认为，上届国会之无大作为，也许会被反动的极端分子用作资本，现在不发生事情，最近的将来盖子也很可能要揭开。

某上校写道，往年富家子弟被征人伍后，通常总是被派去和近卫兵一起值勤，在即将出乱子的时候尤其如此。可是，在 1932 年，农民子弟也被派去担当此类任务，富家子弟并没有得到什么优先的待遇。他说他这个消息是从可靠方面得来的，并认为此事意味深长。他还说另一件事也值得注意：三井财阀显然是为了求安全，给职工普遍加薪，并私人捐献巨款作救济费。他暗示，三井竟然一反刻薄成家的生意经而有此举动，确是件新鲜事。

20 日本剧院之一夕

1932 年 6 月 17 日

晚 6 时，与宾厄姆和小帕森斯同赴歌舞伎座，作大谷先生之客。大谷是日本最大的剧院公司的总经理，辖有全国三十多个剧场和四百五十个电影院。看了两出戏——《桐一叶》和《镜狮子》，《桐一叶》由名演员歌右卫门主演，艾丽斯从前看过他的戏。在今晚的戏里，他演一个老妇人。另一出《镜狮子》由以"狮舞"驰名日本的舞蹈演员菊五郎主演。

这是日本最好的一所剧院，演的古典戏剧和舞蹈也是最好的，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剧院很大，座无虚席，舞台之宽，不比我在任何地方见过的逊色。布景和服装皆灿然可观。所有女角都由男人扮演，演得非常出色。菊五郎及其被视为杰作的狮舞，誉满全国，备受崇拜。他曾拜名伶团十郎为师，学狮舞，据说比他的老师演得更好。团十郎以前常说，在他所知道的舞剧中，狮舞是最难演的。这些名角的技艺大都是世代师承，菊五郎就是他那个谱系的

第五代。在狮舞中，他脸上没有闪露过一丝表情，这舞蹈的旨趣全由他的头、手、身的动作来表现；他演妙龄美女时，头部动作尤为优美。这类日本舞蹈的传统程式和我们的全然不同，所以一下子还不能欣赏其高超的艺术表现，它只能逐渐引起人们的爱好。对日本人来说，这种艺术则几乎是神圣的。

《镜狮子》的剧情很简单：有个美丽的侍女，被选到将军城堡前表演一年一度的狮舞，她在众人面前感到羞怯，经过一番敦促才翩然起舞。她舞蹈优美，手里拿着一个狮子头，身边有两只来和她伴舞的蝴蝶——头一场只是装在长杆上的假蝴蝶，后来换成两个漂亮的舞女。蝴蝶挑逗她，使她激动得发狂，竟为狮子的灵魂所缠，最后变成了狮子。在这个时刻，她从观众的后面走过一种桥状物来到舞台上，穿着灿烂夺目的金袍，披着长密的白鬃，随即跳起狂放的、作为终场的狮舞，长呗乐队给她配上更狂放的音乐，以助声威。乐队由十八人左右组成，队员均穿和服，坐在台后，面对观众；其中约三分之一负责吟唱，其余的击鼓奏乐。在我们西方人听起来，这种音乐纯系杂乱之音，特别是那刺耳的横笛，它总是同日式六弦琴和歌声的主旋律或曲调格格不入，听了一个钟头以后，我真是头痛了，不过这种音乐也的确加强了舞蹈的感染力。观众如醉如狂，这种热情我完全理解。至于吹笛，其意是在宣告主角即将登场、下场或剧情即将达到高潮。

幕间大谷先生带我们到舞台后侧，郑重其事地给我们介绍这位还穿着全套戏服的大名鼎鼎的菊五郎，和他一起照了像。后来，完全出乎意料，大谷又招待我们和他的两个导演同事在戏院餐厅吃晚饭，餐桌上还插着日美两国的国旗。要是在华盛顿，新大使刚到任，就有个戏院巨头来这样招待他，那是不能想象的，但在这里，似乎已经习以为常，而美国也没有与此相近或能与此相比的举国崇拜的传统表演和舞蹈，亦无象歌右卫门和菊五郎那样举国敬仰

21

的演员。这些节目共有六个不同的戏，组成一套，从下午3点演到9、10点钟，但我们已经把最好、最红的两出看了，这两出大约演了两小时。这些戏怎么会对群众有那样大的魅力，不难理解，甚至连我们这些新观众，看罢归来，仍极为感动。

前曾电告国务院，日本可能即将承认满洲国，今天接到复电。国务院问：据新闻报道，日本国会已通过决议，赞同承认，此事我们能否给予证实？我回复道，日本众议院已经通过了决议案，但尚无迹象表明，此举除了政治上的热情以外还有别的含义，也无迹象表明日本政府曾策划这个决议，或者将在决议的指导下行事。我还附上内维尔和有田非正式会谈的要点：有田说，政府不会仓促行事，内田伯爵也肯定不会那样轻率，他正准备回满洲完结南满铁道公司的一些事务，要到7月才能出任外相。

22 由我自己去和外务省谈论这个问题，我看是不明智的，至少目前是如此。连日本有承认满洲国的可能性这一点我们也不应该正式肯定，因为这样做，就会被视为在实际上废弃了日本对我们所作的终将从满洲撤军的一切保证。但同时我又必须知道目前的实情，所以我才叫内维尔去了解，在随便谈论其他事情当中，顺便谈到报上那些异说纷纭的报道。

向美日协会致词

1932年6月21日。东京

诸位阁下，女士们，先生们：

你们当中假如有人当过登山运动员或者原是山地人，就会稍稍理解我今天的心情，因为你们也许领略过，当朝暾初上，登临那渴慕已久的高峰，带着新的眼光，眺览四周的景色，受到新的鼓舞，该是多么兴奋。我在此想到日出，是因为你们的美丽的国徽使我

联想到我往日观赏过的高山的黎明。自我上次访问日本，已经快三十年了，今天我见到的景物和望到的前程，确实都是新的。我国政府授予我的这个地位，也确实是高位之一，在外交界供职二十八年之后来到这个特殊职位上，我感到心满意足，这种深切的心情实难以言词表达。

你们对我的欢迎，我简直找不到话来表达我的无限谢意。它给了我很大勇气来承担这次所奉的重大使命。尤其要感谢德川公爵阁下和其他政府要员，承蒙你们的殷勤好意，光临此会。你们还欢迎了我的妻子和女儿，我代表她们致以谢忱。日本人慷慨好客，久负盛名，我们初到才几天，已感到果然话不虚传。有时我们的语言——确实可以说各种语言的言词，似乎都嫌浅薄。在这种场合，我们就得依靠一种类似爱克斯光的语言，它在口头语言之下振动，常比任何话语都更能传神。你们对我的欢迎，使我更加有理由希望，当我们彼此了解更深时，将会感到这另一种听不见的、只可心照而不可以口传的语言确是一个高明的译员，你我的口谈或笔述，他都能补其不足。

23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时局。若说没有什么重大问题在困扰着我们，那是愚蠢的。必须承认问题是存在的，并且要尽最大努力去解决。我们今天正面临着复杂的国际问题，有许多问题还亟需在今后几个月内加以解决。在日本，在美国，在其他各国，要不是有数以百计的人正在用全部时间和精力解决世界上的困难问题，那么，瞻望前途，就会令人灰心丧气。人们正在逐渐学会彼此合作，共同协商，在会议上开诚布公地讨论问题、交流智慧和知识而共得其益。我深信，朝这个方向做下去，最终将获得成果。上述问题，今晚我全都不能细谈；还没有在你们的国土上扎下根来就大谈这些问题，也未免太放肆了。但是我要请你们相信，全美国都在深切地、普遍地关心着日本。我要请你们相信，今天几乎没有任何问题象远东

问题那样使全体美国人民关切如此之深。

这种关切不限于在华盛顿或纽约或加利福尼亚。它是普遍的。我和总统、国务卿、福布斯先生和卡斯尔先生等好友、以及其他许多人都谈过，此后又横贯大陆，在每一个地方，在接触到的每一个人身上，我都感到有一种强烈的愿望，要了解日本，了解它的思想、它的目标、它的根本意向。我相信日本人民一定也有一种强烈的愿望，要真正认识美国，真正了解它的思想、目标和意向。据我想，我在这里主要就是要起一个译员的作用，我希望能为两国做一种通译的工作，能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不断增进双方的互相信任。我看我的主要任务将是向我的国家解释你们的国家。多年来你们日本人一直在孜孜不倦地研究我国，而我们作为一个民族，对你们的风俗习惯、历史和得到惊人发展的文化方面，也是有许多东西要了解的。你们应用我们的语言这一事实，只不过是这方面的一个证据。

说到美国人民，设若有人问我，在今天的世界事务中，他们最感兴趣、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这个问题在过去十五年中，他们曾用过很大心思，作过很多讨论——我就会毫不迟疑地答道，是各国如何努力建立一个持久的国际和平机构。关心这个问题的，不限于所谓知识界，即教会、大学、各种男女协会等旨在培养和形成舆论的组织，虽然它们的影响很大。上自最高官员，下至底层劳动者，都包括在内。这种关心是普遍的、根本的。对 1914 至 1918 年间那些黑暗日子的回忆，随着时间的流逝，可能已渐趋淡薄，但那几年的经验，已在美国人民心中，在同有此惨痛经验的各国人民心中，培育出一种志愿，一定要在精神上和实际上建立一个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坚不可摧的国际和平机构。

至于世界局势，其严重性是不能否认的。所有国家，包括我刚离开的土耳其，包括美国，都正在受着经济萧条的重压和严峻考

24

验。国家是个人组成的，在紧急情况下，国家就会象个人一样往往可能作出与平时不同的反应。这就使局势更加易变难测，此点是必须考虑到的。但我不是个喜爱危言耸听的人。在当今世界上这种人也太多了。由于天性，又由于有信念，我是个乐观主义者，我坚信，人类的能力和智慧，是能够战胜并制服这些举世为之不宁的困难的，对此日本和我国都负有重任。

在解决我们的问题时，特别需要镇静、从容、达观，尤其是东方的美德。这就得花时间。任何国家都休想在一夜之间恢复繁荣。我们或多或少是置身于同一条船上，而且我们知道，我们已是互相依靠，一国有事，邻国即深受影响。我们毕竟好象是被囚禁在这个浮游于太空之中的小小星球上，满天的恒星都比这个小地球大得多。我们不能离开它，所以我们还是要尽力学会好好相处。

美国之所以真诚地关心日本并切望它能顺利渡过这个萧条时期，原因是很多的，前面说的只不过是其中之一。单拿我们的贸易关系来说吧。美国一国，就承销日本出口商品的百分之四十，并给日本提供百分之三十的进口货。这些数字，值得深思。

就我本人的同情心和善意来说，我希望不久就能把这些心意具体化，化为对我们两国都有益的建设性的工作。要不然，光表示好感，有什么用呢？要完成建设性的工作，又只有直话直说才行，这样才能对彼此的观点有一个十分明确的概念。到底什么叫友谊？它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当然不是建立在空话上。当然不是建立在哗众取宠而不开诚相见的基础上。只有说真心话的朋友才算得上是朋友——在任何一个阶层中都算得上是朋友。他的话有时中听，有时则不中听。但听的人也就晓得自己是站在什么立场上了。现今，不坦率乃是一种缺点，不是优点。时下爱讲假话的人，信誉扫地；爱表示真怀好意的人，也必须用行动来证明自己的

好意。我懂得的只是这种外交，只是这种友谊。

两周前我到达日本时，承蒙各报记者到船上来迎接我，问了我许多问题。我尽量回答，但恐怕还是有误会，因为有许多奇怪的话竟被引述为我讲的，说我自称对当前的日本毫无所知，就是其中之一。不错，我确是有好多好多东西要学，我此来确实是虚心坦率而不抱成见，确实是想竭诚研究日本和它的各种问题。但是，说我对当代日本毫无所知，恐怕就不确切了。相反，我曾经读过、想过、谈过不少关于日本的东西——不仅和我国政府高级官员谈过，而且和许多了解日本的我国和外国的杰出人物谈过，我还和许多我重视其意见、相信其材料的日本政府驻外代表谈过。一个人有这样的经历，就不可能是完全无知。我热切希望，只要有幸和你们在一起，就能不断增加这方面的知识；我还希望，如有不当之处，能通过善意的批评和研究来改正。

我和日本还有别的联系。多少年前我曾访问过日本，下榻东京的一家日本旅社，千方百计力求投到贵国的生活中去，目的就是要尽量学习。然而那时以来，变化多么大啊！宽阔的街道，高大的现代建筑物，瑰丽的公园和花园。这个城市前进得这样快，弄得我这个旧时的游客几乎不可能追上它了。此外，我认为，说到我妻子的由来，也得感谢日本。她做姑娘的时候在这里住过三年，回美国后，有一次我见到她，穿着一套和服，颜色鲜艳，围扎腰带，装饰齐全，站在她家的壁炉边，我确信，当时就是这个情景使我倾倒得使我向她求婚。另外请允许我再说一点，我们还藏有一些名人的亲笔签名，是巴黎和会上西园寺公爵、牧野伯爵及其他参加那次历史性会议的日本代表亲手惠赐的，是我们最珍重并引以自豪的宝物之一。有了上述的一般背景，今后无论要画什么画，就有了一张有用的、好下笔的画布。

在解决我们的问题时，必须有耐心，一百个耐心，还必须信任

领导人员。我觉得我的地位负有重大的责任。要在实际上起作用，不仅需要日本政府、而且还需要侨居这里的同胞们在认为适当时相信我，信任我。我希望他们和日本朋友们都一样感觉到，我的门是经常开着的，欢迎他们经常同我合作，随时随地提出建议和意见。我衷心希望，这次出使贵国，能获得富有实效的、使我们两大民族都长久受益的成果。

最后，我想再提一下卡斯尔先生，自哈佛大学同学以来，我和他一直交往甚密。他是贵国的挚友和爱慕者。我现在提到他，是因为最近我偶然看见他在东京美国新使馆奠基时的一篇演说词，其中有几段话我认为是应该永记不忘的。我想用那些话来作为我在日本期间的座右铭，因为这些话恰好表达了我对我们使馆的要求，在这个就我来说是个很重要的盛会上，最好莫过于把这些话重述一遍：

> 我们希望这些新建筑物能给改建后的东京增添新装。但是，一个使馆，倘若仅有其表，不论外表怎样美观，它就是失败了。如果它只是用于防雨，使大量的文件不受损坏，或只供日常办公人员居住，它就是失败了。它必须是为美日两国服务，成为这种服务精神的寓所。它必须是友好关系的中心。在里面工作的人员必须献身于实现这个伟大的目的。……我希望这块不怕风吹雨打的基石能具体体现我们两国间的友好精神，象征这种友谊永远经得住诽谤者和挑拨者的打击。在这种持久的谅解和友谊中，珍藏着我们对未来幸福与和平的信心。

发展这种谅解和信心，要多多依仗这个热心公益的协会的合作，与此同时，我保证全力以赴。

“日本的局势非常严重”

1932年6月29日

下面是个日本人——警视厅的人——向我的一个属员讲的话。平常这位来客多半是谈天气，这次谈的却值得玩味：

日本的局势非常严重。外表似乎平静，底下却不然，民间有很大的不满情绪。只要有几个人聚在一起，脑筋就动起来了，谋求解决困难问题，寻找出路。我们正不断听到报告，说各种各类的人群蠢蠢欲动。我们搜查他们，拿走他们的文件，抓了一些人，想这样压住，不让任何乱子爆发。但是，什么时候会发生重大事变，那就很难说了。任何时候都可能发生。陆军少壮士官，不听约束；何去何从，他们有自己的看法。不满于政治现状者充斥全国。

至于内阁，斋藤子爵是个正派人，阁员中还有几个亦正图为国效力。但大多数依旧是那些老政客，仍然是在为个人及其党派利益奔走。且看有关县知事的风潮吧。安达这个人，要他为国家做任何一点好事都是靠不住的。他正是一个专搞他自己的政治阴谋的老政客。

许多人一直想组织起来，想物色一个有领导能力的人，来组织一个以公正的原则为基础的新党，但这种人是很难找到的；据我所知，这个规划尚无多大进展。

28

是的，我认为很可能还会有暗杀事件。人们目前的心情既然是这样，要防止这类事件是很难的。

政客们减了所有官吏的薪俸，说是为政府省钱，同时却任命各色政治同伙去当官，而这些官职又是完全不需要设立的，例如各部的政务次官。这些次官都是无事可做。这类事情民

众都知道，心里非常气愤。

光荣的7月4日

7月4日。独立纪念日

今天的工作开始得很早，因为我得在9时参加东方文化学院的开学典礼并作简短讲话。斋藤和另外两个阁员原定要来参加，但是没有来。

12时15分赴东京俱乐部，美国大使照例要在那里向到会成员提议为美国总统的健康干杯（到会者当中有英国大使林德利、加拿大公使马勒、波斯公使、林男爵、石井子爵、还有很多日本人和外国人），12时30分在美国俱乐部，再祝一次酒。两处的庆典都是在酒吧间举行的，这是久已奉行的惯例，我不便干涉。

4时半至7时，艾丽斯和我在家招待各方来宾。我们曾登报邀请所有的美国人，电话通知各个使馆和外务省，说个个都欢迎，虽然很多人都已表示过一定要来的。我穿上礼服，叫陆、海军武官也穿上制服。这里的各国使节每逢自己的国庆日通常是不把外国人请到使馆来的，但我和艾丽斯认为，我们既有新而大的使馆，何不开个先例，把庆祝变成一种招待会。各使团和外务省的几乎所有人员和许多美国人都来了，从斋藤子爵本人算起，共约三百五十人。艾丽斯把大使馆布置得很漂亮，又幸喜天气晴朗，客人们可以在凉台和草坪上走动。大餐厅里可以自取冷菜、香槟酒、混合甜饮料，舞厅里可以跳舞，音乐却不甚佳，因为日本乐队的那个领队兼钢琴家没有来，四个队员还是很卖力的，但他们总是觉得惭愧，坚决不肯收费。虽然美中不足，今天下午的招待会仍然是很成功的，差不多每个人都留到散会，而且看来都很快活。 29

后来我们在平台上吃冷餐，由此可以俯视游泳池和办公处。

艾丽斯早先特别订做了一些日式灯笼，上面用日文写着大使馆的名字，并画有黄色的大帆船（我明白，此种格调是特为投合我对船的爱好而作的）。平台上设有藤椅、草席和许多枕垫，大树罩在头上，照明惟有灯笼和月光，真是一个吃晚餐的好地方。留下来共进晚餐的有弗兰克·麦科伊将军和夫人、连同他的属员布莱克斯利博士和比德尔中尉（麦科伊是今晨随国际联盟调查团来到的，上午来探望我）、德·沃尔特夫妇、约翰逊海军上校、麦基尔罗伊陆军上校、内维尔夫妇、米尔德里德·托伊斯勒和她的已婚姊妹芬斯顿夫人、杜森伯里中尉、华盛顿、小帕森斯、还有一伙年轻人，他们后来又带埃尔西去横滨参加纪念7月4日的舞会，她在那里玩得很痛快。

我刚才忘记说了，参加我们招待会的，还有国联调查团的全体成员，除李顿勋爵因病未到外，克劳德尔将军、艾得罗汪第、施内博士等都来了。南希·阿斯特的儿子小阿斯特现充李顿勋爵的随员，他为他的上司不能来转致歉意，对我派麦基尔罗伊上校去车站迎接调查团、愿协助该团工作表示感谢。李顿真是病重，患了肠炎，发烧到华氏一百零五度，林德利非常焦急。我告诉麦科伊，我们本来很想留他们夫妇住在大使馆，但日本人对此会有什么想法，殊难意料；这样做很有点象贿赂陪审团。麦科伊说，他一向总是避免和我国使馆或领事馆的人员呆在一起，因此即使留他住他也不能接受，他们上次来这里的时候，就曾谢绝过福布斯的邀请。

光荣的独立纪念日就这样庆祝了，恰到好处。

满洲将成为“满洲国”

1932年7月5日

弗莱谢尔是美国记者中唯一接受了我的邀约常来的一位——

每天或隔天来一次，他告诉我，他今晨发表的论国联调查团某些观点的文章的材料来源，这篇文章已引起一片抗议声。他又说，他曾电告《纽约先驱论坛报》：关于日本承认满洲国，林德利已向外务省表示反对，外务次官有田答称，即使承认，最早也得在国联调查团向日内瓦提出报告以后。这个消息后来也在日本报界引起一阵对有田的猛烈抨击，有田为摆脱困境，只好说他不过是表示个人意见而已。 30

弗莱谢尔还顺便告诉我，现正在东京访问的满洲国交通部长丁鉴修昨天接见记者。丁一进屋，就立刻有大约七个日本官员把他围起来，记者们已经觉得非常好笑了。一个记者问道："你赞成满洲国完全独立吗？"这个中国人作了肯定的答复，刚说完，便有个日本官员凑到他耳边来叽咕了一下，于是他又补充一句："这是按照满洲人民自己作出的决定。"另外一个记者问到日本给予承认的问题，丁回答了。那个日本官员又站起来在他耳边唧哝，于是丁又补充说："我们也希望得到美国的承认。"弗莱谢尔说，这实在太滑稽，记者们再也忍不住了，都哈哈大笑。

1932年7月6日

访马特尔，想了解一下，对日本将承认满洲国，他是否也提过抗议。他告诉我，还没有接到叫他这样做的训令，不过昨天和有田谈话时，他曾力劝日本政府不要操之过急，理由是这样行事会使整个局势复杂化。马特尔认为，有田等人表示决心早日承认的公开声明，纯粹是说给国内的人听的，日本政府不会急于行动。

内田今天正式就任外务大臣，并接见日本新闻记者，他说，日本的外交政策依旧不变，日本虽将要求得到它应得的权利，但却不想采取不必要的损及其他强国利益的行动；其他强国的误解，终究是可以消除的，但日本方面如有任何失策，就可能导致严重的后 31

果。“严重的后果”一语，是译载在《日本时报》上的，自然引起了我的注意，我便叫狄考福去找白鸟，问他内田的话这样翻译是否准确。白鸟答道，英译的语气比原话重了一些，但我们所领会的意思基本上是正确的。

“起步起对了”

1932年7月9日

这个夏天，要想碰上许多可以探听消息的交际场合，恐怕不会那么容易，因为很多人都走了，应酬接待也几乎没有了，无从得到与消息灵通的日本人接触的机会。良好的初步基础，看来是已经奠定了，问题是怎样尽量好好地利用它。前几天有个外国外交官告诉我，他的日本牙医曾对他说，美国新大使起步“起得对”，牧野伯爵亦曾对李顿调查团的美国代表弗兰克·麦科伊将军说，我们在这里将会有巨大影响力，可以做很多工作。问题是：怎样做工作？

日本政府完全知道美国的观点，在公众舆论极难控制的现状下，反复申述这种观点，我相信只会得不偿失。任何传闻，只要是意味着美国大使正企图阻止日本政府承认满洲国，就会使舆论大哗，这又反倒会迫使政府改变其初衷而提早承认，报刊现在是代表军部的观点。刚开过一个群众大会，有高级将校参加，其中还有一两个陆军中将，通过了一个决议，要求立即承认满洲国。

今天我写了一封信给牧野伯爵，探问我可否去看他，向他表示敬意。我希望能作一次很坦率的交谈，他也许能给我提出一些有用的建议。我要按照最近史汀生先生和新渡户谈话的精神和他详论大局，希望他能把我们所谈的内容上奏天皇；我要间接地弄清楚，牧野对麦科伊讲话的意思，只是他认为我们可以在向华盛顿解

释日本的观点方面多做工作呢，还是他认为我们可以更明确地向东京阐明美国的观点从而对当前局势发生影响。这两种意思是大不相同的。现在我正找不到开展有益工作的途径，深望这次和牧野谈话可以得到启发。从上面记的这些可以推知，日记既有记事之用，亦有澄清思想之用。

牧野伯爵说年轻的一代已经管事了

1932年7月13日

11时，如约往访牧野伯爵。他穿着和服在他的日式屋里接见我，彼此亲切长谈。我引用了条约并按照史汀生先生最近和新渡户博士谈话的精神，详述了美国对满洲问题的态度的根据何在，并说我恳切希望日本非经深思熟虑不要承认满洲国。他以极谦和的态度听我陈述，然后说道，现在是年轻的一代在管事了；他追溯了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的历史，说道，如今，慎掌国策的元老多已亡故，年轻的一代又还没有培养出他们自己的政治家，目前正是青黄不接，但早晚是会培养出来的。他说，对于前途，他是个乐观主义者。他这种新旧交替论，和我在伦敦听见松平大使讲的很相似。

后来我们讨论到教育的极端重要性和大学在美国国民生活中所起的显著作用。我告诉他，我国大学毕业生是怎样越来越多地在参与公众事务。他描写了他自己在赴巴黎和会途中访问美国的情况，那次距他上次访问恰恰相隔半个世纪。谈话中牧野伯爵提到我在美日协会演讲中的几段话，大加赞赏，说演讲稿已译成日文，呈天皇御览。他谈到比尔·卡斯尔及其在此间所做的建设性工作。最后我说，只要牧野伯爵认为有什么具体办法可以帮助我发挥作用，就希望他以非正式的、私人的方式向我提出，不要拘礼，因为我非常重视他的意见。

33 每个民族都有大人物涌现出来。这次会谈无疑是我到这里以来最愉快的一次，在谈话的整个过程中，牧野伯爵给我的印象甚深，他真是一个大人物。他是天皇近臣，但是，可惜如今军人当道，他也起不了多大作用了。几乎和这里的每个人一样，他也谈到日本人对艾丽斯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总把她当做是佩里家族的一员；他跟弗兰克·麦科伊也谈到过这点，说得更多一些。这次和牧野谈话到底有什么收获？的确，我并没有听到好多具体的东西，他当然不能向美国大使明确表露他对日本国策的态度，但是，我可以体会言外之意，我相信他将会成为一个同情我们的、可能还会有帮助的朋友。

再谈完全不同的另一件事：独立纪念日招待会以后，我才发觉我们餐桌上所有的糖果都带有"莫斯科，U.S.S.R.(俄国)制造"的标记，不禁大吃一惊。听说苏联人正在远东倾销这种糖果，售价比粗糖还低，味道居然还不错。

"危险思想"——反法西斯主义者的专利品

1932年7月15日

有两百名被断定为共产主义者的人正在东京各法庭上受审。他们是去年4月以来在警察历次突然搜查中被捕的。报上几乎没有一个星期不报道某处又有激进分子被捕的消息，但不用说，没有哪一次抓的是军国主义极端分子或其他反动分子。通常都是相当无辜的学生和职员遭殃。反法西斯运动看来规模并不大——其实基本上已被扑灭——但是官方搜捕之后，又继之以大肆宣传，其目的无非是要镇慑其他持有同样信仰的派别，并为军国主义极端分子打掩护。

折衷办理，还是玩弄遁词?

1932年7月16日

弗莱谢尔来告诉我，今晨记者招待会上，白鸟对记者们说，为迎合国联调查团的观点，日本政府正在考虑，在满洲国证明已具备国家资格以前，是否可以先承认它为一个"政府"而推迟承认其为"国家"。这种主张有没有保持中国领土完整及其对满洲的主权的意思，还不清楚，但不管是什么意思，总算是头一次暗示，有可能采取折衷方案。这话要么定有维护中国主权之意，要么就是十足的诡辩。 34

日本为什么在满洲国问题上闪烁其词

1932年7月18日

今晨弗莱谢尔来告诉我，白鸟再次和外国记者谈到满洲国，说法和星期六一样，明白表示，因尊重国联调查团的劝告，完全承认一事可能要延搁一些时候。白鸟的话，可以作各种解释，特别是因为此中牵涉到中国对满洲的主权是否继续维持的问题，所以我便叫内维尔去和有田非正式地谈谈，此去一定要说明，并非奉有任何指令，只是想知道白鸟的话是什么意思。要是由我去找内田，请他作正式的解释，就可能会对局势产生不利的影响，这是我无论如何要避免的。

内维尔和有田谈了将近一小时，主动和他扯家常，说了许多真心话，他和有田很熟，所以能够这样做。有田说，白鸟想必是"疯了"，政府承认满洲国的意向从未有任何改变；并说，一经给予承认，就是承认它有完全的主权。

呈国务卿一封长电，汇报白鸟和有田两人的话，并陈述我们的看法，认为前者的话很象是属于风向气球的性质，是要试探外国的反应，因为，不能设想，没有先和上司通点气，他就敢发表谈话，而且仅隔两天又基本上重复说一遍。有田还对内维尔说，他认为内田不久就会约我去讨论整个局势。关于时局，众说纷纭，互相抵牾的各种声明、新闻报道、街谈巷议犹如横流直湍，怒浪相激，搅得人心烦意乱，而我至少也要随时向华盛顿报告究竟是怎么回事，现在把要说的话都电告了国务卿，我感到舒服得多了。我想，恐怕日本35 人自己也还不知道应该怎么办，白鸟谈话的调子是仔细研究过的，目的是要在国外造成一个好印象，到决定行事时再说。

1932 年 7 月 20 日

拿起晨报，看见内维尔前天拜访有田的事发表了，标题是，现在英美两国俱已插手满洲国的承认问题，惟内维尔此举是否奉有华盛顿之命，尚不得而知。这自然是那个无法无天的白鸟干的，稍过一会儿，弗莱谢尔就向我证实了这一点。内维尔曾非常小心地对有田说过，他只是要求弄清某些新闻报道，并非奉命而来，也不是来提什么抗议，这当然是大使才能做的事。我不明白外务省想从这种大规模宣传方式中捞到什么。内维尔去谈，只不过是意味着我不能非正式地跑去商谈事情，因为我每一次到外务省，在那里讲什么话，都一定会被传给报纸，一定会引起夸张的宣传。日本大使出渊若去过一次国务院，的确也会有记者来找他，向他提问，但是至少国务院本身不会透露谈话的性质，除非有什么正当理由，即使透露，他们也留心不要传错。在东京却不是这样。

9时到办公处就看到国务卿来的论及满洲国承认问题的密电，深感快慰。我认为他是在严格遵循正确的政策。他说他已经看了我的报告，是带着关切和“焦虑”的心情看的。——“焦虑”（“soli-

citude")一词,"韦氏"字典的解释是"怀着恐惧和担忧"。

中国新公使蒋作宾将军今晨来作正式探访。他是穿着一件黑色短外衣、戴着一顶大礼帽来的，这使我在服装(服装是外交的极重要的组成部分)问题上感到为难了。如果我回拜他的时候按常规穿燕尾服戴大礼帽,就会超过他的格式;如果我穿短外衣戴常礼帽，又显然会损害中美间的良好关系。我无论怎么样也不能象这个公使那样严重违反服装上的惯例。这确是我在今后几天得反复考虑的问题。因为外交就是由这类素材构成的。 36

意大利大使、即将在本周内回去短期休假的加拿大公使马勒夫妇、外务次官有田夫妇来吃午饭。饭后我告诉有田,看到内维尔同他的非正式会谈竟发表在报上,不胜惊异,因为内维尔已经很小心了,曾声称他此去并非奉有训令，也不是正式陈述意见，不过是要求弄清报上的某些传说而已。我还说,有田告诉内维尔,内田大概会在这几天内请我去详论大局,我已经注意到了。有田答道,英意两国大使曾要求在本周内会见内田,他想假如我也请求会晤,那就更好了。我说,此刻我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要请求会晤、打扰内田伯爵,虽然以后我或许会有这种愿望。此事就到此暂时搁下。

报纸在外交上的一些用处

1932年7月22日

又一个大热天,早上8时早餐室的气温就达到华氏八十六度。

呈国务院一电，报告热河的军事形势，又呈国务卿一封密电，报告我不要求会见内田一事。我告诉他，要和外务省保持密切联系,时常非正式地讨论问题，将会十分困难，因为这类谈话总是会传给报纸,几乎没有例外，而且往往传闻失实，还会在本地报纸上惹出一些令人反感的、有时甚至是煽动性的评论。白鸟此人,如国

务院所知，似乎是在自行其是，不受上司约束，又好象是专爱哗众取宠，以此为乐。不过我还是说，我希望迟早能解决这个问题。白鸟的确是个谜；币原曾想赶走他而不可能，因为他显然有军部的支持，看来他和军人是沆瀣一气的。他还是石井子爵之侄，又与枢密院议长、反动团体"国本社"的头子平沼深相结纳：凭这些关系，他在外务省的地位当然就很牢固了。此外，他还和外务省亚洲局局长谷正之[①] 非常亲密，后者又是陆军将领谷将军的兄弟，因而两人都和军部有密切关系。

弗莱谢尔前来辞行，他要去轻井泽渡假两周。他是我和新闻界的经常联系人，他走了，我会惦念他的，但他已答应由他的同事唐·布朗暂代，我仍可时常得悉白鸟在每日记者招待会上的妙论。另一些记者显然仍旧是老一套想法，以为美国大使馆决不知道什么消息，也决不会给记者什么消息，因此也就不肯费事打听一下此种情况是否已有改变。弗莱谢尔却从中得益，因为我常常告诉他一些他自己无从知道的新消息。你不可能和新闻界建立有益的关系，除非这些关系是彼此有益的。

以高尔夫球来增进友谊

1932 年 8 月 4 日

美国影片进口商沃纳建议，博比·琼斯玩高尔夫球的一些新影片于公映前先在大使馆放映，我想这倒是一个好办法，可以借此和日本高尔夫球界联谊。通过东京附近各高尔夫球俱乐部的会长，招待券发出了，来了约八十个日本高尔夫球员，还有几个美国人和其他国家的人。放映搞得不错：放映机和留声机都摆在大舞厅帐幔的后面，尽量不露出来；博比·琼斯讲解他的球艺时，声音

① 1942 年继东乡为外相，1943 年为重光所代替。——作者

很清楚，就象他本人在这个厅里讲一样。可惜十二部成套的影片运到日本的只有四部，表演如何使用轻击棒、铁头棒、短铁头棒和短球棒，但仅此已足以引人入胜，后来在吃精美的冷餐时，我注意到好些日本人仍在练习握棒和挥棒的假想动作。每部高尔夫球片子之间加映通常是朴素的音乐动画片，但日本人好象还是很喜欢似的。他们对这次聚会表示非常感谢。

史汀生国务卿的“卑劣的、挑衅的”演说 38

1932年8月15日

下一个事件是日本报纸大吵大闹，反对史汀生先生在对外关系委员会上的演说，这使我在轻井泽才休息了几天（8月10日至13日）就不得不赶回东京。内维尔也回来了。演说想必是在8月7日发表的，我写日记写到这里的时候还没有看到演说词的本文，所以还不知道究竟讲了些什么，不过从搜集到的最新新闻电讯来看，国务卿只是泛泛地谈到在远东局势中运用《凯洛格公约》，并没有直指日本为侵略者。精悍的白鸟先生却不管史汀生是怎么讲的，竟对日本报界说，史汀生先生如此攻击，全日本皆为之愤慨，报纸也就大放厥词；诬之为“恶意宣传”、“极不得体”、“出言不慎”、“卑劣的和挑衅的”等等。有两天日本报纸满篇都是这类谰言，其腔调对日美友好关系毫无补益。事件收场后我才终于看到演说全文，里边并没有什么值得日本生气的东西。日本口口声声说它在满洲的行动是自卫，外务省对这篇演说的公开反应，却正好表明它做贼心虚，这是意想不到的。

日本展开支持战争、反对国联的宣传

1932年9月1日

国际联盟调查团于1932年7月间访问东京时，日本报刊秉承官方旨意发表了一批调子一样的文章，重申日本奉行其“既定方针”的决心。这是写给调查团看的，同时也是在怂恿国民在必要时要对抗国联。如前所述，国务卿在对外关系委员会上的演说一发表，外务省发言人白鸟先生便在8月9日向报界作了一通莫名其妙的、不正确的、挑衅性的解释。这样做的目的，也显然是要煽起民族主义的和反美的情绪。

39 当前，日本全国人民(甚至小学生)又在官方驱策下捐款，为陆军购献“爱国”飞机、坦克、乘用车、装甲车和防空设备。这是为了筹措军费，同时也是在激励战争狂热。

只有武力能遏制日本

1932年9月3日

开了一次有陆海军武官参加的馆员会议，向他们读了呈史汀生先生的电报，这是经过重新考虑后改拟的。大家都同意了。我不想感情用事，但我确实还要不断地公开表明一个意见：除非受到更强的实力的制止，日本政府在满洲的计划是一定要执行下去的。电报写道，如果不为优势实力所阻，日本政府是要坚决实行它的满洲计划的；加之，现在操纵政府的人物还自以为他们的事业是正当的，这就更增强了他们的决心。以上两点无论怎样强调也不为过分，请国务卿务必注意。自由派政治家无足轻重，甚至说一点分量也没有。军事准备正在稳步进行。他们料到，国际联盟定会

发表对他们不利的报告书，但他们还是把美国看作最大的绊脚石；至于同苏俄的摩擦，现在无人谈起了。

我说，日本人是聪明人，很难设想他们真会相信满洲自决这么一个显属捏造的前提，但是他们认为，他们的整个行动，即使不是自卫，也是关系到国家最高的、最根本的利益，因此，他们准备在必要时不惜一战。所有上述意见，均已得到越来越有力的证实，特别是在最近这几个星期当中。细察时局，目前日本人这种顽固态度，我还看不出有什么办法能够克服或改变它。由于国外的道义压力和国内的财政压力，日本的政策或许终有一天要被迫改变，但在目前，我们两国间在政策上和原则上存在着公开对立这样一个事实，我们仍旧不能不正视它。

电报发出了，情况也如实记载下来了，我很高兴。美国制定政策，应当对这些事实有明确的认识。

住在这个国家，使人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作为个人，每个都是友善的，私交是最好的，但作为集体，就总是觉得对方对自己的国家怀有很深的疑忌和仇恨。这种敌意看来根本不是针对个别美国人的。史汀生先生是例外，日本人的敌意全都集中在他身上了。的确，从报刊常会得到这样的印象：日本人在怀疑，史汀生先生的对日态度是否真正代表美国公众的态度。看来有许多人认为，他对日本在满洲的行动历次提出的抗议照会，都只代表他个人的观点，他们直言不讳，一旦史汀生先生离开国务院，情况就会改变。但是，对美国人来说，日本报刊读起来，谁也不会感到舒服。这些报刊一直在骂美国，而有关满洲问题的社论和文章，又只不过是以胡涂思想为基础。它们的一切论点——大意是日本并没有违反《九国公约》和其他条约——都是建立在两个虚假的前提上：一曰自卫，二曰自决。所谓自卫，其法律论据是谬误的。但日本人在提出满洲自决论时，却心平气和地宣称，满洲二千七百万中国居民已经 40

在一场真正的革命中脱离了母国，他们这些中国人已经自己建立了那个闹剧式的满洲国家：这个时候，日本人又变得多么幼稚，这简直是对人的理解能力的侮辱。然而这种论据还是经常作为一个公认的、不容争论的前提提出来，报刊也就凭这个捏造的根据不断地、过细地为日本的立场辩护。

这就是他们的胡涂思想的所在，也是他们的全部论点就象纸牌搭屋那样一碰就垮的根源。我不相信李顿调查团驳不倒日本全部论点所依据的这两个虚假的前提，虽然我也想到了，为了取悦法国人，调查团准会把话说得很婉转。有谣传说，日本报纸也有报道，说克劳德尔将军已接到训令，要尽量降低调查报告书的调子。

9月3日《广告报》发表了一篇署名藤田进一郎的长文，拿日本在满洲的行动来和美国在巴拿马的行动相比。这确是日本社论撰写人最爱写的题目。因此，我很高兴看到弗莱谢尔把两篇文章并排在一起，一篇是这个日本人写的，一篇是他写的社论。弗莱谢尔列举了巴拿马建国的全部事实，结尾写道：

> 以上是有关的事实。美国在巴拿马推行的政策和日本在满洲推行的有相似之处，谁也不会否认。但是，有一个根本的区别，那就是时间的因素，日本作者通常都忽略了。美国干涉巴拿马，是发生在三十年前。当美国军舰支持巴拿马1903年的革命、建立了政府、该政府又将运河权利签让给美国的时候，并没有什么国际条约义务约束着美国政府而不许这样做。
>
> 《国际联盟盟约》、《九国公约》和《凯洛格公约》产生在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以前，各国是靠强力政治决定国运，以战争为推行国策的手段。今天则不然，世界各族人民都坚信要有一种新的秩序，上述条约就是这种新秩序的象征。

《广告报》说话，只能说到这个程度，否则它就会被没收，对于每走一步都得小心的弗莱谢尔来说，也算是相当有勇气了。

上面这些评论，一般人并不特别感兴趣，但是我认为，写日记，就应该或多或少把当时的想法写出来。历史是一串连续展开的活动画景，若干年后能给过去的某一个场面增添一点色彩和气氛，亦不无价值。

花旗银行事件

1932年9月10日

今天大部分时间用在处理花旗银行事件上。假如说这事还不严重的话，则可说是很可笑的。该银行纽约总行曾命令远东各地——中国、马尼拉、新加坡等等，日本也一样——支行将各所在城市商业区的照片寄去，以便了解这些城市现代建筑的进展情况。在大阪，日本宪兵突然叫当地支行停止拍照，此后不久，不仅大阪的报纸，甚至全国的报纸都登出醒目的标题和大幅的图片，指控该银行拍照(尽管是严格遵守日本的法规拍的照)，其目的是给美国政府提供市镇详图，以备战时轰炸这些地区。单从表面来看，这个事件是荒唐的，因为这些地点的照片是在商店公开出售的，而横滨的日本商会，为了做广告，最近还在美国散发过附有同类照片的小册子。银行这样做，其实也是为了日本人的利益。但是，流毒感染，瞬即蔓延；至少该银行已有一个日籍行员辞职；银行又接到爱国团体要求日籍行员全体辞职的威胁性的信件和访问，这样下去，银行即使人员和财产不受损失，也必定会影响银行的名声和营业。

42

白鸟照例向新闻记者肆意夸大其词。因为肇事的显然是宪兵队，宪兵队是归陆军省管的，所以昨天我便叫麦基尔罗伊上校去找陆军省的某些高级军官，要求发表一篇宣布银行无辜的正式声明，但那些军官似乎只是觉得这事好笑，不肯认真看待。此外，银行的柯蒂斯昨天也和有田谈了，有田仿佛表示同情，但当他要求发表正

式声明时，有田却沉默了大约三分钟，最后竟说：“唔，我们怎么能够满意地证明银行此举并无可疑之处呢？”不过，报纸的宣传已经停息，柯蒂斯认为我这方面已无需再有什么行动，但是今天他来电话，说大阪报纸又嚷起来了，登出煽动性的标题，电台公然广播，爱国团体也在捣乱。因此我决定往访内田伯爵，就这事件直接向他提出申诉。

会谈第2号　　　　1932年9月10日

外务大臣内田康哉伯爵

纽约花旗银行事件

43　3时，如约访内田伯爵，他笑着说，久违了。我答道，从他就职以来，我总是想尽量少打扰他。

关于纽约花旗银行总行指令大阪支行在大阪商业区拍照一事，我向他作了详细的申述。

我告诉内田伯爵，尽管并无法律、规章不许拍照，大阪宪兵队仍要求银行停止拍照，随后几乎全国报纸都用耸人听闻的标题报道此事，指控银行所摄照片是要送给美国政府，供拟制战时轰炸计划之用。我详述了这次报纸起哄给该银行的声誉和营业造成的损害，同时要求（1）开始正式调查，（2）为使已经造成的损害得到部分的补救，接到调查报告后，即向新闻界发表正式声明，宣布银行无罪，（3）采取措施停止报纸上的宣传。

内田伯爵留心倾听了我的陈述，说道，在日本，难以干涉新闻界的事，但由于柯蒂斯先生访问过有田先生，调查已在进行，一俟接到报告，他便按照我的请求对此事给予充分考虑。

邀道格拉斯·费尔班克斯来度周末

1932 年 9 月 11 日

此后又到轻井泽畅游了几天，这是今夏的最后一次了。道格拉斯·费尔班克斯是个最受欢迎的客人，满有风趣，天生是个演员，却又出人意外地谦恭有礼。他一到东京我就写信邀他来轻井泽（多年前在华盛顿会见过），但先讲明我们这里的环境是平淡的。他本来另有约会，要和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障碍赛马英雄男爵西中尉共度星期日，但因急于来我们这里，便把别的约会推迟了。星期日先在冷池里游泳，后又冒大雨打了两盘高尔夫球，费尔班克斯连击四十三次。他是高尔夫球名手，在英国常参加对等比赛。星期一下午在他回东京之前又打了一盘。

我们这里还来了一伙年轻人——其实几乎全是我们的朋友 44 ——一起吃中饭、晚饭，喝茶，费尔班克斯玩尽各种戏法，道尽各种传说、轶闻、旧事，使他们一直很开心。他特别喜欢埃尔西，逗得她乐极了。星期一中饭后一齐去拜访德川侯爵和夫人，他们曾邀我们午餐，因打高尔夫球，未能前往。他们横渡英吉利海峡时曾在船上见过费尔班克斯，此后很想和他再见一面。

不用说，纵使是在恬静的轻井泽，也不能完全避免因出名而惹来的麻烦：他老是被人认出来，指出来；从早晨 7 点钟给莫斯小学的两个学生签名起，大部分时间不得不花在签名上，他也总是欣然有求必应；当然他轰动了整个高尔夫球俱乐部，事前已配备好最好的球童，开球时有一大群观众。我每个人都给他介绍了，他总是和颜悦色，热诚相待。他每天都打电报给玛丽，玛丽在一两个月内就要来东京和他聚会；他正在那里租房子，拟小住一个时期，因为他想了解日本人，并多打一阵高尔夫球。有个人请他签名，签完后还

要他再写一点，他便在后面加上“玛丽·皮克福德的丈夫”。他最近在南洋刚拍完一部影片，答应头一场就在我们使馆放映。

分手后他来电说：“周末乐极，无时不欢，至谢。”我相信这是真情，当然，他也曾使我们大家欢度了假日。现在，关于制片、好莱坞和电影界，我们比以往知道得多一些了。他的影片，凡是我们想知道的，他都详细讲解——如影片《八十分钟环绕地球一周》里的印度把戏如何拍摄等等——毫无保留，也绝不夸大。一根绳子抛在空中，印度小孩竟能爬上绳去那样的惊险绝技，制法也很简单，倒转镜头拍摄就行了，绳子是朝下吊着的，并不是朝上。

9 月 12 日，星期一，报上登出华盛顿电讯，报道我星期六就花旗银行事件向内田伯爵提出申诉的事，引用了我发回国内的电报全文，新闻发得真快。我想一定是如我所期，电报已及时到达，赶 45 上了国务院的星期六记者招待会，我知道，美国报纸定会把这次事件当作相当惊人的新闻，因而会向国务院提出一大堆问题。在电报里，我创造了“摄影谍报”这个词，报纸当然也采用了。不管怎么叫，加给银行的罪名，正是这个意思。电报在《日本广告报》上登出后的第二天，《时事新报》就抛出一篇社论，说这是小题大做，竟然诉诸内田伯爵，致使此事变成外交事件，颇觉遗憾，说这是美国大使的轻率，真是不幸。最初白鸟告诉记者，内田伯爵答应调查，不过是按外交惯例对一个大使的申诉给予礼节性的回答而已，并不是真要作什么调查。但是，两天后，显然是由于奉命，他又改口说，对我的申诉，内田伯爵即将答复，将说“日本政府并不认为美国银行的行为不正当，也不认为是动机不纯。预料内田伯爵将会通知美国大使，他不反对向美国报界披露这个消息，但是他未必会向日本报界发表任何声明。”我想，定是有人劝过外务省，要它稍微留意一下美国公众的反应，不过就日本报纸来说，我确信外务省是控制不了的，它也没有作此打算。操纵新闻界的是军部，这次反美国银

行的风波，十之八九就是军部一手造成的，他们以为这又是一个机会，可以在国内煽起反美情绪。

日本在婚姻法和政治方面的正统观念

1932年9月20日

下面是一个使馆职员写来的备忘录：

日本关于使私生子合法化的法律和习惯，比世界大多数国家都宽。在欧洲各国和美国大多数州，要父母随后结了婚，私生子才能取得合法地位，而且即使在这种情况下，通常也还有一些条件限制，譬如，在孩子出生时父母双方均已具备能结婚的合法身分。在日本，未婚父母的子女在出生时即为母家成员，而一经父方承认（不论父亲已否结婚），这孩子即成为父家"庶子"，即合法的孩子，用父方的姓。他可以继任家长，继承家产——事实上，他成了正式的社会成员，不因其出身而背上任何污名。父亲办理承认子女的手续也很简单，只要告知当地户籍官，这孩子为他本人所有就行了，换言之，即在主管官员面前认下这个孩子。 46.

这样轻易就能使私生子合法化的惯例，日本人已经习以为常，根深柢固，因此在他们看来，此种惯例不能适用于国际事务，是没有理由的。满洲国犹如私生子，怀胎时不光彩，生下来更丢脸，然而通过父亲认它为子这个简单手续，也就可以把它变成国际大家庭正式、体面的一员了！

生活的情趣寓于琐事之中，所以我觉得，记日记是莫大的幸福，书信所描绘的，最多不过象一幅印象派的图画；即使是正式通信员连续讲一个故事，也不会总是前后紧密相联，一丝不断，而个人的生活，特别是亲近者的生活，却能提供最有趣的故事。我岳父

托玛斯·萨金特·佩里的书信，自成一格，最近似日记，使我念念不忘。我女儿利拉和安尼塔写信，也是如实反映情况。写日记，难免有考虑不周之处，此乃人之常情。将近三十年了，对我自己在写作上的不慎之处，在回顾时从来不曾成为我们的烦恼。

还是回到政治问题。愿望是思想之父，大概是根据这个原则吧，日本报界预言，国际联盟不久就会瓦解，理由如下：

（1）美国和俄国都没有加入国联，今后美国也不见得会加入。因此英国和法国赞成解散国联，另外成立一个有美国参加的国际机构。

（2）英国对国联的支持，已无多大热情，拉姆齐·麦克唐纳认为，国际问题应通过直接谈判来解决。

（3）国联在远东问题上所进行的活动，毫无价值，如果国联硬要日本服从《盟约》，日本就要退出。

47

（4）法国若要通过国联向德国施加压力，德国就会退出。意大利因同情德国，亦将随之退出，匈牙利、奥地利和保加利亚也会跟着来。

（5）处理玻利维亚和巴拉圭之间的查科问题时，国联已显得软弱无力。

（6）埃里克·德拉蒙德爵士[①]的即将辞职和经费问题也是促国联解体的原因。

议论很有趣，发人深思。是否有人在认真考虑解散国联，我不知道，但自《盟约》通过以来，洪水已一再溢出这个堤坝；它的弱点和不利条件已为实际经验所证明。今天，由于有了《凯洛格公约》，进行一番美国甚或苏俄都能赞同的全面革新，是办得到的，对各有关方面都会有较大的裨益。国联作为国际政治上一间巨大的“票

① 埃里克·德拉蒙德（Eric Drummond，1876—1951），英国人，1919至1933年任国际联盟的秘书长。——译者

据交换所”，乃世界之所需，我国自己就必须跟它合作，而且事实上也在合作；但自有《凯洛格公约》后，《国联盟约》的某些条款已在理论上过时了。那么，保留现有机构，整顿整个组织，根据《凯洛格公约》重订《盟约》，使美国有可能参加，利用这十三年的实际经验，在新的基础上再从头做起，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德国使馆馆员论日本

1932年9月27日

德国大使馆有个馆员，今天来谈了一阵。这几天新闻报道日苏已达成谅解，他对此表示怀疑。可是小矶（武藤将军的参谋长）动身赴满洲前，又确实找过苏联大使托洛雅诺夫斯基，作过非正式的商谈。托洛雅诺夫斯基声称，并没有什么协议，不过他感到满意的是，在短期内俄国不会受到日本的进攻。日本现内阁不想跟俄国找麻烦，小矶将约束陆军。因此，只要现内阁不倒，可望太平无事，但据料现内阁的寿命不会延续到明年1月以后，到那时会发生什么事情，就不得而知了。

我问，俄国人是否认为现正进行的军事准备是针对他们的。

回答是：他们不知道。这位来谈的德国人因为要向他的政府写一份报告，一直在研究此事，他不认为军事准备会有这样大的规模。照他的说法，情况是这样的：若槻内阁（1931年12月倒台），特别是若槻和井上藏相曾想维持金本位，要维持金本位，就必须尽量节约政府开支。陆军原是完全不受任何裁军建议的羁束的，但为了省钱，若槻和井上曾打算裁减陆军。陆军遂不得不有所行动，否则就会丧失他们在国内的全部势力。若槻内阁，要的是联合资本家一起治国，而不是要联结官僚或军部。因此陆军就发动了满洲事变，暗杀了井上和团琢磨。国内一掀起战争热潮，陆军就趁势 48

拼命要钱，以便获得最新式的装备。拨给驻在满洲的五个师团的钱，名为驻军军费，其实用不完。他们正在用这个钱来买装备。同时，为了得到更多的钱，他们还正在叫嚷要对付未来的危险，如将与美国打仗之类。

49

“要么喜欢要么打”

1932年10月7日

常听人说，日本的自由主义分子一直在暗中坚持活动，终究会听到他们的消息的。此说并没有什么具体的证据。尽管不顾军部的反对，日本政府已决定让驻美大使出渊返任，这也许是个好迹象。不过我又觉得，这恐怕是天皇干预的结果。不管怎样，有的明智之士已经看到，假如在这个时刻派一个喧嚣唐突的人去华盛顿，后果将不堪设想，同样，美国要是派这样的人到此地来，也会带来致命的灾难。这种情况，去年5月我在华盛顿见到陆军部长赫尔利时，他用一句就概括了，叫做“要么喜欢要么打”。

下午弗莱谢尔来访，讨论了他即将寄给《先驱论坛报》的文章，随后是某某人来，谈了一小时。他说，他一直不断在作演讲，有一次是向三百个军官讲，清楚地说明了美国的立场。他曾在牧野伯爵等人在场时和天皇谈了两小时零十分钟，他讲的一切天皇都深感兴趣，这使他受宠若惊。他说，天皇完全理解我们的立场，亟欲煞住反美宣传和沙文主义的好战言论。此人还要我注意两点：第一，只要少帅张学良按兵不动，日军就不会直捣北平，这完全以张氏的动向为转移；第二，他希望，美国的大西洋舰队在太平洋演习后，能于冬天返回大西洋，因为，它留在西岸，此间许多排外好战言论和陆海军备战活动就有了借口。他再三说，国内政局，现在是控制住了，军人中比较严重的沙文主义观点正被迫缓和下来。这

最后一点是否属实，我仍然怀疑。

此人能做我不能做的事，正如我函告史汀生先生的，现在是这么一个时候：就美国大使而言，公开演讲时不谈政治问题，倒是上策。我可以在私人谈话中阐述美国的观点，但是一到公开演讲时——实际上所有讲话都会传给报纸，保证不传的也照样传——只要试图说明一下美国的观点，就会引起公开的争论，沙文主义者惟恐我的话会在大众心中留下一点好印象。以后，倘若美国因李顿调查团报告书① 而采取行动，那时公开发表演说，可能较合时宜。国务院最近发了一个文件，就裁军、德国要求军备平等和条约的神圣性等问题极为清楚地、系统地阐明我国的态度和政策，供我国驻欧洲各国的大使参考，鉴于这种说明亦间接适用于此间局势，所以也给了我一份。其中一部分，连同国务卿历次讲话的一些部分，今后要发表演说，可以以此为依据，不过要等情况发展到需要的时候才能发表。 50

此人告诉我，因为我面对攻击而能忍耐，公众的同情是在我这一边，他还提示我，假如我不采用别的策略而只是在适当的时候才运用我的影响，我的影响将会更大得多。

因为谈到这里需要一点诙趣，我便引了一个记者名片上的两句话，名片是前几天送到办公处转给我的，他要求予以接见：

> 请告诉我你对李顿调查团报告书有什么看法，你们美国人民的观点和史汀生老爷是一致的吗？

他理当受到接见，但没有受到接见，因为与记者会面的危险，不亚于发表演说。

---

① 1932年10月2日，国际联盟公布李顿调查团的报告书。报告书虽承认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事实，但却要中国承认日本在东北的"特殊利益"，建议实行满洲"自治"，即建立一个由日本控制的殖民地。——译者

记在日本的一次赴宴

1932 年 10 月 10 日

到德川公爵家赴宴，客人中有出渊夫妇、有田夫妇、武田、麦基尔罗伊夫妇等。德川家的媳妇（亦出自德川家族）作女主人。酒菜、鲜花、陈设、餐具，就我所见过的来说，几近于十全十美，只是电灯没有加罩，强光刺目，把整个景色都给毁了。以客堂上的灯光强弱来衡量主人是否殷勤好客，此种想法，连一些文明国家也仍然摆脱不了，真是奇怪。这种强光既伤目力，又刺激感官，而且把在座妇女的一切美点都照掉了。和往常一样，在酒席上谈话，对我是件苦事，因为日本女人除极少数外，总是不肯顺畅地谈话，说一句，下面 51 的又听不见了，甚至发表意见时也象是在窃窃私语，我只好把耳朵凑到她们的盘子里去听；况且，听得如此辛苦，也很不利于消化。我总想对讲话不肯大声一点的人说：“如果说干什么都得费一点劲的话，提高嗓音总比竖起耳朵省力得多”——但这话我始终没有讲出口。艾丽斯常占优势，因为每次她都是坐在两个男人之间，我则左右都是女人。不管怎样，得与年高德劭的德川公爵共餐追忆他家曾一度统治过日本，也是件乐事。

另一个日本讲话了

1932 年 10 月 18 日

下午某君按约定时间前来。他说，因蒙宴请，特来致谢。但通常只消留下名片就行了，他显然是有话要说才来的。他谈了许多，大意是，日本稳健派的力量还是相当强的，影响也相当广，皆因他们的观点未能在报刊或演讲中发表，所以一般人低估了他们；话讲

得最多，在报上写得最多的人，不一定就是最有影响的人，到适当的时候，那些思想上的温和派就不会再默默无闻了。

这是他们常在我面前叨念的口头禅，但我当然要看到一点实据才行，并且要知道，这个所谓的稳健派运动即使终已受人注意，它又怎样去影响实际政策。现在，日本既然已经正式承认了满洲国，那就很难看出，今后会有哪个日本政府能够否认这一步骤，或承认中国在满洲的哪怕是名义上的主权：看来这是整个问题的关键。至于我，我对某君谈得很坦率，并把美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明确立场告诉了他。听说他将会在日本得势，我很高兴，因为他决不是那种沙文主义的好斗之徒。

在内田府邸宴会，客人中有伍德罗・威尔逊[①]的夫人、出渊夫妇、牧野伯爵、桦山伯爵、德川公爵、有田夫妇、麦基尔罗伊夫妇等。进餐前后我都和牧野伯爵长谈，他的话和今天下午某君所谈的非常合拍，都是强调目前确有一股稳健思潮的"暗流"，继而又谈到《凡尔赛和约》的后果。后来我和某某人坐在一起，他谈的也和牧野伯爵如出一辙。他们都是想使我了解这个意思。 52

只有两件事，尚可视为军人威风稍煞的迹象：一是明知军部会反对，出渊仍将返回华盛顿任所；二是今晨《时事新报》刊出一篇文章，谓朝鲜总督宇垣将军或将接替斋藤，因为人们觉得，在陆军中作为荒木的上级，他是唯一能够驾驭荒木的人。此文竟允许发表，这一点已值得玩味了，尽管到目前为止我还不怎么重视这种预测。

如果说有什么东西能逐渐削弱军阀的势力，那就是国家预算上用于满洲战事的庞大开支：这一点确是必须考虑到的。满洲的"匪"患，看样子是有增无减，虽然听说已攻占"土匪"的一些据点，却没有听到有多大数量的"土匪"失去战斗力。其间又传来另外的

---

① 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1856—1924)，1913至1921年任美国总统。——译者

消息，谓满洲国部队中有不满情绪。还有更值得担心的事，即不知苏俄终究会干出什么。由于“土匪”的破坏，满洲的铁路大部分都有点陷于瘫痪状态，忧虑又因此加深。交通线被破坏，对于假想中的俄国威胁，日本军方就不能处之泰然。这里又包含着一种危险：日本人终将感到有必要占领北平和整个华北。在国际联盟按李顿报告书采取行动以前，他们大概还不占热河，但张学良老在忙着，世界的那一部分正在酝酿什么事，麦基尔罗伊对此很为不安，但现在他也不能下判断。事情都这么模糊，令人惆怅。

与伍德罗·威尔逊夫人共餐

1932年10月24日

艾丽斯陪同伍德罗·威尔逊夫人驱车出游，在明治神宫外苑散步，聊天意兴颇浓。威尔逊夫人谈到一件事很有意思，她说，在日本，微笑一下，非常有用。这话一点不假，艾丽斯就交了许多“微笑”朋友——从我们门口的警察到她训练警犬基姆时路上遇见的母亲们和孩子们都是她的“微笑”朋友。

53 与伍德罗·威尔逊夫人、桦山伯爵等在当地美国人办的圣路加医院院长托伊斯勒博士家晚餐。威尔逊夫人在我邻座，跟我讲到1916年威尔逊总统是怎样听到他再次当选的。故事说得很有趣。据说总统觉得不宜在白宫指挥竞选，便在新泽西城阿士布里公园附近租了一所房子，然而整个夏季他都忙，离不开华盛顿，直到大选(当然照例是在星期二举行)前几天才迁到那里。当时还没有无线电广播，本来可以叫电报公司在屋里装一条专线，可是威尔逊总统又不想要这种“特权”，于是他们便决定由总统的秘书图马尔蒂从设在阿士布里公园的办公室用电话报告选举的结果。

星期二晚上只接过一次电话，那是玛格丽特·威尔逊的一个朋

友从纽约打来表示慰问的，因为《纽约时报》大厦刚才亮的是红色而不是白色信号，说明休斯已经获胜。玛格丽特·威尔逊回答说，除非进一步得到证实，她不认输，但总统却认为是无望了，他说，他感到高兴，可以不再为国事操心（威尔逊夫人说，假如当时真的退了职，现在他也许会在这里），他喝了一杯牛奶便睡觉去了，其余的人仍旧坐着，谈到深夜。星期三也没有消息，只是万斯·麦考密克凌晨4时来电话说，他在西部的选举结果揭晓以前也不会认输。

星期四晚上，已是大选后两天了，依然毫无所闻，威尔逊总统和夫人便动身赴威廉斯敦，去参加塞尔家一个小孩的命名礼，行至威霍金小镇换乘火车时，就是在这个车站上，有个陌生的妇人来向威尔逊夫人献花，祝贺她，因为她的丈夫胜利了。这是他们第一次听到胜利，但还是不相信，以为已经失败了。至少二十四小时以前，华盛顿已得到了消息，但谁也不去报信，因为大家都以为他们当然知道。我问，那些时候图马尔蒂干什么去了。威尔逊夫人说，她猜想他已完全被胜利的报告冲昏了头脑。这样，总统本人，这个最关切此事的人，就成了国内最后听到他自己已经重新当选的人之一。

日本的寺院 54

1932年10月27日

游日光，又一个十分快活的日子。早上，和莉莲·米勒出去瞻仰庙宇。寺庙很多，神道教、佛教的都有，是为纪念德川幕府的创业人家康及其孙家光而修建的。建筑结构和装饰物之富丽堂皇，漆工和木雕之丰富多彩，用不着去描写了。米勒小姐说，以前林德伯格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一言不发，直到全部看完以后，他才说了这么一句："所有这一切都应该保存在玻璃柜子里。"要这样评价，才算比较恰当。我特别感兴趣的，当然是那世界知名的，表示

耳不听恶声、目不视恶色、口不出恶言的三个猴像，再就是那金红二色的圣桥。此外，这些寺院(我看总有六十所左右)乃是掩蔽在一大片巨杉林中，此种景色才真是令人叹为观止。有些杉树据说按年轮计已有千年之久。树属红杉一类，有加利福尼亚红杉的"小兄弟"之称。它们耸立着有如寺庙的高大卫士，排列在长长的长满青苔的石级两旁，筛下点点阳光，洒在金、红、绿三色交辉的屋宇上：这种奇观，使人终生难忘。

参观一家日本丝厂

1932年11月2日

今晨艾丽斯、埃尔西和我，在商务参赞巴茨夫妇的陪同下，赴大宫参观片仓缫丝厂，车行一小时一刻钟。这次参观是早已安排好的，他们郑重其事，大宫的市长和警察署长、公司的副总经理伊丹老先生等高级职员俱隆重出迎。我们参观了全部生产过程，从蚕茧加工、热水泡茧、抽丝、绞丝，直到包好成"本"以备装运——全日本生产的丝，百分之九十二输往美国。最有趣的工序是抽丝——机器排成长龙，数以百计的日本姑娘同时看管着二十台各不相连的机器，五个茧上的丝通过一个洞眼扭成一股线，那丝细极
55 了，几非肉眼——至少是未经训练过的肉眼——所能见。

茧抽完了，或丝断了，姑娘们得把手伸进华氏一百五十度的热水里去换茧或接丝，那纤纤十指，皮都破了，可是她们的动作很快，外行的参观者无论怎样也看不清她们在做什么。车间有扩音器，不断给姑娘们播送音乐，意在使艰苦的工作变得轻松一些。我们在场时，扩音器突然响起美国国歌，以示敬意；我们当然就地肃立，但麻烦的是，放的想必是张大唱片，那崇高的曲调约奏了三次，没有奏完我们就不能走动。

罗斯福当选

1932年11月9日

我自己对大选结果的反应是持"观望"态度，因为我不大知道弗兰克·罗斯福有多大的潜力。有些人一当上总统就获得伟大的名望，至少弗兰克就有这种背景。他对外交事务是否熟悉，我也知道得很少，但他有一套好班子，可以从中挑选他的国务卿。至于我辈命运将受到什么影响，我当然心中无数，要到3月4日以后才见分晓，在此以前，大概也不会知道什么，因为，尽管报上将会有各种各样的设想和预言(有个驻纽约的日本记者电称，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院长戴维·威廉斯博士很有可能被任命为驻日大使)，那都只能是猜测。我自然是很想把这个工作做到底，但我不能在蛋孵出来之前先数有几只鸡。

日本报界对大选结果一致庆幸，因为，第一，他们预料，今后定会有对日本较为优惠的关税政策。其次，大选结果，就意味着史汀生先生从此消逝，他们一向认为，日本之所以因满洲问题而与世界发生那么多纠葛，大部分应由史汀生个人负责。值得注意的是，连使馆里的日籍仆人——帕森斯的女仆和约翰逊的司机——听到这个消息也欢天喜地，两个人都说："史汀生要下台了。"他们之中几乎谁也没有认识到，在对待各项和平条约的态度上，美国人民整个来说是坚决支持政府的，毫无同情日本的倾向。 56

日式晚餐

1932年11月25日。京都

今晚又有一大快事——在日本，似乎总会碰到许多使人快意的事，因为这里的生活是丰富的。在漂亮的大泽公馆饮宴，全是日

本风味。他家父亲是个商人，通用汽车公司在京都的代理人，京都商会会长，出身却是古老的武士家族；出来招待客人的那个儿子，是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生，其妻甚美。共餐的还有母亲、女儿、另一个儿子，加上我们一行和泷野先生。这次宴会，不知我能否描述——很难，因为其优美雅致，必须身历其境才能领会。

进屋时先把鞋脱在门口，他们全家出迎，除儿子外均穿日本装，年轻妇女则着艳丽和服。寒暄毕，男主人领客人至献茶室，沿墙壁设有坐垫，就座时或坐或跪。室为普通方格隔板装成，下铺洁净的草席，为免有玷纯朴，室内空无一件家具。按照习惯，这样的献茶室只陈设一件艺术品——或挂条幅，或置花卉，期望客人赞赏，虚心接受献茶礼。室隅有热水瓮嵌入地中，下烧木炭(木炭自然是看不见的)。当家的女儿来到门口，俯身下拜，然后在嫂子帮助下将木座、轻便木杓、放杓子的茶匣、钵、茶筅等仪物一一取来，她腰带上还系着一条红巾。一切安排就绪后，嫂嫂拿来第一个茶碗——一个小巧的瓷碗。以上各物全放在那洁净的草席上，各有特定的位置。

献茶礼开始。先在每个客人面前摆上一种豆面和大麦糖做的名叫“馒头”的甜品和取食的小箸。女儿跪着用杓子把地下瓮里的开水舀入碗中；打开红巾，再按一定动作折摺三四下，洗了茶碗，装 57 上绿茶，舀上开水，用茶筅搅三次，每搅完一次后在碗边撞一下。于是头杯茶泡好了；嫂嫂扭身起立，走向主宾，下拜，把茶杯放在他面前。主宾深深鞠躬，表示领谢，举杯奉右边邻客，邻客婉却，又奉左边邻客，亦婉却，这才俯首饮下，注意要用左手端杯，右手护着杯子，又要注意须将杯子旋转半圈，不要从送来时的那边喝下。饮后将杯置于面前席上，倾身观赏，向主人品评杯子之美。每个客人都这样一一敬到，一丝不苟。这是我首次躬逢的献茶礼，只觉其雅致宜人，深印在心，已近乎庄严的国礼。

献茶毕，转赴邻室，又在垫子上或跪或坐，围成方形，穿鲜丽和服、戴古式头饰的侍女捧常用的油漆小餐桌而入，每个客人面前拜置一张。先上热米酒，干两三小杯，再斟满，然后吃第一轮菜——鲜美的炖鱼汤、炸鱼、凉拌虾、还有一两味别的，吃时自然是用筷子。大部分我都吃光了，这有点危险，因为后面还有鸡素烧。

原先的餐桌撤去，换上两张大矮圆桌，各放炭炉一个，盘中装一个生蛋，每客一盘，另外就是一碗碗生牛肉片、葱、以及这道最可口的菜所需的各种配料。不用说，席未终，早已撑饱了。最后是水果和接连两杯茶。但最吸引人的还是屋子本身，匀称而又清雅，席间我几乎无时不在观赏——那是一大间四四方方的内室，墙壁是平常朴素的方格隔板，一侧有开阔的回廊，廊窗宽敞，可览室外日本式庭园，室内铺的草席，纤尘不染，陈设只有三样：一是条幅，画繁花正开的樱树一株；二是插花（花囊中插三朵蔷薇和一大颗樱树枝）；三是瓷狮，下有漆座，上罩素净漆匣。这就是全部陈设，但在 58 日本人看来，这屋子已经布置得再齐备也没有了。哎哟，我们在告别时，步履蹒跚，活象过冬的熊一样，但这却是又一个难忘之夜。

大使的娱乐

1932年12月29日

在使馆玩了一场精彩的扑克牌，狠狠地赢了白鸟一下，颇觉痛快。一个人是什么人，在牌桌上最容易看得出来，这次我请人来玩牌，并不是单纯为了娱乐。5点钟开始打，7点半吃晚饭——饭菜极佳——饭后直打到10点。参加者有挪威公使奥伯特、白鸟、金子、大桥[1]、勒·加莱[2]、艾丽斯和我。白鸟是最大的输家，我是最大的赢家，这在我来说，恐怕毕竟是不大合乎外交礼节——但打牌

[1] 后来当外务次官。——作者

[2] 卢森堡实业家，现任该国驻美公使。——作者

就是打牌嘛。我让他明确地知道了，论虚张声势的本领，我和他不相上下，但我通常有胜利的把握。

苏俄：给外交礼节添了一个脚注

在土耳其时我始终采取这样的态度：不能承认苏联大使为外交团团长，而应以年资排在第二的德国大使为尚未承认苏俄的国家的使节们的代理团长。但在土耳其，从未出现什么情况，使我非给这种态度留下记录不可。可是现在，在巴索姆皮埃尔离职期间，托洛雅诺夫斯基暂代团长，他将在1月5日的国宴上向天皇致词，特发出通告，请求各国使节同意他的致词讲稿，这便使我突然遇到了应否在通告上签名的问题。荷兰公使仿照已故的伦杰斯男爵在土耳其的态度，拒绝签名，同样，我、罗马尼亚临时代办及其他一些同僚也拒绝了，但是我请福雷奇[1]转告托洛雅诺夫斯基，这纯系技术问题，并非有意违反国际礼节。托洛雅诺夫斯基答称，他认为，承认他这个人为团长，并不等于承认他的国家，他希望下次见面时和我谈谈这个问题。因此，为慎重起见，我特电请示国务院，相信它定会赞成我的想法。

59

殊知大出我意料之外，也出乎内维尔和全体馆员的意外，国务院回答道，不反对我和托洛雅诺夫斯基保持外交团团长和团员之间所常有的社交上和礼节上的一切往来；他若来访，我应当接待他，还可以交换柬帖，只须写明"致外交团团长"即可，以后凡交换柬帖，我就用私人的帖子。实际上，只要不是把他当作苏维埃政权的代表而和他正式打交道，任何事我都可以做了。

反正事情还没有弄坏。我迅即往访荷兰公使帕布斯特将军，告诉他我已改变决定，对此他颇能体谅，又去请罗马尼亚代办史托

① 德国大使。——作者

依策斯科来见，以便告以此事。然后才叫内维尔去请苏联大使馆再把通告送来，及时签了名。

日本人何以不善于打扑克牌

1933年1月24日

5点半，到一个日本朋友家打扑克，留下来吃饭，又继续打到10点。我是唯一的外国人，跟六个日本人玩。是一个非常愉快的夜晚，虽有我在场，随便的气氛却似未见减损，因为他们之间讲日语或英语都各听其便。白鸟说，日本人不是玩扑克的能手，因为他们太诚实了，但是有好几次我观察到，他们的行为和这种声誉并不相符。不管怎样，我还是赢了。

外交界的座谈

1933年2月14日

昨天和今天，接连同德国大使、荷兰公使、意大利和法国代办谈话，德国大使是我去找他，后三人是他们来问我对大局有何看法。福雷奇认为，自从中日争端开始以来，局势没有比目前更危险的了。意大利代办韦尔硕特还更激动，断言两年内定会爆发世界大战。他和德国人福雷奇预言，《国联盟约》第十六条规定的国际制裁终将实施，日本将会退出国联。帕布斯特和我则在整个谈话中意见完全一致。 60

当他们问我有什么看法时，我先慎重讲明，我要谈的，纯属个人见解，这是因为：第一，美国既非国联成员国，关于国联的行动步骤，我们难以置喙；第二，继任的美国政府尚未就职，除引述罗斯福关于尊重条约的公开声明外，我不能正式代表继任的美国政府发

言，而现政府的态度，已反复申述得十分清楚，无可补充。

说完这个开场白以后，我随时都愿意说，据我个人的意见，我看不出国联，或者别的什么国家，会按第十六条实行积极的制裁（在满洲国问题上）。小国因无利害关系，考虑问题偏于以国联的威信为重，可是我不相信在远东有利害关系的大国会轻易容许事态发展到那样地步。因此我认为国联的行动不会超过道义制裁。

日本人最爱与压倒的优势进行所谓英雄的斗争；强制性的措施只会使他们更紧密地团结一致，甚至比现在犹有过之，而且，即使各国愿意采取行动，究竟能否把他们逐出满洲，还是值得怀疑。我还认为，日本未必会退出国联。军部和沙文主义者想现在就退出，但自由主义者却在竭力反对。币原今天已谒见了西园寺公爵（最后一个元老）。韦尔硕特要我相信，币原是去保证支持政府可能采取的一切步骤，但某君曾明确告诉过我，正如我所料，他是去劝说不要离开国联。还有一些人也正在为此尽力。

当然，由于军部的力量到底有多大谁也弄不清，我也许终竟是错了，但是，退出国联，首先必须得到内阁、枢密院和天皇的同意，而且据我所知，斋藤、高桥、牧野等名流都在反对，因此，要走这一步，至少也要估计一下代价。我的同僚们虽各有所见，但都同意这么一点：强制措施将会给世界和平带来极大的危险。

61

呈国务卿史汀生函件

李顿调查团关于满洲问题的结论

东京，1932年7月16日

绝密

国务卿先生：

假如把我们在此地了解到的情况作一简短的摘要而能不时对

你有用，我愿意在有事可告时，将这种摘要由双周邮袋寄上。

最近两周的大事当然是国际联盟调查团的来访，此事刚刚才结束。……

简略说来，调查团成员一致感到，日本在满洲的行动是根据两个假设：(1)自卫论，(2)满洲自决论。两个论点都被认为是站不住脚的。调查团团员满意地证明了，自1931年9月18日以来，铁路被炸以及随后的每个事件都是日本人自己精心策划和执行的。他们认为，建立这个傀儡国家，非但不能使远东得到安宁，而且会种下深仇大恨，使日中、日俄终将不免一战，会产生一个远比收复阿尔萨斯—洛林更为严重的收复失地运动。他们认识到，日本人也许能给满洲提供一个比中国人统治时效率较高的政府，但这个事实也丝毫削弱不了收复领土的活动。他们认为，日本的行动直接违反《九国公约》、《凯洛格公约》和《国际联盟盟约》的条文，行动之前，本应与其他缔约国进行磋商。他们建议，仍应进行这种商讨而推迟承认满洲政权。他们觉得，即使根本没有和中国人谈过，只就他们与日本人会谈的结果来看，判决也将对日本不利，这是十分清楚的。所有上述各点，除了最后这一句而外，都已在与内田伯爵的两次会晤中向他作了阐明。内田伯爵方面则毫不含糊地声称，日本已决心承认满洲国，任何反面意见他都不能考虑，也不能就此事进行任何讨论。 62

调查团呈国联的报告书是否将明确地反映上述各点，将用什么语气，我当然不得而知，但调查团的五个成员对调查结果都有一致的判断，看来是确定无疑的。

至于此刻正在满洲当政的日本人，我知道所有调查团成员都认为，这些官员实际上是直接听命于日本政府的，如有什么相反的迹象，也不过是"装潢门面"。但也有些调查团工作人员以为不是这样，觉得那些日本官员是"自命不凡"的，并不愿听东京的指挥。

调查团向内田伯爵陈述的那些调查结果和意见是否会对日本政府发生任何影响，会使它的态度有所改变，俱未可逆料。大概不会。就目前形势来看，恐怕要不了多久日本政府就会承认满洲国，但是，如果它采取这一步骤，那就是明明知道西方的意见而故意这样干了。

我在7月7日电报中说过，撇开问题的法律方面不谈而纯从实际效果来看，我觉得，美国若在目前这个时候抗议日本承认满洲国，那是不明智的。报刊现在大都是代表军部的观点，抓住美国的抗议大做文章，无限夸大，在目前情况下它们是做得出来的。很可能会爆发一阵喧嚣，军部就会以此为借口，不顾政府中比较稳重的人的意愿，提前行动。这个危险是存在的，乃是我部下人员一致的意见。若从法律的观点或从世界舆论和历史的观点来判断抗议是否明智，我当然没有资格。关于这方面，有个知名的贵族已经发过议论了，他最近和我的一个馆员谈到军部时说："我希望他们及早改变主意，不要弄到亡国而后已。"

格鲁谨上

日本怎样仿效德国

东京，1932年8月13日

绝密

国务卿先生：

你在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演说发表后，日本舆论哗然。此中意味，显而易见：日本人若非内疚心虚，就是小题大做，因为我们现在获悉，演说只不过是在学术上讨论一种假设的情况，而日本人却视之为指控某一特定罪行。遗憾的是，我无法缓和这篇演说在此间产生的影响，因为我还没有接到演说的原稿或原稿的内容摘要，原

稿得由上海寄来，等到寄达时，事件恐怕已经收场了。不论事件如何发展，反正外务省已经利用了这篇演说，蓄意煽风点火，使公众的反美情绪息而复燃。其所以谓之“蓄意”，是因为日本报界的激烈反应并非根据来自美国的新闻专电，而是根据外务省对出渊大使的来电所作的煽动性的解释，这种解释又是先发给日本报界，第二天才发给外国记者。 64

此种情景，使我清楚地想起了 1914 年德国政府的做法，那时它就是用诽谤外国来煽起国民的战争心理，以后每逢要作新的冒险，例如要发动不加区别地袭击交战国和中立国一切船只的潜艇战时，它就重施这种伎俩。在日本这里，蓄意煽起公众的仇外情绪，特别是仇美情绪，无疑也是为了类似的目的——使军人可以不顾外国、特别是美国的反对而在满洲放手大干。

我认为，这在日本人来说，是虚弱的一种表现，不是强大的标志。日本国内的经济财政，情况严重，也许还会走到绝境。农民困苦不堪，许多工业部门一蹶不振，失业人数不断增多。日元正在贬值，物价却仍未相应上升。钱从国外得不到；最近听说（虽不能保证此说可靠），日本政府曾相继向英、法、荷谋求借款，都没有借成。内债也日益难借。当前形势还不是那么险恶，然而一到“日本银行”吸收国内公债的能力枯竭，恐怕就很危险了。

与此同时，成百万的日元又正浪费在满洲的军事冒险上，由此到底能获得多大经济利益，是非常成问题的，身受严重剥削的人民一旦懂得这些费用的全部用意，后果如何，就难以设想了。我相信，除了不肯面对现实、头脑发热的军阀而外，政府和国内肯思考的人们当中，都有人在日益感到不安。看来主要就是这些军人——以白鸟之流为喉舌——以为，要掩盖上述那些事实，最好的办法是进行宣传，说外国、尤其是美国要阻止日本致力于所谓自卫，借此在民众中煽起爱国的、民族主义的狂热。

这种民族情绪，一向是危险的。1914年，在精心培养的国民战争心理的支持下，德国的军事机构成了脱缰之马，凌越一切束缚势力。日本的军事机构与此并无二致。它本来就是为战争而建立的，现在又自以为已经作好了战争的准备，也将欢迎战争。它迄今65还没有被打败过，具有无限的自信心。我从不危言耸听，但我认为，我们应该随时当心，看到未来一切可能发生的事。历史事实将证明，闭目塞听，就是犯罪。

格鲁谨上

满洲与李顿报告书

东京，1932年10月8日

绝密

国务卿先生：

前函寄上后，在日本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承认满洲国，二是李顿报告书的发表。日本政府如此急于承认满洲国，有两重用意：在国联可能按照李顿报告书采取行动之前，先在国际和美国面前造成既成事实；给陆军一点甜头，以防他们颠覆斋藤现内阁、甚或建立军事独裁。最后的结果是，稳定了国内局势——采取这一措施后，国内安静得多了。

承认满洲国之时，美国竟毫无动静，全世界的反应也相当微弱，日本人显然感到意外。也可能有宽慰之感，但我却倾向于认为，宽慰之中还带有几分失望，因为，从现在全国的情绪看，日本人实际上最不希望的是各国对他们不加理睬。他们喜爱的是戏剧性的反应。

此间对李顿报告书的反应，不出所料——群起谴责调查结果，故作义愤填膺之态，但除粗暴否定调查结果的准确性外，未见有任

何严肃认真的反驳。不过，思想比较稳健明智的人并没有跟大众一起叫嚣，式部长官林男爵就是其中之一，他是个心直口快的人，最近和一些朋友谈论时曾说，他认为报告书是个值得钦佩的、通情达理的文件，尤其是第六章，这章指出了，满洲政权是日本军人建立的。在满洲的冒险行动将把国家引到何处？对此日本有很多人忧心忡忡，但是报刊都不敢登载他们的意见。军部仍完全控制着报刊。 66

最近有两个人的谈话颇能说明当前日本人的心理状态。秩父宫最近宴请弗雷德里克·穆尔——穆尔刚从美国来，将充当出席即将召开的国联大会的日本代表团的顾问。秩父宫欲知美国当前舆论情况，竟向穆尔询问逾一小时之久，最后直截了当地问道，据说美国正为对付日本而积极备战，未知确否。此种疑问竟出自天皇的兄弟之口，日本此刻之紧张不安，可想而知。另外是一个日本友好人士和我谈的话，他对时局的评论我觉得是中肯的，因此摘其大要附上。他的话，核心在这么一句：军人之所以在满洲铤而走险，是因为他们感到，不"为国家的利益"做点事情，就会丧尽一切权势。所以不管今后事态如何发展，都得考虑"保全面子"这一重要因素，这是东方国家看得最要紧的。我认为，整个局势中，最危险的因素就在这里。执迷狂妄的军阀，一旦发觉其计受阻，以至可能失败，不论阻力来自何方，国内或国外，他们都会蛮干，宁陷国家于奇灾大难，也决不会向比较明智的稳健派投降，或承认计谋失败。

*　　*　　*

报纸上的反美宣传正趋平静，虽然军部也许不会让它完全停息。最近已经登了几篇较为友善的文章，《报知新闻》举办的飞行赛失事，总统来电慰问，此举亦将起良好作用。前几天有个美国新闻界名人告诉我，他曾和白鸟谈到日本人是多么荒唐，竟担心美国

正在准备和日本打仗，对此白鸟答道："当然是荒唐的；你想，如果我们认为真有发生战争的危险，我们会那样放胆地攻击史汀生先生吗？"

新来一个姓鲍的满洲国使节，逢人便粗暴地声称，满洲国打算尽早摆脱日本的监护，长春的华人部长大多数是日本人雇用的，但他本人却是"相当独立自主的"，等等。这话是否真实，我却怀疑。他还发表政见，认为亨利·溥仪不久就会成为包括满洲在内的"华北国"的皇帝，建都北平。有些外交界同僚和外国记者好象还很重视他的话，林德利和我却没有把它当一回事。样子很象孩童的小鲍，大概还要继续说大话。

67

至于我们自己今后的政策，我现在更觉得，高明的办法是一面坚持我们的立场，维护《凯洛格公约》、《九国公约》、和"门户开放"政策，一面又尽量不要采取可能激怒舆论的措施，以免助长军人的气焰。你最近在费城的演说中对日本有好评，象这样的友好姿态，连白鸟也终于承认是善意的，还有总统对飞行失事的慰问：这些都能助此间稳健派一臂之力。想必你也有这种感觉。依我之见，国联若按李顿报告书采取行动，最好能够掺上一些友好的和建设性的建议，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越这样做，倒越对我们利多害少。要使各项和平条约在远东终于得到履行，唯一的希望在于鼓励日本的稳健派。

关于这方面，有个参谋本部的人跟我们陆军武官讲的话值得玩味。这个军官说："如今我们是在加班加点地从8点一直工作到6点，因为我们得管两个各不相属的部——陆军省和外务省。"

格鲁谨上

日本友人论陆军对俄国的恐惧

有个日本朋友说，军人在满洲从事冒险之初，日本人民对此事是抱怀疑态度的。后来，直到国联和美国开始谴责日本人的行为时，人民才团结起来作军人的后盾，就象全家站出来为一个受外人攻击的家人作后援那样。他们不会在目前这个时候承认军人是错误的，然而也正由于象一个家庭，他们终究会承认，也许是那个被[68]攻击的人家没有理。现在对日本采取任何激烈行动，都只会加强这种家族感情，使军人继续当权；倘若大家都稍安勿躁，就会出现一种对军人的反感，币原外交[①]也许还能恢复。国家也和人一样，都不喜欢被人厌恶。

军人正在力图保持其权力，同时也正在力图使人民情绪处于愤激状态中。他们总是想向人民显示：军人乃国家之所必需。他们之所以发动满洲事变，这是原因之一。日本有一种心情，认为国家总得在经济上有个出路，而军人也感到，若不为国家的利益做点事情，他们就会丧失一切权势，如果实现裁军，将来军人就会一钱不值，所以他们不得不采取行动，以保全其地位。

日本人非常容易激动。他们好似一个孩子，打了别的孩子以后，现正惊慌失措，东张西望，就怕有人来惩罚他们。这种紧张状态，要到国联开会讨论满洲事件以后，才会和缓下来。

日本陆军的作战计划确实是针对俄国的——不是现在就付诸实行，而是有朝一日要以兵戎相见。日本很怕布尔什维主义，认为一定要把布尔什维主义赶出亚洲。

---

① 币原外交：币原喜重郎(1872—1951)1924至1927年、1929至1931年任日本外相，标榜所谓“协调外交”，即在推行侵略政策时手段稍微放温和一点。——译者

日本已经安静下来的时刻

1932年12月3日

绝密

国务卿先生：

此间政局十分平静，只有一个意义非常重大的例外，那就是，包括荒木将军在内的当政人士看来已感到日本的政治暗杀事件太多，决定加以制止，办法是打击整个阴谋活动的主脑人物，即黑龙会的老人头山满本人。他的住宅最近被警察查抄，儿子被捕。头山向来是不受侵犯的，但最近谣传，有刺杀斋藤、牧野、一木、高桥的计划——仿照以前对四个优秀人物(滨口、犬养、井上、团)的政治谋杀——这就使政府下了决心，认为采取严厉措施以终止暗杀的时候到了。有颇大部分人，包括军部在内，一向都认为头山是一个堪称超等爱国者的人物，而政府竟敢来这一手，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政府的信心和权威在增长。这并不是说斋藤内阁的寿命定会延续到国会下届会议以后，因为这看来是不可能的。不过，这的确意味着那些对以往恐怖政治应负直接或间接责任的沙文主义的鲁莽军人和所谓爱国会社不再是那么坚不可撼的了，人们希望它将为较有裨益的开明政治所取代。

69

报纸上的反美宣传，现在实际上已告停息。我想这也许和某某人有点关系、还很可能是天皇亲自下令制止的。值得注意的是，陆军省的新闻局最近完全换了人。有个新换来的军官是从驻墨西哥的日本公使馆调来的，当我们的陆军武官向他含笑致意、希望他能制止反美宣传时，他答道，这正是他要做的。荒木将军最近遇见我们的陆军武官时，态度亲切，出人意料之外，这跟他对我的态度一样。白鸟已大为失势：他在陆军中的密友已被调走，他的政治盟

友、政友会[1]的策士森恪也在生病，暂时销声匿迹。在记者招待会上，白鸟唱的调子已比以前低得多。日本反美情绪现在何以沉寂下来，我在 11 月 28 日电中还举了一些别的原因。当然，这种情绪始终存在，任何不愉快的事件发生，很快就可以煽而复燃。

关于即将在日内瓦召开的国联大会，我和许多外交界同僚、外国记者、熟悉日本的美侨都谈过，发现没有一个人认为日本会作实质性的让步；要变更或修改日本对满洲国的承认，定无此可能。另方面我又觉得，日本很可能还留有一手，准备在最后时刻拿出来。

我这样推测是根据三个理由。第一，尽管日本现在说话肆无忌惮，行事却未必会那样轻率，甘冒全世界的道义谴责。看来他们 70 可能有某种计划，想用来防止国联通过谴责的决议。第二，日本正在日内瓦为自己的立场辩解。假如一个国家确信自己有理，一如它自称的那样，那又何必辩解呢？第三，越来越明显，日元汇率最近之所以猛跌，国家的海外信用之所以随之进一步低落，其主要原因都应追溯到人们对日本同全世界的政治关系缺乏信心。这种心情不消除，就始终存在着由货币崩溃引起财政和社会混乱的危险，也不能指望外国金融市场会给予援助。

据我看，日本人是正在设法缓和李顿报告书反对日本的行动所激起的情绪，在别人以实际行动反对他们之前，先尽量掩饰自己的行为，到最后，可能就主动提出一些建议，意在今后几年使问题终于得到解决。不过，无论是什么建议，我决不相信会有放弃承认满洲国为“独立国”的打算。关于这些建议（如果有的话）的内容，我的属员和我一周来一直在尽力打听，想略知一二，但仍无所获。国联大会上的讨论很可能还要延续一些时候，对日本的意图一有所知，当立即电告。

---

① 日本两大政党之一，较保守；另一个叫民政党，比较具有自由主义倾向。——作者

我在 11 月 28 日电中曾建议，处理中日争端，必须克制，因为，强制胁迫，肯定只会使日本民族更加牢固地团结起来反对国联和美国。有一点压力，不论是军事的或经济的，我相信都会促使全国团结成为军部的后盾，以致完全压倒比较稳健的势力，这些稳健势力正在暗中致力于恢复日本过去在国际会议中的重要地位。不过我觉得，施加道义上的压力，就不会造成这种危险，说不定还会加深军部和稳健派之间现正开始显露的裂痕。全世界舆论的压力，加上平定满洲的困难和过重的军费负担，最后也许能使日本改变它对这个问题的态度。不管怎么说，既然以物质压力相威胁几乎一定会带来事与愿违的后果，施加道义压力，我看就是我们唯一的机会了。因此，时间的因素很重要，问题只能逐步解决而不能一下子解决。

71

我在大阪的演说似乎还有点效果。其主要目的是想纠正这里的普遍看法——以为你那样积极维护各项和平条约，并没有得到美国人民的支持。我对此明确提出相反的意见:

> 至于美国人民，他们是全心全意支持〔和平〕运动、支持那些为缔造和平局面而努力的人的——在那局面下，各文明国家之间将不再有战争，就象现今各文明国家都已废除了奴隶制度那样。这种和平运动，代表着全体美国人民根本的、统一的、一致的愿望。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鲜明的、毫不含糊的。我们已经反复阐明了我们的立场。

另方面，演说的语气和内容又都极为友好，以期有如用药，既给人服下，又不致引起疼痛。昨晚外务大臣私下向我表示赞赏这篇演说。

借此机会，我想向你表示：你给诺曼·戴维斯和休·威尔逊的指示，是正合时宜的。

格鲁谨上

史汀生国务卿的复信

1933年1月21日

昨天深夜收到的两周邮袋中有史汀生先生一封令人颇感欣慰的亲启函件，其中有这样两段话：

> 你对形势的描述与我们所见略同，我们的行动方针一向和你所建议的大体一致。
>
> 我注意到了，关于美国人民的情感和我维护各项和平条约的立场，你一直在向日本人解释，对此我特别感到兴趣。你所援引的你最近演说中的那段话，把我们的立场讲得十分确切。我确信，你正在做的事，必大有裨益于将来。

迄今为止，大使馆的工作看来是顺利的。



二、暴风雨前的三年平静

(1933年2月20日—1936年2月11日)

谁也不会忽视日本决定退出国际联盟的政治意义。这标志着日本与西方列强断然决裂,为它后来归附轴心国铺平道路。但是,日本离开国联的直接后果,在内政外交上,都不是转向极端主义。恰恰相反。日本领导人对西方列强作了敌对的政治姿态后,却采取一种近似缓和政策的方针——至少对美国是这样。然而表面尽管温和,日本外交政策的实质却依旧是强硬的:限制海军军备的条约不再续订,又向中国派遣大量日军。但对军国主义者来说,事变的进程还是不够快,不合他们的要求。平静时间越长,风暴来得越猛。

75

日本决定退出国联

1933年2月20日

内阁今天议定，一当国联大会一通过“十九人委员会”的报告和建议①，日本即退出国联。很明显，斋藤、高桥等人的反对，已全被压倒了。内阁行动如此急速，又表明是要以此作要挟，企图阻止大会通过报告，同时也是一种姿态，想再次显示其沙文主义的独立自恃。此举须经天皇和枢密院批准，如何退出、何时退出，也还没有讲清楚，但终归要这样做，现在看来几乎是确定无疑的了。

我自己的猜想错了；直到最近，我还以为他们不会走这一步，然而这和他们迄今所做的每一件事——急速承认满洲国等等——皆是一脉相承的。他们的政策，就是要用一个接一个的既成事实来对抗全世界。军部依然至高无上，仍旧构成一种恐怖主义的独裁制。几乎无可怀疑，斋藤一定得到通知，他必须跟他们步调一致，否则国内就会发生破裂，而以暗杀他本人和其他曾反对退出国联的人为起点。就是元老西园寺，在军阀面前实际上亦无能为力，看来今后也仍将受到冷遇。政府中较明智的首脑人物，处境与斋藤内阁刚成立时完全一样；当初他们在爱国心驱使下，屈从于极端分子，总以为随后能掌握控制权，以为同时可以避免再发生“五·一五”②那样的事件，从而对国家有利，但这一切希望都落空了。在此期间，白鸟还扬言，进军热河，随时都可开始。如果日本真是要进军北平，就有发生全面战争的巨大危险。前景简直暗淡无比。

不管如何，我是完全赞同国联的行动和“十九人委员会”的报

① 国联大会把李顿调查团报告书交给一个“十九人委员会”研究，委员会草拟了一个报告，建议国联不要承认“独立的”“满洲国”。——译者

② “五·一五”事件，即前面提到过的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五日陆海军极端分子刺死首相犬养毅的事件。

告和建议的。日本既然终于决定甘冒世界之大不韪而使自己处于孤立地位，硬要推行"亚洲属于亚洲人"的运动，很可能还要最后提出远东的"门罗主义"，那么，还想以容忍去迁就它，似乎就不再有什么意义了。我们困难的日子恐怕还在后头。 76

让人民了解情况

1933 年 2 月 21 日

弗莱谢尔来向我征求意见。他即将给《纽约先驱论坛报》发一篇相当激动人心的专电，指出时局险象环生，普遍在谈论爆发战争的可能性。我说，让国内公众认识到前途有潜在的危险，是很好的，而且他的专电将在巴黎发表，这对日内瓦也可能会产生有益的影响。我告诉他，无须掩盖时局的严重性。

日本与西方决裂，这意味着什么

1933 年 2 月 23 日

经过几天的思考和商谈，我曾试将我的一些想法集中在下列几点结果上：

无论对远东形势作何估计，均应充分考虑下列各点：

(1) 内阁决定退出国际联盟以前，日本已采取各种手段烧毁它与外部世界相通的这个最重要的桥梁。现在走这一步，意味着它国内的稳健派已根本失败，军部已取得压倒一切的优势。自中日争端开始已来，国际联盟的每个重要行动，日本不是阻之于前，就是以既成事实毁之于后，这都是为了明白显示日本要撇开西方而独行其是，蔑视西方对它的事务和它自视为生死攸关的利益的干涉。不能指望它会屈服于西方的道义压力或别的压力。军阀和

在军阀煽动下的国民，都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宁战不屈。现在，来自世界各国的道义谴责，在日本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谴责非但不足以改变日本人的决心，而且只会加强他们的决心。只要政府露出一点与国际联盟敷衍或妥协的倾向，国内即使不爆发革命，也几乎一定会发生更多的暗杀事件。

77 (2) 这种民族情绪是由许多因素造成的，重要的有如下几点：

1. 军部决心保持其威信，不容有任何干涉。

2. "保全面子"本来就是一个重要因素，它是不许后退一步的。

3. 满洲是日本的"生命线"这一信条，经过精心、反复的灌输，已深入民心。

4. 满洲的巨额军费将会造成财政困难，军部是完全不管的，凡涉及他们那个领域的事，他们决不耐烦考虑什么节约。

5. 当条约义务和日本人所自称的切身利益发生冲突时，再要说此种义务仍属神圣不可侵犯，他们就根本不能理解。

(3) 关于入侵热河，我有理由相信，日本人会特别谨慎，不越过长城，尽管这样做可能给战役带来大得多的损失和困难。不过，若是忽视下列危险，也是不明智的：当情况有了发展，或发生意外事件，也可能导致夺取北平和天津，这自然立刻就会使列强的利益和日本直接发生冲突。国联若采取任何积极制裁的行动，日本完全可以用迅速占领华北来作回答。这确实是未来的最大的潜在危险。

(4) 最后，我们必须记住这样一个事实：在军部宣传的影响下，相当多的国民和陆军都认为，美日之间、或俄日之间、或美俄同日本之间终将不免一战。效率已经很高的军事机器，仍在不断地、

急速地加强，其自大和自信已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海军也越来越好战。陆军、海军和国民都处于这种精神状态，因而就始终有这样的危险：任何足以激怒舆论的事件，都可能使日本采取激烈措施而不计代价。

上述判断，不仅是代表大使馆主要成员的意见，东京的外交界同僚和其他外国人士多半具有同感。这些事实和见解，在我经常呈送国务卿的报告中，当然有所反映。

喜事可以解愁

78

我国驻欧洲一个国家首都的杰出的同僚最近电告国务院："王后生了一个女儿。我已向首相道喜。"在华盛顿，值此政治形势暗淡无光之际，国务院接到这封电报，定可聊以自娱。

有能维持和平的和平公约吗？

1933年2月23日

我最近曾在日记中说，我赞成国际联盟处理中日争端的报告和建议。这句话必须修改，正如这本日记中的许多话一样，不过是说出一时的想法而已，思考较成熟后，就得随时修改。那些建议在理论上也许还不错，但问题在于，由于不切合实际，实行起来不会有效，至少在目前是行不通的。当然，从国联的观点来看，舍此别无他途，而且它卷入这个问题后，在我国政府的鼓励下，至少也曾经表现过耐心和克制。然而越是全面来推敲，就越加不禁要问，十四年来世界如此苦心经营的这个和平机构到底是否基本健全，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否基本实用？

不妨稍发遐想，拿1931年的满洲情势来和1898年的古巴情

势比比看。假定古巴危机[1]是在《凯洛格公约》缔结后展开的，"缅因号"巡洋舰在哈瓦那港口被炸沉，战争心理便象森林大火那样燎遍我们全国，全国男女老少都在叫喊"记住'缅因号'"，我国政府终能防止和西班牙开战吗？1898年麦金利欲求避免战争而不可得。纵使那个时代已经有了《凯洛格公约》，我们不也会为舆论所迫、以自卫为理由、不经宣战就占领古巴吗？是谁爆炸"缅因号"，今天的公众仍在猜测，并不知道。是谁制造事端，导致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进攻，今天的公众也在猜测，也并不知道。

79 当然，古巴和满洲情况在许多方面很不相同——我国的行动基本上是人道主义的，日本的行动则纯粹出于私利。可是，在这两件事当中，战争心理都同样起着强有力的作用。有许多人深信，日本欲取满洲，由来已久，与取朝鲜无异，只是等待良机而已。这样看也许对。

我的论旨不是要为日本辩解，而是要探究，如有哪个国家——也包括我国在内——因求战心理十分强烈而发动战争，和平机构能否制止它动手。譬如说，《凯洛格公约》能够阻止南非战争[2]吗？英国大使馆的某某告诉我，当年他的父亲就因主张和平，在自己的村子里竟也有人拿石头打他。詹姆森之偷袭德兰士瓦，[3]其为暴行，就和1931年9月18日日本人的行为完全一样，假如不发生德国皇帝电贺德兰士瓦总统克鲁格获胜这件事，英国人自己本来是会谴责这种暴行的。那封贺电看来是件小事，却成了燃起战争狂热的星星之火。这类事情，在每个国家都会造成一种战争心理，这

① 1895年，处在西班牙殖民统治下的古巴爆发独立战争。美国久已想取代西班牙，吞并古巴，1898年4月，美舰在哈瓦那港被炸沉，美国遂以此为借口，以支持古巴革命为名，向西班牙宣战，攻取西属各殖民地。——译者

② 指1899年英国对南非布尔人（荷兰人后裔）殖民地发动的战争。——译者

③ 詹姆森偷袭德兰士瓦：詹姆森是英国殖民地罗得西亚的行政长官，他在1895年率兵偷袭布尔人的殖民地德兰士瓦，遭到惨败，当时正与英国争夺殖民地的德皇威廉二世故意打电报祝贺布尔人的总统克鲁格。——译者

种狂热可以不顾一切，也不需要军事宣传来煽动它。

可以十分肯定地说，与此同样或类似的情势，将来还会出现。尽管已经有了《凯洛格公约》、《国际联盟盟约》和其他一切殚精竭虑建立起来的和平机构，敌对行动还是不断发生，并将继续发生。世界各国如果听任日本破坏这些盟约而不受惩罚，那么，不仅这些和平条约本身要丧失其效力和尊严，其他各种条约也必将丧失其稳定性。多少正是由于世界未能或无法对日本进行清算，有许多地方的条约已经在遭受损害。对此我们打算怎么办？

实行道义制裁吗？当一个国家被战争心理缠绕着的时候，其他国家都来对它，进行道义上的谴责，其力量是无足轻重的，这除了加剧——不是减弱——其好战情绪外，不会有什么别的效果，今天日本的情况就是明证。况且，这种举世一致的道义谴责能维持多久，始终是值得怀疑的，因为，惑于各自的私利，团结一致的阵线迟早准会破裂。

道义上的摈斥无效，或多半无效，那么还能做什么呢？怎样才能执行《凯洛格公约》呢？当然不能用武力，一动武就恰好违背《凯洛格公约》所维护的原则。用大战来终止战争，显然已经不能达到终止战争这个目的。假如以再打几次世界大战来作为保障我们的和平结构的唯一方法，那么还是此时此地就抛弃这种结构为妙，因为照那样办，文明本身也岌岌可危了。断绝外交关系也没有用，除非继之以其他措施。武器禁运一般也没有什么实效。就目前情况来说，武器禁运只会对侵略者有帮助。所剩就只有经济和财政抵制了。恐怕在实际上亦无济于事。从当前的情况看，经济抵制只会促使日本把中国能够提供必需物资的那些地方也一并占领，结果还有爆发世界大战的危险。在财政上，日本现在已经不能从国外获得贷款了；它欲借未遂，但它还是可以撑持下去。

由此可见，我们的和平机构是理论上堂皇而实际上无用。因

为是做表面文章，所以无用。它就和用泥罨敷剂来治癌症一样——听任癌症发展很久以后才请外科医生来敷上这么一点减痛的药，自然无济于事。国际间的祸事，多似癌症之患。起先只是某个地方长期有刺激，所以开始时一般并不厉害。这种刺激，即使是最高明的医生也不大可能觉察到，但是，一出现明显的症状，早在需要动手术之前，医生就应设法消除这种病症。

未来的世界和平机构必须比医生早走一步。哪里有刺激，它就得有所觉察，诊断出将来生病的可能性，早在成病以前就着手治疗。这当然纯是理论。究竟怎样才能在实际上建成这么一个机构，确是我们那些通常总是没有效力的和平组织应该研究的问题，就象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其他类似团体现正经常领导消除癌症的研究工作那样。总而言之，世界和平机构要做到消灭战争，就必须比现在更加激进，更有先见之明，更多留心事实、形势和环境，而少谈理论。

82

皇家猎鸭会

1933年3月23日

艾丽斯、埃尔西和我在令人扫兴的倾盆大雨中前往参加皇家猎鸭会。整个冬季都常有这种游猎，每个大使馆和公使馆都要请来参加一次，使馆首脑、参事、陆海军武官、商务参赞及其妻女俱在被邀之列。皇室的亲王也要有一个到场，今天正遇秩父宫夫妇特来参加，我们很高兴，因为他们喜欢我们这伙人——其中还有另外几个大使馆的人员。上午9时15分，在浅草雷门车站会合，乘专用电车约五十分钟至武州大泽，然后步行十五分钟过一段田野（有些人坐汽车），来到皇家猎屋。这附近有成千野鸭，为驯养的媒鸟所诱，栖息在沟渠中。每“猎”一回，选十个客人参加，授以大网，网

似捕蝶网，只是大得多，网口很宽。客人各有号码，一发约定信号，即各就各位，沟两边各站五人，沟窄而深，两岸有栏，人在栏后。野鸭一听见“猎人”来，便从沟渠中飞起，“猎鸭”就是当它们飞起时把它们打进网里。这一点也不是什么打猎，因为只要有鸭子飞近网边，几乎没有捉不到的，除非有两网相碰而让它们逃掉。有四只飞近我处，我即一网打尽，轻而易举。有多少飞近身边，全看是走运——或是倒楣，因为捕捉这种无力逃逸的动物，并不是件乐事。林德利这天抓到十只，大多数客人捉住一两只，有人则一无所获。埃尔西捉得一只，她是很不想捉到什么的。艾丽斯没有参加。鸭子飞起后有跑掉的，便放猎鹰去追捕下来。今天不巧，没有风，许多鸭子都不起飞。随从人员两次叫我把它们从水里舀起来，我都断然拒绝，虽然别人是这样做了。他们恨不得把鸭子捉光，因为每个大使得给六只，级别低一点的客人亦各有相应的份额，其余的供宫廷佐餐之用。

这天——后来雨过天晴，春光明媚——真正有乐趣的是在猎屋前面做一些小游戏——在小球场上打高尔夫球、打乒乓球、掷铁圈、打毽子——还有一顿美餐。我们大部分时间是和秩父宫夫妇一起玩——我在乒乓球赛中打败了他，但最后是王妃打赢了。他们毫不拘礼，平易近人，我们自庆幸运，今天不是别的亲王来，因为那些人大都是硬邦邦的，不善于接待外国人。埃尔西特别快活。秩父宫夫妇说，他们太欣赏我们大使馆的晚餐和电影了，要我们不久再请他们一次；他们别无门路可以看到好电影，这倒是实情，复活节后可以请他们。秩父宫乃天皇御弟，他那漂亮的妃子是前驻美大使松平恒雄的女儿，在华盛顿上过学。

83

来自赫尔国务卿的好消息

1933 年 3 月 23 日

5 时返家，得见赫尔国务卿来电，可喜之至。电中言及 12 月 5 日我上总统的辞呈，现特欣然告我，我在此间的工作总统感到满意，望我继续担任驻日大使。闻讯至感快慰。此讯非始料所及，原以为总统若望我留任，只消不派继任人即可。此电实等于新政府明确下达的任命书，使我们确知将要继续工作，真是值得高兴。

日本退出国联

1933 年 3 月 27 日

今天枢密院和天皇批准了日本正式退出国际联盟，并已电知日内瓦，此间同时还公布了天皇的诏书和斋藤的声明。这些文件和其他类似的文件皆侈谈日本的一切行动俱旨在维护和平，但问题在于，日本对这话的解释同我国及国联的解释均大相径庭。日本所谓维护和平，意思是用武力肃清满洲的抵抗力量，直到全无敌手，谁也不来反对它的控制，造成一种由日本主宰一切的太平景象。

假如我没有记错的话，日本宣布站在协约国一边参加世界大战的文件也曾说过，它此举目的是为了维护东方的和平，然后它就理所当然地把德国人逐出中国。但是当时所说的“维护和平”，和现在一样，都是用词不当。不过我还是怀疑，一百个日本人当中会有一人真的认为他们实际上已经违反了《凯洛格公约》、《九国公约》和《国联盟约》。只有为数较少的有头脑的人敢于坦然面对现实。有个日本人曾对我说：“是的，这些条约每一个我们都违反了；

我们已经公开作战了；'自卫'、'让满洲自决'等论调都是扯淡；但是我们需要满洲，就是那么回事。”可是这种人仅占少数。绝大多数日本人都有真正自欺的惊人本领；他们确实相信，他们做的每件事都是对的，李顿调查团是受了中国宣传的骗，列强和国际联盟也都受了骗，因而对事实产生了完全错误的想法。

这样一种心理状态，比无论怎样厚颜无耻但毕竟自知理亏者要难以对付得多。绝大多数日本人——有才智者亦在其中——都不知道是自己错了，所以抵抗外国干涉的决心倍加坚强。他们的心理活动和推断方法和我们的根本不同；和他们交往越多，越能体会到这一点；这是东西方的重大区别之一。西方人以为，日本人既已仿效西方的服装、语言和习俗，就一定会象西方人那样思考问题。这是最大的谬误。东西方之间的条约义务之所以总是易有误释、易起争论，这是原因之一。并不是说日本人签字承担义务时总是不屑遵守。这里只是说，当那种义务和他们认为的切身利益有抵触时，他们就将按自己的需要来解释这种义务，而且照他们的见解和心理状态来看，这样做也许倒还是十分诚实的。现今中日争端中发生的情况，实际上就是如此。无怪要找到一个解决办法即非不可能也是很难了。

85

关于日本违反条约明文规定而在雅浦群岛和其他委任统治岛屿上设防，我们握有充分的第一手证据，即使按日本人的心理，恐怕也很难设想这种举动是符合他们的庄严承诺和条约义务的；但在这里，那个无可争议的事实又出现了：东方关于此类义务的概念不同于我们的概念。整个关于委任统治岛屿的问题，都具有爆炸性，可能还会引起象满洲事件那样大的纠纷。我这个职位，恐怕将来不会是一个安静的职位，但我却不是在发牢骚。

附带说一下，有个很难应付的问题，日本政府已经明智地解决了：它允许外国天文考察队明年去上述岛屿上观测全日蚀。他们

已决定用一艘日本军舰把那些考察队全送去，作为日本的客人，这些人将成为上宾，但也将是处于极严密护送下的贵客。为答复我们代表美国考察队申请准许去访问那些岛屿，此种邀请——要说是命令也可以——已正式向我们发出。

日本人赈济加利福尼亚地震难民

目黑的主日学校有九个小孩把他们每周的零用钱九十六钱(约合二十美分)送来给我，请转寄加州地震的受灾难民，酬答1923年日本大地震后美国对日本的救济。我已复信感谢，把来信和复信都送给了报馆，并拟将钱作为官方急件寄国务院转交美国红十字会，以显示其礼轻仁义重。钱有多寡，道义则一。

附带说一下，日本红十字会对我们的地震难民确实也捐助了一万日元，其中半数是东京市捐的，但是，想到1923年我们送给日本的是几百万美元，日本红十字会的这点捐赠就远不如小孩子捐的那九十六钱使我感动了。

松冈汇报日内瓦开会的情况，矛头指向西方

1933年5月1日

和松冈① 谈话才真是件趣事，他刚从日内瓦和美国回来；事实上几乎都是他在谈。他的英语应用得很熟练，但却给人一种非常自信和自负的印象。从他的一些公开谈话和演说来看，我觉得他是见什么人讲什么话，他可以表示各种意见和感情。今天他告诉我，他在美国时曾为改善美日关系而努力，曾对太平洋沿岸各州在

① 松冈洋右(1880—1946)，当时是日本出席国联大会的代表。大会通过"十九人委员会"的报告后，他就率代表团退出会场。——译者

美国出生的日本人演讲，勉励他们一定要做忠实的美国人。他又告诉我，在他看来，发展日美之间的友好关系应是日本政策的基础，他今晨还曾向内阁宣讲了这一点，并将在此间致力于这项工作。

根据他谈话的那种派头，可以揣想，他在内阁发言，一定是象对一群小学生训话那样。我跟他讲了报刊上的反美宣传所造成的危害。最近他曾对人说，如果他任下届外相，他要如何如何行事。显然，由于日本公众的奉承，由于从日内瓦回来时被当作英雄来欢迎，他是更加趾高气扬了。

演讲的负担

1933年5月21日

圣路加医院新建大楼落成，将往献词，讲稿花了一整天时间，已经写完。上星期日写了两篇讲稿，一篇讲稿将用于横滨，供阵亡将士纪念日①之用，另一篇将用于“美国学校”的毕业典礼上。所有这些讲稿，扣题写起来都是开头难，一开了头，以下就容易了。阵亡将士纪念日和“美国学校”那两次倒比较简单，可以取材于以前在土耳其讲过的稿子，但给圣路加医院讲，则需要另辟蹊径。深愿秋天以前，讲这三次就行了，可是谁也不敢肯定。演讲的确是个沉重负担；它虽和我的职业有不解之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却是越来越不耐烦接受邀请。从一年前来到日本以后，我已经作过三十五次演讲了。

87

华北又生事端

1933年5月23日

下午6时，大使馆的一个日本朋友匆匆送来一张条子，据此我

① 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大多数州定为5月30日。——译者

电告国务院：日军已接到明令，不要进入北平，如其仍有闯入之意，则将有更严厉的命令下达，这些命令也准备好了。看来我们上周呈报的判断是对的，我们断定日本人仅仅是要"包围"北平，然后和中国人谈判，只要中国人保证不再在长城一线攻打日军，日军当即撤围。但又有迹象表明，日本人想在华北建立一个缓冲国，而且可能搞成。北平周围的这种军事活动，正发生在石井子爵在华盛顿举行会谈[1]的前夕，看来确是很不妙。日本军事方面和外交方面的行动和政策总是缺乏协调，使人至感遗憾。正当满洲的紧张场面在逐渐消失而世界各国又大有可能终于默认现状的时候，日本陆军又跳到报纸头版上来了，并在国外造成一种印象——它仍旧是在乱砍乱杀（实际也是这样）。而且又恰恰是在这样一个时刻：各国确实在设法——至少在研究已经提出的各种办法——坐到一起来，共谋达成某种切实的有关裁军、安全和互不侵犯的协议。我知道，此间有许多日本朋友确是在为大局焦虑，但却无能为力。

来栖评史汀生

我的秘书小帕森斯写道："昨晚来栖先生和我翻了一下最近一期《外交季刊》，谈到史汀生的文章时，我大胆表示了一点意见，认为史汀生是一个真诚的大理想家。来栖回答的评语是，'你若不是处境困难，做个理想家是容易的'。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日本许多当权人物虽曾助长侵略行动，却抱着自以为实质上是在防御的心理。我确信，有教养的日本人之所以也相信去年夏天甚嚣尘上的'自卫'论，决不是因为他们想入非非。据我看，不先消除这种日本'处境困难'的观念，就无法制止陆军的有点被误称的'扩张主义'的行动。我并不怀疑军人抱有称霸亚洲的幻想，但我

88

① 在石井子爵赴伦敦出席 1933 年世界经济会议路经华盛顿时举行。——作者

仍然认为，他们的力量是扎根于一种防御的态度，即恐惧俄国，担心日本的安全。因此，就有了'非胜即亡'的说法。"

争取建立一个"国际政治保健学院"

在圣路加医院新部门开幕式上致辞

东京，1933年6月5日

一切时代的有识之士都意识到一个真理，即人类是一个整体。但要使这个基本真理在实际上臻于完美，还必得经历一个缓慢的、渐进的过程。过去，每个民族都有人在培育这种思想，将来也会有人培养它，这些人坚持寄望于这种思想，他们所关心的不限于自己的家庭、自己的信条或自己的国家。

在这个人类是一个整体的哲理中，最能打动我们共同的仁慈之心的要素，是人身的疾苦；救死扶伤不只包含功利主义，其中还有更广更深的意义：我们的医院教人以同情心，它们之所以令人尊敬，根本上是由于它们象征着爱，象征着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对人类幸福所负的责任。

就是由于这种开明的哲学在引导，美国主教派教会成千的教区、洛克菲勒基金会以及许多进步的和热心公益的人士才仗义解囊，我们今天为之开幕的这座崇高的大楼才得以建成和使用。已故的前日本天皇陛下诚挚优厚的赠赐，皇室、内务省、东京市和其他团体的慷慨捐输，后藤伯爵、大隈侯爵、涩泽子爵等日本显要人物的资助，有力地证明了圣路加医院之设在东京，是一个共同合作的事业。日本理事会协同美国理事会，在最需要支援的时候给予最慷慨最有益的指教和帮助，这种帮助对这整个巨大医疗机构的发展起了显著的作用；圣路加医院及其附属部门的成就，则大部分应

89

归功于一个人，即鲁道夫·博林·托伊士勒博士，他有远见、信心和不倦的精力，代表我们两国的那些能干的同事们又给了他有力的支持。今天大家向他表示敬意，他受之无愧，我亦同声赞颂，并向已实现其理想的理想家祝贺。

我今天讲话，目的不在于详述这所医院的背景和历史。这方面，与它的发展密切有关的人已经讲到了，远远比我讲得好。我是想谈谈这座建筑物的广阔意义和它所象征的一切，于此也许可以表达出我自己的一些想法——可能说得不恰当，但仍然是诚挚的。

我刚说过的人类是一个整体这一高尚的哲理，是远超乎经国之术和政见之上的。它是人类的崇高理想，在走向这种境界的过程中，自然的力量必然会给予推动，这大概是渐进的，但它终竟得以实现则是坚定无疑的。文明的总的发展趋势，不是沿着这个方向发展的吗？史前时代的家庭认识到，要联成部落，才能得到较大的利益。部落逐渐发展成为国家。今天世界各国又正在朝着较密切、较开明的合作步步前进，因为它们终于认识到，只有这样，才能为最大多数人谋得最大的幸福。因此人类的共同协作，虽是渐进的，但肯定已在形成之中。当我们经历失望阶段的时候，就回顾一下已经走过的路程和已经取得的进展吧——甚至在我们这一代也是有进步的。这个运动之终将取得胜利，它并不是一个随着时代或个人是乐观还是悲观而有不同看法的问题；这是一件确定无疑的事，因为，纵然定会碰到挫折、障碍和延误，但人类就其全体来看，总是在朝着至善极乐的方向努力，凭人类这种固有的本能，最后胜利是必定会得到的，正如宇宙的法则必然会得到体现一样。假如有人称我为幻想家，那就请这些有怀疑的人去探索一下历史的事实、发展和基本趋势，然后按数学上的类推法去推断一下将来吧。

我今天之所以谈到这个运动，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因为在日

本设立这个大医院，以具体形式显示国际合作的原则，正是刚说过的那个基本真理的物质表现，即人类在精神上是一个整体，而按事物的本性又终将在实际上成为一个整体。第二是因为医学的原理，用来救治世上的疾患，也是很适合的；世界过去受难，现在受难，在经过逐步发展、取得经验、积累领导人的智慧而达到世界一体的太平盛世以前，无疑还将继续受难。

我们国际上的疾患，大都和人身的隐疾很相似。就象癌症那样，国际疾患一般先是某个地方长期有刺激，所以在初规模不大。若能预知那种刺激为癌症的先兆，迅速处理，这种病或许就可以避免。即使是最高明的医生，也可能无法或没有机缘预先觉察到这种刺激，但是，一出现明显的症状，早在必须动手术之前，他就要设法根除这种疾病。

在遥远的将来，有一天我们或许会有一种“国际政治保健学院”之类的机构，它将从各个角度来研究国际关系，就象家庭医师研究或应当研究他所照料的人的心理、生理和品行的状况那样。一发觉国际健康中有潜在危险的根源，早在实际发病以前，这个学院就会对症下药，以消除可能发生冲突的原因，即感染的根源。必须远在疾病生成以前即采取医疗措施。在国际事务中，仇恨的狂热一出现，要避免发病就没有把握了；也可能已经来不及了。必须及时采取预防措施。在舆论有可能被激怒以前，在公众的明智判断力尚未为事态发展所囿、为国际间仇恨偏激情绪所蔽以前很久，几个有远见的政治家，围坐在铺着绿色台布的桌旁，凭借其冷静的判断，就可以对防治一定的病症做大量工作。

这个“国际政治保健学院”——对将来的一种幻想（我想称之为我独出心裁的一种奇妙的发明）——必须经常开会，进行象普通实验室所做的那种研究工作，和现今洛克菲勒基金会及其他类似团体经常进行消除癌症的研究工作一模一样。它的成员不是内阁

91

总理或其他高级官员，而是许多社会活动部门的非政治性的专家。为了能够采取预防措施，并能行之有效，他们的研究结果、他们的警告、他们的建议都必须提得及时。

自 1899 年第一次海牙和平会议以来，我们已经走了一长段路；今后仍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我们用得着泄气吗？这个走向国际合作的运动不象雅典娜，会从宙斯神的前额迸出来，而且一出来就已经是一个成年人；它必得象一切婴孩那样，从经验教训中得益，慢慢地发育成长。它是会长到完全成熟的，正如这所大医院，由于汲取医学界的经验、发明和发现，它为社会服务的潜力亦随之增长。

朋友们，今天的典礼意义深长，它使我有所感悟，致敢纵情遐想。我的所谓"国际政治保健学院"，不过是臆造之物，也许是空中楼阁。因为想到这个医院在完成其进步使命时将会对个人和社会作出许多贡献，所以才借用它的名词和概念，这只不过是用比喻来说明问题而已。有时即使白日做梦也没有什么害处。梦至少可以把我们引人有益的思路。我从这幢大楼，从它将广为容纳的从事种种医疗活动的机构，看到了人类基本上是统一的整体的具体表现。现在人们正在为促进人类的密切合作而努力，那就让我们在这幢大楼所象征的原则中寻找实例，把这所大医院所显示的国际友谊、治病救苦所体现的基督教精神和箴言等都运用到那个更宏伟的事业上去吧。

日美关系得到改善之时

1933 年 6 月 8 日

92 前往横滨，蒙"豪斯顿号"[①] 军舰接待如仪；参观全舰一小时，

① 美国亚洲舰队的旗舰，前来日本访问，这是它一系列例行任务中的一项任务。——作者

随即陪同泰勒海军上将招待大批来自横滨和东京的客人。该舰外形壮观，十分清洁。此舰已两度获得海军射击冠军，一度获得通讯冠军，今年的这两个锦标现在都归它了。高射炮和火力控制台当然是严密掩蔽起来的。

我问巴格利舰长，日本海军军官上船来时曾否要求参观，他说他们没有这样要求，大概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在美国海军上将访问横须贺时答以同样的礼遇。不过，还是看见有飞机在军舰的上空拍照。6时奏起国歌《星条旗》，招待会到此结束。在招待会上，至少日本姑娘们是很快活的。埃尔西欲邀内田须磨子前来作客，但须磨子和她的母亲都不敢请示内田伯爵，理由是“他最近已经准她外出多次了”。不过内田伯爵夫人还是建议由埃尔西去和外相直接交涉。于是埃尔西鼓起勇气，在外相款待佩里夫妇的午餐完毕后去见他。起初他说不行，后来才软下来了。须磨子在我们家玩得很好——当然有艾丽斯作陪，她很感谢埃尔西。我好象记得，那些老式的土耳其帕夏们也是不大鼓励他们的家人与人亲近。

致国务院一长电，呈报美日关系有显著改善。此中有种种原因。首先是日英关系逆转。这主要是由于日本与印度的贸易协定已告废除，对日本的棉织业是一个沉重打击。军部已得到它向往的拨款，中国局势亦较前有所缓和，日本虽已退出国际联盟，却没有因此和西方国家冲突。当然不能说好战情绪已经消失，但显为官方指使的反美宣传现在已不明显了。

对美感情的好转，突出表现在报刊对下面几件事都有明显的好评：(1)关于石井子爵与罗斯福总统的会谈，一般都相信，石井对日本问题的说明，总统是怀着赞同心情倾听的。有一种看法，觉得美国新政府要比上届政府对日本友好得多。(2)泰勒海军上将的来访，完全成功；泰勒海军上将去年在上海与野村海军大将的有效合作，受到普遍赞赏，他在此地受到的接待，亦极为热诚。(3)美国 93

驻菲律宾新总督来此作短暂访问，并曾拜望日本高级官员，给人印象很好。(4)佩里主教来访，特别是他往浦贺瞻仰佩里纪念碑，在此间受到广泛宣扬。(5)圣路加医院的新医疗所开幕，有皇弟莅临，名流到场。

当然，军阀很可能不久又会兴风作浪，依旧给报刊塞满反美宣传，把这阵好感的高潮压下去，但是我觉得，毕竟还是有了积极的、甚或是持久的进展。白鸟调离外务省而改任驻瑞典公使，这又是一个使人可以对前途抱希望的因素。附带说一句，我还听说，白鸟反对调职，曾挣扎到最后一分钟。

这种新出现的对美亲善，甚至在私人交往中也看得出来。例如，约翰逊海军上校告诉我，在过去一年中，某些以前和他最亲热的日本好友也不敢在人前和他接近，其中有一个曾被军部视为太喜欢外国人的，尤其避之惟恐不及。前几天在高尔夫球俱乐部，此人竟与井上子爵一同主动来到我们的桌前，跟约翰逊和我坐在一起，笑容满面，和蔼可亲，过去一年中他们是不敢这样做的。能在这里留下来，得见关系有此改善，我很高兴，友情若能持之久远，实在令人快慰；我想是会持续下去的，除非有不测风云，使之又受损害。一年来，的确有了很大变化。

艺妓馆一夕

1933年6月29日

闷热得直出汗的梅雨天，真讨厌。只穿衬衫，整天呆在书斋里。

约翰逊海军上校在“红叶”艺妓馆宴请日本海军将领和大部分使馆人员，共三十二人。坐地席上，成两长排，姑娘们以热米酒侑客，日式盛宴应有的佳肴逐一献上。约一小时后，热闹起来了，两

小时后，猜拳进入高潮，人们开始敬酒。 94

猜拳是一种用手势作剪刀剪纸、纸包石头、石头砸剪刀由来已久的游戏，某个艺妓前来陪酒（她们是不断换座位的），提议举行这种游戏；她赢了，就该你喝，表示向她祝酒，你赢了，就该她喝。这间名牌茶楼的姑娘们分外活泼，远胜他处，且颇有风趣。这时邻座的客人也不断向你祝酒，还有挨次前来敬酒的，然后你还得去一一回敬。这样，虽然酒杯很小，每饮不过涓涓之量，但积少成多，这晚还是喝了很多米酒。如此畅饮，竟夕皆乐，翌晨亦毫无不适之感——只要你不学一般日本人那样掺上威士忌酒就行了；热米酒本来就蒸发得很快，日本菜合卫生，易消化，恐怕也有关系。这一切都有助于举行一场欢宴，有醉意而决不狂乱，虽亲昵而常保尊严，不纵情，不越礼。

每道菜之间，插入日本音乐和扇舞，后来我们站起来了，在地席上坐了将近三小时，得把屈久了腿伸一伸，此时留声机响了，艺妓们又显出她们跳西洋舞的本事，跳得和本国舞一样好。坐在我旁边的高桥海军大将发表感想，说如果国际会议有这样的气氛，达成协议就毫无困难了。我同意他的说法。

大使馆里的韵事

这班邮件到家之日，埃尔西的喜事对家人就不再是秘密了，虽然此事要到8月间某个时候才能公开。6月30日，她和塞西尔·莱昂订婚。莱昂来到这里还不到一个月，就跑来求我准他娶埃尔西。我说他是个做事性急的人；他答道：“你怪得了我吗？”——对此当然不好再说什么。这事我们大家都高兴；他是个优秀诚实的小伙子，二十九岁，至少在身高方面能比得上我们的另外两个女婿。别的条件，让埃尔西自己去品评吧。她选的这个对象，且不说从性格 95

和人品来看我们大为赞同，单以她要嫁给军人这一点而论，我自然也就高兴了；三个女儿都给了军人，定可以创造纪录——我倒是这样想的。这种想法，大可以补偿因想到她终有离去之日而产生的伤感，她在家总是给我们带来情趣、音乐和欢乐。现在她至少又带来了一个艾丽斯和我都十分喜爱的女婿。他们的婚礼，打算在10月7日举行，那天是我们结婚二十八周年的纪念日。

俄日间的紧张局势加剧

1933年7月18日

参加首相府招待韦尔奇主教和夫人的便宴，主客是几年前在朝鲜时认识的。饭后与斋藤子爵长谈；他说他希望美国能帮助中国自立，我答道，这个问题决不是单靠一个国家能够解决的。他殷勤好客，第二天送了我一面日本丝织的美国国旗。官邸——即设宴之处——的门口，恐怕至少有十几个警察围守着。因错发了警报，就在我们来到的那个时刻，那里正有一场虚惊，只见警察刀出鞘，弹上膛，冲来冲去，搜索某种不速之客。既然常有暗杀的威胁，府第周围会有一种紧张气氛，自不足怪。那晚斋藤子爵夫人好象一直都是那么闷闷不乐的。

已有一月左右简直没有电讯往来了，我给国务院发了一封很长的电报，汇报日本和苏俄之间的紧张状态，列举已经发生的种种事件以及或将演成严重局势的理由。这些事件也可以说有挑衅的性质，和满洲事变以前发生过的事件有相似之处。日本军阀的意向不能用西方的标准来衡量；他们若预见到冲突终不可免，就很可能趁苏俄羽毛未丰而先发制人——时间的因素全利于苏俄。因此，我虽不认为战争迫在眉睫，但确实相信局势有潜在的危险，值得密切注视。我们将这些都写入急件，随上次邮袋寄出，但这要再等十天

才能到达华盛顿，我固不欲神经过敏或危言耸听，可是也不要弄成事到临头而措手不及。在这个地方，把任何一件事视为不成问题，都是不明智的，甚至象蓄意挑起战争这样的事，也不能说一定可以避免。 96

外交中的变革与日美关系

为《日本时报》日美关系专号撰写的文章

在美国外交界服务的三十年中，我观察到，世界各国外交官的工作性质已经起了逐渐的、但却是明确的变化。以前，每个国家都总想通过它的外交代表智胜别国而订立公开的或秘密的双边条约或协定，从中讨到某种政治上或商务上的便宜。描述外交生涯的小说中，常有缔结这类条约的纯属虚构的事例。照例是这么一套：有个男主角，例如，鲁立退尼亚王国有个少年英俊的公使，通过他和埃列思里亚[1]的王后的特殊交情，同埃列思里亚订成了秘密条约，遂在智斗中打败了反角里西亚的大使。以前订条约，是有点象这个样子，直到上世纪末都还有这种订法，但是这类外交故事的作者和读者大概还很少认识到，自本世纪初以来，我们的国际关系和订约事宜已经起了变化。

你查一查现行的条约和国际协定——对缔约国对外关系有约束力，在一定程度上对缔约国内政和政策也有约束力——就会看到其中颇大部分不是两国间秘密谈判的产物，而是公开的国际会议的成果。连双边的商务航运条约或仲裁条约，也常是与一切有关国家议订的一系列同类条约的一部分。如今的外交代表，致力于商订秘密协定的，十分罕见——在国际政治关系发展过程中，

① 鲁立退尼亚和埃列思里亚都是英国小说家安东尼·霍普(Antony Hope)所著《真达囚犯》(Prisoner of Zenda)这本小说中的假想国。——译者

世界已经进步到超越签订秘密协定的阶段了。

要找此中缘故，无须远求。今天交通发达，世界已经变得如此 97 之小，各民族间的交流是如此频繁，各国的商业金融关系又如此密切，以致任何一国与另一国的关系，都会引起所有各国的深切的关注。这和我们美国社会生活的发展情况很相象。在往昔开发边疆的日子里，各地的移民住得很散，各人自行其是。他就是他自己的警察兼法官兼行刑人。但随着人烟逐渐稠密，交通发达，有组织的社区兴起，那些先来的移民就再也不能只按自己的利益和愿望行事了；他们不得不同时考虑公众的利益。社区内任何两个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无论为敌为友，都成了全体成员所关心的问题。今天的国际关系也是这样。我们的各种利益——政治的、经济的和军事的——如此紧紧相联，密切相关，以致无论哪两国的关系失调，都必然影响到其他许多国家的关系和利益，不仅是涉及两个当事国而已（在不久以前，情况还是这样的）。

我们两国正应该根据这种情况来看待日美关系。我们是政治上经济上并臻强盛的两大国，中间是浩渺的太平洋，各据一边，这个大洋的命运，主要是掌握在我们两国手里。太平洋今后是要成为永无休止的妒嫉、猜疑、纷争之地呢，还是要成为文化、商品友好交流的和平大道和为增进世界福利而精诚合作的媒介，多半要由我们两国来决定。

我们两国的政策和行动，对全世界国际关系的未来发展都将有巨大影响。因此，美日关系的前途，就不仅仅是事关我们两国而已。为了我们自己的幸福、安宁和繁荣，我们固然一定要努力确保日美友好关系的持续发展，但除此而外，我们还负有更大的责任——对世界各国的责任。这个责任就是要把即将到来的“太平洋时代”演变成为和平与友好合作的时代，而不是成为苦难和争斗的时代——这种苦难和争斗，举例来说，就曾在国际关系发展过程

中的"地中海时代"出现过。

我们两国要和睦相处，互助合作，应该是一点也不难的。在世界历史上，经济利益曾是许多大冲突的起因，但我们的情况不同，98 我们的经济利益并非互不相容，而是相辅相成的。我们两国都是原料供应国，但这些原料无须竞争。同样，我们虽然都向世界市场提供工业品，但产品各不相同，也无须竞争。日本提供的工业品，主要是以手工艺为基础，以其精巧驰名，美国则提供能由自动化机器大量制造的货品。因此，我们的经济利益不一定抵触，别国之间发生冲突的主因在我们的关系中也就不存在了。其他利益，日美两国的武力外交主义者都经常提出来，作为可能发生冲突的原因，但只要耐心研讨，发挥互助的精神，这些利益也无疑是可以调和的。

即将到来的、命运大部分操在我们手里的"太平洋时代"，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不能成为造福世界的和平友好时代，只要我们戮力同心，就可以使它成为这样的时代。

俄日将战的谣传增多

1933年9月7日

罗马尼亚代办斯托伊切斯科来访，谈论日苏关系。我把我最近谈这个问题的电报私下拿给他看，他说他完全同意我的意见。我们有个助理陆军武官说，他和他的同僚都认为战争决不可免，并预言将在1935年春天爆发，虽然有些人认为还会大大提前。苏联大使最近在招待外国记者宴会上的讲话，引起了许多议论。他显然很气忿，日本报刊明里暗里攻击他的国家和人民，已使他忍无可忍，他在宴会上毫不含糊地指责日本的"防御宣传"，向听众讲明，苏联的耐心和克制已临近极限。他还声称，苏俄不仅能够对付日

本陆军任何公开的侵略行动，而且在陆空两方面都有充分准备，可以发动攻势，跨入满洲境内，如果有必要采取这一步骤的话——说得够坦率了。

99 当然，这些情况一定已经透露给日本人了。俄国人曾讲过，一旦开战，他们就要从空中把东京和大阪两城全部毁掉，因此我想，万一真有此一战，东京便会有点象战场一样。最近日本举行防空演习，空袭时东京接连三晚全城一片黑暗，连看书的灯也不许开，显然是想到俄国的威胁，才举行这样的演习。

初见广田外相

1933 年 9 月 18 日

2 时，新任外务大臣广田接见。同时在场的惟有巴西大使阿马拉尔。俄国大使尤勒涅夫和意大利大使奥里蒂，一个缺席，一个迟到。广田热情相待，两手紧握着我的手，在简短的交谈中，他说，增进对美友好关系，是他的政策的基础，实际上主要是为了这一点，他才接受这次任命——任命是突如其来的，他完全没有料到。从他的态度来看，我相信这些话是由衷之言。我说，就我所见，报界是增进我们两国友好关系的主要障碍之一，它们总是捕风捉影，煽起不信任和猜疑。他答道，“这事我们将一起详尽商谈。”

我对他的初步印象是好的；的确，比之道貌岸然的内田伯爵，他要热情开朗得多；我相信，现在去外务省，将会是件乐事了，以前却决不是这样，我看此人是可以和他坐下来好好谈一谈的。内田伯爵则不光是重听，还从来不想谈话，有几次我因特殊事故去找他，他都好象对那些事件一无所知，只是说他将加以考虑。总之，他是既不能也不愿认真讨论问题的。

我要找广田交涉的首批问题之一是关于报界的问题——只要

我们的人一去外务省(日本外交部之称),就会招来不适当的、令人恼火的宣传。譬如前一天,我想商讨一下神户附近美孚石油公司油库的问题。那纯是一件日常公事——油库是经政府明确许可、花了很多钱修建的,但因村民无理取闹,硬说怕引起火灾,所以建 100 成后却不能使用。春天我曾向有田提出这个问题,未得解决。可是我知道,我去外务省,又会引起不愉快的宣传,于是便叫内维尔去找重光[①]。一小时后,《日日新闻》就登出内维尔的照片,在照片下面刊载一篇言之凿凿的报道,竟说他是和重光开谈判,商谈如何停止两国间的海军军备竞赛。外务省也一声不吭,不加否认。拜厄斯、巴布、沃恩、弗莱谢尔等人纷纷来访,核查报道是否属实,以便决定是否转发美国。当然,听到我们的回答后,他们就立刻决定不发了。这类事情实在令人恶心,但在内田任内却始终不改,从未见他设法制止过。

还有一点,那才真是妙不可言:内维尔与重光谈话时,重光还曾主动提起报道失实的问题,痛骂日本报界不负责任;一小时以后,上述那个荒唐的谣言就出笼了。当然,这也可能是一种笨拙的放试探气球的手法。广田此人,也许可以制止造谣,使我能去外务省而无须顾虑后果,另一方面,他也可能会发现自己无能为力,和他的前任一样。

有关满洲的内幕新闻

下面这篇有趣的报道,是我认识的一个美国记者最近秘密写来的。他讲到他在东京结识的一个日本商人,认为这个日本人一天晚上讲的话"揭开了"内幕,因特引述如下:

我要跟你讲讲满洲问题的真相。夺取满洲,原是一个军

① 重光葵(1887—1957),当时是日本外务省次官。——译者

事学院的计划，由来已久；但总是没有立即实现的希望。满洲的中国人惹恼了军部，实在无法容忍。于是不等时机成熟就突然动手了，决心惩罚中国人。军部原以为会遇到抵抗，但一点也没有抵抗。中国人跑了。我们在满洲到处追击他们。在追赶的过程中，我们总觉得有只脚举步沉重。便往下看看，到底是什么东西粘住我们的鞋。这才大吃一惊，原来就是满洲。

101 在外务省和陆军省，会有人告诉你，现在即将实行这样那样的高明计划。老实说，究竟应该怎么办，他们实在是心中无数。他们正茫然不知所措，沮丧万分。除陆军外，人人都开始醒悟了，感到我们已经犯了最可悲的错误，没有哪个现代国家犯过这种错误。举例来说，假如他们开发了满洲铜矿，日本的铜矿就得全部关闭，成千的人就要失业。日本政府完全明白，把满洲作为解决日本人口过剩问题的出路，不过是做梦。日本移民满洲，每年最多可望达两万人。对一个一年增加九十万人的国家来说，这决不是一个解决办法。

这位美国记者继续写道：

你知道的，某某君乃是日本知识界的领袖人物之一。满洲事变时，他因贸然反对军方的行为，险些被刺杀。他的朋友把他送进医院，又偷偷地在夜间帮助他从二楼越窗逃走。他来到美国；为了保命，在人前就到处呼喊万岁；私下才把心里话告诉我。

他也认为占满洲是一个可悲的错误。我问他对荒木将军有什么看法；他答道：“和所有军人一样，荒木将军也是个傻瓜。”

他说，他那一派主张的政策是，承认中国对满洲的所有权；只将日本对辽东的租借权扩展到整个满洲，为期九十九年。他说，日俄之战，几乎肯定会在下个五年计划之末爆发。

他认为，为了避免这场战争，日本应该让俄国在满洲的某个港口有出海的自由，并设法说服欧洲国家给俄国开放达达尼尔海峡。

某某君回日本后，天皇曾召见他，要他谈谈美国舆论状况。召见的真正用意，显然是要保全他，使他免遭暗杀。事后某某君和我讲了召见的经过。他说，对满洲事变，天皇甚为苦恼，他是不赞成这样搞的。他（天皇）说，日本最大的危险是沙文主义。国家主义太过头了。某某君说，天皇曾命令陆军无论如何不要攻取北京。

（在这期间，荒木将军却一直在公开叫嚷："天皇命令我军举着旭日旗前进，我们岂能向后转，"等等。） 102

我还会见过斋藤子爵，可以断定，这次会晤是受过审查和阻挠的。他非常苦恼。

他说，满洲事件本来就是决不应该发生的。不那样冒天下之大不韪，也可以得到同样的结果嘛。我问他现在何以善其后。他说："某某先生，我不怀疑小鸡是常想回到蛋里去的——那里多么温暖舒服啊；可是一旦啄出蛋壳以后，就无蛋可回了。现在我们只有往前走，往最好处想了。"

我问他，谣传美国和日本要打仗，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他，双方海军的情绪都好象很紧张，但我看不出有任何打起来的可能。他说："某某先生，不要把事情看得太死了。要时刻记住，靠战争吃饭的人总是要打仗的。"

我问他："阁下，你是指海军吗？"

他说："不是，不是。海军没啥；陆军却太不懂事了。"

太平洋上的伟大实验室

大使在泛太平洋协会和泛太平洋俱乐部举行的
巴波亚①纪念日午宴上致词，东京，
1933年9月25日

主席，诸位阁下，女士们，先生们：

我们在想象四百多年前、巴波亚站在连绵的达连湾山岭上第一次凝望浩瀚的太平洋时，不禁要问，他是否赋有深邃的远见，想到这个大洋有朝一日不仅将成为交换世界许多主要物产的大商场，而且还会发展成为历史上最大的实验室。其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大洋沿岸的许多国家，都正在政体根本不同的情况下各奔前程——这些大大小小的国家之所以有着根本不同的政体，是由于种族、历史地理的因素或是由于弃旧维新的结果。

在太平洋各国中，日本以其深厚的东方文化素养，结合一个刚健民族的干劲和首创精神，吸取了西方的文明，在完成西化过程后103——这个过程迅速异常——其民族个性和特征又依然很强，其中突出的因素则是权力集中和君权至上。

地遍全球的英联邦，各邦虽远隔重洋，却仍能保持必不可少的交往。这是由于它有防护得很好的海上交通，有定期举行的会议，以共决互助互卫之道，捍卫彼此的自由和利益。它的力量全在于其制度的灵活和富有弹性。

美国的贡献则在于建立了一个联邦组织，既允许组成联邦的各州毫无阻碍地互相交往，又让每个州在非全国性问题上自有其立法上的独立性。

最后是俄国，它走上一条前人未走过的道路，给政治词典创了

① 巴波亚(1475—1519)，西班牙殖民主义者。他于1513年发现太平洋。——译者

一个新词——苏维埃制度，世界则在一旁注视着，看政治学实验室中这个新添的试验将如何发展。

现在，展望未来，我们必须尽可能设想到，国际间的联系和交往定会有惊人的发展。由于航空事业的发展和进步、电学方面和其他领域中的发明创新，不难预见，有一天世界各国将会在交通运输方面互相连接，其密切远非现在所能比拟。一个世纪以前，蒸汽机和轮船尚在襁褓时期；电报和电话犹未被普遍应用；无线电和飞机更不可思议。经前几代逐渐加速的发展和发明，从现在的进度来看，将会使下个世纪、再下个世纪变成什么样子呢？假如世界的发展速度一直不断增长（定然如此），国际商业和金融结构——其实还有许多别的部门——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定会有那么一天，国际疆界将失去其大部或全部现有的天然约束力，这些天然限制一旦崩解或消失，谁能说得定，世界利益的终趋一致将会使各国的政治关系密切到何种程度？对此，处在目前发展阶段的我们，只能作模糊的想象。

我曾把太平洋说成是一个巨大的实验室。从前，化学家曾力求发现一些必要的元素，以配制出长生不老之药。假如让我们对 104 迷糊难测的未来稍骋遐想，那么，为什么不可以问：在将来某个时代，从上述各种各样的试验和经验中，会不会出现最能为大家所接受、最适于实现世界统一的一种制度或多种制度的综合？这个目标——假如堪称目标的话——今天只存在于我们的空想之中。但空想或白日梦亦未必无益，未必总是那么荒唐。或许巴波亚也有他的梦想，不过，即使他有最丰富的想象力，要说他的发现所产生的结果他都能够预见到，那是不可思议的。

在那个时代到来以前，人们的观点可能已经经历了许多变化。但是这个太平洋上的伟大实验室——为促进文明表现过高度智能的各种民族，已在这里共聚一堂——总是在工作，总是在推进、试

验、了解、甚或已在完成它的工作，以求有朝一日，如今视为天然应有的国界实际上已不复存在；那时候，大海和高山都不能成其为阻碍各国亲近的壁障；那时候，国际关系的整个结构具有如此复杂、微妙、普遍的性质，以致于公共的利益终于远远超过任何一群一国的利益之上。当那一天到来之时，假如适合那时情况的机构，经过世世代代的设计和建造，妥善地建立起来了——假如这个机构是牢固地建立在德川公爵最近表示的那种开明观点的基础上，即“全人类未来的幸福康宁将在不小程度上有赖于增进太平洋沿岸各国间的互谅互助”——谁说世界达不到比我们祖先所设想的境界更加幸福和文明的境界？

那时巴波亚又可以来俯瞰他向世界揭开的这个大舞台，他在看到他对解决历史上的最大问题亦曾作过贡献时，定将含笑九泉。

婚　礼　日

1933年10月7日

艾尔西的喜日过去了；达官贵人们和新娘新郎都已走了。

105　今天不是1905年10月7日那样的清秋之天，但至少雨被大风吹散了，没有下成，天气也还暖和，尚无不适之感。10时，齐赴总领事馆，来到施潘车领事面前，签了证件，内维尔和我当证人；然后赴麹町区区公所，美国侨民总是在这里举行婚礼，因为这里的官员熟悉美国法律手续，美侨无须回答无数的问题，不过该侨民必须是住在这个区的，于是我们的新娘和新郎便把帝国饭店当作他们的住处，饭店在这个区内，当局也就承认了这个假设事实。新娘和新郎险些死于非命：有个摄影记者乱动窗帘，把窗顶上一种很重的木头装置扯垮下来了，差一点打在他们的头上，扬起一阵积年已久的尘埃。不用说，大家都笑了，但如果真的打中他们，那可不是开

玩笑的事。那位市长什么的心里很不受用，向内维尔用日语咕哝道：“我太粗心大意了。”行礼毕(收费极低，才十五钱，约合三美分)，又回到领事馆，施潘牟发给证书，表示他已为此次世俗结婚作证，按照美国法律，莱昂先生和莱昂太太就此结成了夫妇。

3时行宗教婚礼，4时招待客人，这些埃丝特·克兰和广濑千代(Chiyo Hirose)已分别在《广告报》和《日本时报》上作了极好的描述。我可以补充的只是，新娘实堪称道，新郎为国增光，伴娘费伊·范·雷克特伦使场面生色不少。我们原只邀请六十五人作为艾尔西的朋友来观礼，临时来吃喜酒的却约有四百人。艾丽斯和我得去应酬秩父宫夫妇，他们倒一点也不拘礼，可是和其他皇亲国戚周旋，就不能说总是那么自在，尤其是在日本，这些人周身都为皇室的繁文缛节所束缚。好在我小心，事先写好了程序单，送交前田伯爵，征得了他的同意。秩父宫夫妇在阳台饮茶，我把公使们也请到那里去坐，后来马勒说，对这样的安排，公使们将永远感激不忘。

按日本规矩，在外国人的住所酬酢，一直是只有大使才能同皇族谈话。我却偏要让加拿大等国的公使到那里去，这样，一下子就把难办的问题解决了。

106

艾尔西和塞西尔驱车往横滨，由那里坐火车去御殿场，御殿场在富士山斜坡上，桦山伯爵已把他在那里的别墅借给了他们。父母则重理日常事务。抚育儿女，一向是他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事，如今楼上孩子住的房间已空空如也，父母也只好强展笑颜。

一位外交官谈泛亚洲运动

1933年11月13日

有个外交界同行对我说，自今年3月荒木将军、芳泽、广田等

人集会后，日本即有修改泛亚洲运动或大东亚协会的打算，现正加紧进行。他认为，广田虽说要实行与外国改善关系的政策，但依然是这个运动坚定的支持者，他赞同日本的扩张计划。然而这位同行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足以证明此说。据他了解，这个计划是要建立一个“亚洲国际联盟”，由日本、满洲国、中国和暹罗组成，而以日本为首；换言之，即建立一个反白种人的黄种人集团。他说，他刚看过一本新编的日本小学教科书，内有一张远东大地图，包含日本、满洲国、中国、法属印度支那、暹罗、海峡殖民地、菲律宾、及荷属东印度群岛等地，地图上有三面国旗——日本的、中国的和满洲国的。美、法、英、荷的国旗都没有。他认为此中意味深长，又说，昨天参加朝香宫妃殿下的葬礼时，他还注意到一桩很有意思的事：花圈的摆法是，满洲国执政溥仪送的放在首位，满洲国驻日公使丁将军送的在其次，外交使团的花圈则在第三位。与他在一起的他的译员曾把花圈上的题词念给他听。

这位同行觉得苏日间的局势很紧张，任何严重事件都可能引起冲突。他认为，俄国人的态度已经强硬起来了，日本确实害怕来自海参崴的空袭。合众社昨天发自莫斯科的专电报道，日本飞机在苏联领土上空被击落，日本辅助舰在堪察加海面被打沉：这个消息他还没有听到。这次谈话我已做了摘要，作为密件寄给了国务院。

107

苏联大使前来致意

1933年11月20日

11时，苏联大使尤勒涅夫来访，这是我国承认苏联后的正式探望。我在官邸书房接待他，浅酌舍利美酒，举杯互祝健康。我相信，俄国革命之初，他在海军起义中是起过杰出作用的。他做过驻

意大利大使，驻波斯、奥地利公使，必定积有丰富的外交经验。他说，在中东铁路问题上，俄国将寸步不让，看样子他对俄日关系的前途是悲观的。对我国承认苏联，他显然十分高兴，态度极其友好。

我随即回拜，在苏联大使馆享用樱桃白兰地酒，佐以美味的鱼子酱三明治。大使馆是幢极为时髦的新建筑物，房间宽敞明朗，如果布置得体，是会很吸引人的。顺便说一下，承认苏俄，我也沾了光，竟得到一大罐味道鲜美的鱼子酱。想不出拿什么东西回赠他，他又不抽雪茄烟。

托罗雅诺夫斯基受命出使华盛顿，人选极当。苏联挑选其主要的日本通出使美国，在此间看来，这个事实本身即大有深意。

日本人为什么尊敬罗斯福

1933年11月30日，感恩节

宣读总统在教堂发表的公告。美国人到会的很多，有使馆大部分人员，代表圣职人员则有赖夫斯奈德主教、伯顿神父、高恩博士、埃文思博士，还有协和会的另一位牧师。

公告中有个暗示值得玩味，话是这样说的："要使世界各国更加明确地认识到，我们决不谋求征服别国，只请求所有国家都以信誉担保，尊重邻国的主权和权利。"公告已在《广告报》上发表，定会刺痛日本读者中一些人的良心。说不定还会使日本某些自由主义者苦恼不安。总统办事高明：他绝口不谈满洲问题，却着手加强海军，承认苏俄；结果日本便转而采取了全新的、较为友好的对美政策。胡佛和史汀生过去不得不公开表明美国的政策，而现政府却从采取行动中得到好处。罗斯福只消在上台时宣称政策不变就行了，接着便保持沉默——这一点他做得十分成功——做而不说、不 108

写，用的是不见诸文字而日本人心里又完全明白的语言。

日本式的广告

1933年12月7日

邮件此刻刚到，我面前摆着一张别有风味的广告单，是银座大街哥伦比亚零售商店寄来的，上面写道：

现代生活状况——紧张、嘈杂、急迫——令人烦躁。克服之方惟有音乐，惟有音乐可以慰此不愉快不健康的心境。

本店有唱片音乐可供欣赏，如蒙赐顾，还将免费奉献香茗一杯，以佐雅兴。乐曲有古、今、欧、美、日本，任君选用。……各色唱片唱机，一应俱全，任随选购。不妨一试，即知详情。备有善操英语人员，热诚招待。得便敬请光临，聆听各种音乐，包管不负此行。

颂罗斯福

1933年12月9日

昨天到的邮袋里，有一封总统亲自签名的极令人欣慰的信，他向我们各个家庭、各个单位、所有驻日外事工作人员祝贺圣诞节和新年，还称赞我们能与政府合衷共济。我从来没有见过有这样做的。他这样想到大家，并且不惮麻烦，向美国所有驻外使节亲自签发谅必共有五十封这样的信，这的确是罗斯福特有的作风。一个总统对外交官员如此关切，实为我国前所未有；民主党人在野十六年，求官心切，所施对他的政治压力极大，但他都顶住了，没有罢掉一人专业外交使节的官。

109

皇后生子

1933年12月23日

7点钟，艾丽斯准时叫醒了我，说"警报器响了"。真是在响，是宣告皇家生了孩子——生女响一分钟，生男则隔十秒后再响一分钟。那十秒钟内，我热切盼待着，第二声一响，我们皆大欢喜，只有在日本生活过的人才能理解此事的全部意义。

—

纳粹外交官的风范

1933年12月28日

德国新大使来访。他刚从莫斯科来，似乎是在那里就已从波利克罗尼雅德家探听到我们的情况。他个子很高，头长而秃，面孔瘦削，一副典型的"容克"地主像，人们满以为他照例会是粗声大气的，可是奇怪，他握手时居然举动柔和，话音则又尖又细。他一上任就按典型的普鲁士方式行事，派德国大使馆一个叫诺尔的人去告诉《日本广告报》，该报有些谈德国的文章的论调他不喜欢，必须改变。其实弗莱谢尔已经很小心了，在社论中总是避而不谈希特勒主义，因为此间外国人住得相当密集，他不想惹起德国人的吵闹，他一向只限于刊登新闻电报，这些电文当然不一定都是恭维希特勒的。当他问诺尔，要是《广告报》不改变调子，大使会怎么样时，诺尔答道，大使就要向柏林报告。哎呀，多么可怕的威胁啊！

威尔弗里德·弗莱谢尔告诉我，他把这个事件讲给他父亲听了，问他父亲，要是他父亲遇到此事的话应该怎么办，他父亲答道，那就把诺尔扔出办公室了。据《广告报》报道，这位大使的夫人在首次接见记者（凡新到的使节夫人总要接见一下该报的女记者埃

110

丝特·克兰)时曾说道,他希望很快就能了解日本人,"因为我们德国人对外国人的心理素来是敏感的。"唉! 那正是他们最大的弱点之一,上次大战期间他们对比利时人、英国人、最后还有美国人的心理都判断错了,就是明证。《日日新闻》登出的各大使、公使对太子诞生的贺词中,有这位大使的一段话:"欣悉太子诞生,谨表衷心的祝贺。到任伊始即恭逢此事,**我认为这也是赐给我个人的一种光荣。**"皇后竟这样热烈地欢迎他,真是太仁义了。

日本式的摔交——"相扑"

1934年1月15日

今天下午赴大竞技场观看日本式的摔交比赛。想不出有哪种运动要比这更令人厌烦的。这种摔交一点也不象我们的角力。其运动员自成一个社会等级,从小因身长合格被挑选出来,然后象填火鸡那样给喂得肥重无比;他们出场只围一块腰布,赤身露体,大腹便便。比赛时双方对着,先做各种礼仪性的姿势,要做好一阵,然后弯下身子,两拳着地,活象斗鸡;双方同时跃起,较强的一个几乎总是推撞一次就把对手扔出圈外,这盘就算完了。我们看的最长的一盘也没有超过十至十五秒钟。只要身子的任何部分触及小圈外的地板,这一回合就结束。不在地上打滚,单只有推撞。据说有四十八种擒拿法。

更可笑的是,比赛开始、弯身准备跳起时,要互相窥测几秒钟,却又站起来,悠然步出圈外,擦擦身子,喝喝水,好象已经费过大劲似的,又拿一撮盐丢在圈子里,然后又照样从头来一遍,通常要搞六至八遍甚或更多次。这样,观众每看几秒钟的真正格斗,都得等上十至十五分钟。

111 听说其所以一再不跳起来,是因为双方都以为,只要瞪眼盯着

对手，叫他在斗前老等，就可以使他着迷。偶尔有一个也居然唬住了对手。有时也会这样：一方跳起，对方却伏着不动，弄成开错了头，还得重新来过。真是荒唐透顶。但这些角斗士却是公众崇拜的对象；竞技场中的观众当有一千以上，各带着火钵取暖煮食，要在那里露营一天。每一盘报纸都有报道，那些选手，特别是那几个最胖的，在群众中的声望，堪与“宝宝”鲁思匹敌。“相扑”之赛，乃是神道教的一种教仪，每盘都有神官在场，他在斗士蹲下时还要做一个戏剧性的架势；撒盐也是仪式的一部分，报幕员须拿着一把扇子，高声朗诵。看到这个，我们是高兴的，不过看一次也就够了。

日本在怀疑林德柏格

1934年1月16日

近日报纸纷纷转载末次海军大将在《现代》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文章大发黩武主义议论，几乎是直言明说，美国有好战的意图。他说，日本进行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接管满洲，都是为了维护远东和平——不用说，每个日本人都知道，这个意思就是由日本进行统治，但他们在说维护远东和平时显然是真心实意这样认为的。末次的议论中有这么几段：

> 他们〔美国人〕现正把大量飞机运到广州；他们正在加强上海、汉口等地的航空运输线。目前他们运到广州的飞机较多，以后还要运到厦门和福州，从这些地方直至上海沿海都在建航空基地。至于北面，我们还记得，美国人曾一再试图取道阿拉斯加跨过太平洋，然而几次都失败了。从我们的军事观点来看，他们屡败屡试，无非是在侦察。他们是有目的的，但日本人是禀性敦厚的民族，仍慨然宽待他们，那些乡民尤为厚道，视之为想飞越大海的自己子弟。

有个中尉作了一次古怪的飞行，又飞回本国去了。后来怎么样？你猜。林德伯格夫妇来了，在千岛群岛留连了一个星期，头天说气候不佳，第二天又这么说。他们飞了一下又折回去了。他们是在我国北部侦察，当然这可以说是一种设想，但也未尝不可以说这是一种可能。现在美国人在干什么？自那时以来，他们一直在阿留申群岛一带勘查，测量队、电讯队、飞行队等等都大规模地用上了。这一切是针对谁的？此时他们已和苏俄恢复了外交关系。

当然，其中可以看到经济上的动机，但也可以说，他们是在备战，企图从四方八面包围日本。苏俄正在集结强有力的轰炸机，在远东搞战备。战争一旦爆发，他们就可以从台湾、从北方、从苏联领土三路空袭，包围日本。我们必须料到，横渡太平洋的大舰队会载来强大的空军。对此等不测之事，我们正在防备。

林德伯格在进行侦察活动的说法，我看是正在方兴未艾。

三个日本人救了大使馆的一条狗

1934年1月19日

今晨埃尔西和我带着我们的狗基姆和三博沿宫外壕边作最后一次散步，不料回头一看，三博不见了。埃尔西说，“你看它会不会掉到沟里去了？”我们往沟边俯视，但见至少三十英尺下，可怜的三博正在冰和水中挣扎，只有头还露在外面，象个落水的耗子。壕壁笔直，简直不可能爬下去。我往回跑，想看看哪里可以找到小艇，宫门外值勤的警察却只是摇头，样子漠不关心。看来没有一处可以爬下去而游到狗那里，此刻我以为，要救它是毫无指望了。可是当我回转现场时，三博已经在岸上了，正在那里打哆嗦，止步观看或

来援救的人众和车辆正把它围住。

原来是这样：我们的司机本泽、一个过路的出租汽车司机和一个送货小孩弄了根绳子系着爬下峭岸，此时那可怜的小动物不知怎么已爬到岸壁上的小缝中，他们也抓着罅隙沿壁而下，这样便救了它。他们可算是见义勇为，因为只要滑一下，就要猛跌到下面的冰上，那就不得了。三博没有跌死，已经是很幸运了。我想知道前来相助的司机和小孩的名字，但出租汽车早已走了，送货小孩则坚决不肯说出名字，也不受礼，我只有跟他握握手，表示谢意。不管怎样，总算把三博救回来了，它在电炉前烤了半小时、喝了一点热牛奶，又健壮活泼如故。

午饭后我把这事告诉了桦山伯爵，他说这将给报纸提供一段佳话，问是否可以派个《朝日新闻》的记者来找我。我接见了记者，对得到的帮助表示感谢，并说我很想和那两个不知名的援救人取得联系。第二天，这故事连同三博的照片怡然展现在《朝日新闻》上，《广告报》也登了，现在三博竟成了社会名流，艾丽斯带它驱车外出时，它竖立起来，张望窗外，艾丽斯看见有人在指指它。对艾尔西和我来说，这是个惊险的事件。我猜三博恐是跳跳蹦蹦地跳过了沟边，要么就是基姆无意中把它撞下去了。我们的确是爱这些狗，两条都爱。

日本式家宴——有音乐助兴

1934年1月20日

在朝吹家进餐，他们备办得好极了：漂亮的餐桌，精美的古老餐具，十分可口的菜肴，我们在日本人家吃过不少次饭，这次可以说是最好的。开始上来的菜是野猪头、鲜美的鲑鱼、满洲野火鸡等小菜，下鸡尾酒。火鸡肉有鹿肉味，香味尤有过之。餐后，家中的

一个儿子奏木琴，池田文子小姐以钢琴伴奏。他家有七个孩子，每人玩一种乐器，组成一个家庭管弦乐队。在轻井泽的内维尔房子附近，他家有所大房子，我经过那里时，常听见他们在演奏。朝吹夫人已是七个孩子的母亲，依然那么年轻貌美，真是罕见。

114

荒木辞职，林将军接任

1934年1月21日

今天荒木将军辞了陆相之职，我不得不拟一长电呈国务院，23日发出，拟电前我已和很多人谈论过，此电意在对荒木辞职一事试作说明。关于这件事，有种种解释，五花八门，莫衷一是。他现正患病，这当然是主要原因；国会即将举行辩论，陆军需要有个代表列席，而荒木的病又不知什么时候才能痊愈。但是我认为，这不过是给那些想赶走他的人提供一个机会而已，他们是乐于抓住这个机会的。正如某某对我说的，"荒木说得太多了。"他实在是说得太多，也写得太多了，在全世界面前，他是军人跋扈的象征。我从相当可靠方面获悉，民政党的若规和政友会的铃木曾威胁说要在国会提出质询，借以煽起公愤，窘辱陆军，后来才答应克制，条件是荒木辞职。

陆军内部，他在少壮军官中亦并非众望所归。够怪的是，他们还嫌他太温和，软弱无力，不符合他们的期望；他太厚道了，迟迟不肯辞退老将领而为年轻人让路，他们还认为他在内阁中让步太多。事实上，荒木乃是介乎自由主义的宇垣和年轻躁进的沙文主义者之间的人物。他的继任者林将军是个部队首领而非参谋人员。他以沉默著称，但冷酷无情，固执鲁莽，敢于迅速做出决定，譬如1931年，他就曾不顾币原反对，独断独行，由朝鲜进军满洲。据说他认为陆军应该不参与政治，只管自己的事情，不要发表演说，尤其不

要发表煽动性的演说。因此大多数评论者觉得，他出任陆相，预示着日本的对外关系将有所改善。另外有些人却认为，任命他当陆相，正是备战的一个具体步骤，因为他是部队首长，不倾向于调和，与人妥协的可能性比荒木还小。在我的电报中，这一切因素和各种意见都谈到了，我说，目前我相信，林的任命，对政局和日本的对外关系将产生有利的影响，而不是相反，是否如此，到国会辩论时，大概总可能有点眉目。 115

暴风雨前的平静

1934 年 1 月 23 日

纵观政局：

(1) 广田真是在尽力从各方面改善日本同外国的关系。在对美关系上，他主要通过使军部比较安静一些和对报刊施加稳定情绪的影响，已造成了较好的气氛。由于和印度达成了协议，同英国的关系亦有所改善，只是不大稳定，因为经济和商业上还有许多纠葛。同中国的关系没有改善的迹象；大概是正在尽力收买华北的某些头目，一般的看法是，华北迟早会被并入满洲国，要不然就是变成一个自治缓冲国。同苏俄的关系则几乎是坏到极点了，因为，苏联虽想重开把中东铁路卖给日本的谈判，但它的报刊仍在骂日本，日本亦以牙还牙，成了激烈的、挑衅性的公开对骂。终将一战的危险总是存在。德国退出国际联盟后，已开始和满洲国调情。

(2) 各政党正在国会里诘难政府，它们有好久没有敢这样做了。这表明它们那方面的力量和信心正在增强，表明有人相信，就全国来说，庞大的陆海军军费开支正越来越使人厌烦。但也有危险，它们搞过头了，就会惹恼陆海军少壮军官，使其恢复恐怖活动，

现在已经可以听到这些人的忿怒的反响了。

（3）一般都认为，荒木辞去陆相职务，意味着自由主义者和政党得胜。公开舞弄军刀的卡嗒声也许不会象以前那样响了。但林这个人还是难以捉摸；静水常深，何况他还是个志坚力强的人。陆军，还有海军，要想继续得到它们志在必得的巨额拨款，就必定要116 培养战争心理。

（4）如果说总的政局真有什么好转，那也很可能只是暴风雨前的宁静。1935年的海军会议，不论发生什么情况，不论开得成开不成，不论能否达成协议，都会使日美关系——或许在较小程度上还有日英关系——趋于紧张，问题只是严重到什么地步而已。日本定会大吵大闹，怒骂我们老让它处于"次等国家"的地位。怒潮终有平静之时，但此后即使不留下伤口，也会留下又一道伤疤。应该预见到会有这样的风暴，要尽量做工作，任何工作，只要能创造友好的气氛，都是有益的。

（5）日本人并不指望我们在最近的将来承认满洲国。我国的政策，他们是知道的，无需重申，没有重新引起对抗的必要。默然坚持我们的立场，不会使我们丧失原则。

1934年1月24日

大使馆宴请外相。

广田很友好，一如往常，但因开国会、答质询太紧张了，显得非常疲乏。他说，对他来讲，这是一次全新的、困难的经历。肴馔甚佳，头道菜是浓野鸡奶油汤，博得不少好评，最后上来的是冰淇淋加热槭糖；中有鳟鱼和鹌鹑之类。在日本，容易办出好菜。

三博故事续编

1934年1月25日

今天我被告知，救三博的那个出租汽车司机已被《朝日新闻》找到了，为满足我们披诸报端的心愿，特来领谢和接受礼物。艾丽斯为此买来的手表，她要包好才送到办公处去，不免耽搁了一点时间。最后我要他们把这个人请进来，所以又耽搁了一阵。约二十分钟后，内维尔和杰夫进来了，他有点局促不安的样子，最后又转为哄然大笑。原来就在等礼物的那个时候，司机在使馆外面被另外一个司机打了，因为他是偷了后者的出租汽车而来到使馆的，打到后来，两个司机都被带往警察局，那里发现，自称救过三博的那个人不过是个冒名顶替的骗子，他看到广告后，就起了骗取礼物之心。老内维尔又惊又喜。我把礼物放回抽屉，锁上了。 117

1934年1月30日

今天《朝日新闻》的人把确曾救过三博的真正的司机带来了；我们请他上公馆来，艾丽斯把手表给了他，正式照了相——艾丽斯授礼，三博旁观——登在第二天的《朝日新闻》上。司机是个标致的小伙子，十分腼腆、谦和。使他得到应有的甚或是有所助益的宣扬，我感到高兴。

俄日紧张关系开始缓和

1934年2月8日

俄日间常有开战的可能，此间大部分消息灵通人士一直为之不安。除种种挑衅性的事件而外，这一仗也许还会在1935年打起

来，但在最近六个月，和平的希望亦稍有增加。有些重要因素现在正在起着阻止一场俄日战争的作用。

（1）最近几个月来，有一种显著的反对军部的倾向，预算中军费庞大，开支与要求激增，尤其使人不满。这种倾向，在内阁、在报刊、特别在国会，都可以看得出来。最近国会议员在质询时攻击陆海军当局，乃是反军部倾向的最直接、最猛烈的表现，为 1931 年满洲事变以来所仅见。

（2）国会中的质询性质强烈，表示政治领袖们的力量和信心在增长。军部是做过头了。现在就要看这些政治人物由于信心增强，是否也会做过头。假如也会这样，那就有激起更多的恐怖活动的危险。海军方面已经传来了忿怒的反响。不过，国会一休会，政

118 客们当众发表意见的机会就少了，虽然他们仍将有充分的机会对军人跋扈将给国家造成的危局表示忧虑。

（3）与 1932 年 5 月 15 日犬养首相被刺案有关的军官判罪较轻，而牵连程度较小的非军事人员反而判罪较重，这又加剧了公众对军部的反感。我从可靠方面获悉，荒木将军不久前说过，军事法庭在给军人定罪时犯了一个严重错误，对舆论的力量完全估计错了。他又说，当时军官们若是在犬养首相的门口切腹自杀而不是去刺杀首相，那就会立刻发生革命，可是他们为达到目的，竟采取了错误的手段。

（4）人们普遍认为，荒木将军的辞职——实在是因病，但许多人觉得这是天意——给政局消除了一个兴风作浪的因素。他的继任者对预料中的苏日战争抱什么态度虽还不得而知，但至少可以说，公然的战争叫嚣现在会小一些，发自军人的挑衅性言论也会少一些。这种情况，当能起一种镇定作用。

（5）中产阶级，包括自由职业者、商人、工业家、地主，其心理状态在过去一年中已有变化，面临出口增加带来的经济繁荣，他们

希望保持现状，怕战争会造成混乱。这种繁荣工商业阶级享受到了，农村居民却没有沾到多大的光。在继续增高的生活费用面前，农民的收入一直固定未变，或者近于没有变动。另外，现代人迫切要求改善生活状况，对农业区也有影响，那里的人已不再满足于他们祖祖辈辈过的那种艰苦朴素的生活。这些因素，加上须由村社负担的重税，引起了农村地区的扰攘不安。这些地区当然切望减轻负担，对沉重的军费负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关注、更加反对。

（6）国家最高当局是爱好和平的。天皇是个性情温和的人。他在位时期的特征正是以"昭和"二字来表示，这个年号是他自己选的，有"昭示和平"之意。没有理由相信他赞成在满洲冒险，因为事情并不是由他决定的。元老西园寺公爵和牧野伯爵对战争的恐怖感受甚深。自1931年后，他们就已无法使自己的意见为公众所知，但他们还是经常在幕后做工作，人们认为他们的影响力正在逐渐增强。 119

首相就其个人来说，是个喜爱和平甚于喜爱战争的权要人物。外务大臣广田已显示出意想不到的力量，报刊的调子自他就职后转为比较温和，外交方针转为力求同外国发展友好关系，这主要都应归功于他本人。国内有一群坚强的自由主义者，他们一直坚持在幕后做工作，据认为，他们的力量正较前有所发展。最近在东京俱乐部招待英国大使弗朗西斯·林德利爵士和出渊大使的宴会上，主席林男爵介绍讲话人时缓缓陈词，语气坚定威严，他在桌上砰地猛击一拳，强调说："我们要和平！"这是小事，但林男爵却是宫内省式部长官、天皇的亲信之一。

（7）从陆军本身的观点来看——因为是战是和，很可能归根到底还是得由陆军决定——新因素也许能起抑制作用。甚至在陆军内部，头脑清醒者亦不乏其人，他们知道一场日苏战争的严重

性，他们怀疑所要达到的目的是否值得冒这么大的风险——会不会劳而无功。

诚然，陆军有充分的信心能够拿下海参崴和沿海各省，甚至占领直抵贝加尔湖的全部领土，因为，俄国人与内地供应基地相隔数千公里，战略上将始终处于危险境地。但是，他们在东方的防务已经大大加强，驻海参崴和边境其他地方的空军且对东京和日本其他重要城市构成严重的威胁。此外，美国承认苏俄，又给形势注入了重要的心理要素，使日本当权者不能无所顾忌。因为美国虽奉行和平政策，但在日苏发生战争时它会采取什么行动，对日本人来说，仍将是一个未知的、令人忐忑不安的因素，必须加以考虑。军事计划就算订得周密无误，美国的态度如何、会有什么行动，仍是未可确知的因素，因此就成了难测的危险。美国的承认，增加了莫斯科方面的自信，但谁也不相信苏联会发动战争。因此我认为，我国承认苏联，已对时局起了抑制作用，其效力也许比别的任何要素都大。

120

（8）驻东京的各国陆军武官有一种意见，认为日本陆军的战斗力将在 1935 年达到顶点，过了那时，在交通线、有组织的人力、防御工事和装备等方面，时间就将有利于苏俄。外国观察家大都提出并坚持一种假设，认为在实现日本扩张目标的总计划中，沿海各省和东西伯利亚占有重要地位，而苏联则是达到这些目标的障碍，必须在有利的时候扫除。即使真是这样，我仍旧认为，日本有一派正在得势的人，他们认识到，在进一步从事军事冒险之前，把既得成果巩固下来颇为重要。建立“满洲帝国”，就是巩固成果的一个步骤。这派人觉得，在实施进一步的扩张计划以前，满洲国必先向世界证明自己是一个稳定的、进步的政治单元。现在，似乎较有希望的是，比较稳健的这派有可能占优势，而压倒那些不那么讲理的人。

纵有上述那些倾向和种种值得考虑的因素，未来世事的演进还是变幻无常，容易发生无法逆料的事件。我相信，外国陆军武官们全都是抱悲观态度的。的确，帝国武装力量有个重要的派系，特别是那些少壮派，他们是切望同苏联一战，为达此首要目的，陆军和海军都在倾其全力作紧张的、一致的准备。我以前曾把这些人比作经过加紧训练的足球队：它自信占优势，不满足于老是训练，总是盼望出场比赛。陆军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正是抱这种态度，恰似 1914 年的德国陆军。假如让这种人为所欲为，就会有战争，就会始终存在着这样的危险：他们的行动会造成一种战争不可 121 避免的局面。

《密勒氏评论报》编辑 J·B·鲍威尔先生对我讲的下述事件，可以作为这种危险的例证。有一次他在沈阳和一个日本年轻军官共餐，那个军官指着屋里的一张小桌子说，那张桌子有历史意义。“轰炸锦州的计划就是在那桌上拟订的。当时意见不一，表决时我本人反对，但大多数朋友赞成，于是轰炸便照计划进行了。”这故事的含义在于，未经上级指示，也可以采取行动。我当然不能保证确有其事，但鲍威尔先生相信这个故事是真的。这种干法与 1931 年满洲战役中的其他事件并无二致。我们不能无视现实：不论东京当局或前线指挥部的观点和政策如何，将来仍有可能发生类似事件，而任何一个严重事件又都可能造成一种局面，使对苏战争成为不可避免。

总之，最近几个月来，日本潜在的和平倾向已经露头，发生声音，自 1931 年 9 月 18 日以来，没有哪个时候有现在这样显著。有此倾向的人如能稳扎稳打，他们的力量和影响就可望增加，早晚总可以有效地引导国家采取比较明智的方针，少用军国主义的侵略手段。日苏冲突能否避免，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这些新出现的倾向是否继续增强，在目前来看，似有理由对此表示乐观。

日本宫廷庆贺太子诞生

1934年2月23日

宫廷丧事暂停三天，以便庆贺太子诞生，这三天内宫中须分批接待全体有相当品级的日本官员——第三天将达七千人。今天是邀请亲王、王妃、各国首席使节、内阁成员夫妇同天皇和皇后共进午餐，全都围着一张大桌就坐。巴索姆皮埃尔不在，阿马拉尔代理外交使团团长，首先由他代表使团献礼，向天皇敬献一个特大的银碗和一本银面精装、内有各国使节签名的簿子，并致贺词，天皇致答词，然后和我们一一握手。

122

午宴庄严豪华。艾丽斯作为外交使团的代理首席夫人坐在两位亲王之间。天皇和皇后坐在正中。每个客人面前都摆着特制的绘有皇家金羽顶饰的红酒杯和小型的武士银盏。席间有个和我素不相识的李王子忽然隔着赫尔特曼夫人探过身来用德语问我："世界上什么地方最美？"我不假思索，迅即答道："谢德格山[①]，在容弗劳峰之麓。"他好象满意了，说，"我要去那个地方。"攀谈到此为止。

餐后各国使节及夫人相继被请进天皇和皇后见客的房间里，分别座谈五分钟左右，自然是通过翻译。天皇说，日美关系有显著改善，他很高兴。我代表美国祝贺太子诞生，不料他突然问道，"三博怎么样？"(或大意如此。)显然，关于那狗如何掉进宫外壕里、如何被救的报道他都看过了。我觉得天皇非常热诚，皇后则喜气洋洋；她很想知道埃尔西的一切近况。艾丽斯告诉他，埃尔西去北京时不敢带着皇后送的结婚礼品去，怕给丢了，因为那是她最珍视的宝藏。我也和币原谈了许多话。内阁大臣夫人和几个高级官员的夫人们穿着大约一千年前服装——花缎衣裳，红鞋，簪子夹着发

① 在瑞士。——译者

辫，垂于背后。这是一次难忘的盛会；我们在那里从12点盘桓到3点多钟。

苏联大使认为1934年春为关键时刻

1934年3月9日

今天与苏联大使尤勒涅夫先生长谈，他先告诉我关于出售中东铁路谈判的现状；谈判还只限于日本外务大臣和他本人之间作非正式的讨论，双方全体代表的会议尚未恢复。会谈纯属讨价还价，不用说，双方都想得胜——尤其是广田先生，他怕难以满足日本的舆论。简况如下：

123

苏联政府把谈判分为两类，第一类包括(1)撤换苏籍铁路人员，(2)满洲国承担铁路债务。第二类才是铁路本身的出售事宜。给苏籍人员的补偿费，苏联政府将要求九百万至一千万日元。债务约计多少，他没有告诉我。关于铁路的售价，满洲国当局只出五千万日元，一直不肯松动。苏联最初要两亿五千万卢布，后来减为两亿卢布。为方便日本起见，苏联政府后来又同意总额的百分之五十以货物支付，另外的百分之五十中，协议签字时立即以日元付百分之十五，其余百分之三十五由满洲国政府在三年内付清。有待同意的是总数究应为多少。现正谈判用哪类货物支付，日本人想尽量在这方面占便宜。

我问大使，他对谈判的最后结果是否乐观。他用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来回答："假如日本人有心避免和苏俄打仗，就可以达成协议。"我对他说："这话似乎可以解释为：假如日本人不妥协，苏联就要宣战。"他答道，不是这个意思，他的真意是，假如出售铁路一事不能达成协议，这个事实就将是一个重要迹象，表明日本人意在求战，并将用谈判失败为口实，使日本舆论确信有理由进行这场战

争。他们已经在公布的文件中泄露天机，扬言不论谈判成功与否，他们都要取得这条铁路。

于是我又问尤勒涅夫先生，他对避免战争是否乐观。他说，乐124 观是重要的，但又暗示，抱这种态度时他必须非常小心，因为到一定时候，日本政府可能会公布他和广田关于铁路的会谈，那时他的态度就会透露出来，就可能对局势产生重大影响。话虽如此，他给我的印象仍清楚地表明，他对前途决不是乐观的。他说，本月内东京将举行师团主要将领的会议，① 那时将充分讨论关于进攻苏联的正反两面的意见。他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实：1931 年 9 月满洲事变爆发前不久，也开过类似的将领会议。他说，林向来都是在进行反苏活动，特别是在新疆，尽管很难确知他现在的态度如何，但恐怕也没有多大理由认为他有和平的意图。

尤勒涅夫先生重复他以前常对我讲的：苏联有充分准备，可以对付一切不测事件，海参崴和西伯利亚边境的防御固若金汤。西伯利亚大铁路已在改建双轨，冬季酷寒，铺轨工程亦未尝稍懈。日本人若进攻，他们当然能够派大军到满洲，或许还能够夺取海参崴及其邻近的东西伯利亚地区，但是往后的军事行动就将拉长和削弱他们的交通线，苏联人则可以逐渐把越来越多的部队运入那个地区。战端一开，不到一方精疲力竭，是不会罢手的，而要耗尽苏联人的几乎是无穷的力量，就得费很长时间。他说，俄国海军当然比不上日本海军，但海参崴的俄国潜艇队是很强的，击沉一两艘日本战列舰，就会产生巨大影响，使远东全局改观。他又说，苏联的措施现在虽纯属防御性质，但战争一起，防御就立即转为进攻，除非日本迅速获得大胜，否则苏联人就能占领部分或整个满洲，何况125 满洲国现有部队中至少有十万人将支持苏军，可以改变整个战局。

① 这次师团长会议订于 3 月 26 日在东京召开，为期五天。不是每年都开，据说新陆相就任后通常都要举行这种会议。——作者

我对大使说，东京的外国军事专家大都认为，日本陆军的战斗力将在1935年达到顶点，倘若他们想打，1935春季将是最有可能发动进攻的时刻。大使答道，谁也不能预定一个准确的日期，但他觉得今春进攻的可能性比较大，即将到来的日本将领会议开过之后，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因为他们懂得，时间正日益对苏军有利。他似乎坚信，这次日本高级军官的会议将作出最后决定。他同意我的看法，认为日本是有不可忽视的和平力量在起作用，其中有天皇、西园寺公爵、牧野伯爵、一大批自由主义者，尤其还有广田，但他又说，归根到底，还是要由军部来决定。

谈下去，尤勒涅夫先生又讲到新疆的局势，说苏俄遣返的中国军队已在那里打败了别的军队。他认为，日本人在中国节节进逼，是要制造更大的分裂。他觉得，日本人深信，美国正在支持中国，特别是在航空发展方面。他对于美国在菲律宾、关岛等地的进一步设防方面问了许多问题。他还说，根据他的情报，英国正在表现明显的亲日倾向。他说，英国处境很困难，因为英国也是完全有理由害怕日本过于强大的。他大体上同意，政局还相当模糊不清，虽然他已看出在整个远东都有国际阴谋在经常作祟。

庆祝日美友谊

1934年4月22日

盛大节日。艾丽斯和我6点起床，7点45分在横滨坐上日本驱逐舰"岛风号"。我曾问过国务院，可否允许我们坐一艘美国驱逐舰到下田去，国务院不赞成，因为下田在法律上不是开放港口——除非日本人自己提议这样做，而他们又没有这样提。不过他们还是带我们乘他们的驱逐舰去，同乘的有出渊、野村海军大将、桦山伯爵、罗杰斯夫妇、克兰夫妇、狄考福夫妇、古尔德夫妇、另外 126

几个日本名流、一大堆新闻报道记者和摄影记者。这是去隆重庆祝佩里海军准将同日本签订日本第一个国际条约的八十周年，地点就在当时“黑船”停泊的主要港口。

去下田的航程历时三小时半，航速每小时二十五海里。春光明媚，海不扬波，这要感谢老天（要是昨天走，就可怕了），即使如此，一出东京湾，仍有大浪，有些女士脸色发青，出渊和桦山则完全昏过去了(passed out)。（这使我想起日本报纸郑重报道这次即将在佩里部下五个水兵墓前举行的祭礼时，也说这五个水兵“passed out”——不是“passed on”；）[①]沿途都看得见富士山，山色清朗，气象感人。

下田的小港湾风景优美，岸高林茂，岛屿秀丽——有个小岛却不是那么美观，有只俄国军舰因遭大雾曾在那里撞毁。那时候，日本人原是想把这里辟为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埠，与佩里签订的条约中，只开放下田和函馆，后来事实证明，下田当然不能用，遂改为开放横滨。

我们先在下田对岸的一个小村柿崎上岸，汤森·哈里斯[②]曾在这里的玉泉寺住过四年，此后才带着一个名叫逢吉的艺妓去江户，逢吉是抛家弃友来给哈里斯料理生活的，结果在那个时代便为社会所不容，死了也得不到体面的埋葬，可是后来就因为她能无私地帮助当时受憎恶的外国人，日本人竟几乎把她奉若神明。今天的诗歌中还可以见到人们对她的怀念之情。原来的庙已经毁坏了，但就在旧址上，现在又立着一所一模一样的新庙，方丈来迎接我们，陪同前往该寺，我和方丈早已有过多次书信往来。

艾丽斯和我先在五个美国水兵墓前一一烧香，然后才去庙里

---

① 前面的“passed out”是昏倒的意思，后面的“passed out”是死去的意思。“passed on”在这里是前进的意思。——译者

② 汤森·哈里斯(Townsend Harris, 1804—1878)，美国第一任驻日总领事，后升为公使。——译者

纪念汤森·哈里斯。纪念意义之深，礼仪之隆重，无不使我们深受感动。我们在遗物橱前站了一会之后，便细看庙中虔敬保存下来的哈里斯的各种遗物，有他本人的一些物品，还有他的荷兰译员赫斯肯的衣服——赫斯肯后来被暗杀了。庙附近有哈里斯纪念碑，127 上面刻着他的一段日记，是他在日本升起第一面领事旗那天写的：

> 1856年9月4日，星期四。睡了不大一会儿，因为兴奋，又有蚊子——蚊子特大。海边的人帮我树旗杆。工作既费力，又缓慢。旗杆立而复倒；横桁折断；幸无一人受伤。终于从船上找到加固旗杆的材料。旗杆树好了；人们在杆旁围成一圈，下午2时半，我升起了这个帝国从未见过的"第一面领事旗"。这是严酷的现实的反映——预示时代要变——一叶确能知秋。请问，这是否真有益于日本？

野村将军问我，他所谓"一叶确能知秋"是什么意思。我说，想必是说这意味着日本的锁国时代即将结束(未知是否确有此意)，他最后那句"请问，这是否真有益于日本？"表明他当时既想到他本国的利益，也同样想到日本的利益。

随即驱车一英里左右赴下田，日本小学生夹道欢迎，几乎络绎不绝，男女学生都有，大批大批地来自各城镇，远的有来自名古屋者，都挥动着日美两国国旗，高呼"万岁！"其热诚是很难装得出来的。也真是非常令人感动。最后来到市立学校，庆典就将在这里的户外举行。已临时搭起了一座神社，纪念佩里和哈里斯的典礼是按神道教的仪式进行的，有音乐、几个神官和照例堆满几桌的酒馔；先挥动"榊"树枝驱邪，给观众洒圣水涤污，然后主祭人就位、降神、读祈祷表——求神保佑那两位英雄的灵魂得到安息。此后便是我们大家走上去，献榊树枝，最后龛内的小门关闭，表示诸神现在可能离开了。

接着是讲话，讲者甚多——县知事带头，接着是町长、庆典委

员会主席、代表广田的出渊、桦山、野村将军、著名的江川英龙的后裔山田和我。以演说家著称的山田讲得坦率，他说，今后二十年的128日美友谊，要比过去八十年重要得多（此语且含有紧要关头之意），到纪念佩里签约一百周年时，其意义将远比现在这次大。

讲话太久，以至再游一个寺庙、参加市镇午宴等节目都只好放弃了，3时离开下田——在此已有三小时半——小学生又夹道欢送、欢呼。和欢迎时的排场一样，有许多彩船伴随，送出港外，其中有艘旧拖网汽船，装扮成“黑船”的样子，船侧明轮翼等一应俱全，船尾突出地标着“波瓦坦号”。回程风浪较小，很愉快，在军官宅吃茶点联欢。今天确实是个盛大节日。

俄国寓言

据报道，托洛雅诺夫斯基在美国国际法学会演说时讲了一个俄国寓言：有个厨师，见猫在偷肉吃，便向它大讲其道理，训诫一番。猫一面听着，一面继续吃。“我认为这个寓言是针对着国际关系而编的，因为它提出这么一个问题：猫听了，还是继续吃，那又怎么办呢？”

局势又突转紧张

1934年4月28日

这几日是政局紧张的时候。的确，在我们这一行，有趣的形势和任务总是周期性地出现；过几段比较平静的时期，办点大体上属于例行的公事，突然之间又出事了，又要忙得不亦乐乎。自4月17日外务省发言人天羽英二发表声明以来，政局一直在动荡；长电来来往往；大使、公使、代办、新闻记者川流不息来打听消息或探

问对时事作何判断；几无片刻休息。天羽至少已使新闻记者有得忙的，外交官则在花成千的美元付电报费。在不久前的一次晚宴上，我告诉天羽，我们大家都想把电报账单交给他，由他付账，他答道，好，没关系，他既照顾了电报生意，就自然从递信省那里得到佣金。公众是把天羽视为一个说话不负责任的人呢，还是当作一个英雄，目前实难下断语；这倒要看你是去请教稳健派，还是去问沙文主义者。 129

对天羽原来的声明，日本报刊最初的反应是无条件赞同，但当国外反应不妙的消息传来时，有些报纸便一面绝对赞成惟独日本有责任"维护远东和平"之说，一面却同意声明的措辞有点毛病。值得注意的是，广田 26 日给我的声明和天羽的声明不同。据 17 日声明的非正式译文，天羽是这样说的：

> ……维护东亚的和平与秩序，日本必须单独行事，自行负责，这在我国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为了能够履行此项义务，日本必须属望其邻国分担维持东亚和平的责任，但日本认为，除中国以外，任何其他国家都不能够和日本分担这个责任。

26 日的官方译文，措词却有了改动：

> 不过，无论谁，无论用什么借口，若采取不利于维持东亚法律和秩序的行动，日本都不能漠不关心；对维持东亚的法律和秩序，日本有最切身的利害关系，只消看它的地理位置，即可想见。因此，它不能让任何第三者不考虑上述情况而利用中国问题以实行自私的政策。

据报道，天羽在十七日声明中还说：

> 中国若有利用别国势力来排斥日本的任何企图，日本都要反对，因为这将危及东亚和平；中国采取任何意在"以夷制夷"的手段，日本同样反对。日本期望外国考虑到最近满洲事变和上海事变造成的特殊形势，期望它们认识到，对中国采取

共同行动，纵令只涉及技术援助或财政援助，最后亦必将对中国具有政治上的意义。会产生此种意义的行动计划，如果贯彻到底，必定会引起纠纷，这又可能会迫使列强讨论划势力范围、甚至讨论国际共管中国或瓜分中国等问题，这将是中国可能遭遇到的最大的不幸，同时也将对东亚，最后对日本，产生最严重的影响。

130

因此，作为原则问题，日本非反对这些计划不可，虽然它无须乎干涉任何外国单独和中国商谈财政或贸易事项，只要这些事项有益于中国而又无害于维持东亚秩序。倘若这类谈判具有可能扰乱东亚和平与秩序的性质，日本就不得不反对。

例如，向中国提供军用飞机，在中国修建飞机场，派军事教官或军事顾问到中国，贷款供政治上的费用等，显然都会促使日本及其他国家同中国不睦，终将证明是有害于东亚和平。日本将反对此类计划。

上述态度，在日本过去奉行的政策中，应已显示得很清楚。但由于外国要共同援助中国，要提供其他侵略性援助，其态度表现正越来越明显，太过于露骨，故上述政策仍宜于予以公布。

何以要发表4月17日的天羽声明，已有许多揣测。我在致国务院的各次电报及最近的快信中，亦力求讲清此中缘故，主要是根据这样的推测：外国在中国的活动，迹象正日益增多，所以日本也日益倔强。另外我还说，倘若赞成惟独日本才应维护远东和平的责任之说，就会使它在即将召开的海军会议上更有权要求拥有与英美同等的海军实力，还会使它能够独霸中国。天羽曾被日本新闻记者追逼，要他对此类问题表示意见，他终于得到重光的同意，披露已经发给驻华公使有吉的训令的内容。

广田批准发表此项声明与否，无关紧要，因为声明恰好准确地

表达了日本正想推行的政策。声明的措词，虽受到了一点批评，声明的内容，却似已得到几乎所有日本人的无条件赞同，舆论的现状如此，广田要是否定这个声明，就不能保其职位。声明最后很可能会产生这样的结果：(1)加深满洲战役以来即已普遍存在的孤立感；(2)推进陆海军为对付1935—1936年“危机”而作准备的活动；(3)使爱国激情发展到能够辖制政府的程度，遇到在对华政策上或海军比率问题上与列强发生明显的意见分歧时，无论何人当政，都不敢与列强妥协。

到车站给弗朗西斯·林德利爵士送行，广田和大多数外交界同僚都到场了。

看见林德利走了，心里很难过。三十年前在开罗，我们已有同行之雅，艾丽斯和我同他夫妇俩始终保持着诚笃的友情。他一向是个好同事，非常直爽，连机密消息亦不吝见告。

还有个同行，最近把送呈他政府的一封急件念给我听，后来经我请求，又私下送了我一份。其中有这么一段话：

> 诚如某人(在柏林与多德大使谈话后)对我说，到目前为止，美国对满洲国的态度没有改变。我曾向你表示过我的意见，那就是，一旦美国认为改变态度有利，它就会毫不犹豫地放弃史汀生主义①，它并未对任何人负有必须坚持这个主义的义务。尽管《国际联盟盟约》是它的总统的作品，它在1920年还是不顾这一事实而抛弃了国联。

这样类比，表明他完全不熟悉我国的政府制度。所谓史汀生主义，乃是行政部门的一项政策，承认不承认外国，也是一种行政特权。譬如派大使，国会可以作决议，但却不能够不经最高行政长官的同

---

① 1932年1月，美国国务卿史汀生发表声明，表示美国“不承认”因日本占领中国东北而造成的变化。这就是所谓“不承认主义”，亦称“史汀生主义”，是用来掩饰美国的妥协态度的。——译者

意和命令而自行派遣。可是国会又有权拒绝批准包含《国联盟约》的《凡尔赛和约》。

这位外交官接着又说，他仍旧认为，本来就不应该认为《凯洛格公约》亦适用于满洲事变，他提出如下论点：

> 根据1901年9月1日的北京议定书，美国（还有法、英、意、比等国）有权在中国——在北京、天津、山海关及其他地点——驻兵。假定至今还驻在天津的拥有现代优良装备的大批美军，为情势所迫，不得不使用武力以执行其正常的、条约所设想到的任务，比如说，到离城二十公里或者甚至一百公里的地方去制止屠杀美国传教士，史汀生先生会坚持说这一事件是侵犯了中国边界或违反了《凯洛格公约》吗？不会的，因为那是讲不通的。然而论到与此全然相似的日本在满洲的军事行动，他却正是坚持这种说法。固执法理，引伸解释，推演到一定程度，就有违反基本常识的危险。

132

这话论据薄弱，比喻不伦。一是当地外国驻军出击，保护侨民生命；一是数十万大军涌进外国境内，从事大规模军事行动，其目的和结果都是使那个地区和它的所有者永久分离：二者岂能相提并论。我对他这样说了，他却不同意。他在他的信件中仍旧写道，只要美国和国际联盟坚持目前的态度，东亚局势就仍将存在着战争的危险。

对于《九国公约》，这位同行的态度是，他既然不肯承认日本违反了第一条的规定，因此也就不承认它违反了第二条的规定。可是，缔约各国在第一条中同意"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暨领土与行政之完整以后，又进而在第二条中同意各国不得相互地、单独地或集体地与任何一国或多国订立条约或协定或协议或谅解足以侵犯或妨害第一条所称之各项原则者。"即使是那些能接受显属虚构的满洲"自决"论、因而能相信日本没有违反第一条的人，也很难理

直气壮地认为日本没有违反第二条。它既然和满洲国订了条约，当然就违反了第二条。情况变了即可废弃法律上的义务，这话我们听得多了，但是，明目张胆的违约行为假如可以宽恕和承认，那还不如干脆把一切条约都视为"废纸"，对个别国家不方便时，就可以撕毁，就象1914年德国侵犯比利时那样。赫尔先生在他最近的备忘录中讲得很清楚，公认的修改或终止条约义务的办法是有的，但只能按照缔约各国所规定或承认或同意的程序办理。我希望我不会看到有一天美国承认满洲国。 133

赫尔国务卿立场坚定

1934年4月29日

赫尔先生关于外国援华问题的备忘录发到时，幸好我在家。5时译出电文，5时半左右用打字机打好。虽系星期日，又值天皇寿辰，我仍立即写一私函致广田，问他能否即刻见我。他以电话答复，订6时半会晤，因此我可以毫无延误地将文件送去。他慢慢地、仔细地看了，问我认为哪一部分或哪几部分最重要。我答道，我不认为我应该对它试作解释，我觉得电文本身已经很清楚了。他只下了一句评语，谓天羽声明已引起"很大误会"，并说，备忘录一俟研究之后，即予答复。他极为友好，一点也没有表示诧异或不以为然。在我看来，备忘录实堪赞佩，它完全符合形势的需要，行文巧妙，主旨鲜明，而语气委婉。

我看事情总算是过去了。广田保证日本仍愿尊重《九国公约》，约翰·西蒙爵士① 似即欣然接受，未免太快了一点，他向下议院报告说，对此种保证他感到满意，这又可能会使英国公众中某些

① 约翰·西蒙(John Simon，1873—1954)，1931至1935年任英国外交大臣。——译者

人觉得有人还有更多的要求和希望。不管怎么样，反正我们已经透澈地表明了我们自己的立场。我想，国务院之所以“紧急”指示我尽早送交备忘录，大概是要阻止再发表此种虚伪的声明，据说外务省明天就要向报界发表这个声明了。很明显，这份备忘录果已止住了它，因为第二天天羽便向报界宣称，目下将不再有任何声134明。不管别国有什么想法或做法，反正我们将会得到日本人的（也许是勉强的）尊重。此亦一大快事。

日本爱国主义者恐吓荷印

1934年5月14日

帕布斯特来访，我们时常聚谈，这次是其中之一。他说，日本爱国团体“明伦会”最近派了一个代表团——内有退伍的海陆军将领各一人——去找他，交给他一份该会草拟的备忘录，就不久即将在爪哇巴达维亚举行日本—荷印贸易会议一事敦促荷兰政府，要它保证谈判成功，态度相当蛮横。备忘录还发议论，论到荷兰政府对荷属东印度群岛土著居民的压迫，并说，荷兰政府倘不与日本人妥协，就会使两国关系蒙上“乌云”。

帕布斯特将军说，他提出两点：(1)他的政府与荷印土著彼此如何相待，纯属内政问题，不容别人干涉；(2)“乌云”之说，含有恐吓性，这也是不能接受的；若要作为公使的他收下这份备忘录，这两点必须撤销。代表团的人鞠了一躬，貌似默然同意；公使说：“我可以把你们的鞠躬看作是道歉吗？”他们又鞠了一躬。

公使又告诉我，他还听说，上述团体曾向日本政府建议，将来谈判若不成功，就同荷兰断绝外交关系。

荷兰公使想了解一下，美国大使馆在接待这类代表团和收受他们的信件时一向是怎么办的。我告诉他，美国大使馆对这类代

表团通常是以礼相待，但它从来不代表美国政府收受任何致美国政府或官员的备忘录、抗议书或其他信件，我们一贯认为，这些信件既然是来源于日本，就应该通过惯常的、正当的渠道，即日本外务省和日本驻美大使馆。 135

有几次，我们以为这些团体可能会找到大使馆要求转送什么信件，但自我到任以来，它们都没有这样做过，可见我们大使馆坚持那种手续，已卓有成效，打断了爱国团体和其他团体来我们面前陈述意见的念头。

日本式的绥靖政策

（格鲁先生致美国驻瑞士日内瓦领事

普伦蒂斯·B·吉尔伯特函）

东京，1934年5月17日

机密

吉尔伯特先生鉴：

4月5日来信收到，谢谢。遵嘱谨将此间目下政局，特别是日本对待国际合作的态度，略加概述，既陈现状，也联系到日本志在称霸东亚的基本政策。

你在信中说，"人们有清楚的印象：日本在满洲的目标既已大部达到，所以它现在正图尽量平息各方面对它的反感。"这实际上正是广田出任外相所承担的特定任务。于是——用日本报刊目前流行的话来说——广田先生的"国防外交"便代替了内田伯爵的"绝望外交"。

广田推行其和解政策，已显示了力量和才能。他是今年9月上任的，那时候，群众情绪正在恢复正常。外务省咄咄逼人的发言

人白鸟已被撵走。内田伯爵辞职，此事本身就是对军部势力的一个打击。几周内又开了有重大意义的“五相会议”，会上广田在与荒木交锋时晓之以事理，据信已赢得了荒木不干涉外交政策问题的保证。随后在1月间，军国主义的大祭司荒木本人，也自知其对陆军许下的诺言不能实现，终于辞职了。

136

此外，在公开言论中，在国会里，公众舆论都对庞大的军事预算表示震惊，并有责怪陆军的倾向，认为他们不该使整个国家陷于不必要而又危险的激动状态之中。商人和资本家也希望能安享出口兴旺之利。

这几个月来，广田一直都在做工作，是为日本同中、苏、英、美的关系打下一个友善的基础，我也深信他确有此意。报刊的排外主义立见缓和，显然是由于他的插手；重新努力逐个解决日苏间的悬案，说明是他在起作用；在他和我的谈话中，这点表现得更突出：他总是热心于探索一切可能改善美日关系的途径。有些人觉得他是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是小村① 和加藤② 之后最有才能的外相。

然而许多人认为，广田的温和，不过是一种手法和策略，实质上并不温和。的确，在去年，谁若不保证支持日本的大陆冒险事业，不深信日本有“维持东亚和平的使命”，他就上不了台。从这里正可以看出根深蒂固的、正与温和相反的一面。日本政府目前正在力求摆脱国际上孤立的险境，但骨子里每个日本人——无论在朝在野——仍旧是坚决地认为，他们的国家一定要实现其久已抱定的野心——称霸东亚。

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日本政府发现它很难向世界求得一点实际的友谊，除了口头的友谊之外。人们都不免疑心，此间很多人

---

① 小村寿太郎(1855—1911)，1901至1906年、1908至1909年任日本外相。——译者

② 加藤高明(1859—1926)，1899至1916年间曾四次任日本外相。——译者

——甚至可以说绝大多数人——内心认为，日本参与各种条约，承担各种国际义务，只是在帝国的道路上设置重重障碍。当然也有通情达理之士，在御前有影响的老一辈政治家如西园寺、牧野等人，对这些近乎蛮横的观点，并不是毫无保留地赞同，但他们都是老人了，不能指望他们能对政局长久发挥约束的作用。日本在每阵扩 137 张浪潮过去之后，往往有一段巩固成果的时期，在目前，这段时期对国家最为有利，但由于国民总以为目标已经在望，所以不肯承认这一点，这种情绪是显而易见的。

这使人立刻想起，那个确是有名的、因外国援助中国而宣布日本将采取何种政策的«天羽声明»已经表明了广田为日本争取朋友的愿望同这个国家的基本目标是互不相容的。一方面，«声明»已经给广田的睦邻政策造成极为尴尬的局面，另一方面，却没有任何人，甚至没有任何政府官员站出来否认这个声明是代表真正的国策。碰巧«天羽声明»的原稿本是发给日本驻外使节的训令，它的公开发表并没有经外相同意，这是事实，但这个细节无关宏旨。坚决反对«九国公约»的宗旨和意图，反对国际联盟给中国以国际(和西方的)援助，日本一向都是这样表示的，说得出口的话它都说了。……

对苏俄，在目前来说，日本正试图保持和睦。从东京观察形势，可以说双方现在都不想打仗，日本或满洲都没有作临战准备的迹象。至少在目前，我们只需担心发生非常严重的边境事件。广田已着手逐一处理中东铁路、日元和卢布兑换率、渔业纠纷、边界等各种问题，显然是真心希望了结这些悬案，但进展很慢，也不见得有加快的可能。

苏联正欲加入国联之说，在此未引起多大注意，虽然出现过一些把这一步骤解释为旨在保障国家的安全的评论。日本人无疑懂得，苏联人进入国联，将会加强国联在远东的影响，但这种可能性

极小，看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引起什么严重的忧惧。顺便提一下，苏联大使最近告诉我，他没有理由相信苏俄即将加入国联，但将来会怎么样他就不知道了。

至于苏日间订立互不侵犯条约的问题，广田说过，他的政策是 138 先消除两国间具体的争端，然后才考虑订立一般性条约的问题。据信，有个很强的少数派，显然是陆军，在反对订立此种条约；目前国民心理正趋于比较正常，无视这个少数派，这种趋向就有倒退的危险。消除这些具体争端以后才订条约，少数派便没有什么正当理由再反对了。

在结束这封信时，我要提到来函所述当前日本方面在日内瓦提出的意见，即希望仍能出席国联的一些机构，作为换取日本合作的条件，否则日本便废除与国联有关的一切条约。我是在东京写信，根据我在这里的观察，首先我倒怀疑日本所谓的合作到底有多大价值(麻醉剂控制之类的社会问题除外)，因为日本在远东的目标是具有独占性的；其次我怀疑，废除与国联有关的一切条约，是否就会造成一种为日本广大人民所深恶痛绝的局面。至于说接受日本的保留意见，在技术上和政治上都不免有困难，东京会认为这样一来就找到了似乎可信的理由而在明年不退出国联，我也不敢置信。关于国联的事，日本是早已下了破釜沉舟的决心的。日本政府已再三表示，日本之退出国联，是因双方意见有根本分歧，乃势所必行，仅在两周前，外相——他是现已明确表态了的调和派的先锋——还公开说：

> 我们是因为我们的主张被列强否决，才不得不宣布退出我们与之密切合作过这么多年的国际联盟。不过，为了能够完成我们在东亚的使命和任务，这一步骤也是日本必定要采取的。

日本“在东亚的使命和任务”，乃是表达日本自信负有“天命”

的词句之一，任何一届日本政府，倘欲保持日本的国联成员国身份，就要冒否定这种“天命”的危险。而日本退出国联及国联各种活动，如果是肯定无疑的，那又自必带来这样的结果：日本再也不能利用国联作为在列强间纵横捭阖的工具了。 139

上述各点也表明了当今“老人内阁”所面临的问题的性质。斋藤政府可以说是在试图继续刹车。此外，内阁虽已渡过了最近几次政治危机，但一次比一次吃力，所以它又是正在抢时间。是让国民的明智见识尽快重新表现出来呢，还是等不到温和势力占上风政府就给拖垮了？现在，不顾多方面的不满而在撑持政府的，只有天皇驾前那些开明的、超党派的谋臣。要是他们在最近的将来失败了，继任的政府几乎必然会更加反动。为国家的真正利益着想，他们必须尽量坚持下去。不管怎么说，当年掌握政权、使日本跻于世界强国之列的那一代人，是再也不会接管今日的政治事业了。我们早晚将会严重关切这样的问题：新的一代能否胜利完成国家似将承担的艰巨任务，因为，美国和日本在远东的政策将会发生直接冲突——除非有人竭力扭转航向。顺颂

时绥

格鲁谨上

7月3日，斋藤首相的内阁辞职，以冈田海军大将为首的新内阁接任。

评价冈田内阁

1934年7月6日

电告国务院，有个知名的日本自由派人物同我泛谈新内阁，他认为成立这个内阁是稳健派的巨大胜利，事实也确是如此，因为沙

文主义者曾大施压力，要求由极端的国家主义者来组阁。西园寺、牧野和他们那派人显然正在掌权。广田外相和林陆相将留任，高桥藏相亦将暂留，虽然以后大概要由大藏次官藤井来接替他。和我谈话的这个人说，这个决定的出现，犹如“晴天霹雳”，就是让美国按其自身利益来挑选内阁，也挑不出比这更好的了。他说，新内 140 阁将严格遵循斋藤内阁的政策，但将更有魄力和主动性，这是斋藤所欠缺的。我告诉国务院，我虽然还不能够全部同意上述评价，但我的确相信稳健派已占了上风。给我提供情报的人已经证明，此人的意见值得考虑，因为连冈田的名字都还没有被公开提到以前，他就已经预言冈田大将要受命组阁了。

和苏联大使一次有益的谈话

1934 年 9 月 7 日

访苏联大使，问他关于出售中东铁路的谈判，除已经见报的而外，还有没有其他特别的新情况或事实愿意见告的。尤勒涅夫先生答道，尽管日本宣称谈判只是休会，但事实上是停止了。他说，谈判停止，至少也就是把大桥先生赶下了舞台，此人无知而又碍事，纯粹是满洲的日军当局硬把他塞进来进行谈判的。他认为，摆脱此人，广田先生也同样高兴。

我问尤勒涅夫先生，出售铁路一事之所以达不成协议，是不是还由于怕失威信和想获得精神胜利，而不仅仅是价钱的问题，因为苏联的要价和满洲国的出价现在只差四千万日元了，这又何足道哉。大使答道，谈到钱，日本人是锱铢必较的，广田先生做驻苏大使时，为了五百块日元的事就曾和苏联政府磨了很久。我问大使，有无迹象表明哪一方将会提议重开谈判，他只答道，现在还看不出来。

在这一点上，尤勒涅夫先生对广田先生颇表赞许，他说他真是佩服他。他认为广田是个谈判能手，很机灵，但比之内田伯爵，和广田打交道要愉快得多，内田不过是日本军部的传声筒而已。

总的关系

141

大使说，他认为目前发生一场苏日之战的可能性极小。苏联人在西伯利亚和海参崴的力量很强，且早有准备，以防万一。即使发生什么令人动火的事件，他认为也可以局部化，特别是因为，满洲的日军现在还决未具备发动攻势的条件。他说他也认为日本军部的气焰比荒木将军当权时期收敛得多了，天皇及其近臣的势力大有起色，也比以前有大得多的能力来为该国推行稳健的政策。他认为，最近撤掉末次海军大将的舰队指挥权而代之以永野海军大将，乃是一个很重要的迹象，说明稳健派的力量确已增强，也是一个预兆，说明在即将举行的海军谈判中愿意实行和解政策。末次大将会不会另有任用，尤勒涅夫先生似乎还不知道。

大使虽避而不谈他对大局是悲观还是乐观，他的话仍给了我一种印象：展望前途，他现在并不特别担忧，而是认为情况正在好转。

中东铁路职员被捕事件

问他大批中东铁路苏方雇员被捕意味着什么时，他好象对这个事件并不十分重视。他当然说，他们完全无辜，加给他们的罪名都是莫须有的，相反，有确凿证据证明，所控破坏行为，倒是其他方面的人干的。他说，装载日本枪炮和其他军用品的铁路车辆却一点也没有遭到损坏，这就特别值得玩味了。

东欧“洛迦诺公约”①

大使继而转论欧洲局势，说东欧“洛迦诺公约”肯定是会订成的，但德国和波兰是否参加，就毫无把握了。

英日同盟

142 大使问我，有英日结盟之说，我是怎么看的。我把我所知道的有关这些谣言的情况告诉了他，并说，要言之成理以证实此说是容易的，但要拿出事实根据来，我却没有任何证据，相反，连曾否进行过重修旧好的具体谈判，我都怀疑。大使说，他同意我的看法，他也没有得到任何情报，但他认为，英国目前在远东的处境，确是值得它忧虑。他问我对英国派工业代表团到满洲国一事有无确切的了解，我答道，我没有理由相信此中含有任何政治意味。大使同意。

广田论 1934 年的海军会议

休假

将赴北平度假一月，行前往访外务大臣，向他告辞，并告诉他，在我离职期间，如有事要和大使馆商讨，内维尔先生可以负责，随时都乐于效劳。

海军会议

外相主动提出海军会议问题，说日本已明确决定，约在 1934

---

① 1925 年，英、法、比、意、德、捷、波七国在瑞士的洛迦诺签订一系列条约，总称《洛迦诺公约》。其中涉及德法、德比边界的条约规定：由德、法、比保证德法、德比边界不受侵犯，并由英、意两国负责监督实施。所谓东欧“洛迦诺公约”，就是准备在东欧也订立类似的条约，以保证东欧各国的安全，抵抗纳粹德国的侵略。后来这个条约没有订成。——译者

年年底废除《华盛顿条约》[①]。海军中有许多人希望立即废除，但广田先生坚持要等到10月伦敦会谈之后，因为一个缔约国一废约，对所有其他缔约国来说，《华盛顿条约》亦将归于无效，广田先生是想在废约前同有关各方讨论此事，以免得罪其他缔约国，也免得在海军会议前夕造成不良气氛，不经大家先有某种谅解就废约，是有可能造成这种气氛的。外相说，废约的事，将分别同各国商讨，由于斋藤大使不在华盛顿，此事将由松平大使在伦敦与美国出席预备会议的代表团讨论。

广田先生说，同外国解决海军问题，困难固然很大，但还不如国内问题那么难，在国内他还得对付那些沙文主义者。他说他希望海军问题能找到某种解决办法，这样就可以使各国今后得免于负担沉重的造舰计划，特别是因为日本海军的少壮军官坚决反对造大型舰只而赞成造小型的。 143

“一定要为帝国海军雪耻”

1934年11月2日

“青年及在乡军人协会”在神户开会，我们得到了有关此会的第一手报道。陆军第四师团司令官的参谋人员松本中佐在会上发表了煽动性的讲话，要点如下：

(1) 海军会议结果如何，无关紧要，因为在日本所企求的那一级军舰方面，它现在已占优势，并将继续保持这种优势。日本任何时候都能够打败美国，而且老实讲，也能打败其他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

① 《华盛顿条约》，即《限制海军军备条约》。美国为了限制英、日的海军实力，在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上提出要重新规定主要国家海军的实力对比。1922年2月，美、英、日、法、意五国签订了《限制海军军备条约》，规定五国的主力舰和航空母舰的吨位比例为5:5:3:1.75:1.75。日本对这个比率一直不满。——译者

(2) 前几次海军会议上，美国耍两面派手法，致使日本的地位低人一等，帝国海军蒙受的这种耻辱，必须洗雪。

(3) 说到底，公道之所以不得伸张，就是因为美国这个国家总是从中作梗，来自这个国家的一系列侮辱，必须涤除，要把日本确立为公正的世界统治者，就必须打垮美国。

(4) 以前曾是世界上最富裕最繁荣的美国，由于奢靡浪费，已变得虚弱不堪，现在是日本显示其大和魂所赋予的品质的时候了。

(5) 仗是一定要打的，一切都必须准备好，这样才能保证胜利。日本陆军现正待机而动，退役和预备役军人必须随时准备应召入伍，时间或许在今年年底以前，或许在明年年初。凡退役军人皆不得离开所在地区，有最要紧的事也只能离开很短时期。

(6) 日本从来没有打过败仗，将来也决不会打败。

144 想到惯常参加这类会议的年轻人的易受影响的年龄及相当有限的眼界，上述那一类讲话看来确是有点危险，而且容易导致政治性事件，特别是在因伦敦海军会谈而人心有点激动的这个时候。我将非正式地请广田注意这个问题。

接待“宝宝”鲁思

1934 年 11 月 6 日

驱车偕“宝宝”鲁思、勒弗蒂·奥杜尔和东京高尔夫球俱乐部冠军赤星四郎来到朝霞打高尔夫球，尽管整场都有摄影记者缠着“宝宝”，我们还是设法打完了大约十四穴。“宝宝”的球艺很高，和奥杜尔一样，两人都打得很稳，但因好些时候没有练了，这次不是每棍都准。“宝宝”说，我老是想猛打(我常有这个毛病)，和打棒球

的原理完全一样，打得太猛(你听，这位猛击大王居然这么说)，眼睛就一定不注意看球。听这个孩子这样评论，我觉得有趣。"宝宝"在棒球本垒上是否真是一眼也不放松，我没有留意过。

这天我真觉得有趣的还是在来回的车上听"宝宝"和勒弗蒂谈论棒球界的许多事情。当时要有个速记员在场就好了。因要拍新闻影片，打完高尔夫球后，还得坐在俱乐部的台阶上，还得谈话，球童站在后面。不料突然之间，又要我谈一点感想，我便说(现在记得是这样说的)："喂，'宝宝'，能在东京见到你，太好了。不知道你感觉到没有，你今天的游侣都与众不同：一个是赤星先生，东京高尔夫球俱乐部的冠军；一个是我，全世界高尔夫球最差选手。"

"宝宝"豪爽地答道，我给自己封的称号，他决不同意，因为在球场上他老是被诱入该死的圈套。这倒是实情。但是，头一棒他就猛然一击，结果每次他都逃脱了，而我却办不到。不用说，俱乐部的人员和球童都兴奋到了极点，我还给所有在球场上遇到的运动员介绍了"宝宝"；他总是说："很高兴见到你。"他这次来，当然全日本都轰动了，他才是个显赫有力的大使，我怎么也不能和他相比。

美国在远东何以必须立场坚定 145

1934年12月27日

在伦敦海军会谈中，不管日本的态度怎样顽固，我国政府和代表团都毫不动摇，坚决主张现行的海军比率保持不变，我国政府和代表团并决定，日本政府通告废除《华盛顿海军条约》这一行动，已自然地造成了一种会谈应当无限期中止的新局面，遂使日本人空手而归。对此，我们从此间观看伦敦会谈如何发展的人特别感到满意。

首先浮上我心头的想法是，美国现在和将来主要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准备退出远东，也许是体面地、逐步地退出，但终归是退出，听任我们的条约权利被取消，“门户开放”原则被废弃，既得的经济利益化为乌有，商业活动失却保障。有人主张走这条路，而且私下向我鼓吹过，理由是，任何别的政策，终竟都难免与日本一战。弗兰克·西蒙兹就曾强调说，这种危险几乎是必然存在的。在他们看来，冒这种危险，“得不偿失”，因为，美国放弃它在远东的各种利益因而消除未来战争危险之后，还是照样可以过得很舒服。

另一条路是始终坚持维护我们在世界这部分地区的合法权利和利益，意志坚决但不咄咄逼人，在切实可行的范围内，积极地、循序渐进地促进这些利益的正常发展。

已有许多迹象表明，华盛顿现任政府是想走第二条路。因此我想，我们可以抛开退出远东那个假设，在估计前景时可以相信，我国政府绝对无意放弃美国在远东的合法权利、既得利益、不受歧视而均享机会的特权和商业的健全发展。

就我们自己的态度而言，走这第二条合乎逻辑的道路，与睦邻政策不应有、也不必要有什么矛盾之处。既然决心支持和保护我们在远东的合法利益，就难免与日本不时发生摩擦，但这个决策是可以而且应当采取决不牺牲原则而又能争取将美日间摩擦缩至最小限度的办法来实现的。

146

日常执行这一政策，就是外交的事了，外交有时很难办，但始终是重要的，因为政策能否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用什么方式方法处理我们已经碰到的以及今后还要继续碰到的各种问题。日本人有显著的自卑感，在表现时又披着同样显著的优越感的外衣，因此极为敏感，伴之而来的便是咆哮恐吓、沙文主义、惧外仇外和有组织的全国性宣传：由于这一切，处理悬案的方式方法就很要紧，大有讲究的必要，尽管就争端的性质来说往往并不值得那么小

心。这个事实我国政府完全了解，从现政府就职以来发给大使馆的训令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得出来，而我们执行这些训令或相机行事时，也是经常考虑到上述情况的。

但在我们日常外交的背后，有一个头等重要的因素，即国家作后盾，并以国家的军备来显示和加强这种支持。我认为，我国军备的基本要素，应是在原则上维护现行的海军比率，最后在实际上、在与日本海军力量的对比上达到并保持现行比率。在这种背景下，也只有在这种背景下，我们的外交才能有把握做到说话有人听，出言能生效。最近报纸报道，美国陆军总参谋长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说："陆海军平素精强，就可以给政治家的和平言论加重分量；危机临头才急切如狂，加紧建军，那就只能招致敌人进攻。"我们需要作充分的准备，不是为了战争，而是为了和平。

不住在日本的人，是很难估量这个国家目前的情绪的。据说有个美国参议员最近曾建议，我们应当给日本同等的海军比率，以免将来发生战争。这位参议员对我国在远东应奉行的总政策的见解如何，这且不说；他公开讲那种话，已足以坚定日本的立场，助长扩张主义者的侵略野心，这种危险恐怕他还不知道。日本报刊当然就把美国要人诸如此类的言论挑出来广泛宣扬，以此证实日本的普遍的信念，即美国的和平主义分子正占压倒优势，终将支配美国政府的政策和行动。在这种情况下，遂有一种普遍倾向：把我国的外交声明说成是虚声恫吓，认为大可以置之不理，无须惧其实行。

日本人口不停讲，文不绝书，总是自称命中注定要征服和统治世界（原话如此）；陆海军中某些人、爱国团体、狂热的国家主义者，举国滔滔，其扩张野心，已相当昭著：这一切，那些赞同这位参议员意见的人若能听到和读到一点，若能有所认识，那就好了。日本人的目的，是要在中国、菲律宾、海峡殖民地、暹罗及荷属东印度群岛、苏联沿海各省和海参崴取得贸易控制权，最后取得政治上的压

倒优势，就象征服朝鲜和满洲那样，一个时期走一步，中间稍歇一下，以巩固成果，然后一見前面的障碍能用外交或武力来扫除，便又走下一步。眼看许多人在做这样的帝国梦，陆海军可以不顾东京政府稳健派首脑的羁束而恣意横行（这种危险确实存在，满洲事变已是明证），而我们还要指靠条约的约束力或国际间的礼让来保障我们自己的利益——实即我们自己的财产——那就是在自我催眠，这是不可饶恕的。

在与荷兰公使帕布斯特将军的一次密谈中，这位久居日本、精明练达的同行说，据他看，日本海军充满排外好战的狂热，且一心要与陆军争功，以免在公众面前失势，所以很可能会在危机时刻、或实际上在任何时刻攻占关岛，而不计后果。

我不认为现在就会有这么疯狂的一着，可是陆军在满洲的行动，若从条约权利和国际礼让的观点来评判，也可以说是没有理智的行动。重要的事实是，在目前情况下，在今后也依然如此的情况下（虽然在日本历史上沙文主义的钟摆总是往复于强烈和暂缓的周期之间），这个国家的军人，是完全可以冲破政府的约束，抱着错误的爱国观念而干出等于民族“切腹”的事来的。

当日本人说日本是东亚的“稳定因素”与“和平保卫者”时，他们的意思是要实现日本统治下的和平，最后在商业上完全控制着东亚，照某些人的想法，还要在政治上全面控制东亚。最近一期《费城公报》引斋藤大使的话说，日本准备用战斗来维护如此设想的和平，看来可能是误引，不过这话也恰好道出了今天许多日本人的心意。日本国内有一种虚浮狂暴的气质，主要是军部的宣传培养起来的，这种气质可以在今后几年或几代内把日本引到极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除非政府中头脑比较清醒的人确能力挽狂澜，能防止国家走上民族自杀之路。

这种防范能有多大功效，始终可疑。经常有人在密谋反对政

府。例如，听说11月22日发现，有几个第三步兵联队的少壮军官和东京士官学校的学生已策划好要暗杀包括牧野伯爵在内的各种政府要员，密谋被发现后，有几天不准士官生走出校园。还有一桩类似的密谋，据称要在国会临时会议开幕时袭击政界人士，再来一个“五·一五”事件，听说也被发现，及早处置了。这类密谋，目的是要建立军事独裁。诚然，要证实这些谣传是不可能的，但是谈论颇多，无风会起浪是不大可能的。

我希望有更多的美国人出国来这里住一住，慢慢就会觉察到局势真是有潜在的危险和祸害了，不要再在一个自己毫无所知的问题上发表学究式的议论、写学究式的文章，徒为日本军部和极端分子提供炮弹，这些分子得势已非一日，现在则是更有力量了。有 149 人以为，自1931年以来即暗中存在着一大批自由主义者，只要外国稍予鼓励，他们就会强大起来，崭露头角，取得控制权：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自由思想是有，但不能畅所欲言，而且大都软弱无能，短期内也很可能还会是这样。

这么说也许会造成一种印象，以为我们这些大使馆的人是在助长某种“反日”情绪。事实并非如此。不喜欢、不赞成某家的一些成员，不一定就是敌视其全家。依我看，日本的典范人物，可以说是举世无双。我倒想把广田摆在这一类；假如他能畅行其志而不为军部掣肘，我相信，他是可以把国家引上较安稳的航道的。

有位属于这一类型的朋友曾向我们哀叹说：“我们日本人做事总是慢手慢脚，又自高自大，错了连解释一下都不肯。”他们的外交一向是、现在也还是“拙劣的外交”。他们的手段素来不高明。不错，日本“拙劣的外交”是要由军部和极端分子负主要责任，但日本人作为一个民族往往缄口不言，敏于行动而拙于言词。军部和极端分子又一点也不了解、一点也不注意日本和别国的关系，政府官员如白鸟、天羽之流则一味巴结军部，一心只想借此提高他们自己

在国内的声望,保住他们的前程,许多麻烦，就是这样造成的。也许我们还得感谢他们，常常事先就在无意中泄露秘密的也正是这些人。

但是，这一切并没有减少我们对日本生活中那些优良部分的好感，也决不会使我们“反日”。日本是一个矛盾百出、各走极端、大智与大愚兼而有之的国家，这可以在有关海军会谈的言论中找到恰当的例证。海军当局和报刊一直都在坚持说，日本如果没有与美英同等的海军实力，就不能有效地防卫它的海岸；与此同时，报刊和公众又在文章、演说、交谈中大吹大擂，说日本海军今已强过美国海军,一旦打起来，轻易就能击败美国。在这种气氛下,一个外国人要保持超然冷静的观点就难乎其难了。我们使馆中人正150 力求冷静,但愿确能做到。在此期间,我只能做到不要惹起严重事端。建设性的工作目前是谈不上了。我们的精力正集中于反对破坏性的势力。

鉴于以上种种考虑,我要毫不迟疑地再次强调:局势有潜在的危险,作好应变的准备乃美国当务之急。在国际裁军运动中,作为一个国家,我们曾带头限制和裁减军备。我们抱过希望,以为这个运动会有进展，但是，华盛顿会议后十二年来的世局发展,并未给运动的进展提供有利条件。除非我们准备赞成在远东实现日本统治下的和平，赞成日本所设想和解释的这种和平运动必然会带来的一切后果，否则我们就应该迅速把我们的海军加强到条约所允许的限度,《华盛顿海军条约》满期后若不续订,我们也应该继续保持现订的美日之间的比率而不计代价，这是为了控制和减少战争危险而于平时缴纳的保险费。同时还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防止或抵消美国强硬派的好战言论，就象防止或抵消和平主义者的失败主义言论那样。这两种言论有许多都被日本报刊登出来了，因为前者可以用来煽起公众的反美情绪，后者则可以用来制造一种

印象，使人觉得美国软弱、踌躇，只会虚张声势。

我自己的看法——虽只是猜测——是，日本决不想挑起海军军备竞赛，它发现我们在比率问题上立场坚定，就会在《华盛顿条约》满期前的今后两年内，或在我们现在的造舰计划全部完成前提出另外的建议。据信，一旦美国的造舰计划确已完成而达到了条约允许的极限，那时候——大概不会在此时以前——日本就会认识到我们是认真的，就会谋求妥协。我们认为，日本的海军政策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制定的，即美国决不会把海军扩充到条约允许的极限；过去两届政府的海军政策、美国和平主义分子的表面得势，再加上最近经济萧条的结果，又更助长了这种想法。

不错，日本正在拚命制造和煽动舆论，要求即使不是在事实 151 上、也要在原则上拥有和美国同等的海军实力，大有破釜沉舟之概；但是日本领导人也是善于用宣传改变舆论以适应新情况的能手。一旦日本确实看到争取同等地位已不可能，那就很难相信它会听任事态发展到非搞海军军备竞赛不可的地步。1935—1936年的国家预算共达2,193,414,289日元，其中陆海军军费约占百分之四十七，到1936年，国债估计将为9,880,000,000日元，几等于内阁统计局所估计的1930年的国民收入——10,635,000,000日元；在满洲费用浩大，居民的税负已够沉重，很大一部分的人民急需拨款救济：在如此情况下，很难设想日本还能实行与美英并驾齐驱的海军计划。

只要我们的立场表现得坚定明确，就可以稳待日方走下一着。我相信这一着是指日可待的。

关于最近伦敦海军预备会谈的情况，就我们在此间所能估量到的而言，我认为最重要和最有价值的成果是出现了英美在远东加强合作的明显趋势。日本如此藐视条约权利，控制东亚的野心永无止境，假如我们能够指望日后美英能结成坚强的联合阵线而

与之抗衡——这是日本“拙劣外交”的又一直接后果——那么，对我们大家来说，都会有一个比较光明的前途。

西奥多·罗斯福宣布过一项政策，叫做“说话和气，身带大棒”。要使我们在远东的外交有成效，要想把终将与日本一战的危险性减少到最低限度，就只有采取这个办法。这样的战争也许是不可思议的，真是不可思议，但它的鬼影总是在那里徘徊，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也还会是这样。把这一点丢到计算之外，就是可耻的鼠目寸光，避之之道，莫善于充分准备，因为，战备乃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事实，日本的沙文主义者、军人、爱国者、极端国家主义者虽在叫骂美国的“挑衅性措施”，但是连这类人也能领会和懂得这个事实。苏联大使最近告诉我，有个日本要人曾对他说，苏联沿海各省之所以得免于日本的进攻，最重要的因素就是苏联在西伯利亚和海参 152 崴加强了战备。我相信这是真话。我要再三敦促，我国也要作充分准备，以防远东发生不测事件。

上述各项意见，我当然已向我国政府呈报。

日记和公文信件的说明

1935年1月22日

回头读一遍这本日记时，我真不禁感叹：我怎么能有勇气出以示人。它就是这么一个百衲本，一张用碎布缀成的褥子，其中有很多评论还是急就章，都需要进一步阐释或讨论。例如日美关系，这方面是很广泛的，决非此种流水账式的记录所能容纳得了，我那样逐日论述，仓促命笔，就很可能会给人以错误印象。我们的正式函电，就其整体来说，也许还能包罗这个方面，从历史观点来看，必须以这些函电为准。日记的作用，仅仅是给正文补充一点例证而已，历史地看问题，就决不能只考虑这些例证而撇开正文。

我们的函电，也必须作为一个整体和按一段时期来读，才能得到正确的概念。有些函电也许可以说是自相抵牾。例如有封论及海军会谈的、据说是寄给总统的呈文(1078 号)，原是根据这样的想法写的：日本人就全体而论，对海军比率均等问题决无妥协之意，在这个问题上是举国一致的。这在目前来看是实情，千真万确，但两周后我又写了一封信(1102 号)，上报这么一个意思(仅属揣测，也声明是揣测)：当日本人终于发现我们真是要保持现行比率，要把海军实力加强到条约允许的极限，并已照此办理，即使意味着海军军备竞赛也要继续实行此项政策时，他们就会谋求妥协而不敢硬搞军备竞赛，他们虽已布下背水之阵，但过一段时间以后，还是可以改变舆论和政策——甚至在条约满期前的两年内就会改变的。正如我说的，这只不过是猜测，但使馆中人 包括参事和海陆军武官在内，大家都认为这是合理的猜测。所以这两封信实际上并不矛盾：头一封是谈现在，第二封是预测在一定情况下将来会怎么样，即是说，假如我们用事实清楚地表明我们决心要把我国海军建立并保持在五比三的比率上，日本将会怎么样。如果两封信总统都看见了，但愿他能领会此意。 153

美国何以不应撤销移民法

1935 年 1 月 27 日

刚从美国回来的赖夫斯奈德主教夫妇和正在作环球旅行的沃尔特·埃奇夫妇前来茶叙。赖夫斯奈特把他和赫尔、卡斯尔等人的谈话内容告诉了我，主要是谈 1924 年《移民法》① 中有关差别对

① 1924 年 5 月，美国政府颁布新的《移民法》，严格限制日本人和其他东方人移入美国，几乎等于完全禁止。对欧洲人，则允许按每年规定的人数向美国移民。——译者

待的条文的废除问题。他在加州时曾想拜访赫斯特，征询其意见，但赫斯特病了，不能见他。我认为现在不是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这项法令固然一直使人怨恨，今后也一样，但是现在废除差别对待的条文，就会被许多人目为示弱，被解释为意在安抚日本的好战情绪，也许会出现几篇动人的社论，称赞此举，说我们有承认日本为同侪的雅量，但日本的政策决不会因此而有丝毫改变，军部的宣传也决不会因此降低调子。相反，可以预料，有些日本人一定会撰文论证说，美国既能在移民问题上承认日本的同等地位，那么，在海军问题上承认它的同等地位，现在就更是理所当然的了。何况，谁敢说某个法案定能得到参议院的通过？我国和土耳其订的《洛桑条约》，我们曾以为肯定会得到通过，《国际法庭议定书》，政府也以为定能通过，然而两者都没有通过。提出废除《移民法》的差别条文而又废不成，后果将不堪设想。还是暂时不动为妙。

我国海军在太平洋演习何以有助于和平

1935年4月1日

154 新当选为"美国基督教科学派联合理事会"理事长的伊凡·李·霍尔特博士从上海回国，顺道来看我。我已为他安排好与广田会晤，他只是想带个表示友好的信给广田。他说，国内各教会正在要求取消预定在太平洋举行的海军演习，理由是，对日本来说，这将构成一种挑衅和威胁。对这件事，他问我，他应该抱什么态度。

我竭力为演习辩护，并告诉他，我认为反对演习的运动是极其错误的，实际上还是危险的。演习纯系例行之事，约两年前已作了部署，不会进入距日本海岸一千五百英里之内；我们有两洋需要保护，假若取消演习，那不仅是荒谬绝伦，而且是示弱于人，自认害怕日本。倘若我们制定政策，采取行动，全是为讨日本人的欢心，那

就会使他们更加趾高气扬，只能招致日方采取进攻的策略，还会使他们觉得我国的所谓和平主义者正占优势，他们日本人尽可以为所欲为，可以任意侵犯我们的合法权利和正当利益，丝毫不必担心我方会采取防卫行动——造成这样的印象，显然是有害的。

我们要和平，不要战争，但若奉行某些教会所鼓吹的软弱和失败主义的政策，就肯定只会加速战争的到来；遵循我国政府的明智政策，备战而不犯人，保护我们的正当利益而不悖睦邻精神，这才是保证和平的上策。假如日本认为应当把我们例行的海军演习解释为武力威胁，那也只能怪它自己，因为首先炫耀武力的正是它，我们越显得没有骨气，它就越要拔刀相向。东方人欺软怕硬，最能助长其凶焰的，是软弱。

我说这些话时并没有全用这些字眼，但我的确说得极其坦率，因为国内有些教会的态度使我非常不安，霍尔特博士作为联合理事会的理事长也许可以施展巨大的影响。我的看法竟会是这样，他好象有点诧异，因为据他说我在人们心目中原是个教会利益的坚决支持者，不过我觉得他还是明白了我的意思，临走时他至少暗示了他将按我的话去做。假如我真是有侨居此间的教会工作者的 155 好朋友和支持者（我的确是）的名声，我在这个问题上所提出的忠告也许还会格外受到尊重。

德国重整军备，何以有利于日本？

1935 年 4 月 2 日

罗马尼亚代办斯托伊切斯科及帕布斯特相继前来漫谈政治。德国宣布重整军备，确已使世局陷入一片混乱，一切都有利于日本。欧洲的紧张局势加剧，除仍在关心远东的美国外，列强的绝大部分注意力都集中到那边去了。日本可以更加安心，不怕外来的

干预，象这样的时机，自英日同盟终止以来，还未曾有过。若与别国进行政治谈判，它也就居于特别有利的地位。昨天，天羽否认苏日将订立互不侵犯条约，声称并没有为此采取过任何步骤。的确，在目前形势下，日本实无此必要。事态发展正直接对日本有利。天羽说，日本除与波兰有过某种非正式的谅解外，同别国都没有联盟或协约的关系。我们还看到一些迹象：日本和德国正在密切交换意见和情报。但这一切都还不明朗，主要的事实是，日本现在可以"稳坐钓鱼台"，可以多少得逞其志，它估定欧洲列强自顾不暇，不可能多为远东操心。这种局面只会使我们的外交更加难办。

一位日本伟人论日本

1935 年 5 月 22 日

式部长官松平子爵和夫人在梅普尔俱乐部举行日本式盛大宴会，座中有牧野伯爵、林男爵、宫内省官员和全体外国使节（临时代办除外）及其夫人。有头衔的代办也在座。真是一次盛会。

宴后与牧野伯爵同坐，叙谈颇有情趣，其间他讲到他刚和巴黎 156 《时报》编辑杜博斯克的一次谈话，此人正在日本旅行。杜博斯克明白告诉牧野伯爵，他认为日本的政局"险恶"，因为各政党互相倾轧，腐化堕落，国政既有走向军事法西斯主义的危险，也有走向共产主义的危险。

牧野对杜博斯克说（据牧野对我所述），"你回到巴黎以后，无论作报告或写社论，讲到日本国内局势时，请把'危险'一词从你的语汇中删掉。在日本，我们有一种防卫设施，为他国所不及，那就是皇室。只因天皇至上，永能独断乾纲，所以决不会有来自军事法西斯主义、或共产主义、或别的什么'主义'的'危险'。"

这位老人说话如此刚劲，显出这么强烈的爱国心，我还是第一

次领教；他热泪盈眶，不得不揩拭眼镜。他今晚说话的神态——语重而激动——顷刻之间便流露出日本人强烈的忠君思想。我觉得，全国这种忠君思想的力量（不管有多少争吵、政治骚动，甚至暗杀——或许正因为有这些）是很强的，比外国人通常感觉到的要强得多。总之，今晚我窥见了这位平素温文尔雅的牧野伯爵的内心，这瞬间的一瞥，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将永远把他看作世界伟人之一。

美利坚先生和夫人访日

1935 年 6 月 20 日

美利坚先生和夫人到处拜客，今晨拜到大使馆来了。它们是两个和真人一样大的美国玩偶，是纽约市长送到日本来作“亲善使节”的。它们不仅身材如人，而且形容逼肖，栩栩如生。艾丽斯盯了一下这位年轻太太秀媚的眼睛，不禁说道，那双眼睛后面没有灵魂才怪呢。这次访问引起了很多争论，争论的形式是写公开信给《广告报》：一个记者认为，这全是无聊之举，有损尊严，总理大臣和美国大使——据说他还向玩偶敬过冰茶——都来接见玩偶，简直不象话，把日美两国的人都置于荒唐可笑的境地。另一些记者则不同意这种看法。

是这么回事：日本铁路旅业部向纽约市长提出，送两个美国玩 157 偶来作“友好访问”，将在日本受到热烈欢迎，拉瓜迪亚市长接受了这个建议，便把这两个玩偶派来了，临行前还在纽约举行了适当的仪式。据报道，在载它们来的日本邮船上，它们坐的是头等舱，现在则正在乘火车、公共汽车、飞机、渡轮及其他各种交通工具遍游日本。当然，此举不过是为日本旅行社做宣传——一种十足的广告噱头而已——但当得到通知说这对玩偶要来使馆拜访我们时，

我却无论如何也不能拒绝接待，否则就会徒然得罪人，造成不良印象。不过我还是很小心，特向美日协会的一个日方工作人员请教，他经过调查后，劝我放心接待。

其所以要接待，有几个理由：第一，首相、几个阁员和东京市长都要接见这对玩偶；第二，在日本，对玩偶的感情深厚而普遍，这无疑是起因于日本人热爱小孩；一年有好几次玩偶节日，还有各种玩偶会社；第三，我相信应该支持美日间的旅游业，来日本游历的美国人越多，对日美关系越有好处，可以防止某些意外事件和变故。因此艾丽斯和我便在后阳台接见这对玩偶，大部分使馆人员也在这里看热闹。美利坚夫人进来时掉了一只手，但很快就修好了，把它们放在两张椅子上坐着，我们则在一群摄影记者面前和它们握手。对陪同玩偶前来的日本人，按惯例用冰茶款待。不到十分钟就完事了。

后来又在日比谷会堂开群众大会，参加的多是小孩，东京市长亲临致欢迎词，我至少得派个代表，于是便派三等秘书安德鲁斯去代我读演说词，说我很乐意赞助这次访问。为了添上一点轻松味，我的演说词有这一么一句："美利坚先生和夫人有一点比其他来日本观光的人强：它们说日语懂日语的情况，就和它们说英语懂英语的情况完全一样。"不幸日本报刊未能领会这样故作雅谑的真意，竟把我的话引成：这对玩偶精通日语。

158

每天仍有人写信给《广告报》，有的很友善，有的很可恶。这事其实值不得这么重视。不过我确信，我也来凑热闹，尊重这个国家对玩偶的感情，日本人是高兴的。

苏联大使认为美日关系前景不妙

1935年7月17日

今天往访苏联大使尤勒涅夫，他要去休假，即将起程。话从苏日关系谈起。大使说，两国对某些困难问题虽有争执，但结果如何，他毫不忧虑，因为日本人不想打仗，也没有准备好。他认为我要对付的日美间的问题比他的问题棘手得多，日美关系的前景比日苏关系的前景尤为暗淡。他的意思是，未来的日美关系颇不吉祥。在这一点上我和大使有所争论。我逐一列举了日美间的重要问题，略加论述，然后对他说，我确信这些问题是可以和平解决的，即使得不到解决，至少也可以暂时搁置起来。

尤勒涅夫先生说，关于苏满边界纠纷，自我们上次谈话后，情况已稍有改变。现在是想成立一个委员会，其任务不是定界，而只是处理由边界问题引起的具体争端。正如他上次告诉我的，起初他主张，委员会可以由日本人参加，也可以由满洲国人参加，但不能两者都有，苏联人不愿意同两者一起打交道。可是现在他的政府已同意在对等的基础上和日满两方的代表会商。换言之，即苏方代表的人数须与日满两方代表的总数相等。广田先生还没有接受这个建议。他预料谈判将会拖得很长，特别是因为在此种问题上日本军部是很难满足的。他认为在成立委员会之前，议事日程、159 开会地点等等都需要多次商讨，而这些谈判又得由他本人主持，所以他觉得今夏出游轻井泽的希望不大。

话别广田

1935年7月18日

今晨往访外务大臣，告以驻日已三年多，我国政府准我休假一次，明日即启航赴美。并说，但愿能在秋末返回东京。外相情意殷殷，说希望我一定能回来，因为换大使总不免要引起一些紊乱，在新大使和所驻国政府彼此熟惯以前，又总会有一段不方便的时期。他认为在现在这个时候尤其不宜更换，这是最要紧的。我答道，据我所知，目下并无换人之意，我想定能重返东京。

我说，一到华盛顿，我自然就要向总统和国务卿当面汇报，告以我对日本局势和两国关系的观感。外相若想表示什么意见，我非常乐意向总统和赫尔先生转达。广田便提醒我他刚就职时和我讲的那番话，大意是他认为美日亲善至关紧要，他愿以改善两国关系为其政策的基石。他说，虽然两年前关系不佳，但他觉得现在已有显著的好转，他看不出有任何理由不能继续好下去。竭尽全力以获得最理想的成果，是他的心愿。他还说，据他看，日本和某些别的国家的关系，比之现在的日美关系，麻烦还要多，还更不能令人满意。

于此他谈到海军的情势，并说，除非有一线希望，能在今年达160成协议，订成条约，否则，他认为最好还是把问题暂时搁置起来，维持目前的“和平”局面。他说，一国对另一国施加压力，只能激怒对方，千万要避免，他认为这是最要紧的。日本海军目前还没有什么计划，很愿意暂时维持现状。他估计年底以前恐怕得开一次海军会议，但会议可能只是在形式上开一下，也可能休会一两年再开，不一定会引起争吵。广田先生给我的印象是，日本海军当局的苛求之心已经不象原先那样强烈了，但他在这方面没有多说。观其

大意是，假以时日，许多困难问题都可以顺利解决。

驻日三年后休假五个月，使这本日记在这里中断了，但下面一条似乎还是值得收入记录：

向白宫汇报

1935年8月4至5日。华盛顿

远东司大部分同僚俱来迎接我们。我三次去华盛顿，他们大家，特别是他们的首脑霍恩贝克，都异常热诚，大力相助。在卡尔顿大厦见到比利·菲利普斯。与赫尔国务卿长谈，在此以前，我还没有和他见过面。谒见总统，相待十分亲切。他给人的印象是，极度乐观，兴致勃勃，精力旺盛。和他谈话三次，使我非常惊讶：他虽日理万机，注意力却能高度集中，对我职务上的问题，亦了如指掌。他说，他之不常写信给我，也就是一种表扬，因为这就意味着我没有什么差错。国务院的人差不多都见到了，还办了很多事。去了两次波托马克河畔的露天音乐会。

回到东京

1935年12月17日

第二节课于此开始——第一节课始于1932年6月6日，至1935年7月19日止。

我无暇亦无意一开头就叙述或议论五个月假期回来后所面临 161
的各种新老问题，只想说，问题很多，以后自然会时时论到。

往访比利时大使巴索皮埃尔男爵，他透露了一个讨厌的消息：因为他此刻正逢新故王后的国丧，1月起又要去度长假，所以从

现在直到明年9月将由我代理外交使团团长。这就是说，我得一年四次按时在天皇驾前致词，还得参加这个仪节繁复的宫廷的许多典礼。事实上，准备在1月5日宣读的献词稿已经在同僚中传阅了，已注明要由我这个副团长来读，这实在是一个相当可怕的差事。

下午赴外务省访广田，其意只在告知他我已返任。略谈中没有提到什么重要事情，只是广田曾眨一眨眼说，日本报刊骂人时惯用的连珠炮，最近已将目标从美国转到了英国。他没有用那些字眼，但意思的确是这样。对英国访华财政代表团团长弗雷德里克·李兹·罗斯爵士，此间普遍认为，此人非常可疑，在中国搞的财政和政治阴谋应由他负责，最近华北的动乱就是这些阴谋引起的——也就是说，英国损害了日本在中国的“安定势力”，而中国则是一个所谓已被引入歧途的国家。

怒气冲天的一年开始了

1936年元旦

生活给了我很多教训，最肯定的一个教训莫过于制订新年计划的错误。你若明知你会违反协定，那最好就不要签订那个协定；我凭长期的经验，知道我一定会违反我在1月1日所作的一切美好的决定，现在，从哲理来看，在1月1日作决定就是不明智。因此我便不再备办那些老表格(原想模仿本杰明·富兰克林)，填上花多少时间看书学习、练钢琴、运动以及有节制地喝酒抽烟等等，而是满不在乎地跨入新的一年，蔑视我那新英格兰的良心，这种良心我花了整整半个世纪才把它压下去。162 我在1936年很可能仍将浪费许多宝贵时间，甚至比1935年浪费的还多——那又愁什么呢？生活是美好的，但要不太认真才行，我们新英格兰的那些好祖

先(愿他们流芳百世)的确是拼命要把生活变成地狱。不过话又说回来,在我这一行,除了一本正经的生活而外,又能有什么别的呢?

天皇举行觐见礼,这是1933年以来的第一次,皇后因刚生第二子,没有出席。但并没有因此不让女眷参加,她们按班鱼贯走过御前,行三屈膝礼如仪,非常得意。我作为外交使团的代理团长,得率领一长队人,老实说,我们自己使馆的队伍就已经长得相当惊人了。我馆奉命参加的人员及其夫人共达三十五名,而大部分都来了。

行经宝座大厅的时间实在太短,不可能品评那个场面,但仍然可以说颇为壮观——天皇站在宝座前,亲王、公主排成一大片,分列天皇右边和左边,宫廷高级官员又排在这两列之后,服饰灿然,金光闪闪。同行中有抱怨者,因为他们和夫人按规矩穿戴整齐,也只是在天皇前一掠而过,前后都无缘周旋于廷臣之中,这种做法,他们说在世界宫廷中真是绝无仅有。我依旧认为,论雍容华贵,哪里也赶不上日本宫廷,但是我觉得,上次1933年的觐见礼完毕后,至少还款待了一点香槟冷餐,今年却连这样的款待也没有了。我本人还得去见皇后的式部长官,请他代外交使团向皇后恭贺新喜,但也就是这么多了,我们出宫的时间比以往都早。

罗斯福新年提出的警告如何刺中日本

1936年1月5日

总统在国会的致词此间摘要发表了,摘录的范围很广,有大段引文,但日文报纸均未作任何评论;我想一定是外务省传话阻止,目的是免得出现抗辩谩骂之词,否则有些报纸是会这样做的。天羽等官员则托词说没有读过这篇演讲词,借此支吾过去。总统说, 163
任何国家愿意这样做,也许是那双鞋子合自己的脚,那就让它穿

吧；这话真是巧妙无比。

有些话说得很直率，显然是针对意大利、德国和日本的，例如："现在已经到了这样的时刻，美国各族人民必须认识到敌意在增长，侵略倾向日益明显，军备在增加，火气越来越大——这种局面，其中就包含着许多导致战争悲剧的因素。""如欲通过和平谈判和诉诸主持世界正义的天良本性来达到合理合法的目的，就必须有耐心，而那些谋求扩张领土、企图纠正以往战争造成的不公平待遇、想为贸易和人口找出路，甚至也想找机会为增进文明作出自己的和平贡献的国家，却没有表现出这种耐心。它们一向总是急不可耐，或回复到武力统治的旧信念上，或回复到那种荒诞的想法，以为惟有它们是天之骄子，是注定要来完成天命的，所有其他国家都必须和应该求教于它们，受制于它们。我说这些话是经过再三斟酌的，我承认，在那种愿意挑这双鞋来穿到自己脚上的国家，我这些话是不会受到欢迎的。……我要向你们指出全世界人民面临的局势的严重性。危害和平的是少数人，不是多数人，威胁和平的是那些正在为私利而追求权力的人。"

说这番话，我认为是有胆量的政治家表现，这番话，无论其实效如何，必然会深深影响他所指的那些人的意识和良心。此外还有助于通过总统要求的《中立法》和军备预算。他的话制止不住日本向中国步步进逼——因为除了日本战败以外没有别的办法能够制止它——但是要在日本人的行为手段和策略上起一点缓和作用，相信还是可以的，说不定还会暂时延缓他们的行动。以前日本人不喜欢史汀生，现在，罗斯福这个大海军主义者偏爱什么，他们知道了，除此而外，还听到他公开发出警告说："现在已到美国各族人民必须有所认识的时候了"。我想，在美国下次大选时，日本人将为共和党祈祷了。

广田回答罗斯福

1936年1月21日

将广田在国会的演说电告国务院。他的话也可以说是对罗斯福在国会致词的一种回答。他也不点名，只是批评“外国政治家们”不了解别国的实情而又要在那里发号施令。日本人当然要给广田很高的评价，因为据说他同美国人斗智已经斗赢了。下面是他讲话中的有关部分： 164

> 真遗憾，国外有些名牌政治家，似乎硬是要把他们关于天下大事应如何安排的个人信念强加于人，动不动就把不听命的人斥为捣乱者。谁也没有资格谈世界和平，除非他不仅知道他本国的民族愿望和职责，而且也了解和重视别国的立场。要做到了解和重视别国的立场，又往往要从了解和重视那个国家的文化和文明入手。我们已经成功地增强了我们的国力，树立了我们的国威，这是由于，在过去的岁月里，我们曾引进西方的技术和科学，使之增益和适应我们的文明。我认为，现在已经到了努力把我们的技艺和文化转到别国去、从而对国际谅解、对丰富世界文明、增进人类和平与幸福作出贡献的时候了。

皮特曼参议员谴责日本

1936年2月11日

收到国务院来电，电中引有国务卿对皮特曼参议员的演说的评语；皮特曼曾在参议院发表激烈的演说，谓日本的侵略行为对美国有危险。赫尔先生说，此事没有人和他商量过，他也从未插手草

拟这篇演说——当然是这样。国务院的这类电报，对我们核实新闻报道颇有帮助。皮特曼的演说，诚然是十足的好战论，美国报纸社论似乎已在严厉批评它，这也是很对的。然而，对这篇演说的发表，我个人私下并不觉得遗憾，相信其实际效果倒是有益无害的——确切些说，利多于害。

从美国这方面来看，大量增加陆海军军费预算，必将遭到和平主义者的反对，这篇演说却可以减弱这些人的喧嚣。在日本，它可165以向其政府和公众表明，我国并不是象此间许多人所想象的那样是个由和平组织和妇女和平主义者统治的国家，设若被人屡次重掴耳光，我们也有不肯把另一边脸转过来让人再掴的时候。我觉得日本人总爱忘记历史——历史证明，美国人是世界上最易激动的民族之一。他们忘记了1898年的怒潮，那时怒潮一来，即如森林大火，几乎一夜之间就燎遍全国，尽管政府、国会和绝大多数国民本来并没有打仗的意愿，结果引起了美国和西班牙的战争；第一次大战以来，关于和平的言论及活动太多了，以至在日本人的心目中，我国在1917年的行动仿佛已是远古时代的事情。因此我确信，偶有皮特曼式的演说，还是有用的，至少可以促使日本人好好想一想；甚至还能打动他们，使他们认识到，他们损害我们在远东、特别是在中国的权益，应有一个限度，过此限度，就会有受到报复的危险。

应让我国政府的行政部门继续贯彻近年来所奉行的非常明智的政策，即一面步步坚持立场，一面又要避免不必要的摩擦和刺激，但其间无论在国会或报刊上，都要让舆论表达出这样的意向：我们决无退出远东的打算，却有保护我们商业、工业和其他利益的决心，不惜对抗所谓日本在东亚的“绥靖势力”，这种“绥靖”，实即日本统治下的和平，亦即由日本人独霸东亚。在满洲吃闭门羹，我们容忍了；也许这是不可避免的，除非打一仗；日本再侵略中国其

他部分，我们无疑也会容忍，但是很可能会有那么一天，美国人民开始有点不耐烦了，那时如果发生什么事故(随时都可能发生)，甚至还不要象“缅因号”巡洋舰爆炸事件那样惊人，也满可以一夜之间就引起弥天大祸。

我不得不这样想，间或让日本人知道一下，他们以为是死火山的地方仍然还有火，是有好处的。这倒可以延缓他们的侵略日程，多少有助于执行我们的外交政策。因此我反而一点也不生皮特曼的气。



三、从未遂政变到公开战争

(1936年2月26日—1937年7月13日)

推动日本追求世界霸权的动力来自国内。世界经济萧条降临以来，在日本也有与德国希特勒追随者相类似的青年一代，而日本历届政府都未能给他们以施展能力的机会。只有陆军能给这些年轻人提供机会——但文职当局总是力图约束陆军。1932年，反叛的少壮军官刺杀了几个政界领袖，但还是远远谈不上因此就夺得了政权。1936年，他们再度发难。这次可以说是想搞政变。夺权的企图失败了，有些头目被判死刑并被处决，但是，失败适足以把他们引入对外征服的迷梦，对外征服比在国内造反更加令人心荡神驰。

169

闪击：值得载入史册的两封电报

电呈国务卿，华盛顿

第36号，1936年2月26日上午10时

今日拂晓，军人占据了一些政府机关和东京的部分市区，据说还刺杀了几个要人。一切情况目前都还无法证实。新闻记者皆不许打电报或电话到国外。

此电原属试发性质，是想探明我们的密码电报能否发送。收到后，请密码室立即电复。

格鲁

电呈国务卿，华盛顿

加急电，第37号，1936年2月26日正午

大使馆的第36号，2月26日上午10时

第一部分

1．现在似可肯定，前首相斋藤海军大将、前内大臣牧野伯爵、侍从长铃木海军大将、教育总监渡边将军均已遇刺。据说大藏大臣高桥和警视总监亦受伤。

2．军人已在政府官署和皇宫周围的街区设下警戒线，无军部通行证者不得擅入。与各官署的电话联系亦已截断。证券交易所已关闭。

第二部分

3．现在据说首相冈田、内务相后藤、前陆相林亦被刺，藏相高桥已伤重毙命。这些谣传大使馆都还不能证实。

170

4．据大使馆所知，到目前为止，尚无骚乱和巷战。参加叛乱的部队似仍严守纪律，对百姓日常生活未加干扰。不过，在未把叛

乱性质及其可能产生的后果弄得比较清楚以前，大使馆有请求外出者，馆方还是劝他们留在家里。事变中未见有丝毫排外情绪。

第三部分

5．今晨一群群士兵分头向各大报馆散发油印的声明。声明宣称，现政府愈来愈背离真正的日本精神，早已篡夺了天皇的大权。关于此点，声明举签订伦敦《海军条约》①和罢免真崎将军②作为例证。下文有句话意思相当模糊，据合众社译文，大意如下："假如容许这种状况继续下去，日本同中、俄、英、美的关系就会带有'爆炸性'。"声明是由野中大尉和安藤大尉签署的，两人都属于驻东京的步兵第三联队。据投递这份声明的士兵说，今晚5时还要再发一篇通告，那时就将颁布"新的国法"。来使馆报信的那个人认为，有些宪法上规定的权利恐将暂停行使。他把当前的情势比作古巴的巴蒂斯塔政变③。

第四部分〔述其大意〕

6．据大使馆尽可能查明的情况，暴动属于政变性质，乃陆军中少壮法西斯分子所发动，旨在将素任天皇顾问的元老重臣一网打尽，从而实现所谓"昭和维新"。天皇本人显然正被软禁在宫中，不得与外界接触，这定是要使任何人都不能接近天皇，不能取得诏书，以免打乱军人的计划。以前审判刺死永田将军④的相泽三郎，已激起陆军中法西斯分子的反感；最近大选，不料又有更多的自由

① 伦敦《海军条约》：1930年4月，华盛顿海军条约缔约国在伦敦签订另一海军条约，作为华盛顿条约的补充。伦敦条约规定，美英日巡洋舰和驱逐舰的比率为10:10:7，潜水艇比率为10:10:10。条约只在1936年12月31日以前有效。——译者

② 日本当时陆军内部有统制派与皇道派之争。统制派盘据军部内，有林铣十郎、宇垣一成等人；皇道派主张武装政变，有真崎甚三郎、荒木贞夫等人。1935年7月，两派对立尖锐化，陆相林铣十郎迫令真崎辞去陆军教育总监之职。——译者

③ 1934年1月，美国在古巴的代理人巴蒂斯塔发动政变，推翻了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临时总统格劳·圣马丁。——译者

④ 1935年8月，皇道派军官相泽三郎刺杀了统制派的核心人物军务局长永田铁山。——译者

主义候选人被选入国会：看来这些都是叛乱的近因。最新的传闻是，海相大角大将已任代理首相之职，事变的领导人物是真崎将军。这次行动，看来每个细节都是事前周密布置好的。〔叙述大意完〕

171

7．大使馆刚从相当可靠方面获悉，牧野伯爵无恙。

格鲁

斋藤子爵之死

1936年2月27日

这是个可怕的时刻，我刚见到一个悲惨的场面——从斋藤家回来，昨天他就是在家里遇害的。我去时被引到停尸的那间小屋里，尸体是放在地席上，盖着被单，他也许就是在这间屋里被杀的。我先跪下烧香，转看丧者家属，不觉正与敬爱的斋藤子爵夫人相对。昨天她也受了伤，进了医院，后来想必是手放在吊带上、步履蹒跚随着她亲爱的丈夫的遗体出院的。

她问我要不要看看他的遗容，随即把被单揭开；露出一处弹痕（这只是三十六个伤口之一），面容却很安详。我们是多么爱他、敬佩他。他总是笑眯眯的，且不说历居高位和一生行事所赢得的荣誉，单是那头白发，就已经很出名了。遇刺前几小时，他还在我家饮宴，坐在艾丽斯身旁，谈笑风生，他的夫人挨着我，我对面是铃木海军大将——铃木现在也躺下了，伤很重，命在旦夕。

今天，我行吊唁礼后，还没有站起来，在遗体旁跪在我对面的斋藤子爵夫人便对我说，她丈夫以前从来没有看过真正好的影片，他很喜欢在我们使馆看到的片子，她知道，他昨晚过得那么快活，是一定希望她感谢我们的。我真是太感动了，除转致艾丽斯的慰问外，什么话也答不出来。谁料得到，他，或许还有铃木将军，那晚

一离开我们使馆，就径直走向死亡，在自己宁静的日本式小屋里成了刀下之鬼？

这场暗杀，真是惊心动魄——斋藤、高桥、渡边皆丧命，铃木受重伤，恐亦难保。谢天谢地，牧野伯爵幸免于难；因有人及时报信，他便赶紧离开他所住的温泉旅馆，躲到别的地方，他刚走，一伙蓄意要残杀他的叛军就破门而入。这是后来梓山从宫之下用电话告诉我的，牧野和他谈过此事。西园寺公爵在兴津乡下，也及时逃脱了，但那些在东京的重臣，好象没有得到过什么预报。

有件事值得一提：昨晚宴会时，有人打电话给我们的仆人，说斋藤一离我们使馆，就请通知他们，后来我们查电话号码，查出那是本区的警察分局；该局或已得到什么特别警告，也可能仅仅是例行的防备，多半是后者。不管是什么，那晚斋藤在我们家作客，有警察保护与否，都无紧要；他早在午夜前就回去了，是到翌晨5、6点钟才被杀的。要是凶手冲进我们使馆，就在席前把他刺杀掉，那才倍加可怕哩，就他们的力量而论，这也不难办到；至于在国际上会引起什么后果，在这些少不更事的冒失鬼看来，只要这样干更易于达到目的，那是无须考虑的。他们分成几组、甚或每一组都配有机关枪；首相被刺时，几个警察在门外就被扫倒了，在渡边家，他全家人和仆役都被收拾得一个不剩。

串述悲剧的经过

1936年3月1日

现在看来，叛乱前发生的一切，与这四天的事变比起来，是太微不足道了，以致我也无心去摘早先的日记。我得设法把2月26日至29日所发生的一切一点一点地拼凑拢来。此事的结局，是冈田首相突然再度出场，我们和其他几乎所有的人都以为他已经被

杀死了，殊知他却安然无恙，这就带有极强烈的闹剧味。这些叛乱者干的事纵使不是在全世界、也在日本成了笑柄，这是大好事。不过，悲愤的一面还是盖过了谐趣的一面。

这故事得从2月25日晚我们宴请斋藤夫妇说起。客人共三十六位，围坐两桌，为要使这位老先生和其他客人得享一点不同寻常的款待，在前几天我还去米高梅制片公司看了几部影片。最后那个下午，沙森给我放了珍妮·麦唐纳和纳尔逊·埃迪主演的《淘气的玛丽埃塔》，我立刻判定，理想的片子已经找到了，因为片中富有老维克托·赫伯特的优美的音乐、漂亮的场景、美妙的浪漫故事，毫无俗气，几堪与《一夜风流》媲美。

173

几乎一吃完饭就放电影。我们让斋藤子爵坐在舒适的扶手椅上，以便他看厌了可以安睡一会，因为他告诉过内维尔，他在海军里学会了随时随地都可以打盹。但我觉得他却看得乐不思睡。电影放了将近两小时，中间停过一下，吃了一点东西。贝特西·内维尔说，终场时日本女士们的眼圈都红了，因此我认为，她们都已被漫浪故事感动了。后来还有夜宵，但斋藤两老口约在11点半钟就走了，在他们来说，已经算很晚了，因为他们平常总是到10点就要离席。我送老先生出门，自1932年6月我首次拜会他（当时是首相兼任外相）以来结下的友谊也就到此为止了。

想起来真有意思，他一生的大事业竟是以和美国人结识开始——与施莱海军上将结识，在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深造——而以至美国大使馆赴宴告终。他是个可爱的人，温厚可亲，彬彬有礼，处在沙文主义纷扰的时代，却能以伟大智慧和宽广胸怀待人处事。我曾抱过希望，以为可以借助他的威望解决朝鲜学校的危机——地方当局要求信奉基督教的师生均须在神道教的神社做礼拜，这种要求如果坚持下去，就可能弄到我们办的教会学校全部关门。他一向总是支持我们的传教士。如今他那开明的影响力消逝

了，将来会弄成什么样子，谁知道？

26日早上电话铃响——好象是内维尔打来的——他传来凌晨发生暗杀事件的消息——谣言四起，说叛乱者已接管政府和部分市区——谁已被杀，谁还活着，暴乱有多大规模，谁也闹不清。我们头一封电报是早晨发出的，国务院复电答称收到，传送经六小时。这四天事变期间，我们经常有侦察员在市内走动，特别是我们的陆军武官凯里·克兰上校及其译员，他们尽最大努力去观测事态发展。第一天早晨，内维尔就走过叛军的警戒线，镇静自若，很 174 客气地用日语说他要去外务省，他们也以同样的礼貌允许他通过；我想他恐怕是那第一天得去外务省的唯一的外国人——而且去了两次。

那天夜里，艾丽斯很紧张，生怕叛军还要执行某种增补的暗杀计划，而美国大使亦可能名列其中，她坚决主张我们在另外的房间里睡，靠近小孩；我担心她根本没有睡多少觉，又笑她过虑，因为我心中有数，叛军决不会在这个时刻找美国的麻烦。第二天我们使馆外就来了部队，布下岗哨，办公处下面堆起沙袋，警卫森严，还有三个密探（包括来自警察分局的我们的朋友饭田）和两个卫兵驻守在住宅内，我每次下办公处去，他们都一定要跟着。

第一天，墨西哥公使由乡返城，连公使馆也回不了，打电话求助于我；我尽力请堀内帮助解决，但外务省完全无能为力，公使见我尽了力也没有用，好象也就算了。叛军扎在首相官邸和山王饭店，在这两幢大楼上升起他们的旗子，距我们很近；我们在屋顶上用望远镜注视着事态发展。

日本政府暗作擒杀叛军的各种军事准备，同时严格维持城内的纪律和秩序，又向叛军广播，用飞机向首相官邸和山王饭店场地上撒传单，用轻气球悬起一条长幡，内容都是说天皇号召士兵返回营房，回去即可得到宽赦，因为他们是受骗，他们的父母兄弟姊妹

因想到他们不服从天皇而正在流泪，再不解散，即格杀勿论：这样等了两天，他们便一小批一小批地投降了。效果恰如所期，事件全部解决，除行刺时以外，即使放了枪也是极少的。对于这种情况，我决不应称之为野蛮行径。

现在我们知道，当最后一批士兵离开首相官邸和山王饭店时，发动叛乱的军官经过四天抵抗也终于投降了，政府给他们两小时，要他们切腹自尽。他们却不肯切腹，因为他们以为可以援以往暗杀者的例，能受到非军事法庭的审判，他们一心只想利用法庭作讲坛，煽动人民反对政府。但他们还是受到了军法审判，这一定使他们大为震惊，有几个被判死刑，枪决了。

有件事的情节感人甚深，那就是谋杀牧野伯爵的故事。当一个军官和几个士兵半夜来杀他时，他正住在乡间的温泉旅馆里。据我所闻，情况（我相信是真的）是这样的：牧野伯爵的卫士枪杀了那个军官，士兵又杀了那个卫士，随即放火烧旅馆，意在迫使牧野伯爵跑出来。旅馆后面是一片峭壁，这位老先生由他的受过护士训练的孙女和子引着爬到岩面的突出处，至此再也不能往上爬了。不久火光照出了他们，就象探照灯照着他们那样，士兵便端起枪来。可是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那个小孙女——她是个可爱的姑娘，我女儿埃尔西的好朋友——展开她自己的和服，挡在她祖父的前面，士兵看到这种英勇姿态，深受感动，便把枪放下不打了。我始终觉得，小和子真算得是“二·二六”事件中的一位女英雄，她果然救了她祖父的命。

日本开始了新时期

1936年3月1日

叛乱为时只有四天，但我们使馆中人却觉得，自上星期二晚以

后，即斋藤夫妇和铃木夫妇来作客的那个欢乐之夜以后，恍如过了一个时代。如果时间是用事件来划分的话，自那时以后，一个时代确是过去了。世界上许多地方时有此类事情发生，天灾人祸，层出不穷，我们这些局外人则冷眼旁观。我们清早看报，感叹一声“多么惨的灾祸啊”，回头还是去做日常的事，想日常的问题，内心触动不大。只有身临其境，听到惨遭杀害和表现英勇行为的是自己的朋友，而这一切几乎就发生在自己的门口时，才真会感触至深，并 176 且历久不忘。

把朋友们的传述慢慢凑集拢来，现在可以描出这次暗杀事件的梗概了。这些故事不仅适足以提高被刺者的声誉，而且显示出日本妇女的优良品质。例如斋藤子爵夫人，她就曾挺身向前，遮住她的丈夫，对凶手说：“杀我吧，我替他；国家不能没有我丈夫”，并且真把手放在机枪口上，直到受伤后才倒在旁边。又如渡边夫人，她把丈夫抱着，躺在地下，凶手开枪，若不穿过她的身子，就打不着她的丈夫。

铃木将军的故事应垂诸青史；安藤大尉拿手枪对着他，和他论时局，谈了十分钟，谈不下去了，铃木便问：“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安藤答道：“没有了，长官。”铃木说：“那就打吧”，安藤便打了三枪。一弹擦破头盖，没有钻进脑髓，一弹穿过胸部打到肺里，第三弹打人腿中。胸伤最重，失血过多，只有输血才能救他的命。现在看来，他也许可以脱险。杀高桥才杀得真是残忍：枪打不够，外加刀劈——回头还向他的家属道歉，说“打扰了”。

我们还得说下去，看看这究将意味着什么。有一点是一定不移的：日本必须实行某种“新政”，要不然，正如相泽案中被告的律师所预言的，同样的事件仍将一再重演。我对广田有信心，但他所负任务之艰巨，实为前人所未遇。他有极好的机会，与富兰克林·罗斯福上台时所碰到的机会有相同之处，如能有效地、圆满地解决

问题，何尝不可以成为大政治家而载入史册。

“二·二六”事件之类的事何以会发生在日本，翻翻教育日本青年的那些历史书，慢慢想一想，就不难理解了。书中载满的，自上古之时起，即正是这类事迹——不是暗杀，就是自杀，或出于报复，或因忠于主子，或表示对某一情势负责。真是怪诞（日本本来就是一个矛盾百出的国家），少壮军官自以为，他们那样做，是在为 177 天皇效力，是要清除天皇左右的所谓恶势力，可是，这些人却正是天皇自己选拔出来的。军官和这些人之间亦并无私人恩怨。他们杀了斋藤、渡边、松尾（首相的妹夫，被误认作首相）之后，仍给死者烧香；在高桥家，因找不到香，还一定要在这个被杀的政治家面前点上蜡烛。要防止今后再发生此类事件，不仅国内社会和经济方面须实施新政，日本式的学校教育和军事教育亦应来一番根本改造。

事变中也出现过一些可喜的事，其中之一是大使馆人员在行动上和精神上都同心同德，团结一致。内有海陆军武官、商务参赞及其助手，他们和我们大家一起工作，夜以继日，密切合作，各献其所见所闻，只求有裨于全体，毫无本位思想。累了四天，虽然都已精疲力竭，但谁也没有表现烦躁，或发生龃龉。当然，东京和伦敦、巴黎不同，在这个地方，把这伙人融为一体，比较容易，而我们在这里也确是团结的。我们的班子是由各种类型各种性格的人组成的，但却意气相投，融洽无比。我想，此中奥秘之一就在于，一群人凡能常在一起玩的，也就几乎一定能在一起好好工作。

冈田首相是怎样幸免于难的

1936 年 3 月 2 日

首相是怎样逃脱的，实情现在似已完全弄清楚了。2 月 26 日

清晨，官邸警钟齐鸣(约四年前艾丽斯和我赴当时首相斋藤子爵之宴时，亦曾误发警报，且有我们正遭暗算的传说)。冈田将军看表，对睡在同屋里的妹夫松尾说：“喔，我的最后时刻到了，但我不想穿着睡衣死。”松尾答道：“你的生命太宝贵了，你不能死。”冈田换衣服时，松尾便跑到楼下花园里去，高呼“万岁”，在晨光熹微中，被错认作首相，因而被追击，当场毙命。

门口守卫的警察，五个遭枪杀，一个受伤。冈田被人推入侍役宿舍，关在厕所里。他在那里躲到第二天晚上，当松尾的遗体被抬走时，他便化装混进送丧的人群里，径直走了出来。松尾可以说是整个叛乱事件中真正的英雄，因为，虽有许多忠勇的警察不惜牺牲以救其所护之人，那不过是以身殉职，松尾的行为却是自愿舍己救人的义举。 178

广田改组内阁

1936 年 3 月 5 日

电告国务院，广田已奉天皇之命组阁。我很高兴，因为我相信广田是个坚强而又稳健的人，他虽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与陆军合作，但我认为，若能赢得国内各派力量的支持，他还是会尽量明智地处理外交事务。我还觉得，他是想和美国搞好关系的，并将朝这个方向尽力而为，也就是说，他不会比其他任何日本首相做得差。假如由我来选择首相，为美国利益计，我也会挑上广田，此外我就不知道谁更合我的意了。挑一个十足的自由主义者来干，反而会更糟，因为在这个时候，任何人来当首相，都必须取得陆军和海军的绝对信任，否则他的内阁就会从一开始即一筹莫展。

令人惊讶的是，广田立刻就宣布新阁组成，以吉田为外相，报上说，吉田还是他的组阁参谋。在我们看来，这简直是在向军部挑

战，因为吉田不仅是彰明较著的自由主义者，而且是牧野伯爵的女婿。陆军当然决不会赞成他，不久便传说广田已陷入困境，组阁难成，他选定作陆相的寺内将军不肯就职，除非广田彻底更改他的阁员名单。

广田为什么要宣布新阁名单，我想不通，因为他明知道吉田通179 不过，也知道按陆军之命再来抛弃吉田、修补内阁，会削弱他的地位。这样做其中必有深意，可能是想把干扰广田外交政策的责任径直放在军部身上。为了先占一点地步，广田又花了四天工夫来消除他和陆军的意见分歧，然后才向天皇上奏最后的名单，由他自己暂兼外相。在这整个期间，几乎没有听到海军有什么动静——当然是说公开的言行。据说海陆两军之间并无好感，叛乱期间，海军方面曾调了几艘军舰直薄东京，然后对陆军当局说："赶快解决这个事件，否则，要么由我们替你们解决，要么我们就不再过问，概不负责。"果然他们几乎立刻就把军舰撤走了。其实，我听说，他们因陆军应对整个事情负责，亦深感惭愧。据说叛乱的头一天，大角海军大将就曾去过皇宫，有大批水兵扈随，还带了两挺机枪：这故事恐怕也值得深思。

广田阐释其"积极外交"

1936年3月13日

3时，广田先生在首相官邸接见我，等候会见时，现已被任命为首相私人秘书的岸给我看了冈田睡过的房间，松尾就是从那里跑到花园去替死的。广田单独见我，不带译员。他开头就说，他做外务大臣时奉行的政策将持续不变，如今他既当了政府首脑，这种政策更将贯彻始终。他说，他已得到全体阁员的支持，他终将遴选一个肯定也会支持他的政策的人做外相。

我问他，可否给报上现正盛传的作为新政府纲领的“积极外交”一词下个定义。广田说，此语只适用于中国和苏俄，意思不过是全面加速推行既定的政策。就苏俄而论，因苏联在西伯利亚的军力和日本在满洲的军力之间存在很大差距，陆军颇为不满，他们希望把后者——称为“防军”——加强到和边境那面的苏军力量较为接近的水平。不过，他又说，打一场苏日战争是愚蠢的，因为双方都没有取得实际战果的希望，他向我保证，只要他在职，就不会有战争。 180

至于中国，广田说，业已宣布的三原则将成为今后中日谈判的基础，这三点已大体上为中国政府所接受。经我请求，他将这三点说明如下：

1．中国的抗日活动和宣传必须停止。

2．不用说，要中国现在就在法律上承认满洲国，是有困难的，也没有这样要求它，而是要它承认满洲国的实际存在，并使关税、交通、运输等等已有的关系合法化。

3．要求中日合作，以防止共产主义蔓延。

我对广田说，他若允许我叫我国政府放心，日本在中国推行其政策时不会损害包括“门户开放”原则在内的外国权益，这种表示将是有益的。首相说，日本决不至于损害“门户开放”原则，据他看，将来某个时候，日本也许会放弃其治外法权，惟有在那种情况下，日本政策才可能会间接影响外国的权益。

告辞前，我借此机会对首相说——是我自己的意思，不是奉命——由于廉价的日本货越来越多地涌入美国，华盛顿政府颇感为难；我又说，国务院和日本驻美大使馆正在共同努力，希望能在公平切实的基础上解决这些难题，但是，不管怎样朝这方面努力，我国工业界还是在对政府施加愈来愈大的压力，恐怕最后还得请日本政府采取更有限制性的措施才行。

附带提一下，广田在这次谈话中还说，正如他在我们初次会面

181 时说的，促进日美亲善，乃是他的政策的基石，今后仍旧一样。

按神道教仪式举行的皇家丧礼

1936年3月26日

偕艾丽斯参加北白川宫太妃的神道教仪式的丧礼，和1933年我们参加过的朝香宫妃的丧礼一模一样。得穿大礼服去，寒风天气站立户外，却不许穿大衣，为小心起见，我穿了两层内衣，鞋里加衬垫，硬胸衬衫里加毛衣；活象一条塞胀了的蟒蛇，但确能保暖。

神道教丧仪分三部分：先在灵前献供，有米饼、一条大鱼、蔬菜、水果、茶等食品；次献衣箱，内藏供亡人穿的衣裳，献食献衣皆由五六个神官恭行其事；然后主神官向死者之灵读祭文，最后天皇、皇后、太后的代表们挨次献榊枝，亲王、王妃、外交使节、首相和其余政府官员亦相继各献榊枝。诸般仪节，俱十分动人，行事从容庄敬，尤其令人感佩。日本宫廷中，从无匆促急迫之状；一切总不会错乱，因为每个步骤事先俱已布置妥贴，所司何事，何时执行，各人都心中有数。

荷兰公使预见到日本要南进

1936年4月25日

荷兰公使来访，他最近听到一些谈论，谓日本海军的活动范围

184 和场所将扩大到南洋群岛一带，问我关于这方面是否再有所闻。此事狄考福最近曾问过海军省次官长谷川将军，长谷川坦率地答道：那只不过是说，要尽力向南方扩展日本的贸易，海军则自然要保护这些新的商船航线。

我对帕布斯特将军引了一个日本高级人士在1921至1922年华盛顿会议期间讲的一段话，不提当时在场人的姓名，也不提在哪个国家："日本有一个举国一致的主张，即我们一定要扩张；但向何处扩张，则有两派意见：一是大陆派，一是海洋派。目前是大陆派占上风，恐怕今后几年也还会是这样，但是一旦在这方面受到阻碍或挫折，那么——"

前一派意见显然是陆军的想法，后者则是海军的打算。这种情形帕布斯特将军是深知的，但他却说，鉴于最近日本海军人士大谈其向南扩张，他认为，假如欧洲老是处在目前这种形势，以至英国舰队不得不留在本土或附近海域，那么日本海军就也许会在六个月内突然出击，以占领新几内亚或婆罗洲或一些盛产石油的荷属东印度岛屿为目标——会不会发生这种事情，可能性各占一半。

正如我常说的，帕布斯特将军根本就是个悲观主义者，作为一个关心荷属东印度群岛安全的荷兰人，他也几乎不可能有别的想法。就是他，早在两年前就告诉过我，他觉得，日本海军袭击关岛，决非毫无可能。他好象很爱用"可能性各占一半"这个成语，最近谈到日苏今夏会不会打起来，亦曾用过。就我所知道的日本国内对"二·二六"事件的普遍反应和许多方面显示出来的对暴动分子的盛怒来看，在最近的将来，无论日本海军或陆军，我想都不会突然袭击南洋或世界其他任何地区，不过，在发表这类意见时，我总是有一点保留，那就是，在此间作任何预言，假如说得太死，都是危险的。

意大利大使庆祝新的罗马帝国 185

1936年5月9日

赴意大利大使奥里蒂在东京会馆举行的宴会；他邀请了美国

和德国大使馆的大部分人员，据他说，这是因为，他的正式宴会是要先请那些没有对意大利宣布制裁[①]的国家的使节；附带说说，这天晚上偏不那么美妙：食物不易消化，意大利酒都很差劲，房间丑陋，还加灯光刺眼，不过，在现在这个时候，意大利也显然不能把钱花在修理破旧使馆这类琐事上。宴后奥里蒂向我滔滔不绝地谈起国际联盟的罪行及其最后结果，说这些罪行已驱使日本宣告满洲国独立，又驱使意大利变阿比西尼亚为其殖民地，反之，假如国联不来干预，意大利很可能只要取得阿比西尼亚作为委任统治地也就行了。此外，国联还使英意、法意关系恶化，把欧洲推向战争，实际上也毁了它自己的威信。

自意大利在阿比西尼亚得胜后，奥里蒂便面目大变，这种人我还很少见过。几个月前，他似乎还在垂头丧气，现在却得意洋洋，谈笑风生，几几乎要在我们面前飘起意大利的国旗。在我们使馆的一次宴会上，我发现他饭后竟嬉皮笑脸地去拥抱史托依策斯科夫人，我自然就对正在旁观的史托依策斯科先生说到意大利的暴行——它征服了阿比西尼亚还不够，现刻又在打罗马尼亚的主意了。这个评语，史托依策斯科颇为赞赏。我的双关语虽不高明，但未必真是牵强附会，墨索里尼的政治自大狂的意识深处未必没有潜藏着恢复神圣罗马帝国的迷梦。谁敢说意大利与南斯拉夫的摩擦最后不会酿成战争，而南斯拉夫被征服后，罗马的战车又将在哪里歇脚呢？

---

① 1935年10月，意大利发动了并吞埃塞俄比亚（阿比西尼亚）的侵略战争。埃塞俄比亚向国际联盟申诉，在世界人民的压力下，国联不得不承认意大利为侵略国，对它实行经济制裁。美国和德国没有参加制裁。——德国已在1933年退出国联，美国自1935年8月起实施"中立法"，对被侵略的埃塞俄比亚亦不输出武器和军事物资。——译者

日本不许我国海军访问其委任统治岛屿

国务卿致驻日大使电(述其大意)

华盛顿，1936年6月13日

几年来，日本政府每年都请求美国政府在阿拉斯加沿岸领海 186
内给两艘日本政府船只提供方便，允许它们驶入阿拉斯加和阿留申群岛的港口，这些港口通常是不对外国商业开放的。这两艘船，一艘之所以要来这些水域和港口，据称目的是在于研究有关保护提供毛皮的海豹的问题；另一艘的来访，却没有提出要以美国政府和日本政府间的哪个条约或正式协议为依据。尽管如此，美国政府还是答应了日本政府的上述要求。

前些时候就已存在着一种强烈的暗流，猜疑美日两方各在其太平洋领地上扩建港口和加强防御工事。我国政府不反对日本政府船只常来阿拉斯加领海和不开放的港口，就是因为相信这样可以给日本船只提供观察的机会，从而有助于消除日本政府可能产生的疑虑，使它不致怀疑我们在改进什么设施而有违反1922年2月6日签订的海军条约的条文或精神的性质。

我们认为，不幸的是，尽管盛传日本正在其太平洋委任统治岛屿上改进设施，违反不在这些岛屿上设防的条约义务，日本政府迄今却未采取象我们那样的光明磊落的态度。对那些不负责任的传说，日本政府当不至给予赞助，这点我们能够理解，不过，日本政府亦必定与美国政府抱有同感，即，让这方面的猜疑继续下去，就会引起互不信任，因此应当消除这种疑团。

按海军部的计划，不久将派"奥尔登号"驱逐舰赴亚洲防地。这样日本政府就将有一个送上门来的机会，使它也能在太平洋委任统治岛屿较大的不开放港口款待一下我国政府的一只船，和在

187 开放港口一样。我们认为，日本政府若能邀请“奥尔登号”访问这些海港，从两国关系着眼，将有很大裨益。

上述意见，请细加周密考虑。若估计不致碰壁，就请向外务大臣非正式地口述这些意见，即作为你自己的意思而提出上述建议。

望及时电复国务院。

赫尔

驻日大使呈国务卿电（述其大意）

东京，1936年7月8日

今天，作为出自我自己的主动，我向外务大臣提出建议，邀请“奥尔登号”访问太平洋日本委任统治岛屿开放的和不开放的港口。

外相对我所述情况显然十分关注，但他声称，关于这个问题，他一无所知。他说他要查一下，看有什么办法没有，尽量在7月20日以前把查询的结果告诉我。

格鲁

驻日大使呈国务卿电（述其大意）

东京，1936年7月28日

大使馆参事应外务次官之约，前往讨论大使曾向外务大臣提出过的一些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奥尔登号”可否访问日本委任统治岛屿的港口。参事此去，是7月8日大使拜访外相以来得以讨论此事的唯一机会。

次官说，大使的建议已提交拓务省，迄无回音。他又说，大概拓务省还要同政府其他部门商量。在参事追问下，他表示，恐怕外务省无法催促迅速答复。

188 次官的态度是友好的，但这也表明，外务省是再也没有办

法了。

格鲁

代理国务卿致驻日大使电(述其大意)

华盛顿，1936年8月7日

复7月28日下午1时大使馆第163号电。有关“奥尔登号”的建议，国务院断定，要日本当局采取友好行动，已属无望。此间日本大使馆曾要求允许日本政府的训练船“进德丸”进入夏威夷的一个不在开放之列的港口，今天国务院正给该使馆回信，对此项要求表示拒绝。

菲利普斯

德国在俄日之间制造摩擦

1936年6月18日

某某在今天的谈话中秘密地告诉我，他晓得，所有在日本的德国新闻记者都奉有柏林的训令，要他们不仅在新闻电讯中，而且还要通过直接间接的阴谋，竭力挑拨日苏关系，因为，苏俄若忙于远东事务，就无暇在欧洲找德国的麻烦，这才符合德国的利益。某某说，他还知道，法国驻苏大使则正在采取恰恰相反的行动，力求缓和苏日关系，以便苏俄在德国打法国时能够大力援救法国。

二月叛乱者被判死刑

1936年7月6日

电告国务院，陆军省今晨2时宣布，因共犯“二·二六”事件案被起诉和审讯的十九名军官、七十五名军士、十九名列兵和十名文 189

职人员已作出如下判决：

十三名军官和四名文职人员处以死刑；

五名军官处以无期徒刑；

一名军官、十七名军士、六名文职人员处以两年至十五年徒刑；

二十七名军士和三名列兵处以十八个月至两年徒刑，延期三年执行（意即缓刑）。

宣判中一点也没有提到暗杀罪；判刑的惟一根据是，这些军官犯了未经天皇批准而擅自动用皇军之罪。有些军士和列兵被断定为有意识地参加这一事件，其余的则免予处分，因为他们只不过是遵从上级军官的命令。被判者皆不许上诉，死刑用枪决执行。

与此同时，因禁令已解除，报刊遂登出事件的全部情节，读起来有趣极了。就我们所知，处死陆军军官，在日本还是前所未有的。这样严厉，究竟会产生什么后果，尚无法预断；报刊当然是看政府的脸色行事，对这些判决几乎一致赞同；但是，这些犯罪军官一死，在他们的许多朋侪看来，就将成为烈士，而按日本的传统，复仇却是一种美德。我看，更多的"事件"还在后头哩。

回美国参加哈佛大学三百周年庆典，日记和通信在此中断。

回到东京

1936年11月27日。东京

又回到这里来了，重理旧业，诸务猬集，但经过那样一次休假以后，又有干劲了。其实，回到日常工作上来，我倒十二分高兴，狄考福说，卸下重任，他也非常高兴，这种感觉，我们已经多次有过。就这样又干起来了——顺带又继续写日记了。

向广田报到

1936年11月30日

今天拜访首相，度假归来，特往致候。话题首先是美国最近的大选，并谈到可以放心，现政府的总的外交政策，包括睦邻政策在内，将再持续四年。我还说到哈佛大学的三百周年庆典，以及在波士顿举行的日本美术展览会。

当我问到日本近况如何时，广田先生答道，目前他最难办的事是处理征税问题。他说，苏俄的扩军，其规模之大，甚至超过了沙俄时代的军事体制，日本陆海军对此深感不安，陆海军都正在要求进一步扩充日本的军备，主要就是由于苏俄的军备在日益增强，而扩充军备，又必然要增加赋税。

广田先生既然主动提到外交事务，我便问他报上所传日本和意大利订了一项协定是怎么回事。他答道，没有什么协定。事实不过是意大利将在满洲国开设一个领事馆，日本亦终将在阿比西尼亚这样做，只此而已。

首相又说，至于中国，谈判进展得很慢，所谈仍旧是以他从前宣布过的三原则为基础，特别是要中国停止排日活动，要采取反共措施。我问他，听说日本的要求包有关税问题，还要派日本顾问，真相如何。广田先生说，这几点也提出过；关税问题业已解决，至于派日本顾问，其实也没有什么，别国都有许多顾问在中国，日本却一个也没有，在中国的日本商人正逼着要照样派顾问。广田先生明确地说，要派也全是经济顾问，不会是政治或军事性的。他说，布尔什维克的威胁，中国政府显然难以应付，因为中国本身就有那么多的共产党人。

有个大使察觉到德日结盟

1936 年 12 月 3 日

今天有位大使同僚告诉我，他心中毫不怀疑，德日条约[①]一定附有秘密军事协定。他对此事的估计是，谈判一直是由日本驻德陆军武官大岛少将进行的，此间外务省并不知情，大概德国外交部也不知情。换言之，谈判完全是通过军事渠道进行的。

他说，有个事实更加重了他的这种看法的分量，那就是，秋天德国驻日大使尚在柏林时，德国驻日陆军武官奥特上校突然被叫回去，后来又恰在协定签字前重返东京。他认为，与军部非常接近的日本驻瑞典公使白鸟也可能插手过这件事。这位大使说，他觉得，由于去年商订的德满贸易协定试行效果不大，这次的德日秘密协定很可能还设想到由德国运武器给满洲，以偿付由满洲运去的大豆和其他商品。

苏联大使论德日协定

1936 年 12 月 3 日

在今天和苏联大使的谈话中，他谈到日德协定时，颇为忿慨，说其中必有秘密军事协定，他的政府握有确凿证据。他说，军事协定的矛头无疑是指向英国的，我问究竟是怎样指向英国，他说，其中必有这样的设想：打起仗来，便由日德两国瓜分英国的海外属地和荷属东印度群岛。他说，这既切合于日本的南进计划，又切合于

① 德日条约：1936 年 11 月 25 日，日本和德国在柏林签订了一个所谓“反共产国际协定”。这个协定是直接针对苏联的，同时又是用反共的幌子来麻痹西方，做好对西方作战的准备工作。一年后，即 1937 年 11 月 6 日，意大利也加入这个协定。至此，准备发动新的世界战争的德、日、意三国“轴心”正式形成。——译者

德国对殖民地的要求。谈到反共产国际的协定时，他语带讥讽。大使也强调这样一个事实：由于德日协定，苏日关系大受挫折。

日本准备与全世界为敌

192

1937年1月1日

对日本，就其国际关系来说，新的一年是在不祥的气氛中开始的。上一年，它既在世界上名誉扫地，又与英、苏、中不睦，最近和这些国家的关系且更趋恶化。与荷属东印度群岛，关系有所改善。在其近邻中，只有同美国算是尚能维持现状，但由于日本寸步不让，以致《华盛顿海军条约》期满未能续订，由于存在着两国防务和海军军备竞赛的危险，展望未来，对比眼下，实无多大理由可以乐观。

出现此种不幸局面，首先要怪日本自己，因为它手段拙劣，现在自食其果。毛病就出在外交政策受双重控制，这是老问题了。在这方面，政府中的文官，连首相和外相在内，俱受制于军人，听命于陆海军，陆海军是不懂也不关心同外国发展友好关系的，但没有他们的支持，内阁的寿命又长不了。德国就有过同样的情况，在一九一四年闹出多大的事来，我们已经见过了。

美　　国

一两年前，荒木将军曾对英国大使说，要是没有1924年《移民法》的排日条款，日美之间的关系就可以说是完全令人满意的。不错，目前是没有什么重大争端足以严重妨碍日美关系，可是，我们不应闭眼不看事实，目前的一些争执，到一定时候是会尖锐起来的，其中且蕴藏着危险。

首先是海军问题，随着《华盛顿海军条约》满期，这个问题已经

自然而然地出现了。这方面今后会闹成什么样子，尚难预料，但可以有把握地说，假如演成造舰和防务竞赛，由此而产生的猜疑和不193 安，就必然会使两国关系紧张起来。另外还有一些似将为害两国关系的问题，那就是，日本在中国的侵略政策，这种政策终有损害美国利益的可能，再就是，日本廉价商品在美国市场泛滥，长此以往，我们将不得不出于自卫而予以抵制，这就必定会引起国际间的忿恨和倾轧。

菲律宾群岛，对日美关系也始终是一个潜在危险的根源，虽然危险还不会即时出现。

中　国

纵论或细述过去一年中日本在中国的外交活动及其他种种活动，看来都没有必要。只消这么说就够了：日本军部公开谋使华北五省脱离南京的管辖，所费心机，大部分俱告失败；日本军部支持的大规模走私行为，不仅成了国际丑闻，而且致使美英等外国都纷纷谴责日本；中国的抗日情绪，迅猛高涨，遍及全国，日本人非但未能与南京合作，尽力抑制此种情绪，反而凶相毕露，手段蛮横，致使反日情绪不断加剧。

现在，新年伊始，由于少帅张学良扣留蒋介石随后又释放这一事件造成的新形势，日本在中国的计划——不论其为何种计划——似已暂时停止执行。日本人显然是在停步观望。新形势会不会导致中国抗日运动加剧，会不会使南京未来的政策转为强硬，强硬到什么程度，仍有待观察。

中国人表示决心，不再屈服于日本的压力，突如其来，出人意料，以致日本全国似皆有晴天霹雳之感。它就象一个惶惑不安的人那样，正在搔首踟蹰，不知今后如何是好。报上已有一些议论，提到要改变对华政策，但是朝哪个方向改，目前还看不到什么形

迹。对中国已经变化了的情况，一向最不能正确认识的，看来倒是日本：这很奇怪，却是实情。现在日本既已明白，用军事压力讹诈 194 是不灵了，那也许就会试用某种别的侵略方法以控制华北。经济合作，强调其目的是要“改善人民生活状况”，乃是军部的一个老计划，其代言人正在加劲鼓吹，此法或许可以给日本扩张主义活动提供一条出路，而南京政府也不会太反对。看来日本暂时还不热衷于对南京主动发起正面进攻。从周围渗透，并在华北和蒙古边境固守已得的地位，这样做的可能性比较大。

去年初我对日本面临的大势所作的评述，其正确性已无可置疑，关于日本的对华政策，里面是这样讲的：

> 按什么程序，用什么方法，将受许多因素的影响，但扩张主义的贪欲是根本的。人们将会看到，从今以后，不露声色的逐步推进也好，明目张胆的侵略也好，不论用哪种方法，日本都将坚决致力于巩固它对华北和蒙古的控制：我认为这是毫无疑义的。

苏　俄

在政局发展的现阶段，日苏亲善是一个时代错误。事情是明摆着的：一方面，俄国有充分理由担心，日本终将扩张到蒙古和西伯利亚，另方面，日本也害怕共产主义在邻国蔓延，这两点凑在一起，即足以阻碍任何互相信任的基础的建立，边境事件和其他枝节的纠纷，就不用说了。不过，到去年 11 月，外交上努力的结果，已达成一项公平的临时协议，在此情况下，苏日关系，或可暂安，一时当不致酿成太大的危机。组织一个混合委员会来考虑边界问题，此议已原则上被接受，显然对日本有利的渔业条约，亦已草签，并准备在 11 月 20 日正式签字。苏联在西伯利亚和海参崴的防务，加上西伯利亚铁路铺成双轨，其效率已足以使莫斯科对于关东军

195 的咆哮和威吓几乎可以一笑置之的程度；而日本人则尚在忙于使其军队现代化，忙于加强其满洲驻军，争取和北面的苏军达到适当的平衡，谈不上继续寻衅以求早日开战。

可是，苏日关系的这种暂时改善又被日德防共协定的缔结粗暴地破坏了。协定表面上虽说目的只在于共同对付共产国际的活动，反对它在各地散播共产主义的宣传和行动，因此并不是公开针对苏联政府的，但是，两国参谋本部间存在着秘密谅解或协议，乃是公认的事实，苏联驻日大使且坚称，莫斯科握有这方面的确凿证据。日本内阁的政敌认为，假如关于协定的消息不在 11 月 20 日以前给泄漏出去，苏日渔业条约就可以签字了，一切也都会好起来，因此，他们责备外相，说他让消息泄漏，是犯了严重错误。但是，若谓莫斯科不会早在那个日期以前即深知在柏林进行的事，那是难以相信的，假如有什么错误的话，恐怕不是错在某个日期以前走漏了消息，而是根本错在缔结这样一个协定。

道理很简单。这个协定，及其可能附有的一切秘密协议，都是日本军部订的，与德国的谈判主要是由日本驻德陆军武官大岛少将进行的。进行这次谈判，曾否得到日本外务省的同意，我们不得而知。但是，鉴于外务省对改善和稳定日苏关系久已孜孜不倦地在做工作，视之为事关大政方针，我们有理由这样问：日德协定对日苏关系的破坏作用，事前是否十分明显，与日本外交的政治方向如此背道而驰的事，东京的文职政府是否会表示赞同。协定确已招致全国各方的非难。

这也可以说是日本政策受双重控制的又一次表现。不管怎样，如今是木已成舟了，日苏关系显已大受挫伤，在最近的将来，亦196 难以挽回。而且可以肯定，苏联政府必将依旧按这样的原则行事：只有叫武力说话，日本人才听得懂，至上之策是，一旦来犯，不论是边境袭扰，还是较大规模的侵略，均立即以加倍的力量回击。

德　国

若谓日德协定含有某种设想，一到战时，就会使协定具有军事互助条约的性质，那也不见得。据说，日本曾竭力拉波兰参加日德协定，但未成功。波兰既置身事外，法国又使德国有后顾之忧，要德国承诺在苏日作战时进攻俄国，那是不大可能的。不过，谓有某种协议，如交换军事情报、向日本提供武器弹药和技术援助以换取满洲商品等，则仍是合理的假设。不管所缔协定究属何种性质，明显的是，日本政策已有新的方向，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和德国的关系势必加强，不论有意无意，这种新的倾向，不仅对改善日苏关系，就是对改善同英国等民主国家的关系，也必定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意大利

认为日本正蓄意与一个法西斯集团结盟，本无充分理由，但它最近几乎同时与德、意订立协定，这就自然会引起此种看法。其实，日本将撤走驻亚的斯亚贝巴的公使馆，代以领事馆，意大利则在沈阳设总领事馆，从而表示在事实上日本承认意大利据有埃塞俄比亚，意大利亦承认满洲国"独立"这样一些协议，看来都不过是着眼于建立互惠的贸易关系，并没有什么重大的政治意义。

英　国

日本倒想同英国亲善，但正如英国大使最近对我说的，它希望的亲善，是要建立在"只取不与"的基础上。日本人的热忱，不过是 197 表面的，只是出于一种顾虑：日本陆军已终于醒悟到，万一日苏开战，英国也许连善意的中立也不肯保持。在这种现实面前，日本人不能不有所顾忌。由于满洲事件、日本对中国肆虐、贸易问题及其他种种争执，今天的英国人民，很多都有反日情绪。

另一方面，英国同苏俄的关系在这三年中却没有发生过什么严重的逆转。英苏关系不算亲热，但至少也还差强人意。苏联人知道，在英国搞共产主义宣传，不会得到宽容。有关海军和贸易的协定，亦已订立。这样，两国以往的敌意，大部分在消散中，而英日关系，却一直在恶化，日本陆军已终于认识到这样发展下去将意味着什么，因而正开始感到不安。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有日本陆军军官特意来和他们的英国同行表示好感，亦不足为奇。

潜在的危险还在于，日本有控制中国各地的打算，这将是严重的，因为这种控制迟早一定会损害英国在中国的利益。臭名昭著的《天羽声明》和其他日本对华政策声明，俱未能减弱英国支撑和发展其在华利益的决心，可以推想，如果英日各自的对华政策都贯彻到底，二者就定会发生冲突。

同时，在印度、澳大利亚等地，还有贸易之争，又有石油问题，这些一向都是麻烦问题；在基隆事件中，据说英国水兵还被台湾的日本警察打伤，关系因之更坏。由于日本政府迄今仍不肯为事件作适当的赔偿，局面闹得很僵。英国东亚舰队总司令已推迟原定的对日正式访问，英国议会中则有人提出窘人的质询和各种议案。皇弟秩父宫亲王虽已准备代表天皇前往伦敦参加即将于 5 月举行 198 的英王加冕礼，但从目前情况来看，他恐怕不会受到怎样热烈的欢迎——要是在几年前，那就不同了。

在日本国内，也可以听到许多坦率的批评，提出批评的人不喜欢日德协定，他们宁愿英日重修旧好，这种老交情现在显然没落了。

国　内

日本政治中有个值得注意的新因素，即来自人民的抗议。1937 年新年伊始，人民对政府政策的反抗更加突出，其鲜明程度，

为1931年以来所未见。以往历届内阁均受过反对派的压力，但象这样直接发自人民自身的反抗，多年来还未曾有过。

这并不是说，公众舆论甚至已有取得支配地位之势。远非如此。不过，民间确有一种情绪在勃蓬滋长，认为人民在当前政治问题的讨论中应有发言权。这种情绪，是军人给国家造成的经济和政治困难激起来的，目前还缺乏统一和领导，但是，运动有希望终将发展成为一种阻力，可以抑制当权军人所支配的这个国家的好战态度。观察家常常感到，日本的政治制度易于发动并非出自民意的战争，这是国际间来自日本的最大危险。人民要求有受到咨询的权利，凡属这样的倾向都是有益的。任何国家的人民，无论在政治经验方面多么先进，要达到对战争的代价有成熟的认识，都得走很长的路；但最近日本国民，对那种以既成事实强加于全国的秘密外交，抗议极为强烈，这表明，他们至少已在这条路上开始走了几程——尽管以后说不定又会倒退。国民已认识到，日德协定对日本在世界上的地位有严重危险。抗议还迅速延及其他问题。日本的舆论，往往自行烟消云散而无所成就，当前的抗议运动，结局也可能会是这样，但是，新年伊始，此事是引人注目的、现实的。

除与德国订立协定、与南京谈判失败、处理对苏关系失策均遭非难而外，内政方面的一些因素，也使广田内阁不得安稳。1936年 199 “二·二六”事变后广田组阁时，军部显然逼他作过承诺，要在阐明国策、改善人民生活、加强国防和奉行积极外交方针等方面采取行动。后两点，广田已在履行：军事预算，急剧增加；缔结陆军所中意的反共协定，当然也就是迁就“积极的”外交方针。但对另外两点，广田却因循延宕。根据第一点，军部有人提出改革行政部门和议会的各种方案，广田却总是推给一些专门委员会去研究，实际上就是避而不纳。这样拖下去，最后等到其他更紧迫的政治问题来了，他就借此转移视线。对第二点，即改善人民生活，那就连假装要实

行的样子也没有了。物价飞涨，债台高筑，赋税激增，皆与许下的诺言背道而驰；意在逐步管制电力工业的那些措施，人民也很不理解，更难说对人民有什么好处。

看来只要军部想倒阁，就随时都可以把广田撵走，如果决定这样干，理由也是现成的，说内阁未能实行其政纲就行了；但迄今尚无迹象表明，军部已一致认为换一个内阁就会干得好一些。军部依旧是操纵政府的太上皇，1937 年也还会是这样，但是，由于军部统治所造成的祸害层出不穷，反对这种统治的情绪，亦随之增大增强。财界和工业界中也有显著的反对派，对政府管制政策的法西斯倾向，他们越来越公开表示不满。

同时国会也要开会了，众议院的席位民政党占百分之四十四，政友会占百分之三十六，社会大众党、其他小党、无党派人士分占其余的百分之二十。在广田内阁中，代表民政党的是递信相和通商产业相，代表政友会的是铁道相和农林相。广田内阁最重要的大臣都没有政党关系。

要而言之，在 1937 年开始时，日本内政的特点是，人民非议政府（尤其是它的外交政策），公众不满于生活费用上涨、预算增高和税负加重。在反对声中，广田内阁仍有可以争取留任下去的有利条件：第一，军部（仍居支配地位）还没有判定更换内阁就能改善现状，第二，各政党还不能联合起来进攻。

陆　　军

毫无疑问，由于去年的“二·二六”事变，日本陆军在公众中的声誉急剧下降了，不过，后来的情势发展已足以消除那时的不良观感，使陆军的势力和人望得以恢复，甚至比过去还高。陆军当局兵不血刃就迅速镇压了叛乱，有效地恢复了秩序，因而博得了公众的赞许。此外，应对事变负责的将领引咎辞职，被宣判有直接罪责

的军官受到严惩，军部宣布决定清洗陆军中的“直接行动分子”，整饬全军的纪律：这一切都在广大国民中造成了很好的印象。陆相寺内将军镇压“直接行动分子”，在陆军中确立较严的纪律，无疑已见成效，抑制现役军官的政治活动，也做得相当成功。而且陆军还被视为有决心推动政府机构的改革，实行各种造福于农村和其他各界人民的社会措施，这也有助于提高它的声望。

日本在外交上的种种错误和失败，军部要负主要责任，报刊责难之声，正甚嚣尘上，但这种宣传，大部分是一些政客搞的，他们正扬言要在即将召开的国会中猛烈抨击内阁。可是，在广大国民眼中，这些政客一般都已声名狼藉，整个来说，国会也是如此，因为许多丑事正是导源于这些议员们的贪污腐败，议员当选后，极少有人做一点事来实践他们的竞选诺言。如今竟允许国会议员在报上肆意攻击内阁，这件事本身就表明，军部对自己的力量和声望有充分的信心；那些政客此时在报上燃起的凶焰，到国会真正展开辩论时，很可能大部分都将烟消火灭。

201

关于国会，以往的经验已经证明，纵有胆大而孤立无援的自由主义者在那里抨击军部，结果对政府的政策往往还是没有什么影响。

对外交上各方面均显遭失败，人民一般都倾向于要外务省而不是要陆军负责。反之，少数有识之士，则大概比以往更加感觉到，日本现在面临如此恶劣的外交形势，陆军要负责任。

有个重要事实不容忽视：在1937—1938年度的预算中，达727,965,556日元的陆军军费，已得到内阁的赞同，这是日本历史上最庞大的陆军军费，比1936—1937年度的数目多219,648,856日元。看来国会也不会对这个数额作多大的削减。

总之，陆军对日本内政外交政策的影响力，似乎一点也没有减弱。

海　军

随着1921至1922年《华盛顿海军条约》和1930年《伦敦海军条约》满期，日本进入新的一年时，便与世界主要海军强国处于无约状态。它面临着与美英进行无止境的海军军备竞赛的可能性，面临着美英在太平洋和远东属地大增防御设施的可能性。这种局面，当然是日本的行为造成的：(1)它在1934年12月发出通知，表示要废除那两个海军条约；(2)它退出1936年的伦敦海军会议，以后便不再遵守三国条约；(3)它听任这些条约在1936年12月31日失效，既未就海军的质或量的限制问题，亦未就太平洋和远东设防的限制问题与其他海军大国达成任何协议。

202 驱使日本退出海军条约和拒绝再承担义务的主要原因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它死也不肯再受法律和契约的约束而使自己处于低人一等的地位；简言之，在日本人心目中，5:5:3的比率实在是有辱国体，有伤自尊，无法忍受下去，因此，大概在1930年《伦敦条约》签订后不久，日本便下定决心，要不惜任何代价消除这种屈居人下的耻辱。

还有一点，恐怕也是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日本确信，《华盛顿条约》订下的比率再也不能给它提供保障安全的手段了，尽管在订约的那个时候它觉得是可以的。不能否认，1922年以后，情况变化很大，特别是在航空技术方面，新的情势无疑已减弱了日本的安全保障。加之近年来日本还以东亚的安定因素自居，那么，摆脱各种限制，以免妨碍新政策的有效推行，就更有必要了。

在估计日本废除海军条约而宁愿与列强处于无约状态这一行动的后果时，且先看日本可能会得到哪些好处，其中有几项可以列举如下：(1)由于它的地理位置，由于它的属地和本土都有岛国性质，港湾、内河航道等很多，形成天然屏障，它便认为，如果海军数

量和质量两方面的限制都摆脱了，即使就靠它那相对贫乏的资源，它也能够建立起一支足以稳保安全的海军；(2)日本觉得，它已以行动证明，它是不甘屈服于西方大国强加的限制的，这样，在东亚，特别在中国面前，它的地位就会大大加强；总之，它是想在中国人面前赢得“面子”；(3)日本海军专家深信（亦不无事实根据），他们可以达到一定程度的均等，办法是提高质量，即建造新型军舰，亦即大型军舰(四万五千吨至六万吨)，装上大口径炮，相形之下，现有的战列舰就显得陈旧了。他们记取了德国的经验：当1906年英国建成“无畏号”级军舰，而使英国以前所有的战列舰都变得陈旧时，德国也大大改善了自己与英国海军实力对比的地位。

不过，对日本来说，无约状态恐怕毕竟还是害多于利。第一，《华盛顿海军条约》，乃是一组政治性条约的一个组成部分，日本人废约，也就破坏了1922年以来控制着太平洋和远东的集体安全体系。为了补救这种局面，它也许不得不设法订一些新的、可能属于双边性的政治协定，以策安全。但是，从前的英日同盟①，恐怕是永远不能恢复了，目前也看不出有什么政治安排可以代替英日同盟或刚被它抛弃的集体安全体系。 203

其次，日本对待海军条约的行动，已使它完全孤立——1934年3月它退出国际联盟，就已经开始孤立了。除此之外，现在日本还将面对美英可能在太平洋和远东属地增加防御设施的威胁，这种威胁即使不是迫在眉睫的现实，至少也会成为一个代价高昂的谈判条件，将来要是日本被迫谋求订立海军协定或其他政治协定，美英就可以在谈判中抓住这一点向日本要价钱。

① 1902年，英日曾签订同盟条约。1921至1922年华盛顿会议期间，美国为了拆散英日同盟，加强美国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地位，提出另订新约。1921年12月，美、英、日、法签订《四国条约》，宣布废止英日同盟，代之以四国条约。条约规定四国彼此尊重在太平洋的属地和领土的“权益”，并为维护这些“权益”而采取共同行动。这也就是作者所谓的“集体安全体系”。——译者

至于要在中国面前赢得“面子”，最近的时事证明，这种期望已经完全落空了。日本不仅在去秋南京谈判中受挫，而且现在还碰到前所未遇的顽强抵抗和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较为团结的中国。

其他结果也不如意。去年已明显地看得出来，有人认识到了，对一个国家来说，尤其是在战时，孤立才是真正的危险，因此，过去六个月，日本已在认真设法，力求摆脱这种处境。11月，日本政府公布了日德反共协定和日意协定，日意协定至少意味着彼此在事实上承认了对方用非法手段征服的领土，此后不久又公布了同波兰订立的增进文化交流的协定，而波兰则是德俄间战略上很重要的缓冲国。莫斯科立即作出强烈反应，结果，日本同这个拥有强大武装的邻国，关系又变得非常紧张。

因此，根据现有迹象，可以证明，从政治意义上说，日本不与列强续订或另订海军协定，并没有使它的地位得到改善；不过，专从海军的角度来看，并主要从防御上着想，也可以说，日本也许是得利者，虽然这还有待于进一步证明。

204

奎松和麦克阿瑟访问东京

1937年2月1日

昨晚菲律宾共和国总统奎松在赴美途中到达东京。我在车站欢迎他，驱车把他和麦克阿瑟将军接到大使馆，他们将在这里作客一宵。设便宴为奎松和麦克阿瑟洗尘。

今晨引奎松总统见天皇，会见后留进午餐，在座的有高松宫亲王、松平夫妇和其他贵客。天皇和奎松随意叙谈，谈及达沃地方的问题和一些别的问题。席上我也对天皇讲了许多关于哈佛大学三百周年庆典和波士顿日本美术展览会的盛况，他似乎很感兴趣。我们还畅谈高尔夫球，我告诉他日本的高尔夫球场我打过二十四

处，我觉得日本简直是打高尔夫球者的天堂，他听了好象印象颇深。我还很少见过天皇象今天这样平易近人。由于政治风潮，不知道到奎松总统来访时将是何人执政，所以我没有预先安排正式的招待会，但今天下午还是举行了一次相当大的非正式茶会。晚上奎松赴有田外相之宴。

席间的演说很有意思：有田向奎松致欢迎词时只字不提美国，奎松的答词却通篇都讲到美国，并且非常庄重地说，菲律宾应该感激美国为它所做的一切。有田建议日本和菲律宾将来应发展最密切的文化经济关系，对此奎松答道，将来建立那样的关系，菲律宾共和国的首要责任和首先关心的当然是要把美国包括进去，但他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不应达成一种三角谅解，这对大家都是有益的。他并非就是如此措词，但意思是这样。他这篇答词第二天发表了，我非常高兴。他的话，特别是那一句——就日菲未来关系而论，“行动胜于言词”——含有断然回绝之意，但日本人是否听得出来，我却惑疑。麦克阿瑟将军对我说，他认为奎松是世界五大政治家之一，我看他说得对。我发现他很能激发人，有他作客，颇感欣幸。

日美关系从未这样好过

1937年2月12日

艾丽斯患感冒，觉得不舒服，今天下午留在家里，由我代表全家参加中国大使馆的招待会，倒也不虚此行，因为我在那里得到了和天羽促膝长谈的机会。天羽说，他认为两三年来日美关系已经大变，日本对待美国的态度和三年前迥然不同了。他说，现在我们之间真是没有什么重大的悬案，他觉得很有意义的是，外务大臣就要在这几天内发表演说，声明深愿与美英两国均保持最友好的关

系;对美国,外相将说到此处为止,若是谈到英国,则还要谈到各种悬案都可以通过外交谈判解决。换言之——天羽说——谈到美国时不附说明,这就表示没有值得一提的重要问题。

我说,我认为能有此局面,主要应归功于广田先生,他曾尽力约束日本报界,过去有些时候,就是因为报界对美国大放厥词,所以才引起那么多麻烦;这些言论被新闻记者传到美国,美国报刊自然要应战,于是两处都发生恶性循环。天羽便告诉我,他在这方面也出过力,在和日本新闻界代表人物见面的周会上,他都尽力开导社论作者,希望他们不要再和美国吵嘴。这点他做得相当成功。我对天羽说,我虽把改善关系之功归诸广田,但他天羽在其中起过206 重要作用,我也是深知的。我提到报上传说白鸟可能出任外务次官,天羽却把白鸟打入计开之外,说此人想和苏俄打仗,因此定然与现行体制不相投合。我说,我觉得日本此刻正处在紧要关头,真是站在十字路口;天羽同意我的看法,他说,这个时期之所以成立一个温和的内阁,缘故就在这里。总的来说,我觉得这次谈话很有意义,因为天羽明确地强调了一个事实,即现任内阁是温和的,就目前来看,情况也好象真是这样。

当心这是暴风雨前的沉寂

1937年3月19日

一个月来的政局别有意味,因为,滨田、尾崎和另外一些质询者在国会猛烈攻击政府,首相和其他阁员的答辩却比较温和,特别是有迹象表明,至少在目前,政府真是想在对外关系、尤其是在对华关系上实行较稳健的政策。这种政策将执行多久,能执行多久,还不能断定。毫无疑问,一定程度的纪律已经灌入陆军中了,以致军官们现在写文章、说话都非常小心。年轻军官大家心里明白,谈

论政治或批评政府者，一经告发，很可能就会在下次整肃时被撵到不如意的职位上去，所以他们得步步留神。目下这个样子，几有恢复"币原外交"之势，长期以来稳健派说话都没有现在这样响亮，他们的影响也可能比以前大了。

不过，我一刻也没有欺骗自己，以为这种新倾向会持续很久。这很可能只不过是一个插曲，或者说，只不过是扩张主义运动中一次周期性的退潮，这个运动我常常谈到，并视之为恰似海边的浪潮，坚信潮是在涨，而不是在落，重涨起来的侵略扩张运动的浪潮 207 必定要比以前的潮水冲得更远。因此，在制定我们的对日政策时，应该非常当心，日本政府似已在政策和策略上永久改变主意，这不过是表面现象，我们不要因此而被引入歧途。军部掌权，太牢固了，今后亦仍将如此。现在国会已被解散，因为政府所要求的许多法案它都不肯通过，内阁无意与各政党再吵下去，我们得密切注意，要看今后几个月国家施政动向究将朝向何方，按常例，今后几个月一定有好戏看。在这里，总觉得有点象坐在火山上，不知道火山将在什么时候爆发，我则确信，爆发的日子决没有过去。

日本欢迎海伦·凯勒

1937 年 4 月 18 日

今天下午在东京会馆欢迎海伦·凯勒[1]，大会之后，又继之以"盛宴"。这次大会，把深藏在日本人民品性中的真实感情都显露出来了，这是在其他任何场合所做不到的。除有教养的家族而外，日本人的传统礼貌，一般都只是一种客套；那种礼貌，一点也没有关切体贴别人的内容。但感情又是另外一回事了。今天的客人，是

---

[1] 海伦·凯勒(Helen Keller,1880—1968)，美国女作家，两岁时即变成又聋又瞎，七岁起被教会说话、读书。她到处募捐，从事帮助盲、聋、哑人的事业。——译者

一个并无一官半职的妇女，她全凭自己的努力，克服了完全失明、喑哑、聋聩等绝顶的困难，献身于帮助盲人的公益事业，现在来到了日本，在这里传布她的福音，展开她的助人至善的工作。此事感动日本人之深，为我居此五年所仅见。

在大会讲台上就座的有首相——他大概是以兼摄文部大臣的身份出席，还有外相、内务相、东京都知事、东京市长、德川公爵和盲人基金会会长大久保侯爵。大厅挤满了五六百人，座无虚席，其中我注意到有币原男爵、芳泽先生和许多高级人士。大员们一一 :208 发表简短的讲话，称颂凯勒女士的劳绩；她通过汤姆森女士致答词，然后大会献给她一只美丽的日本香炉。

末了轮到我讲话时，我因为太感动，便索性撇开讲稿，尽量向大会倾吐我对这一切的真实感受，代表凯勒女士感谢他们。艾丽斯和几个客人在大使馆，从收音机听到了我的讲话，她说，我的话确实充满了感情。的确是一次难忘的盛会。我相信凯勒女士也必定同样受感动。可是《朝日新闻》却说：“假如他们〔指政府和人民〕把献给凯勒女士的殷勤分一点点来增进盲、聋、哑人的福利，那就会使她更高兴得多，胜过首相、阁员和国家其他领导人都来欢迎她。不过她也来得正好，可以提醒人们注意那些私人办的慈善机关，它们是在怎样增进盲、聋、哑人的福利的。……但愿政府能明定政策并付诸实行。……”

四、中国事变

(1937 年 7 月 8 日—1939 年 10 月 10 日)

陆军极端分子在日本国内夺权未遂，便把他们的国家拖入大规模的对华战争。这场战争不仅团结了国民，使之支持极端分子，而且还使整个国家走上了全球性的军事冒险。日本军国主义者原来希望占领中国所有主要港口，就可以控制全中国，但事实证明，他们估计错了。继之而来的是 1939 年 8 月的德苏条约，它为希特勒进攻波兰铺平道路，这在日本几乎和欧洲一样都引起震惊。反共产国际协定，乃是此时联结德日两国的最强的纽带，连最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也没有料到德国人会同苏联做成交易。因此，欧洲爆发战争，对日本军人来说，未必就纯是幸事。新形势使他们能够更放手地南进，但也给他们增添了西顾之忧。

中国事变开始了

1937年7月8日

中日两军在距北平不远的芦沟桥打起来了。谁是肇事者，还不清楚，不过纳尔逊·约翰逊说，从日本人常在中国驻防军附近举行演习这个事实来看，这种事件早就该发生了，不发生才怪哩。

日本各界一致赞成开战

1937年7月13日

电告国务院，在当前危机中，内阁、军部、外务省、报界和工商界都认为，日本在华北的地位，不容有任何削弱：意见看来是完全一致的。当然不用说了，当首相同各派政客、金融家、工商界领袖商量，问他们是否支持政府时，他们岂能说不。但是，就目前形势而论，我们感到各方的一致性比满洲事变时大。

美英表示意见

1937年7月14日

昨天日中两国驻美使节均往访国务院，我国乘此机会表示，希望双方都要克制。我国的行动已告知英国政府，国务院随即发布下述新闻稿：

> 今晨日本大使和中国大使馆参事分别来访本院，通知有关华北时局的消息。在随后的交谈过程中，我们向双方都表示了这样的意见：日中之间的武装冲突，对和平事业及世界进步将是一个沉重打击。

日本尚未增援部队。

“去问游客吧” 212

1937年7月17日

下述有名故事可以用来说明当前的情况。某次远东危机期间，有个美国商人问一个久居日本的侨民，危机的根本原因何在，今后又将如何。侨民答道：“不知道。”商人说：“什么，你在这里住了三十五年，竟会不知道？”老侨民说：“我确实不知道。不过你可以去问问来到此地旅游的人，随便哪个都行。他们会告诉你的。”现在在日本，有很多人坚信，目前这次危机，乃是日本人早已策划好了的勾当，他们处心积虑地要夺取华北。他们举了许多证据：近卫内阁上台如此顺利；前一两年各项事情已在发展，终于导致最后一击；他们认为苏俄已被内争削弱，无力干涉；英国在欧洲处境危殆，不能把海军用于远东；日本已与德国达成谅解。凡此种种，虽亦言之成理，但我还是必须与那些老侨民持同样态度。我不知道，去问游客吧。各种说法，全是猜测，我们能做的只是注视事态发展，搜集真情实况，尽我们的力所能及逐日分析这些材料。

赫尔先生在华盛顿发表了一篇极好的公开声明。声明完全不偏不倚；它没有指责谁，没有点谁的名，却又明确无误地阐述了我们维护和平的政策、条约的神圣不可侵犯性、修改条约应按正当手续、应尊重国际法，还申述了美国的经济政策以及裁军、与各国合作而又不卷入同盟关系等方针。不论有裨于时局与否，发表这种声明，远比直接抗议为佳，抗议不仅无益，且有激起愤懑情绪之害。日本人不会喜欢这个声明，因为知道是针对他们的，但声明的形式却使他们绝对找不到发怒的理由。

中国对日本侵略的回答

1937年7月20日

中国政府已将一份备忘录交给南京日本大使馆，提出四点：

213 一、两国应商定一个日期，届时双方军队即停止活动，返回原驻地。

二、以外交谈判解决争端。

三、当地达成的任何协议，均须经南京政府批准，始能生效。

四、中国方面愿意接受为国际法和条约所承认的任何解决办法。

日本人显然希望知道，这个备忘录是否就是回答他们送去的照会，假如是，又为什么对他们提出的各点不予答复。日本报刊当然把中国的照会说成是“没有诚意”，今天的几家晚报还暗示大局已无可挽回。在我看来，南京既已向日本提出停战，并建议通过外交谈判解决，日本人现在如果还是要打，那就在世人面前难以自解。可是，如果同意进行外交谈判，照他们的观点来看，也有矛盾，因为他们一直认定这次事件是个局部问题，应当就地解决。

今晨有报告说，苏军又在袭击满洲边境。中日开战后苏联会有什么行动，我看日本至少也要计算一下这个未知的因素。

“你们不接受我们的观点，我们之间怎么能妥协呢？”

1937年7月21日

陆军省军务局的一个军官告诉凯里·克兰，从昨天须磨[①]同

① 当时是驻华盛顿的日本大使馆的参事；1940年任日本外务省发言人。——作者

霍恩贝克的会谈可以看出，我国的态度是亲华的，并说我国完全不了解华北的情况。日本人会有这种印象，一定是霍恩贝克向须磨表示了审慎持平的意见，凡属此种意见，都必然会给日本人留下那样的印象。这事使我想起荷日海运会议时日本代表团说的那句天真的话："你们不接受我们的观点，我们之间怎么能妥协呢？"

到处都有部队的活动

214

1937年7月31日

今天有人告诉我一个故事，妙不可言，而且实有其事，要用牛津式的慢条斯理的语调来讲，才能领略它的妙处。有那么一位英国太太，相当高贵傲慢，最近路过日本，离船上岸之后她就对她的东道主说："啊，这就是神户啦。请告诉我，我们驻在这里的总督是哪一位？"

今天电告国务院，中国只要有援军开入华北，日本就要动用重兵，这种决心看来是越来越大了。昨天开过五相会议后，近卫公爵即谒见天皇，报上还有个报道，说已作出重大决定，并说这是日本对华计划的"第二步"。此间到处都可以看到出兵的景象。

美国仍想维持和平

1937年8月6日

英国政府除重申7月28日对我国驻英大使提过的意见外，现在又建议由英美向日中双方提出调停，愿提供中立地点以便谈判代表会晤，帮助解决谈判中可能遇到的困难，随时安排撤军。但英国政府在行动之前，还想听听多兹① 和我关于日本对这个建议大

① 英国驻东京临时代办。——作者

概会有什么反应的意见。

今晚在我书房里同多兹、英国使馆的桑塞姆、接替内维尔任我馆参事的杜曼长谈后，我得出了如下结论：

1．我们觉得，日本政府或人民，都没有热衷于同中国打仗的明显表现——军部当然不在此限。日本人普遍的看法是，中国人对日本屡表敌意，所以才造成现在这种局面，日本政府和人民虽仍愿避免一场全面战争，但政府决定采取的措施，无论是军事的或其他方面的，他们亦将支持。大陆上的军事行动开始后，军费即追加 215 四亿日元，战事若扩大，军费自必扶摇直上，这就必定会使争取和平的主张得到有力而切实的论据。

2．日本人坚决认为，不论是和是战，现在都必须由中国决定。在这方面我虽同意约翰逊的意见，但就目前来看，中国在北平地区的权力实际上已被取消，中国人恐怕是不会主动求和了。如果中国军队继续开往河北，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全面冲突。

3．我们应当想尽办法制止战争，这一点我看极为重要，因此，美英政府欲尽最后努力，以英国政府的切实可行的建议为基础，出面斡旋，我的良心不允许我反对，我只是认为，提出建议时应十分清楚地讲明，这一行动决不会构成干涉。我们觉得，在东京，接受调停的可能性不大，但也不一定毫无希望。应注意不要张扬，成败多系于办事的方式方法。两国政府若决定进行，我想那就由多兹和我分别求见广田——要在他的私邸而不要去外务省——极秘密地提出此项建议，问他觉得怎么样，照日本的看法，所拟计划是否有补于事。在向日中两国政府试探时，若认为不宜于先此后彼，那也可以同时在南京如法办理。

4．至于东京将如何对待此举，我相信，只要采用我刚才说的那种秘密的和探索的方法，就可望不致引起什么反感。种种迹象表明，此类可以试探调停的渠道，只要想走，现在和今后都是畅通

的。

5．我经过仔细推敲后的判断是，找广田就英国方案作口头的、探索性的、半正式的、秘密的会谈，要比正式的“外交手段”好，可以避免“干涉”之嫌，可以获致较好的结果。总之，千万不能张扬。

6．我充分意识到，我先前已经表示过，凡能促进局势好转的事我们都做过了，但我还是希望，美国在此远东大局最关键、最危急时期中的行动记录，历史将把它看作是不遗余力的、公正无误的、慷慨助人的。 216

多兹和桑塞姆都说同意我的意见。

中国人在上海扔炸弹，损害了中国在外国的声誉

1937年8月29日

近来好象大都是在燠热的星期天早上写日记，今天，8月29日，也不例外。身边所有的人，或几乎所有的人，都到山里度周末去了。艾丽斯和埃尔西在轻井泽，其余使馆人员有的去轻井泽，有的去中禅寺，只有本周末值勤的克罗克、文书人员和我还留在这里。杜曼建议他和我轮流出去度周末，但是我不想在这个时候外出；事情发生得太快，有时出了什么事，只能由大使处理，或应当由大使处理。我们当外交官的，不乏悠闲的时节，消遣之道也有的是；我们的工作总是一张一弛地循环着，紧张的工作真的来了，我衷心欢迎，哪个专业人员不想过些时候又得到大干一阵的机会呢？因此，此时此刻，我不能放松。艾丽斯热得难受，我赶紧把她和埃尔西送到轻井泽去，孩子们早已送去了，住在凯里·克兰家。我本人则以热添劲，精神正旺。所以又在继续——啊不，这个短语我用

得多了。我想说的是，我们将继续工作，一切在所不计。

8月14日上海发生了炸弹事件，这是现代最可怕的惨案之一。炸弹是乱扔的，击中汇中饭店和华懋饭店，炸死了聚在外滩等处的中国平民数百人。有个美国传教士的儿子鲍勃·赖肖尔在汇中饭店门口受重伤，美国人可能还有死伤的。我已写信给住在轻井泽的赖肖尔博士和夫人。后来我们从逃难者口中听到了第一手的叙述，真是惨不忍闻。

与英国新任驻日大使罗伯特·克雷吉爵士首次晤谈

1937年9月8日

217

英国新大使罗伯特·克雷吉爵士来访，虽然他要到星期六才递国书。我们谈得很愉快，谈话给我的印象是，他希望我们之间保持最密切的合作关系。他和克莱夫[①]谈过，我想，我们初见即如此坦率友好，也许就是因为克莱夫跟他讲过我们两人的关系。

警告广田

1937年9月20日，川奈

又打了十八穴高尔夫球，三天共打了六十三穴。末尾打第六十三穴时，我比标准少打三次而打入穴中，极为得意。赤日灼肤，身子困乏，精神却很爽快，这就很有意义了。

杜曼来电话说，今天我恐怕还得去见广田，所以午餐后就赶回来了。得悉日本有轰炸南京的计划，需要立刻提出意见。6时见到外相，我说话措词强硬，迥异往常，我觉得现在是使用最重分量

① 罗伯特·克莱夫爵士是罗伯特·克雷吉爵士的前任。——作者

的语言的时候了。在讲话时我说道，我们切不可忘记历史；1898年，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都不想同西班牙打仗，可是，“缅因号”一炸，战争就制止不住了。美国人民是世界上最爱和平、最有耐心的人民；主张国际和平、裁军、维护条约的尊严等，都是我们带的头。但是，遇到挑衅，我们又可以变成世界上最易动怒的人。最好不要忘记历史。

这些意见显然发生了影响，因为广田第二天清晨便去觐见天皇，后来我们又开始看到一些迹象，说明政府正在为滥炸的结果感到不安，正在采取措施约束空军人员。不用说，闯祸的就是这些年轻的冒失鬼；他们一闻到血腥味，就狂奔乱撞，不管炸了谁，炸了什么东西，都觉得“毫无关系”。大概是由于我们提了抗议，他们也渐渐知道了外国的反应，所以政府后来派了一个海军将领到上海，同总司令长谷川商讨此事，现已传出话来，9月25日以后将不再轰炸南京。当然不炸了，到那时候，他们要摧毁的都摧毁完了，还炸什么呢？在此期间，代理国务卿穆尔也和斋藤谈过，随后我还奉命在这里提交了一份强硬的照会。现在决不是抱骑墙态度的时候。 218

对无能的政府提强硬的意见

1937年9月20日

今晚6时与外务大臣在他的官邸谈话时，我首先感谢日本当局在9月22日和26日美侨撤离期间特对避免轰炸粤汉铁路作了安排。外相问我曾否收到他关于轰炸惠州(Waichow)美国教会医院事件的照会，我回答说收到了，并对他的道歉和愿意考虑赔偿再表谢意。

我把话题转到现已宣布的日本海军将从明天中午起轰炸南京的计划，向他表示最有力而热切的意见：假如实行这种计划，外国

外交机关和人员以及其他非军事人员就有严重受害的危险。我说，倘若因此种军事行动而发生事故，就会对美国政府和人民产生非常严重的影响；又说，美国和其他国家对日本的反感正在日益增大，这是日本自作自受，它在世界各国人民中给自己积下不信任、猜疑、普遍憎恶等倾向，还可能会弄到被逐出国际大家庭。我告诉外相，由于日本在中国的行动，几年来他和我一直培植的日美友谊正在迅速冰消瓦解；美国人民虽有耐心，但如有涉及他们海外合法利益的严重事件发生，他们亦容易激动；日本在中国的行动如果造成某种严重事故而使美国人民觉得有伤其尊严，那就肯定会在我国产生巨大影响，这是我经常担心的。

219 我又恳切地对外相说，日本海陆军在中国的行径正在迅速使日本失去世人的好感，几乎弄到举世共愤，他应该负起责任来，指导日本的对外关系，约束日本的军人。我说，陆海军并不了解、看来也不关心日本的对外关系及其在世界上的处境，因此，把现行对华行动方针领导起来，他责无旁贷。我的意见和呼吁，强硬而直率，没有给广田先生留下任何幻想的余地。我竭尽全力要使外相确信，轰炸南京时如果发生涉及美国利益的严重事件，就必定会在美国产生反响。

广田先生对我的意见一点也没有试图反驳，而是自始至终，肃然静听。我讲完后，他才说，四小时以前，他已从东京下令给在华海军司令部，轰炸时要全力避免损坏南京的外国外交机关，避免伤害平民。我说，下午的报纸报道，昨天已经炸了南京，外相却说，那个不足道，而且离外交机关很远。关于日本海军发出的要在9月21日中午开始轰炸的警告，外相自动表示意见，认为警告距执行的日子未免“太短”了。

我今天和外相谈话，虽然语重话直，大异于我到日本以来的常态，他却毫无见怪的表示。他的神态自然比平时沉重，听我讲话时

看来也相当难堪，但他决未强作反驳。最近的发展情况表明，在当地的个别问题上，他已经在告诫陆海军了，总是力求不要得罪美国，可是我们仍旧不得不正视这样一个事实：在总的目标问题上，东京文职政府对军人的影响就微乎其微了。

“亲善使节”

220

1937年10月5日

松方幸次郎起程赴美之前，特来一谈。尽管我劝过桦山、副岛等人不要派什么亲善使节去美国，他们还是有一批人要出去：松方、芦田、高石、铃木文史郎赴美，石井子爵赴英法，伍堂海军中将赴德，大仓男爵赴意，如此等等。在美国，他们是不会有什么成就的。

他们基本论调是，他们打中国是为了自卫，美国人谁也不会听这种胡话，不管他们怎么说。美国人对中国有天生的同情感，而且一直是这样，而且对受压迫者几乎是永抱同情态度。日本是在中国土地上打仗。还有什么好讲的呢？这些使节都将碰一鼻子灰，如果我没有大大弄错的话。

但松方说，他此去不是做亲善使节，而只是去进行商务联系，购买石油、废铁、卡车之类的必需品。我警告他：他将会看到，美国舆论并不接受日本所谓中国要对当前战争负责之说，日本最近的许多行为已使睦邻政策难以继续实行，美国政府在决定自己的政策和行动时，是一定要倾听国内舆论的。他则认为，现在在日本，美国的影响最大，可以发挥重大作用，促使这场战争停下来。

10月5日，罗斯福总统发表了著名“芝加哥演说”，号召对侵略国实行“防疫隔离”。此后不久，比利时政府又邀请承诺尊重中

国政治和行政完整的1922年《九国公约》的缔约国到布鲁塞尔开会。

九国会议能有什么成就?

1937年10月9日

在军事和政治形势方面，日本人正在上海周围发动强大攻势，无疑是想影响九国会议。他们似已扫清了大片地段。但我们要问的是：就算日军能够占领和控制一切想占的领土，就算中国军队部分被歼灭，全部被打乱、被瓦解、被驱散，那又怎么样呢？日本人或别的什么人能迫使中国讲和吗？假如和不成，日本人能撤得回大量的军队来吗？

221

他们必须守住已得之地。他们的补给线正越拉越细长。在经常遇到游击战、实力不断消耗的情况下，这支在中国的大军，他们能够维持多久？日军这样完全被拖住、相应被削弱之后，苏俄会怎么样？据我看，这是大局中未可逆料的重大因素。但是在此期间中国会不会垮呢？会不会人心解体、陷入一片混乱呢？那当然正是日本人所希望的；他们之所以不断轰炸无防御的城市，就是想达到这个目的。我们面临着许多费脑筋的问题，以上这些只不过是一小部分。

另外，九国会议又能取得出什么结果？强迫交战双方议和，然后被断然拒绝？试行经济制裁吗，然后得到象阿比西尼亚问题时那样的可耻失败？或者是仅满足于道义谴责，打一阵大雷，而效果只等于在日本下一场小冰雹？

在这篇不确当的独白到达美国海岸的时候，也许上述问题的一部分或全部将会有了比较清楚的回答。

日本拒绝参加布鲁塞尔会议

1937年10月21日

有位外交界同僚说，他昨天曾向广田再度陈词，重申10月15日提过的意见，力劝日本政府参加布鲁塞尔九国会议。他的论点是，国际联盟开会时，日本就因为没有到场而错过了陈述自己看法的良机，这次布鲁塞尔会议，将给日本再提供一个说明其立场的机会，这种立场将会得到与会各国的慎重考虑，因为它们的最大愿望就是促成中日战争的和平解决。外相答道，上次这位大使和他谈了以后，他请教过此间很多显要人物，这些人，特别是政党领袖们， 222 意见几乎一致，都反对参加会议。不过，由于尚未收到请柬，所以就还没有作出最后决定。

1937年10月22日

吉泽昨天告诉杜曼，就外务省来说，肯定不会接受九国会议的邀请，除非请柬上讲明会议并不是根据国际联盟决议和10月6日美国政府声明[①]而召开的，否则就不要指望会有好的答复。

谣传和谈，但日本的好战气焰日甚

1937年10月30日

今天国务院来了三封电报，对报上所传日本准备讨论和平条件表示关切，希望听取我们对形势的评论和估计。谣传之一是德

① 1937年9月12日，中国向国际联盟控诉日本的侵略行动。10月6日，国联大会由于不愿采取行动，便决定由《九国公约》签字国召开会议。同一天，美国国务卿发表声明说，美国政府愿意信赖《九国公约》签字国的会议所将要通过的决议。——译者

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竟当了调停人，正在上海和川越谈判。为了弄清这个传说，我们坦率地同德国参事内贝尔谈了此事。他说，关于上海谈判，这里的德国大使馆毫无所知，由于日本人认为陶德曼有亲华之嫌，由于中国聘请德国人当军事教官，川越和陶德曼之间的关系一向不很融洽，陶德曼最近到上海，还想借此机会和川越搞好关系。

我把此间报刊的一般评论告诉了国务院，这些言论都集中到这么一点：到与中国谈条件的时候，日本不会容许任何局外人的干涉。于是我又说，若真要查明日本政府的意向，唯一的办法，是由我去找广田"试探"一下。我说，我可以这样做：最好是请求到他私邸去见他，以免张扬，开头先提旧话——8月6日我对他说过，如 223 有用得着我之处，只管告诉我——然后才把话题渐渐引到布鲁塞尔九国会议，讲明这次找他是出于我自己的意思，不是奉命。这样，即使泄漏出去，也不致拖累或牵连到美国政府，而且说不定还可以从广田那里诱出一些暗示来，他那方面恐怕也会欢迎这样给他提供的门路，以便把日本国内不赞成死战到底的人动员起来。总之，办这样重要的事，我不赞成用"中间人"，这种人很容易把事情搞坏或者弄得面目全非。

日方提过的条件，我们所知道的，迄今只有著名的广田"三原则"，而这三点的含义又极其广泛，几乎怎么解释都可以，视日本人在一定时期的需要而定。记得这三点是要中国人在事实上承认满洲国，停止反日活动和宣传，镇压共产主义。不管最后的条件究竟是什么，可以有把握地说，不论还包含什么内容，其中肯定会有这么一点：日本要在政治经济各方面实际上完全控制华北。我想，除那朦朦胧胧的三原则而外，广田是不会向我提出什么具体条件的，恐怕连非正式地透露一下也不肯，但亦无妨去试一试，以便打开谈判之门。我曾经为土耳其和希腊之间的停战尽过力；若能促成日

中停战，也是一大快事。

国务院立即回电，建议采取的行动，听由我酌情办理，只是提议最好不要专为这个目的去求见，而要在因别事去见广田时相机提出这个问题。国务院允许我便宜行事，并且几乎总是说是“建议”，而不说是“指令”，我当然感谢。

发出上述专电后，即与克雷吉连续开会，有时在我们使馆，有时在他那里，议出了一封电报，由杜曼参加定稿，此电拟写成一式两份，分呈我们两国政府，以期有益于布鲁塞尔会议。约而言之，其中的意思是，假如会议的结果是要进行斡旋或调解，那就必须当心，不要越出会议“以协商谋和平”的任务，不要对冲突的根源或所涉及的责任表示意见。会议越能保持不偏不倚，调解终能成功的希望就越大。

此外，如真要调停，就应由一个国家担任，最好是由美国或英国，而不要委托几个国家或叫美英一起出面，因为那样就有施加压力的意味，而外来压力，或任何类似压力的东西，都将会遇到坚决的抵抗。会议还应当慎重考虑到它的行动可能会对日本国内的政局产生什么影响。广田地位不稳；军部和沙文主义者想用松冈代替他，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我们就只能坐待日本以更加残酷的手段对待中国，美英在此间的利益亦必将受到损害。这里的好战情绪显然在与日俱增。 224

所议措词相同的电报，我们已能同意其基本部分，最后的定稿，克雷吉和我也都满意，遂于晚间7时将电报发出，但愿此电能转送到正在布鲁塞尔开会的诺曼·戴维斯①和艾登②的手里，并能影响会议的策略。我们的法国同僚也同意给巴黎发一封大意相同

① 诺曼·戴维斯（Norman Davis,1878—1944），当时是美国出席布鲁塞尔会议的代表。——译者

② 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1897—1977)，当时是英国外交大臣，英国出席布鲁塞尔会议的代表。——译者

的电报。我觉得我们这一天工作得不错。

今天克雷吉心烦意乱；英日关系几已坏到不能再坏的地步；上海又死了三个英国兵，很可能是日本炮弹打死的，英国的反日情绪正不断高涨。日本建了一支新的舰队——第四舰队，这也使他焦虑，他担心此举的主要目的是要有效地封锁香港。我看他真正害怕的是日本海军可能会故意挑起一场英日战争。不管怎样，我们现在知道了，日本海军的攻击目标确已从美国转到英国，我们还知道，日本海军极不愿让陆军独出风头，所以也在那里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帕布斯特也同样担心，怕这支新舰队有配合“南进”政策的计划，侵入荷属东印度群岛。他和克雷吉还担心会再发生一次“二·二六”事件，两人都认为有此可能。

但是，我们又问自己，军人和沙文主义者还有什么委屈呢？的确，看来陆海军已为所欲为，政府或保守派根本没有干预他们。西园寺、牧野、汤浅、松平等人，如今似俱已销声匿迹。再搞暗杀又有什么好处呢？不过，素具武士传统和流氓习气的日本军人和沙文225 主义者，在此间政治舞台上，始终是一个不可预测的因素。什么事几乎都可能发生。

广田指责美国发起组织反日阵线

1937 年 11 月 16 日

广田对我说的话，大意如下：根据来自布鲁塞尔的报道，看来最后决议草案是想用联合行动来对付日本；外相只见过决议的初稿，通过时有无变动或修改，还不知道，但他担心，假如真是号召采取联合行动，那就会对日本舆论产生很坏的影响；“联合行动”之意，似乎是实行某种制裁，如经济绝交之类，这种行动不仅无助于停止战争，而且只会使中国人得到鼓励，从而无限期地延长战争。

据“某国”外交官传来的消息，美国不仅倡议召开布鲁塞尔会议，而且还正在会上起着积极的领导作用。

广田说，这些传说肯定不久就会出现在日本报刊上，必将产生很坏的影响。日本公众一向认为，拼凑反日联合阵线的首要国家是英国，但是，假如报刊现在报道说布鲁塞尔会议的领导权正为美国所掌握，那么，反日的责任大部分就会移到美国肩上。正如外相常对我说的，与美国友好乃是他的基本政策，因此他颇为上述情况势将产生的后果“担忧”。直到最近，日本人仍以为，在这次中日冲突中，唯有美国的公正态度是真诚的；所有其他国家的公正态度都受到怀疑，因为它们在中国有特殊利益，而美国的立场则不同，所以人们还以为它对促进实现和平可能会起重大作用，就象日俄战争时那样，因为它是日本的友邦中最公正的一个。由于总统的芝加哥演说，这种情势，有点变了，但后来总统向国会致词时避而不提远东，这又使日本公众感到，美国的态度也许并不完全象起先所想的那样“严峻”。 226

接着广田又说，日本在中国的战争进行得很顺利，日军尽可以继续前进，如果他们认为需要的话，但是他们也许并没有长驱直入的必要。现在达成和平解决，对中国只有好处。中国政府若从南京撤走，那将是一个蠢举；有些将领已在组织与蒋介石对立的反对派，他的地位并不太稳。假如现在讲和，日本的条件将是“公平合理的”，日本不会占据中国一寸领土，但是，假若战争长期拖下去，这种态度就可能会改变，牺牲既然增大，条件就会比较苛刻。美国要对大局有所助益，最好的办法就是劝蒋介石议和。中国政府如有愿意谈判的表示，广田便派代表去上海和中国代表谈，或公开，或秘密，哪种方式都可以。

广田讲完后，我把他的话逐点重述一遍，问他我是否已经正确理解了他所说的一切，对此他作了肯定的回答。我告诉他，他的这

些意见，我将向我国政府转述，在此期间，希望他尽力约束日本报刊，有关美国态度的报道，未经证实者，都不要发表。我告诉他艾登在英国下议院实际上是怎样讲的，并说，国务院已断然否认我国政府曾倡议召开布鲁塞尔会议，还向他重述了召开会议的缘由。广田说，他同意我的意见，使日本报刊保持冷静是要紧的，他将尽力而为。我又指出，中国大使仍在东京，议和的外交渠道看来还是存在着的。广田同意，但不发表意见。

广田曾论到我国在日俄战争中起过的作用，并暗示，蒋介石若撤离南京，和谈将更难着手，这两点也正是昨晚杜曼对吉泽提过的：这很值得注意。一定是吉泽立刻把话传给了外相。

227

赫尔否定广田的指责

1937年11月17日

国务院来电，传来了布鲁塞尔会议11月15日通过的宣言全文。

美国驻罗马大使馆报告说，哈瓦斯通讯社的一则东京专电报道了据说是日本想要强使中国接受的条件，问我们对此有何看法。我们回答国务院：11月15日外务省发言人称，这些报道都是"毫无根据的"。

国务卿给我一电，谈到我和广田的谈话时，他说，布鲁塞尔会议通过的宣言中绝无"联合行动"一语。赫尔先生猜想，广田也许是指宣言的最后一段，那段是这样措词的：

> 出席布鲁塞尔会议的各国虽然期望日本不要坚持拒绝，但现在的局面是，国际条约的一个缔约国与所有其他缔约国的意见相反，坚决认为它所采取的行动不属于这个条约所涉及的范围，把其他缔约国认为对当前局势有效的各项条款视

为无效。在这种情况下，到会各国就必须考虑它们的共同态度应该是什么。

国务卿还托我转告广田，任何传说，凡谓我国倡议召开布鲁塞尔会议者，都是**没有丝毫真实性的**。赫尔先生还知道，在会上，各国政府不过是分担交换意见的共同任务，谁也没有做过超出这个范围的事；不论哪国外交部，只要它握有可以公开得到的情报，都不会对这些事实有误解，如有，他将感到惊讶。他要我告诉广田，广田希望同美国保持友好关系，他很感激，五年来他赫尔也是一直在为此尽力，但是，他亦不得不坦率地、纯粹出于善意地表示忧虑，发展和增进这种彼此都永记在心的友好关系的事业，不应该因当前的远东局势受到损害。

广田何以误解赫尔的意思

228

1937 年 11 月 20 日

外务省美洲局局长吉泽私下告诉我，我 11 月 18 日转达的赫尔先生致广田先生的口信，有些词句和精神实质被误解了。原来有这么回事。为了保证能够准确地按照电文传达赫尔先生的信息，我先把它写下来，然后去见广田，实际上是念给他听，没有插入临时口头传达。口信说，赫尔先生衷心感谢广田先生愿同美国保持友好关系的切望，为了这个目的，五年来赫尔先生亦在不断努力；赫尔先生仍不得不善意地、坦率地表示忧虑，深恐建立和发展这种彼此都关心的友谊的事业会因目前的远东局势而受到损害。（述其大意）

口信末尾的这句话是带刺的，可是广田听了却非常高兴，并请我向赫尔先生致谢，所以我当时就有点诧异。广田问我可否就把我写的和念给他听的这一份留给他，我推托说，这张纸只是一份粗

略的记录，我回使馆后将立即给他送一份较整洁的抄本来。这样做的理由是，我不能把原本留给他，因为那是照密码译出来的，而且上面还有一些我不想给他看的附注。我一回到使馆办公处，就给他送去一封私函，附上一份紧贴信息原文的意译本。

今晨陪麦克默里①去访广田时，见面我便问他，已否收到了我的信。他说没有，还想打电话问我要哩。我说，两天前即已送出，就是紧接着我们上次会晤之后，我要查一查。我们刚走出广田的办公室，便碰见吉泽拿着我的信走进来。他说信先送到了档案局，所以给耽搁了。吉泽要杜曼下午来找他，并说，广田先生对信息颇有不同的理解；他以为赫尔先生是说，尽管远东局势如此，他还是在为美日亲善做工作。广田显然是误解了“忧虑”一词的意思。

这个信息，按广田那样理解，曾使他高兴得不得了，以致忙将此事电告一些驻在外国首都的外交使节。现在我的信收到了，他的理解和信息的真意之间的显著差异看出来了，他便感到有点为难——要不要向外另发文件以更正错误呢？吉泽认为可以不必，也许听其自然还要好一些。这一切都只怪广田先生对英语掌握得不够，同时也说明，决不能信赖纯粹的口头传达。至少有一点值得我高兴，出此误会，不能归咎于我这方面有什么粗心大意，因为我是据原文老老实实向广田念的。

给一个日本开明人士的信

东京，1937年12月3日

私函，机密

某君鉴：

你11月11日的致英国朋友通告信函，惠蒙随11月19日来

① 美国前驻华公使，这时任驻土耳其大使。——作者

函寄下一份，已仔细拜读，深觉饶有兴味。信中颇多宝贵材料，为此尤当感谢。

现下寄到我处的为日本的态度和行动作“解释”的材料很多，来源甚广，形式多样：有书信、备忘录，还有其他各种文件。其中态度客观、真心实事求是而值得一读的寥寥无几，大部分均不值一阅，因所据论断甚为片面，且未经证实，亦无证据以检验其准确程度。当此世局扰攘之际，愚见以为最要紧的是，我们大家都应当抱客观态度，应先对所获资料的准确性有十分的把握，然后才下判断，提建议，作决定。否则我们的判断即无多大价值，如对所据前提的可靠性不能肯定，世人就会把我们的论断视为存有偏见或纯属宣传。

正因你本人即抱开明、无畏的态度，是个追求真理的人，同时 230 又是一个爱国者，常把你国家的最大利益放在心上，我才不揣冒昧，要对你的通告信函提几点意见。请你相信，我是作为挚友而这样做的——不仅是你的朋友，而且是日本的朋友。我总觉得，一个碍于情面而不肯直率进言的朋友并不是真正的朋友。1932 年我在美日协会上作首次演讲时就说过这个话，以后也总是力求照此行事。不过有时作为朋友可以说的话，作为外交官就不能说，我是以朋友的身份来写这封信的。

你在通告信函第十六页上说：“……是中国向日本挑衅，是事先精心策划好的。”第十八页上又说：“……一支中国大军，平白无故，向我正在演习的一小队驻屯军开枪。”显然，彼此都会说，是对方开衅，但是，中立的观察者大都认为，谓中国侵略，所举证据并不足以证明此点。究竟是哪个肇事，恐怕谁也不知道，但一般都有这样的看法：日本人既然在中国土地上、并且就在距中国驻军那么近的地方频繁演习，要不出乱子才怪哩，早就该出事了。除日本军部的一面之词而外，假如你还另有什么可靠的证据，足以证明你的论

点，我倒是非常乐于领教的。据我看，要辨明这个问题，单凭一面之词是不够的。

其次，我知道确有其事(第一手而非第二手情报)：中国政府曾向日本政府提议7月17日停战，表示愿意将部队撤至芦沟桥事变以前的阵地，在波及的地区内停止一切军事活动，只要日本政府亦采取同样行动即可。其间双方均不得试图占据战略要地；换言之，即订立君子协定：不利用停战期间谋取优势，听候和平解决。这个建议于7月16日送达日本政府，但未得到理睬。我很担心，这个事实如载入史册，将不会怎么光彩，但这确是事实，不是谣言。

第三，关于日本轰炸中国，你只在第十九页提到一个事例（炸 231 广州），说偶然炸死了一些平民（你说为数甚少）。我们根据中立观察者所目击，却握有大量绝对可靠的证据，证明日本轰炸不设防城镇、医院、传教机关和教育机关的事例是很多的，日本飞机是在远离中国军事设施若干英里的地方大肆投弹，因此并非偶然，平民被炸死者亦为数甚多。这些轰炸事件，日本报刊即使有所报道，也没有几桩。美国报刊却报道了，也是根据中立人士提供的绝对可靠的观察资料，我国之所以举国愤慨，主要就是因为看了这些报道。兹附上清单一张，内列我们正式了解到的一些轰炸事件，供你私人参考，并请保密。

我颇愿承认，中国的对外宣传，效果一向比日本的宣传好，但是，上述各点，并不是根据宣传，而是根据中立人士提供的确凿证据。假如追溯到以往若干年的历史，日本倒有充足的理由可以向世人辩解，但若以当前的敌对行动和作战方式为依据，日本就没有多少道理可讲了。在我国，日本宣传人员常用“自卫”一词，我认为这个词用得不恰当。普通美国人，他会很客气地听你讲，但只消问你一句就够了：“唔，你们是在中国土地上打仗吧，难道不是吗？”要在

这种责难面前辩明自己有理，需要追述许多历史背景，选用“自卫”一词，是不恰当的。

我相信，你从这一切将会意识到，我国出现反日情绪，是有充分根据的，有正当理由的，决不仅仅是宣传的结果。我经常热切祷盼的是，我们两国的传统友谊，不管经历多少事故，仍能以完好无损的面目再现于将来。为达此目的，我始终努力不懈，这点我想你是知道的。

此信乃是私函密件，我已经强调过了，请你也作如是观。不过，你既然是个追求真理的人，我觉得你还是有知道这些事情的权利。

约瑟夫·C·格鲁谨上

一个日本极端分子的来信

232

1937年12月4日

下面这封今天收到的信，可以说明此间的普遍情绪：

〔译文〕1937年12月2日

美国驻日大使

约瑟夫·克拉克·格鲁阁下

打倒英国！

由于英国怂恿，中国才对日本采取挑衅态度，因此才发生目前的日中冲突。随着在中国的战争的发展，香港现已成为反日活动的中心。日本海军坚决主张，香港应由日本占领，否则对中国海岸线的封锁就将归于无效。

我们认为，日本应当首先占领香港和新加坡，由此消除日中冲突的根本原因。尽管英国援助中国，日本还是占领了中国南方的五个省，即江苏、浙江、安徽等省。为了维持东亚和

平，从今以后，应在中国永久驻扎一百万日本人。

日本中学和其他学校的英语课今后应当减少。只有志在专攻英语的人才得学英语。

上述各节已于11月15日送呈日本陆海军当局。

〔签名〕某某

（退役日本海军大尉）

我们接到"帕奈号"沉没的消息

1937年12月13日

今天确实是个凶日。这里的星期一通常都比较轻松，因为这里的星期一正当华盛顿的星期天，那里休息。我们打算和几个外国同僚及其他一些人去竹之台打一天高尔夫球，但是，一看早晨来自中国的一串电报，一切出游的念头都打消了，我立刻换了衣服，于11时半往见广田。日军正在炮击从南京经长江撤退的中国残余部队，不分中外船只，一律射击，据说这是司令部的命令。

据我们的消息，载有我国使馆人员的美舰"帕奈号"和三艘载有美国难民的美孚石油公司船只正从南京溯江而上，路上在至少有两英里长的一段路程中遭到炮击，炮弹正落在这些船只的四周。我提醒广田注意我12月1日提出的关于"帕奈号"的照会，把大使馆获悉的一切事实告诉了他，给他留下一份备忘录和詹森[①]的四封电报的摘录，有一封讲得很清楚，日本炮兵队是奉有命令的，要不加区别地袭击一切船只。我向外相呼吁，这样滥轰我们的船舰，要设法制止，并向他指出，如果发生杀伤美国侨民的事件，就会在美国国内产生极坏的、严重的影响。广田只是说，已经预先通知过

① 纳尔逊·詹森(Nelson Johnson, 1887—1954)，1929至1941年先后任美国驻华公使、大使。——译者

所有的外国人，要他们撤离南京一带的战区，不过他还是要请军事当局注意我的抗议。我这次行动是自发的，不是奉到训令，后来我觉得做得对，哪怕只是留下记录也好，所以很高兴。

我还借此机会向广田致谢，因为“胡佛总统号”在台湾附近触礁，可能全毁了，日本政府曾派一艘巡洋舰、一艘驱逐舰和一艘商船去援救。我又请求允许我们把“奥古斯塔号”也派到那里去。外相说，要去不会有什么麻烦，假如为此需要来一个正式照会，他会通知我。

以后一直无事，到3点钟，艾丽斯告诉我，广田刚才来电话说，他就要来大使馆找我。我当即对她说，外务大臣亲自跑到使馆办公处来，这是没有先例的，一定是出了什么可怕的事。我自然立刻就想到“帕奈号”。当我走到我的办公室时，广田已经在那里了，一见面他就说，据报道，“帕奈号”和美孚石油公司的船已被日本飞机炸沉。他一点也没有试图抵赖，没有推说也可能是中国飞机炸的，并且表示，日本政府“深为抱歉和遗憾”。广田看来确实很激动，露出日本人在最激动时常有的那种表情；他说，“对这件事，我真说不出我们心里是多么难过。”我陪他下楼，送他上车。 234

今晨访广田的经过已于中午电告国务院，广田下午3时的来访也报告了。电中还报称，海陆两大臣也都分别向使馆海陆军武官表示了歉意。

这时国务院已发来“特急电”(12月12日夜11时45分发出，12月13日夜9时15分大使馆收到)，说国务院已从汉口得到关于事件的报告，命我去见外相，探询消息，要求日本人立即采取适当的行动，要使广田认识到局势严重，亟需采取一切措施，以防美国船只和人员再遭袭击。我于晚间9时45分回电说，院方所示各节，已在预料之中，今晨已经先办了；我们迄今尚未接到只字关于“帕奈号”被击沉的美国官方消息，鉴于院方电报的传送须费时

九小时，我建议凡属急讯，均用无线电拍发，不要用绕经马尼拉和上海的海底电缆。

日本在初是禁止报刊刊登此项消息，但不久即收回禁令，外务省亦发表正式声明，暗示，“帕奈号”和美孚石油公司船只是和许多运载逃出南京的中国残余部队的中国船舶混杂在一起的，因此事件纯出意外。美联社的莫林、合众社的汤普森和《纽约先驱论坛报》的弗莱谢尔都来探问我们有什么消息。我非正式地对他们说，为增进日美友谊，我惨淡经营，已五年于兹，但由于这次事件，恐怕前功尽弃也说不定。说老实话，此刻我真是担心邦交会破裂，连万一要走时如何赶紧收拾行李的细节都已经在开始筹划了——就象1915年“卢西塔尼亚号”被击沉①后我们在柏林开始整装那样。这种即非蓄意亦显属无理的侮辱，美国政府和人民是否忍受得住，我尚无法预断。

“帕奈号”沉没以后

1937年12月20日

235 又是好些日子没有记日记了，在此紧张而又劳累的时节，实难使日记跟上日期。我们已一直在艰苦地工作，不分昼夜，不计星期天，“帕奈号”事件造成的危机，更容易使人感到烦躁和气恼。这次事件，真是令人难以置信。战争从来就不是、也不可能是仁慈的事业，但是，对“帕奈号”先施轰炸，继而又用机枪近距离扫射，到伤员和其他幸存者爬进岸上树丛以后，仍继续扫射，必欲斩尽杀绝：日本海陆军的这种行为，简直是不可理解。

日本人历次轰炸医院、教堂、大学等非军事目标，总是拿“可见

①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5年5月，英国商船被德国潜水艇击沉，船上有一百一十四个美国公民丧命，美德关系顿趋紧张。——译者

度小”和差误来作辩解，但就“帕奈号”事件来说，这种托词，再也不顶用了。情况很象是这样：飞机从一定高度炸沉该舰后——炸时或许知道是美国炮舰，或许不知道（虽然船篷上清楚地画着或铺着美国国旗）——便俯冲下来，陆军的汽艇也开过来一齐扫射残存者。这就绝对不会看不见美国国旗。扫射的目的，很象是要消灭亲见炸船的证人。我们从可靠方面得知，至少陆军当局——很可能还有海军——曾下令，长江上的船舶，一概打沉，尽管他们早已获得确讯并且清楚地知道那里有我们的船——其实，连船的准确位置都是知道的。

我最初的想法是，结果可能会断绝外交关系，斋藤将领回他的护照，我将被召回，因为我“想起了‘缅因号’事件”。当详情传到国内，国民开始了解到其残忍程度竟如此骇人听闻时，我更加认为可能会断交。倘若再发生类似事件，断交就是肯定无疑的了。但是，广田立即亲自来访，表示日本政府“深为抱歉和遗憾”，日本海军当局亦采取类似步骤，此皆前所未有之举，且决无推卸责任之意：这一切，似又暂时平息了公愤。就这点来说，日本政府倒非常聪明。但本地报刊却至少还想否认有机枪扫射等情；外务省发言人也有这种倾向。在此期间，亚内尔海军上将正在上海搜集证据，此间陆军亦已派专人前往上海调查。美国海军将开调查法庭，询问证人，录取证词。同时，我们还听说，那个应对轰炸负责的海军将领，日本海军当局已将他召回，命他退役。现在真是一个紧张而又关键的时刻。 236

但是，存在着“两个日本”这一事实，也是在此刻表露得最明显。自“帕奈号”遇难的消息传来之日起，便不断有代表团、访问者、书信、捐款向我们涌来——上自高级官吏、医生、教授、实业家，下至小学生，各行各业的人都有，总想通过某种方式为其海军的行为表示羞愧、抱歉和痛心。有位衣着整齐的日本妇女，从使馆办公

处的侧门走进来，剪下一大绺头发，连同一朵石竹，送给我们——这是哀悼亡夫的古仪。还有个日本人为此国耻而痛哭流涕。我们每到一个地方，都有人来道歉。有些贵妇人、官太太，不告诉丈夫便径自来拜访艾丽斯。总之，事件的这一面，仍感人甚深，表明日本人在本质上依旧是一个侠义的民族。

事件会演变到什么地步，尚难逆料。到国内得知详情，国会和公众日益愤激时，我们或许不得不断交。但假如我们能够度过这次风浪，那么，经此事件，也许正可以把日本政府震醒过来，使它认识到，除非它能抑制陆海军，否则断交就必不可免——断交及其一切后果，肯定不是他们所希望的。因此，说不定正可以因祸得福。但还是那个问题：他们能够抑制吗？假如采取压制措施，东京就很可能再发生一次"二·二六"事件。政府自身就正在进退两难。我们也知道，天皇本人是想干预局势的，但是会让他干预吗？日本有许多矛盾现象，这里我们又碰到一个：陆海军是天皇的"赤子"，为他效忠，惟命是听，惟旨是从，但又脱缰而逸，横行霸道，无恶不作，所为决非天皇之所愿，亦非天皇所批准。

英国人的境遇和我们一样，他们在长江上的船也遭到袭击，人也被炸死。

237

大使馆致"帕奈号"沉没事件日方调查人员的声明

1937年12月22日

兰登[1]写信给总统，答应在外交政策方面支持政府，这封信发表了。还有一些人，但愿他们也能和政府同舟共济，不过我又觉

---

① 艾尔弗雷德·兰登(Alfred Landon, 1887—?)，美国共和党领导人之一，1936年曾与罗斯福竞选总统。——译者

得，他们那套要丢弃我们在远东的利益、国家的尊严和威望(即使不是国家的荣誉)的主张，并不代表美国大多数人的意见。我并不认为共和党可以从政府的远东政策和行动中捞到多少政治资本。

大使馆同山本海军将军及其他军官讨论“帕奈号”事件的会议今天在我的书房里举行，地板上铺着地图，大家围图而坐，其中有海军省次官山本海军大将、高田海军中佐、柴山大佐、西中佐、吉泽先生、杜曼先生、美国新海军武官比米斯海军上校、新陆军武官克雷斯韦尔少校，会开了三个多小时。我们都有这样的印象：日本陆海两军俱显然是真心实意，务求查明事情的真相，要不是有很多原因，他们是不会轻易这样做的。我以如下发言结束这次会议：

> 我想简单地谈点意见，可以吧？各位将校懂不懂英语？〔译员告诉大使，他们都懂，不需要翻译。〕
>
> 今天承蒙诸位光临，并多承指教，非常感谢。感谢大家为查清整个事件的实况而出了大力，感谢高田海军中佐和西中佐提出了现场调查的报告，这些报告我都很留心地听了。我国驻上海的海军司令亚内尔海军上将正在开调查会——开海军侦讯法庭。我还没有得到该庭的调查结果，也没有接到该庭搜集证据的最后报告。我知道它已经在听取证词，尤其是幸存者的证词，已经在作尽量深入的调查。希望不久就能接到报告。不过我还是收到过一些证据，我们侦讯法庭搜集到的这些证据，和今天两位中佐所摆的事实，有许多是相符的，但并不是各方面都一致，某些地方仍有出入。关于谣言的问题，讲得很多了。我颇愿承认，有些谣言虽到处流传，也许是无稽之谈，但我又觉得，有些传说，最后的证据将会证明，那是有事实根据的。 238
>
> 现在来回顾一下吧——我只想略为追述一下我国政府的态度，也就是说，看看我们已经做了哪些工作。

12月1日，我首次提出这个问题，告诉外相，那里停有“帕奈号”，我国驻华使馆人员要坐那条船，请采取措施，以防不测。后来接到来自南京和上海的报道，谓炮弹正落在“帕奈号”周围，我又在13日早上11时30分往见外相，告以此类报道，请求采取措施，以免美国人的生命财产遭到危害。那天3点钟，广田先生来访，通知我发生了“帕奈号”被炸事件，为日本政府道歉，表示深感遗憾，陆海两相也这样做了。

随后日本各界人士来访或来信，向我表示歉意，这对平息由事件激起的美国人民的愤慨有很大作用。14日，我接到训令，要送交一项陈述我国政府态度的照会，4时，我求见外相，那时他没有空。到8时30分我才见到他，当即递上照会。

其间吉泽先生曾于5时送来日方照会，我方照会中有几点已在日方照会中得到回答，但不是所有各点都已得到答复，所以我们至今仍在等候回音。

17日，我们的消息表明，事件要比我们最初想象的严重得多，因为我们陆续从上海得到证明材料，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船被炸之后又遭机枪近距离扫射，避入苇丛逃生的人亦不能幸免。至少有一架飞机低飞下来扫射他们。又有证词说，“帕奈号”还被陆军汽艇扫射。这些证词，加上上海侦讯法庭得到的其他材料，说明事件要比最初想象的严重得多。

239 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我国政府不想在枝节上同日本政府争论，因为这种争论只会淆乱主题，在主要问题上，基本事实是清楚的，无可争辩，亦无庸置疑。我国船舶在长江航行，合法合理；那里有我们的船，大概的位置何在，日本军事当局是知道的；船上标有美国国旗，横直都有，一目了然；船被日本海军飞机低空轰炸；日本水面舰艇驶近它们，射击它们，“帕奈号”载得有人，但人已逃离；逃生者被日本飞机扫射：这一切，

都无可怀疑。日军犯了罪，根据这些罪行，我国政府提出抗议，要求十足赔偿，皆理所当然：这也是不容怀疑的。

我想再说一遍，你们赔礼道歉，尽力查究实情，向我报告调查结果，保证赔偿，我都非常感谢。不过我认为，采取最严厉措施，使这类事件决不可能再发生，这才是最要紧的事。再有一次类似事件，后果恐怕就不堪设想了。所以现在我们下一步就是等候对我们的正式照会答复，看上海侦讯法庭的调查结果如何，在那以后，才能确定我们该怎么办。

“帕奈号”事件了结

1937 年 12 月 26 日

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它显示了两国政府的明智和卓识，尽管一方几欲不惜任何代价“保全面子”，尽管另一方横遭侮辱，两国政府仍没有感情用事，贸然准备诉诸武力。日本政府为击沉“帕奈号”谢罪，卑躬屈节；我方则立即接受道歉。我国政府的照会，我看是篇杰作；我们已满意地看到，日本政府自认有责，表示悔恨，提议赔偿，都做得很及时；我们承认日方的行动是对我方要求和期望的 240 响应；在枝节问题上各自信赖本国的证据和结论；我方表示，切望日本政府采取的措施真能奏效，足以防止日本军政当局再攻击或非法扰害美国在中国的侨民、利益或财产。

日方办事也同样巧妙，他们把照会安排在圣诞前夕到达华盛顿，使其能在圣诞节日得到我们政府的处理（我方的答复于圣诞节下午 3 时自华盛顿发出）。日本人不会不知道，我国富于圣诞精神，“和睦处世、善意待人”的思想必定会浸染、影响我国的决策。不管怎样，有此结果，我也就万分庆幸了，以致中午去见广田时一进门就笑容满面（与 12 月 17 日往访时的姿态大不相同），告诉他

我带来了好消息。当我向他念完我方照会时，他确实热泪盈眶，充分表露出日本人的激动之态；他说："听到这个决定，我衷心感谢贵国政府和你本人。我高兴极了，你给我送来了一件精彩的圣诞节礼物。"想必他也是大大松了一口气，和我一样。我们又算暂时渡过了一关——很难的一关。

可是，瞻望未来，我丝毫也没有万事大吉之感。可以肯定，还会出现难关，也许还会更加艰险，美国人民的忍耐不是没有止境的。仅仅损害甚或摧毁我国在中国的有形利益，或侵犯条约权利，或破坏我们所维护的原则，尚不至于引起日美战争，但是，再有某种侵凌美国主权的行为，或者屡次三番的公开侮辱，战争就很容易挑起了。危险就在这里，这是现实的危险，日本军部与日本政府不同，他们并没有责任感，凡是知道这种情况的，在展望前景时都不能排除这种危险。我离开外相官邸的时候，心里非常明白，我们因"帕奈号"事件解决而感到满意，只不过是畅快一时，五年来我总是想建成一幢坚实的日美友谊大厦，但这幢大厦的基石已经崩解成流沙了。

.241 日本教师和小学生的信和诗

亲爱的先生们：

闻贵国军舰和人员遭遇大难，急致深切的慰问。

消息传来，始知发生惨案，我们日本人震悼之深，不是你们所能想象的。

要知道，我们并无丝毫害人之心，造成这么大的损害，纯全是事出偶然。

请向丧失亲人的家属转致我们真挚的同情和吊唁。

附上用日文写的挽歌一首，伏祈赐纳。

中国事变发生时，我有个兄弟在北京和天津之间的通州的一个村子里被杀。当时他住在金水楼旅馆，那里的防军突然向我们手无寸铁的日本人开枪。

几个月都没有得到他的消息，不知究竟是死是活。

终日悬念，悲伤不已。

海外素不相识的朋友也来信勉励，邻近的人则看顾我们。

在忧患中听到温存的话，实感莫大宽慰。

尽管我们的境遇也很艰难，我们要向你们深表衷心的同情和吊慰。

谨向全体美国朋友致意。

某某谨上

吊“帕奈号”及死难船员

（某君写的日文挽诗）

恶浪汹涌，
　　战火纷飞，
战场纷乱眼迷离。
　　健儿腾空，一心追逃敌。
弹落处，呀！炸着的不是敌船，
　　却误中了友邻的舰艇。
船沉了，还带下几个水兵。
　　皆因那致命的一击，
举国震悼，无限伤情。

242

（附注：原文语带双关，难以直译成任何外文。上面所译，只是略表诗中大意。译员最上。）

〔译文〕

东京，1937年12月12日

美国大使阁下

亲爱的大使：

日本空军向贵国——美利坚合众国——的军舰误投了炸弹！妈妈告诉我，我大吃一惊。这个消息真把我吓呆了。我相信，发生这种误会，一定是由于江上弥漫着浓雾。要是空军战士知道那是美国船，定不会那样做，日本空军没有任何理由要把美国军舰当作轰炸的目标。这次不幸事件也许会给船上官兵造成一些伤亡，这是我最担心的，但愿他们都平安无事。

亲爱的大使，我衷心希望你不要把这事看得太严重，要宽大为怀，原谅那些日本海军航空兵，责任毕竟不在他们身上。我还恳切希望，能允许我为日本空军的严重错误向你道歉。我非常喜欢贵国。美国万岁！再见。

某某

东京世田谷区

森山小学

五年级生

日本开始看到"中国事变"意味着什么

1938年2月10日

今年是在预兆不祥中开始的。由于发扬了真正的、罕用于国际事务的圣诞精神和基督教精神，由于美国政府和人民表现了可佩的英明机智，"帕奈号"事件暂时解决了。但是，祸事仍旧还会发生，前景依然十分暗淡。一方面，在华日军危害美国人生命、利益、财产的行为，东京政府无力控制。另方面，我国虽有和平主义的倾

243

向，渴望和平，但在屡受侮辱的情况下，不能设想我国人民的忍耐力是无限的。

假使上面两个前提不误，看来就只有忧虑之理而几无安心的余地了。有个事实也许最能说明我自己的忧虑：最近我曾把这套日记和五年前到日本以来的私函的装订本量了一下，订购了两三只书包式的皮箱，以便突然要离开日本时一接到通知就可以把这些文件装好，并且一提就可以送上船。我不认为这样的变故决不会发生。

"帕奈号"事件引起的反响刚开始宁息，就传来日本侵略军在南京逞凶肆虐的消息，他们抢劫美国人住宅，亵渎美国国旗——多次将美国国旗扯下来，烧掉，不然就撕碎；如此等等，恣意侵凌美国的权益。中国人显然遭到了几近于见人就杀的屠戮，许多中国妇女则被强奸。当然，什么事日本人都是有得申辩的。关于污辱美国国旗，他们说，那是因为中国人用它来保护自己的财产，但是，连我国总领事签署的贴在真正美国财产上的日文证件也没有人理睬，这又怎么解释呢？至于强奸的事，他们说，数以百计的中国妓女从妓院逃出来，日本兵只是把她们带回去重操旧业，何况我们得到的消息乃是来自传教士，他们不过是转述他们的中国雇员的话，并没有亲自看见过他们所诉说的那些事。

有人对我说，日本人的真意是要逃难的中国民户和店铺老板回来安居乐业，我说，中国居民，尤其是那些有女儿的人，听到那么多关于大批处决、屠杀、奸淫的消息，若是不大敢回来，恐怕没有什么奇怪吧；我这么看，来和我说话的这个人便有点答不上来了。其实他还是说了，而且竟然这么说：他能够理解中国人的态度。 244

日本反对英国，估量美国

1938年3月31日

在目前情况下，对我们这些身在使馆的人来说，生活就好似摆着一系列栏架的煤渣跑道。每跳过一栏，都有一阵快感，但是我们没有欺骗自己，以为总会跳到最后一栏。新栏正在不断出现。要是在往常，还要难跳得多，现在稍好一点，这不过是因为日本政府目前亟需避免同我国政府和人民发生不必要的摩擦；它知道，要应付的困难已经够多了，而且以后也许还会是这样，它不想在军部给它带来的麻烦之外再去惹是生非。由于日本政府希望日美关系保持平稳，所以目下我们才在外交谈判中有了一点力量。

日本政府抱这种态度，不是感情用事，决不是的。有此愿望，纯系出于政治常识。他们知道，他们必然要和英国发生持久的、日益激烈的对抗；他们打仗的目的之一，虽未明说，实际上就是要取代英国在中国的势力，步骤也许是渐进的，但终究还是一定要取而代之。他们最不想干这样的事：过分刺激美国，使其一怒而与英国合作，以至在远东建成有力的联合阵线。他们一向认为，美国是不会这样做的，因为他们相信，美国和平主义和孤立主义的情绪实在太强烈了，不允许这样做，但是，除军部逼着要干的而外，他们（日本政府）还是不敢冒险。我觉得，日美间的纠纷之所以大都能够很快解决，就是因为存在着这种形势。今后很可能还会是这个局面。因此，在目前情况下，我的职务虽然无论怎样异想天开也不能说是轻245 松，但假如不能象刚才说的那样因利乘便，那就会更难办得多。我们的外交成就——如果堪称成就的话——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取得的，我们政府处理各种问题时态度都很开明，也是一个原因。

日本国内，政局很不宁静。政府在国会受到各政党的猛烈诘

难，颇有法西斯管制气味的国家总动员法案和电力管理法案又引起很多人的反对。不过，在国会里，最后仍将是政府得遂其愿，与往常一个样。政府内部，在对华战争的战略问题上看来也意见不一：一派主张直捣汉口，纯用武力来结束战争；一派则不赞成用过激手段，认为最好还是巩固已占之地，靠时间和经济财政压力迫使中国屈服。说也奇怪，倒是首相和广田领导的众所周知的文职派宁取前一种方法，陆军头目反而赞成后者，理由是，兵力不够，不足以征服和保住更大的地区。

3 月底还没有向汉口进兵的迹象。日军正在山东和山西“扫荡”，据外国新闻广播，他们的“扫荡”并不顺利。实际上，最近还传说中国人打了一些胜仗。日军受挫，这里的报刊当然是一个字也不准登的，不过，看到报上说日本人已占领某一城镇，过几个星期又看到还是那个城镇被占领，那就不难作出结论了。陆军武官办公室墙上的地图，插着各种颜色的针，近况如何，显示得相当清楚。

在此期间，我们看到德奥合并，捷克斯洛伐克有被侵之虞，佛朗哥在西班牙内战中取得显著进展，英国和意大利会谈，张伯伦抱骑墙态度。也许正是他的政策解除了眼前的战争危险，但是，从远处望大局，我便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可以对前途表示乐观。各国，特别是英德两国，都不过是又在为“那一天”做准备。至于德奥合并，我们这些热爱过那古老的“舒适的维也纳”的人，一想到那座可爱的城市和昔日风光明媚的乐土即将纳粹化，不禁感慨系之。在纳粹制度下，谁能得到真正的幸福？

追怀帕德雷夫斯基 246

1938 年 5 月 15 日

249

最近放映的关于帕德雷夫斯基[1]的影片，有个情节使我想起了我自己和这位音乐大师的交往中也有件与此极为相似的事。我童年时代就知道他的名字，因为在当时的美国，他的名字(当然是读错了)已是家喻户晓，无不知其为当代首屈一指的钢琴家；艾丽斯记得，她是在波士顿的布伦斯威克饭店见到他的，对他那光亮的金发印象很深。我第一次亲自和他接触是在1917和1918年大战期间，那时我是国务院西欧司司长，兼管美国人捐送给敌占区朋友或教友的救济金。这种救济金的数目当然要限制在最小限度内，以免"援助和慰劳"了敌人。

帕德雷夫斯基常常送捐款来给德占区的波兰人，通常是五六万美元，相对来说，数目是不大的；他总是以他那样的人所能做得到的方式为波兰人抗辩，常常泪流满面。他出来抗辩，波兰人便有了理想的代言人。

我第二次碰见帕德雷夫斯基是在巴黎和会上，我又听到他在为波兰人讲话，不过这次是为了他们国家的独立，结果也很好。后来他当了波兰的第一任总理，是这个新建国家最理想的挂名首脑，但这一角色他当得并不成功，因为他那慷慨无私的心肠不适于政治舞台；他跟毕苏斯基合不来，1919年底便辞职了。

后来1924年我做驻瑞士公使时，又曾偕艾丽斯赴莫尔日参加一年一度为帕德雷夫斯基举行的寿筵。通常要给他放烟火，但那晚下雨，晚餐在屋里开。传香槟酒时我提议向他敬寿酒，讲了几句话，说到这位大师在美国深受爱戴，又说我一向知道他是个伟大的爱国者、大慈善家、大演说家，但他作为音乐家我们就无所知了，因为他主要是在美国演奏，而我们却是在国外生活，所以他的演奏会我总是未能躬逢其盛。帕德雷夫斯基起来致答词，对我那点颂词

---

[1] 伊格纳斯·帕德雷夫斯基(Ignace Paderewski，1860—1941)，波兰钢琴家、政治活动家。——译者

也照例激动得老泪纵横；他把夫人叫过来，对她说："最近哪天晚上有空，就专请格鲁先生和太太来同我们在一起，我将为他们弹一个晚上！"

这是个绝妙的主意，我相信他当时是诚心诚意的。但不久我 247 即奉调回华盛顿任副国务卿，莫尔日之约还没有实现就走了。后来我们的长女伊迪丝去世，艾丽斯在关掉伯尔尼的公馆以后，带着其余的女儿乘船回国，一路上伤心极了。在她们到来的前一晚，我赶往纽约，看报知道帕德雷夫斯基也到了这里，而且那晚就要在卡内基堂演奏，便独自去听。奏完后我又象《月光曲》影片中那对夫妇那样走到钢琴下面去听他重奏。帕德雷夫斯基看见我在那里；他一定还知道我们有丧女之痛；大概也还记得他曾经约过我们。总之，他重奏了大半个钟头——而且是弹给我听的。这是我终身难忘的一夜。

首次会晤外相宇垣将军

1938年5月31日

今天新外务大臣宇垣将军①分别接见外交使节。他显然不懂英语，谈话是通过译员。

他说，他要尽全力增进日美邦交，还说，他素无外交经验，不习惯于这一行的错综复杂，因此他将始终说直话。我答道，我正因为有三十四年的外交经验，所以越来越深信不诚实是愚蠢的，在我们的交往中，我将以至诚相见，这点他永远可以信赖。因此我们的想法是一样的，可谓殊途同归。

我说，关于保护美国在中国的利益，不知他的态度如何，我若

① 他是个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将官，天皇曾一度挑他做首相，命他组阁，因陆军认为他太富于自由主义思想，拒不推荐后继陆相，组阁遂告失败。——作者

能在这方面对我国政府有所报告，那将会是有益的。外相明确答道，他保证保护美国的在华利益，如果这方面发生什么问题，就告诉他。

248

广田外相为什么丢官

1938年6月21日

有个日本政府要员，以深知政情的身份讲话，对最近内阁改组的目的和现在这样组成的政府的意图作了如下论述。近卫公爵和政府其他成员已认识到，要进一步巩固日本在中国的地位，避免和英美发生严重摩擦，就必须把纯军务以外的一切政务的领导权从陆军手中拿过来，交给政府的文职部门。广田倒台，就是因为他既无力对抗陆军，同时却又坚决认为日本在中国的对外关系要由外务省控制。这不是陆军所能容忍的，军方现正筹设所谓“中国机关”以专门处理有关中国的问题，就是由于这个缘故。

宇垣将军和池田藏相答应就职，是有条件的，即军部不得掌握有关中国的政治经济事务。这也说明何以要让板垣将军当陆相，原因就在于他既享有陆军少将军官的信任，同时又主张陆军不应过问政治，只应尽其作为有力的战斗机器的本分。宇垣和池田都认识到，不和英美保持友好关系，就不可能解决日本在中国的问题，因此宇垣提出，一定要尽力使英美的利益得到保护。要夺军部的权，说服他们遵从政府文职人员订下的政策，显然不会那么容易，能否成功，大可怀疑。同时还成立了“华北开发公司”和“华中振兴公司”，其目的就是要使在华经济事务脱离军部的控制。在所有这些问题上，“五相”①的意见完全一致。上面关于政府立场的论述，乃“直接来自当事人”，被认为是绝对可靠的。

① “五相”，即首相、外相、陆相、海相、藏相。

“中国事变”变成中日战争

249

1938年7月1日

6月间发生的大事是猛炸广州和日本准备进军汉口，由于中国人掘开黄河大堤，造成洪水泛滥，进攻计划不得不大加改动。另外就是日本内阁改组。

轰炸广州，是现代战争中最残酷的事件之一，加上不久前在南京干下的骇人听闻的暴行，玷污了日本的名声，致使外国对日本传统的“武士道”和自尊心有了新的看法。这些罪行给日本带来的恶名，是永远洗不掉的。

广州被炸后，英法大使和罗马教廷使节俱向外务大臣提出正式抗议。我国则采取另一种做法，由国务卿和副国务卿在国内发表公开声明，表示严正的谴责。6月9日，我因斯科维尔(美国传教士，被一名喝醉了酒的日本兵枪杀）事件往访日本外务次官堀内，借此机会，我对他说，我想就日军在中国轰炸平民一事非正式地说几句话。先讲明，我不是在正式提抗议，事实上也没有奉到要这样做的训令，而是出自己意，并且是从日美关系着眼。我说，六年来，为保持和发展我们两国的友好关系，我始终努力不懈，因此，凡出现我认为有可能损害两国关系的情势，我总是情不自禁，觉得非向日本政府指出不可——至少也得非正式地指出。

我说，今天我不想探究空袭的法律问题，也不想谈什么设防区或不设防区的法律问题。我只想指出，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狂轰滥炸造成大量平民死伤，就会对美国舆论产生很坏的影响；我还要提出一个问题：这种大屠杀必然会败坏日本在外国、特别是在美国的声誉，是不是只要能在军事上占点便宜，就值得这么干？我说，依我看，这方面的问题，首先外务省要管，因为它要对日本的对外 250 关系负责。我认为最要紧的是，日本政府应经常记住，轰炸平民一

事，不论发生在什么地方，不论是怎样发生的，本乎人道主义，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都深为关切。

我这样以友好方式商讨问题，次官表示感谢，并谓宇垣将军亦必与他有同感。他说，我的意见将会得到充分考虑，事实上外务省此刻也正在和军事当局商谈这个问题。

这种交涉方式，似乎还起了一点作用。不管怎样，嗣后我们听说，政府已派了一个联络军官去前线，要对滥炸加以控制。我们还从各方面获悉(甚至东京俱乐部也在议论)，我国的抗议，正因为是用上述方式提出，这才打动了日本政府。日本人尽管在军事上残暴，毕竟还是一个易受感动的民族，在这里，办事的方式方法，比在任何西方国家重要，这是毫无疑义的。弄懂这类事，得靠经验，靠长期的经验。拍桌子在这里一点也没有用，反而达不到目的。

我们分析过内阁的这次变动。这次改组表明，政府已认识到日本正进入艰苦跋涉的时期，表明战时心理和战时经济正在形成，自开战以来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现象，使我们想起了上次大战时德国的景况。食品还没有怎么管制，但许多物资现在对国民来说已经成了禁物，皮革亦在禁用之列，结果将是不再做皮鞋而鼓励人民重穿旧时的木屐。他们终于真正苦干起来了。高尔夫球因是橡皮做的，不准做了，我看，在不远的将来，高尔夫球这玩艺儿即使不全停，也一定会衰微，球场恐怕最后也会全部或大部分关闭。这一切，要说有什么意义的话，那就是，它将使许多日本人切身感到，他们的国家真已处于战争状态。

日俄发生冲突，但双方避免战争

1938 年 8 月 1 日

7 月份的大事是苏满边境张鼓峰发生苏日冲突：苏军在有争

议的地段占了一座有战略意义的山头，据本地新闻报道，日军又将 251 苏军赶了回去，双方伤亡颇众。我们到日本后六年来，那一带地区总是时常发生类似事件，但这次有点不同，似乎比往常严重，使我们想起了去年的黑龙江岛屿之争，那时好象是日本人想试探苏联的实力。目前这一次，则可能是俄国人在试探日本的实力和决心，要不就是与中国人遥相配合，发动这么一个事件，以牵制进逼汉口的日军。假如真是为了这个目的，看来他们至少已经获得了部分成功，因为，据传已有大批日军北调，而日本现在也确实不能忽视那个地区，不能不防备万一。

我确信苏联人此刻并不需要同日本打仗，也确信日本人决不能在这个时候冒险，因此对这次事件我没有大感不安，并且一开始就觉得此事定将局部化。与日本高级将领交往甚密的德国大使奥特将军告诉我，这些将领曾对他说，他们现在并不想同俄国发生麻烦，因为中国的事已经够他们忙了，所以他们不会让事件扩大。我想，奥特不会骗我，因为我们私交甚笃；若不发生意外，事件定会很快解决。幸运得很，事件果以停战的方式解决了，那里虽始终存在着冲突的根苗，但张鼓峰事件仍有可能变得同其他许多事件一样；激动一时，又沉寂下去。

在其他方面，这个月的要事是，我们坚持努力，要日本保证尊重我国在中国的各项权益，结果略有所获，但也只此而已。我曾与宇垣将军长谈过三次，第四次约见时他不得空，改与堀内会晤。第一次会见恰好是在美国独立纪念日，为时约两个半钟头，我详述了美国在华利益的各个方面。这次会见，决不是去碰碰运气，所有要讨论的议题事前都仔细研究过，花了几天功夫，为的就是要对各种情况了如指掌。我说到的一些事情，和说话的强硬语气，大可以使 252 他发火，我也等着他发火。可是他没有动怒。他甚至还感谢我能够同情地看待局势，而且是在听我明确说了美国政府和人民对中

日战争的总的看法如何、特别是对轰炸平民如何憎恶之后表示感谢的。

这次会谈是否有用，不得而知。也许在某几点上有些帮助。但是，不能指望会有多大效果，除非日本人有理由感到美国将会采取某种行动。他们可以给保证，给多少保证都行，但又总是会这样说："请别着急；军事情况使得我们暂时还履行不了诺言。"英国人和我们处境相同，而困难尤有过之，因为他们的利益比我们广得多，日本人又正在加紧排挤他们。有迹象表明，英国政府再也忍不住了，很想发作，但是，只要日本人仍料定英国因困于欧洲纷争而不能动武，他们就会继续对它嗤之以鼻——说话不妨相当客气。

慕尼黑会议前夕的日本

1938年9月30日

9月28日是个繁忙而又重要的日子。欧洲正在战争边缘上发抖。我们都围着收音机，听伦敦、香港和悉尼下午和晚上播出的新闻，详情还是弄不清楚，只听见报道总动员，张伯伦寄最后信息给希特勒，请他放心，英法保证敦促捷克斯洛伐克履行其交出苏台德地区[①]的承诺，罗斯福总统直接致电希特勒本人，再次呼吁和平——此电堪称为一篇有力而开明的文献。不过在德国，这些呼吁当然是一篇也不许发表的。

我没丧失信心，觉得战争还是可以避免，除非希特勒真是疯了，否则到最后关头总可以达成某种协议。但要说希特勒也许真的发疯，我也可以同意。希特勒在国内发表了几次演说，把话说得

253

① 苏台德区是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土，住有不少日耳曼少数民族。1938年9月12日，德国法西斯头子希特勒公开要求将苏台德区并入德国。9月19日，英法向捷克斯洛伐克施加压力，要它接受希特勒的要求。9月29日，德、意、英、法四国政府首脑在德国慕尼黑举行会议，签订协定，将苏台德区交给德国。——译者

太绝了，现已很难打退堂鼓，打退堂鼓就会严重丧失威信。

随后华盛顿来了特急电，命我去见外相或别的外务省官员，建议日本响应总统的倡议，也向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呼吁和平。1时，电文译出，打好字，值此危机时刻，知应分秒必争，1时零5分，我便命杜曼携电赴外务省，交给负责人，等候宇垣将军按约定时间——2时50分——接见我。订此约会时，岸曾说，外相和次官整天都不得空，不能接见我，但我告诉他，我的事极其重要而紧急，非见外相本人不可，这才作了安排。使馆秘书卡伯特·科维尔随同前往，由他核对外务省译员土屋的翻译；翻译完全准确。开头我先对外相说，现在是文明史上最严重的关头，此刻采取什么决定和行动，又足以从根本上影响今后文明的发展方向。随即传达美国政府的信息，口述而外，又送上非正式的文本，以便留下记录，明白无误，还附上一份总统致德国总理、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英国首相、法国总理的呼吁书的转抄本。

信息译成日语，科维尔在旁边注意着，外相听完后作了回答，大意如下："对美国总统在德捷争端中所采取的行动，我代表日本政府表示完全同意。你知道，日本一向是渴望和平的，现虽不幸在从事对华战争，仍是希望在那里确立和平状态。我们也在谋求和平解决德捷之争；不过有个问题：日本采取类似美国的行动，会不会有效？从我们自己所处的地位来看，以采取什么行动为佳，必须慎重考虑。但我们还是坚决赞同总统所表示的信念。"

下午晚些时分，吉泽建议道，若由外务省将美国的电文和宇垣 254 的答复发表出去，也许倒是件好事；我立刻同意，他也获得了宇垣的许可。国务院未曾授权让我这样做，但是，即使吉泽不来问我，外务省也很可能会发表，即使不发表，也几乎一定会泄漏出去，说不定还会走样。而且我认为，纵然日本不可能采取类似行动，若把它赞成总统的行动一事公布于众，也显然有益的。正如堀内当晚

对克雷吉说的，他们自己就正在作战，却要去呼吁别人不要妄动干戈，这实在有点尴尬。夜间10时，外务省公报发表了；我对公报的形式有点失望，因为它没有十足反映宇垣对我讲的话——宇垣对总统的态度和行动都表示赞成，公报却只说赞成他的“愿望”，但也总算是说了这么一点，聊胜于无。我猜一定是吉泽起草以后，那个沙文主义的发言人河相又给稿子打了折扣；这种情况是常有的。

克雷吉曾于7时15分来访，长谈时局。

快到午夜时，有个消息把我惊醒了：“汉堡美洲轮船公司”已下令命其船舶留在日本海域不动，英国“半岛及东方轮船公司”则命其船舶于二十四小时内离开日本海域：这都是不吉之象。立即将此讯电告华盛顿，此刻在华盛顿，定有类似的函电潮涌而来。

深夜，杜曼、科维尔、译电员瓦伦札和我在我书房里审核我草拟的各类电报，又听收音机的最新消息：约花了一小时。应付了午夜传来的关于轮船的消息以后，我还是睡不着觉。

29日，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古德塞尔博士来访，告诉我他拜会外相的结果。宇垣曾给过他几封致日本驻华官员的介绍信，他是去致谢，原以为五分钟就够了，不料外相竟留他坐了一个半小时，细问他日军当局是怎样对待美国传教士和教会的，很想知道他的看法如何。古德塞尔便单刀直入，把日军的暴行、屠杀、奸淫、野蛮、残忍都老实告诉了他，还给他留下一长串早已编好的笔记目录。外相并不因此见怪，古德塞尔再三给他机会，让他可以随时结
255 束这次会见，他都预先拦住。这天正是外务大臣辞职的前一天，他这样做，的确值得注意。古德塞尔还给宇垣讲了一个故事：在爆发“中国事变”的芦沟桥邻近，他亲眼看见城墙上刻着“东洋和平诞生之地”几个大汉字。古德塞尔说，外相喜欢这个故事，开心得笑起来。

在巴索姆皮埃尔处午餐，有维罗索斯（巴西大使）、特恩希尔

(瑞士公使)、帕布斯特等许多同僚在座,一同接待佩尔彻夫人,她是我们以前的同事佩尔彻先生的遗孀,佩尔彻当过比利时驻柏林、驻伯尔尼使节,后来又驻过巴西。在座者谈起欧洲危机都没有什么乐观的调子。晚上艾丽斯和我呆在收音机旁,一直听到将近午夜都没有听到什么重要新闻,因为慕尼黑会议要到此地时间晚夜11点才开场。第二天(30日)早上6点半钟起来,却发现时局真的有了希望。上午10时45分,喜讯传来了,"协议已经达成"。

这样我们遂以多日未有的舒畅心情迈入10月。

两晤有田外相

1938年11月7日

今天首次拜会新外务大臣有田先生[①],因他那方面采取消极态度,会谈未能取得满意的结果。作为老朋友寒暄一番之后,我便说到他的前三任外相曾先后向我保证,在他们各人的在职期间,日本政府的外交政策不会改变,美国在中国的权益将受到尊重,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的原则将得到支持。然后问他愿不愿重申这些保证。

有田先生答道,他上次做外相时,日本人民对美国的态度特别友好,今天也依然是友好的,但其间由于中国发生事故,美国对日本的态度却已大变。他想,只要看看最近日本报刊的评论,日本人民目前在这方面的态度如何,我就可以理解一二。外相说,考虑到他国内的舆情,他不得不慢慢进行,"十分谨慎"。 256

外相提到首相11月3日的演说,认为已经说明了日本的政策。我立即答道,我们仔细研究过那篇演说,觉得有些部分仍需要解释,我特别问他能否将下面这段话解释一下:

① 前外务次官,1938年10月29日被任命为外相。——作者

日本不拒绝与列强合作，亦不欲损害第三国的利益。设若这些国家理解日本的真意而采取适合于新形势的政策，为了东洋和平，日本亦将毫不迟疑地与之合作。

我问，所谓“适合于新形势的”政策，首相指的是什么样的政策？有田先生答道，他认为要紧的是，我们应该就所有这些问题好好谈一谈，等他任职稍久一点，准备得好一些，然后才来谈。他反复说，他得慢慢进行，局面“非常困难”。他今晚要去伊势国庙报到，我问他可否一回来就接见我。外相答道，他还需要一点时间，不过希望下星期内能谈。

我说，形势紧迫，我国政府也认为事不宜迟，有田先生便劝我耐心，并说，倘若我们硬要日本立即答复我方10月6日的照会，这种答复恐怕也不会令人满意。他老是强调“耐心”二字。

于是我便告诉他，有个问题我得特别提请他注意，刻不容缓，那就是上海至汉口这一段长江上自由航行的问题；我提了强硬的口头抗议之后，又给他留下一份标着今天这个日期的照会。我对外相说，含糊不清的答复，我国政府是不会满意的，我逼他，要他作圆满的答复，包括确定日期，及早取消对汉口以下长江航行自由的限制。外相仍支吾其词，不作明确答复。

1938年11月21日

今天下午与外务大臣长谈，我说，美国从未企图“剥削”中国或在中国谋取任何势力范围，史实昭然，我相信外相也会同意这一点。我们的愿望历来是、今天也仍旧是避免划分势力范围和进行剥削。我们对“门户开放”的解释同那些做法是完全相反的。这些话外相表示同意。

257

接着我便从原则问题转到实际问题，指出，外相曾要求我们耐心，但在我方看来，美国人民的耐性不是没有限度的，我国政府必

须倾听美国国内的舆论。我说，毫无疑问，由于日本在中国的政策和行动，外相和我当然会对日美关系的发展情况感到不安，至于我，则更是很久以来都没有象现在这样烦恼。我觉得，挽救之道，最好莫过于日本政府立即采取一些较明显的措施，向美国政府和人民证明，那些不断从日本各方传到我国去的要把一切外国权益逐渐赶出中国的说法都是不实之词。

我说，明显的措施中，首要的一步，应是立即停止轰炸，立即停止以其他方式侵犯远离陆海军作战地区的美国教会和其他美国财产。这类暴行仍在不断发生，每天都有消息传到我们使馆，彰彰在人耳目。加之，逞凶的范围这样广，持续这样长，仍推说事出偶然，显然是站不住脚的。最近，这些暴行不仅损及美国财产，且已伤及美国人的生命，辱及美国国旗。

我还口头反驳了日方 11 月 14 日关于长江航行的照会。

我再次请求解释近卫公爵在 11 月 3 日广播演说中讲的那段话，即只要外国理解日本的真意并采取适合于新形势的政策，日本便与之合作。我说，我很想知道这里提出的合作在实行时打算怎么做。例如，美国人近几个月来常听见侨居中国的日本人对他们说，美国商界只有通过日本中介人才能进行对华贸易。我问，外相所设想的"合作"是否也是这个意思，因为在今天的中国，正是逐渐在实行这种办法。 258

外相回答时先感谢我这样坦率。他同意，我们之间最好是开诚布公，即使难免会说出一些不入耳的话。他托我转告国务卿，他断然否认关于美国人将来只有通过日本中介人才能做生意的说法。他说，日本希望并力求保证自己获得某些原料，但是，美国的贸易和其他事业仍有广阔的、甚或更大的活动范围，且将受到欢迎。

我再次吁请立即采取措施，满足我们的迫切要求，再次强调这

对缓和美国舆情，至关紧要。正式谈话到此结束。

我给外相留下一份我的陈述的非正式记录，标上“口述”二字，并说，这决非外交文件，只是把我的话准确地记下来，给他一点帮助。外相对这个做法表示感谢，并说以后和我谈话时他也要仿效。我们一致认为常常见面对彼此都有益处。

回答日本对我国门户开放政策提出的异议

（向有田外相口述意见的书面摘要，谈后留给外相）

1938年11月21日

在开头时我想说，星期六承阁下接见杜曼先生，关于在中国造成的新形势，日本的看法如何，又承至少说明了一部分，对此我颇感欣慰。你对杜曼先生说的一切，我俱已获悉，因此，假如你愿意，我们会谈时可以先假定我已熟知那次谈话。

我很高兴地注意到，你曾向杜曼先生表示，为了尽量消除我们两国政府间现有的意见分歧，你希望以后能和我谈几次；我也要尽力而为，凡向我表述的日方观点，我都要尽量准确地向我国政府转达。

259

另方面，你将会看到，我也必须尽量明确地阐述我国政府的观点，因为彼此若无彻底的了解，要调整今后的关系，是不可能的。

我认为今天的谈话将纯是探讨性的，还要讲明，我这次来不是想答复日方11月8日的照会，因为那个照会我国政府还得花时间细加研究，意见如何，到时候我自会接到指示。

不过，有几点我还是想立刻提出来。

阁下曾论及“剥削”中国和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问题。历史载有明证，美利坚合众国从未谋求“剥削”中国或在该国取得“势力范围”；此点我想你会同意。我们的愿望历来是、今天仍然是避免

由任何一国或在任何一国划势力范围和进行剥削。

我们对"门户开放"所作的解释，同那些做法全然相反。自美国建国以来，商业机会均等原则就一直是我国外交政策的根本原则。美国参加的、载有体现此项原则的条款的有关远东的条约，其缔约宗旨，无一不是为了减少和避免远东国际关系中已经发生或可能发生的摩擦。

我们认为，遵守这些原则和条款，就能促进和平与普遍繁荣；采取相反的方针，就必然会引起摩擦，结果不仅贻害各国，就是奉行此种方针的国家亦不能免受其害。美国政府和人民坚信，那些原则和条款，乃是为所有有关国家的利益着想的。

我国政府亟欲采取步骤，以阻止当前的走向国际无政府状态的趋势，深愿对改善国际关系和恢复国际秩序作出贡献。国际关 260 系中的问题，通过和平谈判、共同协商和信守国际协定来解决，正是我国政府的主张。

我国政府奉行的贸易政策，则是要促使各国在国际贸易中取消和减少对商品交换的限制，我们相信，对外贸易正常发展的结果，只会使生活水平提高，生活更加丰富，邦交更加融洽。

商业机会均等的原则，历来是美国人民和政府的信条和指导原则，美国舆论认为，任何国家，如果力图在另一个国家为自己树立优先的地位，那就同建立、保持美国及全世界的繁荣不相容。

我国政府还认为，无论哪国政府，都不能自以为世界上一个广袤而重要的区域该它独霸，要由它独断专行；任何政府要这样做，不管其动机如何，到头来都必然是误国害己，也危害别国。

上次与阁下会谈时，我曾请求解释近卫公爵11月3日讲的一段话，即，只要外国理解日本的真意并采取适合于新形势的政策，日本便与之合作。

我很想知道，这里提出的合作，在实际上打算怎样实行。例

如，美国人近几个月来常听见旅华日侨说，美国商界只有通过日本中介人，才许进行对华贸易。你心目中的“合作”也是这个意思吗？如今在中国，正是逐渐在实行这种办法。

阁下曾要求美国政府方面要有耐心，但我显然有责任指出，不论美国政府抱什么态度，美国人民的耐心总不会是无限的，我国政府亦不能不倾听国内的舆论。

毫无疑问，由于日本在中国的行动和政策，你我二人当然会对 261 日美关系的发展情况感到不安。至于我，则更是很久以来都没有象现在这样烦恼，依我看，不论今后我们会商和谈判的结果如何，日本目下即应毫不迟延地开始采取明显措施，以防止日美关系的继续恶化。

首要步骤之一该是向美国航运和商业开放长江下游。我们知道，现在长江上的航运，除给日军输送军需品外，事实上还有日本商人来来往往，他们正式做生意，公开登广告，因此，日本政府提出的阻止美国贸易的理由，我们完全不能接受。

最近日本政府声称，它决无蓄谋妨碍长江航行和贸易之意，现在它已在专心致力于尽早恢复正常状态，我国政府注意到这种保证，但同时还是认为，现状迟迟不矫正，歧视外国权益的严重性就会与日俱增。

对日本当局来说，另一明显的重大步骤应是立即停止轰炸和侵犯远离陆海军作战地区的美国教会和其他财产。这类暴行仍在不断发生，每天都有消息传到我们使馆，源源不绝。暴行如此猖獗而频繁，犹推说事出偶然，显然是站不住脚的，最近，这些暴行不但损及美国财产，且已伤及美国人的生命，辱及美国国旗。

我方照会和日方 11 月 18 日复照中提出的其他各点，留待以后讨论。

外交的核心

（摘自1938年11月22日我在美日协会饯别日本新任驻美大使堀内先生的宴会上的讲话）

我觉得，外交的核心就展现在这里。办外交，用书面言词办的或能够办的，恐怕只有很次要的一部分。阐明书面上的言词和言词背后的精神，才真算是办外交。而在当今世界上，又还有比这一切更重要的，那就是公众舆论的巨大力量。书面文件可以反映舆情，但决不可能充分地、准确地阐明舆情，也不可能把推动人们去制定那些文件的真正精神表达出来。 262

因此，这就成了大使的最高目的和任务之所在。他首先必须是个讲解员，这种讲解的职能，要在两方面起作用。他先要了解驻在国——了解它的境况、心理状态、行为和行为后面的动机，将这一切向他本国政府解说清楚。然后反过来，又设法将他本国的意图、希望和要求告知出使国的政府和人民。他是两国相互调节其据以行事的思想和动力的执行人。的确，国际间的摩擦，往往不是出自根本的分歧，而是起于闹不清的误会和猜疑。这类问题，单凭书面言词而不经口头商讨，能解决多少，我们这一行的人谁都明白。记得六年半前，在这个协会热情欢迎我的妻子和我的宴会上我曾说过，有时候，我们的语言——实际上包括一切口头和书面的语言——都显得空泛浅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得依靠一种类似爱克斯光的语言，它在表层下面振动，往往比任何写得出来或说得出来的东西都有效。此种情景产生于、而且只能产生于个人之间的接触。

可见，一个大使因解释错误而造成危害的可能性是很大的；而他能做好事的机会也真是不可胜数。

一位提供情报的意大利人预见日本海军将挑起战争

1938年11月27日

昨天有个和我私交甚密的意大利使馆要员极机密地告诉我，日本海军已断然决定宣战，大概在不久的将来就要实行，这是作为走向同苏俄作战的第一步。

这位向我提供情报的人还强调说，香港是保不住了，“五分钱卖给我，我也不要”。他说这些话的理由是：日本海军感到，自 263 1931年以来，陆军独享威名，它则仅仅是给陆军当驴马；它越来越不甘于充当这种角色，所以决定要乘此国民好战情绪高涨之际，扫除东亚所有的敌手，完成日本在这个区域的霸业。据认为，英国由于过去十五年间扩军进度缓慢，现已势孤力弱。日本海军原来还摸不透美国海军的动向，惟有此点，尚能使它有所顾忌，但在上星期，这点顾虑也消除了，因为美国显然已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不卷入远东纠纷。

虽然此人或许有点爱夸张，但还是可以这样设想：他处的地位，消息灵通，而他的消息的出处，又非别人所能接近。我的看法是，他的话也许反映了海军少壮军官的主观愿望。

罗斯福总统插手干预

1938年11月30日

9月份世界大事的重点在于欧洲危机。现在，在我们来说，重点又转到日本来了，但我写到这方面的时候已是11月底，10月和11月发生的事情又那么多，实难一一记得起来。大事自然是汉口

陷落和广州陷落。日军突然在大亚湾登陆，长驱直入广州，几乎毫无阻挡。日本公众当然以为战争实已就此了结，精心炮制的提灯游行庆祝在东京搞了几天。蒋介石的军队能保存多久，固然难说，但至少还存在，有些是退走了，但没有被歼灭，只要那些军队还存在，就不能设想日本敢于削减它的前线兵力和占领军。

10月初，我国采取了最重要的外交步骤。开头是国务院来一长电，日期是10月1日，命我相机向外务省提交一份长照会，内容几乎涉及全部有关日本损害美国在华利益的问题，包括门户开放 264 和机会均等原则、日本人对各种企业的垄断、外汇管制、关税率、电话和电报通讯、码头和航运、长江贸易、对要求回去管理其资产的美国人所加的种种限制、对铁路运输的干扰、邮电检查等等项目。

按照摆在我桌上的电文是这样讲的：总统根据上述情势，要求日本政府立即采取措施，履行它许诺的维持门户开放和不损害美国利益的保证；美国政府相信，从美日关系着想，早日答复将是有益的。我没有什么理由不相信这个信息是来自总统。以前为了另一件事他也这样做过，而且我想，这次要提的抗议既如此重要，用他的名义，仗他的威望，也是完全合理的；实际上我还立刻想到这是一个好机会，可以借此请求立即谒见首相——他仍暂兼外相，只是还没有接见外交官。

其实，这封电报根本不是总统发的。其所以出现"总统"二字，纯粹是因为译错了电码。

但当时我还是立即求见首相，理由是我要向他转达来自合众国总统的信息。近卫公爵当然无法拒绝，这样，我就无须冒超越外相之嫌而又能在他这个首相面前将我们在中国的处境和盘托出，这方面的情况他很可能还了解得很少。最初他们说首相整天不得闲，经我坚持，终于允给半小时，即1点至1点半，正是在他因别事要去觐见天皇之前，这就更好了。为免惹人注意，他们派挂上普通

牌照的首相专车来接我，引我穿过官邸花园，从屋后暗梯进入他的办公室。

我的口头抗议，近卫公爵全都听了。我说，这还要写成照会，265 即送外务省；为准确起见，又照例给他留下一份我的谈话的非正式记录。近卫公爵听完后说，承总统寄来此讯，他感到荣幸。又说，虽然换了外相，无论对中国之事或对其他国家，日本的政策都不会有任何改变，已经向我们作过的关于在中国维持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的保证，将坚守不渝。（奇怪的是，一个月以后，11 月 3 日，他就改取新政策，背弃他作过的一切保证。国际间的诺言原来不过如此。）

首相说，由于中国的战局，要满足我国的全部要求，恐怕一时还办不到，但他明确保证，这种耽延，为时不会太久。他说，他深愿一如既往，继续尽力改善日美关系，他是非常重视两国关系的。他还说，我提出的各点有许多他还不甚了解（当然不了解），但他愿意研究。后来我听说，这次谈话后，近卫公爵即命外务省就我提出的各个要点和争执问题写出一份报告。

向国务院汇报时，我称院方电报来得正是时候，还说明了何以正是时候。殊知三天后院里又来一"急"电，说总统根本没有发过什么信息，这可把人吓了一跳。不过国务院也猜到，定是前电有弄错之处，院方自然不希望减损已经获得的效果，因此已向总统讲明，而总统对我利用他的名字亦已认可。要不是他认可，我的处境真不堪设想。但我揣测，当总统听到这个故事时，眼里想必还是会闪出一丝喜悦。至于日本外务省，我相信他们仍会觉得那次会谈有可疑之处，吉泽在私下谈话时就曾对杜曼说："我们有点不大理解，为什么大使的口头抗议说是传自总统，而 10 月 6 日补来的照会却又只字不提总统"。至于我们那个以为"总统"一词无误而不作复查的译电员，我对他说："这次算是上帝保佑你，下次可不能

这样干了。"

关于照会，我们向国务院提过一条建议，大意是，照会说到日本人在满洲国的垄断企业时，只应用来作为例证，而不要使人觉 266 得，正当国际联盟对日本实施《盟约》制裁条款之际，我们又来重新争论整个满洲问题；换言之，就是要讲清楚，我们只是担心在满洲发生过的一些事情可能会在华北重演。国务院说，它提到此点也纯全是举例的意思，准予修改，照会便在10月6日送去了。现在，这个照会已经成了具有世界意义的文件，因为有关各国都看到了，这次交涉，必然要在中国"门户开放"这个问题上摊牌。有几个同僚还对照会的内容啧啧称赞，认为措辞也很妙——是国务院草拟的，并不是我的手笔。和我们一样，英国人和法国人亦切盼早日答复，后来直到11月，才接到日方复照。

早在10月4日我就告诉过国务院，要有思想准备，日本人很可能在汉口陷落前先攻取广州。这当然就会卡断从香港把军需品运进中国的这条路。

10月间发生的事很多，我无暇在此逐日记述。和克雷吉谈过多次，我们之间一向保持着最密切的联系。除照常不断抗议日方轰炸和侵犯美国在华财产外，还在外务省进行过几次重要会谈。问题成堆，当解决的日子最后到来时，还会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又有个美国教堂被日本飞机炸了，据我们所知，那里和中国的任何军事目标都相距甚远，传教士奈胡斯的幼女菲比被炸死，菲比的母亲和姐姐受伤，这个奈胡斯事件，使我比往常更加悲愤；目击者叙述日军兽行的报道，不断传来，还有照片为证，复使我怒火中烧而又无可奈何。要不是这东京还有同样为此痛心的善良的日本人和我们在一起——他们也许更难受，因为这关系到他们本国和他们自己的体面——我们真会感到很难在这个职位上呆下去。有时我实在憋不住了，便向几个日本朋友倾吐积忿。他们一定以为我是受

了中国宣传的煽惑，未免夸大其词，因为他们自己无从得知实情。外国杂志如《读者文摘》之类，即使有寄到手的，其中如有犯禁的文章，审查官也会在投递前把这些文章全撕掉。他们只有亲自到外267 国去，或者找归国的日本人谈，否则就没有任何门路可以打听真相。而真相又是那么令人恶心。

向日方递交总统提出的各项问题

（口头声明的记录，交与近卫公爵）

1938 年 10 月 3 日

兹因须就合众国总统亲自关怀的一个问题略作商讨，特拜访兼摄外务大臣的近卫公爵阁下。

深知阁下多忙，故不欲以过多细节相扰，所谈拟只限于问题的梗概，其必述细节，将以照会形式详录，容后送交外务省。

要谈的问题，与日美邦交有关，以美国在华利益的境况为主。

这个总的问题，曾与前几任外相、特别是广田先生和宇垣将军谈过多次，他们都再三向我明确而肯切地保证：美国在华利益将受到尊重，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的原则将保持不变。

可是遗憾得很，美国政府不得不说，侵犯美国权益、包括违反门户开放原则的事仍不断发生，依然如故。

鉴于上述情况，合众国总统特要求日本政府迅即采取有效措施，改变下述局面，以履行其早已许下的维持门户开放和不侵犯美国权益的诺言。

1938 年 4 月 12 日，我曾请求外相保证，对歧视美国在华北贸易的那些金融措施，日本政府将不予赞助；外相虽声称日本政府将继续支持门户开放原则，但对我所提的抗议，迄未作具体的答复。

现在美国政府获悉，在青岛，日本当局实际上已在实行外汇管

制，擅自规定出口汇票要卖给横滨正金银行，否则不准货物出口，出口汇票又只能按远低于天津和上海公开市价的汇率出卖，否则该银行就拒绝收买。 268

烟台也在实行类似的措施。

美国政府不断听到这样的消息：不久还要在整个华北建立全面的外汇管制制度。

控制外汇交易，必然导致控制贸易和商业。外汇管制，不论直接或间接，一经强制实行，日本当局就可以任意破坏机会均等原则，阻挠日美两国在华北地区的自由竞争。

在这种情况下，华北从美国进口什么货物，向美国出口什么货物，以及由哪些商人来经营，都将完全听命于日本当局。

美国政府早已向日本政府指出，日本在中国占领区的行政当局所进行的并正式得到日本政府赞成的对中国关税率的改变，乃是专断的、非法的越权行为，对此日本政府不能辞其责。

无须多讲，只要管理贸易、征税或禁止贸易的最后决定权是直接间接由一个"外"国当局来行使，以牟其一己之利，在中国就无"门户开放"可言。

要在中国维持机会均等或"门户开放"，有一个基本的先决条件，那就是，在该国经济生活中，不得存在直接间接偏利于任何外国或其侨民的特惠和垄断权，看来这是不言而喻的。

7 月 4 日我曾对外相说，在中国开办特种公司或垄断企业，就可能会使美国贸易受到限制和阻碍，美国政府希望不要造成这种局面。外相慨然答应：中国"门户开放"将予保持，美国政府可以放心，日本政府将充分尊重机会均等的原则。

在远东，美国侨民和他们的利益，损失已经很重了，其所以如此，应直接归因于当前的日中冲突；美国对华贸易，即使在最好的条件下，也不能指望早日复兴。 269

因此，美国政府感到更难安于这样的现状：美国侨民还得对付日本在华当局对他们权利的层出不穷的无端侵犯，对付日方旨在使美国对华贸易丧失同等机会的行动和政策。

美国政府对待日本侨民及其贸易和企业，不仅总是遵照1911年《日美商约》的条文和精神，而且还总是以国际法和国际秩序的基本原则为依据，美国对待各国侨民及其权益的政策的基础就是由这些原则构成的；日本工商企业至今仍在美国享有机会均等。

阁下不能不承认，日本当局在中日两地给美国侨民及其工商企业的待遇与美国政府在其辖区内给日本侨民及企业的待遇，其间存在着巨大差别，而且日益悬殊。

鉴于方才论到的情势，总统特请日本政府履行其早已作过的一些保证。总统要求，为了维持门户开放和不干犯美国权益，日本政府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做到：

（1）撤销日本在其控制下的中国境内所强制实行的、直接间接歧视美国工商企业的外汇管制和其他歧视性的措施；

（2）取消势将剥夺美国国民在中国从事正当工商业的权利的一切垄断权和优先权，取消旨在为日本企业界在中国各地发展商业和经济建立全面优势的一切措施；

270 （3）停止日本在华当局对美国财产和其他权益的侵犯，包括诸如检查美国邮电、限制美国人的居留和旅行、限制美国贸易和航运等各种形式的干扰。

限制和侵犯美国在华权利的事例还多得很，我今天没有时间列举。不过有几桩我还是想特别提一下：日本军事当局正在设置种种障碍，阻止美国公民到中国内地旅行；在上海检查和干涉美国邮电；成立华中电信机关，公开宣称目的是要控制华中的通信事业；创办日本控制下的轮船公司，要独占上海一带的水运。

兹向阁下恳切呼吁，望以日美邦交为重，大施鼎力，使这许多

问题得到解决，两国关系如何，在很大程度上须依日本是否履行其多次明确作过的保证而定。

日本关上了开放之门

1938年12月5日

11月，我国同日本的关系不是有所改善，而是恰恰相反。在此以前，历届外相都向我们保证，中国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将予保持，美国权益将受到尊重；11月3日，政策却发生突变。这倒不是指实际政策，而是说官方口头上的政策变了。当广田、宇垣和直到10月3日为止的近卫公爵相继一贯向我明确保证要维持门户开放时，他们都是在或真或假地试图把不可调和的东西调和起来。他们的口头禅是："请忍耐一下，一切都会好的。"

有田说，作这些保证，并非欺诈，他的前任们只不过是徒劳地想调和原则与现实而已；他有田则不然，他晓得那是不可能的，倒不如直话直说。因此他不肯确认以前作过的保证。他向我表示的以及政府公开宣示的态度，不再是"请忍耐一下"了；现在讲的实际上是："东亚已出现新的形势；日本为自身战略上和经济上的安全计，必须支配中国的某些原料资源，控制某些工业上的机会。这些特定的东西，你们外国人不能再享有了。但是，在贸易、经济、金融等各个领域，都还留有很多机会，就这方面来说，门户依然是敞开的。请看，自满洲国成立后，你们和满洲的贸易倒有了飞跃的发展。"

据我看，日本政府的政策简而言之就是这样。但这还不是政府中极端分子、工商界和陆军的政策。他们是一心要把外国势力和外国贸易全部逐出中国，把中国变成日本独占的市场、日本经济和工业独霸的基地的。他们是这样一种人，既不懂经济规律在实

际上怎样起作用，也见不到，若无外国人合作和外国资本，要恢复和发挥中国给工商业提供的巨大潜力，日本连开个头也不行。等他们吃了亏，到后悔莫及之时，就会明白这个道理了。

在概括上述变化时，还有个小小的因素恐怕也要考虑在内，那就是，在此期间西方搞了慕尼黑协定，日军攻下了广州和汉口。

日本报刊经常指责美国和其他外国不懂得、不了解“东亚新秩序”。有田本人也对我抱怨道，美国报刊在这方面冥顽不灵，不理解日本所作的无意（完全无意）向外国对华贸易关上大门的保证（这话是 12 月 26 日讲的），我答道，日本政府的官腔，每次都要套上一些限定语，使人如堕五里雾中，摸不到日本政府的真意，他所谓的保证，不仅美国报刊，连美国政府、公众和我本人也感到很难评价。

作为实例，我只请他去看两段他交给我的一份文件，其中在讲 272 到留给外国工商业的机会时，限定性的词语就至少出现五条之多，如“某些工业”、“在既定计划范围内”、“一般说来”、“任何特别歧视”、“不应有的歧视”，等等。我说，我们当然要听其言而观其行，效果比表示意图的言词重要，何况言词外边还镶上那么多限制条件，使日方在作解释时完全可以随心所欲。外相也发觉此种情状确是荒唐，不禁哑然失笑，问我可否让他把我从他自己的备忘录中标出来的辞句抄下来。

目前我们面临的局势大致就是这样。首相正式宣称：“日本不拒绝与他国合作，亦不欲损害第三国的利益。这些国家若能理解日本的真意，并采取适合于新形势的政策，日本为东方和平计，亦不吝与之合作。”这些话真是莫测高深。何谓日本的真意？什么样的政策才算适合于新形势？象这样的官方声明，简直是儿戏。

在此期间，谣言四起，议论纷纷：或谓美英可能向蒋介石提供财政援助，或谓可能对日本采取经济措施。日本是那样对待我国

和我国在远东的利益，我也巴不得以牙还牙，但是，不管我个人多么想报复，对所谓采取经济措施，我还是一直不赞成，除非我们准备坚持到底而承受其必然结果，那也许就是战争，因为制裁总是含着刺激，终究不免一战。英国人——至少有一些英国人——相信，英美一实行经济制裁，日本很快就会屈服。我不同意这种论调。日本和日本人，我知之甚深。他们是一个不怕吃苦的民族，在历史上他们曾饱经忧患，对灾难已习以为常；"以死相拚"，就是他们的精神，其根深蒂固，几甚于其他任何民族。他们将勒紧肚带，一勒再勒都可以。他们能以稻米为生，必要时就靠稻米打仗。一旦大量储备物资告罄，石油、橡胶和其他军用必需品又被剥夺，也可能会使他们受到一些约束，但要迫使他们投降，还得花很长时间：我是这样看的。至于外国援助蒋介石，那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这并不需要官方出面，尽可以非正式地做而辅以官方支持。

11 月底以前的情况就是如此。

大战之年开始了

273

1939 年 1 月 31 日

1939 年在险象环生中开始了，形势之险恶，近代史上罕有甚于此者，因为以极权主义国家为一方，以民主国家为另一方，都在迅速摆出阵势，准备厮杀，很可能又酿成一次大战。这是危如累卵的一年，实无任何理由可以乐观。

12 月已预料到的内阁危机在 1 月 4 日爆发；近卫公爵辞职，枢密院议长平沼男爵组成新阁，除更换首相外，只有藏相池田和内相末次大将下台算是重要的变化。我们经过多方探索，得到的结论是：这次危机是集中在末次身上，他主张全国只成立一个政党，鼓吹按极权主义路线采取严厉措施，这些过激的观点，使他万难为

国会所容，但要单独排除他，又在政治上行不通。在日本，遇到这种情况，照例是采取折衷办法，末次的去职，也可以用这种成例来说明；要赶走这个极端分子，就必须同时弃掉那个人所共知的自由主义者。

除末次这个因素外，大家都知道，近卫公爵一向健康不佳，久欲卸却重担；拿下汉口和广州以前，发生内阁危机，就可能会产生心理上的不良影响，他不能冒这个险，但现在不同了，对华战事进展顺利，作此变更，估计不会引起严重反响。关于这次事件，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公众对中日之战已感到失望，人心确已松弛下来，为了提高国民的劲头，也需要更换一下领导人；简言之，需要"打打气"。平沼说，在一般政策上他将一仍旧贯。他一向总是被列为极端的国家主义者，但是据说，随着年事增高，他已经老练得多了，虽仍抱有极端分子的自恃心，但不一定就会奉行极端政策。有人甚至认为，他将设法与民主国家和解。留任原职的有田还保证说，事实也将会是那样。不管怎么说，眼下我还是看不出在这方面会有什么显著的变化。

274

美国大使和满洲国大使互访

1939年2月23日

里普利先生，信不信由你，我今天居然接待了正式按约来访的满洲国大使，五天后，我也如约正式回拜，戴大礼帽，穿晨礼服，一应俱全。不，读者诸君，美国并没有因此就承认了满洲国这个高尚的国家。这只不过是作为外交使团团长的我，尽自己的本分，承认一个被正式派到日本朝廷来的大使而已，确定其身分合格、可以正式成为外交使团成员的是日本朝廷，不是外交使团团长。阮先生殷殷致意——当然是讲汉语，由吴先生及时翻译——团长也一样

客气。我们畅谈天气和东京的美景，详尽无比。又谈到猎捕满洲长毛虎，这时才碰到一个真正的难题，引起了激烈的辩论。不过，话得讲明，我们两个使馆之间没有交换过任何照会、柬帖或别的正式文件，也不是将要有这种关系，送过的文件都标有“外交使团团长”的衔头，都是属于外交使团而由外交使团发出的，也是为外交使团的事而发出的，决非出自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或人民。

斋藤大使的骨灰引起外交问题

1939 年 4 月 3 日

希特勒撕下了假面具。什么他只是要收回原来属于他的东西（别国住有德国人少数民族的地区），什么他在欧洲不再有领土要求，他都不说了，这个国际强盗已不再用这些诺言来诓骗曾经相信过他的世人了；假面具已经扔掉，全凭大炮威胁，他侵吞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这个国家的成立，我国曾在巴黎和会上帮过忙。匈牙利实际上已成为附庸；罗马尼亚垂危；梅梅尔被兼并；波兰受到威胁；立陶宛、丹麦、荷兰、比利时眼看就要遭殃。是不是还要在亚得里亚海域夺取一个港口？这是否也只是个时间问题？不，我不相信墨索里尼会欣然同意。而英国这个恬然昏睡的老狮子，现在也好象终于有点不安而动起来了，上月底，居然现了一下怒相，轻吼了一两声。别碰那根骨头（波兰）。①

在此期间，我被一个问题缠住，这是我到日本以来碰到的最烦难的问题之一：美舰“阿斯托里亚号”载着已故大使斋藤的骨灰即将到达日本，要为此安排程序。

① 德国吞并整个捷克斯洛伐克（1939 年 3 月 15 日）后，英国政府的对德政策表面上突转强硬。1939 年 3 月 31 日，英国向波兰提出保证：波兰的独立若受到威胁，英国即给予援助。——译者

我国政府建议采取这样的做法是前所未有的(据我所知，确是前所未有，因为斋藤是在卸任后死的)，当我将此意向日本政府转达、日方表示接受和感激时，我只是被告知，“阿斯托里亚号”可在横滨停留九天，自4月17至26日。此间却立刻就有反应，而且照例是政治性的。日本人将此举解释为具有深刻的政治意义，反响随之而起，感情上政治上都很强烈。朝野上下都以为日美关系已翻开新的一页，亲美热潮席卷全国；热情且化为决心，一定要用具体行动来表达日本的谢忱。游艺、宴会、午宴、招待会、广播、游园会、观光旅行等节目都订出来了。

就在这个时刻——确切地说，3月26日——我们接到了国务院的首次告戒，要我们谨慎。这次告戒显然是由一篇发至美国的新闻专电引起的，那条消息说，有二十串珍珠项链要送给“阿斯托里亚号”军官们的太太，大使馆已经收下了。实情是这样的：有个大阪珠宝商跑到东京来，拿项链交给我们的海军武官比米斯上校，声称这是对美国政府的义举聊表谢忱，还说，愧不能拿出六百条来，让“阿斯托里亚号”船员每人都可以得到。在日本，要是拒绝这样的馈赠，就会被目为大不恭敬，而且送礼者又须立刻赶回大阪，于是比米斯上校便说，他可以把项链暂时保存在他的保险箱里，待与“阿斯托里亚号”舰长特纳商量后再说——海军条例并没有禁止收受这类礼物的规定。

但比米斯并没有收下项链；他讲得很清楚，只是暂为保管而已。我们不相信特纳舰长会收这种礼，当时的想法是，可以等他来了以后，再把项链悄悄地退回去，这要比断然拒绝好一些，不致使人太难堪。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这种事也会变成宣传材料。不料那个珠宝商却向报界讲了此事，这就很清楚了，不管他送礼时是何心情，事实上他是在借此机会替他自己和他的商店做广告。我们便赶紧派了一个海军译员到大阪去退项链，他退掉了，这段插曲算是

到此结束。

可是，一波甫平，一波又起。亲善感激之情，既热烈，又广泛，竟至酿成要开群众大会来表示谢意。一百一十七个知名的国会议员和其他人士组成一个委员会，以年老的金子伯爵为主席（他久负盛誉，号称美国的挚友，虽然根据1932年的惨痛经验，我知道他根本就不是什么朋友），精心筹划，要大搞演奏国歌、挥舞国旗、组织学生队伍、发表演说等活动，再继之以表演柔术和其他日式武术，下午还要同"阿斯托里亚号"船员举行大型田径赛或打棒球。我立即感到，这样的集会，肯定不符合我国力戒大肆宣扬之意，亦违背"阿斯托里亚号"来访的本旨，这样大吹大擂，将会使美国人民十分恼火，他们定会有这样的反应："空话少说，用行动来表示你们的谢意吧。"

因此我就赶紧处理，同时也充分认识到，这种新局面必须应付得巧妙，得给日本人垫上某种缓冲器，泄掉他们郁结在心中的情感。否则就只会引起气恼和怨恨，我们的义举所产生的积极效果就会再度遭到损害。自不免要打许多次电话，开许多会，但我至少做到了推迟委员会的叶山之行，他们就要去那里把计划告知金子伯爵了。

在一次与吉泽在大使馆餐夜商谈并有杜曼参加的会上，我们暂时接受了一个折衷方案：举行一场不加渲染的运动会，只由金子一人致辞，特纳舰长略致答辞。第二天早晨（那是个星期天），便把委员会的几个人硬从床上拉起来，在使馆开了一个会，我对他们说：这回遇到的是一件严肃的事，任何招摇性的举动都应当避免，大肆宣传，就会使美国政府和人民觉得此间误解了他们的一番好意，请千万不要那样做。这次会是在我彻夜未眠之后开的，那晚我通盘考虑了这个问题，5点钟起来后也一直在忙。委员会成员，至少有些成员，听了我的话以后显然有所感动；植原是日本最有才干

277

的法学家之一，他明白了此中道理，向我保证，定要再开一次会，传达我的意见，提出修改方案，然后送给我看，在此以前，不采取进一步行动。这下子便至少延缓了委员会的叶山之行，他们正是要在星期日清晨去向金子伯爵报告原定的计划，我之所以把他们从床上拉起来开会，缘故就在这里。

这是今天——4月3日——的情况。明天我还要去找日方接待委员会的主席泽田，私下"非正式地"把整个问题在他面前摊开来，我想，要制止这次运动，有些话恐怕就得开门见山地讲。我愈加确信，即使只举行"一场只有一个人致词的不事张扬的运动会"，或任何一种群众集会，也会损害我们当初的好意。执国旗、唱国歌、游行等场面照例是会有的，这些情节定将出现在美国报上，还是会给人以政治上大事宣扬的印象。只要在这里不致太得罪人，所有这一套我都要尽力阻止。最低限度也要使其一切从简——挥舞国旗、学生游行等一概免掉，除金子伯爵致词、特纳舰长略致答词外，不再有什么演说，若要我允许"阿斯托里亚号"官兵赴会，就得给我明确保证，一定要做到这几点。事关重大；我国政府以美国巡洋舰送回斋藤遗骸这样的举动，我只希望能产生好结果——在日本和在国内结果都一样好——在这点上我实处于两难境地。这个问题是不容易对付。不过我总觉得，日本人要对我们的义举表示谢意，至少要按照上述精神来做，用别的精神都是事与愿违的。

斋藤大使的骨灰运抵日本

1939年4月17日

278 今天是个重大的日子，场面动人，充满深情，艾丽斯和我都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天。我们使馆下半旗致哀。"阿斯托里亚号"载着已故大使斋藤的骨灰来到了，1时半，在横滨山下码头举行接灵

礼。汽艇准时驶离"阿斯托里亚号"，该舰和近旁的日本巡洋舰上礼炮齐鸣。(昨天艾丽斯去看过斋藤夫人；夫人真是了不起，这两日尽管悲痛，她却能够自持，始终是那样温雅肃穆，实在是值得敬佩。)

当美国水兵将装着骨灰瓮的日式灵柩抬上岸时，我们全体排队随行，来到设在码头上的灵堂。堂前礼仪，一言以蔽之，备极庄重，互致十分感人的演词后，接待委员会主席方从"阿斯托里亚号"舰长特纳手里接过骨灰。众人随即进至灵前，依次鞠躬，然后排成送殡队伍，由美日两方水兵组成仪仗队，日本乐队奏着出殡进行曲，经过列满人群的横滨街道，向停在另一个码头上的丧车行进。

总统送的花圈排在前头，外务大臣的随后，再次是我的，美方的花圈自然是由美国水兵抬着。美侨按我的提议，由赖夫斯奈德主教、迪克·安德鲁斯和伊格尔哈特博士这三位旅居日本最久者作代表。比米斯上校充当我的随员。场面之庄严，周密安排的程序中每个步骤之一丝不乱，皆令人叹为观止。

艾丽斯和我乘丧车随至东京，外务大臣及其他高级官员齐集在东京车站迎候。此后日方人士即随柩车赴斋藤家参加祭典，我们则觉得最好还是不要去搅扰人家的私事，遂在此处离开送殡行列。刚才有件事很有意思：供坛上特别摆了一瓶老帕尔牌威士忌酒，那是斋藤最喜欢的牌子，有照片为证，香炉里还点上三支他爱吸的香烟。在美国人眼中，这似乎是旁门左道，但在日本看来，这却是最虔诚、最合式的祭奠。按神道教教规，祭坛上应陈列食品，供死者享用，死者如爱喝威士忌酒，就要想尽办法让他得到。

艾丽斯和我，偕同比米斯和我国驻横滨领事博伊斯及其夫人，279
在"阿斯托里亚号"上与特纳舰长安静地共进晚餐。

总统寄信给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我真想打个电报告诉他："做

一个美国人，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感到自豪。”总统的信息不一定有效，但我觉得，在当前危机中，应该最充分地发挥美国在道义上的影响力。要是 1914 年我们能这样做，那次世界大战说不定可以避免。现在若能这样做，想来还是可以防止战争。凶兆就在眼前，希特勒可以卜算，如果他会算的话。不过我不相信他会算。

1939 年 4 月 18 日

我让使馆再下半旗一天。丧仪在宏大的本愿寺举行，比以往任何祭礼都壮观。日本最高层人士全部莅临。首先由大僧正诵经，然后有田、我和堀田（斋藤的朋友和同期同学）依次走到灵前致悼词。有田的悼词文情并茂，他本人也激动得声音发颤（其实我又何尝不是这样）。末尾他念道：

> 春回大地，万象更新。君却一去不可复还。语君不能闻君言，视君不能见君容。感念及此，悲痛满怀。哀思无限，非可言宣。祭此数语，敬祈来闻！

接着便是众人挨次烧香，第一个是作为斋藤法定继承人的十三岁的长女，以下是他的母亲、遗孀和幼女，再次即到有田、艾丽斯和我，一直轮下去。我们没有去墓地，也是因为不便去搅扰别人的家事。斋藤夫人的伯父岩永取了一些骨灰去，要埋在他们家族的地上。我所见过的最感人的丧礼到此结束。自“阿斯托里亚号”到达之时起整套仪式之庄重严谨，确是令人难忘。

特纳舰长偕其僚属来访。

宴请特纳舰长。艾丽斯是座间唯一的女性，她当女主人，给了我很大帮助。事后出渊说，我连陆军大臣也请了，真是“妙策”。我是最后灵机一动才想到请他的。外务大臣、宫内大臣、陆军大臣、海军大臣同时坐在一个外国人家里，这在日本恐怕还是破天荒第一遭。

艾丽斯备办了一席有甲鱼的美膳；我的各种好酒都端出来了，的确是佳肴美酒，可与一切盛宴相比而无愧色。大家的兴致都很高。我举杯敬祝天皇健康，有田以遥祝总统作答；在接待“阿斯托里亚号”期间，恐怕就只有这次宴会没有人演说了；对日本人说来，正式宴会而无演讲，那是不可想象的，但美国大使馆也就是美国地界，而且这一夜是我当独裁者。不过我们还是得屈服于摄影记者，这方面的压力实在太大了；得罪报界，没有什么必要。不管怎样，使馆里的场面总算得上是够漂亮的：凉廊桌上樱枝吐艳，餐桌上则小菊竞芳——宾客分坐两桌，每桌十八人。筵间诸事井然有序而又毫无官场的拘谨气氛，大使馆及这次宴会，确实值得夸耀。当然，和往常一样，这都要归功于艾丽斯。我对有田说，家庭主妇在男子宴会上出头露面，在日本恐怕不多见吧，不料他竟答道，正相反，这是常有的事。在我们这种稳重的年纪，这个风俗是很好的。

1939 年 4 月 19 日

外相设午宴招待特纳舰长及其属员。餐后坐在草坪上，大家讲故事，新闻记者便乘机给有田、特纳和我合摄了一张很好的照片，登在报上，加上“日美间的微笑”这样一个标题。

晚上，海军大臣米内大将在水交社① 大排筵席，以富士山、日光的寺院等最好的风景照片分赠舰长、“阿斯托里亚号”军官餐室和准尉食堂。送给军官餐室的那一张旋即挂在该室显眼的地方，25 日舰长举行告别宴会时已经挂在那里了。水交社的这次宴会，餐后还有美女玩杂耍和日本舞蹈等精彩节目。海军军官总是比陆军界人士善于交际，这大概是因为他们常在国外游历的缘故。席上的气氛亦极为欢畅。

餐后米内大将把杜曼拉到一边(海相的英语不甚流利)，请他

① 即海军俱乐部。——译者

转告我：我曾担心日本有卷入欧洲纷争的可能，他已经注意到了，281 他想告诉我，不必多虑，因为"日本的政策是确定了的。国内图谋实行法西斯主义因而与德意结盟的势力已经'受到抑制'。"海相说，为了保持亲睦，无论民主国家或独裁国家，日本都要与之合作，但又必须置身于这两个集团之外，日本有它自己的思想体系，和两者都不同。

我们后来向吉泽重述了这次谈话，他说，暂不与德意结盟的决定，想必是刚作出的，因为以前他没有听说过。海相请转告我的那番表白，可以视为一个明确的迹象，表明日本不欲卷入欧洲漩涡，吉泽知道，在这个重大问题上，海军的意见举足轻重，但是我们也不要以为反共协定就再也不会加强了。

在谈话中，米内大将又说，他们正深切感到，需要同美国恢复友好关系。当他被告知，两国之间的纠葛——例如轰炸我们在中国的财产——并不难解决时，他答道，这类侵犯美国权益的事他都知道，将会采取有效措施加以纠正，现在正在调查。

海相又转到限制海军军备的问题，为目前尚不可能实行限制而海军又是"危险的玩具"表示遗憾；海军的需求总是越来越多，结果只能造成财政破产，或引起一场大爆炸，因此终归要达成协议才行。他反复地说："一定要裁军"。

这是我们之间最重要最有深意的一次谈话，我认为它标志着日美关系已出现新的趋向，甚至可以视之为日美关系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因为米内是可以信赖的。

日本离开轴心国的航道

1939 年 5 月 15 日

到启航返美休假为止，5 月上半月的大事，是尽力阻止日本与

德意全面结盟。到出发时，这方面的努力已见成效，我已得到明确的正式保证：不会有全面的联盟，虽将有某种安排，那也只是强化反共协定，其适用范围仅限于苏俄。但是，我很了解，有人仍将对 282 政府继续施加压力，假如英国与苏俄缔盟，政府就将被迫参加极权主义国家的联盟，要不就是倒台，而由南将军、木户侯爵或米内海相取代平沼；这都不是不可能的。不过，若由米内组阁，则仍意味着不致参加独裁国家的联盟。

我觉得，日本目前的政局，火药味很浓，新的暗杀事件可能发生，即使不是很可能发生。在中国的战事，看不见议和的前景，国民感到厌倦，希望有具体的效果，而收效却遥遥无期。这决不是说，日本正在软下来；恰恰相反，一切都证明它是决心干到底的，而且也没有什么即将发生财政或经济危机的迹象。但是，由于得不到最后结果而了结“支那事变”，怨气是很大的。人心很不安定。

我和日本上下层人士谈话——我有充分证据，可以肯定，我的论点已为首脑人物所注意——都是按这样的意旨讲：欧洲若爆发全面战争，美国决不能置身事外，这几乎是注定了的；必然会发生激怒美国人民的事件，历史已经证明，美国人是世界上最易激动的民族之一。到那时，和平主义者和孤立主义者也会站在战争支持者的最前列——至少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会这样做。要是德国轰炸伦敦和巴黎而炸死很多平民，只此一端，亦足以使美国人民大为激动。即使德国和意大利在开战后几周内即席卷欧洲，美国的决心和无穷的资源最后亦将赢得胜利，绝对有把握，就象 1918 年那样。那时，假如日本因全面军事同盟的关系而被绑在德国阵营内，要美国仍与日本和平相处，那就几乎是不可能的了。

因此，日本应当看到未来，为它自身着想而择定朋友。由于对华战事造成的一些困难，日美关系暂处于紧张状态，但困难终究是可以克服的，日本应当着眼于长远利益，不要只顾目前。无论从哪 283

方面来看——经济、财政、商业、感情——美国都较适于做日本的朋友，为世界各国所不及，如果日本也遵守交友之道的话。打一场日美战争，不管从什么观点来看，都是愚蠢之极。再看另一面吧，德国和意大利能给日本什么好处？跟它们做朋友，到底能得到什么实惠？这些利害得失，都值得趁早好好想一想。

以上论点，正如我刚才说的，看来已经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思考。我有理由相信，这些话天皇亦有所闻，一些高级人士已在鼓动，希望考虑我的意见。有些人，包括采取主动态度的海相在内，则谈到我的"忧虑"，劝我不用再担心，因为形势的发展，终将如我所期。

这样，我们就离开日本了，要去度几个月假，心里感到，不管最后结果如何，为了把日美关系引上正轨，至少已经尽了人事，这毕竟是我的本职工作。

因返美休假五个月，日记在此中断。

五、一个世界，两场战争

（1939 年 10 月 10 日—1941 年 12 月 8 日）

欧洲战争爆发后的头几个月，所有日本人都惶惶不安。不是害怕德国就是害怕俄国。有些人曾重整旗鼓，力图弥缝日美之间的裂痕，但是，与美国达成谅解的一切希望都暗淡下去了。法国崩溃后，局势愈无法改变。同美国的关系一天坏似一天。英国似已濒于失败。南面的法属印度支那和荷属东印度群岛处于无防御状态，虽守中立但仍加紧扩军备战的俄国却日益关注着东方。于是日本人便决定暂时专心致力于向南扩张，惟恐落在德国人的后头。1940 年 9 月底，日本作为正式伙伴加入了轴心国集团。此举有两个主要目的。一是促进向南扩张。一是以此警告美国：美国如向德国开战，亦将成为美日之战。美国没有被吓倒，依旧保持其坚定的立场，反对日本在远东的侵略。这样，两国就终于不免一战，日本遂袭击珍珠港。

287

危险期开始

1939年10月10日

重新拿起工作，已有充分准备。感到身体很好，渴望再度投入工作。

乘"龙田丸"返日，据船长说，这次航行，是他在太平洋上遇到过的最平稳的一次，最后那几天，大海更平静得和内湖一样。

大使馆显得比往常更漂亮，当然有人赠送鲜花，到处都摆满了。忠实的使馆人员在门前笑脸相迎。艾丽斯做的头一件事是打电话给波兰大使夫人德罗默太太，请求前去看她；夫人说，她近来一直没有会客，但艾丽斯又当别论，她显然有点激动。我也打电话给波兰大使，对他说；在所有同僚中，我要先拜望他。

波兰大使发现日本有反德情绪

1939年10月12日

告诉了波兰大使德罗默先生我要最先拜望他之后，便在今天早上去了，向他力表同情之心。[1]他显然很感动。他说，美国政府承认波兰新政府[2]，这个行动对他在这里很有帮助，因为日本人在对苏关系上有困难，正不知如何对待他才好，如今美国既有所行动，他就可以说服他们继续承认他这个大使而不必再有顾虑。

大使说，日本人至今还记得我在春天离日返美前所表示的意见，即一旦欧战爆发，美国几乎肯定会被卷入，他们不知道我现在

---

① 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对波兰发动了侵略战争，9月29日吞并了波兰。——译者

② 指波兰在伦敦成立的流亡政府。——译者

是否仍旧这样看。我答道，这次归国，我才认识到，有一种强烈的、还几乎是普遍的不愿参战的决心，与1917年所见到的态度迥然不同，尽管还会发生许多难以逆料的事，但我现在觉得，我国不参战的可能性是大大增加了。德罗默先生说，他认为，春天我向许多日本要人发表的议论曾对阻止日本与德国缔结军事同盟起过显著作用。日本人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渴望与美国友好。他说，除为数相当少的一派人而外，日本人现在有强烈的反德情绪。 288

"根据直接听来的材料"发表的演说

1939年10月15日

整天准备即将在美日协会发表的演说。在新罕布什尔山里老家几个星期的沉思中，已决定作这次演说，欣幸的是，总统和国务院也都赞成这个主意。此事做起来颇感棘手。远东司已拟了一个初稿，我在华盛顿时又加以补充，回程中又几乎每天都在修改。可是现在我发现，现内阁及其支持者平沼和近卫公爵显然是真想同美国改善关系，发表原拟的那种演说，就会使他们为难，这未免太短视了。我现在深信，找团体和个人作非正式的谈话，效果倒会好得多。因此我必须在左右两难之间走中庸之道，既不要让人低估了美国政府和人民对日军在中国的行为的愤懑，又要尽量避免使用爆炸性的言词或把演说变成"诉状"，越过日本政府而径直诉诸国民。

我很理解，要是日本大使在华盛顿这样做，我们的政府也是会恼火的。我讲话的语气很重要。现在需要的是斩钉截铁地讲实情——呼吁停止轰炸、侮辱、限制贸易和其他具体的侵犯美国权益的行为。可是大原则也不能忽略。现在拟的稿子，使馆人员都觉得很得体，我也有同感。难免会引起一些不愉快的反响，但真会触

犯人的话是极少的。究竟如何，以后自见分晓。幸喜国务院已给我来电，英明极了，向我示意：我可能会发现日本另有倾向，这样，289 就不宜再用原稿，若因此而使我个人已有的影响力受到损害，那就不好了。虽然原来提出要作这次演讲的是我自己，但国务院的来电仍使我有如释重负之感。

“直接听来的”

（摘自1939年10月19日在美日协会的讲话）

英语中有个成语——“直接来自马口”[2]。为什么单挑这种动物来作比喻，我一点也不知道，尤其是因为马大都是不大爱传送感情的。不过意思还是一清二楚的。今后几个月我在日本讲的话就是“直接来自马口”，因为这些话将准确地表述和阐释当前美国政府和人民对日本和远东的一些看法。在归国期间，我还有幸同总统及国务卿商谈过多次。

5月间赴美前，有个日本朋友曾请我把他所想象的日美关系的现状转告我在美国的朋友，其大意如下：

由于日本的军事行动，美国在华权益正受到一些轻微的无关紧要的干扰；日军当局总是想尽办法预防干扰美国的利益；美国发表的有关日军损害美国在华利益的报道都是故意夸大其词，目的是要煽起美国人民的反日情绪；日方有些行动之所以遭到美国人反对，多半是由于风俗习惯不同、语言不同，由于美国墨守法规的态度；美国政府对中国日占区内美国权益受损之所以持那种态度，主要还是导源于美国国内的政局；中国日占区的情况在最近的将来即可好转，将使美国再也无从埋怨。这就是我那位日本朋友的观点。

---

① straight from the horse's mouth，意为“直接听来的”。——译者

唉，真实情况远远不是这样！美国政府对真相了解得很准确。美国人民也知道得很清楚，为今后的日美关系计，必须正视这些事实。只有考虑到这些事实，才能了解目前美国政府和人民的对日态度；只有考虑到这些事实，并采取有效步骤去改变这些事实，才能改善日美关系。日美关系必须改善。 290

今天讲这些，并不是想详述引起我国反感的各种原因。这里不是列举详情的地方。那些事实，我们两国间的那些纠葛，乃是要由两国政府去考虑的事；实际上，其中有一些，也就是两年来我一直在和日本政府讨论的问题，而且还要继续交涉。但我相信，那些事实和困难问题，你们也一定知道一个轮廓。有些问题是严重的。

此刻，在座的可能有许多人这么想："每种情景，都有两面；我们在日本，也有我们的舆论需要加以考虑。"不错，正如我说过的，我在美国时，就曾将日本的观点的各个方面尽量告诉大家。但在日本这里，我也要尽力说明美国的观点。不细心考虑双方的观点，要建立友好关系，必然徒劳无功。愿你们都能体会到，我是多么热烈地希望达到这个最希望达到的目标，多么深切地、纯客观地愿意为获致成果而尽一份力量。因此就得让我来消除一些我认为今天存在于日本的纯属虚妄的对美国态度的错误看法。

错误看法之一是，美国处理东亚事务的方法是囿于一种纯属"墨守法规的"态度，这是当今日本广泛流行的看法。何谓"墨守法规的"态度？假如是指尊重条约、尊重正式承担的义务和国际法，那就说对了；尊重这些，正是、并将永远是美国政策的基本原则之一。但我在日本听到的常用的"墨守法规的态度"一词，似乎是指一种见树不见林、不能高瞻远瞩的立场。那就让我简略地谈一谈决定美国政策和目标的几个基本原则吧，这些政策和目标是为适应现代生活的需要而制定的，的确主要是以"守法"的应世态度为基础的，但是据我看，却又远远超越了纯粹"墨守法规的"态度。

美国人民渴望同所有国家保持和平关系，也希望各国之间都保持和平关系。这种和平愿望不是我们独有的，但我们有一个非 291 常明确的信念，即：在整个历史上，仅仅是作为两次战争间的一个插曲的那种和平，并不是能够稳步发展世界文明的环境，甚或连保存文明 不行。我们相信的是，要依照我们国务卿所谓的"适当程序"来处理国际问题，才能维持国际和平。

美国人民要求尊重别国人民的主权权利，也希望自己的主权权利同样受到尊重。我们凭经验得知，解决国际纠纷的有效办法，与其说是在于仅仅放弃使用武力，倒不如说是在于断绝一切立即或终将使用武力的念头。请那些好讥诮人的人好好想一想，恃要挟为处理国际关系的方法，会带来什么后果！使全人类共有的良知良能得到明智而实际的运用，是纯粹的"墨守法规"吗？

美国人民认为，可以把战争的影响限制于交战国之间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当国民经济还是以农业和手工业为基础时，各国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自给自足；它们主要是靠自己种植或制造的产品过活。今天的情形就不是这样了。现在各国要获得自己不出产的商品，要卖掉剩余的产品，都日益有赖于他国。由于各国都自有其特产，能够比他国更有效地或更经济地在地上种出或制造出某些物品，遂逐渐形成了极其复杂的商品交换制度。各国都为共同利益献出自己的工艺成果和自然资源。

正是这种交换制度，它不仅提高了各地的生活水平，而且使那些在简单的自给经济时一个人也难过日子的地方变成可供两人甚至三人过舒适的生活。使易于失调的、复杂的世界经济保持平衡，不仅和我们高级文明的利害有关，而且是我们大多数人的根本生存之所系。战争不但破坏交战国的人力和物质财富，而且干扰世界经济的妥善调节。因此，一些国家之间的战争，就成了所有其他国家利害攸关的事情。那么，即使单为世界经济着想，以适当程序

解决国际纠纷，我们自己身体力行，也力劝别人照做，这样的“墨守法规的”思想，又有什么悬谬可笑呢？不以法律和秩序为基础，国 292 际交往中的这些观念又怎么能够树立呢？

美国人民信奉商业机会均等的原则。从来不曾实行过这个原则的国家，恐怕是没有的。甚至把美国坚持门户开放称为所谓“墨守法规”态度的最主要表现的日本——我是说甚至日本——也曾坚决主张在中国以外的地区实行门户开放，并曾得到过好处，我们只是被告知，这个原则不适用于中国，除非经过修剪和阉割。我刚才说的那个极其复杂的世界经济体制，有一个基本要求，那就是，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各国能够随意在各地做买卖——如果有人要在某些地区专为一个国家的国民索取先买权并维护这种特权，这些地区便不可能有自由竞争的条件。

不用说，我刚才表述的思想，是普遍适用的。

还有一个时常听到的错误看法，我也不得不提一下，那就是，指责美国政府和人民不了解“东亚新秩序”。对不起，关于这个概念，我想提一点不同的意见，请大家指教。何谓“东亚新秩序”，美国政府和人民是一清二楚的，决不比日本了解得差。日本官方曾给“东亚新秩序”下了一个定义，叫做安全、稳定和进步的秩序。美国政府和人民不仅切望自己享有，而且切望世界各地区的一切国家都享有安全、稳定和进步。但是，东亚新秩序的含义之一，却好象是要剥夺美国人在中国的久已被确认的权利，这是美国人民要反对的。

有事实为证。对日军今天在中国的那些做法及其似欲达到的目的，美国人民已愤慨到什么程度，你们当中有许多人很可能还不知道。这样讲，决不是说美国人民已经忘记了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长期友谊。但对日军在中国滥施轰炸，美国人民确是深感震惊，这不仅是基于人道，也是因为随着美国公民被炸死炸伤，美国人的 293

生命财产正受着直接威胁；对在华日军侵犯和损害美国权益，他们愈来愈看得很严重，认为是蔑视美日两国所订的条约和协定，蔑视有日本参加的多边条约和协定。美国人民知道，那些条约和协定是日本自愿签订的，条约和协定中的条款构成一套实际的安排，是用来维护——为了大家的利益——国家主权和经济机会均等这两项互相关联的原则的。

经济机会均等，乃是日本长期以来多次明确赞成并一再坚持过的一项原则。美国人民还不仅是因其机会均等和待遇公平等久经确认的权利横遭剥夺而感到不安，他们觉得，远东目前这种倾向如果继续下去，就会使他们衷心怀抱的建立一个有秩序的世界的希望归于破灭。由于日本驻华当局的政策和行动，美国在中国的权益正在被削减或消灭。美国的财产正在遭到损坏或摧毁；美国侨民正在遭受危险，受到侮辱。假如我认为今天适于把全部事实都一一摆出来，你们就一定会感觉到美国的态度是正确的，是有充足理由的。今天我为什么要克制自己，大概你们也明白。

总而言之，美国人民根据他们得到的一切绝对可靠的证据，有充分理由相信，日本是在为一己之利而力图控制亚洲大陆的广大地区，并在这些地区内强行一种排外的经济制度。正是这个看法，加上轰炸、侮辱以及种种侵犯美国权利的行为所产生的影响，形成了今天美国人民的对日态度。至于我自己，也会这样说。日本当局已做和正在做的许多伤害美国的事，都是完全不必要的：这是我的信念，也是美国政府和人民的信念。我们相信，不违犯美国的任何权利，也能够获致远东的真正安全和稳定。

294 以上就是我力求给予准确说明的美国舆论，我在回国期间曾对它作过很仔细的研究和分析。我们两国间的传统友谊太宝贵了，有意无意的损伤，都不能容许。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经济、财政、商业、企业界的利益、旅游、科学、文化、感情——日本和

美国都应该永做互相体谅的朋友。国际大家庭中，就跟兄弟二人或众兄弟之间一样，总难免发生争吵，但在困难时节，美国也曾再三对日本表示过真诚的同情，深愿对它有所帮助，对日本的成就，则表示赞赏，对结成互助的关系，亦曾寄予热切的希望。

我今天讲得极其坦率，请不要误解或曲解我的动机。我之所以抱此态度，首先是因为我爱我的国家，忠于我国的利益，但也是因为我深爱日本，并且确信，两国的真正利益，即根本的和永久的利益，要求我们在交往中思想和行动都应该协调。那些知道我对日本有感情——这是和你们在此间相处七年、在愉快的交往中培养起来的——的人，一定能看到，我的言行是一个挚友的言行。

我刚从美国回来时，有家日本报纸曾表示怀疑，不知我怀里藏的是匕首还是鸽子。让我来回答这个疑问吧。除了期望为日美友谊全心、全意、全力地工作而外，我怀中别无藏物。

今天我摆了一些事实，单刀直入，如实反映。但我也是在恳求，为我们两大民族悠久长远的友谊计，彼此要有善意的了解。值此乱世，但愿现在以至长久的未来，邦交均能稳定，这种关系如能保持下去，对日本，对美利坚合众国，都只有好处。

一次有历史意义的演说的背景

1939 年 10 月 19 日

下面是我回东京后给杜曼、克雷斯韦尔和史密斯-赫顿的备忘录，其中叙述了这次演说的背景：

> 我回国期间，美国公众的反日舆论日益强硬。几乎普遍赞成废除 1911 年《商约》，几乎普遍要求冬天即对日本实行禁运。政府目前的态度是，不容许美国权益被排挤出中国。假如美国实行禁运而受到日本的报复，我国政府亦很可能会作

某种形式的反报复。

我曾指出过，一旦采取制裁政策，就必须贯彻到底，而贯彻下去，又很可能终将导致战争。可是政府现在的态度或国民的态度，都没有任何软弱的迹象。总统和国务卿似已下了决心，要撑持我们在远东的地位。海军秋季演习定在夏威夷水域举行。有增派美国海军陆战队赴上海之说，但就在我离华盛顿前，此事已决定缓议。不过，无可怀疑，如果在华日军继续侵害美国人和美国权益，如果他们步步进逼，定要将美国势力逐出中国，我国政府就会采取报复措施，后果在所不计，绝大多数美国国民亦将支持政府。“卷起帐篷，体面地退出势难防守的阵地吧”这样的高论现在很少听见了。我们在远东的地位，正被视为我们在整个世界事务中的地位的一个重要部分，而决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

想到美国政府和人民的这种态度，我们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把日本政府同日本军部区别开来而一心信赖其善意和努力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身在大使馆的人，一向总是以适当奉行慎于言行而不要激怒军部这样一种政策为职志。如今美国政府和人民的态度既如此坚定，我认为现在的上策就应该是将这种态度谨慎地告知日本政府和人民，以免他们总是以为(至少在我5月离日以前普遍是这样看的)，到最后美国还是会让步。现在我不认为我们会退让了，我觉得大使馆现在应该致力于使这种实情逐渐渗透到日本人的意识中去。让日本人老停留在那种误解上，有百害而无一利。不过，执行大使馆的这些任务时，仍须慎重。

今年夏天，国务院已认真考虑再写一份强硬的照会给日本，但杜曼先生劝他们不要这样做，我支持他，理由是这种照会于实无补，只会激怒军部，况且，我们的立场早已充分记录

在案，无须再作补充。不过，我又主张，还是应该做点工作，把在华日军侵犯美国人和美国权利的事实摆在日本人民的面前。

据我了解，那些事实，甚至有影响的日本人也不是个个都知道，因此他们总是觉得，美国之所以反对日本和日本的政策，反对“东亚新秩序”，一方面是由于硬要死守那些在他们看来已属陈腐的法律细节，另方面则是由于一贯同情中国。要想由有影响的日本人出来发起一个制止军部排挤美国在华利益的运动（我想到枢密院议员之类，他们该是有影响的），首先必须让他们知道美国政府和国民的坚决态度以及这种态度所依据的事实。那样的误解存在一天，我们就很难指望他们为改善关系采取建设性的步骤。他们能否采取建设性步骤或有效步骤以约束军部，固然值得怀疑，但我们不能因此就不去做我们迫切需要做的事。

在说明我们的态度时一定不能用威胁的口吻。对日本人施加威胁，只会加强他们的决心。美国政府和人民的态度，只能作为一个明显的事实摆出来，事实俱在，所以日本制定政策时应该给以充分考虑。

因此我认为——总统和国务卿也同意——我回东京后对美日协会作首次演讲时，应当尽力把美国的真实感情及其所依据的事实向日本人讲清楚。我只不过是报告我过去四个月在美国观察到的情况，这样就会使这次演讲格外有力，我觉得应当充分利用这个机会。这种有利条件，以后的演说不会再有了。我的想法是，以尽量友好的态度陈述国务院原想在那份拟写而终于未写的照会中提出的观点。美日协会大概是我们仅有的讲台了。我的演说定会引起相当广泛的讨论，即使只有《日本广告报》登载，也将会引起日本朝野许多有力人物的

297

注意。万一有人抱怨，说我是要撇开日本政府而直接诉诸日本国民，那也可以用事实来答辩：日本要人以往又何尝没有利用过这个协会来阐述日本的观点（1932 年我们到日本后首次参加这里的宴会时，石井子爵就曾在这里讲过话，可以比较），我当然也可以要求享受同等权利。

演说之后，有些美国新闻记者在描述听众的反应时用上“发愣”、“震惊”之类的字眼。其实，当时在场的只有合众社的汤普森，他抢在别人前头了，那些人以为这次要讲的仍将是外交上的老生常谈，可是美联社的莫林，还有休·拜厄斯，很快就陆续接到纽约的电话，要他们详细报道。日本报界的反应则果不出我所料，有些报纸骂我傲慢、粗鲁、大失外交礼貌。总的倾向是，不管我怎么说，仍旧咬定美国人民完全不了解实情，总爱小题大做，把一点点偶然“事件”看作大肆侵夺。再就是认为我们依旧不了解“东亚新秩序”。但也有几家报纸，特别是《读卖新闻》，开头虽对我作人身攻击，说我傲慢，最后还是鼓足勇气，含糊地说，美国的观点似仍有可取之处，应细加研究。这类态度，在此间一般人看来，当然是十足的邪门歪道，但是，这也表明，灌输思想的工作已开始奏效。

有些日本人警觉起来了

1939 年 10 月 25 日

有个开明的日本朋友告诉我，自从我作了那次“划时代的”演讲以后，他就一直在同最高层的大员们讨论，其中有首相、外相、汤浅（天皇的近臣之一）和牧野伯爵等，大家都在仔细研究这篇演讲。他说，他和他们每个人都谈过一个半至两个小时。又说，演讲已留下很深的印象；我已经开了一个头，而且非常及时，现在上述诸人，加上陆相畑将军和兴亚院总务长官柳川将军，将组成一个班子，推

298

动局势继续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他说，能否解决东亚新秩序同《九国公约》之间的矛盾，还不大有把握，但是，采取步骤以廓清气氛，以期转变美国的舆情，显示日本的亲善愿望，这样的决心确是有的。他说，这个计划，他相信西尾将军（已被派往中国统一指挥，制止南北日军当局的不断争吵）也一定赞同。以往日本没有什么建设性行动，听任美日两国隔着太平洋对骂不休，现在是结束这种放任政策的时候了，我的演讲已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他说，和他谈过话的那些高级人士都一致认为，我提出的两百多件抗议照会，不是尘封在外务省，就是只得到一些空谈采取适当行动的保证，现在应该积极处理；新外相野村海军大将不久就会约见我，不管我讲什么，都将洗耳恭听。他说，我一定还能够与首相一谈，他也准备倾听我的意见。

关键性的两个月

1939 年 11 月 1 日

我的演讲词立即发给了美国各通讯社，却没有发给日本报界，有个日本名人劝我发，我也没有照办，因为我要外务省知道，不应背着日本政府发文件这点起码的规矩我还是遵守的，这点我们也告诉了吉泽，当时他和外务省的岸、三谷俱在场，一起听了演讲。我预料公众一定会要求刊布演讲词，果然，两天后外务省就自动请我把演讲词发给本地报界，我们立即照办。这也许是件小事，但这类事情在日本却显得很严重，很快就被人注意到了。 299

据我看，今后两个月，将是美日关系史上最关键的两个月。除非我们能够迅速得到具体结果，使他们不仅以消极步骤，而且能以积极步骤向美国人民显示，日本确有尊重美国在华权益的诚意，否则，要求在冬天对日本实行禁运的压力就会增大，国会就可能提出

这项要求。所谓消极步骤，我是指停止轰炸、侮辱及其他公然侵犯美国权利的行为；所谓积极步骤，则是指向外国贸易开放长江那样的措施，作为向美国公众表示诚意的实证。以上论点，凡是和我交谈的人，我都对他们说了，以后仍将这样做，毫无保留。这不是威胁，而是讲明客观实际。一但实行禁运，那就只有眼睁睁地看着美日关系一直坏下去，怎样想挽回都来不及了，今后两个月之所以紧要，缘故在此。

美国在对日关系上的抉择

1939年12月1日

最近有个日本人说，日本当前最需要的，是出一个有伊藤公爵之才的政治家。唉！这种人物再也没有出现过，也没有将要出现的样子，由于缺乏优良的治国之才，日本是注定要倒霉的。政府软弱，在挣扎中打乱仗。而在今天的日本，要控制住五花八门的各派势力并把它们联合起来，却又非得有一个特具超凡之才的政治家不可。

日美关系的症结在于，政府倒不难给我们安慰性的保证，可是全国就没有一个力量够大的个人或集团能使那些保证得到充分的履行。几乎毫无疑问，稍知外交的日本人，不论在朝在野，绝大多数都想和美国友好，但是他们还有待于牢固地掌握住指导政策和采取有效措施的权力，不这样，也就无法获致友好的邦交。邦交的增进，不能单靠表白善良意愿的言词。这点我已经告诉过他们，而

300 且一直在说，但收效甚微。美日关系的前景，现在看来并不美妙。

前景究竟如何，正是我们此刻需要好好研究和关心的问题。

两大任务

在进一步申述意见之前，我想先讲明以下几点：据我想，我作为美国驻日大使的职责——因而也就是大使馆的职责——包含着两个基本任务：第一，最大限度地保护和发展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利益；第二，保持和增进美日之间的良好关系。即使在遇到这两个任务互相抵触时，也不能卸却对二者所负的责任。我们必须做到的，就是尽可能将这两大任务结合起来。在分析问题和提出建议时，必须经常把这两个主要意图放在心上。今后我国政府应奉行什么方针，当然不能由大使馆决定，而是要由政府根据更高的政策去决定。

在制定今后美国在远东的方针时，我认为我们政府应当经常明确地考虑到两点。首先是我国外交政策的根本原则，我国外交政策是以自己尊重法定的义务、也希望别国同样尊重为依据的。其次是现实感，即注意到客观实情的存在。当原则与现实主义冲突而又无法协调时，必然出现这样的问题：设若以让步求协调，我们能够或应该让到什么程度？我们究竟应否在原则和现实主义之间谋妥协？我国自身作为一个统一体，我们充沛的国力，现在都已达到了预期的鼎盛之点。国际道义，包括尊重法定义务和永远不以武力作为推行国策的工具，对我们来说，既是口号，同时也已成了信仰。

美国曾庄严地（借用威尔逊的说得有点过分的字眼）承担义务，要维护《九国公约》的原则，亦即主要是要维护中国的领土和行政完整及“门户开放”。这就是前面说的原则问题。 301

情况的另一面是，日本并不想尊重中国的领土和行政完整，无论现在或将来，都毫无此意，只有将它彻底打败，才能使它这样做：在国际事务中，没有比此点更确定无疑的了（假如说国际事务中有

什么东西可以确定的话)。使"门户开放"在实际上得到遵守，现在和将来都是一个遵守到什么程度的问题，这就要靠施展手段，而不能靠原则。这就是前面说的现实问题。

能打败日本吗？

欧洲的现状不变，现在在地平线上就望不到打败日本的可能性，无论哪个国家，无论置日本于何种境地——军事、社会、经济、财政无论哪方面的困难——都不能摧垮日本。军事上也许会遇到暂时挫折或出现僵持局面，在一定时期内，由于中国人加强压力，甚至会如军事家说的"在战略上撤退到预定阵地"，换言之，即退入华北——控制华北，本来就是所谓"中国事变"的首要目的；也许会遇到财政困难和经济萧条；要勒紧肚带；或许会困苦不堪；国内还可能发生日益高涨的社会动乱；但是，要说全面崩溃，现在还望不到此种前景。

我早已指出过，日本已开始在搞通货膨胀，以后我还要谈到公债消化率下降、纸币发行量大增、物价高涨，以及伴之而来的广泛的物价管制措施等等反映通货膨胀进一步发展的现象。试图管制大米的供求，则正在激起广大农民的骚动。然而我的意见仍是，即使局面坏到不能再坏，日本人还是会固持己见：在大陆上的冒险事业，不容半途而废，既然已经豁出去了，就得坚决干到底。使馆中大多数人，包括我在内，都不相信，美国一实行禁运，日本就会垮到不得不放弃其侵华计划的地步——禁运即使扩大到断绝美日之间的全部出口和进口，也不会收到这种效果。

302 统计学家为了使自己满意，曾经证明，并且还会继续证明，外来的经济压力可以击败日本。但统计学家一般都未能把心理因素估计在内。日本是一个耐苦尚武的民族，至今仍在受着决死硬拚的武士道教育，这种精神世代相传，已经积习成性了。日本人有史

以来就一直在对付层出不穷的天灾人祸：地震、飓风、洪水、瘟疫、农作物病虫害和几乎连绵不断的国内外战争。由于饱经风霜，他们惯于吃苦，对严密的组织纪律亦习以为常。以往的困难，每次都克服了。单凭统计数字来下判断，很容易使人迷误。

"东亚新秩序"

由美归来后这几个月，我仔细全面地研究了日本的舆论，包括政府、陆军、有影响的非军界人士、实业界和民众等各方面的意见，有一点可以肯定地说是一致同意的，那就是，所谓"东亚新秩序"已成定局。这个词可以作多种解释，但它也有个最起码的概念，即满洲、内蒙和华北永远归日本控制。在陆军中，在政府和国民的某些人当中，这个词的含义要广得多；这些人是要控制中国全境，或者说，凡是现在或将来能够夺占的地方都要保住，包括过去条约所规定的通商口岸和各国租界在内。对满洲的控制，因有了"满洲国"这个傀儡国，已经实现了；控制内蒙，是留待将来解决的问题。扶植王克敏和汪精卫两个政权，以控制华北和华中，则是此间所希望和期待的。这些计划，当然含有日本长期、甚或永久驻军的设想，这样才能强迫这些地区屈从日本的利益。在日本人中，把"东亚新秩序"想得比上述最低概念更窄的人，是很难找到的。

苦药丸需要包上精心制作的糖衣，日本人正是给他们的欲望和意图裹饰糖衣的能手。他们说——有许多日本人也居然相信——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旨在给中国带来持久和平，是在为中国人自身着想；他们的战争是一场"圣战"。他们还说——也有许多人相信——那样做是为了防止共产主义蔓延到日本本土。—— 303
这又未免贬低了众所公认的日本警察管制和根除国内"危险思想"的能力。他们会告诉你——也确是这样说的——一旦汪精卫政权完全稳固下来，好斗的、自己不能保持安宁的中国人不再闹乱子，

美国的利益就自然会得到充分的尊重，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的原则亦将得到发扬，天下也就太平了。这一切美梦据说都一定能实现，等着吧，只要稍为耐心一点就行了。我们不吃这一套，我们没有受骗的必要。

日本的基本要求是什么，我们自己能够概括，也许比许多日本人还要概括得好一些。他们要的是：

（1）战略上的掩护地带，以防备苏俄来攻，特别是对满洲的进攻。

（2）控制中国出产而为日本所缺乏的原料，以保障经济上的安全。日本在经济上是脆弱的。

（3）根除中国、特别是华北境内的抗日和共产党人的活动和宣传。

日本极端分子所向往的远不止此，但上述要求可以说是1931年满洲之战以来日本进行侵略的基本的和最低限度的目标。

等候日本陆军和军事体制有朝一日会在国内信誉扫地，就等于期待"千年至福"①。日本陆军决不是象狗尾巴那样属于身体的突出部分，别以为砍掉这部分就可以防止尾大不掉：它是和整个国家的结构不可分割地裹在一起的；它盘根错节，既切不断，亦不因丧失信誉就会萎缩。诚然，有很多日本人并不喜欢陆军的行事方法；强征大批健壮的青年前往中国作战，造成大量伤亡，军费日增又给日常生活带来种种限制和不便，对此是有许多人感到不安。但是，如果说可以把陆军诋毁到如此地步，使其权力和威望就此一蹶不振，以致不再能控制国策，或至少失去对决策的强大影响，那就是一种臆断，我相信凡是熟悉日本和日本人的情况的人都决不会有这种想法。这使人不禁感到，主观愿望往往会变成信念，持这

① "千年至福"：出自《圣经》，意谓基督将再临人世，为信徒建立极乐世界。——译者

种臆说，不幸确是一个实例。在日本，如因社会动乱而发生政变，任何政变都会立即导致无情的军事独裁，这几乎是毫无疑义的。

因此，在这里我们便发现自己正面对一个问题，从目前所有的迹象来看，这是永远回避不了的，那就是，原则同现实的对立。我们怎样处理这个问题呢？

首先，我不认为我国政府能够、或者应当、或者将要在原则问题上妥协。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居然会这样做，这在我来说是难以想象的，可以推断，对政府和绝大多数美国人民来说，这也是难以想象的。我们无需这样做。除非《九国公约》的条款经"正当手续"而有了修改，否则我们就应当而且必须尊重和履行我们自己在那个条约中所承担的义务。……

是否需要把日本孤立起来？

常有这样的论调：应该而且可以把日本孤立起来，这样它就会屈服。由此又推论出，除非在经济和财政上损耗它、孤立它，把它降为二三等国家，否则它就会在大陆和海外继续扩张，席卷菲律宾、荷属东印度群岛和西方在远东的其他属地，这只是时间问题而已，现在是遏制它扩张的时候了。

对这个论点，我提出下述意见。凡是要对违法国家采取某些孤立它们的办法，都必须预计到最后还是得使用武力。制裁开始后而不贯彻到底，就会使宣布制裁的国家丧失威信和影响。制裁若贯彻到底，又可能导致战争。这点我觉得是不证自明的，甚至可以说是不容争论的。据我看，除保卫国家主权外，使用武力，就无异于自认：第一，缺乏善意，第二，缺乏富于智谋和想象力的、建设性的治国之才。论到我们所面临的实况，有人会说，只有单方面的善意和才略，那是不够的，对此我的回答是，日本也有这些因素，尽管到目前为止仍处于潜伏状态，但总是存在着的，外交的职能之一

305

就是促使这些因素茁壮成长。币原外交曾经出现过，它也可以再度出现。

到外交上智穷力竭之时，再谈制裁也还不迟。在我写这篇日记的时候，外交谋略还没有用尽。我生性不是个失败主义者。我相信外交手段仍然可以制胜。

与野村外相三次会谈

1939年12月4日

外相野村海军大将约我今天两点半钟去他的官邸见他。因忙于和首相密谈，他迟到了十五分钟，为此深表歉意。这次谈了一个半小时。

外相说，11月4日我们一度谈过，现在再谈，他很高兴，会谈中断了这么久，他又感到抱歉。他说，我上次提的意见以及留给他的文件，他都仔细研究过了。我对他提过，必须停止轰炸美国财产、侮辱美国公民和侵害美国在华商业活动，日本当局如有制止之意，最好是拿出直接证据来；他认为这些建议很有价值。野村将军知道，美国有这样的印象：那种种暴行是故意干的，日本当局有驱逐美国在华利益的意图。他要向我明确保证，事实决非如此，这个印象乃是一种误会。规模空前、遍及广大地区的军事行动正在中国进行，我们所诉说的一切事件和案件都是事出意外。日军奉有命令，要尽力注意保护和尊重美国在中国的财产和公民。外相说，他和主管阁僚讨论过这个问题，有个事实他可以告诉我，为了保证执行这种保护和尊重，对驻华各指挥部，还在人事上特别作了安排。

306 野村海军大将又说，加于美国在华商业活动的那些限制，乃是包括管制占领区在内的军事行动的结果，军事行动同安享平时的

商业权利不能没有抵触。不过，这些限制也只是特殊的、暂时的，一俟和平到来，我们的权利就能恢复。根据一时的状况来下判断和预测将来的情景，只会引起误解和纠纷。

他说到这里时，我便把正在损害美国商业权益的各种做法列举了一些，如建立垄断组织，这种做法使得各种美国行业无法营业。我觉得很难把这些垄断组织和其他限制性措施解释为出于军事需要。外相说，既是战时，就需要管制商品，独家经营和其他限制性措施可以用这个理由来解释。我又反驳道，有许多措施已给美国政府和人民留下这样的印象，它们自始即有成为永久性措施的意味，若事实与此相反，我欢迎提出具体的证据。

野村海军大将重申他的历届前任给我的保证：在华日军毫无排斥美国利益之意，相反，他们奉有极严厉的命令，要尊重美国的利益。他说，我国的对华贸易问题，应在东京和战地同时处理，他要求战区内的美国官员和当地日本官员保持密切接触。

野村海军大将说，轰炸美国财产和侮辱美国公民的事件正在逐渐减少。例如在北海和南宁，他没有听到那一带的美国财产受到任何损失。而且还正在采取促进美国商务的积极措施，例如可以从汉口装运桐油，从汕头装运花边和抽绣品。因此，他可以说，按照我上次提的宝贵建议，可能做的，都在做了。他知道我抱有改善关系的真诚愿望，为了酬答这种态度，他此刻正在和有关当局研究采取一些适当办法。

野村将军感到遗憾的是，他和我虽在共同努力改善关系，美国的显要人士却不时大放厥词，甚至说到可能对日本实行禁运，他认为这是在损害我们的努力。

在这一点上，我请他注意美国的言论自由和公开讨论的自由。我说，经验告诉我们，对报刊或个人的言论采取压制的办法，往往倒会激化那些言论，弄成事与愿违。我又说，政府以外的人公开发

表意见，即使那些人可能和政府有密切接触，也不一定就代表政府的观点。外相笑答道，日本也常有这种情况，特别是在报界。

接着外相又说，他想提出几项统计数字，以答复我上次所提的一些抗议和解决悬案的具体建议。他说，我上次交给他的事件清单，他们已经仔细分析过了，而且还根据可以得到的文件写了一份摘要。他随即递给我一份非正式的日文文件，并说恐怕我还希望能得到译本，于是他便向我宣读下面这份摘要：

1．所提抗议业经告知收到或已作答复者　179件

2．所提抗议未告知收到或答复者　203件

（1）不需要告知收到或答复者　22件

（2）虽未告知收到但其内容已转交在华有关官员者　27件

（3）虽未答复但已就地解决或已处理者　8件

（4）仍在继续调查而尚未答复者　110件

（5）其他诸种情况　36件

野村海军大将表示抱歉：由于办事疏忽，我们所提的抗议，有一些没有被告知收到或答复，但他向我保证，我们提过的一切抗议和意见都正在受到注意，主管官员正在设法解决。

有一些事件已经解决或即将得到解决，这类案件共有三十九宗。这些事件都已调查完毕，日方官员正与我方在上海的官员接触，寻求解决办法。外相说，吉泽先生将向杜曼先生或我本人说明他刚才交给我的非正式文件的细节，并且还乐意随时讨论各项悬案。他说，他认为我们最好能同吉泽先生定期交谈，他建议外务省和大使馆的官员组成一个类似常设委员会的机构，以便处理这些悬案。这样，问题就能够迅速解决或在解决办法上达成协议，日美关系就可能由此趋于稳定。

外相提到，新闻报道竟说待解决事件有六百多宗。他认为报

道如此失实，只会给公众造成误会，损害我们的关系。他觉得最好是把实情公布出去，建议由吉泽先生和我们联系，共商有关公布的事宜。

接着外相便说，现在他很想“非正式地”谈谈。他谈到我们的通商航海条约，认为“纵使条约满期，我仍然希望关系保持正常，两国人民都没有理由为此表现激动”。日本的对美贸易在日本整个对外贸易中占很大比重，对美商务倘若受到削减，日本显然就要另谋出路。

我觉得这话既含有要挟之意，也可以说是在暗示要谈判订立新约或临时协定，于是我便把11月24日赫尔国务卿对日本大使谈话的释义念给外相听，特别强调最后一段所包含的意见，大意是，对消除两国亲善的障碍，美国政府并不认为自己有主动提出具体办法的义务。

随后我便要求外相处理下列各事：

(1) 8月1日再次袭击河南桐柏县的“路德派兄弟布道团”(尼胡斯事件)。

(2) 侵犯新乡的天主教教会的财产。

(3) 我向外相宣读了10月20日北平来电中有关暴徒袭击陈留“独立卫理公会”的电文。

(4) 为了能直接收到华盛顿政府发来的消息和新闻简报，克罗克先生正与铃木先生商讨大使馆安装无线电收报机的问题，我请求外相亲自注意和关心此事。我说，我国驻外外交机关多已设有此种收报机，驻日机关却仍是一个主要的例外；我们若能与华盛顿保持密切而又迅速的通讯联络，对我们两国都有好处，大使馆设收报机，我并不想请求允许(因为这是外交权利，我们可以正当地行使此项权利，无需别人允许)，不过我还是希望在安装前得到外务省的明确赞同。

(5) 我给外相讲了塔克事件的实况和此事在美国引起的普遍关切。我说，我曾接到国内许多重要人物的来电，他们都关心此事，我国政府亦正式表示关注。我说，塔克先生虽已监禁了大约六星期以后被释出狱，但仍要在此后两周内受审，据我了解，说是犯了擅自传布某种违禁文献的罪；案子的结局定会在美国发表，势将对美国公众以及塔克先生的朋辈产生重大影响。我又说，我并不想干涉日本的正常司法程序，因此没有就此案提过正式抗议，但我希望外相知道，此案已在美国引起普遍关切，包括官方的关切。外相说，连他也很难干预此事，案子是司法省经管，他相信塔克一定会得到公正的处理。

同意发布新闻公报如下："今天外务大臣和美国大使双方都以积极的态度继续就日美关系的各方面问题进行了会谈。"

1939 年 12 月 18 日

野村将军今天在外务省约见我，在一个半小时的谈话中，他通过译员井口先生向我读了一份备忘录，然后交给了我，我随即送给了国务院。

外相明确地通知我，日本政府打算"在大约两个月内"为一般航运开放长江，到南京为止。外相又说，由于在中国的战事，大概暂时还得对这种航运施加一些限制。

外相明白提出缔结临时协定，以便现行通商航海条约满期后继续维持日美通商关系，并表示，鉴于条约即将满期，所余时间不多，希望很快就能开始进行订立新约的谈判，如有可能，最好在圣诞节前就开始。我答道，我没有奉到有关此事的训令，问他是否要我将此话转告我国政府，算是由他提出的具体建议。他作了肯定的回答。

谈话还包括下列几点：

(1) 外相把我们的问题分为“积极的”和“消极的”两类。我答道，我们两国间存在着一些事关根本原则的意见分歧，若照外相的分法，这恐怕很难归入上述两类的哪一类。

(2) 在我 11 月 4 日和外相的谈话中，曾否提到有可能使美国舆论“迅速”转变，我不记得了。

(3) 在野村讲完他的声明和我对日本政府力求改善两国关系表示赞赏之后，我便按照我国政府的训令，把国务院对 12 月 4 日外相所谈各点的反应非正式地、全面地告诉了他。其中包括：国务院认为，日本有关当局迄今所作的努力只不过是“刚刚触及问题的边缘”而已。

(4) 关于那两个“公司”和其他垄断企业，野村说，为了克服国防问题上的种种困难，已有必要在满洲国、日本和中国之间建立一些“经济集团”。但是他宣称，日本并无排斥他国之意，而且“很愿意接受外国资本”。我问外相，“是在没有歧视的基础上吗？”对此他只答道：欢迎外国参加这些企业。

(5) 关于货币问题，外相认为，他们“不得不为军队筹措经费”，但对外币的差别待遇，“一俟战斗停止，中国的新政府成立，就可加以修改”。

(6) 会谈结束时，外相“非正式地”说道，为了我们两国的利益，我们必须防止欧洲的战争扩大到远东，对防止这种意外，日美协和将是一个强有力的因素。

1939 年 12 月 22 日

今晚与外务大臣会晤时，我向他口述了两个各不相属的声明，大体上依照国务院昨天来电的两段内容。我还引用了国务院 12 月 18 日训令中的话，这个训令我以备忘录的形式交给了外相。

野村将军用日语作了口头答复，后来译员又将原话的译文交

给了我，译文如下：

“美国政府已决定，纵在日美商约终止生效以后，亦将采取措施，促进正常的通商关系：对于这个决定以及阁下在这方面的努力，都表示深深感谢。不过，商约问题，并非只以两国通商关系为限，而确是在许多方面都涉及我们两国间的总的关系。例如，没有具体协议，通商关系即使能在大体正常的基础上维持下去，此种关系中经常在变动的情况，亦不可能预测。这是一种飘忽不定的景象。有鉴于此，并从改善美日关系的大处着眼，我热切恳求贵国政府对缔结临时协定的问题细加考虑。

“我可以告知阁下，正如美洲局长吉泽先生业已通知贵大使馆参事杜曼先生的，日本政府依上述观点对此问题细加研究后，已备下临时协定草案一份，并已将此草案电达驻美大使堀内；已经告诉他，可以在会谈中适当的时候将草案提交华盛顿的国务院。”

在随后的谈话中，我再三讲明，日本现在必须切实履行它作过312 的保证，即在无歧视的基础上尊重美国在中国的权利及合法利益。

双方基本上同意了下述新闻公报，我还得到明确保证：外务省决不另作超出公报的宣传。公报如下：

“外务大臣和美国大使今午就两国关心的问题继续会谈。对解决讨论中的问题，外相和大使都表现了互助的态度。讨论已有进展。会谈还将继续。”

米内海军大将领导新阁

1940年1月14日

内阁辞职，米内海军大将组成新内阁，有田为外相，我的老友藤原为商工相。米内就是去春阻止与德国缔结军事同盟的那个人；我是在“阿斯托里亚号”运送斋藤的骨灰来日时结识他的；他曾

来大使馆赴宴，我又在海军俱乐部的盛大宴会上和他共餐，餐后他请人转告我，我不用再担心日本会与德国结成同盟。

有田重返外务省

1940年1月18日

有田接替了野村将军，就职后分别接见各国大使。他对我说，他已命堀内往访赫尔先生，共商条约满期后“依约进行贸易的商人”应处于何种地位，他希望我赞助此事，以免两国侨民遭受损失。我只是把谈话中述及事实的部分呈报上去。国务院是知道我的观点的。后来国务院来电说，堀内病了，来见霍恩贝克的日本参事被告知，关于商人地位的会谈应在东京进行，因此现在有田很可能要见我，我也只能将他的建议电转华盛顿。这有点象打板羽球，拍过来拍过去。不过我想，国务院把会谈集中在一处是明智的。我简略地顺便对有田说，东京有一种宣传，使公众误以为我曾向野村将军保证不会出现无约状态，这真令人遗憾。不过，现在报上已在正确反映情况了。

英日事件把美国大使挤到暗处去了

1940年1月23日

有艘英国巡洋舰截住日船“浅间丸”，带走了二十一个德国人，说他们很象是在德国海军服役的。这个事件当然会引起一场轩然大波，特别是因为事情就发生在几乎看得见日本海岸的地方。有家日本报纸说，“这是污辱了大和魂”，当罗伯特·克雷吉爵士在公开声明中指出日舰亦曾在香港附近扣留和搜查英船不下一百九十一次时，日本报界更是勃然大怒，先骂大使失礼，说他根本不该发

表任何辩解性的声明，后来又怒斥他竟把崇高的日本同香港那样的蕞尔殖民地相提并论。爱国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激情汹涌全国。

附带说一下，当我今天去约克雷吉同往参加美国俱乐部的午餐会时，他笑着向我道歉：现刻他已成了众人注目的中心而把我挤到暗处去了。我答道，我十分欢迎他占据这个中心，并请他就这样呆在那里，让我在暗处安静一下。

得到罗斯福的赞许

1940 年 2 月 14 日

今晚邮袋来了。我曾以私人身份给总统寄过我 11 月份日记的序言，注明写于 12 月 1 日，谈到了我觉得应该推行什么样的对日政策，我还对他说，“我本来不打算拿这么多阅读材料打扰你，但是我想，不管什么文件，你的慧眼定能一下子就抓住它的要点。”罗斯福给我了一封很令人高兴的回信，还加上这么几句：“你处境困难而能对棘手的工作应付裕如，我很高兴。谨向格鲁夫人致候。你的同道某某。”

314

更多的迹象表明日本在犹豫

1940 年 4 月 10 日

国会循例开了一下会，又渐渐无声息了。汪精卫的店铺开张，不知能开多久，又要失其踪影了。除了日本人的刺刀，他恐怕再也没有什么能保长治久安的基本条件了；目下看来，除非日本愿意并且能够在世界这一地区长期留驻大批武装力量，否则他就不能继续觉得自己能站住脚跟。预言事态会发展成什么样子，那是白费劲，远东的事情，一向都很难说，因为这里边实有许多无法估计的

因素。但是我们至少可以这样讲：日本绝大多数有识之士正越来越认识到，从大处看，对华战争乃是一场徒劳无益的战争。

前面这个断语是根据许多观察材料并与日本要人谈过许多话而得出来的。日记只能述及这些材料和谈话的极小部分，但诊断病症也只是以一些症状为根据，最近同一个有影响的日本著名时事评论家的谈话，我觉得就特别具有显示症候的意义。他是写广播稿的，近年来常以尖酸之词肆意攻击英美，拼命宣扬日本的沙文主义。在两次长达几小时的交谈中，这个日本人却特别申述了两点意见，听起来实在令人惊讶。一点是，他曾经仔细研究了日本对华开战以来赫尔先生发表过的全部言论，并已得出结论：赫尔先生所说的一切都极为正确，日本则是错了。不要以为此人是在别有用心地说奉承话，他是真正讲求实际的那种人，这个事实足以打消别人对他的怀疑。他说的第二点更有意思。经过深思熟虑，他认为，中国事变绝不可能解决，除非日本决心做到：(1)直接同蒋介石打交道；(2)允许有利害关系的第三国出面干涉（我猜意思是调解）；(3)给"东亚新秩序"下个定义。一个抱国家主义思想的日本人，竟对美国大使说这样的话，我看是颇有代表性的。

我相信，假如我们能让事情按正常趋势发展而不受阻碍，时间就会对我们有利。所谓阻碍，我指的是带制裁性的那类措施。长期以来我就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讲的——现在我更加坚持这种想法。今天我曾分别同两个美国人谈过，一个是《原料战略》的作者布鲁克斯·埃米尼，一个是吉米·扬，后者最近曾因被控乱传有关日本陆军的谣言而被关押、审讯和定罪，这种情况本可以使他对日本不抱客观态度。这两人却不约而同地、真诚地完全同意我的论点。

二人之中的埃米尼，最近问过一个日本知名人士：倘若美国正式宣布对日本禁运，他认为会产生什么结果。那人答道，这在一定

程度上要看禁运是怎么执行的。假如在做法上弄到有伤日本的“面子”，它就会断然报复，不计后果。明令禁运而又不伤日本的面子，是难以想象的，因为即使诡称禁运的目的在于保存美国的资源，那也瞒不过日本人，道理很简单，要来一个惩罚性的禁运之说已经闹了很久了，此间几乎肯定会出现危及日美关系的情势。

日本在任何情况下都有向美国宣战的可能，美国许多写文章、发议论的人总是低估这一点，他们看到日本正忙于对华作战，就更加忽视这种可能性。他们不了解军部重要人物以及民间的民族主义的狂热可能强烈到什么程度，这种狂热不仅可以立刻阻止现任政府和开明人士朝亲美的方向努力，而且还能采取步骤，使日美关系即使不处于危险的也会陷于严重的紧张状态。设若两国打起来，那很可能不是因为双方事先作过慎重的权衡和周密的筹划，而是某种煽动性的行为促成战火的自燃。美国人民不想跟谁打仗；美国某些知名人士也轻视战争的可能性并告诉人民没有战争的危险。虽已有人——包括沃尔特·李普曼等少数深谋远虑之士——发出反对此种论调的呼声，但其他的人好象还是以为可以太平无事。

前首相阿部将军被任命为参加汪精卫政权成立仪式的使节，316 即将于4月15日前往南京，表面上是要去和汪精卫谈判日本承认该政权的基本条件并议订和约，但他真要做的，却是同当地日军当局谈判，近卫计划中的原则和具体项目他能够实现多少，尚待判明。日美关系的前途将在颇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谈判的结果。

今后几个月可能很重要，甚至还可能是个关键时期，不过我以前也时常这样说，已变成老一套了。我今春是否应该回美国度假，现在还不知道。假如真出现好机会，能在这里做些建设性工作，我就不回去。从另方面来看，我对日本政府再也没有多少话可说；我国的立场已经充分阐明；我们只能静听下文。回到国内，也许倒可

以做点较有益的工作，此外，就近听听我们政府和人民的声音，还可以增长见识，就象去年夏天那样，很有好处。我要找有田谈谈，看他有什么意见，到4月底5月初，再向华盛顿请示。

有田结束了始于野村的会谈

1940年4月26日

今晚有田先生来到大使馆时，我问他，我们这次谈话，他希望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他答道，“完全是非正式的”。接着他便说，他先要道歉：1月间他就职时曾向我表示过，要把他的前任野村开始的会谈继续下去，殊知未能实现。对局势经过一番研究，他已得出结论，由于我们两国在原则问题上分歧太大，在这个时刻为准备议订新商约继续会谈，恐怕不会有什么效果。

我同意有田先生说的，在原则问题上我们两国政府间存在着重大的意见分歧，不过我又说，美日间的纠纷，还有更尖锐的方面，集中表现在日军继续侵犯美国在华权益，最近且变本加厉，我觉得，应该先消除这种状况，然后才有可能妥善解决有关原则的问题。说到这里，我便向外相出示一份打字二十多页的声明，并把标题读给他听，声明中罗列了今年初以来继续发生的轰炸和人身侮辱等事件，以及通过垄断措施、外汇管制、进出口限制等损害美国对华贸易和工商业的大量新事例。

我说，轰炸和其他侵犯美国权利的严重事件再度发生；日本政府虽向我屡作保证，愿意实行机会均等原则并尊重美国在对华商业上和其他方面的利益，但仍未对实践诺言作显著的努力：这实在令人泄气。外相答道，谷先生已把我最近对轰炸美国侨民和封锁天津英法租界的抗议告诉了他，他正在尽力改变这种状况。他希望对天津租界的封锁不久就能解除。一俟对华战争结束，我们关

于垄断措施、外汇管制和进出口限制的控诉，至少可以解决一部分。外相还谈及赔偿我们在中国的损失的问题，说他曾经尽量设法解决，结果虽不一定能使要求赔偿者完全满意，但也表明他曾为满足这些要求作过真诚的努力。我感谢他出过力，但接着还是对他说，到目前为止，所做的一切，对整个问题仅仅是触及皮毛而已。

外相随后又谈到据传我将返美休假。我答道，休假问题每年都有的，今年作何打算，尚未确定，但是，老实说，关于改善美国在华权益的境况，这几个月来我都在等，看有无一点履行诺言的迹象，殊知始终是白等，看到的只是侵犯美国权益事件的重演和加剧，因此我越来越怀疑我在此是否还能有所成就，并觉得此时回去和我国政府亲自联系一下，或许要比留在东京较为有益。我说，我已经向日本政府充分阐明了我国政府的立场和态度，现在我们是在耐心地等待结果，但显然是空等了。

外相说，他希望我不要在这个时候离开日本，因为日本国民现正为日美关系恶化而深感不安，可能会把我的离去理解为部分绝交，公众的反应也许会"非常严重"。我答道，我将根据外相的意见考虑此事，如何决定，不久就可以告诉他。假如我决定放弃休假，那就希望美国在华利益的境况确能有所改善，这才不辜负作此决定。

随后是漫谈欧洲的战争。这次长约一小时的会谈，虽夹有一些刻薄话，但仍是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我用如下调子结束了这次谈话：经世治国者，必须放眼于长远的未来，而不是只顾目前，日美友谊自有其深厚的基础，最后必能战胜一切困难，道理很简单，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没有美国的友谊，日本就不能进步。

日本与荷属东印度群岛

1940年5月1日

假使荷兰被德国入侵，荷属东印度群岛将处于何种地位，现已成了一个重大议题。4月15日有田正式发表声明说，该群岛的现状有任何改变，日本均不能漠然置之。我们有根据认为，其所以作此声明，是因为欧洲各中立国首都曾传说美国正打算在荷兰被入侵后把这些岛屿放在自己的保护之下，我们还有理由相信，这些消息是一个德国人散布的。有田的声明使赫尔先生也回敬了一个声明，谓该群岛的命运我国亦甚关心。有田对一个走报消息的人叹道，他发表声明时，决没有料到美国政府会把它理解为暗示日本自己想要“保护”这些岛屿。不管怎样，这样互相打趣，实即留下了我国政府也参与了这场重大争端的记录。

“把我看作威尔基最早的党羽”

1940年6月10日

测定共和党将推谁作总统候选人，为时尚早。要让我来选，当然是选温德尔·威尔基[①]。前些时候当我读到他的第一次演说词和关于他的经历、人品和性格的记述时，我曾对艾丽斯说，他总有 319 一天会脱颖而出，她满可以把我看作威尔基最早的党羽。他还没有冒出头来，但我想他一定会的。我希望并相信罗斯福将再参加竞选和重新当选，因为他能认清并正在有效地处理当前我们民族利益攸关而又尚未解决的问题，即作好准备以防纳粹向西半球渗

---

① 温德尔·威尔基(Wendell Willkie, 1892—1944)，美国共和党领导人之一，1940年被推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译者

透——我姑且不说入侵——这个首要问题。这是超乎一切国内问题之上的大事，我的推测是，假如罗斯福重新当选，他就会在内政上迅速向右转而全力加强战备。但假如罗斯福因某种预料不到的缘故而不再竞选，或者，与现有迹象相反，他竟然落选了，那末，我就希望威尔基当我们的下届总统。我是从远地观察，不过我总觉得他诚实，有魄力而又富于经验，有眼光而又具行政才能，尤其是对我国面临的问题有一个清楚、正确的概念。我作这样的评价，是根据他的言论，这些言论我读到的很少，但却是很重要的。从现在起，我们的一切谋划都必须放在这样一个基点上，即英国海军可能被毁。这个现实罗斯福是意识到了，据我对威尔基的观点的了解，我想他也懂得这一点。

1940年6月18日

近来有好几天没有记日记了。6月中已过，世局发展如此惊心动魄，我也没有什么心思坐下来记述我们在这里的琐行趣事。不过历史总是一件件事凑成的，在七巧板中，连碎片也有一定的位置，因此我还是要勉力把这种零录琐记坚持下去。欧洲的事变必然会对远东产生重大的、甚或是剧烈的影响，还可能会引起后果深远的变化。在此关键时期没有离开本职工作，我深感欣幸。

日式丧仪使人想起另一个日本

1940年6月11日

今天德川公爵的佛教葬礼，一如日本所有同类仪式，感人至深。私祭长约两小时(1点到3点)，外国人惟有艾丽斯、杜曼、我和泰国公使在场，其他外交官和众宾客只是3点钟后才排队到灵前来烧香。在日本住了八年，我今天感到自己已不是外人，而是这

群人中亲密的一部分，俨如在波士顿与家人父子相聚而不是在东京。坐在我们周围的日本人士和他们的夫人，皆出自名门望族，很多人我们都非常熟悉。德川、近卫、松平、松方家人，仿佛就是索顿斯托尔、塞奇威克、皮博迪等家族。他们的地位，他们的权势和声望、他们的人品、他们之间的关系，我们都很清楚，就象我们深知波士顿的同样人物的情况一样。我们还感到，他们也是把我们视为自家人。

这听起来好象有点趋炎附势，实则毫无此意。假如不拿世家而拿两国的张三李四来比譬，意思也完全一样。这不过是在说一个简单的事实，那就是，我们不再感到自己是外人，悼念一个去世的朋友，和其他日本朋友亲密地在一起举行佛教丧仪，此中意义之深，气氛之隆重和亲切，都使人觉得好似在参加一个亡友的基督教式葬礼，恍如置身于波士顿的伊曼纽尔教堂。

德国的胜利搅乱了日美关系

1940年7月2日

5月间日本涌起的政治喧嚣，迄未退减，反见日益加剧。德国连胜，法国崩溃，普遍预言英国必败，都在对这里产生其必有的影响和作用，对陆军、极端分子和亲轴心分子的影响就更不用说了。军部在咆哮，政府则用稍微温和的语言，要求停止从印度支那、香港和缅甸向中国输送军事物资，要求英军撤出上海公共租界。同时他们还要求荷属东印度群岛不考虑其他国家的正常贸易定额和需求，而保证无限制地供应日本所要的商品，在移民和实业开发方面与日本合作。

言外之意是，这种种要求通通都得答应，不然就如何如何。若是这些要求得不到满足，日本是否就会使用暴力，此时尚难断定。 321

日本政府的行动比较缓慢、谨慎，可是极端分子正越来越嚣张，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包括内阁很快倒台在内——不是和平下台，就是通过象“二·二六事件”那样的政变。公众的反英情绪日益高涨，大部分也反对美国。谣传内阁如果倒台，将由近卫公爵继任，但据我们看，他未必愿意接管政权。我们猜的是平沼男爵。近卫据说正忙于筹建他的一党制。

我在6月10日、19日、24日和28日私下同有田会谈过，没有什么具体结果，但至少起了敞开两国政府间的谈判之门的作用，这也是他们的本意。由于都是在共同的朋友的住处会晤，虽不免泄漏风声并至少有一家报纸提到会谈正在进行，但我们还是基本上避开了公众的注意。

显然，单是外相和我这么争辩一阵，不能指望会有多大的结果，虽然从可靠方面获悉，首相米内将军曾责怪有田没有给我较大的鼓励。美日关系已陷入恶性循环。我们这方面认定，改善两国关系，有三大障碍：(1)日本以使用武力为推行国策的手段；(2)日本不履行按条约所承担的义务；(3)日本以各种方式侵犯美国在中国的权益。日本则坚持说，只要对华战事尚在进行，这些障碍就不能排除，甚至在战事终止以后，我们所指控的问题也只能解决一部分而不能全部解决。另外它还认为，美日间没有商约，这件事本身对改善两国关系就是一个重大障碍。恶性循环的圈子封得死死的，如何突破，真是一个绞人脑汁的难题。

与松冈外相第一次会谈

322

1940年7月26日

新外务大臣松冈洋右今天循例分别接见各国使团首脑，接见纯是礼节性的。他留我谈了将近半小时，而不是按常规只谈五

分钟。

开头外相说，他还来不及制定政策，不过他还是要说，当报界问他，与广田政策、有田政策及其他外相的政策比较而言，他的政策将是什么样的政策时，他曾答道，不必寻找什么松冈政策了，只讲日本政策吧。

外相表示，他对赫尔国务卿极为敬仰，要我转告，请国务卿相信，他一向都非常重视日美关系。松冈先生说，他从来就是个说话很坦率的人，在我们今后的交往中，他可能会常说一些不象外交言词的话，但他相信，直话直说，收获还会大一些。接着他便引述他不久前写的一篇文章，说到倘若美国和日本终于非打不可，它们也应该明确知道打仗的原因和理由，如果打起来了，亦不应该象历史上常见的那样因误解而让战争扩大。我说，我这个人也不喜欢旧式外交，也赞成说话直截了当，我相信，把我们的关系建立在这样一个谅解上，对双方都有好处。我料想我们也许还能把“战争”一词排除掉。

松冈先生说，历史主要是被一些盲目势力所推动，在一个变化迅速的世界里，这些势力并非总是控制得住的。我承认，盲目势力在历史上是起过作用，可是我又说，外交家和政治家的根本职责之一就是要把这些力量引导到健康的轨道上来，我希望不久即能和他一起探究美日关系的现状，坚信我们二人若均以正确态度对待这个问题，就必能适当引导他所担心的盲目势力，取得重大成就。

我问松冈先生想不想看看我上次和他的前任有田先生会谈的非正式记录，会谈中我曾陈述过美国政府的各种观点，我希望这份记录可以为我们下次谈话提供一个有用的基础。外相说他很乐意看，便将记录收下，放在衣袋里。

松冈寄语罗斯福

1940年7月26日

今天我和日本帝国新任外务大臣松冈洋右先生首次正式会见时,大臣阁下特请我代他个人寄语罗斯福总统,大意如下:

几年前松冈先生离日内瓦回国路经美国时，他虽仅是国会议员而未担任别的官职，然因系旧交，亦曾赴白宫拜会罗斯福先生，表示友好，兼致敬意。现松冈先生特请我向总统转达他个人的一点意见:维护世界和平,他也极为关切，而且终生向往;不过,他已终于明白了,世局既然是在不断演进、变化和发展，就不能靠固持现状来保卫和平。他说,国际联盟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成员国没有勇气执行盟约第十九条，该条规定，情况如有发展变化,即应作相应的调整。世界必须建立新秩序，世界和平必须以适应发展变化为基础。

罗斯福总统答松冈外相

1940年8月3日

罗斯福总统对松冈先生的私人寄语作了非正式评论，我口头转达如下:

松冈先生对维护世界和平确表关切和属望，并谓既欲实现世界和平,即需适应世局之发展变化，陈词坦率，闻之令人欣慰。兹亦以同样直率的态度奉答松冈先生:愚见以为，真正的、持久的世界和平,只有靠循规蹈矩的行事方法、公平合理的待人方式，才能取得,这又首先需要尊重所有有关各方的权利,允许一切国家俱得遂其合法愿望。每个国家,包括美国和日本,均有追求进步和安全

的愿望，此乃正理常情。为的是这些目的，用的是上述方法，因而引起某些变化，那才是正当的，美国亦无憾于此种变化。日美两国领导人俱有维护世界和平的热忱——当然是指真心诚意的——这一事实就提供了一个机会，可以积极探求如何增进日美两国政府和人民间的关系。

日本死心塌地投奔轴心国

1940年8月1日

若谓在米内内阁存在期间我们已经能够做到对美日邦交有所建树，那又未免言过其实，但是，我们至少已经打下了一个尚属可用的基础，设使那个政府延续下来，是会有一点建树的。如今内阁换了，连同换阁所带来的种种变化，似乎比一场台风还厉害，竟然毁掉了一块地基。因为，一望而知，近卫内阁在阐释当前大众的要求、特别是军部的要求时，即已充分表露，它将死心塌地地投向轴心国，要建设东亚新秩序，要肆意践踏美英的权益、原则和政策。

支持此种方针的日本人，尤其是陆军中人——我们现在不得不承认他们是占大多数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都把现在的世局视为实现其扩张主义宿愿的"千载难逢的良机"，以为决不会受到据说已是残废了的民主国家的妨碍。法国已不足挂齿；面对强大的日本海陆军，荷兰在东印度群岛只能作微弱的防御；美国被欧战绑住手脚，它的海军全力倾注在西方；至于美国，在这些扩张主义者看来，当那个有潜在危险的希特勒正大谈其终将征服西半球之际，它也定不敢与日本纠缠。德国的战争机器和体制，德国的耀眼的胜利，有如烈酒，已冲昏了日本人的头脑。

这是新姿态。实际行动如何，尚待分晓。天皇和元老重臣的态度可以推想，反映这种态度的近卫公爵，至少在英国的胜败尚未

325

判明之前，很可能要适当约束一下那些“激进分子”，尽量把步子放慢一点，慎重一点。可是另一方面，那些“激进分子”，在某些报刊的支持和怂恿下，已在制造事端，想借此煽起反对美英的舆论，并以误报和歪曲事实的手法夸大那些事件。从以往历次反美反英的运动来判断，可以设想，这次运动定会愈演愈烈。这类反美和反英运动，通常总是在不同时期分别进行，意在把这两个民主国家拆开，但是现在我们这些美国人和英国人已被视为处境大致相同的人了，今后想必亦受到大致相同的对待。

国务院由最近一次邮袋寄来的美国报刊剪辑影印本很有意思，我发现里面的社论和文章都反对对日本实行“绥靖”政策，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纽约《每日新闻》的社论，论点被“中国情报局”引述，也只是作为攻击的靶子而已。因此很明显，假如可以把这些剪报看作美国报刊和美国舆论的横断面，那就说明，赞成对日本实行“绥靖”政策的声音并不多。剪报所反映的几乎一概是相反的意见。

“绥靖”一词自慕尼黑事件后已别具涵义，从此贤明政治家的词典中便不会再有这个词了。它所象征的那种态度，非我所取，我断然否认我同这种态度有什么关连。这个词意味着失败主义。三年来我屡次提出劝告，就是打算——如果得到采纳——防止我国对日关系的任何方面出现必须实行“绥靖”政策的局面。赞同剪报所述观点的人，也许都忽略了一点，那就是，在现存形势下，日本并不喜欢别人对它实行“绥靖”政策，就和美国厌恶这种政策一样。我们汇报日本报刊言论的一系列电报都没有忘记强调指出：设使美国因受欧洲战局的冲击而从权宜之计或有其他考虑，这才提出调整关系的建议，日本是不会响应的。我面前就有一篇社论，是评论罗伯特·克雷吉爵士的，克雷吉曾问松冈先生，英国能否指望和日本改善关系，这篇社论便就这个问题写道：

“我们知道，英国是在欧洲打了败仗，所以才渴望与日本改善关系；我们也可以预料，在这种情况下才来求日本改善关系，自然不会被接受。”

看了这些我假定其为美国报纸的横断面的剪报后，我有一个印象：美国报界，因此也可以说美国公众，分不清什么是“绥靖”政策，什么是调整两国间问题的方式；既做到调整两国间的问题，又不牺牲我们的荣誉、我们的利益和我们对第三国承担的义务，这并不是人的智慧和善意办不到的。

松冈和斯坦哈特聚会

1940年8月24日

我到日本八年了，第一次碰到一个外相跟我直接打电话：那是松冈，不过是为昨晚的宴会向我致谢，称赞这餐饭，并说他今天早上和我们的驻俄大使劳伦斯·斯坦哈特谈得很高兴。昨晚宴会后松冈已约定斯坦哈特今晨去看他，说他很想再谈谈。他们谈了一小时四十五分钟，谈些什么斯坦哈特当然都告诉我了。斯坦哈特特意避而不谈日美关系，他说那是我的职权范围，他不想越权。他们主要是谈苏俄。松冈之所以打电话给我，大概不过是要表白一下，他并没有背着我讲什么话。

还有一件趣事：松冈叫他的私人秘书来对我的私人秘书说，他即将派一个会说英语的日本人陪送斯坦哈特去北平，一直送到西伯利亚边境，这仅仅是为了确保他途中不会受到侦探和海关人员的留难。但更有趣的是，我再次会到松冈时，他说，他曾叫他的私人秘书告诉我的私人秘书，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斯坦哈特觉得这个日本人送他的目的是要监视他，他都可以辞退此人，撵他回东京。这还不算，最妙的是，松冈的私人秘书把这段意味特殊的话咽下

去了，未曾传达。他显然是感到他的上司说得太不聪明了，必须删掉！

日本加紧建立“新体制”

1940年9月1日

8月是日本在近卫政府主持下建立“新体制”的时期，外务上则有点踟蹰不前，还要看“不列颠之战”①的结果如何——世界各地似乎都在等，有好多事要以它为转移。

“新体制”一事，正在密锣紧鼓地进行，日本正在急速变为一个严密组织起来的国家，尽管从大体上看这种做法还不能称之为法西斯主义，也不能称之为纳粹主义。它和两者都差得很远。不准备象意大利和德国那样搞单一的政党，相反，倒是所有政党都不得存在，要靠人人各自效忠天皇而把全国团结起来。虽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集中营，但警察和宪兵已在忙于严厉镇压一切违犯“新体制”原则的人，这些原则还包括生活要节俭，反对很多取乐方式，如日本人最喜爱的鲜艳颜色、游戏、运动以及通常的娱乐，“危险思想”更不待言。我担心，日本人那种传统的愉快精神将会越来越淡薄。报上每天都总有什么禁令公布，所禁者有大有小，累积起来，影响就很可观了。

我们正在草拟一封急件，其中将列述一些禁令。禁令五花八门，从有关衣、食、举止行为的通告到情妇不得装电话这样郑重其事的规定，应有尽有。这对风流荡子该是多么大的打击！有些高尔夫球俱乐部已经宣布，今后不得举行锦标赛，不得雇球童，不得在平日打球，二十岁以下者不得打高尔夫球，不得乘汽车至球场，在火车或电车中不得着灯笼裤，成员保有的银杯均须上缴，熔归国

① 1940年7月至11月，纳粹德国准备入侵英伦三岛，大举轰炸英国。——译者

家利用。俱乐部的通告还强调说，今后打高尔夫球，目的只在于增强体力。我常称日本为打高尔夫球者的天堂，如今这样一来，对这个天堂又是多么大的打击。一切形式的赌博亦均在被禁之列。音乐还没有禁，可是电台比以往更爱播军乐和爱国歌曲，加上那种日本式的用鼻音的唱法，难听死了，简直叫人无法忍受。唉，这是什么生活啊！

美日关系没有进展。在最近训令中，我发现有迹象表明，我国政府可能正在作显示强硬态度的准备，这个训令我非常赞成。日本军部向政府施压力，要立即入侵法属印度支那，但已被制止。不过，假如“不列颠之战”一旦判明将是德国得胜，那么，可以预料，日本就不仅会及早向印度支那、而且还会向香港、甚或终于向荷属东印度群岛进军。我想，日本若要入侵东印度群岛，就必然会使我国和它正面冲突，但我又不认为现在马上就会发生这种事情，因为，第一，我过去和现在都没有怀疑过英国终能战胜，其次，近卫政府很可能要在悍然入侵之前先施高压外交，对这些岛屿试作长期的和平渗透。这是在假定政府能够约束陆海军的情况下说的。但是如果约束太紧，到一定时候又可能发生行刺事件，因为，日本政府虽已实行极权主义和严密管制，终究还是控制不了军部和那些狂热分子，不能和德国、意大利相比。

和新外相松冈谈了三、四次之后，我得到的印象是，他讲话太随便，但显然是个口直心快的人，而且按他的处世标准来说，也还算是诚实的。我觉得他真是想同美国搞好关系，愿意朝这个方向尽力而为。但是他可以做些什么，还得瞧瞧，我们只能根据事实和行动来判断。不过我总算在日本第一次碰到这么一个可以和他“非正式地”谈话的外相。在松冈身上看不见有田所惯有的“谨小慎微”的样子，若与内田伯爵那种谜一般的人相对照，就更显出不同外交手腕的两个极端。

近卫公爵我看是一个体质差、健康坏、意志也薄弱的人，他之所以极勉强地被突然捧到现在这个地位，是仗他的家声和传统，也是不可抗拒的形势逼成的。他肩负的任务綦重，观看他如何应付，倒是挺有趣的。

8月底的态势大致就是这样。

一个不为日本重视的警告

1940年9月2日

有个开明的日本友人说，他刚在叶山见到金子伯爵[1]，这位老先生虽仍有肾病和皮肤病在身，但不久还是要来东京参加枢密院的会议，那时就要来看我，答谢我去夏对他的访问。我对这位朋友说，不敢让金子伯爵劳神，我去看他好了。

我的这位朋友说，金子伯爵听到一些谣传，说美国商人现在不想和日本做生意了。他料想这种传说不确，不过原口将军即将赴美了解真相。我告诉这位朋友并请他转告金子伯爵，日本军人在中国危害美国商业和其他利益的情况日趋恶化，而不是在好转。春间我请他向金子伯爵转述的一般情景迄无丝毫改善。我又较详细地描述了现状，告诉他，美国在中国的工商业，是经过几代人经营起来的，日本人却用垄断措施、外汇管制和其他全属非法的手段使之毁于一旦，这是因为日本人要在经济、金融、政治各方面把工商业领域全部控制起来。我的朋友表示惊讶，并说金子伯爵方想不到情况竟是这样。我请他把我的话原原本本地转告金子伯爵。

330

我这才详细谈到日本当前的政纲，指出依靠轴心国，日本只会沦为附庸，如此行事，目光极为短浅，甚至连筹建东亚经济集团也是目光短浅的表现。我用许多话说明，在任何事情上信赖希特勒，

① 政界耆宿；从前是西奥多·罗斯福的朋友。——作者

都是愚蠢的；告诉他何以德国决不会支持日本在中国取胜。又告诉他德国人为什么要在德国和英美的纷争中拚命拖日本下水。我说，作为日本的挚友，我为它的前途叹惜，担心它按现在的路子走下去，最后就会不再成其为一个大国。凡是头脑清醒的人都看得出，即使单从实际情况，从商业、经济和财政上着眼，也应该采取同美国增进友谊的方针。但是，只要日本继续侵犯我国在这个区域的权利和正当利益，两国关系就不会有任何改善的可能。

这位日本朋友显得颇受感动，说要立刻回叶山，向金子伯爵转达我的意见。我希望，在即将召开的枢密院会议上，这位老先生能将我的意见透露几分。他知道我是作为日本的朋友讲话的，假如我说的不是事实并且不是众所周知的事实，那的确是很难说出口的。我深深感到，日本若仍坚持目前的政策，就等于往礁石直冲。

松冈解释日本何以就印度支那问题发出最后通牒

1940 年 9 月 20 日

收到并译出国务院 9 月 19 日电报后，便与松冈约定于 9 月 20 日下午会晤，我准确地按照国务院的指示行事。

松冈先生说，西原将军确已向印度支那总督提出了最后通牒，只是内容略有改动——改的是些什么，没有说。此事是怎样发生的，松冈作了如下说明：

8 月 30 日，法国大使根据法国政府的指示，与日本政府在东京签了一个协定。协定特别规定，日军调动，可以经过印度支那和暂用飞机场。印度支那总督本应在 9 月 6 日签一协定，以实施 8 月 30 日在东京签的协定，可是不知是何缘故，他拒绝了，并对东京协定的执行加以阻挠。日本政府迫不得已，只好去问法国政府，总

督如此坚决不合作，他的行动是否还受法国政府的节制，关于东京协定，法国政府是否守信义。法国政府说，它是守信的。总督却显然没有履行协定的诚意，据日本当局了解，他还向驻印度支那的外国领事们夸口说，他是在应用阻碍战术；因此日本人感到有必要提出最后通牒。

松冈说，其所以订那些措施，目的是便于日军攻打蒋介石，给中国带来和平。又说，战事一停止，日军就立即撤走；印度支那的领土完整和主权将得到充分尊重，因此不会打乱东亚的现状。外相说，他和近卫公爵以及政府其他成员是代表日本少数派的意见，他们有决心不让日本搞压迫、剥削，或损害别国的完整。他说，在这个问题上，国内正在进行一场反对极端分子的斗争。在这里我打岔了一下，我说，日法协定还订有关于印度支那的商业和经济的条款。松冈没有否定我的话，只是向我保证不会有剥削。

外相说，8 月 30 日签订的法日协定的条款是保密的，缔约国只要有一方泄密，条款便归于无效。又说，不过，他可以私下告诉我，订约一事是法国先提出来的，它要求恢复从前法日两国相互作过的保证。那大约是在缔结英日同盟的同时议妥的。确切的日期他记不清了，只记得协定生过效，向国际联盟注过册。（想必就是 1907 年 6 月 10 日订的法日协定。）我又打断松冈的话，问他，法国希望保证，是保证不受哪个国家的侵犯。松冈先生说，这个问题还要讨论。然后继续说，日本则要法国允许日军跨过印度支那并得暂时使用飞机场，作为答应它的要求的报酬。他叮嘱道，这些情由是秘密向我吐露的，以后外间如有传扬，即须斥其不确。

外相的话又长又乱，尽管如此，我还是尽量准确地撮其大意，向国务院作了汇报。当时外相说完就走，要赴另外的约会，我来不及说什么，只是告诉他，日军如调入印度支那，我国政府即断然视之为破坏现状，这是日本政府曾经允予保持的，至于如何进一步说

明我国政府的态度，则要等研究了我的汇报后才决定。

日本成为轴心国的正式伙伴

1940年10月1日

9月是日本史上和美日关系中一个最重要的时期。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同盟[①]，乃势所必至，自近卫政府成立之日起，日本政策的倾向，即有可能产生此种结果，但这么快就订成盟约，实出意料之外。活动一直严守秘密，主要是由德国特使冯·施泰默尔在东京进行，自然有人作种种揣测，但知道谈判进展得如此迅速的人为数极少。有些美国新闻记者甚至到了签约的那个下午的5点钟还仍旧以为条约是要在东京签字而不是在柏林，我的某些同僚则直到签约的那天都还在轻视三国结盟的可能性。

尽管我们大家都或多或少地象在暗中摸索，但我们还是根据远自8月3日以来的报刊评论呈报过我们对此事的推想，我在9月20日去电称，从可靠方面获悉，天皇在前一天历时三小时的会议上，已当着全体阁员和陆海军最高当局批准了与德国缔结防御同盟。可是，这个消息总是不能得到证实或进一步说明，直到最后一刻，我们依然什么也不能肯定。

333

同盟条约是9月27日在柏林签字的，这件事，我尽量从各个角度来思考，29日便有了如下一些想法：

很清楚，同盟主要是针对美国的。条约有利于德国和意大利之处是显而易见的，它可以改变太平洋地区的形势，使美国有后顾之忧，但日本能得到的好处却不那么明显。实际上似乎也真有点

---

① 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三国签订了同盟条约。条约规定：三国互相承认彼此在欧洲和亚洲的“领导地位”；在受到第三国——未参加中日战争及欧洲战争的国家——的攻击时，进行互相援助。——译者

受惠不均，除非已就下列一点或几点订有秘密条款：(1)支持日本控制或开发法属印度支那及荷属东印度群岛；(2)由德国在重庆斡旋，调解中日冲突；(3)同苏俄合作，以解除日本的北方之忧。

就第一点来说，只要德国控制住维希政府，日本就可以在印度支那畅行无阻；同样，德国如在荷兰逞威，日本就可以对巴塔维亚大施压力。后面这一着，我觉得是三国同盟最危险的潜力之一。论到第二点，只有苏俄合作，才能对蒋介石施加有效的压力。至于第三点，情况还很不清楚。有个同事昨天听见苏联大使很干脆地说，盟约的内容他事前也不知道，但人们又在议论纷纷，认为苏日终将订立互不侵犯条约。

有个素来同情美英的日本人在盟约公布后悄悄地说，美国何不派一支海军访问新加坡，民主阵营要采取报复手段，最有效的莫过于这样做，这一步骤一定能发生影响，使日本的过激分子有所顾忌。若由英国出面宣布，它愿意让美国军舰使用新加坡海军基地，也可以起同样的作用。

很明显，订了这个条约，日本就是把很大的赌注押在英败德胜334上。最近会到外相，在不供发表的、非正式的谈话中，我表示这样的意见道：日本走现在这条路，无异于向岩石直奔；日本与德国结伙，无论欧战的结局如何，都只能落得一个当附庸的下场；不管德国许下什么诺言，它都不能、也不会给日本提供有效的支援，我觉得，为了建立一个经济上不健全的东亚集团，就牺牲世界贸易和商业上的自由交流，日本财政和经济的前途必将毫无希望。松冈先生没有和我争辩，只是说，我的这些看法都是个人看法而已。

据我看，还有一件要事，那就是9月间曾给华盛顿拍了一封我只能称之为“绿灯”的电报，这也许可以说是我出使日本八年来发往华盛顿的最值得注意的文电。将来记录上会表明，在7月间米内内阁倒台以前，我提出的劝告都始终是属于“红灯”一类，并非主

张"姑息"，是建议不要用强制的手段，而要用和解的方法，以便施展积极的政治手腕。日本损害美国权益、特别是在华权益的行为有增无已，在这种情况下，仍谈和解，已是越来越难了，不过我知道，径直实行制裁，就会使日美关系无可挽回地低落下去，只要还有一线希望，能使日本脱离极权主义国家而摆向民主国家，我觉得我们仍然应该继续朝这个方向下功夫。放弃这种努力，我认为就等于自认失败。……

尽管事后聪明不难办到，我还是觉得大使馆提过的劝告，没有哪一项是事后看来应该改变的。外交已败于国内外的一些倾向和势力，这些倾向和势力决不是外交控制得了的。

米内内阁倒台、近卫和松冈领导下的所谓"新体制"建立后，我花了大约六周或更多一点的时间来观察和思考，现将我对局势的判断于日记中概括如下：

《芝加哥每日新闻》驻中国记者A·T·斯蒂尔先生关于日本局势的意见已细加研究，我看这些意见是很有根据的。他认为，对美国来说，最明智最安全的海军政策是坚定不移，他认为美国有一种倾向，总是过分强调坚定政策会带来危险：他的这些基本看法则颇有见地，值得下很大功夫思考分析而好好评论一番。

制定美国对日政策，必须依据华盛顿政府较为全面的观点，依据我们大使馆也许还看不到的许多因素，在阐述我现刻对这个大问题的意见时，我是经常记住这一点的。

毫无疑问，不管日本现政府是怎么想的，反正军部和此间其他极端分子都是把当前的世界形势视为实现其扩张野心的理想时机。德国的连战连捷，已象烈酒一样，使他们陶醉如狂。英国会垮台，他们直到最近还坚信不疑。他们深信德国很快就会得胜，应趁德国还在默许日本扩张的时候，赶在德国海上实力终必加强因而可能阻碍日本伸展其东方霸权之前，先巩固日本在大东亚的地位，

如此方为得计。这些人尽管一直都在密切注视美国的态度，但他们总是把美国估计得很低，认为它不会作什么有效的反对。开明人士，无论在朝在野，又都一直没有约束约极端分子的能力。

不过，现在我发觉，新政府就职时突然出现的那种乐观情绪慢慢冷下来了。政府、陆军、海军和日本国民现已开始觉察到，英国终究还是有不败于德国的可能——这种可能性我曾再三向我接触到的日本人明确地强调过——除了逐渐有点认识而外，他们还看到了我国和英国在共同防卫的事业中团结日益紧密，美国在大西洋英属领地上获得海军基地，而把五十艘驱逐舰让与英国以支援其海军，就是例证。有些消息正传到他们这里，说美国要赶建两洋海军，可能要加强太平洋海军基地，甚至说美国终将使用新加坡。

336

这些报道和事态发展，正在日本人的意识上产生可以预料的影响。一方面，这些倾向都着重指明，英美合力或美国单干，最终都将有积极行动，日本正面临着这种行动可能造成的危险。英美共同采取防御措施会造成什么危险，日本早有理解，它总是尽量避免同时得罪英美，就是明证。另方面，这些报道和事态发展又使某些集团更加振振有词，他们想把原料产地和市场统统置于日本支配之下，以确保政治上经济上的安全。日本人正开始怀疑，即使德国战胜，他们在中国和在南洋的扩张计划是否会因德国得胜而遇到新的危险。同时，在他们的思考中，苏联将来会采取什么态度和政策，又还是个未知数。

上面概述的各种因素，正开始使日本人迟疑不决。特别是在荷属东印度群岛，压力下的外交谈判将会继续下去。但东京政府竟能阻止军人执行其猛然入侵印度支那的计划（哪怕是暂时的），这也就是略趋于慎重的表现，我确信，这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与我国的态度有关。看来，在弄清世界局势、尤其是美国立场以前，日本很可能仍将继续实行斯蒂尔先生所谓的蚕食政策。

我国若强行制裁，结果就会使日美关系江河日下：这个意见已经谈过了。我国最近开始实施的国防计划，现在固然可以为一些措施辩解，谓其不一定属于公开制裁。可是我们必须记住这样的可能性：严禁石油之类那么重要的产品出口——美国盛产石油，乃众所周知——就会被日本政府和国民视为伪装得不巧的裁制，就可能会、也许简直就会惹起某种报复措施。要是日本陆海军认为他们的扩张计划被破坏应归咎于美国，那么，是否会发生斯蒂尔先生说的美国强调得太过分的那些危险，就不取决于日本政府的深思熟虑，而要由陆海军的鲁莽灭裂的性情来决定了。这种报复，可能表现为由政府用一些措施来反击我国禁运，但更可能的是，陆海军不让政府知道或不先经政府批准就采取某种突然行动。这些危险是无法预计的，是任何时刻都不能准确估量的。可是，否定其存在，或者贸然制定政策和采取步骤而不充分重视这些潜在的危险并决定直接对抗这些危险是明智的，那就是目光短浅了。

陈述下列意见时，我总是记着我出使日本的两个基本目的，那就是，增进和保护美国的利益，维护我们两国间的友好关系。碰到这两个目的发生冲突时，应以何者为重，乃是上级推行什么政策的问题，这就不在我的权限之内了。我的意图只在于就我们使馆所见，把时局中的主要因素讲清楚。强硬政策包含的危险已经谨慎地阐述过了，现在再来谈谈放任政策会带来什么危险。

不把日美关系看作世界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就不可能讨论直接有关的问题，也不可能正确地观察这个问题。从全局着眼，可以看到几个方面，略述如下：

(1) 美国和英国，乃是散在世界各地的一大群英语国家的领导者。这些国家代表着一种生活方式，今天这种生活方式正在受到另一群国家——德国、日本和意大利——的令人震骇的威胁。德、日、意公开宣称的目的是，要用武力把它们的意志强加于被征

服的国家。用外交手段，力图与这类国家协商，一般是无效的。有时候外交手段可以延缓它们的攻势，但却不能完全堵住它们的攻势。只有武力，或者准备使用武力，才能制止它们实现其目的。现在必须把日本归入掠夺国家之列。它已经抛弃了一切道德伦理观念，已经成了自认不讳的、无耻的机会主义者，一有机会它就尽量利用别国的弱点以牟其一己之利。它的南进政策，对美国在太平洋的利益构成明显的威胁，对大英帝国在东方的地位构成致命的威胁。

338

(2) 可以说，美国的安全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英国的海军，而英国海军又得靠、而且只能靠大英帝国来支撑。

(3) 在目前这个时期支持大英帝国，对它来说是生死攸关，假如我们把这种支持看作也是我们自身的利益所关(事实正是这样——我的看法很明确)，那么，至少在欧战的结果判明以前，我们应该尽一切办法维持太平洋的现状。单靠表示不同意和把意见仔细记录下来，我看是不能维持现状的，我们的利益也不再能够得到充分的和适当的保护。很明显，日本之所以还有点顾忌，没有用更蛮横的手段对待美国的权益，也只是因为我国的潜在力量未可小觑。但是它又往往相信，美国人民不会允许使用这种潜力，因此，同样明显的是，它的这种信心达到什么程度，它蔑视美国权益的行为也就干到什么程度：二者恰成比例。一旦这种信心被打破，外交手段就可望重新有效了。

(4) 如果我们凭坚定的政策，能在英国赢得欧战胜利之前维持住太平洋的现状，日本就将面临一种形势，使它现有的机会主义观点不可能再占上风。那时也许就可以着手重新解决整个太平洋问题，使其符合美日双方的长远利益——当然是在公平的基础上。在日本的观点未彻底更新以前，只有显示武力，同时下决心在必要时使用武力，才能有效地获得这种结果，才能保障美国未来的

安全。

因此，考虑到日本此间的实际情况和它现在的观点，我的意见是，现在已经到了这样的时候：美国若是继续运用耐心和克制，反倒会使美日关系越来越不稳定。如能迫使日本政府和国民信服，看到自己确是对自己的力量估计过高，终必失败，那么，钟摆最后还是会摆过来，这时，重建美日友好关系还是可能的：这是我的希望。除此以外，别的我看都是绝路。

当我结束9月份的日记时，心情很沉重。我过去所了解的那个日本，已不复存在了。 339

有些日本人对与轴心国结伙心怀疑虑

1940年10月2日

很难确切估计日本公众对日德意三国条约的反应，理由有二：(1)现在的报刊审查和舆论控制很严，(2)我们原来那些与日本人联系的可靠而重要的消息渠道一般都不能再用了，部分原因在于，日本人一和美英大使馆接触，往往就会有警察来找麻烦，另外则是由于大多数日本朋友似乎都放弃了与美国改善关系的一切希望。(我们知道，有几个日本旧友——包括妇女——已经上了黑名单，正在被严密监视，有些以前经常来访的密友，现在则连和美国人换一下也怕人看见。最近有个喝得有点醉意的日本朋友把这一切憾事都告诉了我。)那些与美英有利害关系的日本商人，由于政府新近采取的背离美英的方针，利益受到损害，对"新体制"、特别是对与轴心国结盟深感遗憾，因而私下也强烈地表示了一些意见，但这些意见决不能拿来作为准确衡量整个舆论的标准。

不过，就大部分舆论来看，很多人对这个条约都明显地缺乏热情，我相信，此中就有海军，甚至还有陆军和政府中的某些集团。我

们知道，首相是死命反对缔结这个同盟的，只因陆相和外相在御前会议上发起猛攻，他才输了，尽管天皇本人对此事也很不高兴。1937年订"防共协定"时，曾有过提灯游行、执旗游行、街上张灯结彩等示威活动，这表明至少还有一点自发的热情，而这次却什么也没有了。《报知新闻》实在天真，竟然写道："必须想点什么办法，使国民的血沸腾起来。对日本来说，三国条约乃是激动人心的进行曲，并不是挽歌"！天皇也觉得有必要下一道诏书，自1934年日本退出国际联盟以来，这样做还是第一次：此中意味，可以想见。诏书一出，就立刻把所有公开的反对言论压下去了。

至于转述美国的评论，日本报纸非常小心，美国大报的强硬社论它们都避而不提，美国有些头面人物[1]发表的温和言论它们则常常用大号字着重宣扬，同时还对萨姆纳·威尔斯[2]在克利夫兰的演说断章取义，专把调子温和的某些段落抽出来。关于美国希望实行"绥靖"政策的说法，竟在日本报纸上变成了大书特书的条目。

判断日本将来的策略，必须谨慎，不要为大量基于空想的推测和意见所惑，必须静观事态发展。盛传日苏将订互不侵犯条约，如果订成，当然会对时局发生很大影响。德国军事代表团即将来日，这是根据条约的规定，瞻望此事，我有点担心，因为代表团成员决不会只谈技术援助和物资问题，一定还要在这里、特别是在日本军部中煽风点火，催促他们南进，驱使他们同美国开战。

有些同僚曾问外务次官大桥先生，日本与德国结盟有什么好处，他答道，这个条约是直接针对美国的，自从1924年的《移民法》

① 《使日十年》第一版曾在此处提到这些美国人当中的一些人的名字，现在删掉了。日本报纸把他们的原话歪曲篡改得很厉害，以致造成错误印象，以为他们是赞成绥靖政策的。——作者

② 萨姆纳·威尔斯(Sumner Welles，1892—1961)，1937至1942年任美国副国务卿。——译者

以及满洲事变以来，日本进行必要的扩张，美国都一直从中作梗；世界极权主义将代替业已破产并行将被扫除的盎格鲁撒克逊主义，日本不得不与另一阵营结盟，这个阵营并不是那么毫不妥协地定要维持现状。类似这样的话他也跟我讲过。

松冈说明日本参加轴心国的理由

1940年10月5日

外相交给我一份日文声明，题为"就三国同盟问题致美国的声明"，大意是，条约不是针对某个特定国家的（尽管大桥对我的同僚说过，条约是直接针对美国的），如果美国理解东亚新秩序，日美两国间就不会有什么纠纷。我们大使馆将原文译出如下：

就三国同盟问题致美国的声明

最近缔结的三国盟约不是针对任何特定国家的。日德意联合起来，被另一国进攻的可能性就减少了，可以防止世界混乱蔓延，在这个意义上说，三国同盟对世界和平是有助益的。通过这个盟约，日本也进一步表明了它要在包括南洋在内的大东亚建立新秩序的意图。

建立东亚新秩序，就是要建立一种新的制度，使日本能与包括南洋在内的大东亚所有地区的各民族建立共存共荣的关系。与所有其他国家处于平等的地位，日本就可以在大东亚各地自由地经营工商业并向这些地区移民，由此就可以解决其人口问题。这并不意味着要开发和征服这些地区，也不是要封闭这些地区，排斥别国的工商业。日本久已试图通过移民、对外贸易和在外经营企业来解决它的人口问题，但欧美各国总是把日本移民拒于其广大领地之外，给贸易和企业设置障碍，致使日本解决人口问题的种种合

理、和平的努力皆成泡影。

大东亚共荣圈内，正在努力消除那些不自然的、强加于人类自由活动的限制。预计完成此项工作，将尽可能用和平手段，对现状尽量少作不适当的变更。

日本的对华政策，构成上述努力的一个重要部分。可是，由于有些中国人对此缺乏理解，由于英美采取不承认满洲国的态度而使蒋介石怀着收复满洲的希望，不幸的武装冲突爆发了。这场冲突，实即战争，日军在其活动中就不可能不触动列强的在华权益。当这些权益妨碍日本对华作战时，情况更是这样。因此，要终止对这些权益的触犯，最合适的办法应是鼓励和促进日中媾和。尽管实情如此，列强仍不仅搬用教条式的法理论据和因情况变化而不再适用的条约见解来抑制日本的行动，而且还用限制向日本出口重要商品之类的手段来压制日本，同时又给日本的敌人蒋介石政权以积极援助。这些行为都是出自不可告人的动机，即总想尽量拖长东方的混乱状态，消耗日本的国力。我们不得不认为，这些行为并不是由于爱好和平，也不是旨在保护权益。日本与德意签订防御同盟，目的不外是要抵抗这种来自列强的压力，丝毫也没有出击他国之心。假如美国理解上述形势和情况以及日本建立东亚新秩序的用意，即使在订了这个盟约之后，日美关系也不会有任何变化。日本有决心解决日美间的一切悬案，增进和美国的友谊。

日本政府已经把我和日本现政府官员谈话时经常出现的一些要点写下来了，就我所知，以前还没有这样做过，它直言不讳，在这方面以前不论哪届政府都赶不上它。有几点颇为突出，值得注意：

(1)“新秩序”现已伸及大东亚，包有南洋在内。

(2)在这个大圈子里，日本“可以自由从事企业、贸易和移

民”，但又说这并不意味着征服或开发，也不是要封闭这些地区，排斥别国的工商业。

一看到这一点，许多想法就涌上心来。譬如，在荷属东印度群岛办企业和移民，是不是要强加于人？如果是，不先征服，又怎么办得到呢？允许日本办企业和大量移民，都是违背荷印的政策的。办企业和开发之间，若说有什么差别，差别也微乎其微。

日本一旦在这些地区站住了脚，要是日本人的本性不改，那么，其他国家就将有好得不得了的“自由从事工商业”的机会。

(3) 这个声明，矛头直接对准我国的移民法，对准我国为阻挡廉价日货泛滥而规定的进口限额，以及我国的道义上的禁运和按战备计划实行的出口许可证制度。

那些责难，不值一驳，说一句就够了：要是日本处在我国的地位，它也完全会这样做。

(4) 日本将努力实现它的计划而“对现状尽量少作变更”。

(5) 中国事变爆发，是因为英美不肯承认满洲国，是由于有些中国人认识不足。

上面头一点倒是个全新的思想，我以前从来没有看见记录过这一点。至于中国人，其理解力恐怕真是太迟钝了。

(5) 墨守法规的论点——过时的条约见解——以禁运压日本——支援蒋介石。

这段没有什么新东西。

(6) “这些行为都是出自不可告人的动机，即总想尽量拖长东方的混乱状态，消耗日本的国力。我们不得不认为，这些行为并不是由于爱好和平，也不是旨在保护权益。”

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动机。非常简单，我们要蒋介石打胜，是因为他合法地、正当地代表中国。此外，我们深知，蒋得胜后，不管我们的权益会有什么遭遇，反正不会比目前日本统治下正在发生

的情况更坏。至于说“消耗日本的国力”，日本的军事实力是要大大削弱，只有在这个时候，日本军部才会信誉扫地；在军部失势以前，远东决不会有和平。

344

松冈谈话两小时十五分

1940年10月5日

今天我应邀往访松冈外相，谈了两小时十五分，谈话绝大部分是非正式的、不供发表的。和往常一样，谈话约有百分之九十五由松冈包办，因为他那持续不绝的独白除非硬插话进去是打不断的。尽管有时他也提出一些显属有趣的论点，但他说话总是象滔滔流水一般，一泻不止，要记录都很难。

这次松冈先生谈的主题是，当前的世界情势乃是旧传统同机械时代发生冲突的必然结果。此番会谈中只有一次我语气激昂，那是外相的话引起的。他试图为以战争实现国家的扩张辩护，认为这是出于迫切的需要，德国的情况尤其如此。正如我以前说过的，旧时的德国，我有亲身的了解，当它安处于国境之内时，它是一个幸福、自足的国家，进步而且繁荣。如今德国领导人把弱小的邻邦碾为齑粉，以满足其狂妄自大的野心，这种行为，无论如何也不能用需要作借口而予以宽恕，假若硬要这样做，那是十分荒谬的。至于日本，我个人很知道它经济上的需要。可是，日美关系走到现在这种可悲的境地，并不是经济上的合理要求造成的，而是由于日本要用武力来满足那种要求，不肯采用赫尔先生的合理可行的计划中所设想的那些按合法程序以解决经济困难的方法。谈到这里，松冈先生接话，他认为英美的特性是自命不凡，总以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死也不肯承认自己有错处。对此我答道，我一直还没有发现过有哪个日本人肯承认日本已经违反了《九国公约》的条

款这样一个明摆着的事实。松冈先生的答话使我大吃一惊，他居然说，他非常愿意在我面前承认这个事实，但他又天真地说，当然，在政治上他不能承认，当年国际联盟会议上有人逼他承认，他就没有承认。

外相说，他曾经退隐过一个长时期，上届近卫政府邀他入阁，他三次拒绝，后来反复思量，痛念国家多难，这才前往敦促近卫公爵再度出山，因为他觉得，革命和混乱即将来临，惟有近卫这个人物能够救日本。近卫已不象上届那样是个游移不定的政客，而完全是另外一个人了，他下定了救国的决心，国内至今仍有爆发革命的危险。我问他怕的是甚么样的革命，松冈先生答道，“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革命”，他认为危险并没有过去。接着他又谈了一阵前任外相如何优柔寡断、意志薄弱。

松冈先生说，与德意结盟的事既已办妥，心中已无挂牵，他打算立即开始工作，竭尽全力解决我向他诉说过的一大堆事件。他要指导日本的对外关系，这是他出任外相的先决条件，他说他无意让军部、特别是那些狂热的少壮军官来向他发号施令。

谈话过程中外相还说到日本并没有把其他国家的利益逐出东亚的意思，而是欢迎别国合作，一同发展新秩序。我立刻打断他的话，我说，听到你这样讲，我很高兴。不过，正如我多次讲明的，事情的真相是，美国经过若干代积累起来的许多合法权益已经被逐出日本了，驱逐的速度还正在加快。松冈先生的回答照例是，对华战争一结束，蒋介石一被打垮，这些问题就会得到解决。他还照例呼吁，美国应当停止援助蒋介石。我也照例把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重说一遍。

临走时外相恳求我力劝我国政府不要再进一步对日本实行禁运。他说，这些禁运“不会给我们造成严重的困难”，但却会大大激怒日本国民。他又说，一想到日美之间会发生战争，他就不寒而

栗。(关于禁运，我看松冈先生也说得对，和长远的效果对比起来，眼前的影响当然不严重。)

346

日本害怕美国主动采取措施

1940年10月9日

许多星期以来今天第一次外出，从东京驱车约七十分钟至霞关，参加美国俱乐部每半年举行一次的高尔夫球赛，外务省却偏挑这个时刻来找我，要我赶紧回去。大使馆办公处说我6时即归，大桥以为还是太迟了——他要马上见我。得到消息时幸而我已经打完了最后一盘，那时我也还是从容行事，五时三十五分终于来到了外务次官的官邸。这么急别无任何理由，只不过是因为据说我国政府已"命令"远东的美国公民撤退，报上又传说美国政府已决定对日本宣布全面禁运，外相显然很紧张，遂叫大桥立即召请我。

关于禁运，我说我毫无所闻，至于撤侨，我说我国政府并没有下过什么"命令"，只是提个建议，以防万一。当大桥谈到我国"禁止输出"废钢废铁时，我便把赫尔先生就这个问题对堀内讲的话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大意是，此乃依据我国战备计划，纯属内政措施，日本既在不断损害我国在远东的利益，它就没有多大理由对此表示抗议。幸运得很，和大桥会晤前，适接国务院来电，述及与堀内的会谈，这种电报确是太有用了。

大松还谈到日本希望与美国和睦相处，并无进攻美国之意，我答道，我们对日本亦同具此心，正如大桥先生所知，美国人民是酷爱和平的。可是日本最高层政治家最近发表的煽动性言论，已使美国政府和人民对日本的真实意图感到可疑，那些言论已在我国引起了恰如所料的反应。我还说，那些言论必然会对我国的战备计划发生影响。

这次会谈以及如此急迫地要见我，都清楚地表明，最近日本政府成员的挑衅性言论在美国引起的事态发展已使松冈深感不安。我以前在建议我国政府应在一定时刻考虑撤走远东的美国人时，曾经说过，此举将在日本人的意识上产生强烈影响：这话现已得到了证实。

裕仁和近卫对三国盟约的真实想法

1940年10月22日

今天有人告诉我，他从可靠方面获悉：天皇和近卫公爵都激烈反对三国同盟，但是，天皇发觉，假若不同意，他也许就活不成，他对近卫说："唉，你我二人只好同浮沉共命运了。"这消息是间接从一个皇族成员那里得来的。经常有人在谈论，近卫将会倒台，将由一个军事独裁者取而代之，复活旧时"将军幕府"[1]式的政体。不过，这显然是代表偏激之见，如今三国同盟既已缔结，近卫也就暂时可以熬过困难时期了。

有个趋附亲日活动的美国杂志主编来访大使馆

1940年10月24日

日本报纸上登了一些谈话，据说是《当代》杂志发行人沃克·马西森先生讲的，我便邀请马西森先生今天来访大使馆。我告诉他，我很小的时候就记得，我时常爬到我家堂屋里的大桌上去，现在还记得，我发现上面有一堆杂志，期数虽多却只是一种。那就

① 幕府政体是日本封建时期掌握全国大权的军事独裁政体。首领称征夷大将军，居处称幕府。天皇徒拥虚名，没有任何实权。——译者

是《当代》杂志，惟有这一种是我们当时买得起的，由于发生了感情，后来我自己还订阅了好多年。我用这种方式把话引入正题，是为了向马西森先生表示，我对他的期刊有兴趣，因此，自然也就关心期刊的主办人。我还觉得，讲了这段背景，我就可以坦率地谈论我今天想谈的问题而不致引起任何误解。

过去八年间，我都一直在为改善日美关系做工作，但遗憾得很，这种关系现已陷入非常紧张的状态，尤其是最近这个时期，为了估计美国政府和人民的对日态度，日本人对美国公民的言论特别注意，细察入微。就在这个困难时刻，马西森先生来到了日本，并对日本报界发表了谈话，这些话一经推敲，便使人得到这样的印象：(1)美国人民一般都不了解远东，(2)美国政府的政策和最近采取的那些措施是以国内政局以及此种政策和措施对即将到来的大选的影响为依据的，(3) 美国人民的想法与此政策、措施并不一致。

我对马西森先生说，在美国，我们非常珍视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权利，但是，一个美国公民，来到国外，又值国际政局紧张之际，而在外国人面前非难自己的政府及其政策和措施，显然就是不忠、不爱国。我说，报上报道的马西森先生的言论，同我在此间正在进行的工作针锋相对，有拆台的作用，因为这些言论所造成的印象和我正在努力传布的印象恰恰相反。因此这些言论会给美国利益带来很大的损害。日本报刊常常误引外宾的话，我完全了解这种情况，但是，关于马西森先生的谈话，我没有听见有人出来否认，说报道不确。我向他呼吁，作为一个忠诚的美国人，希望他以后不要再发表那样的谈话了。

马西森先生不否认报道的准确性。他说，他来日本是为了熟悉远东的情况，没有想过要跟报界谈话，但新闻记者老是来缠，很难避开。他说，他承认我的态度是正当的，他对他的行事极为懊

悔，我对他说的那些需要考虑的事他以前没有充分意识到，今后他决不再公开发表意见了。

重新考虑日本参加轴心国一事

1940年11月1日

事态发展太快了，我简直不敢回头去看以前的日记，因为里面前后抵牾之处甚多，这表明它不过是一种一天一天凑成的百衲本。但它至少可以显示我们在一定时刻——写日记的那个时刻——的想法和所得的情报，有些情报是确实的，有些则完全不可靠。它可以显示我们是怎样时常在暗中探索和瞎摸。幕后发生的事情，我们越来越无法知道了，只因可靠的门路多已断绝，即使身在幕后，这边也往往不知道那边在干什么。迟至8月，我还写道，德国人老是挑唆日本与美国为敌，日本政府已日益厌倦：现在读起这些文字很是难受。

许多政府中人，也许占大多数的在野的日本人，的确是感到厌倦。可是一个月以后，日本人已听任德国人把他们拖入了三国同盟，把德国人设想的使日美终必一战的目标定为同盟的目标。亲轴心的白鸟派胜利了。也有这样的看法：松冈真想同美国搞好关系，他将朝这个方向尽力而为。是的，他的确是想搞好关系，但他所希望的关系是要建立在我们先得放弃我们在远东的合法权益的基础上。在那样的基础上，我们可以享受最舒服的友谊。当拥有松冈、大桥、白鸟在内的近卫政府成立时，我们得到的是一张还没有冲洗的底片。照片的概貌我们先就知道了，但具体的轮廓如何却不知道。现在底片洗得相当好，模样正在显现，就未来的日美关系来说，这可不是一张赏心悦目的照片。

三国同盟既已成立，我们就不能再把日本当作一个单独的国

家来看待。它已经成了一个组织的一员，我们的对日态度，必定也就是对待那整个组织的态度。

另外，此间情况正愈来愈糟。“新体制”不得人心，不满情绪正日益增长。前几天连陆相自己也不得不宣称：不必把新体制理解为要排除生活中的一切乐趣；他显然看到事情已经弄成什么样子了。政府内部争吵不休，莫衷一是，还有许多人在说，已经成为仅仅是挂名首脑的近卫，日子也长不了。在日本，钟摆总是摇个不停；稳健派说，不久就会摆回来，趋于正常，但我看未必。恐怕还会更朝那面摆，摆到极端，倘若近卫倒台——辞职抑或通过政变——继之而来的很可能是军事独裁，甚至还会是幕府一类制度的重演。

至于美日关系，我们现正等待大选，又要看大选后情况如何。日本人也在等。这次我们让他们猜。他们正在想，他们是否还在掌握着主动权，对此他们已开始怀疑。

野村海军大将被任命为日本驻美大使

1940年11月7日

今天在苏联大使馆庆祝苏联国庆的招待会上，松冈告诉我，他今晚要再找野村将军，劝他出任驻华盛顿大使，他认为这次可以成功。

1940年11月8日

松冈打电话给我，说他昨晚已说服了野村将军，天皇已批准他任驻美大使。我电告华盛顿，谓野村此人品格高尚，经长期交往，我觉得他值得敬重，他以前做外相时，曾被认为是基本上对美友好的：因此就这个人来说美国政府可以接受。顺便提一下，松冈曾再三对我说过，若论驻美大使的人选，当然是以他自己最为理想，但

是东京离不开他。因此任命野村显然是不得已而思其次；

松冈谈罗斯福和野村

1940年11月10日

今天和外务大臣谈了两小时，我陈述了一大批各色各样的事件，占去了大部分时间。

外相说，他邀我来他的私邸喝茶，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只是想这样间或非正式地谈谈，可以保持联系，还想告诉我，关于我方指控的日本侵犯美国在华权益的事，他正在不断尽力消除我方抱怨的根源。

松冈先生首先请我在发回国去的电报中转告总统，他个人对总统的重新当选表示衷心祝贺。

外相说，这次请野村将军出使美国，野村曾两度拒绝，因为此去势必要向美国政府提出一些保证，而一旦内阁更换，外相易人，新外相若不赞成松冈先生的意见，这些保证就会归于无效；他野村不愿被置于这样的地位。外相说，他那样坚决地劝说野村接受此职，并且终于能够打消野村的顾虑，这都雄辩地证明了他自己对待美国的态度。

外相说，大使馆和外务省之间的来往文件全都要他过目，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他的日常工作有时竟延长二十小时以上，尽管如此，他还是告诉他的最高部属，他不容许用官样文章答复美国的抗议，每个事件，他都要知道全部事实，这样他才能够向我展示日本立场的真相——至少可以口头说明。他打算就这样做。他说，他承认有些做法很荒唐，例如，许多新事件竟说要由中国新政权负责而不应由日本政府负责。他要改正外务省方面的这种态度。

关于今后的演变，我告诉外相，要使美国有好的观感，行动和

事实胜于官方声明。

我还告诉外相，大桥先生曾对我说，外务省很少从日本驻美大使馆得到关于美国报刊评论的材料，我对此表示惊讶，因为我却习惯于把日本报刊的评论每天都全部电告华盛顿。我表示意见道，特别是在这个时期，日本政府应当知道美国报刊、也就是美国公众在想些什么、说些什么：此点极为重要。

352

日本帝国庆祝其诞生二千六百周年

1940年11月10日

今天是日本帝国建国二千六百周年两天庆祝会的第一天，幸喜两天都遇到好天气，轻寒中日丽风清。头一天是贺典日，第二天是庆祝日。几个月来，一队队男子和女学生已一直在宫城前面的广场上干活：整平地面，竖立带上装饰的柱子，陈设无数的鲜花，最后搭起一座大篷，篷前设座位若干排，可供五万人入座。这些人全都是特邀的，只有他们能看到庆典，因为任何人都不许站在丸之内一带办公大楼的屋顶上和窗前，要不然这些地方就会变成场外千万人的看台。任何人也不得从高处俯视天皇，我注意到那些屋顶和窗前确是空无一人。

这两日天皇和皇后、皇族大多数亲王和王妃（秩父宫患肺炎，病重缺席）、国家全体高级官员均到场。近卫公爵主持庆典，向天皇读贺词，领头呼万岁。

1940年11月11日

今天是全国庆祝的日子，我们在桌边就座，昨天却没有座位，一直站了一小时多一点，今天有得坐，也算不错了。今天以日本餐款待，米酒及其他肴馔一应俱全，但不能当场吃喝，而是要让我们

拿一块叫做“风吕敷”的大丝巾包着带回家去的，我们自然就把这包东西转送给我们的日本仆人，对他们来说，得一享“御膳”，总是无上的荣幸。还有礼仪性的舞蹈、多次爱国歌曲的合唱和乐队演奏。高松宫向天皇读欢迎词，然后我还得代表外交使团致词。

致词时稳步走过篷内全体来宾之前，又走过台下鸦雀无声的五万人之前，走到天皇面前，鞠躬，取出眼镜和稿子，宣读，再鞠躬，放回稿子和眼镜，再鞠躬，向后转，严肃地走回我原来的位置：这一套真是够呛。但还是干得不错，又因为我决定慢慢地读，注意咬清每一个字，所以后来我听说，通过扩音器，大家都听得很清楚。连美智等大使馆仆人也群集在收音机旁，每个字都听见了——会上的贺词播到全国。在其他节目中一直板着面孔的天皇，听我读祝词时每听到一个要点都点一下头，当我最后读到希望日本能对人类共同文化和幸福作出贡献时，他的头点得尤为起劲。第二天法国大使阿塞尼-亨利特意来告诉我，他曾注视天皇的表情，深信天皇那样频频点头赞许，是要帝国政府和最高官员们记住，他自己是渴望和平的。阿塞尼-亨利对此印象很深，特将此事当作一个重要的政治迹象电告他的政府。甚至宫内省发的新闻稿也宣称，“陛下好象非常喜欢”那篇祝词。不管怎样，事已办完，总算松了一口气。我的脸皮还不够厚，还不能不把这种差事看作一次严峻的考验。

附带说一下，祝词是国务院负责定稿的。在此政局紧张时期，我很小心，曾将原稿电呈国务院，经他们压缩精简后，成了一篇佳作，不卑不亢。他们任凭我再改，我却一点也没有改动。

今天我打电话给松冈，问他6点钟去不去东京俱乐部为二千六百周年祝酒。他说他不知道有这回事，我说：“喂，要是你来的话，我们就可以再聊一聊。”他答道：“好，我去。”6时45分，他进来了，同几个还没有走的俱乐部成员寒暄后，便和我退入别室，进行

了一次长谈。随时都可以直接打电话给松冈，倒是一个很大的方便，这样做是根据他自己的建议，以前的外相，肯定谁也不欢迎这种做法。

354

松冈是三国条约的幕后人

1940年11月18日

日文报刊皆盛传美、英和泰国已结成秘密军事同盟，有家报纸还说美国已给泰国一千万美元贷款。看样子很象是故伎重演：日本人在开始制造借口，以便对泰国施加某种压力——军事的或外交的压力——索取空军基地和其他设施的使用权，供最后扩展“南进”范围之用。我想我们定会看到事态朝这个方向发展。

关于三国同盟的缔结，在初只能推测，得自各方的消息又多属以讹传讹，后来我们才逐渐从这种混乱中挣脱出来。我认为，尽管原来有人说近卫公爵和松冈均非出自本愿，而是为极端分子所逼，但是现在相当清楚了，这事就是松冈搞成的，他还把近卫拖下水。我们从极可靠方面获悉，其他阁员要么只是略有所闻，要么就是完全蒙在鼓里，直到最后才被咨询一下。现在我从一个与宫廷有密切联系的人那里搞清楚了，天皇很不想批准三国条约，其所以终于同意，只是因为松冈对天皇说，他经过深思，确信如果不与轴心国结盟，同美国的战争就不可避免。从松冈嗣后讲的一些话来判断，这种说法我看是真的。

日本向南看

1940年11月25日

硕果仅存的元老西园寺公爵昨夜去世。考虑到他在日本社会

上声名卓著、地位崇高，除向他的嗣子西园寺八郎和秘书原田男爵发唁电外，我还命大使馆下半旗。

有迹象表明，日本政府已向蒋介石提出某种和平建议，据信是德国怂恿的，蒋介石若不接受，日本就正式承认汪精卫。几乎毫无疑问，日本的兴趣正日益转向“南进”方面，首要目标是控制印度支那。据信约有三个师团在海南岛集结，何时动用，视欧战的发展和美国的态度而定。

355

“亲善使节”赴美，亦徒劳无益

1940年12月7日

有个“日本经济联盟”的重要成员，作为一个我将称之为“Y先生”的日本知名人士的中间人，和我接连谈了几次，我因这事又和国务院通了几次信，并对当前政局作了一点简单的分析。Y先生胸怀某种宏图、或可说是计划，想要去美国，他相信，只要实行这个计划，美日关系就会立即好转。他的计划没有透露给我们，不过我猜一定还是老一套，即请美国从中斡旋，与蒋介石讲和。

我举出很多理由，劝Y先生打消他的念头，但后来他又修改了他的方案，说他还是想去美国，不过不作为什么亲善使节，也不搞宣传，只是去了解一下美国公众对日本的看法，以便取得第一手资料而向日本最高层政治家汇报。他和最高当局交往甚密，且有影响，我们是知道的。因此我告诉国务院，我认为也许值得让他走一趟——当然完全是以私人的身份。这个建议被接受了，只是附有一些条件。日本人，甚至大多数政府高级官员，对美国舆论了解之差，实属惊人，所以凡是可以启发他们的事，我都完全赞成。

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我还拿了一些美国大报重要社论——包括沃尔特·李普曼10月8日的文章——的影印本送给这位中

间人，建议Y先生拿给他的朋友们看看。后来我听说，那些社论已经译给了几个高级官员，他们见到自己那样不了解美国的态度，自己也不禁愕然。我觉得我这么做倒是一个极好的办法。

356 我对政局的分析可以概括如下：

日本政府现正奉行危险的政策，终究要闯祸，有些日本人是认识到的，Y先生的态度和他要去美国的愿望，就是体现这些人的近乎绝望的呼声。不过，他竟然自信他的“计划”能立刻改善美日关系，这也表明，他们还是根本误解了美国政府和人民的立场。他和他的同道都不能理解，我们不会仅为一时之利就转变方向，我们的立场是以植根于美国信念中的原则为基础的。

日本人在气质上能够领会这些基本事实的，恐怕为数不多。在他们的构思中，理解力或逻辑性微乎其微，因为他们的观点是长期以来被管制下的、沙文主义的报刊塑成的。他们把我们的政策说成是盲目坚持陈腐的法规观念，自私而又顽固地阻止日本进行正当的扩张，武断专横地不许改变现状。

这些日本人始终坚持认为，就在表层下面，有一大批持温和意见的人，如果美国做出某种实际的友好姿态来支持他们，他们就随时可以冒出来，夺极端分子的权，而美国人却认为现在应该先由日本来作这种友好表示，他们觉得很难理解。

不错，日本是有一大批稳健派，但不幸的是，这些人现在一如以往，既软弱无力，又表达不出内心的想法。一度很不稳定的近卫内阁，由于延揽平沼男爵入阁，陆海军两大臣又公开表示支持，现已相当稳固。从目前形势来看，我们相信，在现内阁被推翻以后，继之而来的其他内阁也定然会以同样的决心贯彻早已订下的方针，那就是，确立日本在“包括南洋在内的大东亚”的地位，它视此为理所当然，因为它已经成了现代世界的头等强国而领土上和经济上却依旧局处一隅。

至于日美关系，自从美国侨民部分撤出远东以来，驾驭这种关系的策略已经有所改变。美国政策趋于稳实、从容、却又坚定不屈，废除1911年《通商条约》后所采取的渐进步骤就是这种政策的实施，其效果日本现在正在领略之中。对三国条约以及日本最高层政治家紧接着发表的挑衅性言论，日本国内的反应是一片惊慌沮丧。现在发觉，算盘打错了，美国人并没有被吓倒，日本承认汪精卫后美国便立即贷款给中国国民政府，就是明证。

事情现已到了这样的地步：日本人是看到了，必须想点什么办法，防止发生最坏的情况，可是他们仍决不会考虑根本改变政策，但又只有改弦易辙，才能改善同美国的关系。绝对不能设想，有哪个领导人、或领导集团目前会出来主张撤出中国和放弃南进之梦。美日关系就这样陷人恶性循环。任命野村将军使美，也许意味着日本当权者在作最后一次努力，以防美日关系严重恶化，但若指望这位新大使有回天之术，能满足美国的期望，那也是妄想。

关于这一点，我重复了我在9月12日电报中说过的话，即：坚定的政策固然不免会有风险，但放任的政策却会在将来产生更大更严重的危险。

"轴心国赢不了这场战争"

1941年1月1日

又一年消逝到历史中去了，那是可怖的、残酷的一年，但也是世界上一些地区表现了人性最优秀品质的一年，人们为了最崇高的原则——自由、宽容、正义——而表现了英勇、豪侠、自我牺牲、战斗和必要时不惜一死的决心。我没有片刻丧失过对英国必胜的信念——这种信念当然不是根据去夏那些黑暗日子里的事实，那些事实当时我们还不知道——但在总统12月29日的广播讲话

中，我们得到了我们所能得到的最好的新年祝词，他说："我相信，轴心国赢不了这场战争。我抱这种信念，是根据最新、最好的情报。"

我们固然希望美国不卷入战争，希望与一切国家、特别是与日本和睦相处，但要是甘让自己受骗而产生一种虚假的安全感，那就是愚蠢透顶。正在往战争道路上走的是日本，不是我们，但这条道路对我们自己未来的幸福具有同样的危害性，因为日本走这条路时，是打着"包括南洋在内的大东亚新秩序"和"大东亚共荣圈"等冠冕堂皇的幌子。那些建议实行绥靖政策的美国人，要是能看看日本要人在最近日本杂志上发表的反映他们的真实欲望和意图的文章，哪怕是略看几篇，这些爱好和平的同胞也会明白，绥靖政策是一条死路。实行这种政策的时机已经过去了。有些好心肠的同胞也许会责备我，说我不提建设性的意见而偏要危言耸听，对这些人我偏要说，只有挫败日本极端分子的计划，使其声誉扫地，我们才能指望在东亚看到和平。癌症不加控制，它就会逐渐侵及它所能到达的一切地方，直至无法抑制其恶性支配力。但是，若在早期就控制住癌症，使其不起作用，当建设性的而非破坏性的力量重占支配地位时，我们还是可以看到日本回复到健康的状态。那时，正如我在呈总统信中说的，我们才可以着手同日本重建正常的关系，重新处理整个太平洋问题。

英国若在欧洲获胜，诚然会使目前我们在这里碰到的问题改观，并使其大为简单化，但是，我们是否能够坐待英国胜利，是否应该让日本在它现在觊觎的一切地区埋头干下去，恐怕还是一个终究要考虑的问题。这个问题，我看将取决于日本前进的速度。在此期间，我们要时刻作好准备——准备对付任何事变。

战争的转折点我看已经到来。假如希腊的参战不算，那么，总

统12月29日的演说总该是转折的标志。我们从收音机听过这篇演说;我又看了五遍,差不多能背得出了,自然又想尽办法使它受到日本要人的注意,因为日文报纸发表的只是经过仔细挑选的摘录。这是一篇惊人的演说,假设我对重选罗斯福是否明智有过丝毫怀疑(我没有怀疑过),这篇演说也会把此种怀疑一扫而光。对那些想蒙头睡大觉的同胞,这篇演说是一副强烈的清凉剂,也是一个无法反驳的警告。

12月14日,我给总统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弗兰克:

……关于日本及其所作所为。愚见以为,事情越来越清楚了,我们总有一天一定得摊牌,尚待决定的问题只在于,对我们来说,是早点摊牌有利,还是迟点摊牌有利。

从这个角度来看,决定问题的主要因素似乎是:

(1) 英国在欧战中能否打胜,何时可望打胜;

(2) 我们卷入对日战争,会不会妨碍我们在欧洲援助英国,以致影响英国的胜败;

(3) 我们自己的远东政策,同我们的战备计划、同现在和今后的美日海军实力对比,必须协调到什么程度。

由于我们此间情报有限,对这些问题,即使作概略的回答我也没有资格。

从东京这里观察局势,我们的看法可略述如下:

我总希望在美日关系中能有一点永久性的建树,经过八年的努力,我发现,外交已被它根本无法控制的倾向和势力击败,我们的工作好似遭到一场台风的猛袭,毁灭殆尽,无以言外交的成绩。日本已公开地、无耻地成了侵略国之一,成了那么一个组织的一部分,凡是美国要维护的,它几乎全要摧毁。

现在只有设下不可逾越的障碍，才能防止日本人在中国永久盘踞下去，防止他们在已被他们划定的地区以经济控制为政治统治的先导而推行其南进政策。象美国禁运所产生的那类经济障碍，从远处看固然会给日本造成严重困难，但同时也有可能促使日本人孤注一掷，以求经济上自给自足。

历史证明，日本的政策总是时而摆向过激，时而摆向稳健，但是从今天的情势来判断，我们认为，较大的可能是更加摆向极端，而不是转朝相反的方向。近卫、特别是松冈，不久将会倒台，但是，**在目前情况下**，日本的领导人，不论一个还是一群，若要完全改变扩张主义的计划，就别想活命。

我们自搞一套，日本动一下，我们也在某方面动一下，这种从容对付而又坚定不移的政策，高明极了，它已深深印入日本人的意识之中。不过，日本人民当中虽有很多人在为他们领导人的现行方针悲叹，却仍旧无法说出自己的心里话，也没有什么力量，看来今后也还会是这个样子。另外，德国人又拚命在这里煽风点火，要使日本和美国打起来。我曾直截了当地告诉松冈：他的国家正奔向灾难。他至少已经看到了，他为吓倒我们而作的那些努力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而是适得其反。

由此看来，除非我们准备和休·约翰逊将军一起全部撤出"包括南洋在内的大东亚"整个区域（决不会有这种事），否则我们迟早会和日本发生正面冲突。

我方的逐步强硬的政策，诚然要冒必不可免的风险——特别是象"帕奈号"被击沉那样的突如其来的打击，那是会激怒美国人民的——但据我看，假如我们奉行放任的政策，我们将来碰到的危险就要大得多。

换言之，当日本推行南进政策的时候，我们若不采取积极

措施以维护我们未来的安全，其危险就要比采取积极措施大得多。据我了解，美国人民绝大多数都倾向于采取有力行动。主要的争论之点我看不在于是否必须阻止日本实行其计划，而在于什么时候去阻止它。

要紧的是，要经常记住，我们采取“战争以外”的措施时，假如没有为贯彻实行这些措施而不惜一战的决心，就很容易给日本人看穿，他们就会放手大干，甚至由此得到更大的鼓励。只有当他们肯定了，我们是有要打就打的决心的，我们的初步措施才有收效的希望，才有可能消除战争的必然性。——这也是1914年爱德华·格雷爵士[①]说过的话。

倘使我们因如此行动而能促致日本现今的领导者终于失势，日本国内就可能会发生一场思想革新，那时才有可能同美国恢复正常关系，从而重新处理整个太平洋问题。

我对现在和今后局势的看法，概括起来，大致就是这些。我发回去的电报有些你一定看过了，在这些电文中，我们总想把这个岗位上所能见到的情景尽量描述清楚。此间即便是日本人自己，右边也往往不知道左边在干什么，因此，为获得准确的情报，我们不得不在暗中到处摸索。他们所谓的“新体制”，搞得一塌胡涂，政府内部亦争吵不休，糟得令人难以置信。每加一项极权主义的措施，就新添一个响亮的口号来掩饰。的确，一切都已面目全非，不是我们所了解和喜欢的那个日本了。

……你正在运筹帷幄对外事务，国家有你继续掌舵，不致失去你那英明的远见、坚强的决心和宏壮的胆略，我深感庆幸。

---

① 爱德华·格雷(Edward Grey, 1862—1933)，1905至1916年任英国外交大臣。——译者

总统为远东危机作出结论

总统复信：

白　宫

华盛顿

1941 年 1 月 21 日

亲爱的约：

12 月 14 日来函我已细加研读。

首先，我得说，你对时局的全面估计和论断，使我得益非浅。这些意见是基于直接的观察、长期处理对日关系的经验和高明的判断，三者结合到一起，实属难能可贵。你下的结论，我完全同意。

此外，我重新当选，承你殷致贺忱并对我指导外事表示信任，我衷心感谢。

我国对远东的事态发展将持何种态度，你要我就这个问题的某些方面表示意见，这是很自然的。我认为，根本的前提是，我们必须承认，欧洲、非洲和亚洲的战争，全都是世界冲突这个整体的组成部分。因此又必须承认，在欧洲和远东，我国的利益都受到了威胁。我们肩负的任务，是捍卫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我们国家的根本利益，不论在什么地方，只要这些利益遭到严重危害，就得保卫。我们的自卫战略，必定是一种全球战略，各条战线都要考虑到，凡有助于保卫我国总的安全的机会都要利用。

你提出一个问题，视之为决定我国对日态度的主要因素之一，即：我国若卷入对日作战，是否会妨碍我们在欧洲援助英国，以致影响英国的胜败。关于这一点，我觉得，我们必须考虑到，如果日本占领了荷属东印度群岛和马来半岛等地，英国战胜德国的可能

性是否会因此减少。英伦三岛，岛上的英国人，其所以还能够生存和保卫自己，不仅是因为他们拥有坚强的本土防御设备，而且还因为，作为大英帝国的心脏和神经中枢的英国本土能够调动雄厚的资源来维持生计，并能有效地对敌人施加世界规模的经济、陆军和海军的压力。他们靠输入世界各地的货物和利用庞大的海外资金为生。他们保卫自己，不仅是靠本土的防御措施，而且还在远离本土的地区进行广泛的经济、陆军和海军的活动，这既可以保障自己的物资供应，又能切断敌人的一些供应来源，并使敌人不能集中全部军事力量来攻击帝国的心脏和神经中枢。

英国人在许多地方需要我们按大体上业已确定的方针给予援助，在远东，就美国的能力来说，这种援助当然是在“可能”范围之内。他们的防御战略必然是全球性的。我们在实行给他们援助借以保证我们自己的安全这一战略时，必须设想到给英国运送物资，同时还要想到要有助于防止世界各地之间的交通要道被封锁，这样英国才不致于失去其他重要的供应来源而让敌方得到更多的物资。

你还提出英国在欧战中能否得胜、何时可望得胜的问题，并认为这也是决定我国对日态度的主要因素。我在前面已经说过，这次战争乃是世界性的战争而不仅仅是欧洲的战争。正如我最近公开宣布的，我坚信，英国人在我们的帮助下定能得胜。战争很可能要拖长，我们必须记住，假如日本不受遏制，在战争过程中，太平洋西部和南部区域的领土归属就可能发生变化，要使这种变化再变过来，需要实力，但到英国胜利时，它的实力恐怕已经所剩不多了。从来信第四页下端和第五页头上的话可以看出，你也相当重视问题的这个方面。

363

一和你谈我的想法，就谈了这么多，这是因为，我们面临的问题太大、太错综复杂，即使想表述一下，也得从五大洲和七大洋来

想。末了我还得着重指出，我们的问题既然是一个防御的问题，我们的计划就不能订得太死。一有新的变化，我们就得根据当时的情势来确定何时、何地和怎样才能最有效地调动和使用我们的力量。

顺致热烈的问候，

富兰克林·D·罗斯福

罗斯福对林德伯格[1]

1941年1月2日

总统1940年12月29日广播演说的全文，还有我们每天的无线电新闻简报采自美国各大报的社论，我都尽量向朋友们散发。我还叫威尔斯把演说全文发表在《日本新闻周刊》(Japan News Week)上，周刊在日本的订户约三千二百个，其中有高级官员、企业单位和教师，在报摊上零售一千二百份。单是住友公司就订有一百份，分送其职员。这样，至少某些重要人士可以见到演说的精采部分，注意到日文报刊删掉的段落。

于是日文报刊便对总统的演说再加评论，《中外》评道："林德伯格等人都反对参战，由此可见，罗斯福的演说不过是表示他个人的意见，不一定代表美国国民。"美国名人发表的反对派意见和孤立主义言论，此间报刊总是大登特登，相反的情节则极少刊载。因此，日本公众得到的印象自然是紊乱的、歪曲的。

---

① 查理·林德伯格(Charles Lindbergh，1902—1974)，美国飞行家，当时发表了许多反对美国参战的演说。——译者

德国挑拨日本和美国绝交

1941年1月3日

此间德国人正千方百计阻止野村大将赴美，嗾使日本同美国部分断交或完全绝交，并且还将加紧离间日美关系，策动日本南进：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最近得自某方面的情报，更使此事洞若观火。我遂提请日本当局记住下列几点：

(1) 日本如果依从德国的驱策，不仅会吃大亏，最后将一无所得，徒增耗费，而且还会招来危险。

(2) 日本设若站在轴心国一边参战，亦只有两个结果：一是战败；一是轴心伙伴得胜而日本也暂时捞到一点东西，即使是这个结果，那些伙伴也决不会允许日本保持其战利品。

(3) 全世界反对轴心国的浪潮正继涨增高，越来越明朗化；德、意胜利的可能性则日见减小。

(4) 日本若惑于纳粹的奉承，卷入新的军事冒险，它就会得罪那些原无伤害日本之意却有打击日本之力的国家，假如日本硬要迫使它们采取自卫行动，它们就会使用这种力量。要是日本不让自己被引入歧途，那就有百利而无一害。

(5) 若谓轴心伙伴能给日本有效的军事援助，那是欺人之谈。

(6) 日本可以好好想一想：假如参加在轴心国方面作战，或者公开进犯美英的利益或与美英有重大关系的利益，要冒多大的危险，又到底有什么好处。

附带说一下，我还告诉了国务院，德国人拼命挑拨日本和我国作对，我们知道得很清楚，我一直在提请包括外相在内的日本熟人记住上述各点。我还正在想方设法使各界有影响的人士注意总统

12月29日演说的全文。

366

日本报纸预告日美战争

1941年1月7日

今天的《国民新闻》有一篇长社论，警告日本国民：由于英国崩溃，日美战争不可避免，美国必将在今年某个时候参战。社论又说，这样一来，主要战场就会从欧洲转移到太平洋，而以日本和美国为"交战双方的两大主力"。社论还引用东条陆相最近的言论以及松冈和里宾特洛甫[①]的来往文电，谓里宾特洛甫称，英国"至迟在今秋将被消灭"。该报断言，轴心国已受够了美国的挑衅，有理由对美国宣战。

与松冈发生争执

1941年1月18日

今天在松冈为野村大将饯行的午宴上，我同他们两人都谈了，并希望野村能发挥他的影响（向哪里施加影响，我没有说），以改善美日关系。松冈说："关系确已坏到极点"，说完转身就走开了。

席间，松冈实际上还以战争威胁美国，我立即回答，大意是，"外相也在美国长住过，理应知道，美国人民根本上是爱好和平的，同时也主张正义和公道。他还知道，有些东西美国人民是要坚决维护的，其中有属于义务者，另方面也有属于权利者。让所有国家都得享和平、繁荣、安全、稳定和幸福，乃是他们最深切的愿望。处在目前世局下，我们必然会认识到，在今天的国际关系中，事实和

① 约阿希姆·里宾特洛甫(Joachim Ribbentrop,1893—1946)，1938至1945年任德国外交部长。——译者

行动就是具体的证据，至于这些事实和行动所披的外衣，不管多么漂亮，都是不算数的。国家就跟人一样，要‘听其言而观其行’。”

派野村出使的唯一优点

1941年1月20日

在一连串为野村大将饯行的宴会上，我曾和他多次见面，今晚甚至同在一张沙发上坐了半小时，可是，他此番出使前景如何，最近访华有何观感，他只字不提。他的英语显然讲得不好。将来在美国碰到那些强硬的参议员、众议员、新闻记者或官员，要是争论起来，不知他怎样对付。但正在此间访问的卫理会主教贝克却告诉我，他曾在野村家和他长谈过，深觉野村善于选词，熟悉长音节的字眼。不管怎么样，现在已经不是语言的问题了，在最近的将来，语言掌握得好不好，也无关宏旨。野村大将此去，我看只有一个好处，那就是，美国政府和人民现今的思想和言论如何，可以指望他老老实实地向他的政府汇报。

日本的礼貌

1941年1月25日

今天“奇普”·波伦[1]从莫斯科来到这里。他曾自敦贺来电说，他将于某时抵东京，“假如还活着的话”。由海参崴来的这段旅程相当可怕，可怜的波伦因感冒发烧，一到就倒在床上。他说，敦贺的日本官员和船上的职员态度都非常恶劣；他出示护照和其他证件时，证件总是被一把抓过去，船上更无服务照料可言。这就是

[1] 后来在德黑兰会议上任罗斯福总统的俄语译员。——作者

波伦对日本和这个号称礼让的民族的第一个印象。威利[1]来时的最初遭遇，也叫人忘不了：他从俄国一过境，便被日本大兵推出人行道外。前几天我在东京车站排队，等候通过剪票处时，来了一个日本人，他认为他应该占先，便猛然一撞，把我推到队外。幸而我忍了一下，没有还击，理智随即抑制了勇猛。每个国家都有粗暴的人，但今天的日本似乎正是这种人的天下。人家肝火正旺，你有什么办法呢？

说来真是有趣，最近美国军舰"棉兰老号"上有人对着一艘日本军舰拍照，被看见了，驻广东的日本海军当局便大吵大闹，又是要求道歉，又是要求交出胶卷。事情最后闹到哈特海军上将那里，他便叫格拉斯福德海军少将转告日本驻华舰队司令岛田大将："驻广东的日本海军当局竟提出这样的要求，他（哈特上将）不胜惊讶，他本人就亲眼看见过日本军舰、特别是"出云号"上的人对着他所乘的旗舰拍照，他却做梦也没有想到过要对这种举动提什么抗议。"一下子日方的要求也就收起来了。很明显，老岛田总算还有一点常识。

第一次有偷袭珍珠港之谣

1941年1月27日

谣言四起，谓日本人正在计划，一旦与美国决裂，便出动全部力量，大举突袭珍珠港。我当然向我们政府报告了。

日本人视美国为战争贩子

1941年1月31日

① 美国驻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公使。——作者

“美国政府的国务卿赫尔考虑到与英国的关系，联系到太平洋问题，曾经暗示：日本若有什么建议，美国愿予考虑。这种暗示，实属傲慢无礼，不值一听。是哪个国家在制造紧张局势，致使太平洋不得安宁？毫无疑问，是美国。正是美国，它一面标榜门罗主义，力主世界和平，一面却煽风点火，引起欧洲动乱。它并没有到此为止，而是还在加紧策划更凶险的阴谋，要把战争扩大到太平洋。假若日本要提出什么建议的话，那就是，请美国舰队立即从太平洋撤走。”

《京城日报》（朝鲜的日文日报）

日美关系的前景暗淡已极

369

1941年2月1日

最近东京有个同僚形容日本当前的政局为“不稳定的平衡”。若说不稳定，我们可以完全同意，但要说平衡，恐怕就有点用词不当了，即使真有什么力量在制止倾斜，这种平衡亦非肉眼所能见。不错，稳健派是在不断做工作，以求保持平衡，特别是本届国会，开得很秘密，各委员会会议皆不许旁听，目的就是要使政府的方针不致受到公众的指责。我们晓得，有田连日来都在质问外务大臣；我们还知道，广田曾谓松冈是在奉行一种“致日本死命”的外交政策；我们还从几个知名的国会议员那里获悉，政府曾暗中保证，要采取一种旨在避免与美国冲突的政策。

可是实际上军部却在全力推动南进；他们违反与维希政府的协议，变本加厉地压制印度支那，同时还硬要调解泰国和印度支那的纠纷，据报道，目的是要获得金兰湾的海军基地作为报酬：这就证明日本是要夺取最后进攻新加坡的跳板，志在必得。稳健派和极端派正处于“平衡”状态云云，似难讲得通。后者正牢牢掌握着

政权，实际上还有充分证据表明，在纳粹分子的怂恿下，他们还打算迅猛地往前冲，他们要不是认为美国不会动，就是认为即使美国不甘沉默而进行干预，后果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日美关系的前景已暗淡到极点了。

日本继续进行蚕食活动

1941年2月7日

下述新情况，无论是实情还是传说，都是具体的迹象，表明日本正在加紧推行其南进政策：

370

(1) 谣传日军已在邻近马来亚北境的泰国基地宋卡登陆，金兰湾出现日本海军船只，暹罗湾出现日本巡洋舰一艘至几艘、水上飞机母舰一艘、驱逐舰数艘。

(2) 日本正进一步侵犯印度支那，控制西贡机场和调停泰、印纠纷，便是例证。日本之所以要充作调人，据说是想获得海军基地的使用权。

果不出我们大使馆所料，日本是在继续实行其蚕食政策，过去两年间，它就是用这种办法夺得了海南岛、涠洲岛、斯普拉特利群岛[1]和印度支那北部。实行这种政策，是朝要伸手的方向先试着猛冲猛打几下，然后停一阵，探明所用手段的效果和影响，接着再干；现在由于纳粹德国的怂恿，这项政策执行得更起劲了。

日本已经在东南亚取得了一种地位，再作一些准备，它就可以由此包围或进攻新加坡，可以给轴心国在印度洋的船舶提供物资了。进攻新加坡的计划，看来很象是要与意料中的德国在英国登陆的计划相配合，同时进行。陆海军中的保守派显然不主张立刻对新加坡下手，而是要等到欧洲形势有利时才动，可是不要忘记，

---

① 即我国南沙群岛。——译者

军部极端分子那种不顾后果、以死相拼的劲头也可能在英美能够干预以前就压倒了保守分子。

国务院 1940 年 12 月 4 日发出的非正式备忘录，论述了新加坡对保卫英国本土的重大作用，说得相当透辟，堪称定论。英国目前不能、最近的将来大概也不能分出大量海军部队来防守新加坡。依据我们既定的援英政策，我们决不能坐视这个战略重镇落到敌国手中。

荷属东印度群岛、中国国民政府和远东英国人的士气之所以尚能维持，大概是因为还抱有一线希望，相信美国终将援助他们。巴塔维亚的荷兰人正受着巨大压力，英国人也有突然受到突如其来的重大压力的可能，由此应得的启发是很清楚的：一分预防等于十分治疗。没有荷兰人的坚强努力，东印度群岛和新加坡是否守得住，非常可疑。新加坡被敌国夺去，必然会严重影响中国的士气，影响英国在近东和东地中海的地位。

美国应当采取什么行动，何时采取此种行动，非我大使馆所能决定，因为这是属于最高战略决策的问题。我们建议不要采取不彻底的措施，这种措施不仅无益，而且后患无穷。正如我以前说过的，我们面临的重大问题不是应否阻止日本南进，而是什么时候去阻止它。把美国海军部队集结到远东来，必然会有引起战争的危险，危险会大到什么程度，很难估计，但不管怎么样，除非美国准备打仗，否则就不应当冒这种危险。不过我们还是认为，及时制止日本南进，固然要冒险，但若让它横行无阻，将来的危险就会大得多。据我们看，日本人正是指望我国消极被动。我们认为，若要采取断然行动，就应当趁早。

昆明来讯称，江西鄱阳的美国天主教教堂于 11 月 15 日被炸，所述颇为典型：“一架日本飞机俯冲至约三百英尺高，向教堂投弹，院子里有两大幅美国国旗做标记，所有建筑物都画有白十字，视界

也很清晰，但都不管用。随后这架飞机还回转来观察破坏的效果，并用机枪扫射场地。该教会称，教堂附近一英里内并无任何军事设施。”又是一次不可避免的误会；请原谅。

松冈愿作调人的内幕

1941年2月21日

今天我得到一个消息，出处可靠与否我不能确定，大意是，一个有陆军重要将校参加的强大集团正在酝酿政变，要用“二·二六”事件那样的暗杀手段推翻政府。这个集团认为，政府正把日本直接引向对美战争，这场战争，日本最后必败无疑。所传政变搞成后出来执政的主要人物的名单我也得到了，但不想记在这里。消息确否，虽无法查核，但我知道，确有人对近卫和松冈不满，我还知道日本人会怎样行事，这个消息未必全是无稽之谈。

松冈向艾登先生提出要为欧洲和平居间斡旋之说，甚嚣尘上；外国报纸大量报道，英国下议院亦有人提问。何来此事，我原有一个想法，后来证明我是猜对了，2月26日松冈把这事的原委全都告诉了我。事情似乎很简单，鉴于日本调解泰、印纠纷之举受到批评，松冈便通过驻在伦敦的重光给艾登送去一份备忘录，在大段说明中有这么几句：

> 最后，外务大臣〔松冈先生〕尚欲讲明，对早日恢复和平，日本深为关切，因此不仅在大东亚，在世界其他任何地方，日本亦亟愿出任调人，无论调停事宜，或其他旨在恢复常态的工作，均乐于承担。

其实还有这么一段情由：情报部次长石井在外务省看到了这个备忘录，便把其中某些部分向报界披露了，这种做法，恰似有名的《天羽声明》，当年天羽也是把广田给驻华公使的一封训令公诸

报界，两事如出一辙，透露消息，事先都未经外相知悉或同意。松冈告诉我，他很生石井的气，已对他发出“严重警告”，但在公众面前，当然还是要顾到石井的面子。不管怎样，此事已经产生了有害的影响，而且害处相当大。松冈说，英国人已借此大做文章，暗示德国处境不妙，需要讲和：这种结果，和他当初的意图全然相反。谈到这里，他非常激动，因强抑怒火，两眼充血。

高尔夫球成了外交的晴雨计

373

1941 年 2 月 22 日

在法国大使馆例行的一次星期五“宾至如归”招待会上，法国大使馆参事费恩男爵问到我打高尔夫球的近况。我说：“每当外交界同僚或日本人和我谈起来的时候，开头几乎总是问我的高尔夫球而不是谈天气，这是什么缘故，我亲爱的男爵？”费恩答道：“呃，大使先生，你的高尔夫球乃是测量外交团体温的温度计。只要你有一个星期不打高尔夫球，此事就会电传到世界各国的政府办公厅，因为这表明局势真是严重了！”我说：“好，明晚你打电话来，我将极秘密地告诉你，我是否还能按我现在的规定每星期六下午打一次高尔夫球了。”

回想和松冈的一次谈话

1941 年 2 月 26 日

在论到泰国与印度支那争端的谈话中，松冈外相特意指责英国政府，说它在远东采取的措施直接刺激了日本，使局势很难好转。他还连带提到关于新加坡港口敷设水雷和澳大利亚军队被调到马、泰境上的报道。

我说，明明是防御性的措施，日本人却说成是进攻性的，我觉得有点奇怪。正如我在美日协会午餐会上对外相说过的，我们行事，总不免要以“事实和行动”为依据，与日本南进有关的那些事实和行动，正是不仅使英国、而且也使我国深感不安的实际原因。日军在相继占领涠洲岛、海南岛、斯普拉特利群岛和其他地区后，现在又涌入印度支那，根据我们的情报，日军已占领西贡机场，日本海军也正在那一带活动。这些步骤，加上日本许多政治家和陆海军将领表示南进意图的公开言论，已经造成了一种形势，对此，无论美国或英国，都不能处之泰然，因为这不仅威胁到我们的利益，而且还威胁到我们的属地。

松冈先生答道，发表煽动性言论的不止日本一国，关于这点他还点了几个美国人的名字。他否认西贡机场被占，咕哝一些有关东京(Tongking)的事，又说，日军驻在印度支那，是严格按照与维希政府所订正式协定的条款。我说，根据我们自己的情报，日军人数已大大超过了原来的规定，外相却答道，这不过是补充兵员而已。

谈过以后，我便就接触到的问题分别写了十三个备忘录，即使如此，也还是不能把他谈过的问题包罗无遗。熬过这种会谈的人，恐怕没有不头昏脑胀的。松冈之饶舌，据我所见，只有昔日土耳其的外长图菲克·鲁希迪·贝伊能赛过他——鲁希迪则全是讲法语。幸亏我做过副国务卿，具有牢记会谈要点的诀窍，那时往往要急速接连接见七八个外交官，只有事后才来得及口授备忘录，而且每份备忘录都不得有遗漏，因为哪怕是忘记一点，也有可能招致严重的后果。

日本横暴分子在国内的行为

1941 年 2 月 28 日

粗暴的日本人不仅对外国人粗暴，对本国人也是如此。最近报载，电影院门前排队的人群中，常常发生推撞、纷扰、乃至斗殴。当“大政翼赞会”[①]（好漂亮的名称！）生活指导部长喜多先生被问到对此有何高见时，据说他答道：“据我看，这是由于群众缺乏训练。要是日常辛勤工作，每月消遣一两次，倒也无可非议；但即使是合理的娱乐，也没有权利在戏院门口互相推撞。”电影院的经理则说：“这表明一般公众是多么热烈地在追求娱乐。”实情却是，娱乐活动，甚至一切生活乐趣，现在都受到极大限制，结果人们的性情自然就愈来愈暴躁了。德国的口号是“快乐才有力”，在日本，这个口号应当改为“不乐才有力”。

375

有个日本政治家变得随和了

1941 年 3 月 20 日

赴外务次官官邸参加大桥次官和夫人主持的外交团宴会。大桥待人和气，甚至可以说很亲切，他就任以来，似乎变老成了。不过在席上艾丽斯总是逗得他很高兴。餐后大桥和我作很有趣的长谈——谈到日本的教育、经典及其教育制度的缺点，这种制度只是教育少年死记，而不是培养他们的识别能力；在这个问题上他讲得很坦率。随后便谈到罗斯福总统最近的演说，他说，他曾经搔了头

① 1940 年 6 月，第二次近卫内阁成立后，实行所谓“新体制”，解散各政党，并于 10 月成立“大政翼赞会”（意为“辅佐天皇的政治组织”），本部总裁由首相担任，全国各地直至村庄、街道都有基层组织。翼赞会是一种对全国人民进行监视、压制的法西斯组织。——译者

皮，想弄通总统所谓远东的独裁制度是何所指；肯定不能说是日本，因为，日本尽管有许多缺点，但无论如何不是处在独裁统治之下；后来他懂了；噢，罗斯福当然是指蒋介石这个十足的独裁者。至于说美国是在支援民主国家，他实在想不出还有比蒋介石的中国更不民主的了。

他讲到野村大将同总统及赫尔先生的会谈，他感到高兴的是，双方已一致认为打一场日美战争是荒唐的。他痛骂那些给外国人不良待遇的人。他谈得很有风趣，妙语联珠，而且十分愿意议论他本国的缺点——虽然恐怕还不是所有的缺点；我们原以为这晚将遇到一个意兴索然、可怖可憎的场面，事实却恰恰相反。

日本自欺的简例

1941年3月26日

有理智的日本人常犯理智上不老实的毛病，或者说，往往根据灌给他们的宣传而作出太老实的结论，这种情况究竟严重到何等地步，我始终觉得是一个尚待回答的问题。鉴于当局不许他们知道事实，也许我们还可以假定他们是无辜的，但是，象早稻田大学校长那样有才有学、长期标榜自由主义的人也居然写出下面这种废话来，这就有点难以理解了：

> 正如不久前近卫声明着重指出的，当前日本作战的目的，不在于获得一点点领土。……相反，倒是为了维护中国的独立，并在尊重它的主权的同时建立东亚新秩序。正是为了完成这个伟大的使命，日本才不得不下决心进行这场历史上最大的战争。……试问，具有如此崇高理想的战争，世界上哪里能找到先例？称为圣战，确是恰如其分。……今天世界上那些最坚决主张维持“门户开放政策”和“机会均等”原则的国

家，正是最不愿意实行它们的主张的。大家都这样言行不一，国际正义能确立吗？

尽管如此，他们当中有些人也还是有幽默感，《日本时报和广告报》最近登了这么一条新闻：

> 英国占领丹属冰岛是非法的，所以德国政府谴责这种行为，并已将该地区纳入潜艇封锁的范围。这是要给英国人一个教训：非经正当的法律手续，不得擅取别国的领土。

德国人的脸皮实在太厚了，所以总是看不出这条报道所含的讽刺意味。有个日本人曾经这样批评德国人："他们把我们当成什么人了？仆从吗？"前几天他对我说，德国人那么强横，他认为是出于一种很重的自卑感。一个日本人能讲出这些话，也算是难能可贵。

有一次上述那家报纸又把希特勒演说中的一个词——"Herrenvolk 即统治民族"（the Herrenvolk, the master race）——印成"长毛的原始群，即巨猿"(the hairy horde, the monster ape)。我不相信这是由于印刷厂的学徒搞错了。

赞扬威尔基

1941 年 3 月 30 日

美国国内正在两个问题上发生激烈的争论：一是关于《租借法案》①，一是考虑到我国有卷入战争的危险，我们给英国的援助应该只达到什么程度。我担心，在争论中，感情太强烈，有时就会妨碍客观地思考问题。例如，国内有个明智的朋友写道：

> 一个人，不论男女，如果真诚热情地相信有种行动方针真

① 1941 年 3 月，美国通过《租借法案》：国会授权总统，可以向"其国防对美国国防十分重要的"国家出售或租借战争所需要的各种物资。——译者

是对国家最有利的，那么，要是因顾虑到个人而保持沉默，那就是不正派的，不管他有什么理由。

可是这同一个人在另一处又写道：

他〔威尔基〕似已完全丧失了理智，已经成了一个专想在报上露名的人，一个政治投机家。正如某某人说的，“**他不懂党派斗争的策略**，甘让自己被政府利用。”

着重号是我加的。什么策略？当此世界战火纷飞、美国又徘徊歧路之际，还要在党派政治上钩心斗角吗？威尔基在理智上和其他方面倒可能恰好是一个正派的人，而“一个男人或女人，如果真诚热情地相信有种行动方针真是对国家最有利，却又……保持沉默”，那才是“不正派的”，这样说难道不合理吗？

不错，我国是实行两党制。少数派构成一个健全的反对派，乃是这种制度的重要部分。但是，难道这就意味着在国家生死攸关的问题上，反对派的任何成员，特别是有名望的成员，对政府的任何政策，即使是那个成员衷心认为正确的政策，都不应当支持吗？

我所以提这些问题，是因为，我觉得上引两段话自相矛盾，其中对威尔基的基本看法是，“他不懂党派斗争的策略”。哦，想必是我自己的资质有缺陷，要不就是我对一个人及其动机的评价有错误。我自去年春天首次读到威尔基的一些演说词后（我的意见已记在当时的日记中），就已相信他是个正直的人，心地上、政治上都是诚实的。我也深知，他现在已经远远背离了他在竞选演说中讲过的一些话，但我所谓心地上正直的人，并不是指那种在情况已有变化、视野已较开阔、思想已较成熟之后仍不敢修改自己以前发表过的意见的人。

378 就威尔基而论，关键似在于他在心地上到底是不是正直的。假如他仅仅是在沽名钓誉——是个“专想在报上露名的人和政治

投机家”，那么，我对他的品质的评价就全错了，我也就退出辩论。但是，假如他真象我坚信的那样打心底里就是诚实的，而对那种他认为真是最有利于国家的行动方针却保持沉默，或加以反对，那岂不是又成了一个不正派的人了吗？象他那样大力支持他视为正确的方针，难道不应该吗？我自己的看法是，威尔基的才器日有提高，将来他定会在我国政治生活中起杰出作用。

日本的“南进”暂告停顿

1941 年 4 月 10 日

3 月这个月，远东局势的发展踏步不前。“调停”泰国与印度支那的争端，已有结果，实际上不过是日本向法国人提出最后通牒而后者完全接受而已。法国人知道，印度支那的力量不足以抵抗日本的入侵，假如硬顶，就很可能丢掉整个印度支那，因此他们认为，放弃一部分，总比丢光好一些。附带提一下，我们还听说，泰国首席代表事后评道，这次按日本之命所订的解决办法，“完全缺乏常识”。看来此事的最后结果是，日本勒住了印度支那，并且至少部分地扼住了泰国，将来日本人认为时机已到，准备进攻马来亚、缅甸或新加坡，就可以利用这两个地方。不过，欧洲的事态仍在发展，另外日本人至少还得瞟一瞟美国的动向，因此日本的“南进”暂时还踟蹰不前。

在此期间，松冈已赴欧洲进行他的有历史意义的访问。大家知道，他曾经说过，里宾特洛甫一向被认为是欧洲最出名的说谎者，他倒想去看看真相是否如此。至于他在莫斯科的情况，我们从最可靠方面获悉，在他和斯大林一小时的会晤中，他宣讲日本的意识形态就讲了整整五十八分钟，结语更是妙不可言：日本人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均非共产主义者，但共产主义和日本的家庭生活却

颇有相似之处；据说斯大林随即答道，尽管俄国和日本意识形态不同，但他看不出两国有什么理由不能成为朋友，说完就走出去了。

我很想知道，松冈与希特勒会谈时，是否也同样有办法能够垄断发言；论饶舌，只有超人才赛得过松冈，但说不定希特勒是个超 379 人。据传松冈曾对德国报界说（大意）：世间种种祸乱都是英美的阴谋诡计造成的。这种话我想他一定讲过。德国人我是了解一点的，他们一定会过高估计自己的本领而对他大施威胁利诱，这种惯用的伎俩，只会削弱而不会加强轴心国之间的纽带。等着瞧吧。不管怎样，松冈先生单挑这个时候来访问，真是最糟不过了——他一到柏林，就碰上德国将南斯拉夫拉入轴心国集团的计划从初步成功变成彻底失败，他抵达罗马的当天（或前后），就传来意大利在马塔潘海战中惨败的消息。松冈走到哪里，哪里就倒楣，魔星降临，亦未有甚于此者。

日本国内，政治和经济形势俱不断恶化，对近卫及其内阁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高。这种不满导致4月初的内阁改组，小仓、丰田海军大将和铃木将军被延揽入阁。小仓是住友财阀的头子，碰巧又是关西美日协会（大阪）的会长。丰田稳健明理。他们两人我都认识，小仓和我很熟，丰田也相当熟。这次变动，无疑是平沼导演的，我们相信定是他在幕后牵线，要给近卫公爵虚弱的内阁增添一点力量。改组的结果也许会是健康的，可以指望他们能对狂热的极端分子施加抑制性的影响。事实上也开始看到了一些征候，至少亲轴心的情绪已有略微冷却的迹象。

但归根到底，正如我常说的，今后形势如何演变，在很大程度上仍将取决于欧洲事态发展、特别是不列颠战役的结果。

尽管很勉强、很扫兴，我还是放弃了今春请求休假的一切打

算。举世扰攘，不是休假的时候，何况未来几个月既然很可能是欧洲的关键时刻，远东也同样可能出现危局。我原拟于6月返美接受一个名誉学位，[1]这并不需要很长时间，在这期间看来也不会发生什么大事，别人主持使馆工作，亦能胜任：要这样劝服我自己，是容易的。但是，也可能会发生某种需要大使运用其影响力的大事。380 我心里很难受，因为有时夜阑人静，我曾经大胆地想过，说不定哪一天会得到这样的荣誉，现在请帖果然来了，而我却不能接受。旧有的新英格兰的良心又抬头了。

盛传日本将进攻新加坡

1941年4月15日

在我暂去川奈的期间，东京盛传，不待松冈归国，日本在几天内就要攻打新加坡。谣言层出不断，以致有些新闻记者已打电报回国，外交官亦全都为之震动，这样我们大使馆遂不得不将此说电告华盛顿。自12日至15日谣言传了三天左右，15日，杜曼午餐时遇见大桥，大桥却“矢口”绝对否认。根据大桥的指点，我们叫美联社的希尔去问石井康，石井说，“我可以斩钉截铁地说，日本决无派陆军或海军进攻或前往新加坡之意，”他还说，正如近卫公爵最近声明的，日本对南洋，所抱的目的完全是和平性质的，只限于经济方面。这次谣言，他称之为“战争贩子的作品”。石原将军曾因撰文主张进攻新加坡而奉令退役，至少他那里是谣言的出处之一。

---

① 作者曾接到他母校哈佛大学的邀请，要他去接受名誉博士学位。——译者

苏日互不侵犯条约

1941 年 4 月17 日

关于和苏俄签订的这个条约①，报刊总的倾向是给以谨慎的赞同，并无多大热情，而且还指出，这不过是日苏关系走向稳定的第一步。有迹象表明，对这个北方邻邦，还是没有感到可以完全信任，因而可以放心南进。

总的来说，反对用武力推行南进政策的势力似乎还是相当可观。政府亦仍在留心观察欧洲局势的发展及其对美国政策的影响，但又必须承认，前两周东地中海军事形势不妙，已在日本引起了显著的反响，舆情正趋于对亲轴心分子有利。

昨天日本政府就如何评论日苏条约的问题向日本报界发出了下列秘密指示：

(1) 报刊不要造成一种印象，使人觉得日本对订成这个条约的反应并不热烈；

(2) 不要述及日本国内某些反苏分子的反对意见；

(3) 不要说苏俄订这个条约是因为它有什么弱点；

(4) 不要触及日苏两国相互提出的附有条件的规定。

这些指示当然十分重要；它们本身就说明问题了。

我由可靠方面获悉并已据此电告国务院：德国在日本的第五纵队不断在增加，确已使人觉得可虑。据说，盖世太保分子日益猖獗的活动已彰彰在人耳目，这些家伙正在把他们认为抱有反轴心情绪的日本人的名字报给日本警察当局。

---

① 日苏条约：日本为了集中力量"南进"，暂谋北方的安全，于 1941 年 4 月 13 日与苏联签订了《中立条约》。条约规定：如果缔约一方与第三国交战，缔约另一方将保持中立。——译者

苏日条约的背景

1941年4月22日

我在3月份的日记中已经写过，松冈在赴柏林途中曾与斯大林进行他们之间的首次会谈，六十分钟的会晤，有五十八分钟是他向斯大林演讲日本的意识形态，末尾还强调共产主义和日本家庭生活颇有相似之点。后来松冈从柏林回国时，又对斯坦哈特[①]说，与斯大林订约，他原以为希望甚微，因为俄国人要求，要订互不侵犯条约，日本就得作一些让步，而他松冈是不肯让步的，日本公众也不会容许让步。可是后来到最后一分钟，看样子好象是斯大林突然提出可以订一个中立条约，于是几分钟便签订了这个条约，日本方面并没有作什么让步（如果没有秘密让步的话）。对此事最感到出乎意外的，显然是松冈。

这个中立条约是否附有秘密的承诺或协议，目前还缺乏这方 382 面的情报，在这种情况下，我还是分析了条约可能产生的结果，得到了如下结论：

（1）日本至少在表面上无须为订约付出代价，由于这个事实，订成此约就意味着松冈取得了一项个人的巨大成就；

（2）条约并未规定缔约国各应实行什么政策、负担什么义务，可见，缔约的目的，主要是在于利用由此而产生的影响——双方都认为可以借此影响对方和第三者（在苏联看来，可以影响德国，在日本看来，可以影响美、英）；

（3）不管苏联在中国问题上有什么保留，不管条文措辞如何巧妙，条约的倾向恐怕还是要促进而不是阻止结束中日战争；

（4）就日本同苏俄的关系而言，特别是考虑到日本人有点注

① 美国驻苏大使。——译者

重形式的心理，条约亦当有抵消三国同盟的片面性之意。

(5) 条约势将助长主张猛力执行南进政策的日本极端分子的气焰，因为它保证，假使日本与第三国(即美国)开战，苏联将保持中立。

斯坦哈特曾宴请松冈，在松冈同他的谈话中，露出下述各点，我得知后便毫不踌躇地把这几点记下来了，因为松冈回来后若有时间，他还是会把他和斯坦哈特谈过一切告诉我的:

(1) 无论在柏林或罗马，松冈都没有作过任何承诺。

(2) 日本加入三国同盟的主要目的是维护和平——这是松冈的口头禅，在公私场合，他都经常是这样叨念的。

(3) 只有当美国向德国宣战时，日本才必须同美国作战，除此而外，凡事日本都要先和德国协商。

(4) 松冈不相信德国会对美国宣战，但万一竟有此事，他希望，美国在太平洋采取任何行动，都要先给日本一点时间，让它表明立场。

(5) 日本将严格履行它对轴心国承担的义务。

383 (6) 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都对松冈说过，他们不想同美国打仗。

(7) 他们还暗示，日本应停止反美的宣传鼓动。

(8) 他们三个人都表示希望和平，但是，在英国投降以前，他们看不出有任何和平的可能。

(9) 希特勒这个人给松冈留下很好的印象，松冈称之为天才。在他们的各次会谈中，希特勒都很讲道理，冷静沉着，一点也没有表现出一般人所形容的那种暴躁的特性。

(10) 里宾特洛甫赞扬英国正在进行的战斗，并且认识到，从防御的角度来看，它现在的力量比战争开始时强。他还表示意见说，大英帝国恐怕是摧毁不了的。

（11）希特勒要在万不得已时才入侵英国，他把胜利的希望完全寄托在飞机和潜艇上。

（12）松冈不相信英国能够离间德意两国，意大利几乎全被德国控制住了，何况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还有互相钦佩的个人关系。但德国人奉命，“无论在态度或言谈上都不要轻视”意大利人。墨索里尼并未因最近的挫败而泄气，自信不久即能“卷土重来”。

（13）由于苏联要求过奢，松冈同莫洛托夫会谈时几乎毫无进展。

（14）日本可以和莫斯科达成协议，也可以和苏联翻脸：它有选择的余地。

（15）松冈亟欲结束对华战争，并且觉得，要是美国总统能告诉蒋介石，他若不肯接受公平合理的议和条件，美国便停止援助，那么，战争就可望结束。可是，日本人还是不肯让第三者来调停，和平仍只能通过两国直接谈判来实现。

（16）除非苏联大量削减它对德国的物资供应，否则德国人是不会侵犯苏联的，虽然他们已为此作好了充分准备。他认为，德国人放出可能要打苏联的风声，目的不过是要吓唬苏联人，使其继续供应物资。

（17）松冈希望总统和赫尔先生能信任他。

后来斯坦哈特为谨慎起见，将上述各点的记录念给松冈听，松冈证实，所记准确无误，他正是这样讲的。 384

德国会打俄国吗？

1941 年 4 月 22 日

德国是否很快就要进攻苏俄以夺取乌克兰的粮食和高加索的石油，一时还不能断定。我认为终究是不可避免的。在那一天到

来之前，德国人会时常散布即将进攻的谣言，目的是恫吓俄国人，使其增加货物供应量，甚或迫使苏联加入轴心国集团。德国人总是以为，入侵苏俄，其轻而易举，和一次小规模的交锋差不多。这种看法也许对；但俄国人又是很难揣度的。诺门坎之役，他们确实肃清过日本人，不过那也许还不是一次大的考验。

松冈向黑龙会报告

1941 年 4 月 25 日

听说松冈一从莫斯科回来，反法西斯、反共的黑龙会便立即派代表去见他，要弄清他同俄国人签订的协议究竟有多大范围。据可靠的给我们提供情报的人说，松冈十分明确地保证，条约中决无秘密条款，无论是日本还是苏联政府都没有作过任何性质的口头承诺。两国也没有讨论过削减各自在西伯利亚和满洲的兵力。

松冈说，日本的政策是在研究了全部事实、持平而周密地估量了时局中的一切要素之后才决定下来的。这个政策，坚怀了远大的抱负，即终竟要在地球上造成“八纮一宇”一词所设想的那种局面，但它的目的，还在于实现日本对这个词所抱的概念，那就是，天下太平，在这种太平盛世，对任何民族都不再有征服、压迫和剥削。松冈说，这个政策一经决定，就要坚决执行，但又要十分慎重，留心变化着的情势中的每个细节。（变化了的情势，这是一个空子，日本总是给自己留下这个空子。它将恪守它所承担的一切义务——一旦它认为情况变了，义务就成了废物，“恪守”也就到此为止了。）

松冈的手腕要过了头

1941年5月2日

松冈出访柏林、罗马和莫斯科归来后，红极一时，他和苏俄签订中立条约的成就，加上最近德国在巴尔干和利比亚的军事胜利，暂时巩固了他在民众中的声望。一般都认为，他的野心是要当首相（倘若他真当了首相，那就请上帝保佑日本吧），他将利用他在外交上的成就来增进他个人的利益。

但是，我们从最可靠方面获悉，他正在干一件逆风行船的事。据了解，他一回来，就在欢迎他的民众大会上发表演说，明嘲暗讽，攻击他的内阁同僚。他转弯抹角地指责他们蓄意破坏物资分配制度，他还提到日本中古史上一个图谋篡位而被后世唾骂的人物足利尊，暗喻有人在撤大政翼赞会的台，这也应属于叛逆行为。

此外，据说还有这么一回事：他回来后向近卫公爵汇报，内容有，在订约过程中，他曾自作主张，未经内阁授权便向苏联许下某种诺言：听到这点时，首相和阁员都非常忿怒。到底是什么诺言，无法确知，因为按新颁布的《国家机密法》，凡向我们泄密者，都要吃官司，但也未始不可以猜想：所作诺言，大概和西伯利亚边境驻军的人数有关。

看来短期内松冈还不会被撤换，因为公众对他的评价太高了，但政府中人不喜欢他，特别是因为他总想不惜与美国一战，所以还把他看作危险人物。我们知道，近卫公爵和内阁决不会让他去访问美国，尽管他有此愿望。

谒见皇太后

1941 年 5 月 10 日

自从九年前我们到日本以来，还没有和皇太后接触过，所以艾丽斯主动提出要拜望她，先后经过松平夫人和式部长官松平子爵的安排，觐见订于 9 日举行。这次觐见，是以祝贺太后之子即天皇幼弟三笠宫订婚及其孙女即天皇长女与年青的东久迩宫亲王订婚为名，艾丽斯也只是以外交团团长夫人的身分被接见，因为若是作为大使夫人，就会开一个先例，类似的请求就会接踵而来；不管怎样，这次如此安排，也已经是破格了。但在艾丽斯来说，她确是一向钦仰太后，真想再见她一面。

结果甚佳，接待非常热情，极为欢洽。她们坐下来畅谈了半个钟头，由艾丽斯的朋友、女官山中夫人当翻译，她还见到了年老的西村，此公自夫人死后老得更厉害了。艾丽斯说，关于西村夫人的情况，太后了解得比任何人(除我以外)都多。太后感谢艾丽斯经常送时装书刊(《时装》杂志等等)和爵士音乐唱片给秩父宫妃，艾丽斯答道菲物不成敬意，太后便说，不要小看这些唱片，秩父宫在叶山养病时就给他放过这些唱片，他欣赏极了。

太后又说到前晚秩父宫妃和她进膳时还谈起这些唱片，谈起秩父宫妃的兄弟死时艾丽斯送的花。太后还知道艾丽斯很关心聋哑学校，并感谢她在这方面做了一些事。太后对艾丽斯知道得这么多，令她惊奇，那样感谢，又使她有点窘，于是她便讲了一些奇闻轶事来凑趣，逗得太后爽朗地笑起来，这想必至少可以宽松一下宫中那种礼仪森严的气氛。太后还详细问到我们的儿孙。

艾丽斯去时带了一些鲜橙、柠檬和葡萄，这是沃尔特·迪林厄姆从加州送来给我们的，后来听说太后又转送了一些给天皇和皇

后。太后赠给艾丽斯一束采自御花园的绝美的兰花，后来山中夫 387
人对荻原夫人说，这次谒见“极为成功”，太后非常高兴，她亲手给外国大使夫人送花，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太后说，她希望不久会有那么一天，能把所有各国使节夫人都邀集到宫里来赏花。艾丽斯道别时太后拉着她的手依依不舍，送她到门外，行屈膝礼而别。

我把这次聚会写得这样详细，是因为我觉得，此事表明，皇室切望与美国亲善，也将有助于亲善，因为此中情节定会从天皇一直传到臣民，虽然我们自己要极其当心，不要跟任何人说起。

日本外交政策出现明显的分歧

1941年5月15日

致华盛顿一长电，述评日本驻南京大使本多和外务大臣松冈在中国问题上有明显的意见分歧。本多主张加强汪精卫政权，倾全力在南京政府控制的地区创造出一种可以向日本国民显示“中国事变”已告“解决”的局面。报刊却奉命要大肆渲染日本在中国的军事行动，此后数周间，日本报纸上便满是日军大胜和连歼中国军队的报道，这些报道与来自对方的报道不甚相符。我对国务院说，本多的意见，事关日本对华政策的新动向，按理应当由首相或外相来表示，可是他们都没有说什么。因此，外国驻此间的外交界人士都认为这是一个重要迹象，表明日本政府内部意见不一。

1941年5月16日

因松冈对法国大使阿塞尼-亨利讲了一些话，大使本人又向我转述，上述分歧的内容就更加清楚了。松冈似乎认为，诱使汪精卫逃离重庆，他自己起过很大作用，所以他感到应当尽全力支持汪。388

可是，从汪对日本的态度来看，他觉得汪已没有再求他支持的资格，据他看，不论怎么解决，现在能够和日本实现一项解决办法的，惟有蒋介石。目下还没有托任何第三国的人或中国人去和蒋打交道，但是松冈已准备在适当时刻放个双方都信得过的人去向蒋提出某种符合日本要求的建议。

非正统外交的一章：松冈外相特写

1941年5月27日

关于1940年9月27日的三国盟约，以及德美发生战争时这个条约与日美和战问题的关系，外务大臣松冈先生所表示的态度，作为不大正统的外交的一章，是饶有趣味的。

引起我同松冈先生口头和书面交换意见的那些情形可以证明这一点。外相出访欧洲约六周后回到东京；我立即函请在外相得便时与他约会；他使我（别国大使也一样）等了约三周之久，最后才在外务省正式接见我。在谈话中外相表示意见说，美国既然对德国抱挑衅态度，就该公开对德宣战，这样才算"好汉、体面、合乎情理"。他还说，希特勒一直非常耐心，宽宏大量，不对美国宣战，但是，不能指望希特勒会无限期地保持忍耐和克制。我对他的话提出抗议，他便收回原意，推说不是暗指美国干了不算好汉、不够体面、不合情理的事，后来他又写信对我说，只因他的英语知识不足，所以错用了"decent"（体面）这个词，他的本意是要说"discreet"（考虑周到的）。

外相随即极为清楚地表述了他对三国盟约的解释，大意是，倘若美国为它开往英国的船只护航，倘若德国击沉这些船只，倘若美国因此便同德国开战，那么，他松冈先生就要根据盟约第三条的含义把美国看作侵略国，他相信，随之而来的就是日美战争。他又

389

说，这仅仅是他自己的意见，到时不但要和他的阁僚、而且还要和日本的盟国商议，而与盟国商议时，三票中日本又只有一票。(关于这一点，有件趣事值得一提：据希腊公使波利提斯先生说，今春德国攻打希腊时，松冈先生曾告诉他，日本在三国盟约下该尽什么义务，要由它自己决定；它作决定将以常识为指导；松冈先生认为，至于到底是什么决定，那是十分清楚的。那时一点也没有提到过什么三票中日本只有一票。)

盟约第三条规定，只有当盟国之一被他国进攻时盟国之间才要互相援助，而外相却对日本在此条下承担的义务作如此解释，我表示惊讶；日本竟可以这样放弃它将来的行动自由，可以把它未来的命运交给三票中它只享有一票的场合去决定，我尤为骇异。我阐述了美国对公海上的自由航行权的态度和美国要在公海上自由航行并将为自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决心。

5 月 15 日，我回复松冈先生 5 月 14 日第一封来信，一面感谢他，一面对他说，那天会谈中他有些话"含义严重、影响甚大"，令人遗憾。17 日，松冈先生给我来了一封长信，标明"纯系私函"，强调这么一个事实：尽管他知道当外相应该怎么当法才"对"，但那种当法并不利于增进我们之间的了解；他常常忘记他是外相，很少意识到这个职位。许多外交家常抱的所谓正确态度，他实在是感到讨嫌，这种态度"不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成就"；他承认他总爱用一两千年甚至三千年前的思想方法来考虑问题，假如在我看这是颠狂的表现，那也没有办法，因为他生来就是这个样子。

他说，5 月 14 日会谈中他的那些措词，作为外相本来是说不出口的，在我们的正式交往中，没有讲这些话的余地；他是把我当成一个世界公民才向我吐露真言的，他总是把我看作不单是一个 390 大使，而且是一个他可以对之暴露内心深处的思想和意图的人。不过，他仍然写到尽管美国那样挑衅，德国还是忍耐，写到倘使美

国因进攻或被攻（被攻这一点他认为"倒不足为虑"）而卷入欧战，可怕的世界末日就会降临到文明世界的头上。另外他还说，我信中所谓"含义严重，影响甚大"，他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他想不起他有哪句话可以使我作这样的解释，所以他相信其中必有误会。他建议一两天内再会谈一次。

5月19日，外相在他的私邸接见我。喝过茶，便漫步到花园里，两人都抽着烟斗，无拘无束，随意闲聊。他突然谈到赫尔先生曾召见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将军，告以14日我们会谈时松冈先生曾企图"恐吓"我：对此他表示惊讶。外相否认他有吓我之意或曾经恐吓过我。对我将上次会谈呈报我国政府，他也感到诧异，因为那次他同我讲话，是把我看作格鲁先生而不是看作美国大使。我告诉外相，我在报告中说到他讲话的语气和内容时用过"好战的"这个词，接着我便把他那些被我形容为"含义严重、影响很大"的话背给他听。外相没有对我的报告的准确性表示怀疑，只是笑着说，他的言词也许可以说是好战的，但他的内心和思想却是爱好和平的。

我对外相讲明一个事实：我在日本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要确切地弄清楚日本政府的政策并向我国政府汇报，一如野村将军，对美国政府的政策，他在华盛顿也正是这样做的；松冈作为外务大臣，乃是我能够了解日本政策的唯一的官方渠道。因此，纵使他是跟作为格鲁先生而不是作为美国大使的我讨论政策，我也依然有责任把他的观点报知我国政府，因为他是在代表日本政府讲话。在应否报告这一点上，外相不同意我的说明，但他还是确认了5月14日他向我发表过的意见。

391 在这次两小时的谈话中，我谈到美国的不可剥夺的自卫权，谈到国际法在公海航行自由方面的应用，并表示意见说，设若日本真是想同美国和平相处，就无论如何也不会把美国的自卫措施理解为侵略行为。我还向外相读了赫尔先生4月24日在美国国际法协

会上演说的全文。松冈先生倾听着，对每个要点都点头表示理解；他认为这篇演说把美国观点陈述得很清楚，堪称为一篇很好的演说，但又说，除美国观点而外还有别的观点，他觉得我们美国人总是不能设身处地替其他当事者想一想。我答道，我们只能依据事实和行动，这些事实和行动已经把其他当事者的立场和态度表现得非常清楚了。

以上仅仅是漫记与松冈先生两次会谈和书信往来中出现的某些要点。人家和我谈话、写信，是把我看作朋友而非大使，我本来不想加以利用，但我还是坚信，外相长时间出访归来在外务省第一次和我会晤后所交换的这一切意见，不管方式多么别致，仍只能当作官方意见看。至于松冈先生表示的意见是否代表日本政府全体的观点，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就我们打交道的一般情况而论，又不妨可以这样说：我和松冈先生的个人关系还是很好的；我把他算作我在日本的私人朋友之一，在交往中我喜欢他的直率——至少表面上还算直率；讨论问题时，有些话用词过于强硬，有些话甚至逼得我非提出强烈的正式抗议不可，但即便是在这种时候，也尽量少带激昂情绪；作为外相和大使之间交换意见，有时还可以无所顾忌地互相攻其不备，使对方吐露真情。有些言词虽可以解释为意在侮辱对方的国家，例如他竟说美国应该怎么做才算“好汉、体面、合乎情理”，但那是冲口而出，有口无心，而且一经诘难便自愿收回，没有使人事后仍耿耿于怀。

若问松冈先生在心地上和政治上是否诚实，我不欲表示怀疑。在东京，政治把戏是层出不穷的，有时人家就引他的话，证明他在 392 这个场合讲的是一套，在那个场合又完全是另外一套。他讲话确是太随便，滔滔不绝，时间许可，能讲上几个钟头，这样，要他说话一点也不自相矛盾，那是不可想象的。不过，他和我谈话时，我倒觉得他是在遵循着一个经过缜密考虑过的方针，即尽量把美国和

德国开战的后果描绘得非常可怕，这很可能是出于一种错误的估计，以为用这种手法就可以对美国政策施加抑制性的影响。

松冈先生就职后不久就暗示过，他的政纲是，恐吓美国，迫使它对远东和欧洲都采取完全不介入的态度，他认为这是办得到的，也应该这样办。订立三国同盟，就是贯彻这个政纲。殊不知弄巧成拙，这一着不仅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而且还刺激了美国舆论，成了促使美国舆论脱离孤立主义的主要因素之一。计划是惨败了，但看样子松冈先生恐怕还是不会改弦易辙，而宁愿在一条充满极大危险的路上走下去，因为另订方针，就无异于自认完全看错了美国人的性格和气质，就必然会使他的外相位子坐不稳。

德国催逼日本进攻荷属东印度群岛

1941 年 6 月 10 日

有个国会议员，对我们友好，但因有亲美的名声，不敢来大使馆，今天他通知我，松冈正受到德国大使馆和日本某些极端分子两方面的强大压力，要他对荷印采取有力行动；因为荷印当局已答复日本的要求，送来的照会严正有理，婉言拒绝将身上全部财物奉送给日本或其他任何国家。据说，德国人催逼日本动手，是以美国不可能同时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两面作战为理由。日本的极端派则是想在德国胜利结束战争之前拿下荷印，因为他们害怕德国也在打荷印的主意。

那位报信者还告诉我，纳粹分子已钻进日本的文化团体及其
393 他各种团体，其深入程度，比一般人知道的大得多，他们正在煽动群众，挑起对荷印的恶感，想借此迫使松冈行动。政府中亦有人相信，美国舰队大部分已从太平洋调赴大西洋，这种信念，对此间情势当然也有明显的影响。

关于上述情报，我向国务院评论道：日本袭击荷印会冒多大危险，目前我还不能作有把握的判断。从战术上来看，只要对华战争还在打下去，日本进攻荷印恐怕就要冒极大的风险。但事情又有另外一面，我们必须记住，松冈先生已是轴心国的囊中物，对来自德国的压力，往往俯首顺从。在日本国内，他还拥有一大批有势力的追随者。他的言行，无不包含着对美国的蔑视，他总是以为，对日本的扩张野心，美国无可奈何，不会有什么坚强措施。日本极端派在军政两界的影响力，不可低估，低估实际上就是短视。

苏德开战前夕的日本国内情势

1941 年 6 月 19 日

东京一直在传说，内阁内部在大政方针上意见不一，尽管日本宣旀忠于三国条约，但对极权主义，特别是纳粹型的极权主义，仍有人抱强烈的抵制态度，这种态度最近且日见明显。现在东京之所以笼罩着一种"停滞不前"的气氛，上述情况也许就是原因之一，此外，美国政策的趋向还摸不准，德国有进攻苏俄的可能，以及国际上其他方面的事态发展，恐亦与造成这种气氛有关。

日本国内这种意见分歧，其迹象有些也许还会使人感到有趣。日本给荷印的答复极为温和，从这里也可以发现一个显著的迹象。

据大政翼赞会协力委员会最近一次会议上透露出来的消息，代表们在讨论中，没有把松冈先生 5 月 28 日在日比谷公会堂的演说词列入议题。在那次演说中，外相曾拼命为纳粹德国的极权制度辩护；他还说，日本的经济结构远远不如德国，又骂日本政府领导人和日本实业家缺乏责任感，全是无能之辈。很可能就是由于上述原因，加上那种十足希特勒式的腔调，所以这篇演说虽已由松冈先生本人提供全文，印成了二十万份小册子，内务省却禁止 394

发行。

听说近几个月来，司法大臣柳川将军已下令逮捕了下级官员四百四十人，理由是，这些人的极权主义言论触犯了《思想取缔法》——该法规定，主张推翻资本主义者，均应受罚。现在我们又知道了，6月11日农林大臣石黑先生之所以辞职，直接原因是，农林省的农政局长盗用公款，用于极权主义宣传，最近被关押。

6月17日，报上宣布，内阁中将新设一个“思想对策协议会”，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压制官吏的危险思想。

对日本政策的不满，对纳粹和法西斯思想倾向的反抗，在大政翼赞会协力委员会代表们的发言中亦有流露，发人深思。会上好几个发言者都承认，日本国内，亲美亲英的，大有人在，另外至少有一个发言者还力主日本不要模仿纳粹德国的极权主义制度。

国内意见不一致，既强烈表现在上述迹象中，也表现在报纸社论谨慎的评语中。这些征候都说明，日本的外交政策尚未最后确定，突然改变方向，并非全无可能。

395

德国进攻俄国：初步印象

1941年6月22日

今天传来德苏开战的消息。此事早在意料之中，但这样突如其来，仍令人惊异，我原以为还要迟一点才爆发。自欧战开始以来，我只敢作两个有把握的预言：一是英国不会战败，二是德国和苏俄终归会打起来。一个预言已经成为事实；另一个到一定时候也将实现。

这个消息似乎证明了两点：第一，德国人已经放弃了今夏入侵英国的打算，第二，德国人对补给品，首先是石油，正日益感到拮据。苏军的潜在战斗力如何，我不知道，我们当中也没有任何人有

确切的了解。

俄德开战后日本陷入窘境

1941年6月23日

德苏战争使日本左右为难；它对轴心国作过保证，对苏俄也保证过要守中立；现在到底该执行哪种政策呢？有个日本高级人士说，在他看来，日本将先抱骑墙态度，到交战双方胜负判明时才插进去捡便宜。不管此说确否，反正内阁几乎是在连续不断地开会，陆海军将领也在开会，另外还有御前会议：忙得不亦乐乎（此后还忙了许多天）。这一切会产生什么结果，我们还不知道，但可以肯定，现在该是日本采取新的方针、与美国和解的时候了，如果日本能采取一些建设性的政治步骤，和解是大有可能的。这个时刻，正是改变路向的可能性很大的时刻。

荒木将军那帮人一向认为，不夺取海参崴和沿海州，日本就永远不会有安全感，目前这种局势，定会使他们焦躁万状。我对这个消息是有理由相信的：有个做过首相的日本政界高级人士正要责备松冈，说他的政策已将日本拖到下述境地：

（1）对德国，由于与轴心国缔下盟约，日本被绑住了手脚；

（2）对苏俄，中立条约也把日本束缚住了；

396

（3）和中国的冲突，解决遥遥无期；

（4）与荷印的谈判，并未得到公众因听信官方宣传而久已伫望的那种结果；

（5）日本同美国的关系在不断急剧恶化。

我们别忘了一点，德国缔结防共协定之后，又和苏俄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曾经出卖过日本，那时的平沼—有田内阁曾因此引咎辞职。目下正有人这样看：近卫—松冈内阁现在也应当效法那时的

内阁，至少松冈本人应该滚蛋。

日本对俄国采取等着瞧政策

1941 年 6 月 26 日

我们获悉，6 月 24 日，苏联大使确曾问过外务省，在苏德之战中日本抱什么态度，所得的答复是，日本的方针尚未确定。松冈说，哪一方应负开战的责任，这对日本的决策将有很大影响，又说，日本的根本政策，乃是以三国同盟为基础。因此，日本尚须判明，苏日关系现在是否仍能与日本的根本政策相协调。

很明显，当初日本加入轴心国集团，是假定德国和苏俄的亲密关系将继续下去，苏德战争一爆发，也就把这种亲轴心的根本政策毁掉了。至少在理论上可以这样讲。我们且看看再说。

日本否认有反俄企图

1941 年 7 月 5 日

今天收到国务卿特奉总统之命寄来的要转交给近卫首相的信397 件。信中表示：近闻日本意欲进攻苏俄，美国希望此说不确；使太平洋区域的和平更加可靠和巩固，这是美国政府的希望，它素知日本亦同具此心，倘真有攻苏之意，这些希望就破灭了；总统说，若能从近卫公爵得到维护和平的保证，他将深为感谢。

我立即写信，由可靠的人送交首相私邸，问他我可否向他面交来自总统的信件，并请他指定会晤地点，只要能避免惹人注意就行。不久他的私人秘书牛场来了，说首相很乐意见我，但又恐我去他的私邸仍将被人注意，遂拟寻个高尔夫球场，在那里相会。可是偏碰到星期日，所有高尔夫球场都挤满了人，第二天也是假日，因

此近卫公爵认为星期二或星期三以前实难会晤。我说，这事很急迫，我不能耽搁，但为免使首相为难，我想就由牛场本人把总统的信带去，这样，我便把信交给了他，并对他说，我将整天呆在大使馆，等候回音。晚上，回话来了：先谢传信之事，然后就说，近卫公爵的复信，一俟外相自御殿场返京，即尽快由外相交给我。

这种做法有点欠妥，牛场先生在传达回话时为此表示抱歉，但他又说，在外交事务上，首相同外国大使直接打交道，在日本是没有先例的。我便委婉而有力地提出意见，请牛场先生为我转告近卫公爵：如果以为我是故意撇开外相，那就错了，我的办事程序，与野村大使在华盛顿同罗斯福总统直接商谈并无二致，总统甚至还对野村大使说过，随便什么时候他都乐意会见他。我毫不含糊地对牛场先生讲明，近卫公爵认为不能直接答复总统的来信，我感到遗憾。

我告诉国务院，我决没有把近卫公爵的态度看作意在拒绝答复。这不过是一个碍于没有先例和囿于习惯势力的问题而已。想当初比尔·卡斯尔来日本时，身负特殊使命，以订成海军条约为目的，事体如此重大，他也只是同外务大臣交涉，并没有谋求直找当时的首相。

398

为了叙完这件事，这里还得记下：7月8日，松冈约见我，把首相的复信交给我转交总统，信中大意是，迄今为止，日本政府还没有考虑对苏俄作战的可能性。他还给了一份他在7月2日向苏联大使发表的声明，意思也差不多，只是加了这么一点：日本将来的政策主要取决于今后的事态发展。我问松冈，所谓今后的事态发展，他想到的有哪些，他答道，可能连带发生的事非常多，例如，苏俄会不会与英国结盟，美国会不会设法经由海参崴向苏俄运送军用物资，用以对付日本的盟友德国。松冈说，日本国内的有力人物正在对他施加巨大压力，逼着要同苏俄开战，假如真发生上述他所

想到的那些情况，极端分子的资本就会大大增加，他苦心为维持和平而作的努力就会遇到比现在更大得多的困难。松冈说，他曾向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两人都呼吁过，他现在的处境已经很困难了，希望不要增加他的困难。

经过这次和松冈的长谈，我告诉国务院，我觉得很难相信此刻日本已经决定要和苏俄打仗。

附带说一下，在交给我的回信中，外相已按捺不住，竟问总统和美国政府是否真有介入欧战之意。7 月 11 日，我接到国务院的回信，除别的话而外，还叫我告诉外相，美国不论有什么行动，都将纯全是防御性的，至于是否有参战之意，希特勒先生最能提供这方面的情报——只消把他今后打算采取的侵略步骤透露出来就行了。

但这个故事还不能就讲到这里为止，因为 7 月 17 日大桥又把我请到外务省去，交给我一份外相的口头声明，里面说，日本政府不想辩论我方回信中所提的论点，但是，美国政府，或者任何别国政府，要是暗示可以滥用所谓自卫权，日本政府便不能置之不理，399 它既不能赞成美国回信中暗含的对德国的指控，也不能同意美国政府的下述看法：任何国家，只要暗示一下美国应停止其自卫政策，就是在实际上把自己列在企图征服全世界的侵略国一边。

当时诈称卧病在床的松冈，在前一天晚上已经辞职了，他的后任很快就接替了他，这样看来，上述声明，也很可能就是他的外相生命结束时的最后一喘，其语调之尖刻，和一年来我们大部分交往中他那种敌视美国的态度是一致的。他在政治上死去了，作风至死不变，他的最后言谈结束了当代已经极为有趣的外交中的一个有趣的时期。

罗斯福总统要求近卫首相否认日苏即将开战的传说

国务卿特奉总统之命给日本总理大臣近卫文麿公爵阁下的信，1941 年 7 月 4 日

美国政府得自各方面的报道，谓日本政府有与苏联开战之意。

正如日本政府所深知，维持和保障太平洋区域的和平，一向是美国政府诚挚的心愿，为了达到这个崇高目的，美国政府曾尽了最大的努力。

从近几个月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大将在会谈中向国务卿赫尔先生所作的陈述中，以及从日本负责官员的言论中，美国政府抱有希望，相信维持和保障太平洋区域的和平也是日本政府的心愿。现在美国政府得到的报道，与这些陈述和言论全然相反，致使美国政府觉得这些报道很难信以为真。

美国政府一向希望，太平洋区域的和平现在不仅不会被进一步破坏，而且还真有了更加巩固和得到保障的可能，据了解日本政府亦同具此心，但是假如日本走上军事侵略和征服的道路，那么，这种行动，就必然会使美国政府所抱希望成为泡影。

但愿所传日本决定与苏联开战之说并无事实根据，日本总理大臣阁下若能就此点作出保证，实为美国政府的热切希望。

日本帝国外务大臣奉总理大臣之命复书美利坚合众国总统，昭和 16年(1941 年)7 月 7 日。〔译文〕

在现在这种时候，不仅在日本，而且在其他各国，均谣诼纷纭。

防止欧战蔓延到大东亚地区，维持和保障太平洋区域的和平，始终是日本政府的真诚愿望，为达此崇高目的，日本政府一直都在

竭诚尽力，这几乎是无须赘言的了。

为了回答来函的最后一段，日本政府希望讲明：迄今为止，他们还没有考虑参加对苏作战的可能性。对于苏联与轴心国之间的战争，日本政府的立场已在1941年7月2日帝国外务大臣向苏联驻日大使发表的口头声明中说清楚了。为了使总统了解日本在目前情势下不得不实行的方针政策，不如就将这个声明附上一份，供他细阅。不用说，美国政府自会把这个声明当作绝密文件看待。

附带说一下，日本政府也想借此机会探问清楚，总统或美国政府是否真有介入欧战的意图，因为，欧战的前景，日本政府当然非常关心，他们也从各方面听到一些谣言，内心确实不安。

401

日本在观察德国对苏联的进攻

1941年7月6日

我觉得，现在已有充分的证据足以评价日本政府在7月2日御前会议上重新决定的立场和政策了，评价自不免含有几分推测的性质，但仍然可以显示我的见解的一般倾向。

由于德国进攻苏联，日本决策人及各派皆不知所措，在十天的商讨和审议中，发生严重的混乱——如果还不能称之为内部危机的话——从我们得到的证据来看，这种混乱现象是越来越明显了。按我们的估量，局势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松冈和平沼男爵之间冲突已多少有点公开化了。现正闹得满城风雨，有人还说，平沼男爵曾发出威胁，要仗他内务大臣的地位逮捕几个极端派的头面人物，不过没有执行，因为他接到警告，说果真如此，就要暗杀他。（据我对平沼的了解来判断，这个传说不象是真的。）但至少可以说，这些谣言，不管真与不真，都可能反映，日本领导人当中，存在着尖锐的意见分歧。我们认为，在没有统一的思想、也没有哪一派思想占统

治地位的情况下，积极有力的政策是不会有的，因而也就不致于卷入新的纠纷或承担新的义务。

在结束上次大战的过程中，日本取得了大国地位，踌躇满志。此后日本同纯属欧洲的、与它关系不大的问题到底有多大关连，仍不十分清楚，直到日本人侵满洲的问题提到国际联盟来的时候，人们对此才有了充分的了解。记得 1932 年日本退出国联后随即宣称，它要结束它对欧洲承担的义务，要把自己限制在东亚，这次大战爆发后，它又正式确认这个政策，并称之为“自由独立的政策”。这个政策执行了八年，表现得相当坚决，但到三国同盟缔结时，却来了一个急转弯，这个同盟又再次使它卷入欧洲事务，在德国进攻苏俄以前，已有一种看法在滋长，认为日本既与德意结盟，便承担了一些本来可以避免的风险。

关于德国集团和日本集团，特别是关于日本在新联盟体系中预期将居于次等地位的问题，德国和日本之间在概念上有很大分歧。实际上日本也开始明白了，德国是希望在中国取得特权地位，而无视“东亚新秩序”。日本已开始怀疑：德国的诺言是否靠得住；是否德国一打赢，什么都对日本有利了。松冈多次遇到挑战：据说他在柏林时，希特勒曾提出劝告，要日本与苏联订约，改善苏日关系，可是话音未落，德国就进攻苏联，这不是蓄意诓骗日本吗？对此松冈不得不一再反驳。这并不是说，对德国的诚意日本已经完全失去了信心，我不想过甚其词，但我也不认为，这种信心今天还是那么坚定，可以赞成任何倡议，即使弄到为德国的利益效劳比为日本自身的利益还周到，也觉得有理。

因此我认为，在德苏已经开战的形势下，不考虑上面说到的三个因素，就不可能重订日本的政策。这三个因素是：(1) 日本国内没有一致的意见，(2)希望在日本已经承担的义务所能许可的范围内，尽量缩小卷入欧战的危险，(3)对德国的诚意，信任的程度已在

减弱。

在东京的外国观察家说，御前会议已决定，在攻打苏联沿海州以前，先持观望态度，一面注视德苏战争的总趋势，一面推动南进。这个计划的第一步，据说是以印度支那为目标，要在金兰湾及其他一些地方取得基地，惟须逐步进行，以免和美国发生公开冲突。还说，这个推动南进的决定，是针对德国的，其用意是要赶在德国获得全胜而能遏制日本的野心以前，把日本在南方的地位巩固下来。

一般认为，德国最希望的是日本采取措施，转移美国对欧洲 403 的注意；它并不是在催逼日本参加对苏俄的进攻。如果德国的愿望真是这样，那就可以说，上述所谓御前会议的计划倒正好与此相符。

但是，所谓御前会议的“重大决定”，也可以说是下决心要实行一种伺机而动的政策，静待苏联的崩溃。要证实这种估计，也可以举出几点：(1) 近卫公爵曾对派拉蒙影片公司的门肯说，对德国和苏俄承担的义务日本都要履行；(2)松冈先生曾向苏联大使发表过声明；(3)外相 7 月 4 日还对某某某谈过话。松冈是想通过这次谈话造成一种印象：日本国内，意见普遍一致；三国同盟各成员国之间，相互信任完满无损。这就和实际情况显然相反了，使我们对他的话不得不持保留态度。

日本加紧动员

1941 年 7 月 12 日

东京不断有谣传，谓某几类预备役人员正在被军事当局召集入伍，但似乎只不过是目前形势下应有的预防措施。

这是此后持续了几周的大规模动员的最初迹象之一，不久又开始有消息从神户、大连、沈阳和哈尔滨传来，谓大批部队似乎主

要是朝满洲方向调动。我们听说，正在召集三十五岁至四十二岁的男子，限一两天内报到，有个电车公司一周内就有五十个司机被征召。我们使馆也走了一个厨师副手。大阪报道，预定在本周举行的年度网球赛和其他运动会一律取消，因为有很多学生要坐火车来参加比赛，而火车将移作别用。大阪还报道，局势显得非常沉闷，气氛日见紧张，普遍确信，将会有事，什么事，却只能猜测。

404

动员已经紧张到不许外国人旅经濑户内海，不许外国人乘火车出入国境，因为这样走就一定要乘坐下关和釜山之间的渡轮。禁令妨碍了正常的交通，给一些想去上海的美国人带来极大不便，他们已经订好了日期要从上海坐船回国。这还不算什么，到8月初就厉害了，驶往美国的日本船舶全部停航，连去上海也难了，在多数情况下根本去不了。

英国朋友写出了内心的话

1941年7月24日

有个前两三年在东京住过的英国朋友来了一封长信，有几段值得引述，因为写得相当好，而且指出了一个我久已知道的事实：许多似乎讷于言词的英国人，本性却具有很深的感情和鉴识力，只是由于英国人在气质上偏于抑制，所以往往不肯外露。我想，大概主要是因为他居留日本时与美国人过从甚密，才彻底突破了抑制，才能这样坦然自陈。他走时我曾到车站去送他。

> 承到车站送别，感激良深，我不能让星期四就那样消逝，一去不返，我必须把谢忱记在纸端。
>
> 我们敬爱的外交团团长为了几分钟的送别，不惮麻烦，远远赶来；何况那天其他的人要去中禅寺，你也要去轻井泽，行前有许多事要做；如此见重，我认为不仅是出自你那极可珍视

的友情，而且也是意在对我特赐光宠。

诚然，你拨冗前来，只赶上和别人一起最后说声再见和一路平安，但是，这类小事，却使友爱、忠诚和敬重的火焰永照不灭，这种火焰有的人则连点燃的力量也没有。

和你及其他诸友相处如此欢愉，确是难分难舍。终于得归故里，与爱妻及留家的亲人团聚，固觉欣慰；但我有幸得到的友情，一旦割舍，即使是暂时，亦令人万分怅憾，黯然神伤。

不过我相信，乌云消散的日子仍将到来，尽管我还得流着“血、泪、汗”，冲过层层暗堡，杀出一条路来，但我敢肯定，我们当中至少有一些人还是能活下来，将会再聚于某地，重度往日无限幸福的日子。

可是，在某处再打高尔夫球的时候，假如我发现自己不是作为你的伙伴出现，我这个幻想仍决不能算圆满。……

两年半以来一直是生活在各种国籍的朋友的圈子里，他们多半都是同邻居说话也要特别谨慎的，今后我不会再过这样的生活了。

我今后的生活将是同另外一些朋友(世界上最优秀的人)在一起，犹如共处在一艘军舰上；必须万众一心，燃成一股火焰，怀着一个思想，抱定一个目的。

我的工作就是要点燃这股火焰。这些朋友的献身精神、互相关心和忠诚不贰的精神(无论什么行业，要成大事，这种精神是必不可少的)，其价值如何，必须受考验——在战斗期间经受最严峻的对人类耐久力的考验。

格鲁先生，你的恩情，我是永远报答不完的。

你给了我很多教益。如何才能点燃这股火焰并使之永放光明，我在东京时已经有了一个光辉的榜样和典型，凭此火焰，就将战无不胜，事无不成。

谨向格鲁夫人致以最好的祝愿；谨向你的友情表示最深的谢忱。掬诚倾心，敬向我亲爱的格鲁先生道声再见。

维希政府把印度支那的基地让与日本

1941年7月25日

我们现已获悉，维希政府的官方发言人24日宣布，日本已提出要求，要在印度支那的战略地点占有基地；谈判正在维希和河内同时进行，日本并未提出最后通牒，德国亦未施加压力。他还说，将在1940年8月30日法日协定的范围内作出安排，只要法国对印度支那的主权不变，只要日本不提出领土要求，暂时扩大法日军事协定也没有什么不便。 406

有个新闻记者问维希政府的发言人：法国曾宣布，它将保卫它的帝国，使其不受任何国家的侵犯，现在这种决定，是否与原来的政策不符？他答道：由于叙利亚出了事，法国政府不得不作出这个决定。又问：法国曾否请求美国帮助维持印度支那的现状？这个问题如何回答，发言人显然是有准备的，因为他立刻答道：1940年，法国曾经求助于美国，未能如愿，这次它觉得不必多此一举了。以前这个发言人碰到难题时，往往推说要请示上级，这次他却没有用这个老办法来回避。

丰田外相说明日本何以决定保护印度支那

1941年7月25日

新外务大臣丰田海军大将今天分别接见外交使节。和我谈话时他先说，他奉命当外务大臣，实出意料之外，外交他是外行，期望

我帮助他。然后就说，三国同盟继续有效，日本的政策仍以三国条约为基础。关于政策，他没有再说什么了。

我则说，为了给美日关系作一点永久性的建树，我一直工作了九年，希望外相合作，把这项工作继续做下去。我说，改善两国关系，不仅对美国来说很要紧，对日本来说，也只有好处。不过我又说，必须记住，友谊不是单行道。

我这么说，外相表示感谢，保证给予合作。他说，今天与各国使节会见完毕后，就将立即和我长谈。

当晚9时半，我应邀往访新外务大臣，再次会谈。他说，明天 407 中午，日本政府将发表正式声明，宣布与维希政府达成的关于日军拟进入印度支那的协议，但是鉴于美国关心此事，他想事先向我说明一下这次行动的理由和意图。丰田将军随即交给我一份日文文件，外带一份非正式的英译本。

看过文件后，我说，此件我将立即转交我国政府，但同时我还想告诉外相，我将把我国代理国务卿昨天曾对报界发表的一篇声明交给外相，我这样做对日方文件中的某几点来说可能是最好的回答。接着我便把声明中今天电台选播的几段念给外相听，并说，全文明天就送给他。

在以下的讨论中，我又着重阐发了威尔斯先生声明中切要的几点。我说，指责别人“包围”日本，说什么日本的行动是旨在“保卫印度支那，维护其安全”，都是十足的谬论。我还说，日方文件中所谓“日本无意将印支南部变为武装进攻毗邻地区的基地”，这句话我注意到了，很高兴，但是，日本历届外相的诺言和保证，我国政府和我本人几年来领教得多了，其虚妄性已使我们大失所望，弄得我们只有信赖事实和行动而不能信言词。外相没有试图反驳这个声明，只是恳求我信任他。

在接下去的谈话中，我历数了日本南进的各个步骤，直至如今

又要占领印支南部的基地，从而危及包括菲律宾群岛在内的太平洋其他地区。这次行动，对新加坡和荷属东印度群岛肯定构成威胁，我国关心这些地区的安全，有着合乎实际、合乎逻辑的理由：这些我都详尽阐述了。

外相没有试图反驳我的论点，只是重述日本拟进军印度支那是志在和平，不同意我们使用"占领"一词，因为日本并无领土野心。我答道，"占领"一词的意思，不包含时间问题。

谈话结束时，外相热切向我呼吁，希望我尽最大努力转告我国政府：日本抱的是和平目的；最要紧的是，在此关键时刻，不要采取刺激日本人民和妨碍改善日美关系的措施。他说，我们的谈话内容他将告知野村将军。 408

美国冻结资产令——适用于日本和中国

下面是一项声明的本文，注明的日期是1941年7月26日，发给报界的时间是7月25日下午8时。

> 总统因考虑到他已宣布国家处于无限期紧急状态，特颁布行政命令：冻结日本在美国的资产，方式与1941年6月14日冻结欧洲各国的资产相同。此项措施的实行，是要把涉及日本利益的一切财政和进出口贸易事务置于政府管制之下并对违犯此令者处以刑罚。此项行政命令，一如1941年6月14日命令，其目的尤在于防止利用美国的财政金融设备和日美间的贸易来危害美国的国防和美国的利益，防止把用强迫手段或征服得来的资产在美国变换现金，制止在美国进行颠覆活动。
>
> 应蒋介石大元帅的要求，并为援助中国政府起见，总统同时亦已将中国在美国的资产纳入冻结管制之列。对中国资产

实行发许可证的制度，将以加强中国政府的外贸和外汇地位为目的。按中国政府的意愿把中国包括在此项行政命令之内，乃是本政府援华政策的继续。

我们从完全可靠方面获悉，日本新内阁成立后不久，德国大使即往见外相，请他寄语首相，大意是：(1) 德国在俄国的战争将在8月间胜利结束，(2)英国将在9月间受到德国入侵，(3)冬天以前德国将大获全胜，从而结束战争。日本受到劝告，在这种形势下，它应当继续忠于轴心国盟约。

提供消息的这个人还说，德国也希望革掉松冈，这不仅是因为与苏俄订中立条约他要负责，而且是因为他太饶舌了。又说，德国是希望日本入侵苏俄，而不是要它继续南进。

日本新外相何以睡不着觉

1941年7月26日

应外务大臣之约，今天再去见他，详论日本在印支南部建立基地及美国冻结日本在美资产(已传有此行动)后的新形势。由于两人对所论问题的看法大相径庭，结果也就无一致之处可言，谈话主要是重述昨晚会谈中提过的意见。

这次刚要来见外相的时候，恰好接到关于代理国务卿和日本大使会谈的报道。因此我便把其中的内容告诉了丰田将军，希望他确切地知道代理国务卿对野村将军讲的话。代理国务卿曾说，他看不出现在还有什么把华盛顿会谈① 继续下去的基础，外相特别注意这句话，要弄清楚确切的字义。他请我解释。我告诉他，我们只能按字面的意思来领会这句话。外相很怕华盛顿会谈破裂，

① 华盛顿会谈：从1941年4月起，美国国务卿赫尔和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在华盛顿就"美日妥协"和"中国问题"进行会谈。——译者

焦虑之情，溢于言表。我有理由相信，就在我们会晤之前天皇接见过他，所以我觉得，他很可能是在反映天皇对此事的关切。

丰田将军告诉我，代理国务卿对日本大使说，德国曾对法国政府施过压力，他对这话特别感到遗憾，并说，日本同法国政府谈判印支问题时，决没有借过任何外来的压力。 410

和对付英国大使一样，丰田将军竭力拿英国对叙利亚采取的措施①来同日本对印度支那的行动相比，但我在答话中强调指出，这两件事全然不同。

丰田将军反复叨念，美日间目前这种可悲的局面，全是美方误解日本的真意造成的，对此我答道，这个毫无根据的论断，日本官员和报刊已经搬用了很多年，我们都听腻了。为了表白日本的真意，前几届日本政府都作过保证，许过诺言，结果如何呢？我便扼要重述了许多惨痛教训。我又说明了美国政府和人民为什么终于弄到无法相信日本关于所谓“真意”的保证和解释。

外相显得非常关切地问到，除冻结日本在美国的资产而外，美国政府是否还打算采取更多的报复措施，我答道，我的办公室还没有接到任何消息。

丰田将军告诉我，这几夜他简直根本睡不着觉。看来，由于事态变化，他确是很懊丧，一上台做外务大臣就碰到现在这种局势，他尤为苦恼。我详细回顾了我多年来为把日美关系置于健全持久的基础上而作过的努力，特别讲到米内内阁时期所作的努力，还由此提到野村将军最近在华盛顿为这个目的所做的工作。

我说，我不想在失败主义的气氛中结束这次谈话，说完便竭力敦促他，希望他尽最大努力防止美日关系进一步恶化——要是日本在太平洋地区再有任何侵略行动，美日关系就必然会进一步

---

① 1941年6月英国为了保障它在中东的殖民地的安全，占领了当时仍在法国维希政府统治下的叙利亚。——译者

恶化。

东京有好几个朋友都问我，丰田将军明知日本即将在法属印度支那有所行动，也预见到由此而产生的后果他不得不去应付，他为什么还是接受了外相的职务？据我个人看，和大多数日本官员一样，丰田将军也有那么一个明显的信念，即美国不会采取报复措施；因此，美国一冻结日本资产，反击日本进军印度支那，他们就感到突如其来。这样错误估计美国的政策，是由于日本驻美官员不能正确测量美国的舆论，还是由于他们的汇报不能在这方面说服日本政府，我不知道。不论哪次和日本政府打交道，我都曾竭尽全力，试图矫正这种错误估计。不过，日本对最近的事态发展感到突然和严重关切，我确信是真的，美国政府的行动已引起此间强烈的忿恨，我相信也是真的。

日美和好闪现一线希望

1941年7月27日

本星期日早晨，代理国务卿来了一封极重要的电报，报告了一个同样重要的建议①，建议是总统向野村将军提出来的，是为了安定整个远东局势，避免日美关系急剧恶化——恶化直接导源于日本在世界这个地区的侵略政策和行动。建议的内容属于绝密性质，所以我现在不想记录其细节，但这些细节确给日本提供了一条合理的出路，使它可以摆脱它所谓的困境和它所谓正在威胁它的安全的ABCD四强②对它的包围。

---

① 1941年7月24日，美国总统罗斯福接见日本大使野村，要求日军撤出印度支那，并提出建议：由美、英、中、荷四国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印度支那为中立区，如果日本政府同意这个建议，美国就让日本有可能自由取得它所需要的原料和粮食。——译者

② ABCD四强，指美、英、中、荷四国。ABCD是四国英文名字的头一个字母。——译者

看电报时，我额手称庆，幸而留在东京，没有去轻井泽，因为据我看，极重要的是，不仅应当立刻弄清楚丰田将军是否已经完全明白了这个建议的全部意旨，而且应当尽量发挥我的影响力，使它能够被接受。我在日记里说过，今夏我没有回国，是因为预计到有朝一日可以发挥我的影响力，我认为现在恰恰就是当时所想到的那种时刻了。因此我马上打电话到外相私邸，虽值星期日早晨也请 412 求约见。11 时半，在官邸见到了外相，我自己作主，自己负责，在长谈中尽力提出最强烈的呼吁，也可以说是作了我从未作过的最强硬的陈述。

我把这次行动告诉了国务院，并说，我是越权了，但经过深思，考虑到三点，我觉得我这样做是对的：(1)头等重要的是，应当让丰田将军完整地准确地了解总统的建议；(2)时间因素也很重要，时间不允许我预先请国务院授权；(3)我相信，总统一定希望我们想尽办法，确保他的建议能得到最大限度的重视，确保日本政府能充分认识到它的深远而开明的意旨，因为太平洋未来的和平，也许就系于是否接受此项建议。使我惊讶的是，这份三天前即 24 日就已送交野村将军的总统建议，丰田将军竟说他没有收到，他走开约五分钟，显然是去打电话问外务省，回来后又说确实没有收到。两天后我们从外务省美洲局长寺崎处获悉，野村将军同总统会谈那天，他只是给东京发了一封非常简短的电报，我和丰田谈过后，寺崎旋即通知野村，叫他立刻呈送一份详尽的报告来。

两天后，收到萨姆纳·威尔斯来讯，颇感欣慰，他说，在这个时刻，我的行动有极大的助益和价值，总统和他本人都表示赞同。我不能说，结果一定圆满，我极度乐观，但会谈时我确曾告诉丰田将军，他现在正得到了一个可以大显才略的良机，一条可以解决他上台时遇到的险恶局势的途径；其实我还说，他现正碰到一个机会，可以使他成为日本最大政治家之一而名垂青史。总统的这一步

骤，不论日本接受与否，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实已置美国于无懈可击的地位；此举总有一天会被全文载入史册。日本人假如不能利用这个机会，在历史上他们就将处于不值得羡慕的地位。30日我再电国务院，又就上述问题提了一些建议。

413 在最近与丰田将军的几次谈话中，我觉得意味深长是，真使他激动的唯有一件事：我说到我国有人认为，日本奉行目前这样的政策，应归咎于德国的压力；每次我一提起，他就断然否认德国现在还能对日本施加任何影响。顺便说一下，以前有个同僚告诉过我，松冈曾电询里宾特洛甫，据传德国即将进攻苏俄，此说有无根据？里宾特洛甫断然否认，而四十八小时后，德国就入侵苏俄了：松冈本人证实过这个故事。情况再次充分表明，日本人正越来越厌恶德国人，后者显然和往常一样，手段又要得太过火了。

日美距战争只有八码远

1941年7月31日

在印支危机当头的时候，我看日本人真是愚不可及，竟让他们的海军航空兵向停泊在重庆的美船"土土伊拉号"投了一颗炸弹，险些闯下大祸，我最担心就是这种事件，这话我曾对松冈讲过。托天之福，炸弹距"土土伊拉号"约有八码远而幸未击中，虽然船受了伤，另一颗炸弹又险些击中美国驻华使馆。只是由于奇迹降临，才逃脱了劫数。要说是事出偶然，我看是无法令人相信的：有三个美国官员曾从紧旁能俯瞰该船的山上目睹此事；天气合乎理想；轰炸机在近城一万五千英尺的高处离开编队，改变航向，直冲到"土土伊拉号"和大使馆的顶上。美国官员一致认为，这是蓄意轰炸使馆区和"土土伊拉号"，只差一秒的几分之一就击中目标。

我还来不及做什么，外务省代理次官山本就在11时来到了使

馆办公处，代表日本政府深致歉意。后来我被告知，外相本人打算2时到使馆来见我；后又改到2时半，最后通知，2时半外相正与首相会晤，丰田将军觉得最好还是我在2时45分去见他，我去了。我不知道外相为什么要改变计划。不过，他也道了歉，并要我相信事件纯出偶然，对此我公开提出异议。 414

后来野村将军机密地告诉萨姆纳·威尔斯，为免将来发生类似事件，日本人将停止空袭重庆，这次事件就此了结。[1]日本人又玩了一次火。

附带说一下，美国新闻记者将有关这次事件的报道发回美国时，曾遭到审查员的阻挠，电话电报均不许使用，当天我和一个日本高级官员商谈了几次，我提醒他："帕奈号"事件发生时，广田马上就来使馆办公处见我，而我也在五分钟之内就把广田此举通过美国记者电告美国，正是这样，才使美国的民忿平息下来。因此，现在就应当立刻让记者传送消息，以便把山本来访及迅即道歉一事报道出去：我认为此点极其重要。这位官员尽力去做工作，但又和审查员发生一连串误会，直到傍晚才把电讯打通，为时太迟，恐怕已经赶不上美国东部晨报的早刊了。有些记者乘线路开放时发走了消息，但五分钟后审查员又把线路关了，有个通讯员就没有能够发出电讯。不过这位日本官员还是很能干，电波虽已转到南美洲，但4时左右又拨回美国几分钟，让这个美国通讯员将报道发出。

关于日本某些内部弱点的内幕消息

1941年8月7日

有个日本人士最近和我的一个馆员谈话时，发表了一些十分

① 几天后仍继续空袭重庆。——作者

415 有趣的意见，此人我很熟悉，从他的地位和无可怀疑的诚实来看，可以肯定，他所说的事他是确实了解的。其要点如下：

日本驻美大使馆的人员非常差劲，野村将军虽然本人是个干才，手下却没有第一流的参谋。在东京，政府中许多年轻官员虽有强烈的反美情绪，近卫公爵却能起稳定作用，调整美日关系的唯一希望就寄托在他的身上。

近卫公爵知道我很想多和他谈谈，就象总统常和野村将军叙谈那样，但就怕泄漏和张扬，所以没有来请我。他还暗示，我馆呈送华盛顿的报告，当然都会被日本当局侦悉，虽然他知道我们确实有"一种密码"（很有意思，但是，使用他所说的这种密码，我觉得还是绝对保险的）。

有个住在柏林的、向我们通报消息的日本人最近来电话说，日本如果有人认为德国在苏俄的攻势并非即将取得全胜，那就是胡说。恰恰相反，攻势正完全按计划进行，这个在柏林的日本人觉得奇怪，为什么日本还迟迟不进攻苏俄。在东京接电话的这位先生只答道："你才是胡说哩。"

从美英的观点来看，要是松冈组阁，身兼首相和外相，那才是日本最危险的内阁。这个报信人证实了我们对最近内阁改组的解释，他说，这次内阁改组，德国人和日本驻德大使大岛将军都不高兴，自新阁成立以来，大岛几乎一封电报也没有来过。

此人相信，丰田将军觉得在这个时刻若和我再谈几次，可能会很有助益，希望能有机会和我加强联系。

416 从日本看罗、丘大西洋会议

1941年8月14日

今天听到，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大西洋某地举行历史性的会议，

发表美英关于战争与和平目标的八点宣言①，这条消息《日本时报和广告报》只用小标题登了一栏，而新近出版的德国战报则横跨三四栏。罗斯福政府的反对派当然会把宣言看作承担了各种各样的义务而使美国卷入欧洲事务，但是，我认为，不论将来发生什么情况，历史都将把这次会议及其结果视为威尔逊总统宣布“十四点”②以来最开明的措施之一。

这些年来，人性也许没有多大改变，但通过惨痛的经验，无论如何也学到了一点东西，我敢相信，现在罗斯福和丘吉尔宣布的这种深谋远虑的计划，人们决不会再容许政客们把它毁掉。实现这样一个计划，需要长时间，甚或很长时间，但是，在这个时刻把它宣布出来，我认为是个表现雄才大略的行动；轴心国一定又要回骂一阵，但不管它们怎么咆哮，这个行动总是占了它们的上风，并预先就破掉了希特勒想在适当时候表示的和平姿态。我很久都没有象今天这样高兴，和往常一样，我为我们国家及其当前的作为感到无比自豪。

丰田将军的和平建议

1941年8月18日

外相今天下午约见我，进行了我与外交当局谈话以来最长的一次谈话。谈了两小时半，译电室的职员译我的汇报到次晨5时35分才译完，我自己写汇报则一直写到午夜以后很久。

---

① 1941年8月，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大西洋的纽芬兰海面上举行会谈，以争取人心，对付德、意、日法西斯团。会谈结束时(8月14日)发表宣言，即《大西洋宪章》，宣称：反对与人民自由表达的愿望不相符合的领土变更，尊重各国人民的主权，摧毁纳粹暴政，解除侵略国武装。——译者

②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8年1月，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十四点”和平条件，要求“公开外交”、航海自由、废除经济障碍等等。——译者

就这次谈话来说，这天真是酷热难当。我记录他的话时，汗如雨下，所以一小时后丰田将军便命人进冷饮，打冷毛巾来揩汗。他作宽衣的姿势，以笑问的样子看我。我当然点头，于是两人都脱去上衣，卷起袖子，打起精神来接着谈。外相的英语还过得去，我说的他都听得懂，不需要翻译，但他总是叫外务省美洲局的稻垣坐在旁边，在谈话进入"正式"阶段后把他的话翻成英语。

417

今天的谈话太重要了，所以我把他的话全都记下来，约有十二大页之多，记完时手几乎都转筋了。他是通情达理之人，在我接触过的外长中我比较喜欢他。我们的私人关系很好。今天，在我们拿冷毛巾擦汗时，我说："将军，你曾经时常站在战舰的舰桥上，看见过持续几天的暴风雨，但自接掌外务省的桥楼以来，却遇到了一场冗长、持续不断的风暴，没有片刻宁息。你我都必须向那怒涛泼一点油[①]。"外相纵情大笑，我想他定会把这几句话拿到内阁会议去说，但他没有利用这个机会还我一句："好，可是如果美国停止向日本输出石油，我们怎么泼法呢？"

这次谈话开始于今天下午4时，丰田将军口述意见、从日语译成英语，我又把它记下来，共花了两小时半。为解决当前日美间的危局，他提出了一个极重要的建议。他还说，最要紧的是不要泄漏出去，尤其不要漏给德国人和意大利人，他希望，我向华盛顿汇报时，须提防别人看到我的电报。我说，电报将用密码发送，我希望并相信这套密码是破译不了的；至于我这里，惟有杜曼先生和我的机要秘书阿诺德女士——她要誊录这次谈话——将会知道这个建议。这样保证以后，外相似乎十分满意。……

外相开头说，这将是一次绝密的长谈，要谈的问题非常重要，希望我合作。他说，他将作为海军军官而非职业外交家和我坦率地谈。我答道，我自己也厌恶旧世界的那种外交，也是习惯于极坦

① "向风浪泼油"乃成语，平息风波之意。——译者

率地、直截了当地讲话。下面就是丰田将军讲话要点的意译：

（1）根据印支联防议定书而派日军进驻印度支那，乃是一个和平的和掩护性的步骤，目的在于解决中国事件。这是日本主动采取的、独立自主的步骤，德国或任何其他方面都没有施过压力。

（2）尽管已经请我同时还命野村将军传达过上述保证，美国还是认定这是在德国唆使下运用武力，并采取了经济措施（指美国冻结资产令）；此项措施已把两国带到了完全断绝经济关系的边缘，给美日和平关系的悠久历史留下了很大的黑点。

（3）外相说，日本人民与他有同样看法，公众舆论极为愤慨，但政府仍禁止贴标语、开大会、发表带敌意的报刊评论，尽量抑制人民的愤慨情绪。

（4）日本政府对总统7月24日建议的答复已直送华盛顿，赫尔国务卿8月6日回到华盛顿时野村大使已将答复交给了他。答复是经过仔细全面考虑后草拟的，总是希望尽量满足美国政府的愿望。

（5）日方答复中有约束两国政府的重要建议：中国事件一解决，日军即撤出印度支那；答复中有约束双方的三点建议。

（6）不过，总统的建议毕竟是专论印支联防措施的。因此日本的答复也相应地只限于谈这个问题，应当单独地对待日方的答复，不要同赫尔国务卿与野村将军已在讨论的两国关系的总调整牵扯在一起。

（7）8月8日，野村将军从赫尔国务卿处接到了美方对日方建议的答复，其中只是重复总统7月24日建议的内容，野村将军对此感到遗憾，总统的建议日方曾慎予考虑，美方却对这些考虑太不重视了。

（8）换言之，日本政府虽已明确证实其意图，一俟中国事件解决，日军就立即撤出印度支那，因为中国事件是远东和平的障碍，

但美方的建议，看来仍是要以日军撤出印度支那作为先决条件。

(9) 如果美国真想在远东实现和平，日本政府就希望它充分考虑日本政府的声明，与日本合作，解决作为远东和平障碍的中国事件。

(10) 正如大使所深知，本届和上届近卫内阁都曾最诚恳地希望调整日美关系，外相还坚信，罗斯福总统及赫尔国务卿无疑亦同样有此愿望。

(11) 丰田将军担心，两国和平关系破裂，不仅本身是件极惨痛的事；日本和美国，作为在当前世局下对维持世界和平举足轻重的最后两个国家，若不能运用政治家的才略，就会使很坏的世局更加不堪设想。这将会给人类历史留下最大的黑点，未来的历史家将无法了解破裂的性质。最后，我们作为政治家，假如容许这种情况发生，那就意味着我们未能对两国人民尽到责任。

(12) 外相认为，日本和美国都必须在当前危机中尽其作为世界救星的责任。因此，它们这两个隔着太平洋相望的大国，必须在平等的基础上、在镇静友好的气氛中考虑它们的问题。

(13) 外相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尽管有上述那些道理，由于两国间发生的误会，加上第三国的阴谋，目前的美日关系已变得十分紧张，若不设法改善事态，局势就可能极为危急。

(14) 外相认为，要克服这场危机，唯一的办法就只有使两国负责人当面会谈，彼此表明真意，着眼于挽救现局，寻求拯救人类和促进世界和平的方法和手段。

(15) 换言之，外相认为，在上述愿望的激励下，如果两国领导
420 人能在上述精神的激励之下，从大处着眼，为调整美日关系而开诚布公地倾谈，那将是非常适时的。因此，他深信，最为合适的是：近卫公爵前往檀香山，亲自同罗斯福总统会谈，假如总统同意的话。丰田已于8月7日将此意告知野村将军。他想叫野村将军在罗斯

福总统回到华盛顿时就亲自去见他。

(16) 据新闻报道，总统已于昨日返抵华盛顿。因事关重大，所以外相才同我讲这些话，他希望得到我的合作。

(17) 外相一想到我曾为增进美日友好关系竭诚尽力，持续九年之久，就坚信我定会给予合作。

(18) 不用说，首相出国，在日本是史无前例的。然而近卫公爵这个首相却下了很大决心，要去会见总统，尽管他明知道国内有好些人反对。近卫公爵的这个决定，无非是表现一种极强烈的愿望，要尽一切努力拯救世界文明，使其免遭毁灭，并维护太平洋的和平。外相坚信，总统亦必有同样的想法，定能同意日本政府的这个建议。

(19) 首相与总统会谈时，若双方领导人均表现出高度政治家风度，高瞻远瞩——日本并不拘泥于 8 月6 日野村将军送去的日方对总统 7 月 24 日建议的答复——坚信即有可能就日美关系的一般问题达成公平合理的协议。关于此事，外相希望我注意：千万不要在两国和国外引起误解或造成一种印象，以为日本政府与美国政府谈判是因为受到美国的压力。据此，外相认为，最好莫过于立即停止执行那些对日本施加经济压力的措施，或大大减轻其程度，日本政府自亦乐意酬以相应的行动。外相希望美国政府注意到这一点。

(20) 上述各点，就是这个极其重要、绝对机密的建议的内容，外相今天特别约见我也就是为了这个缘故。由于事情重大，性质微妙，万一泄漏，不堪设想，所以绝对需要保密，不言而喻。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迄今为止，他只命野村一人在美国讨论和办理此事，但为使建议得到实现，他又才十分坦率地向我交底，目的是要取得我的帮助与合作，假如建议中有什么问题，他还很乐意和我商讨。

在外相讲前几段话的时候，即还没有说到拟议中的檀香山会

谈的时候，我曾提到日本的逐步南进。我指出，尽管得过许多关于和平的保证，美国政府仍旧只能依据事实和日本的行动而不能依据言词。我还注意到，上次谈话时，外相曾说，日军之所以进驻印度支那，是因为日本有受到美英等国包围的危险，现在，他却单只把解决中国事件当作此事的动因。对于这些评语，外相默不作答。

我还对他重述了7月23日副国务卿向日本大使发表的声明，大意是，赫尔先生看不出现在还有什么把国务卿和野村将军在华盛顿的会谈继续下去的基础。我又说到8月8日赫尔先生对野村将军讲的话，大意是，在美国政府看来，8月6日日本大使交给国务院的建议，并没有响应总统7月24日提出的建议。

据传满洲发生中国人骚动

1941年8月20日

我们从可靠方面获悉，满洲骚动四起，严重的动乱正在中国人当中迅速蔓延。经济困难，为修筑边防工事而蛮横地征召所有行业的工人当兵，必不可少的煤矿工人亦不能幸免，意料终将与苏俄打仗，对日本人愈加憎恨：就是这一切激起了骚动。游击队越来越多，夺取农村的粮食和物资，对治安的影响已相当严重。如果同俄国打起来，预料这个运动还会具有革命的规模。连满洲国的军队也受到骚动的影响，正准备一有机会就举行兵变，这一切日本人也知道。

1941年8月22日

大连领事馆送来报告：近几周，来自各方面的情报都说有迹象表明，在满洲的日本人对东京政府的外交政策和经济政策日益不满。税负日增，管制日严，很多日本人都感到厌恶，不惜设法逃税和

规避各种禁令——要是在一年前，这种行为是要被视为不爱国的；当地的后备役军人也常常表示极不愿意被征入伍。政府的政策正在军事上财政上给国家套上艰巨的任务，人们极度悲观，认为这是担负不了的，据传，已经有几个人自杀了。毫无疑问，当地日本人的士气和爱国心在过去一年中显已低落下来，很多人，包括官吏在内，都对政府的现行政策有反感。

石油禁运和资产冻结对日本产生了影响

1941年8月29日

美洲局局长寺崎先生今天下午3时前打电话告诉我，外相虽曾订3时约见我，但鉴于事态又有发展，他担心这种会晤将会惹人注意。因此他改请寺崎先生代表他把外务省的信息送来。于是寺崎先生来到大使馆，代表外相把日本首相致总统函的文本交给我，供我参考，此信已由野村将军于8月28日在华盛顿递交。

寺崎先生的来访，是用来代替我去见外相，因为，日本首相致函总统一事日本报界已从华盛顿知道了，消息既已以这种形式传到了日本，政府也就不可能再对日本公众隐瞒此事。

寺崎先生代表外相说话，详述了华盛顿方面宣扬此事①后的恶劣影响。报道虽然没有透露首相致总统函的内容，但确已向日本公众、亲轴心国分子及极端分子透露了这么一点：在美国政府最近采取步步进逼的措施而使日本举国愤慨的时节，近卫公爵已主动采取了显属和解性的行动。美国的进逼措施包括先下令冻结日本在美国的资产，后来又宣布运油给苏联的美国油船已从加州各港启航，又决定给蒋介石派遣由马格鲁德将军率领的军事代表团。

① 是野村将军自己在走出白宫时向美国报界宣布说，他刚才向总统递交了一封日本首相的信。——作者

寺崎先生指出，泄露首相的信，结果只能是直接有利于日本的极端分子和亲轴心国分子。这不仅使今后很难再采取和解性的行动，而且还大大增加了谋刺近卫公爵的可能性。他还说，今天下午警视总监就曾暗示，首相的生命危险增大了。

寺崎先生向我传达了丰田将军的呼吁，要我请我国政府采取下列三个步骤。不这样做，近卫公爵促进美日谅解的努力，恐怕就会遇到严重障碍：

（1）美日两国政府负责首脑的会晤应当立即举行。倘若迟延，就会给反对与美国作任何和解尝试的分子提供机会，使他们能够组织党羽，向日本公众传播一种观点：近卫公爵正屈服于美国的压力，不顾公众均视美国措施实属挑衅的情况下，竟谋求与美国达成谅解，这是在丢日本的脸。

（2）美国政府应暂缓派油船赴苏联，至少也要等到拟议中的总统与日本首相会谈有了结果以后。寺崎先生说，外相认为，对油船问题，群情激昂，情况确是危险，决非夸大。关于油船的事，他还说，据日本当局得到的情报，有五艘开往海参崴的美国油船已经穿过了津轻海峡和宗谷海峡。

（3）在拟议中的两国政府首脑会谈期间，美国政府应暂停执行冻结日本在美资产的法令。

寺崎先生又代表外相向我着重指出，日本政府已与美国政府开诚相见，已向美国保证：中国事变一解决，现驻法属印度支那的日军就撤退；驻印支日军不再在该地区采取进一步行动；只要苏联信守中立条约的文字和精神，日本亦将遵守这个条约。他还说明，这些都是目前日本政府所能作的最大限度的保证和承诺。日本政府既已尽其所能，作了这些保证，外相认为美国政府方面亦应尽最大努力，做到上述三点，帮助首相贯彻其现行方针，这个方针，由于美国泄密，现正充满着极大的困难和危险。

寺崎先生说，外相是在向我呼吁，希望我向总统和国务卿充分说明首相的处境，恳求美国政府不要从法理而要从心理的观点来对待日方所提出的让步。

寺崎先生说完上述要点后，我首先把刚收到的国务院8月28日来电第一段的实质内容告诉他，阐明国务卿对日本政府就运油给苏联提出异议一事的看法。我趁机强调指出，国务卿在这个问题上所持的立场是符合逻辑的，有强大的说服力。为了使日本大使关于国务卿最近在华盛顿的会谈的报告的准确性不致被曲解，我还向寺崎先生口述了国务院通报这些会谈的电报的内容。 425

谈到相互冻结资产的现行规章时，我再次向寺崎先生强调：美国执行冻结法规时对待日本侨民是很宽大的，和日本对美国公民及美国利益那种苛酷的待遇比起来，大不相同。寺崎先生在答话中只是重申外相的要求：这类问题应当从在日本人心理上会产生什么影响来考虑，因为，在此两国关系紧张的时期，心理上的影响特别强烈。于是我又请寺崎先生注意，日本报刊的反美情绪正在高涨，对此寺崎先生答道，他可以极机密地告诉我，管宣传事务的内阁情报局的某些人员抱有明显的亲轴心国情绪，这个问题日本政府感到真是难以对付。

与寺崎先生讨论到上述外相提出的三点时，我没有让他抱什么幻想，无论是第二点还是第三点，里面那些荒谬的要求，美国政府决不可能同意。

与近卫公爵共餐

1941年9月6日

今晚首相邀我作为朋友到私邸进餐。在座的只有杜曼先生和首相的私人秘书牛场先生。谈话三小时，极坦率地陈述了两国的

基本观点。首相请求把他的话用个人信函转告总统，相信这些话可以发挥和阐明他命野村将军在华盛顿通过外交途径所提的

426 建议。

近卫公爵，因而也就是日本政府，确定地、全心全意地同意以国务院宣布的四项原则作为改善美日关系的基础。①

近卫公爵承认，两国关系弄到现在这样可悲的地步，他要负责，但他认为——虽然谦虚地觉得自己能力有限——只有他能够促成两国关系得到恢复，不负各方的期望。他若失败，以后的首相就没有哪个人——至少在他这一生中——能办得成这件事了。所以他才下了决心，顶住一切反对势力，一定要不遗余力地完成他现在的计划。

首相希望，丰田将军向我传达的、日本政府准备承担义务一事，已经为总统和他本人的会谈打下了一个合理的基础。不过首相也已看到，有几点恐怕还需要澄清并进一步作精确的阐明。他有信心，双方的意见分歧定能得到彼此均感满意的解决，特别是因为，日本海陆两军的首领都抱有善意，不仅赞成他的建议，而且还将列席拟议中的会谈。首相还讲明，他向美国提出的建议，陆海军两大臣都曾表示完全赞同。

从日本大使向首相所作的大使与美国总统及国务卿会谈的汇报来看，首相觉得，美国政府对日本现内阁的力量十分怀疑；它弄

427 不准，内阁若采用和平计划，是否能够挡得住反对派的攻击。近卫公爵告诉我，自从在华盛顿举行非正式会谈以来，他自始即得到陆海两军负责首脑的大力协助。就在今天，他刚和陆军大臣议妥，陆相已答应派一位大将随同首相去和总统会晤；海相也同意派一位

① (1) 尊重各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
(2) 拥护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
(3) 拥护机会均等、包括商业机会均等的原则；
(4) 太平洋的现状，除可能用和平手段改变外，不得搅乱。——作者

海军大将伴随首相。近卫公爵还机密地说，海军方面的代表，他料想很可能是前海军大臣吉田将军。另外还将有参谋次长、军令部次长及其他陆海军高级将校随行，这些人都是与他志同道合的。他承认，军部中是有人不赞成他的政策，但是他确信，既有陆海军负责首脑的充分支持，那些人即使兴风作浪，他也可以镇服他们。

近卫公爵反复强调：最重要的因素是时间。订出全面解决的一切细节，也许需要一年半载；由于日本国内对来自国外的经济压力的愤慨情绪正不断增长，一年半载后是否还能执行这类和解计划，他就不敢担保了。不过他确能保证，在目前这个时刻，他可以带领日本人民走向他所选择的目标，在拟订他可能承担的义务的细节时若是遇到困难，这些困难也可以满意地克服，因为他的政府已下定决心，不完成它现在所作的努力，决不罢休。

在讨论过程中，我概述了我国政府以往的惨痛教训：历届外相都曾信誓旦旦，向我许下诺言，日本政府却均未能实践。结果美国政府终于得出结论：不能信赖日本的诺言和保证，只能看行动和事实。这话首相没有试图反驳，他只是强调，他的政府现在希望实现美日关系的彻底重建，他向我保证，他将承担的义务，决不会象以 428 前我们得到的那些“不负责任的”保证那样，他不许诺则已，一许诺，就必定履行。首相说完这一点后，我明白了，他的意思是，有志就能找到办法。

近卫公爵说，假使总统有什么机密建议，想向他个人传达，他很愿意另作安排，和我秘密会晤，但他仍表示，拟议中的和总统的会晤，切望能尽早安排，考虑到日本国内的现状，应该是越快越好。近卫公爵相信，一切问题和悬案，定能在与总统的会谈中得到彼此满意的解决，并以这样的话结束今天的会谈：他决心圆满完成重建日美关系的计划，不计代价，个人安危亦置之度外。

大使馆参事与近卫的私人秘书的谈话

1941年9月18日

我馆参事尤金·杜曼与日本首相近卫公爵的私人秘书牛场友彦谈过一次话，下面是他今天送来的汇报：

牛场先生昨天下午打电话到我家里，问我可否让他立刻来访，我对他说，我因感冒，已卧病在床，但假如他不怕传染，我也愿意见他一会儿。5时许，牛场先生来了，到将近7时才走。

牛场先生问，大使关于最近与首相会谈的汇报，已否得到华盛顿的批示。我答道，国务卿已来电，对近卫公爵的态度和见解，表示赞赏，可是野村将军9月4日向国务院提交的一份文件却把事情搅乱了，所以大使觉得，他没有足够材料可以据以要求再次会见首相。

牛场先生说，野村将军的行动，格鲁先生已告诉丰田将军，内阁听到以后，深感不安。他说，野村将军是收到过近卫公爵的一份草案，那是回答美国6月21日草案的，但因当时日本发生内阁危机，野村将军就没有把文件送去。他另外写了一封短信给国务卿，这封信毫无补益。牛场先生推断，野村9月4日送去的文件并不是得自东京的那份草案，因为，日本政府的基本观念之一一直是想靠总统斡旋，在日本和中国之间打开一条通道，而野村将军9月4日的文件却显然没有提到总统的斡旋。

我便向牛场先生解释道，华盛顿之所以难以准确了解日本政府的立场(例如9月4日的文件)，原因不止一个。我希望我们正在解开缠到一起的乱绳，不过为弄清问题又浪费了

429

一周多，这却不是我们的过错。

牛场先生以惊人的坦率说道，他决没有责怪美国政府的意思，在决定美日两国政府首脑会晤这样重大的行动前，当然先要准确了解日方的目的和意图。说到底，问题的症结是中国。他认为，日本政府早已很清楚地表示，它愿意维持中国“门户开放”的原则，但是，为解决中日冲突它将向中国提什么条件，迄今为止它却没有明确提示过。华盛顿会谈已经拖了几个月，国务卿也已一再明示，在预先知道日本的议和条件之前，他不打算让美国政府在任何决定中承担义务，而且条件要符合他为调整两国关系而提出的那些原则，他才满意。

牛场先生建议，美国政府应要求日本政府透露议和条件，因为他可以向我保证，任何这样的要求，日本政府都会立即答复。我说，他的意见我听不懂：正如牛场先生自己讲的，美国早已表示过，希望知道日本议和条件的性质；在我方6月21日草案的第三节中，我们曾插进一个短语，目的就是想暗示：430 日本政府本来应该先将议和条件通知美国政府，这样总统才好去和中国政府交涉。因此我断定，我方之所以终未得到通知，是因为日本政府不肯向我们透露议和条件。

牛场先生说，目前这种情况是怎么来的，他不十分清楚，但他可以向我保证，日本政府非常乐意把议和条件告知总统，并由总统转告中国政府和其他有关的各国政府。讨论一下之后，两人认为，最好是日本方面采取主动，将议和条件通知美国。牛场先生将向近卫公爵建议，由近卫把条件告知格鲁先生，以进一步证明日本政府抱有诚意，有与美国政府开正式谈判的热忱。我们还同意，如果近卫公爵觉得主动还是应该来自美方，那就由格鲁先生——假如他认为他能够这样做的话——向近卫公爵表示，希望知道日方议和条件的性质。

后来我们又讨论到美日两方对欧战的态度。牛场先生说，日本不可能预先就向美国承诺：美国对德国采取任何可能导致美德战争的行动，日本都将视之为防御行动。他认为，丰田将军送给格鲁先生的那个方案可以大致表明，在拟议中的两国首脑会晤之前，日本政府能够承诺到什么限度。不过他又说，日本各派势力已经达成谅解，这将使近卫公爵能够直接向总统就日本的态度作口头保证，他相信，此项保证定能完全符合总统的要求。

这方面还有一个问题使他非常担心，那就是，与美国就此点达成协议之后，日本政府又将如何向德国解释。我说，素来拥护条约神圣不可侵犯原则的美国，决不会要求日本背叛它的条约义务。不过依我看，同盟条约及其权利义务，和各盟国制定自己的政策，其间仍有判然的区别。当然也就可以说，盟国固应奉行为共同目标服务的政策，但是三国盟约决不会产生一种义务，一定要日本奉行单只为德国目的服务的政策。日本可以通知德国，日本虽准备履行盟约第三条规定的义务，但它已作了保证，要实行与美国政策相符的政策，这难道不可以吗？从法律意义来讲，三国同盟乃是一个防御同盟；签约时天皇颁布的敕令表示得很清楚，日本政府当时是把盟约看作一个和平工具。松冈先生从莫斯科回来时曾告诉驻东京的某国大使，如果德美之间发生战争，日本将就事前的情况与其盟国磋商，他确信，日本是否站在德国方面参战，几乎在一切情况下都将由日本政府自己决定。

431

牛场先生表示惊讶。他说，松冈先生解释过盟约第三条，且与近卫公爵的解释全然相反，这个他知道，但是他不知道松冈先生还向外国政府的代表者透露过他自己的解释。顺便提一下，他还说，松冈先生告诉过首相，格鲁先生曾向华盛顿报

告，上次内阁改组是由于美国对日本施压力。我告诉牛场先生，我们从来没有那样报告过。我说，我可以私下对他讲，我们的报告是说内阁改组主要是由于两个原因：第一，德国进攻苏俄，推翻了日本签订三国盟约时以为德俄将保持和睦的估计；第二，关于三国同盟的适用范围和含义，首相和松冈先生两者的解释有矛盾。牛场先生说，我们完全正确。

谈话最后部分的主要内容是，牛场先生强调，对日本的建议，美国政府应尽快给予善意的答复，他认为这点非常要紧。牛场先生反复提到三国盟约签订一周年的日子即9月27日即将到来。

日本提出了与中国媾和的条件

432

1941年9月22日

今天下午应邀往访丰田外相。他用日文读了一份文件，随后译成英文，又发表口头声明，大意如下：

（1）关于总统与近卫公爵会晤的建议，已包含在首相致总统的函件之中。

（2）日本政府的意图是，计划中的会晤将讨论两国间需要达成协议的问题，然后通过正常的外交途径订出细节，以执行会上达成的谅解。可是美国政府却另持一种意见，要等初步非正式会谈中出现的问题谈妥以后，才举行首脑会议。

（3）外相解释道，他已在9月4日向我作的声明中回答了美国政府所提的全部问题，9月4日声明是扩大而不是缩小了日本政府愿意谈判的范围。

（4）随后外相便把日本拟订的与中国议和的基本条件交给了我，由我转交国务卿。外相着重说明，这些条件，不应视之为新建

议，它们是同9月4日声明联在一起的，应视之为声明的补充，当时他曾确认，日本政府仍希望总统从中斡旋，结束日中冲突。

(5) 丰田将军告诉我，由于总统与日本首相会晤之议在国外传开了，由于国外电台报道和提到了正在进行的日美会谈，一个月来，日本国内已发生巨大变化。幸亏日本政府尽力，日本公众和报刊大都还不知道上述发展情况，但有些集团却听到了国外的宣传，433 反对日美谅解的分子已在加紧活动。

(6) 9月27日日本参加轴心国一周年即将到来，日本政府将设法防止发生事变或特殊事件，将只允许私人团体进行庆祝活动。不过，27日以后美国还是迟迟不表态，那些反对日美谅解和得知日美会谈的分子可能就会乘机煽动舆论，因而使会谈很难继续。

(7) 丰田将军指出，日本政府迄今仍在等待美国回答他在9月4日声明中提出的各个要点。他自信，在那个声明里，日本政府已经向美国政府毫无隐讳地展示它的目的和期望。

当外相问我华盛顿有无新消息寄来时，我便把国务院9月20日来电的内容讲给他听，电文是我来见外相前刚译出来的。丰田将军特别留意国务卿向日本大使讲的一句话：美国政府与日本政府所见全同，也是希望赶紧办事。外相认为，美国政府还想就所议之事同别国政府商量一下，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这样一来就不免耽误时间，因而也就可能会产生极坏的结果。

谈到日本驻美大使对9月27日这个日本参加轴心国一周年的日子不大关切时，丰田将军表示意见道，野村将军对日本国内的情势相当隔膜，所以觉察不到这个日子的危险性，我对外相说，他竟没有把他自己对此事的担忧告知驻美大使，我感到惊异。

谈到日中议和条件时，我告诉外相，在美国政府有机会审议这434 些条件以前，我不想作什么评论，但为清楚起见，我仍想知道第三点中所谓"现存协定和惯例"的确切含义。外相答道，这些词语必

须按本意来了解；不过他由此还提到美国在中国驻有海军陆战队，只作为一个实例，用以说明这几个字眼。

我答应立即向国务卿转达上述声明，他交给我的日中议和条件亦一并转达。但我又讲明，从日美两国政府间来往的函电来看，要在9月27日以前就对如此重大的问题作出决定，我不能表示乐观。

1941年9月22日日本外务大臣提交美国大使的日中议和基本条件的本文

(1) 睦邻友好。

(2) 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

(3) 日中联防。

日中联防，是为了防制共产主义活动和其他颠覆活动，这些活动可能会对两国安全及维持中国社会秩序构成威胁。

为了上述目的，根据现存协定和惯例，在必要期间，日本得在中国领土内的某些地区驻扎陆海军。

(4) 撤回日军。

除第(3)点规定的驻军外，为应付中国事变派赴中国的日军，一俟事变解决，即撤出中国。

(5) 经济合作

1. 日中间应实行经济合作，以开发和利用中国国防所必需的资源为主要目的。

2. 上条之意，并非限制第三国在中国的经济活动，这些活动惟须在公平的基础上进行。

(6) 蒋介石政权与汪精卫政府合并。

(7) 不兼并领土。

(8) 不索赔款。

(9) 承认满洲国。

日本重述罗斯福与近卫会谈的条件

1941年9月25日

寺崎先生今天下午自己要求来访，向我传达了一篇口头声明，基本内容如下：

丰田将军不止一次地、详细地告诉过我，日本政府目前的态度，就是时刻等候着美国政府答复日本政府提出的美国总统与日本首相会晤的建议。因时间紧迫，丰田将军又不在外务省，美洲局长遂主动来见我，目的有二。第一，他想问问，关于上述建议，我国政府有无信息下达；第二，他有个文件要交给我。

文件乃是日本政府对美国政府6月21日草案内容和议事准则的答复，同时也是给9月4日外相交给我的建议作个说明。里面没有什么新建议。它不过是把外相9月4日建议和另外几次说明中阐述的日方立场集中在一个文件里，以便于作参考之用。这个文件不应视作条约一般的正式文件；其文本是"完全灵活的"。所以美国政府要怎么修改都可以，但要改变文件的实质，日本政府就不会欣然同意了。

驻日大使呈送国务卿的报告

（摘　要）

（国务院所记的原稿的大意）

1941年9月29日

讲到在华盛顿和东京举行的预备性会谈时，大使指出，复阅一

下今春以来关于此事的来往电讯，就可以看出，为安排近卫公爵与罗斯福总统会晤，日本政府的劲头是越来越大，最近更是加紧努力，务求不再耽延。大使承认，在会谈中，他主要是起一个传信人的作用，但他自然还是希望作一点建设性的贡献，尤其是想尽量正确估计日方对会谈有直接间接影响的那些因素和情况，供总统和国务卿参考，并设法促使日本政府采取美国政府视为达成两国谅解或协议所必需的措施和政策。自1940年7月米内内阁倒台，日本的对美外交曾一度晦暗失色。可是今年7月近卫—丰田内阁成立后，对美外交又获得了新生，十分活跃起来。因此大使切望，虽然新基础还不够稳固，不足以使人坚信在此基础上逐步树立起来的建筑物定能持久，但还是不要错过这么一个有利的时期。

大使记得他以前说过的话：在日本，钟摆总是在稳健政策和极端政策之间摆来摆去；在现存情形下，任何领导人或领导集团要改变扩张计划，就休想能够存活下去；只有设下不可逾越的障碍，才能阻止日本人永久盘据中国和向南推进。大使还记得他有这样的看法：采取积极措施，维护美国未来的安全，固然要冒风险，但不那样做，危险就可能更大得多；只是因为考虑到美国的潜力，日本才不敢更放肆地侵犯美国的利益；只有显示武力和表明决心在必要时使用武力，才能制止日本执行其暴力扩张计划。大使还记得他说过，美国这样行事，如果终能使日本领导层丧失威信，日本最后就可能发生一场思想更新，日美关系也就可以恢复正常，整个太平洋问题亦将随之得到重新调整。

大使指出，美国已在非常英明地实行前面设想的政策，这种政策，加上世界局势的发展，已对使日本领导层丧失威信起了作用，松冈外相下台，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关于世界局势的发展，大使举了两件事，一是日本缔结三国盟约，一是日本承认南京汪精卫政权，这两件事都是发生在德国进攻苏联以前。德国一进攻苏联，便

打乱了三国盟约的基础，日本加入德意轴心，原是为了防住苏联，获得这一面的安全，以免有遭苏美来击的危险。目下日本正欲摆脱极端危险的处境，以矫正原先的失算。大使记得他向国务院报告过，大意是，由于国外事变的冲击，日本的外交政策必然要改变，由于世界局势转向，到一定时候日本的稳健派可能会占上风。他认为这样的时候已经到来。据他看，如果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宣言所预示的那种重建世界的纲领能够实行，现在倒是个机会，可以争取日本同走这条路。美国的政策——多年来总是克制、耐心辩论、努力说服，又加上明示决心，必要时采取积极措施——已使日本的政治土壤适宜于播上新的种子，大使认为，假如细心栽培，新种就可能结出成果，实现预期的日本思想更新和日美关系的彻底调整。

某些方面曾提出一种看法——美国政府无疑也注意到了——438 在这个时候搞日美协议，只会给日本提供一个喘息的机会。在此喘息期间，日本将先借美国的帮助，从日中冲突中解脱出来，然后恢复和加强力量，下次一有机会，又继续执行其扩张计划。这种看法不是一定驳得倒的。这派人又认为，由于日本国内经济恶化，由于美、英、荷逐步加大经济压力而使日本的财政、经济、社会俱有崩溃的危险，日本也将会被迫放弃扩张计划。大使则进一步说，假如这个论点可以视为相当正确，那么，美国为达其目的，就只能在两种方法当中选一个：一是日益拉紧经济制裁的绞索，一是谋求建设性的和解——这又不是所谓绥靖政策。

大使认为，自华盛顿预备性会谈开始、罗斯福总统原则上接受日本首相关于两国政府首脑会晤的建议以来，美国政府选用的正是第二种方法。大使说，的确，美国始终没有背离过与日本谈判一切问题的意愿，尽管那时日本已经在从事武力扩张。他觉得，从远大的政略来看，美国这样选择，其明智看来是无可挑剔的。即使积

极和解的方法现在或以后遭到失败，也随时可以改用另一种方法，即逐步加紧经济制裁。依大使的意见，美日关系的发展趋向不论是好是坏，今后美国显然必须长期保持备战状态。英国在世界大战中终必获胜，那时许多问题将会自动解决；同时想到这一点，就有理由感到莫大鼓舞。

大使承认，无论实行什么对日方针，都必然会有风险，但他经过仔细研究，仍然相信，如果拟议中的两国政府首脑会谈能沿着预备会谈的路线最后达成协议，就将大有希望，起码可以防止远东局势恶化，也许还可以确保今后取得积极的成果。大使提到他以前表示过的意见：关于美日关系，主要的争论之点并非美国是否必须制止日本的扩张计划，而是什么时候制止的问题。他提出这样的问题：现在美国是正逢良机，可以不经一战便制止日本的扩张计划，还是即刻就得冒战争的危险？不利用现在的机会，美国是否将会遇到更大得多的战争危险？大使坚信，对这两个问题，回答应该是肯定的。

某些方面认为，在目前情况下，无论美国在太平洋采取什么行动，日本都不大可能故意采取将会导致日美战争的对抗行动。大使说，日本和美国都会有人采取易于激怒对方舆论的行动，致使战争不可避免，若谓继这些行动——不论是胡来的还是经过考虑的——之后不一定会发生战争，他不能同意。在这点上他想起了"缅因号"事件和"帕奈号"事件。

大使强调了了解日本人心理的重要性，日本人的心理根本不同于任何西方国家人民的心理。对任何特定情况，都无法估计日本人会作什么反应，也不能用西方的任何计算尺来预测日本人的行动。就不久前还是属于封建主义的这样一个国家来说，并没有什么奇怪。大使觉得，他的主要职责就是要尽量正确解释日本人的心理，他说，在过去的岁月里，在他呈送国务院的许多报告中，他

439

都是力求这样做的。大使总是抱着这个想法，所以不怕赘言，特提出以下需要考虑的各点。

在现在的预备会谈中，如果美国希望或期待日本政府同意明确承担义务，而这些义务又在原则上和具体细节上都能满足美国政府，那就几乎可以肯定，会谈必将无限期地、无结果地拖下去，直至希望与美国恢复亲善的近卫内阁及其支持者终于断定，协议已属无望，美国不过是在争取时间。在这种情况下，加上日本那种异 440 常的敏感，那种丢了面子就不得了的变态心理，不难想象，日本的反应必将是严重的。结果将是近卫内阁丧失威信，反美情绪突然升高，这又很可能会引起激烈行动。这些行动最后会造成多大损失，无法估计，其性质则很可能会激怒美国人，同时，报复措施和反报复措施又将会造成一种使战争难以避免的局面。逻辑上必然的后果将是近卫内阁倒台，建立军事独裁，其倾向和气质都不是要避免与美国发生正面冲突。问题在于，这种情况，甚至比罗斯福总统与近卫公爵的会谈——如果按计划举行的话——不能达成十分满意的协议更严重。换言之，问题仍旧是，真诚谈判而不能获得完满的成功，比之美国显得不愿进行这种谈判，其严重性是不是总要小一些。

大使继续说，他曾无数次强调——他认为这些宣言必须按其表面价值来理解——在罗斯福与近卫会晤和正式谈判以前，日本政府不可能把它将作的保证和将承担的义务讲得比已经表述过的更具体。大使解释道，日本之所以持这种立场，据他私下得知，原因之一是，前外相松冈在7月间辞职以后，曾向德国驻日大使详述过华盛顿会谈到那时为止的全过程。由于松冈的支持者有许多仍留在东京外务省，恐怕任何消息这些人都会毫无顾忌地泄露给德国人和国内极端分子，这就会使现内阁的地位维持不住。

某些基本原则日本政府虽已暂时接受，但在预备会谈中前此

提出的关于日本未来目的和政策的定义和公式，以及对这些定义的补充说明，却很抽象、很含糊、可以作广泛解释，以致不仅不能阐明日本政府准备承担的义务，而且反倒造成混乱。大使同时又说，441 他已被告知，近卫公爵既与罗斯福总统直接谈判，就能够向总统提出保证，由于会谈具有深远影响的性质，这些保证不会满足不了美国。此言确否，大使不能肯定，不过他指出，特就日本与轴心国的关系而论，日本政府虽始终不肯保证它将公开抛弃三国同盟成员国的身份，但它既表示愿与美国进行正式谈判，实际上也就是表示愿意把日本的同盟关系化为一纸空文了。因此大使认为，近卫公爵直接向罗斯福总统提出保证，比预备会谈过程中答应的较为明确和令人满意，并非不可能。

基于上述他完全有理由认为正确的观察，大使认为，在预备会谈中坚持或继续坚持要日本作出只见于最后正式协定或条约的那种明确而具体的许诺，美国的目的是达不到的。大使认为，美国应对近卫公爵及其支持者公开表示的诚意和善意给予适当的信任，相信他们能按他们准备接受的基本原则制定日本将来的政策，能随即采取措施，逐渐地但却是忠诚地履行这些原则，不用说，美国亦将同时采取相应的措施以履行其义务；只有这样，日本才能够实现转变方向，改弦易辙，从而全面改善日美关系，一场终将爆发的太平洋战争也才有可以避免的希望。要打垮日本军事机构和陆军的威风，唯一的办法是使他们在军事上一败涂地，大使看不出现在有这种可能。另外就只有一个可取的办法（在大使看来也是唯一明智的办法），那就是按美国现在努力的方向，通过积极的和解，促使日本发生一场思想和观点的更新。大使问道，在美国的努力的势头尚未消失、因此尚能克服大使断定必然会不断加强的日本国内反对势力以前，是否应该把大部分智慧和谋略用于贯彻这种努力，使其获得成果？

442 呈报上述意见时，大使十分尊重罗斯福总统和赫尔国务卿的高瞻远瞩，深知自己是在驻日大使馆视界的局限下提出自己对问题的看法的。

日美最后会谈的背景

1941年9月30日

到9月底，若要再为美日间自初春以来即已进行的所谓预备会谈严守秘密，那就有点象鸵鸟了，因为，这事现已传遍全世界，近卫公爵关于"在太平洋某地"、其实是在美国领土上与总统会晤的建议，在日本军政界，也是众所周知。这类事是不可能保密的，至少在日本是这样，因为听到消息的人太多了。但我们自己却绝对保密；国务院关于此事的来电只有杜曼和我本人能启阅，我的回电亦标明只交国务卿。

据我揣想，野村将军处理他那一头的事务却不怎么内行，执行训令，他曾多次耽延，而且至少有一次看来还对工作起过阻碍作用——那次他竟自行提出一个新的协议草案，被华盛顿视为是在促退而不是促进谈判，到得知此件并非东京所拟、东京并不知情、应予撤销时，几个星期已经浪费掉了。据丰田将军说，由于语言有困难，他想把会谈移到东京，不过，国务院虽同意可以在东京举行平行的会谈，但考虑到总统直接关心此事，仍非常希望主要会谈依旧在华盛顿进行。因此现在会谈就多是在华盛顿和东京两地重复着，彼此电告情况，这样，至少可以保证核对传报是否正确和完备。在华盛顿，总统和赫尔先生，有时是韦尔斯、霍恩贝克、汉密尔顿或巴兰廷，同野村将军或其助手若杉会谈，在东京，则由杜曼和我同443 近卫公爵或丰田将军或寺崎会谈。

若把这些会谈的背景分解为一些简单的事实，这背景也颇为

简单：日本人发现，松冈（当然是在近卫公爵和大多数军人的支持下）引他们加入三国同盟，是下错了赌注；果不出我所料，纳粹分子在日本趾高气扬，结果适得其反；美英因日本进军印支南部而分别实行经济制裁后，日本政府终于开始看到凶兆，不仅认识到，与德意结盟，无论德国胜败，日本都将一无所获，而且感到，英荷美经济压力之重，决非日本的经济体制所能承受。

早在这些事情发生以前，会谈实际上已开始了。一批有影响的日本人士曾劝说当时的大多数阁员，与美国恢复和好，非常合乎需要，松冈本人长期坚决反对此举，最后还是被劝说不再激烈反对了，尽管他仍旧对我说，根据他自己对三国盟约第三条的理解，美国若与德国开战，也就肯定会有一场美日战争。但后来，与松冈在柏林得到的所有保证相反，德国竟进攻苏俄，由于估计极端错误，松冈被赶出了内阁，以丰田将军为外相的新阁不久便加紧活动，争取与美国谅解。

把国家引到了现在这种境地，近卫公爵要负重责，但既有松冈当了替罪羊，首相也就继续留任，并且显然不是不愿支持和推动方针的转变。日本正在迅速滑向与美英交战；我们还知道，天皇很久以前就告诉过他的大臣们，不管实行什么政策，都决不要使日本陷入与这两国中任何一国的战争。我看毫无疑问，天皇对三国盟约并没有好感，其所以允予批准，不过是因为松冈诈称日本即将在经济上被民主国家扼杀，德国必将战胜英国，同时也是因为政府宣传机构精心培植起来的支持极权主义国家的公众舆论，尤其是军部的意见，当时占压倒的优势。 444

不管怎样，反正新阁成立后，近卫公爵和丰田将军便开始全力以赴，争取迅速与美国达成协议，声称愿意满足美国的一切要求，要把预备会谈推到高峰，由首相亲自出马，与总统在美国领土上举行正式谈判。就我所知，首次暗示要举行这样的会晤，是日方在4

月送来的早期草案中提出来的，后来又提出，预备会谈达成谅解后，美日双方的代表便尽快在檀香山开会，由罗斯福总统和近卫公爵揭幕。① 不过，作为日本政府的明确建议，这个计划是由外相在8月18日两小时半的长谈中向我传达的，据我们的记录，此件且又于8月23日由野村将军提交总统。一个日本首相，在这个崇尚惯例和传统的国家，竟如此打破惯例和传统，并且可以说是卑躬屈节，甘愿到美国地界去拜会美国总统，这也就是一个标志，表明日本政府已下了决心，要消除给我国造成的巨大损害，这种损害已经得罪并逐渐激怒了一个强国。

正是现在，9月底，尽管日本政府声称自信已经全面满足了我国的要求，会谈却几乎毫无显著的进展，预期的目标还是一点也望不见。其所以如此，只因日本人有一种心理，致使日本政府不能让自己把自称准备承担的义务用简洁明确的语言表示出来。他们提出方案，其措词总是给争论之点留下可以作最广泛解释的余地，不是澄清问题而是把人弄得更胡涂，然后要我们接受这些方案，不全盘接受，即表示惊异，并着手安排，要两国政府首脑立即会晤。近卫公爵乘坐的军舰已准备就绪，等着送他去檀香山或阿拉斯加② 或总统指定的任何其他地方，随行的高级文武官员也挑好了，一心只待出发。

在此期间，我竭尽全力向我国政府描述日本国内形势的实况。9月29日发的电报即长达十五页，可算我发过的电报中最长的一封。目的就是要对日本国内有关当前会谈的情势作一个清楚的、我自信是准确的陈述，但也讲明，我只是从本使馆的角度看问题，

---

① 此项建议是在未经日本政府确认的纯非正式文件中提出的。——作者

② 战争爆发后，美国流行一种传说，谓拟议中的罗斯福总统与近卫公爵的会晤将在日本军舰上举行，日本人的意图是要绑架总统。这种揣测当然是没有根据的。近卫公爵是建议在美国国土上会晤——在檀香山或阿拉斯加，或在总统提出的别的什么地方。——作者

我呈上的意见完全服从总统和赫尔先生远为广阔的视野。他们得考虑似在日益倾向于赞成对日本采取更强硬措施的美国舆论，当然又还得考虑整个世界形势，远东虽与全局紧密相连，但毕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刚才有机会重读了几封我以前写的函电，我曾在里面指出，那时，和解的时机已经过去，主张对日本实行强硬政策。我现在仍然相信我当时写的每一句话，后来我还说过，日本政府现在致力于改变方针，包含与美国和解，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我国政府极明智地完全执行我所主张的政策。当时我提的意见，结语是这样的："如果由于如此行动我们能促使日本领导人终于丧失威信，日本最后就可能发生一场思想更新，因而也就可以使日美关系恢复正常，使整个太平洋问题得到重新调整。"松冈的失势和倒台，主要是由于在德国进攻苏俄的问题上估计错误，但间接促使他垮台的，正是美国的强硬政策——日本每采取一个侵略步骤，就用我们自己的一个步骤来对付它。我认为，促使日本思想更新、恢复日美正常关系、解决整个太平洋问题的良机，现在有了。要做到这一切，颇不容易——在很大程度上要看日本是否感到我国的经济措施真会使它在经济上陷入绝境——但也决不是不可能，假如我们继续施展妙腕的话。 446

我现在的这些主张，并不是绥靖政策，而是"建设性的和解"。"建设性"一词很重要。它有建筑之意，要建一幢永久性的建筑物，谁也不会那样傻，竟想把它建在不牢固的地基上。与日本进行探索性的会谈，目的就是找到一块牢固的地基，铺这样的地基，就决不能在美国政策所依据的基本原则上妥协。其次，正是由于我们实行了我所主张的强硬政策，所以才造成了有可能实现建设性和解的形势。

在对付这些困难而又非常复杂的问题时，不要忘记，外交实乃

国防第一线，我们的海军只不过是第二线，我们的陆军则可以说是第三线。如果作为第一线的外交奏凯，其他两线就不需要动用了，而作为前线后备军的其他两线一出现，又可以大大增强第一线。作为第一线的外交，必须负起责任，做到无需动用这两个后备军，我正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待我在日本这里的职责。最后结果如何，我不知道；也没有哪个知道；但在我的人生观里，没有失败主义。

日本对和平的希望仍在增高

1941年10月1日

有个地位很高的日本朋友把我拉到一边对我说，他从黑龙会中的密友处获悉，首相拟赴美国地界会见合众国总统一事，东京政界现在都知道了。人们考虑到经济形势，俱认为与美国达成一项解决办法，实属绝对必要，所以一般都赞成这个建议，连军部亦有447 人赞同。各重要政治团体的代表均见过首相，并已向他保证，他争取与美国达成协议的努力，将得到日本全国的支持。这些团体虽显然认为日本政府早已满足了美国的要求，但仍进一步断言，如果首脑会议开成，很难设想近卫公爵会让自己完不成使命，失败而归，因此美国的条件首相必然会接受。上述团体很重视下列事实：警察现正严密监视日本境内的德国人；三国条约签订一周年纪念日，首相故意离开东京；周年庆祝活动的规格降至最低级。

只有近卫公爵能拯救和平

1941年10月3日

另外一个日本人告诉我，当前的日美会谈若不迅速获得成果，肯定就会遭到日本极端分子及亲轴心分子日益加剧的反抗的破

坏，那时，近卫内阁很可能倒台，除了近卫公爵，就没有哪个日本政治家能够做到与美国达成谅解了。我恭听着，然后对他讲，通过外相，我和日本政府经常有接触，他考虑到的那类情况，外相当然随时在告诉我，我当然也经常把日本的实况和我对情况的估计呈报给我国政府。

沈阳的白俄动员起来为日本效命

1941年10月6日

10月3日，沈阳的白俄都被警察叫去开大会，会上他们被告知，凡属白俄居民，不论男女，年满十八岁至三十五岁者，均须立即领取一定式样的制服，很快就要受体育训练，须随时听候下达任务，什么任务，以后再说。会上还有个日军特务机关的军官向他们训话，对他们说，六十天内满洲将处于紧急状态，他们必须静候为国效忠。驻沈阳的美国领事说，他将尽力在几天内送点评论来，说明这个异常的行动。

杜曼再晤牛场

1941年10月7日

今天我馆参事尤金·杜曼再度会见近卫公爵的私人秘书牛场友彦，杜曼关于此事的报告照录如下：

牛场先生昨天来电话求见，我提议请他今晨来我家和我共进早餐。牛场先生按约定时间准时来到。由于进餐时有仆人在场，谈话需要记录下来的不多，实质内容如下：

牛场先生说，由于日美预备会谈毫无进展，首相处境困难。近卫公爵不知道下一步该怎办，反对派现已有了一些具

体材料，可以用来攻击内阁，前景相当暗淡。他说，除非我们充分理解首相是在什么情况下负责提议会谈的，否则就不会懂得局势的全部含义。陆军很想结束日中冲突，但决不肯负责倡议了结这场冲突。当近卫公爵负起责任时，陆军便给他充分的、无条件的支持，他的崇高希望倘若不能实现，他就得"负责"，以后谁也不会有他那样敢冒风险的勇气了，也不会有他那样的声望和政治地位，足以在通过谈判解决日中冲突这样的国家重大事务中得到陆军的支持。

牛场先生继续说，美国政府方面一张牌也不肯摊出来，这就加深了日本政府中人的悲观情绪。不错，美国政府对其原则，已作了充分的说明，但它要日本政府承担什么，却没有明确开列过。会谈开始已经几个月了，美国政府显然仍是步步留神，不让日本人知道任何细目，真是令人失望极了。自收到美国上次的备忘录(10月2日)以来，日本政府中有更多的人认为，日本已堕入陷阱，论点大致如下：美国本无与日本达成协议之意；现已使日本暴露了它的政策和目标；这些政策和目标与美国的政策和目标不符；因此有正当理由拒绝与日本达成协议，应继续对日本保持带敌对性的态度。

449

我对牛场先生说，这种揣测是毫无根据的。我记得，10月2日的备忘录曾提到美国公众对关于正与日本进行会谈的报道是怎样反应的，并曾讲明，美国政府渴望解决太平洋问题的热忱虽不下于日本政府，但美国的舆论既然是这样，就需要在开正式谈判以前先就一些根本要点取得一致意见。

牛场先生问，我们曾否收到这个备忘录的本文。我给他看的摘要(10月4日我曾让他看过备忘录的摘要)，语气是简单明了的，客观的，但据他说，备忘录的本文却"令人极不愉快"。里面满是争辩和教训，寸步不让，没有一点旨在推动日

本政府满足美国政府愿望的暗示或迹象。他还举涉及对欧战的态度的那段为例，反问道：备忘录为什么不暗示一下到底期望日本政府作什么承诺？

最后牛场先生表示意见道，日本政府只剩下一个请求，那就是，究竟要日本作何种性质的承诺，请美国政府提出一个具体的细目单，这个请求若得不到明确答复，就终止会谈。①

与此同时，我于今晨应邀往见外相。开头他告诉我，国务卿 450 10月2日交给日本大使的备忘录正文，这里已经收到了，正在细加研究。外相问我对备忘录有何看法，我答道，大使馆只收到一份摘要，在我有机会研究全文以前，我想还是不表示意见为好。

丰田将军接着又告诉我，他已被告知我与首相9月6日私下会晤的情况，且已得悉我已将近卫公爵在会晤时讲的话作为"个人密信"通过国务卿转给了总统。外相说，他是要我明白，我同近卫公爵接触，他决无反对之意；相反，他倒期望，通过这样的会晤，可以很好地交换意见。丰田将军说，首相关于9月6日会晤的私人记录表明，近卫公爵虽已"原则上"接受了国务卿一直强调的四点，但仍表示，在将这四点应用于实际情况时，尚须作某种修正。可是，10月2日美方交给日本大使的备忘录却说，首相"完全同意"那四点。因双方记录有异，故已命野村将军告诉国务卿，若认为这话是首相在那次私人会晤中讲的，就应该把"完全同意"改为"在原则上"。

外相声称，首相在9月6日讲的话，纯属私人的、非正式的性质，目的不过是让我知道在日本政府决策中居重要地位的一个人的私见而已。托我将他的意见的要旨作为私信转致总统，是近卫

① 要对日记从东京角度所述形势下美国政府的立场有个清楚的概念，须研究国务院1942年5月19日的备忘录，载《美国对外关系，关于日本部分：1931—1941年》，第325页。——作者

公爵在会谈当中才想到的。丰田将军说，因此，万没有料到，首相
451 在这种情况下对我讲的话，竟会被收进一份公文中，这份公文是要在许多并不知道我和近卫公爵会过的日本政府官员中传阅的。美国政府的官方文件中既然出现了误称为首相意见的话语，事前外相和我又没有彼此核对过关于 9 月 6 日近卫公爵和我会晤时的谈话的记录，所以有必要把首相谈话的日方记录讲清楚。(首相用日语说的、经杜曼译给我听的意见，在我汇报那次会谈的电报中叙述得很恰当、很准确，这是丝毫不容置疑的。上述所谓日方记录，一定是把首相后来说的两句话搬到前面去了，这两句是："他确信，意见分歧是可以很好地调和的"，"他明白，有几点还需要阐明和弄准确"。)

谈到这里，丰田将军说，他希望，研究完毕后，即可对国务卿 10 月 2 日的备忘录提出意见，在此期间，最好是不要讨论那些他所谓"技术性程序"引起的事项。他指的是某些分歧，例如，对近卫公爵 9 月 6 日的谈话和日本大使提交国务院的一些材料，曾有不同的理解，这些东西有的并非正式文件，有的颇不完备，日本大使 9 月 4 日提出的草案就属于这一类。丰田将军觉得，费力去澄清这类由技术性程序引起的细节，只会使讨论复杂化，不过，一旦会谈真有一点进展，他还是准备处理这类问题。

外相说，至于国务卿 10 月 2 日的备忘录，他想先提个简单的意见：他有个印象，美国政府是要日本政府立即无条件地回复到四年前的原状。自那时以来，日本已经卷入了一场大规模的战争，要求日本国民忍受困苦和牺牲，日本国民是受过教导的，他们把经受这些考验视为尽爱国之责。日本政府愿意并准备回到四年前的原状，但重要的是，美国政府应当理解，以往四年做的事，实际上是要
452 在顷刻之间就一笔勾销，这是个艰巨无比的任务，要完成这个任务，必须在许多方面作根本性的调整。

丰田将军问道，对国务卿10月2日备忘录中所概述的美国政府的立场，我可否非正式地表示一点个人的意见。我答道，美国政府是想把远东情势放在一个稳固耐久的基础上，没有这样一个基础，就不能作任何持久性的安排。我告诉他，我个人对国务卿10月2日备忘录的反应是，我觉得美国政府是在力求得到保证：日本将真诚地、不折不扣地遵守那些原则；不这样，就不能为太平洋区域的持久和平建立牢固的基础。

1941年10月8日

因得到外务省的特许，自颁布冻结令以来，今天我第一次可以把薪俸支票存入花旗银行并提取现款，用以支付一些帐单和家用帐目，包括欠轻井泽万平旅社的帐。但馆员仍旧得不到钱。不过也快要有个协议了。英国人在冻结令发布后几天内就有了协议，所以这事全解决了，我们的协议却一拖再拖。

伦敦电台今晚广播了伦敦《每日邮报》的一条报道，说我昨晚在一次宴会上表示相信，美日之间将会达成协议。我是曾经在美国协会的年会上作过一次非正式的、不供发表的讲话，会员全是美国公民，我恳求他们不要外传。在讲话中我重述了赫尔国务卿在9月13日记者招待会上论及预备会谈时讲的话，另外还说道："把几年来极度紧张的关系调整好，皆大欢喜，我们何尝不想，但是，要实现这个愿望，必先解决许多悬案，而解决悬案，又取决于许多因素，所以我们的工作就复杂万分，困难重重。结局如何，我无法奉告；我不知道；谁也不知道。"

后来我又说，"我从来不相信我们两国会破裂；现在也没有这样想。我们要有力能移山的信心，说不定我们真能够移山倒海。我认为这终究是做得到的。" 453

我详述了日本这几年来把两国关系弄到现在这种境地的政策

和行动。讲到美国政府的观点：任何国际建筑物，都必须把地基建在国际交往中的一些根本原则上，涉及这些原则，就决不能妥协。

冻结信贷使日本濒于破产

1941年10月9日

据我一个属员从可靠方面获得的情报，日本政府现在可以利用的外汇，总数约为两万德国马克，在这种情况下，需要付外汇的契约到期时，日本政府势必拖欠。美、英、荷印实施的冻结令，已经完全切断了用这三国货币来支付的交易，用南美诸国货币来支付的交易也大大减少了。据提供情报的这个人说，他手里的契约就要付总数约为五百万瑞典克朗的外汇，近几个月来，日本买瑞典的货物，主要是由柏林供给资金，大概是用德国提供的信用贷款。

最近日本接到德国的通知，这些信贷已被冻结，只能用来买德国货。据这个人说，德国人采取这个行动，可能是预计到日本将退出轴心国集团。来自另外一处的消息则说，瑞典因扩充军备，欠德国的债甚多，所以现在德国人要求瑞典用货物偿还，不要瑞典克朗。此间盛传，日本现已欠了德国八千万马克的债。

从国际金融的观点来看，日本现在的处境，其窘迫实已与日本国内某些被指名的外国人一样了。

454

丰田将军再次想促成罗斯福—近卫会谈

1941年10月10日。

今天下午外务大臣约见我。

开头他说，国务卿10月2日的备忘录他虽然仔细研究过了，但其要旨仍然有点难以捉摸。不过他已得出结论，美日两国政府

有争议的是以下三个问题：(1)日本在中国驻军；(2)对欧战，美日两国各有各的态度；(3)在中国维持机会均等。外相又说，10月3日，他曾命日本驻美大使去问国务卿，在上述三个问题上，美国政府要日本政府承担的义务，可否用明确的话语摆出来。日本大使没有回报；10月6日，他又再叫他去问。10月9日，日本大使电复外相，那天他已见到国务卿，但外相要问的事，他无可回报。丰田将军说，命日本大使去探询，原是力求得到一点消息，结果却白白浪费了一周的宝贵时间，消息如能得到，是可以促进一下当前的会谈的。外相今天又向野村将军发了训令，命他继续努力，取得回音，但为避免再有拖延，他又特请我转告我国政府，盼以答复下述声明的形式给他一个回信：

> 日本政府曾就某些问题向美国政府提过解决方案，这些方案显然未能使美国政府感到满意。日本政府要承担哪些义务美国政府才满意，现在美国政府可否向日本政府提出来，供它考虑？

谈到这里时，我趁机回答了日本报刊对当前会谈没有进展的批评。我向丰田将军强调指出，美国政府决定和执行其政策时，总是要考虑和权衡美国舆论的发展和现状。丰田将军说，甚至在日本，也不能无视公众舆论，不过，近卫公爵与总统的会晤如能实现，从而达成协议，控制日本的舆论，倒是件比较容易的事。外相向我保证，在首脑会议上，日本政府有可能承担性质深广的义务，但在目前情况下，日本政府不能在会前将它愿意承担的义务全部摊出来。他一再表示担心，事态如果老是象现在这样悬而不定，政府就会控制不住日本国内的极端分子。

谈话开始时，外相曾对我昨天将日本拟向法属印度支那增兵的报道函告他表示了谢意，所以我又回到这个问题，向他强调指出，日本在我们两国政府正进行会谈的这个时候增兵印支，将会造

成一种很微妙的局势，而且在我看来，还必将对会谈产生严重的、恶劣的影响。我告诉外相，我已请他注意印支日本当局最近的行动，如逼着要接管电报、邮政、海关，要求更多的空军基地之类，在这样的时候，又有增派的日军来到印支，这就必然会使人抱极大的怀疑，不知日本对印支是何居心。外相答道，他正在仔细研究我谈论这个问题的非正式的私函，且已与陆军大臣商议过，希望几天内即能给我回信。他又说，他还和陆相讨论过我请他注意的印支日本当局的行动，已请陆相迅即采取措施，改善局势。

456

外相又告诉我，他觉得日本驻美大使显已非常疲劳，所以正在考虑派一个经验丰富的外交家去华盛顿协助大使把目前的会谈继续下去。丰田将军说，他已经想到一个有大使级身分的高级外交官，但尚未与此人联系，所以还不知道他是否同意担负这个使命。如决定派他，不知美国政府能否为他在马尼拉至旧金山的班机上订个座位，这点确定下来，对外相将有很大帮助。丰田将军说，这位官员不是向美国政府委派的，而只是作为日本驻美大使馆的一个临时的、非正式的属员。我对外相说，他询问的事我可以转告我国政府。

谈话结束时外相再三叮咛，由于时间因素很重要，必须加快会谈的进程。

近卫内阁倒台

1941年10月16日

今天下午5时近卫内阁倒台，8时15分正式宣布。巴西大使听到这个消息就来电话告诉我，我们刚用完为杰克·柯蒂斯饯行的晚餐，十几个人正聚在我的书房里。每个人，包括我自己，都感到诧异，因为，我虽知道，美日会谈没有进展，迟早定会拖垮近卫内

阁，但没有料到会这样快。

与近卫公爵通信

1941年10月17日

近卫公爵今晨寄来一封私函：

1941年10月16日

大使阁下：

由于国内政局——日后也许可以向你说明情况——我的同僚和我不得不辞职，真是令人遗憾而又失望。

不过我确信，继任的内阁定会竭尽全力把我们坚持至今的会谈继续下去，直到取得成果。因此我切望，你和贵国政府都不会因为更换内阁，抑或只凭新阁的外貌或一时的印象，而过分失望或气馁。我向你保证，我的内阁曾力求达到而未能达到的崇高目的，我一定尽心竭力帮助新阁去完成。

一向幸蒙惠予合作，我趁此机会表示衷心感激，无论继任者为谁，均切盼赐予同样的优惠。

向你致以最亲切的问候。

近卫文麿谨上

我的复信：

1941年10月17日

总理大臣阁下：

你的友善的来函奉悉，谬蒙过奖，感激良深。你确信新阁将尽一切努力，务使两国政府间的会谈得竟全功，以此相鼓励，尤当向你致谢。你本人亦将帮助新阁完成你和你的同僚为之奋斗的崇高目标，闻之万分欣慰。几乎无庸赘言，你的继任者当然能指靠我的真诚合作，同心协力，把两国政府已作的

457

努力继续下去，直到获得成果。

请允许向你表示一点希望：在长期为国操劳，克建殊勋之后，如能暂卸重任，则正可以寻得宽舒，稍事休息。

向你亲爱的近卫公爵，表示我最崇高的敬意和诚挚的问候。

约瑟夫·格鲁谨上

458 同时，近卫公爵的私人秘书牛场来见杜曼，对导致内阁倒台的情势作了极有趣的说明，并说首相曾经力争，终于得到保证，要任命一个能将日美会谈继续下去的继任者。他是奉近卫公爵之命来告诉杜曼，要杜曼转告我。所述情节，奇妙无比，将来也许可以成为日本历史上的重大时刻之一。这种种情况将导致什么结果，尚难逆料。

上午10时，我们电告国务院，现任关东军司令官的梅津将军很可能是首相候选人，到下午5时，我们却又报告，被选中的是前陆相东条将军，他将以首相兼摄陆相和内相。东条是春间不顾松冈反对、最初支持与美国举行会谈的五阁员之一。这点至关紧要。

我们获悉，前德国驻旧金山总领事、希特勒的亲信弗里茨·魏德曼正在来日途中。后来又听说，魏德曼很可能是要去天津当总领事，他将以那里为基地，管理德国军事谍报网的东方组，他本人的特长是搞破坏和恐怖活动，拥有进行这些活动的大宗秘密资金。据信他将从天津指挥远东各谍报组织和盖世太保机关，现驻上海的迈森格和驻曼谷的许伯尔都归他统辖。这个远东组的主要目标，据信是印度和缅甸，它的任务是充当在远东搞钳形运动的前哨，是要与德国伸入西亚的另一股钳子配合，两面威胁印度。印度是自亚历山大大帝以来所有最大征服者都要夺取的目标，据说希特勒也非常重视这个目标。

美国大使馆里野蛮西部边疆的情调

1941年10月19日

我将这个星期日留下来用于仔细重阅美日预备会谈自春间开始以来的全部材料，写一份要点概略。会谈的进展和退步，若用 459 一张曲线图来表示，就会显示出起伏特别大。最近则一直是在倒退。我是想熟悉会谈的全部情节，以便在会见新外相东乡并讨论到这个问题时可以应付裕如。

如今真有重返昔日美国“野蛮的西部”之感，一个多月来，特别是9月18日近卫公爵遭到袭击以来，我身边总是带着一只手枪。9月18日那天，近卫刚离私邸外出，就有四个手持匕首和短刀的汉子跳上汽车踏板，要刺杀他。幸而车门是锁着的，刺客也很快就被私邸的便衣警察制服了。9月27日——三国条约签订一周年纪念日，我整天都在等着，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在1931、1932年那些暗杀事件迭出的日子里，卡梅伦·福布斯就曾一度被列入一个所谓爱国会社的暗杀对象的名单，只是因为那次他碰巧不在东京，所以才幸免于难，我知道，在现在的一些黑名单中，我也是榜上有名的。在大使馆官邸的入口处，警察主动加强了守卫，办公处入口附近也设立了警卫室，但是，使馆的围墙很长，夜间几个持刀人随便从哪里翻过墙来，破窗而入，仍是轻而易举的事。我不喜欢充英雄，但也不想不好好回敬一下就让一群暴徒把我宰掉。

有一次和一位日本官员谈话时，他拿我的手去按他的胸脯，我猜他是想表示他的心是摆正了的，可是他的心摸起来硬邦邦的，我马上就明白了，那个硬东西根本不是他的心，而是一只实实在在的手枪。与我们无异，很多日本人也同样受到军部极端分子的威胁。

对东条政府的分析

1941年10月20日

鉴于美国报刊和广播几乎普遍认为，日本现政府的成立，乃是一个预备步骤，下一步就将是进攻俄国，要不就是采取某种必然会导致日美冲突的行动，我便根据事实和合理的推断，列出一些因素，这些因素表明，那些关于这次更换政府的意义的看法，虽似已为美国公众所接受，不见得就是正确观察形势而作出的恰当估计。

460

近卫公爵的一个心腹告诉我们，近卫决定辞职，并在辞职时要求保证，继任的首相将是一个能把前政府开创的政策继续下去的人选，也就是说，能谋求与美国重修旧好和解决中国事件。

我们曾认为，要是探索性会谈破裂，或拟议中的正式谈判失败，近卫公爵就会被迫引退，继之而来的就将是军事独裁，而不会是文官政府。会谈还没有破裂，从这个事实来看，与上述预测相关连的条件并没有出现。我们觉得，前政府辞职的动机应该是：近卫公爵相信，美国政府若是同一个在陆军——它是决定大政方针的主宰——中居支配地位、为陆军所支持、从而具有权力的首相打交道，而不是同一个中间人交涉，日美会谈就会取得较快的进展。尽管不出所料，接替近卫内阁的并非文官，而是一个军人，但有迹象表明，东条内阁是愿意按上述政策继续会谈的，这就意味着，给东条内阁戴上军事独裁的帽子，认为它的任务就是要加紧推行势将引起日美武装冲突的政策，那就未免太轻率了。

重要的是，我们应该看到，东条将军与日本已往的军人首相有别，他不是退役军官，而是一个现役大将。这就是说，近若干年来，日本陆军第一次为日本政府的政策和行为公开承担责任，以前它是坚决不肯的。由此又可以推想，东条将军既保有现役军衔，就必

能对陆军中的极端分子施加较大程度的控制。

我有个馆员曾在莫斯科结识新外相东乡先生，近几个月来又在东京这里与东乡先生的夫人和小姐见过几次面，他告诉我，新外相当驻苏大使时，颇受苏联政府敬重，被视为近年来日本派往莫斯科的使节中最受欢迎的人。据可靠的人说，东乡先生曾主持日苏间在莫斯科进行的旨在订一项政治条约的会谈，由于主持得很好，1940年秋他被解职时苏联政府曾明白表示失望，还为他饯行，给予异乎寻常的礼遇。此外，不要忘记，去年有一批外交官被松冈解除第一线职务，东乡先生亦在其中，据信，解职的原因是，他不赞成松冈所推行的那种极端的外交政策。 461

日本官方通讯社"同盟社"适才发表声明，大意是，由于近卫内阁已经定下了日本的根本国策，东条内阁将不另订新政策。

评西外务次官

1941年10月22日

今天报上宣布，西春彦被任命为外务次官。西氏近年来专管苏日关系，曾两度派往赴莫斯科执行任务。在那里他与东乡共事，东乡之所以挑选他，无疑是因为个人关系，现在外务省的两个枢要职务俱由这两个人担任了，他们都有办理对苏事务的直接经验，且均被认为是对苏友好的人物。西春彦这个人我认识，也很喜欢他，他并没有多大学问，也没有什么杰出的才能，不过大家都觉得他为人正直，可以信赖。他是接替天羽的职位。

"妥协，妥协，妥协"

1941年10月24日

有个日本朋友对美日会谈发表了一些意见。他主张，美国应

同日本发表一篇联合宣言，声称美国无意“渗入”印度支那。他还如往常一样地说，美国如要会谈取得进展，必须妥协才行。我严肃地作了回答，指出没有妥协的余地，并且说明，发表他所建议的那联合宣言，简直是荒谬绝伦。我给了他一份我9月1日写给某某人的一封长信的副本，请他阅读、作记号、记住、深入领会。这位朋友，我虽然很喜欢他，但很难和他辩论，因为，不管你怎么讲，他总是又回到他原先的论点——妥协，妥协，妥协。

462

天皇是如何干预决策的

1941年10月25日

有个可靠的给我们提供情况的日本人士告诉我，就在近卫内阁倒台前，天皇曾召集枢密院和陆海军的要员开会，问他们是否准备实行一种保险不会同美国打仗的政策。参加会议的陆海军代表不回答，于是天皇便讲起他祖父明治天皇实行过的进步政策，并破例行事，命令陆海军服从他的愿望。天皇的立场既如此明确，这就需要挑选一个能够有效地控制陆军的人来当首相，东条将军之受命组阁，就是这样来的。东条依旧名列现役军官，同时又负有责任，要尽力使当前的日美会谈取得成果。

提供情况的人向我强调指出，日本各阶层，特别是现在的政治领导人，都有一个愿望，日美关系的调整，必须实现，怎么做都行；日本报刊最近的反美论调，亲轴心分子和某些派别的过激言论，并不代表这种愿望。关于这点，他又说，新外相东乡先生接受这个职位，其具体目标就是要尽力完成当前的会谈，达不到这个目的，他就辞职，这已是不言而喻的了。

日本领导人大都认为，与美国达成谅解的主要障碍，是日军撤出中国和印度支那的问题，但他们又都确信，设若美国不那么坚

持，一定要全部日军立即撤出这些地区，置日本于十分为难的境地，撤军还是办得到的。

这位与最上层有联系的报信人还说，现在的形势和日本现存的政治体制，十年来第一次使日本的政策和行动有转变方向的可能。

沃兹沃思时代的英国——和丘吉尔时代的英国

1941年10月27日

一百三十五年前，普鲁士覆灭后，英国茕茕孑立，单独对抗着拿破仑独霸下的欧洲时，沃兹沃思①写道：

又是一年，又一次致命的打击，
又有一个大帝国倒下啦；
我们没有盟友，不会再有盟友，
我们是敢与敌人斗争的最后一个国家啦；
好得很！从此我们懂得了：
能保卫自家的只有自家；
凭自己的右手打退敌人；
靠自己站稳脚跟，不然就是一个字——垮！

据英国《笨拙》周刊登刊，1940年，又有两个老水手以散文的形式表述了同样的心境，一个望着英伦海峡对面仍在硝烟弥漫中的法国北部港口说："嗯，现在只剩下我们了。"另一个答道："是啊，

① 威廉·沃兹沃思(William Wordsworth，1770—1850)，英国诗人。拿破仑宰制欧洲大陆时(1804—1814)，英国处于孤立境地。作者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打败法国(1940年)后，英国的处境与拿破仑时代相似。——译者

我们共有四亿个血肉之躯。”

德国人对东条内阁的反应

1941年10月29日

下面是某国驻东京使馆人员搜集的材料，描述了此间德国人对当前政局的反应，据信相当可靠。

德国人对新内阁并不热情。近卫公爵一辞职，他们就以为一定会成立一个力主参战的内阁，但新内阁却使他们大失所望。新内阁就职后，又马上逮捕了两个德国人，这就更给他们泼了一瓢冷水。

464 一旦美德开战，日本将作何反应，此间自大使以下的德国人都感到捉摸不定。他们把日本人看作不能信赖的机会主义者。

德国人现在主要是尽力挑拨日本人进攻苏联。此间德国商界的重要人物最近被德国大使馆叫去，并被告知，尽管生意清淡，他们的薪水仍将照发，条件是他们应自视为德国政府的代理人。他们的特定任务是，在日本人当中散布流言，怂恿日本人既反对美日会谈，也反对俄国，鼓吹现在正是进攻俄国的最好的时机。德国人这样做，据信是反映：(1) 德国统帅部急切希望赶快打垮俄国，特别是因为，在冬季战役中，德军的被服很难供应得上；(2) 希特勒本人想转移日本对荷属东印度群岛的注意，这个地方他自己想要（不过，为了牵制民主国家，德国又想怂恿日本南进，要是没有第一点，第二点就会被抵消）。

这时，在德国侨民中，则继续搞战备。德国陆军武官除从事某种航运活动外，又在东京德国会馆组织战前教练，所有适龄德国人均须每周参加一次。据谣传，德国人还打算成立一支“自由军团”，一旦日本参战，即与日军并肩战斗。

此间德国人一般虽仍有胜利的信心，但对时局的某些方面还是发愁，例如，俄国战场伤亡甚大，德国国内粮食不足，美国可能参战，特别是法国时常发生的暗杀和处死人的事件，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所谓“新欧洲”并不太平。

有个一向可靠的人士给我们提供了下述情报：

> 由陆海军联合占领泰国的详细计划已拟订完毕。计划是以德国攻打比利时和荷兰的作战方案为蓝本。要求用空降部队和伞兵同时占领所有机场、港口和战略要地。两百五十架运输机集结在台湾和海南岛，或者准备着随时调用，一声令下，即可执行此项计划。

东乡外相接见各国使节

465

1941 年 10 月 30 日

今天下午 3 时，东乡新外相分别接见各国大使，公使则将在明天接见。候见时区别对待：英国一边的使节、德国一边的使节、中立国使节分在三个不同的等候室。我是外交团团长，又是最先来到的，却被引入一个小小的休息室，那个我们常在那里聚会的大客厅，无疑是留给轴心国使节了。驻日年资次于我的阿塞尼-亨利，我看见他驱车来到，但没有进我那个房间；我不知他们到底把他归入哪一类。克雷吉没有来，因为昨天他已被外相紧急约见，不过可以想象，我们定会被划在一起。

一进外相的房间，迎面就是一列常见的排得密密的新闻摄影机和电影摄影机，我与外相合影，只用了几分钟，此后这些摄影记者便被“嘘”的一声赶出去了，因为只准他们拍摄外交团的团长。翌晨，《广告报》照例登出我们这张照片，大大地放在头版，对此，他们亲爱的盟友奥特将军恐怕会不大高兴吧。

丰田将军与东乡多么不同啊。前者轻松愉快，非常友好，谈正事前总要先开开玩笑；后者则冷酷无情，毫无笑容，沉默寡言。东乡的英语说得还可以，但声音太低，谁也听不明白，我则更是茫然，他要是用个译员，我反倒高兴。加濑和我坐在一张沙发上，他口齿清楚，英语又极好，所以我不会有什么听不见的。尽管空干一场，我还是怀念我和丰田将军的确是愉快的交往；他是那种类型的人，不管所办之事怎样难办，你总是乐于和他打交道。

交谈时东乡先生说道，几年前他在外务省时，美日关系已经不大妙了，自那时以来，每况愈下，终于坏到今天这种地步，若再恶化下去，就充满着极大危险。谈到从春季持续到现在的日美两国政府非正式会谈时，外相声称，希望会谈仍继续下去，并能毫不拖延 [466] 地胜利结束。他请求我合作，共同实现这个目标。

东乡先生说，为了取得进展，美国应当正视某些现实和事实。他随即举日本在中国驻兵为例。他说，别国现在也仍有军队驻在中国的某些地区；例如外蒙古就驻得有苏军。外相没有再提到预备会谈，只是说，他希望在适当的时候再和我谈谈。

我先请外相相信，我也很想跟他合作，然后向他说明，我们国务卿希望会谈仍在华盛顿进行，因为总统对会谈十分关心，而且还积极参与。不过，在东京举行平行会谈，往往也有帮助，可以提供一个核对的机会，使美国政府的意见得到较完整较准确的了解，所以在过去一段时期，国务卿直接电告我的有关华盛顿会谈的内容我都常常转告外相。接着我便把国务院通报 10 月 24 日副国务卿与若杉先生会谈的来电的释义交给东乡先生。

我对东乡先生说，美国大使馆致外务省的函件外相当然不可能一一亲阅，所以我以前总是把特别重要的信件另送丰田将军，请他亲自注意——这个做法是得到他的允许的。东乡先生同意我继续这样做，这次会见到此结束。

告辞时加濑先生对我说，他已被任命为外务省美洲局第一课课长，乐于充当外相和我之间的直接通道，只要我愿意。我感谢加濑先生，并提起我们以往的交情，又对他说，再次见到他在我和外相的会谈中起译员的作用，我很高兴。

驻日大使呈送国务卿的报告

（摘　要）

（国务院所记的原稿的大意）

东京，1941年11月3日

大使向赫尔国务卿及韦尔斯副国务卿汇报如下：

他引了东京《日日新闻》11月1日的社论（已以同日第1729号电报呈报），又说，该报还在"帝国濒临最大危机"的头号标题下发表了一条纽约专电，摘要报道了据说是日本大使馆交给《纽约时报》的一篇关于必须结束美日经济战的声明。据信，所引社论和评语，都是当前日本人的情绪的准确反映。

大使引述了许多电文，那些都是他数月来对日本国内影响政策的一些因素的分析，并说，他已无可补充，也不想作什么实质性的修改。据他看，用下述各点来观察现状和最近将来的局势，也许就可以对日本的立场作出一个结论性的判断。

（1）日本不可能把日本或日中冲突同欧洲的战争及其变动分割开来。

（2）日本的政治思想，从中世纪思想到自由主义思想，应有尽有，因此，其公众舆论，乃是个可变量。哪派思想将占优势，国外事件和形势的冲击随时都可以起决定作用。（民主国家则不然，由于影响和指导外交政策的原则同属一类，由于引起意见分歧的多半

是方法而非原则，舆论形成的方式则有所不同。）例如，去年德国在西欧打胜仗，随之便是亲轴心国分子在日本得势；后来德国未能侵入英国本土，日本对德国的最后胜利发生怀疑，这个因素又有助于增强稳健派的力量；最后，德国进攻苏联，推翻了俄德将保持和睦的估计，这又使日本人认识到，把日本拖进三国同盟的人，实是误国。

468 （3）近卫公爵力求调整日美关系，并欲由此走向与中国媾和，东条内阁也答应照这样做，从这里可以看出，他们是想纠正 1940 年的错误。设若此举失败，设若德军继续得胜，日本就会同轴心国结成最后的、更紧密的联盟，这是意料得到的。

（4）美国许多第一流经济学家推断，由于财力物力有减无增，终至枯竭，作为军事强国的日本很快就会崩溃：驻日大使馆从来不相信这种理论。这类预测是不自觉地以一个假定为根据，即：日本必先考虑保持资本主义制度。不错，日本的商业大部分确已丧失，工业生产锐减，国内资源耗竭，但他们预言的那种结果并没有出现。相反，使国民经济一体化的计划已在严格实施，要不是这样，就真是会象预言的那样发生崩溃了。可见，到此刻为止所发生的一切并没有证实那种意见，即：最好莫过于继续实行禁运，甚至再加封锁（有人提议过），这样就可以避免在远东作战。

大使谈到他 1940 年 9 月 12 日发的第 827 号电（报告日本军部把德国在欧洲得胜所造成的形势视为扩张的“绝好机会”）。他的电报是在这种情况下发出的：当时美国若采取和解措施，看来是既不明智又徒劳无益的。电中建议的强硬政策随后即为美国所采用。这种政策，加上世界政治事件对日本的冲击，使日本转而谋求与美国和解。大使推断，谋求和解的努力如果失败，日本的钟摆就可能再次摆回以前的立场，甚或走得更远。这又会导致他所谓的全力以赴的殊死的斗争，以顶住外面的经济封锁，宁冒民族切腹的

危险，也不向外国压力屈服。据天天感觉到日本国民气质和心理的观察者的了解，毫无疑问，这种事故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几乎是一定会发生的。

469

若把日本人的性格和气质放在心上，就会明白，逐步加紧实行严厉的经济措施即可避免战争之说，乃是一个靠不住的假设，根据这个假设来考虑美国的政策和措施，那是危险的。据大使馆的意见，采取这一方针，并不能避免战争。不过，每种观点只是抒一己之见而已，因此，大使馆认为，把其中任何一个定为当然正确，并据以确立政策，都是违背美国的国家利益的。这是本末倒置。根本问题在于，万一国防的第一线、即外交失败，与日本开战，是否符合美国国家的目标、政策和需要，这显然是首先要决定的，因为，只有在这个决定的基础上，罗斯福政府才有可能奉行一种尽量不为摇摆不定、看风使舵、意见纷纭诸因素所左右的方针。大使并不怀疑，这种决定，由于一经作出恐即不容改变，定然已经充分讨论过并且已经落实，因为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大使着重声明，他在对这个重大问题发表上述议论时，政府的意图和想法如何，他并不清楚，他的意思决不是说政府正在实行一种考虑不周的政策。他也决不是想主张美国对日本实行“绥靖政策”，或者从作为指导和调整国际关系、包括美日关系的基础的根本原则后退一分一厘。方法可以灵活，在原则问题上却决不能妥协。贸然与美国作自杀性的斗争，日本是干得出来的，大使的目的只不过是要防止美国因误解这一点而同日本打起来。诚然，正常的谋国之道，不容许日本有那种行动，但是，日本的谋国之道，是不能用美国的推理标准来衡量的。

对目前日本报刊的好战腔调和报道内容（几年来已在猛烈攻击美国，时起时伏），大使认为不必过分担心，但他又指出，日本显然已有准备，一旦和平计划失败，便执行另一计划，对这点估计不

 足，就是短视。他还说，以为日本的备战不过是炫耀武力、目的只在于给日本的高压外交以精神上的支持，并根据这种看法来制订政策，也同样是短视。日本的行动，不仅会使日美武装冲突成为不可避免，也许还会是危险的、戏剧性的突如其来。

民族切腹大有可能

1941年11月4日

我对日本国内涉及美日关系的一般情势的看法，已在11月3日电中说过。如果发生战争，我希望历史不要忽略这封电报，尤其不要忽略那几句话：倘若我们的和平努力失败，日本为了使自己不受外来经济压力的损害，也许就要全力以赴地作殊死斗，甚至不惜实行民族切腹，我们这些天天和这种气氛直接接触的人了解到，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几乎是一定会发生的；日本的逻辑规范或理性，不能用任何西方的计算尺来衡量；有些人以为，我国的经济压力不会把日本推向战争——这种想法，若据以决定政策，将是危险的；和平计划失败，日本就要打，它是准备好了的，无视或低估这点，或把这种备战仅视为意在支持日本外交的虚声恫吓，都是目光短浅；日美间的战争可能会危险地、戏剧性地突然爆发。那封重要电报已永远记录在案。

来栖准备起程赴美

1941年11月4日

12时10分，加濑来访，传达外相的话：外相要派来栖赴美帮助野村将军进行会谈，但美国快机定于明晨从香港起飞，他要是坐不上这一班而搭下一班，须得等两周，那就太晚了，因为，"由于技

术性缘故”，他必须在13日以前到达华盛顿。这当然是指必须在15日日本国会开会以前。假如快机不能停两天以便来栖飞往香港，另外的办法就只有让来栖先飞塞班岛，然后乘驱逐舰至关岛，在那里追上班机。我很了解，后面这个计划我国政府是不会欢迎的。

杜曼打电话到华盛顿给马克斯·汉密尔顿。一定是汉密尔顿做了一些很麻利的工作，因为几小时后他就来电话说，一切都安排好了，快机飞离香港的时间将从5日延至7日。我立刻用电话告知东乡，他似乎高兴极了。

下午9时，来栖因将于明日清晨动身，前来辞行。他说，昨天下午东乡才把使命交给他，当时他感到惊讶。此后他一直在研究有关会谈的文件，这才明白，他碰到的是个难题。他说，他此去只是要给会谈增加一个新观点，并尽量设法达成协议。看样子他口袋里并没有什么具体的新方案。假如飞机上能多找到一个座位，他还想把外务省美洲局的结城带去当秘书。

以前与石油公司进行长期谈判时，来栖曾任外务省通商局局长，后来先后在罗马和柏林做过大使，签订三国条约的就是他，但我没有理由认为他现在对纳粹德国还是比对美国好。他的妻子是美国人，女儿弥惠是埃尔西的好朋友。我们进行了坦率的长谈，听我讲美国的立场时，他没有激动，只是平心静气地阐述日本的立场，追溯到币原外交时代以及币原外交失败的原因，讲到中国人曾把这种外交看作软弱的表现。

日本新闻界破坏会谈

1941年11月5日

《日本时报和广告报》今天发表一篇恶毒攻击美国的社论，列

举七点，认为美国应当主动采纳，作为向日"赔偿损失"的方案，内容如下：

472

(1) 停止所有外国对重庆的一切军事和经济援助。停止军事代表团现在试图使重庆继续同日本作战或保持内乱状态所做的宣传。

(2) 完全不干预中国与日本进行的交涉，以求结束战斗，建立经济合作。美国可以劝重庆与日本议和。

(3) 停止用陆海空军基地和经济壁垒来包围日本。不再以国防为借口在西太平洋调动陆海军。

(4) 承认日本的共荣圈和日本在西太平洋的领导地位，听任满洲、中国、印支、泰国、荷印及其他国家和保护国各自与日本建立政治经济关系，不加任何干涉。

(5) 如满洲国希望得到承认，即应采取显属必要的步骤承认之。它是个有皇帝当政的国家，已然存在，任何人也改变不了。且不言经国才略，稍有政治常识，亦知应给予外交上的承认。

(6) 立即无条件停止冻结日本和中国在美、英、荷印及一切实行此项挑衅性措施的地方的资产。

(7) 恢复通商条约，取消对航运和商业的一切限制，废除一切借和平之名行备战之实的恶劣措施，不管是经济的还是军事的。

昨晚将近午夜，美国新闻记者预先被告知将发此社论，他们立即赶回各自的分社，据我了解已将社论全文逐字电告美国，此文一到，定会成为美国报纸的头版新闻。假如有什么东西能使美日达成协议的希望全成泡影的话，那恐怕就是这篇社论了。谁不知道这家报纸是日本外务省的机关报？我想美国人民将不会赞成再作争取和解的努力。这种臭文章，既令人泄气，又愚不可及。它即使不预先就毁了来栖的使命，也对他绝无好处。

这件事最能说明日本人的幼稚：他们希望、也需要同美国达成

谅解，可是，甚至在为此继续努力的时候，仍不断在他们的报刊上塞满带敌意的文章，这些文章只会使谅解成为不可能。当然，文章在一定程度上是写给本国人看的，表示他们是多么爱国，但同时也是想恐吓美国人，特别是那些孤立主义者及和平主义者，迫使美国政府按日本的条件与日本妥协。美国孤立主义者的言论，日本报纸都用大标题展示在头一版，无怪乎日本国民皆以为孤立主义者是代表美国舆论的多数派。日本照例追随它的德国盟友，总是错估外国人的心理，尤其是英美人的心理。

对华盛顿会谈会取得进展，我已几乎不抱什么希望，但是，假如谈判之门能够继续开着，彻底破裂能够避免，也许我们还是可以渡过难关，直到德国和德军的必然崩溃开始到来，那时，问题将会逐渐不解自决。现在，最乐观也只能这样希望。

10 月 31 日，《日本时报和广告报》还发表过一篇也是很恶毒的社论，煞有介事地说，作为酬答按《租借法》给重庆的援助，美国曾提出实即以中华民国为"抵押"的要求：(1)取得保有和利用中国四个未指名的海军基地的独占权，战后亦将保持此种权利，(2)由中国采取经济措施，如取消贸易限制、无差别地听任外国使用原料等等，其结果实将造成美国在经济上统治中国。社论说，这些"要求"，是马格鲁德代表团仗武力提出来的，已为重庆政府在原则上接受，作为商讨的基础。

社论指出重庆政府并非中国，又以所谓美国的"要求"与日本对华方案那种"合作"、"互惠"的性质相对照，然后下结论："由此可见，按《租借法》给重庆的援助，并不是要帮助'贫穷的中国'，而是在扩张富裕的美国。"

我对国务院说，对日本报纸这类虚妄恶毒的攻击，要是在一般情况下，我觉得最高妙的办法是不予理睬，但这篇社论所提出的指责，我认为非常重要，不能放过，我问国务院可否准我发表一篇否

474 认的声明。国务院答道，我不理睬那些错误的言论和攻击，这种克制态度，它表示赞赏，但这次情况特殊，它授权给我发表否认的声明。因此我写了下面这封信，11 月 5 日，《日本时报和广告报》在"美国大使馆辟谣"的标题下把它登出来了：

编辑先生鉴：

报刊上出现关于美国政策和行动的错误报道，美国驻日大使馆公开加以注意，并非常例，但 10 月 31 日《日本时报和广告报》社论提出的指责，性质特殊，在目前情势下，大使馆不得不为此破例。

据社论说，美国曾在重庆提出一些要求，如被接受，就会把中国变成抵押品。详言之，这些要求是：(1)取得保有和利用中国四个未指名的海军基地的独占权，战后亦将保持此种权利，(2)中国将采取某些经济措施，其结果实际上会使美国在经济上统治中国。

美国大使馆受权声明，这些指责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所以全是虚构的。

东乡和重光尚可理喻

1941 年 11 月 7 日

在今天苏联大使馆庆祝国庆的招待会上（它是现在唯一还在举行这种招待会的使馆），为上述《日本时报和广告报》的社论，即列出七点作为美国向日本"赔偿损失"的方案的那篇社论，凡和我谈话的日本人，我都乘机向他提出最强烈的抗议，并指出这篇社论造成的危害是多么严重，特别是在来栖衔命赴美、力求胜利结束当前会谈的这个时刻。我说，当此大家都在盼望得到建设性而非破坏性的结果之际，在此间制造敌对气氛，又给美国公众留下恶劣印

象，真是愚蠢之极。我讲明，我不是妄想干涉日本的舆论，只是想 475
如实地指出，《日本时报和广告报》素知是受外务省控制的，社论自应是代表日本政府的观点，这类社论在美国翻印出来，必然会产生很坏的影响。

外相东乡，对社论似乎毫不知情，声称肯定不是外务省授意写的，不过他答应调查，并且马上就把编辑局长乡敏叫来，把我的话告诉了他。我也和乡敏谈了，他说，社论应由他一人负责，是他自己写来说明日本的最高要求的，这些要求肯定要比政府在会谈中提出的要求高得多。我说，他已经造成多大的危害，他也许还不知道。别人告诉我，乡敏反对秘密会谈，他发表这篇社论，是作为对这种秘密状态的抗议。

我也和重光[1]谈了，他完全同意我的意见，并说，这种事他将尽力制止，"同盟社"编辑局长松本则向我保证，日本报刊的调子和内容即将有所改变，他很守信，报刊的论调果然立刻就有了好转。看来我的激将法相当成功，他们全都动起来了，在苏联大使馆的那次集会显然很有用。

后来再访东乡时，我又重申上述抗议，他答道，外务省从来没有控制过《日本时报和广告报》，不过，若从现在起能加以控制，还是好得很。不管乡敏怎么说，社论仍说不定是外务省指使写的。有个给我们提供情报的人说，确是奉命而写，不过我想，假如真是这样，那多半是部下瞒着外相干的，我相信外相的确是一点也不知道。

社论对美国公众的影响，也许我强调得太过分了，但我揣想，它一定已成了美国报纸的头版新闻，因为广播评论员总是大谈这件事。

讲到宣传问题，我发现，当年詹姆斯·加勒廷（他那引人入胜 476

① 前日本驻英大使，1943年4月继东乡任外相。——作者

的日记我正在重读）在《根特条约》①签订前尽力促使英美两国媾和时的情况，和现在非常相似，而且很有趣。1814年4月21日，他从伦敦寄了一封信给陆军部长威廉·H·克劳福德，信里写道：

> 他们〔英国人民〕切望"惩罚美国"。美国有什么正当理由要和英国打仗，他们连想都没有想过。他们是这样看的：美国以为波拿巴正在得意，英国则危在旦夕，所以赶在此时与他合作，企图趁火打劫。此间大多数人会普遍有这种看法，一点也不奇怪。为了取得这种效果，从而使对美战争得到民众的支持，英国政府认为最好的办法是翻印和传播美国联邦党的言论和报纸。如果说皮克林、昆西、斯特朗、汉森等人②未能把绝大多数美国人民争取到他们这边来，至少在此间他们倒是完全成功了，没有费什么力气就使得那些从政治刊物讨消息的英国人确信，美国〔投入1812年的战争〕，并不是因为有什么委屈，只是充当波拿巴的盟友而已。

若把皮克林、昆西、斯特朗、汉森等人的名字换成当今美国的孤立主义者，相似之处就很明显了，因为，日本报纸头一版大登特登的，正是这号人物的言论，日本人自然就把他们假定为绝大部分美国民情的代表者。

总统今天说，美国政府正在考虑撤走现正驻在北平、天津和上海等中国口岸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问题。

---

① 《根特条约》，结束1812至1814年英美战争的和约，1814年12月签订于比利时的根特。加勒廷是当时谈判和约的美方代表之一。

② 这几个人是1812至1814年英美战争期间反对美国与英国作战的美国政界人物。——译者

日本为什么宁愿静观而不愿与俄国开战

1941年11月7日

关于日本可能进攻苏联远东各省的问题，其真实计划如何，显然谁也不知道，只可以说，自东条内阁成立以来，毫无迹象足以证 477 明，进攻苏联是政府的最近意图之一。最近出现的一些尚难确定的迹象表明，东条内阁倒是力图与苏联政府保持正常关系，也许还力图利用苏联目前的处境，通过谈判来满足日本的某些要求，特别是在苏联的对华政策方面。外相和外务次官两人都有与苏联政府善意协商的直接经验，从这个事实也可以看到日本在这方面的最近意图的一些蛛丝马迹。

人们已经注意到，自新政府成立以来，新闻界对苏德战争的态度一般都比以前慎重和客观。10月13日的《日日新闻》社论讲到苏日关系中某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并评道，虽有日苏中立条约，苏联仍继续支援蒋介石，此种态度，对改善两国关系是个障碍，因此请求新外相利用现在的机会解决这些问题。此外，素称为外务省喉舌的《日本时报和广告报》前两周撰文评论德苏战争时，已大体上倾向于强调这样的观点：纵使包括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在内的俄国欧洲部分全落入德国人之手，苏维埃政权也决不会垮台，因为苏联政府还拥有充足的人力物力和工业基地，可以继续打下去，另外还有英美经过西伯利亚提供的援助。

苏维埃政权如有任何即将瓦解的征兆，形势显然就会顿时发生变化，但仍有迹象表明，至少在今后短时期内，日本将在苏联远东国境线上保持以前的静观态度。关于日本在满洲的兵力，现有的最可靠估计，约为五十万人至八十万人。这支军队，在老练的军事观察家看来，用以在苏维埃制度崩溃后西伯利亚处于解体状态

时进行袭击则有余，用以在远东苏军保持原状的情况下对西伯利亚发动正式进攻则不足。

478 据说有艘叫“气比丸”的日船被苏联水雷撞沉，到目前为止，报上还没有企图利用这个事件的任何迹象，日本的反应迄今只限于向此间的苏联大使抗议，但根据上面的分析，要判断此事会对苏日关系产生什么影响，为时尚早。这次惨案是在日本多次指控日本附近水域布有苏联浮动水雷之后发生的。

日本新闻界谨慎了一些

1941 年 11 月 8 日

上星期，日本报刊仍有许多专论美国和外交政策的文章，放肆如故，但从今晨的报纸来看，那种连篇累牍的恶骂却好象突然停止了，这点变化，很有意思。除《都》报有一篇评来栖出使和日美会谈的社论外，其他报纸都只限于评论一些在我们看来实属无害的问题。

丘吉尔保证立即宣战

1941 年 11 月 11 日

丘吉尔发出声明：“美国若卷入一场对日战争，英国即随之立刻宣战。”英国首相这种无条件的、不给日本留丝毫幻想余地的声明，听来令人高兴。

“狗一受惊就狂吠”

1941 年 11 月 13 日

这个星期《日本时报周刊》的社论，头一句就是：“日本和法属

印度支那间正在实行的政治经济计划，提供了一个日本关于共荣圈的思想的横断面。”印度支那的现状如何，日本今天对印支的控制是用什么方法得来的，我们已经知道了；现在日本又明确承认了自己的计划如何，听来真是使人神清气爽。

日本人的天真实在是惊人。他们企图干什么，总是爱用一些冠冕堂皇的公式和口号来掩饰，意在使他们的计划带上最纯正的正义性，甚至用来骗自己，使自己也相信自己的所作所为统统是正义的。“大东亚新秩序”、“东亚共荣圈”及其“永远不变的”政策等就是这样来的。前几天有个日本朋友对我说：“日本人本来还是小孩，应作为小孩对待，你们却视之为成人，待之如成人，你们英美人的毛病就在这里。一句鼓励的话，一点鼓励的表示，就可以使他们产生信心。德国人懂得日本人的这种心理，并利用了这种心理，收到了显著的效果。”我还可以附带说一点：假如真是这样，那就算我平生第一次了解到德国人也懂得外国人的心理。

当我说到日本报刊、撰文者、演说者的恶意言论贻害无穷时，这位朋友答道：“狗一受惊就会叫，越吓它，它就越狂吠。今天的日本人，连军人也在惊恐中。日本新闻界，不要睬它。”

我只得对这位朋友说，象《日日新闻》那样重要的报纸竟然也在前几天发表文章，说美国的行为“有如一个娼妓在阴暗的角落窃窃私语”，这也叫一个美国人和美国人民不要计较，就有点难了。

东条向国会致词

1941 年 11 月 16 日

今晨我参加了有天皇驾临的国会开幕式，使馆人员特纳和费尔里陪同前往。轴心国外交官大批出席，中立国使节来了几个，克雷吉没有来。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代表同我商量过，他们都来了。

我知道，我若缺席，就会被人注意，而且也没有什么理由要让轴心国使节独占会场，或造成一种印象，以为我觉得日美关系已处于危急状态——在天皇面前，尤其不应留下这种印象。在接待大厅中，大家仍聚在一起，我也照例同德国大使奥特、意大利大使英得里握手，但在外交官专席上，却首次被分开了：在武部官大久保的小心引导下，土耳其、泰国使节和我在左边坐下，德国和意大利大使则移到右边就坐。大久保护卫着外交使团，眼睛很尖：他撵走了一个人，因为那人只穿短上衣而没有按规矩穿晨礼服；还有个来给上司当译员的，因名不在外交官名册上，也被他发现、赶走了。

480

第二天是首相和外相演说，我们使馆有四个人坐在外交官席上，东条讲完后，我们的海军武官史密斯-赫顿探过身去对我馆秘书本宁霍夫耳语道："好，他总算没有宣战。"《朝日新闻》评道：

> 有四个美国使馆人员第一次出现在贵族院的外宾席上，首相在院里发表首次施政演说。首相的讲话结束时，雷鸣般的掌声响彻全场，往常在这里，即使是最好的演说，也没有人鼓掌。美国使馆这四个人突然乱成一团，交头接耳。随后又都大摇其头，此种举动用意何在，谁也不知道。外宾席上其余的人都凝视着他们。

首相和外相的演说主要是讲给本国国民听的，但传到我国，也不会留下好印象，东乡提出的要与美国达成谅解的三点，尤其如此。这三点是：

(1) 如何胜利结束中国事件，日本自有考虑，第三国不得阻碍。

(2) 本帝国周围的国家不仅不应对本帝国施加直接的军事威胁，而且还应取消经济封锁之类的敌对性措施，与日本恢复正常的经济关系。

(3) 应竭力防止欧战和各地动乱蔓及东亚。

这就是日本的"永远不变的"政策。

和平能否维持，就看美国了

481

1941 年 11 月 18 日

今晨《日本时报和广告报》的社论有这么一段：

> 正如格鲁大使说的，日美间悬而未决的问题，数以百计。但在目前这个时候，最关键的似乎是，美国政府应该认识到给日本以安全感的极端重要性。美国联合英国、荷印、澳大利亚和重庆，在日本周围设下以海空军基地连成的巨大的包围圈，构成对日本帝国的直接威胁。这种战略形势存在一天，日本就一天不会有安全或安稳的信念。美国如果希望世界这部分地区不要有战争，就应该懂得，就在它的手中，握有解决全局的钥匙。

这种观点在此间颇有代表性。威胁别人的永远是美国；潜在的侵略者永远是美国，决不是日本。由此又推论出：美国完全"误解"了日本发展新秩序和共荣圈的和平用意；"包围"(纳粹德国也很爱用这个词)无辜无害的日本，致使调整关系成为不可能。

重新考虑近卫公爵

1941 年 11 月 21 日

常常想到近卫公爵函告我内阁倒台时我回他的那封信，特别是信里说到他为国宣劳、功绩卓著的那段话。这话也许会受到某些人的挑剔，理由是，他的国家陷入困境，包括与轴心国结盟在内，都是他领导的结果。这些我全承认，但我觉得这一切更应该归咎于松冈的恶劣影响，松冈之过大于近卫本人——近卫还得应付军

部和极端分子。

我之所以提到他的勋绩，主要理由是，惟独他还想扭转车头，而且为此努力不懈，无所畏惧，甚至冒生命危险，事实上也几乎丧命。不管他在指导日本政策上犯过多少错误，他是有理智有勇气承认错误的，并且试图把他的国家引上与美国和好的新方向。我认为，单凭这一点，他已应得到某种程度的善意对待。在华盛顿会谈期间，正值日本人侵印度支那，不是生活在日本、不了解日本国内充斥着各种势力和压力的人，是很难理解近卫的处境的，但我却理解，所以才会在信中讲到他的功绩。假如我再来写这封信，我不会改掉那段话。

482

来栖：德国对他使美深感不安

1941年11月20日

今天是感恩节。在美国联合教堂做礼拜，为使我们能在12时参加埃辛一特克的婚礼，礼拜提前于10时半举行。克雷吉、奥菲瑟、波利蒂斯、福脱姆夫人等外国人士也来参加礼拜，意在对我国表示感谢。阿克斯林博士作了很好讲话，听了颇受鼓舞，我很高兴，但没有料到要讲那么长，克雷吉和我们只好在礼拜结束前退场。照例看总统的感恩节公告。

柏林来电颇有趣，谓来栖赴美，日本驻德大使馆深感不安，有怨言，大岛大使向德国人坚决表示，不管华盛顿出什么事，日本都将一心一意地推行其南进政策。据说大岛认为，在目前这个时候，日本若进攻荷印或滇缅路，美国不会采取什么行动来阻止，现在的形势比将来有利。

纳粹分子正尽力使柏林的日本人觉得德国在俄国战场上的胜利是决定性的，大岛的这些看法，可能是反映这种情况，但也很可

能是由于大岛深知，日本的政策如果真转向稳健，他自己在柏林和东京都会陷入窘境。大岛将军在思想上属于白鸟派，是个彻头彻尾的亲纳粹分子。

美国的十点建议传到日本

1941 年 11 月 29 日

我国政府已将调整远东全局的十点建议草案提交日本人。这是一个客观、宽宏大度、有政治眼光的文件，日本自称一直在为之奋斗的一切，几乎全都给了它，只要它不再实行侵略政策就行了。采取新方针，它就可以不受限制地获得必需的原料，自由地进行贸易和通商，得到财政上的合作和支援，冻结资产令亦将解除，并且还有与美国商订新商约的机会。如果它仍想在政治和经济上宰制东亚各国(美其名曰“东亚新秩序”和“东亚共荣圈”)——日本极端分子大都确有此意——如果它用武力推行南进政策，很快它就会同所有 A B C D 四国处于交战状态，就会必败无疑，沦为三等国。但要是放聪明一点，应事有方，它就可以不用再斗而得到它迫切需要的、自称不惜为了发动一场斗争的一切，即战略、经济、财政、社会等各方面的安全。

483

日本的舆论，总是可以在较短期内改塑的，政府现在有个巧妙的办法可用，那就是，劝国民相信，政府在华盛顿会谈中已赢得外交上的巨大胜利，可以不用武力而得到它一直在力争的安全和“自由”。

此后两三天，我常往东京俱乐部，按上述道理同几个日本知名人士攀谈，后来我听说，我那些慎重讲明纯属私人和非正式性的谈话已引起东乡、近卫公爵、松平、木户侯爵等人的注意。和我谈话的那些人，看来大多数是知道美国的建议草案的，并因此非常悲

观，但话被传到东乡等人的耳里，想必还是有用。但愿我的话能一直传到天皇那里。这些话确实有说服力。

不过，在此期间，日本人又在把大批军队和补给品运入印支南部，显然有入侵泰国之意。此外，在此紧要关头，首相还借庆祝《防共协定》签订五周年的机会发表演说，谓美英为了攫取远东霸权，正在挑拨东亚各民族互斗，"为了人类的荣誉和尊严，我们必须把484 这种惯技彻底清除出东亚"。

总统中断了在佐治亚州温泉的短期访问，提前赶回华盛顿，如此急促，我相信，东条的好战演说至少是原因之一。在此危急时刻发表这样的演说，真是愚蠢之极；诚然主要是讲给国内听的，但也明白显示了大多数日本人的信念，即：只要把武力威胁的分量加足，就可以吓倒美国；日本政府即使真想同美国保持和睦，继续给国内的反美舆论加油，看来也是胡涂透顶。有个日本朋友说过，狗一受惊就会叫，越惊恐，越叫得凶；又说，日本人实是小孩，应作为小孩对待：我再次感到他的话确是中肯。首相的演说我看真是稚气可掬。日本昔日甚为自负的经国之才而今安在？

日本对美国的建议反应悲观

1941 年 12 月 1 日

几天来，我和一些日本知名人士谈过，其中一些人是与外相有直接联系的，大多数亦似已知悉我国政府最近提出的十点建议草案的内容。他们虽希望华盛顿会谈继续下去，但都表现出一种悲观的反应，觉得弥合两国的立场实有困难，似皆认为我国提案的"调子"毫不调和，并且很强调这一点。

在每次谈话中我都着重表示了我个人的意见：我国草案着眼于一个客观的、广阔的计划，是个政治家风度极高的方案，因为它

所提供的，实际上正是日本所谓一直在为之奋斗的东西，它还提供了一条和平的、合乎逻辑的途径，使日本可以不再用武力而得到它常说的迫切需要的东西。同时我又毫不含糊地表示惊讶：在此危急时刻，首相竟会觉得适于发表那样的演说，这篇演说，无论语调或内容，都只能被认为是好战的。我还讲明，这篇演说必将在美国引起可悲的、严重的反应，美国政府和人民都必定会有这种反应。

我还说，日本政府现在可以改塑舆论，使它相信，政府已在会谈中赢得外交上的胜利(假如定要保全面子的话)，可以不战而达到它当初所谓不惜为之动武的目标。

今晚报纸报道，内阁今天决定，不管达成调整关系的协议有多大困难，会谈仍将继续下去。

今晚在东京俱乐部遇见一位日本老友，样子苍老，面带愁容，他告诉我，内阁已决定停止会谈。我说，要是那样的话，恐怕什么都完了，不久我就会离开日本。可是报纸随即宣称，会谈将继续下去。但这位朋友的精神好象已经垮了。

东乡感到失望

1941 年 12 月 3 日

参加贺阳太妃的葬礼，全部仪式都按照皇室丧礼的惯例。天气很冷，因不能穿大衣，我只得穿上两套内衣裤和一件毛衣。站队等候柩车时，发现靠近我的是德国大使。我只问了一下奥特夫人可好，他答道，她在神户。我率领外交团来到祭坛前，献上榊枝，出来时恰好走在首相东条将军的后面。等车时，东乡外相对我说："我非常失望。"我答道："不管怎样，还是继续会谈吧。"海军大臣岛田将军向我致候，情致殷殷。

“华盛顿向我们下了最后通牒”

1941年12月5日

昨天收到一封与此间政府人士有密切联系的日本名人的亲笔信。部分内容如下:“瞻望时局,令人懊丧。我有何感想,你知道;你的心情,我大概也理解。现有许多心里话,请允许我坦然直陈。我和朋友们谈过,仔细考虑了他们的感想之后,我得出的结论是,他们觉得,美国11月26日文件的实际内容虽不得而知,但华盛顿确是向日本下了最后通牒。这就是日本人的心理,遗憾得很,所以我认为,目前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美国先同意把日本方案算作商订一个临时协定的基础,以后才按美国方案订出最后协议。我只希望事情善始善终,故不揣冒昧,奉致此函。”

我看这封信真可以说是当前日本舆论的典型。

更多的日本人疑心美国在拖时间

1941年12月6日

据一个素称可靠的给我们提供消息的日本人说,东条将军11月30日演说的讲稿,首相和其他阁员事前都没有看过,据信是大政翼赞会的人起草的。演说不过是由代表者照读讲稿而已,其内容和语调与东条将军过去所有的演说都不同。

有人密报,据相当可靠的人传出的消息(惟尚未证实),魏德曼领导的纳粹恐怖组织正在作拚死的活动,力图破坏华盛顿会谈,最近炸西贡美商油库和美国领事馆的事件,就是这个组织的三个德国特务干的,目的是要给美国人造成一种印象,以为这种袭击是日本人主使的。这个组织的主要目的就是要破坏美国在远东的利

益，不久很可能还要加紧活动。

罗斯福向裕仁呼吁

1941年12月7日

今天的广播宣称，总统曾寄信给日本天皇，但内容如何，通过什么渠道传达的，没有报道。只是到深夜时，赫尔先生发来一封简短的十万火急电报，谓正在译制一电，内有总统的信息，我收到后须尽快送交天皇。我立刻叫杜曼到大使馆来，打电话给东乡的秘书友田，请安排我和外相在午夜左右紧急会见；即是说，信息一到，在译码时，杜曼就打电话。那封短电，据电上所注收报时间，中午的时候已经到达日本邮电局了，虽属急电，却直到夜间10时半才送到使馆来。这两电是国务院分别在12月6日下午8时和9时发出的。我这么晚请求约见，友田好象很不安，他问杜曼，事情是否急到连明天都不能等。第二天杜曼感到，友田那时一定还不知道战争即将爆发。 487

不过友田还是安排了约会，我们的司机早已回家，承本宁霍夫帮忙，于凌晨12时15分把我送到外相官邸。东乡立即出见，我请求觐见天皇，面交总统的信，随即朗读此信，给东乡一份副本。信怎样送才适当，国务院让我自己斟酌，我觉得最好是请求面见天皇，这样才能极大地加重这封信的分量——并确保交到他本人手里。在初东乡说，他还要研究一下这份文件，我问他，这是不是意味着他能否替我请求觐见，还不能肯定，他才答道，他要先将此事奏明天皇。他又说了一些话，评论华盛顿会谈，我说，关于12月5日的会谈，我还没有接到报告，若要我把他的这些评语向国务院重述一遍，就只会使问题复杂化，他便说，没有必要汇报。我约在凌晨12时30分告辞。

国务卿的指示和总统致天皇的信全文如下：

十 万 火 急

818号，12月6日下午9时

机密

请尽快按你视为适当的方式将总统的信送交天皇，内容如下：

488 “日本天皇陛下：

“近一世纪前，美国总统曾致书日本天皇，向日本国民献上美国国民的友谊。奉献得到接受，在此后持续和睦友好的长时期中，仗国民的德性，治国者的贤明，两国俱日臻昌盛，对人类亦大有贡献。

“只有在事体特大、对两国均至关紧要的情况下，我才需要径函陛下，商讨国事。我觉得现在我应该这样做了，因为影响深远的紧急事态，看来已在形成中。

“我们两国间的长期和平，对两国、对全人类都有过有益的影响，现在太平洋地区却正在发生势将使我们失去这种影响的事态。这些事态包含着悲剧的可能性。

“赞成和平及各国皆有权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美国人民，一直在热心地注视着数月来我们两国政府间的会谈。我们希望结束目前的日中冲突。我们希望太平洋的和平能达到如此境界，由多种民族构成的各个国家都能并肩共存而无遭受侵略之患；希望各国人民都能摆脱难以负荷的军备重担；希望各国人民都能恢复既不歧视任何国家也不专利于任何国家的通商关系。

“我相信，陛下一定和我一样明白，要追求这些伟大的目

标，日美双方就应该赞同消除一切形式的军事威胁。非如此不能达到这些崇高的目标。

“一年多以前，陛下政府与维希政府缔结协定，据此，五六千日军被允许开进法属印支北部，以保护更北面正在对中国作战的日军。今年春夏，维希政府又允许日军开进印支南部，共同防卫印支。其实从未有人攻打印支，也没有人这样策划过：我想我这样说是对的。

“这几周全世界都看清了，派到印支南部的日本陆海空军数量很大，致使别国有理由怀疑，这样不断在印支集中兵力，并非防御的性质。

489

“在印支集中的兵力规模既如此之大，现已伸及印支半岛的东南角和西南角，菲律宾、荷印千百个岛屿、马来亚、泰国等地的人民当然就要自问，这些日军是否正在准备或计划朝这许多方面的一路或几路进攻。

“我确信，陛下将会理解，这些国家的人民的担心，都是合法合理的，因为这关系到他们的安宁和民族生存。建立陆海空军基地，拥有大量人员和装备，组成能够发动攻势的大军，对此，美国有那么多人侧目而视，我相信陛下也会理解的。

“很明显，实难设想这种局面能这样继续下去。

“上述各族人民，谁也不能无限期地或永久地安坐在火药桶上。

“假如日本陆海军撤出印度支那，不留一兵一卒，美国就绝对不会有入侵印支的想法。

“我想，从荷印、马来亚、泰国等地的政府那里，我们也可以得到同样的保证。我甚至可以负责要求中国政府作同样保证。这样，日本从印支撤军，就可以确保整个南太平洋地区的和平。

“我致书陛下，就是希望，在此危急之秋，陛下能和我一致行动，想方设法驱散乌云。我确信，不仅为了我们两大国人民，而且为了邻近地区的生灵，我二人均有恢复传统友谊、防止世界上再有更多死亡和破坏的神圣职责。

“富兰克林·D·罗斯福”

此间报界仅仅得到这样的通知：总统正寄信给天皇。

赫尔

六、一个世界：一场战争

（1941年12月8日—1942年5月31日）

日本打美国，是绕过我们的国防第一线——外交——而进行袭击，不先按常例宣战就发动军事进攻。结果美国驻东京使馆人员及散在日本势力范围内的其他官员都发现自己处于与世隔绝的境地，一系列震撼世界和把美国卷入一场全球总体战的大事他们都不知道。1941—1942年冬季和初春，菲律宾、威克岛和关岛，香港、马来亚和新加坡，荷属东印度群岛和缅甸，全都沦入日本之手。到5月底美日交换外交官的事安排就绪时，日本人不仅已达到这一年的扩张的极限，而且已在珊瑚海打了第一个败仗，东京也挨了一次轰炸。美国正经历其内战以来最黑暗的几个月，然而战局已开始出现转折的征兆。

493

战　　争

1941 年 12 月 8 日

上午 7 时，被加濑打来的电话唤醒，他叫我尽快去见外相。他说，从 5 时起一再打电话，都打不通。我急忙更衣，约 7 时半来到外相官邸。加濑很亲热，东乡则板着面孔，态度拘谨。他发表一篇简短声明——该声明现已纳入我呈国务院的报告中——接着又交给我一份长十三页注明 12 月 8 日的备忘录，说这个备忘录今天已由野村将军交给了国务院，通知国务院停止会谈。下面是备忘录的最后一段：

> 日本政府甚为抱歉，不得不于此通知美国政府，考虑到美国政府的态度，日本政府只能认为，继续谈判，亦不可能达成协议。

东乡说，他已见过天皇（在凌晨 3 时，我听说），这个备忘录也就是天皇对总统来信的回答。他还讲了几句道谢的话，感谢我在会谈期间给予合作，随即送我下楼，在门口道别。只字不提珍珠港的事。

回使馆后即刮脸，进早餐，然后向国务院发去报告，但此电未必收得到。旋即得知，大本营已宣布，日本已与美英开战。这是《读卖新闻》今天清早的一篇报道中讲的。报道虽全带官方口吻，在初仍令人难以置信，稍后，外务省的大野来访克罗克，拿着正式通告，两手发颤，向他读道，武装冲突已经开始。

不久，使馆的门户便被关闭了，我们则被告知，谁也不能出入。外务省的职员增尾被任命为联络官，充当我们和外务省之间的通494道。我们又被告知，不得发密码电报，所有电报均须送外务省批准。罗伯特·克雷吉爵士来看我，在门口被警察挡住；他走下车

来，讲明他的身分，可是警察仍抓住他的两膀，他推开他们，找到一个警官，警官把他放进来了。我们作最后的倾谈，为我们的合作互致谢意，他说，这种合作，是他驻日数年很少的几件快事之一。丹麦公使的妻子蒂利茨夫人也来看艾丽斯，回去时遇到留难，最后是在一个便衣警官的帮助下才回到了家。我们的最后来访者，清晨前来的有希腊公使波利蒂斯和西班牙公使的妻子德·维戈夫人，她是来看艾丽斯的。

一群日本无线电技师在使馆办公处和职员宿舍进进出出，仔细搜查，把短波收音机全部拿走。他们很有礼貌，却查得非常彻底，但来到大使官邸时，我说我只有两架收音机，他们也就相信了，只拿走收音机而没有搜其余的房间。他们都非常客气，陪同前来的外务省的大野尤为谦恭，特为打扰道歉。

一听到开战的消息已经证实，我便下令烧毁全部密码和机密信件。

同时又传话给大家，为了自己的安全，每个人都应该留在使馆院内。拟好一封明码电报，告诉国务院，使馆全体人员均平安无事，但暂未发出，因为核查人数时发现，兰德尔·琼斯被算漏了。原来他今天休假，到横滨去了，还没有回来。大家担忧了一阵，忽见他步过场地而来，这才松了一口大气，而且还有点惊异。好象是这么回事：他在横滨听到开战的消息后，便乘头班火车回来，没有出事，又从新桥驿坐出租汽车来大使馆，也一切正常。到达后他才发现使馆的门都锁起来了，不许进出。他站着不知如何是好，正在想办法的时候，有个便衣警官走过来，指他看隔壁海军武官住的院子，建议他用史密斯-赫顿武官的花园墙边的梯子爬过使馆围墙，那梯子是几年来一直放在那里的。他接受了这个建议，所以安然回来了。

大使馆参事尤金·杜曼保存的记今日之事的日记，有两段也 495

应该放在这里，以便留下记录：

我的男仆每天早晨都在7时半叫醒我。今晨他却不到时间就叫了，说美联社记者马克斯·希尔先生有电话来。我听见希尔先生说："我得问问警察我是否可以同你讲话。"我可以隐约听到希尔先生在电话那一头和某一日本人谈话的声音，我明白了，希尔先生的话是意在向我透个信。过了好一阵，他的女仆才在电话里说，希尔先生已不得不离开寓所。我答道，我完全明白。

我随即打电话给本宁霍夫先生，请他立刻去希尔先生家查明实况，因为我非常担心他已被警察逮捕。约8时半，本宁霍夫先生来到我家，说刚去看过希尔先生。他报告说，希尔先生被软禁在家，正在用早餐，餐后就要去警视厅，他将在那里受审。美联社次席特派记者戴南特先生和合众社记者罗伯特·贝莱尔也在希尔先生处，但本宁霍夫先生报告说，警察不许他们同希尔先生通话。后来讲到的这两个记者显然没有遭逮捕。贝莱尔先生找到几分钟的机会对本宁霍夫先生说，大本营已宣布，日本舰队已在西南太平洋某处与美英舰队接触。贝莱尔先生还说，他听说，今天清晨，日本飞机已轰炸檀香山。本宁霍夫先生和我共进早餐，随即赶回去洗澡，准备做今天的工作。

日本人利用了德国的闪电战方法，在会谈尚未破裂时就这样干，这是卑怯行为。袭击的准确时间我还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在轰炸夏威夷、战争开始以前，野村将军是否已通知赫尔先生会谈决裂，非常值得怀疑。日本人要是仅限于在远东扩张，只打菲律宾，美国国内本会有和平主义者和孤立主义者出来说，远东的事横竖与我们无关，可是，他们一打夏威夷，美国人民肯定就会一怒而起，团结一致。电台援引惠勒参议员的话说，美国必须"狠揍日本人一

顿”。这话说是容易，做起来就难了；可能需要很长时间，在我们的力量能够充分显示出来以前，我们也许还会受到一些沉重打击。但从长远来看，日本必败无疑，因为美国人民一旦愤起，就决不会善罢甘休。由于美、英、澳、荷印、甚或苏俄、还有中国都终于起来反对它，不久它就会应接不暇。

我在最近的一封电报说过，全力以赴作殊死的斗争，以顶住外面的经济压力，即使意味着民族切腹，亦在所不顾，这种事日本是绝对干得出来的，其行动还可能会是“危险的、戏剧性的突如其来”，我们应当有所准备：我很高兴此言已记录在案。现在发生的事果然正是这样。

禁止出入时，我们的馆员，包括非受任命的人员在内，幸而全体都在使馆院内，只有琼斯在横滨，也平安地回来了。在被关在屋里以前，我已经禁止馆员外出。纷传日本国内境况困难，甚至说东京已宣布戒严，我却不相信。但也很可能有反美的示威游行，我馆一等秘书兼总领事马金森报告说，他从办公处的窗子看见一群为数约为二百的日本人正向大使馆走来。不过，使馆他们显然是绝对到不了的。

今天马克斯·汉密尔顿从华盛顿同我打电话；我听得很清楚，他却似乎很难听懂我的话。他说，国务院正在考虑委托谁来照管我们在日本的利益，他征求我的意见。我提出阿根廷和巴西，尽管我认为后者可能会参战。英国人已把他们的利益托给阿根廷人。后来我又去电提出中立国中的瑞士、西班牙和葡萄牙，但不知此电能否收到。我说，我们已非正式地向外务省建议，“龙田丸”仍应继续驶往美国，接载日本大使馆和各领事馆的人员，日本人也可以把另一艘船交给我们使用，我们当然没有作什么承诺，因为我还不知道政府的意见如何。“龙田丸”上有许多美国人和外交人员，因此我料想我们不会去阻碍它的行程。但也许它不管怎样已经折回日本 497

了。汉密尔顿代国务院全体同僚向我们致亲切的问候。

晚上6时45分，我们把大使馆和领事馆的全体人员请来举行酒会，约六十人。杜曼作了一篇短小精炼的道及艾丽斯和我的讲话，使我们深为感动。住在院子外的科尔斯小姐、杜曼、威廉斯、克罗克、波伦、特纳、本宁霍夫、库珀和埃斯皮俱已迁入使馆内，床铺全由我们供给，膳食亦多与我们共餐。在宿舍有房间者则为需要床铺或地铺的人提供临时床位。我们是一个团结、合作的集体，又是一群志趣相投的人，这在此种时刻，用处极大。今晚，在这与日本——就我所知，它是历史上唯一先对美国宣战的国家——开战的第一天，每个人都疲惫不堪。

不用说，8日凌晨我见到东乡时，他定然已经知道了战争爆发，可是他一字不提。如说有什么迹象的话，那就是他进屋来把日方对我国新建议的复文啪的一声丢在桌上的那种姿态，等于说，这是最后的回答。但和往常一样，他的态度十分冷静，谈完后站起来时，他还和悦地说了几句感谢我合作的话。离开他的官邸时，除知道会谈已经破裂外，我丝毫也没有感到战争已经爆发。我这样没有任何疑心，东乡想必也觉察到了。以前日军开进印度支那时，会谈也曾一度破裂，但后来还是恢复了。我在11月3日预言过，战争的爆发，恐将是“危险的、戏剧性的突如其来”，除了这点感觉而外，就大使馆来说，这次闪电战确是完全出乎意外。

意味深长的是，国务院12月6日下午9时发的传达总统致天皇书的818号电报，实是在7日正午到达东京中央电信局的，可是直到晚上10时半才送到使馆来。电报上打的收报时间的日语记号表明了这一点。

当了日本的俘虏

1941年12月9日

今晨警视总监留冈幸男带着一个副官兼译员来找我（仍由特纳当翻译），说他要尽量使我们得到舒适和方便。他非常和气。后来警察擅自闯入使馆办公处和宿舍，甚至闯入大使官邸，对我们从馆外购进食物和衣着用品百般刁难，即使不是把我们当作罪囚，也是完全作为俘虏看待：这种种行为和态度，无疑是出自下级警官的命令，出自守门警察的愚昧无知，不去了解一下我们的地位就按自己的领会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些情况，总监恐怕还一点也不知道。

外务省欧洲局的太田也来过。他说，外务省美洲局的加濑今天本是要来的，但偏巧很忙。太田说，他刚去过英国大使馆，看能做点什么，以宽舒那里的处境；为了改善这里的境况，他很想听听杜曼的意见。杜曼便把本宁霍夫叫来，一起开了一张很长的必办事项的清单，交给了太田。供应新鲜食品、来这里的日本官员互不协调、供给燃料油等问题都开在里面了。太田说，所有这些事项他都要加以考虑。本宁霍夫走后，太田谈到星期日夜间杜曼与友田通电话的事。杜曼问太田，外相表示不愿就寝太迟，所以不大想见我，这是否意味着他试图避免在开战以后和我再见面。太田急了，不觉大声叫道："绝对不是。袭击夏威夷，外相一点也不知道，是到第二天清早才听说的。"无须深究，日军要采取战争行动，天皇陛下的外务大臣显然事前并无所知。

史密斯-赫顿一家暂时还能继续住在使馆隔壁的屋子里，还可以给大约十六个人提供食宿之便，用梯子（此梯久负盛名，"二·二六事变"期间即已用过）翻墙，就能进入使馆院内，所以他们又可以 499 给我们带报纸来。爬梯子的事警察晓得，在初并不反对。后来我

们的一个领事未经与杜曼或我们当中的任何人商量就去召唤他的中国仆人，叫他越墙而入；仆人抱着一包鸡蛋，在黑暗中一交掉进反光的水池里，引起一片喧嚷声，警察跑来了。这又招来了调查：梯子被拿走，史密斯-赫顿全家及其宿客不得不长久住进使馆院内，使馆得多供十六个人的食宿，以至办公室里也铺上了床，史密斯-赫顿一家三口则迁入大使官邸，一如杜曼、威廉斯、克罗克、波伦、特纳、本宁霍夫、艾丽斯的秘书科尔斯小姐等。我们还每天都摆下可坐十四人的餐桌，轮流邀请其他馆员和办事员来共餐。

为了留下记录，特将8日晨外务省美洲局第二课课长大野交给克罗克的信抄在下面。拟了一电，向国务院呈报此件，交外务省代表增尾代发，后来听说已经发了，但究竟能否收到，无法肯定。

第136号——绝密——调查5。

外务省

东京，1941年12月8日

阁下：

谨通知阁下，自今日起，贵国与日本之间已进入战争状态。

我就此机会向阁下重表最崇高的敬意。

外务大臣　东乡茂德

美利坚合众国驻东京特命全权大使

约瑟夫·克拉克·格鲁阁下。

大野读完后，克罗克说："这是个很可悲的时刻，"大野答道："是的；我这个任务可厌极了。"

500

大野接着又念下述声明的译文，这是日本当局拟的有关大使馆及其职能的几项规定：

1941年12月8日，大野先生向克罗克先生宣读了下述声明：

（1）大使馆及各领事馆的职能，自今天起停止。

（2）大使馆及各领事馆的人员，将按国际惯例给予保护并给予生活上的便利。

（3）为获得上述保护和便利，建议使馆全体人员集中住在使馆围墙内。

（4）与外面通信，包括电话和电报，一律停止。凡有人要外出，均须通过即将派驻馆前的官员增尾联络官取得外务省的许可。他已随我来到此地。

（5）代表贵国利益的国家确定后，即允许贵使馆与该国代表建立为代表贵国利益所需要的联系。

（6）对于保护美国公民，正在给予应有的注意。

（7）所有无线电发报机，一律立刻交出。

（8）短波无线电接收机，不许再用，无论公私，一律交出。

（9）关于战争状态的通知，可用明码电报转告贵国政府，电报可通过联络官拍发。

表扬大使馆日籍雇员

1941年12月12日

我馆日籍雇员的品格，真是夸不胜夸。他们全部表示希望留下，直到我们启程回国，但因不许他们在受雇于美国政府期间外出，也不许与家属通讯和回家，所以我们只得解雇一些任务不十分必要的雇员。预计终归是得全部解雇的。防止房屋庭园损坏，维修机械和设备，仍旧需要相当多的人，盼望将来代管美国利益的使馆能作出安排，雇用我们的日籍雇员。

501

我恳求国务院允许我同时向这些雇员——在极困难的境况下他们的忠诚和责任感亦异乎寻常——保证，我国政府将给被解雇者以足够的补偿，并将设法在战争期间继续雇用那几个老人。送信长在使馆工作近四十年之久，还有好些人亦已受雇十年或十年以上。

苦中作乐

1941年12月13日

馆员们想在今天星期六晚上在办公处公用室开个舞会，我虽希望采取一切适当可行的步骤保持他们的士气，但还是否决了开舞会的想法，因为我觉得，在此严重时刻，给正在馆内转来转去的警察造成一种印象，以为我们这些使馆中人是以轻率的态度对待局势，是很不明智的。我知道，跳舞本身决无害处，但不幸的是，只要有跳舞的念头，就总是会给人以心情愉快的印象，而我们此刻的心情又决非轻松愉快。其他一切消遣和保持士气的办法我都赞成。

这样，在鲁思·凯利的布置和得力管理下，公用室便成了著名的"游乐场"，给馆员们提供了一个舒适的聚会场所，有敞开的炉火、大安乐椅、玩音乐的钢琴和留声机、打桥牌和扑克的桌子、麻将牌、象棋，还有图书杂志。艾丽斯午饭后几乎每天下午都打桥牌。

此外，我们的海军助理武官斯通中校还在庭院下部巧妙地布置了一个高尔夫球场，可以玩"慢击"和"轻击"，使我们有机会练习和消遣。启用球场时还正式举行了开幕式和比赛，波伦得胜。球场被命名为"大东亚黑硫温泉高尔夫球选手球场"，据说驻华盛顿的日本人是拘留在白硫温泉，我们这个球场如此命名，实有调侃之意。

由瑞士使馆代管

1941 年 12 月 14 日

瑞士公使戈惹先生 9 日接到他的政府的通知，美国在日本的利益将由他照管，但直到昨夜(13 日)他才被允许和我会面，今天早晨来此。我们看见他的车来到门口，警察却不许进门，他只得转赴外务省，请求打电话通知警察。外务省与警察当局之互不通气，事例很多，这只是其中之一。

门终于开了，公使的车也开进来了，警察还是禁止杜曼与公使讲话。但是杜曼迅速给馆员们传了话，馆员们来到庭院，当公使下车时，他们向公使欢呼。警察气坏了，试图制止，欢呼却反而更加热烈，把警察弄得束手无策。杜曼用手指碰了一下嘴唇，向公使暗示他不能讲话，公使遂由一大批警察簇拥着来到大使官邸，一个警察在其前，两个在其左右，一两个在其后面。把我们视为囚徒，当作罪犯对待，这显然从一开始就是警察当局的态度，约近三周后，由于公使抗议，他们被撵到馆外，并被告知不得如此苛刻，这时他们又转为怒恼，并想拿我们出气，做了许多小动作。他们已经丢了面子啦。

在这以前，即头三周，警察在使馆院内串来串去，随意进入办公处和私人住房，在大使官邸窗前窥视，有一次还走进客厅，监视捆扎行李，经请求才退出去。各处设立岗亭，有一次我挟着一包东西去办公处，就看见一个警察在他的笔记本上登录。文明世界的国际外交惯例，就这样全然不予理睬。还有种种刁难，幸亏被拘留前刚好收到旧金山“联合食品公司”寄来的一大批罐头食品，要不然，后果真不堪设想。让我们得到的取暖用油，微乎其微，为了节约，我们几乎冻僵了。

最初还不准杜曼参加我和瑞士公使的商谈，但不久他就冲破了障碍，经常列席。公使每两三天来一次，他具有条理分明的组织意识，深明按外交惯例我们应享有什么权利，我们旋即庆幸有这样一个坚强人物当我们的代表者。凡有苦诉，他都记下来，向佐藤或西提出抗议，且终于收到显著效果。前外相佐藤受命主持一个委员会，专门处理我们的问题，但他优柔寡断，令人大失所望。西外务次官则较能合作，也比较明理。在对待我们的问题上，外务省和警察当局之互相隔离，号令不一，全盘暴露，再也找不到更突出的例子了。

日本下级官吏的行动

1941 年 12 月 16 日(摘自杜曼的日记)

今天还算平静无事，不过有件事值得一记，因为它正暴露了日本人的无决断、易变和幼稚。现在我们的值日官已在办公处大厅里设了一张办公桌，工作两天了，真是好得很，除了提供一个极有用的情报中心、兼充传达室并办其他事而外，还立刻起了加强大家的秩序纪律观念的作用。因为我们每二十四小时只能匀出够开两小时暖气的燃料，所以正门必须经常关上，为此还特意出了一张大的用英日文字写的条子。值日官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提醒进出不注意关门的人回去把它关上。今天白天来了一个穿制服的日本警官，军刀在腰间锒铛作响，砰地把门打开，阔步穿过门廊，朝外务省联络官增尾的办公室走去。值日官很客气地对他讲，请把门关上。警官停在原地，显然踌躇了一下，才转回去关门。当时我们没有把此事放在心上，但约六小时后，我们又得想这件事了。晚上10时顷，大使馆译员藤本跑来找我，有点慌张，说首席警官叫他来告诉我，必须取消值日官的设置，撤掉办公桌，理由是，日本政府已下令停

504

止大使馆的职能，因此任何馆员均不得执行任何职务、行使任何权力；十分明显，被请回去关门的那个警官当时是吃了一惊，一下子作不出拒不听从的决定，所以去把门关了。可是回到办公室一思量，一个想法便浮上心来：他被一个馆员支使了，这岂能容忍。他很可能又想到布告板上的通告，上面列有值日官的任务，其中之一是："监督整理(policing)房舍的内务"。熟悉美国军队习语的人都知道，"policing"一词，不过是指打扫、整理内务而已。但这个日本人必定以为我们是在授权给值日官，要他监督日本的警务——这简直是无法容忍的侮辱。还有一种可能，下午10时以前，这个警官自己左思右想，谅必还跟气愤的同事们谈过，搞了约六小时，大概又喝了两杯，这才把心一横，要干掉这个值日官制度。但他行动时又不通过正当途径，即通过外务省联络员，给大使一份书面文件。要这样办，就必须作出不可改变的决定，僭取权力，他是不肯这样做的。于是他就大要典型的日本式的把戏，施展威吓，看是否能够奏效。

不管是怎么搞的，内德·克罗克叫藤本去回答，在请示大使以前，什么也办不到。我们的打算是置之不理，静候发展。不过克罗克还是把布告板上的通告取下来重新写过，把"policing"改为"cleaning"〔打扫〕，另外措词，以免再有会引起日本人反感的字眼。

结果值日官还是没有取消。

圣诞前夕和圣诞节

505

1941年12月24和25日

这个圣诞前夕令人难忘。吉恩·杜曼为晚餐贡献了一只弗吉尼亚糖腌火腿，这是他一直留着备特殊时节用的，内德·克罗克则带来两瓶1933年制的"伯恩卡斯勒·多克托"美酒。简和汉克·

史密斯-赫顿夫妇、科尔斯小姐、威廉斯、特纳、本宁霍夫、波伦、克雷斯韦尔等均在座。我代表艾丽斯和我本人以香槟祝酒：一敬全体受委任和非受委任的馆员，对他们在此艰难时刻的杰出的组织能力、首创精神、深思熟虑和广泛的帮助深表感佩，且将铭记在心；二祝他们留在国内的夫人们，希望她们早日得与丈夫欢聚，愿上帝保佑她们。杜曼致答词，情意感人。

有些朋友陆续送花来，法国大使的夫人约朗德·阿塞尼-亨利致艾丽斯美简一封，还有纪念品，西外务次官的夫人晚餐前给艾丽斯送来两只火鸡，这是西表示私谊的一种方式，此举值得深谢。全体馆员也向艾丽斯和我赠花，多好的属员啊！

但这天真正动人的事是发生在晚饭之后，馆员约三、四十人——几乎全馆出动——走上坡来，向我们住在官邸的人唱圣诞赞美诗和颂歌。先在大厅里唱拉丁文的《来吧，信徒们》，然后唱着德文的《神圣之夜》，慢慢走进凉廊。这是自发的行动，因为他们只练习过一次，但在本宁霍夫指挥下唱得确是美妙。艾丽斯和我都深受感动；她甚至痛哭失声，可怜的老伴，我却得抑制自己。他们继续唱了一阵，最后慢慢离去，出去时以最轻音再唱英文的《神圣之夜》，下坡时再用英语唱《来吧，信徒们》。这是我们将永志不忘的一夜。后来馆员们仍继续在办公处公用室唱歌和弹钢琴，我相信，这一晚定能给他们久被压抑的感情和那些士气正受着严峻考验的人提供一个健康的排遣机会。

圣　诞　节

506　天气晴朗宜人，中午在太阳下和暖如春。艾丽斯发了几天的膝关节痛，今天好了一些，我们照常带着萨沙和米基两犬在草坪上散步，她觉得很舒服。被拘留已经十八天了，第一次收到几份《日

本时报和广告报》，读起来虽不是特别令人高兴，但日本人传来的那些陆海军捷报我们并不完全相信。我仍旧坚信德国终必崩溃，一旦德军开始瓦解，最后结果的苗头就会显现出来，因为，德国退出舞台后，力量不断增强的美英海空军就可以全部用来打日本，它之终必败亡，就将成为明摆着的现实，那时恐怕连那些目空一切、凶猛好斗的日本人也不会看不到。这当然是主观愿望，但也是言之有据的，因为我深知德国人的特性。1918 年的景象很可能重演，希特勒估计错误而进攻苏俄，将证明是自取灭亡。历史将会证实这个预言。

一如过圣诞前夕，正是因为有现在的处境以及这种处境激发起来的同舟共济的精神，我们过了一个在东京这么多年来从未这样过过的圣诞节。阿诺德小姐及其共炊伙伴斯库兰太太、加德纳小姐、普莱费尔太太、约翰逊和斯图尔特两上尉都前来官邸参加酒会，下午 1 时又共进圣诞美餐，菜肴有西夫人送来的火鸡和内德·克罗克贡献的泡热白兰地酒的葡萄干布丁。大家互赠礼品，通过一个友好的警察，我给艾丽斯弄来两盆优美的兰花，看来他是找遍全城才买到的。

4 时，我们的仆人下田、深谷、船山和加藤接到通知，准他们的家属进使馆，他们遂在办公处前面欢聚，其状十分动人。自从我们被拘留，他们就不能同家人通话了。

此后我们便在公用室的圣诞树前聚会。我们有两棵圣诞树，一棵摆在官邸，一棵摆在办公处，这原是下面院墙边挡住房屋光线的两棵树，吉恩·杜曼叫人砍来，挂上往年剩下来的装饰物。开头是副领事戴维·托马森和我弹钢琴，然后大家唱圣诞赞美诗和颂歌，最后是古尔德上尉扮的圣诞老人出现，向大家分赠礼品，朗诵优美悦耳的诗句。他表演得很精彩，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聚会。507

圣诞庆祝到此结束，这事我们永远都会记忆犹新。

交换外交人员已有安排

1941 年 12 月 30 日

瑞士公使告诉我们，日本政府已接受我们提出的在洛伦索-马贵斯交换外交官的建议，现正把它的说明细节的照会译成法文，这个照会公使说他将立即经伯尔尼电转华盛顿。这样看来，事情终于似有进展。根据杜曼的好建议，我即召集馆员开会，把消息告诉他们，他们一闻此讯，便高声欢呼；这将有助于维持士气。在横滨和旧金山两地直接交换外交官之议，日本外务省已放弃(此议它自己就从未认真对待)，因为日本陆海军当局断然拒绝考虑让一艘美国船开进日本水域。

我把一只装外交团团长文件的大金属箱子交给公使，请他交给新团长阿塞尼-亨利，在转交以前，须先去外务省，请木内检查这些文件，让他们放心，我们没有把别的文件夹在里面偷送给法国大使馆。还得由一个日本官员偕戈葱一起坐车去外务省。警察对我们施加的隔离措施已登峰造极。

轴心国外交官不大乐意让法国大使当外交团团长，比较喜欢资历次一级的巴西大使，阿塞尼-亨利是否当得成，还得等着瞧。

有些日本朋友忠实如故

1941 年 12 月 31 日

有个日本朋友来看我。他说，两国间爆发战争时，他痛心疾首，所以未能早来。他代朋友们向我殷切致意，还捎来两封日本友人的信。他说，拘留的头两周警察苛待我们，是由于战争来得太突然；没有作过任何应付这种紧急情况的计划，所以起初政府各机关

之间就毫无协调可言。我说，现在已有显著的改善，但我们所受的待遇依旧是罪囚的待遇，与日本驻美大使及其属员和领事馆人员所受的体恤和宽待一点也不相称。

下面是那两封信：

东京，1941年12月17日

亲爱的格鲁先生和夫人：

近年来虽发生了很多不幸事件，但两国间长期的友好关系竟得到这样一个悲惨的结局，谁也没有料到。我记得很清楚，你常对我说，增进我们两国的友谊，乃是你的终身事业。我还知道，为使华盛顿会谈不致破裂，你是多么努力，直到最后一刻。你那样的不懈努力也不能拯救和平，确是令人痛心。但你可以永远相信，你对我国和我们的情谊，我们决不会忘记。在结束这封信以前，我还得说一件事。夏天每天我在我妻子的病榻前对她讲华盛顿会谈进展情况的时候，她总是尽量绷紧她那柔弱的神经，全力倾听，务使一字不漏。我们好友关系的这种悲剧结局她在生时没有得见，这倒是她的幸福。

感谢你对我和我全家的深情厚意。

某某谨上

东京，1941年12月30日

亲爱的格鲁先生：

我是带着很沉痛的心情写这封信的。尽管我们为防止关系破裂作了真诚不懈的努力，可怕的事变终于还是发生了。导致这场战争的原因和形势，我不想多说，我只希望，目前的斗争也许原不过是两国长期友好关系史上的一个短短的插曲，很快就能重修旧好。

你和格鲁夫人，凭你们长达九年的精明能干的工作，已在

我的同胞中获得了很多朋友。正如你所深知，轻易忘却朋友，尤其是象你们那样的令人敬佩的朋友，并不是我们日本人的习性。请你相信，我们有很多人对你们的艰难处境深抱同情。

509

得享你那宽仁厚道的友情，我引为莫大荣幸，这恐怕是用不着说的了。但愿我们又会有为增进两国关系而再次精诚合作的一天，我只切盼这个好日子很快到来。

我已调职，日内即动身赴任。恭贺新禧，并祝归途平安。

某某谨上

除夕在办公处进自助晚餐。11时59分，把灯关了，齐唱《怀想当年》①。灯再亮时，古尔德上尉扮作“时间老人”出现在人丛中；他简单致词，大家又手挽手地再唱《怀想当年》。艾丽斯和我却在10时半左右就走开了，没有守岁。我们觉得没有什么可守候的，没有那种心境。

新年开始

1942年1月1日

天朗气清。早晨下办公处给馆员们拜年，又向负责保护使馆的巡查部长清河及其属下九个警官道贺。1936年“二·二六”事件时清河也守护过使馆，以后还和我坐车出去玩过。他向我提起那个时候，说那时我送过他一只银烟盒。清河说，这场战争是国与国之战，不是个人之间的战争。

瑞士公使来访，他马上就要去皇宫参加新年招待会，这次招待会，就外交团来说，我想规模一定要比往年小一些。戈惹说，日方虽已接受了我方提出的在洛伦索-马贵斯交换外交人员的建议，但他们有些人又想改在塔希提岛，去那里，航程要短得多。戈惹说，

① Auld Lang Syne，亦译《往昔的时光》。——译者

此议他将转告华盛顿，作为来自日方的一个建议。外务省已写了一个照会给他，详述交换事宜，他给了我们一份照会的副本。

一击入穴

510

1942年1月4日

在使馆高尔夫球场上打球，我一击就把球打入穴中，在这里打球以来，这是第一次。球场长四二二码，有九个洞穴，穴边还有小小的终打区，一应俱全。有一击须翻过或绕过住房，若想平直打过屋顶，就有危险，不过迄今为止只打坏过一个窗子。反光池塘里的鱼现在快活了——假如它们喜欢玩球的话。

每餐总有十至十四人同桌，幸喜我们是一群志趣相投的人。不和我们同膳的职员和其他馆员也经常轮流上来吃一餐，这样保持联系。艾丽斯亦常去办公处看看供应部门或公用室，去拜望各个寓所。

“我们依然很忙”

1942年1月9日

昨夜外务省失火，房屋差不多烧掉一半。有关我们最后撤退的那些文件，想必也烧毁了一些。虽然瑞士公使可以按他自己的记录提供复本，但这样一来，已经耽延的事恐怕更要推迟了。不过我们还算过得舒适，只是屋子太冷，因为必须节约燃料（直到傍晚才敢开暖气）。日子过得很快。早上我从早餐后一直工作到11时半；然后打一小时左右的高尔夫球，为的是运动一下，呼吸一点新鲜空气；夜间早睡。有充裕的时间看书。刚看完克罗宁的《王国的钥匙》，真是一本好书。

交　　换

1942年1月16日

瑞士公使带来了日方对我国政府关于在洛伦索-马贵斯交换外交人员的建议的答复。交换地点是接受了，但在波伦所拟备忘录中议及的两项提案上却有许多异议。我召集全体馆员开会，把谈判所取得的进展告诉他们，对他们保持高昂的士气和卓绝的和衷共济的精神再次表示赞佩。

511

1942年1月18日

依艾丽斯的建议，本星期日晨我们有许多人在办公处音乐室聚会，唱了好几首大家最爱唱的赞美诗，琼斯弹钢琴，本宁霍夫当指挥。马里恩·阿诺德的清亮的嗓音十分悦耳。

因闲时较多，大有读书的机会。约翰·梅斯菲尔德的《曙鸟》已看完第二遍，这是古今描写海洋的最伟大的史诗之一，不可不读。又看完了达格代尔夫人写的鲍尔弗的传记第二卷，现在正在看杰塞普教授写的伊莱休·鲁特的传记。西奥多·罗斯福处理远东问题，鲁特曾参与其事，在现在这个时刻，关于他的言论和行动，读起来特别有味。

1942年1月19日

瑞士公使戈惹和他的夫人——她终于被允许来看艾丽斯——今晨来访，两位夫人倾谈约两小时。其间许多日本朋友和另外一些人送来鲜花和水果，共二十二批，还有一些人想送，但未能获准。有几个外交界的同僚也送花来。

1942年1月20日

现在日本报纸那种得意忘形的自吹自擂，读起来真是令人恶心。我正准备带两整套12月8日以来的《日本时报和广告报》回去，一套送国务院，一套留给自己。

1942年1月22日

在高尔夫球赛中胜斯通一筹，但不久就被鲍勃·费尔里打败了。本宁霍夫在一场紧张的羽毛球决赛中战胜了拉姆。此外还有桥牌、象棋、跳棋等比赛。我们总是搞得很热闹。

我为我的私人秘书鲍勃·费尔里感到自豪，他是马萨诸塞州劳伦斯主教的孙子，非常称职。由于缺乏洗衣设备，每个馆员，不论男女，都是自己洗涤，场地下半部看去就象后院一样，晾满了衣服和寝具。费尔里却在官邸搁楼上找到一部旧洗衣机，于是他便在拉斯塔德帮助下每天为全体馆员浆洗两次。他还是他那座公寓的防空监视人兼体育指导员，另外还轮流当值日官和主持整理办公处的内务。顺便提一下，他还是个电学家、无线电专家和飞行员，曾作过五百多次跳伞。这些本领都是在哈佛念书时暑假期间学的。真是个精明能干而又热心公益的青年，前途未可限量。

512

1942年1月24日

荷兰公使帕布斯特将军因心脏病今天死在圣路加医院。他从1923年起当驻日公使，在此以前早已任公使馆的陆军武官，是这里资格最老的外交家。一如克雷吉和罗默，他是我最亲密的同僚之一。他是个典型的固执的荷兰人，但为人谦和，与我心性相投。我将永远怀念他，把他看作我在日本结识的寥寥几个最值得尊敬的朋友之一。他的突然去世，使我非常难过，但对他来说，这倒是个幸福的解脱，因为，我想他没有什么亲人，又是鳏居，战争造成的事

态必定更加深他的愁苦。

1942年1月25日

星期日又唱赞美诗，现在这要成为定例了。这类聚会颇有鼓舞士气的作用。日子过得很快，星期日与星期日之间的间隔好象很短。我们一点也不感觉厌烦，至少我没有这种感觉，我相信很多人也和我一样，特别是那些可以做点学问而以此自娱的人。

杜曼正忙于写一本很有趣的书，根据网球家堀田伯爵提供的日本文献讲一些汤森·哈里斯出使日本的轶事，堀田是一个在哈里斯那个时代相当于外务大臣的日本高官的后裔。那时日本官僚、特别是警察当局的心理，和今天我们这些使馆中人遇到的，何其相似，看到这一点分外有趣。

513 在馆员中，我确实感到遗憾的只是极少数馆员，这些人没有求学问的兴趣，极少或毫无常读有益书籍的劲头。大多数人都忙于办公处和院子里的日常勤务，甚至还得承担离职打杂女工的活，每晨轮流擦洗和打扫。但有些馆员恐怕是太离不开纯交际活动了，这种人必定有感到厌烦的时候。

帕布斯特将军的丧礼

1942年1月29日

瑞士公使又来过。他通常都有许多问题要讨论，但每隔几天总要来一次，以便保持联系。照管我们的利益，不可能有比他更合适的人了。他敏于观察形势，办事讲求实际，性格坚强，又十分谨慎，力求使他的功用不因采用不适当或非正统的办事程序而受到损害。同时他的助手豪希——他也常来——也是个务实的人。他们的态度，使我清楚地想起了1917和1918年照管德国利益的瑞

士驻美临时代办，那时我是国务院西欧司司长，他常来国务院找我，几乎每天都要讨论一大串问题。

今天在圣路加医院附属教堂为帕布斯特将军举行丧礼。日本政府已作了安排，每个敌国使馆可以派一人参加。在外务省官员增尾和巡佐清河陪同下，五十二天以来我第一次走出使馆。我从挂有丧帘的侧门走进圣路加医院，马上就被领进教堂，没有跟任何人讲话的机会。我想悄悄溜进后排，但正在当招待的岸却热情招呼我，把我引到右边第二排靠通道的座位上。在右边第一排就座的是照管荷兰利益的瑞典公使巴格和荷兰临时代办鲁奇林夫妇及荷兰公使馆的其他人员。我们这一排也有一些荷兰使馆的人员，另外就是罗伯特·克雷吉爵士夫妇，我们后面是比利时大使福托姆夫妇，秘鲁、哥伦比亚、希腊和其他现正与日本交战或已与日本断交的国家的使节。

514

左边第一排是西外务次官、广田、佐藤和币原，币原迟到，走路拄拐棍，摇摇晃晃，显已老态龙钟。他们后面是阿塞尼-亨利夫妇，他是以外交团团长的身份坐在那里的，再后是蒂利茨夫妇、戈惹夫妇、智利公使、阿根廷代办和所有非敌国的外交官。还有很多日本人。礼拜式全用日语，只有荷兰牧师致词时用荷兰语，又用英语说一遍。末尾是一个荷兰人来到风琴前，奏荷兰国歌。

巴格公使和鲁奇林夫妇先走；我随即被带引出来，恐怕所有敌国外交官都是这样带出来的，以防彼此交谈。我和巴格及鲁奇林夫妇握手后，立即上车。正要走时，克雷吉夫妇出现了，我只和他们说了一句话，不过寒暄而已，另外就是说了一声“船上见”。本想停下来聊一聊，但警察表示过，任何谈话，特别是和克雷吉交谈，将会给他们带来很大麻烦，所以只得作罢。艾丽斯虽也接到外务省的邀请，但没有去参加葬礼，后来我们间接听到日本朋友说，她的敏感可以理解，亦应感谢。

新加坡陷落

1942年2月15日

新加坡——现称“昭南”——失陷了。这新名字兼有“昭和时代”和“南进”之意。这是个沉重打击，但我仅视之为一时的打击。日本人终必撤出一切非法占领的地区；日本列岛本身易遭攻击；他们的海军和有限的商船经不起消耗，终必削弱，总有一天我们可以有效地封锁日本，把它的本土和南方占领区完全隔开。到它在海上决战失败，或者俄国参战，或者德国垮台，也许要等很长时间，但在任务完成以前，我们决不会罢手。

1942年2月16日

瑞士公使带来一份最新的我国政府关于撤退外交人员的照515 会。照会是通过西班牙渠道寄来的，从华盛顿发出的日期是2月5日，已经迟误好几天了。看来定是外务省的太田把它扣了五天之后主管此事的佐藤才知道有此文件。戈惹非常气愤，认为谈判已不让他过问，至少没有经伯尔尼通知他有照会到来。看样子必是日方要我国政府把谈判渠道集中到西班牙方面来，可是佐藤又对戈惹说并无此事。我猜想，这不过是外务省惯有的缺乏协调的又一次表现。

一件事就大可以说明日本人想问题、办交涉是多么迂缓：瑞士公使为替我们把汽车、酒等什物卖给外交界同僚，曾与日方多次商谈，皆无结果，这点点事竟拖了两个多月才终于作出安排。

今天日本人正忙于庆祝新加坡陷落，一大排队伍来到我们使馆前示威，英国使馆门前想必也有人示威。助理陆军武官巴布科克少校跑出去站在阳台上向示威者挥手。示威者也欢笑着挥动手帕

迴敬，领队人尽力制止这种友好的表示，大家却反而大笑起来，走过去以后仍笑声不绝。

尽管大搞战争宣传，民众对美国似乎还是没有什么深仇大恨。我们还从各方面获悉，日本虽取得一些初步战果，民众仍在自问，美国有无穷无尽的资源，日本究竟是否真能打胜。

必须彻底打败日本

1942年2月17日

今天我召集全体馆员开会，把谈判撤退事宜所取得的进展告诉他们。我还对他们说，我绝对相信，目前的日子虽然暗淡，我国终必获胜，我给他们念了下面这段日记：

> 我们即将回国参加工作，凡能对美国在这次世界战争中终必获得的胜利有所贡献的工作，不论是奉到适当的号召，或是遇到机会，我们都要承担。我们是带着坚定的信念回去的：轴心国虽获得初步胜利，但它们之终将失败，终将受到严酷无情的清算，是确实无疑的，其确实有如引力定律。为了日本自身的利益，为了美国未来的安全和幸福，为了世界文明的安全和幸福，必须彻底打败日本，因为，在目前情况下，只有这样，才能使它的军队、军事机构、军事体制声誉扫地并受到清算，才能使日本民族永远走上和平的道路。不管这个过程有多长，不管需要美国人流多少"血、汗、泪"，都必须最终地、有效地完成这个基本任务，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在太平洋区域，一个爱好和平的美国和一个穷兵黩武的日本不能并存。

516

任驻日大使十周年

1942年2月19日

十年前的今天，受命出使日本。这是有趣的十年。使命虽终于失败，但即使从这些事件看，我现在也不肯抛弃这十年的经验。

历史的教训

历史当然是以事实为根据，以当时的有助于阐明这些事实的评论为根据。可是，人类若不汲取历史教训，在治国方略上得到积极的指引，研究历史还是没有益处。文明的某些方面的飞速发展，特别是科学、经济、交通和运输的发展，已使一国的闭关自守成了时代错误。世界各国已紧密相连，结为一体，以至正如我国政府近年常说的，两国或数国之间一旦发生战争，就会打乱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世界经济，因而引起所有其他国家的关注。世界各地一出现势将或即将导致战争的局势，我国政府即表示关切，原因就在这里。

不过，对这类局势在道义上或实际上进行干预的权利，必然带上一种义务：我们当然不能一方面以事关我国利益为由，对国际间517可能导致战争的局势行使道义或实际干预的权利，而另一方面，却对造成这种局势的条件漠不关心。今天各国互相依存，这是个事实，不是理论：在现在这样一个紧密相连的世界里，每个国家的政策和行动，都会产生波及世界五大洲和七大洋的影响。用征服的手段夺取和预先占据其资源应供大家利用的地区，是不能允许的。然而，只要任何一国实行排斥别人、保护自己、增进一己之利的政策，不热心于帮助解决别国——其福利亦为现存世界经济的运转所必需——的问题，文明的进展和人类的幸福就会因无益的战争迭起

而不断受到阻碍。

在今天和明天的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可以“自顾自”，因为邻国——所有邻国——的问题必然会变成它的切身问题的一部分。明智的治国之士必须承认，“光荣孤立主义”或集团孤立主义的实际威力，已经永远消逝了。在我国未来外交、政治、立法等各方面的政策和行动中，要是我们不能领会历史的教训，认识不到过去曾经失掉许多机会，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就必定仍旧会错过良机，不能运用我们物质的、道义的无限国力去发展文明和增进我们本国人民的福利而无须耗费生命财富于无益的战争。

十足的拦路抢劫

1942年2月21日

瑞士公使今天又来过，告诉我们，变卖汽车、酒等什物的事现在要全盘重新考虑了，因为大藏省坚持要瑞士公使将卖得的钱存入横滨正金银行，另立帐户，和他的公事费用的帐目分开。准我们取款，应付日常开支，但是，我们一走，这笔钱就要冻结，不许公使取用而把我们各人的钱在华盛顿记入我们帐户的贷方。诚如公使向木内指出的，这等于没收。我决不愿在这种条件下变卖我的汽车和酒，我请公使暂缓办理此事，只将实情报告华盛顿。 518

这是十足的拦路抢劫。大藏省、内务省、陆军省都已决心径直决定一切问题，不商诸外务省，不考虑国际惯例。据说，外务省并非未曾得过主持外交的机会，但已失败，它太丢脸了，所以现在必须靠边站。有个日本外交官的太太告诉戈惹，她的丈夫很气闷，想离开，因为他被置于这样一种境地：受权向公使作了一些保证，后来由于别部改变决定，又不得不收回保证。例如，在大藏省看来，照管大使馆及其人员的财物的应是大藏省而不是瑞士公使，一切

处理这些财物的事都要由它决定。这当然是荒谬的，戈慈十分正确地向木内指出，如果真是那样，大使馆人员就没有什么被保护的合法权利了，因为他们不能诉诸日本法庭。可是其他各部仍旧独断专行，不和外务省商量，不理国际法和国际惯例。

还有一点，横滨警察当局不让瑞士代表去察看一个敌侨拘留营，只许侨民派两个代表来警察署见瑞士代表。这当然是违反一切国际惯例的，并且意味着那个拘留营有问题。警察当然会警告侨民代表，不要诉苦，否则就要对他们更不客气。上次大战期间德国并没有这类禁令，我们常去看设在鲁勒本的拘留营，至少每周一次。日本其他地区却允许瑞士人单独和被拘留者谈话，不受警官监视。看来又是各不相照，每个警官都可以自作主张，自行其是。

华盛顿诞辰

1942年2月22日

华盛顿生日，星期六。唱完赞美诗，又唱《共和国战歌》，然后唱国歌。11时半，邀请全体馆员来官邸聚会，我提议为总统的健康干杯。

519

日本必败

1942年2月28日

由于日本正不断扩展其征服地，由于同盟国的帐上至今仍无收益可以列入贷方，盟国之终必胜利，日本之终必失败，遂难以预见。可是日本最后必败，我却没有丝毫怀疑。我已经说过，据我看，日本之必败，其确实有如引力定律。

未经事实证明的预言，也许不过是痴人说梦，但对最后结果，

我有我的想法，大致如下。或因经济解体，特别是石油匮乏，或因发生革命——可能由被占领国首先发难，德国终将垮台。根据长期经验，我了解德国人的特性：志得意满时，是嚣张的恶霸，形势逆转，就会一变而为懦夫和哀声泣诉的失败主义者。食物和原料的供应紧张，必将日益加剧。不论在俄国或在别的地方，一旦军队不再连续得胜，瓦解之势就会急转直下。士气将会垮下来，末日就不远了。来自俄国战场上的伤亡名单将产生其应有的后果，戈培尔的宣传谎言总有不再能支撑士气的一天，民心总有涣散的时候，这一天说不定很快就会到来。丘吉尔最近说，胜利之来，也许要比原来预料的快，这样乐观的话从他口里说出来，可不寻常，因为他一向总是爱描绘局势的阴暗面，我想他说这话时是想到上述情况的，而且很可能还握有德国军民即将解体的证据。

德国一退出舞台，意大利自然也就随之退场，留下来的将是日本单枪匹马对付美英海空联军的局面，也许还要加上苏俄。那时假如苏俄参战——很难设想它会放过收复失地而使自己永久处于不败之地的机会——问题就大大简化了，因为，盟国海空军以海参崴为基地，就可以迅速封锁日本本土，轰炸它的城市，摧毁它的船舶，完全掐断它的生命线以及它同国外军队的联系。最后甚至可以占领日本。 520

即使苏俄保持中立，要等英美获得全胜后才来解决它自己与日本的问题，完全摆脱了大西洋战事的美英联合海军也一定至少能够在打得到日本的距离内收复一些基地，它们的潜艇和飞机仍旧可以由此截断它的航运，封锁日本列岛。

当然，德国退场后，日本政府也不会看不到战争的必然结果，为了救它的城市，为使商船——经逐渐损耗后要是还有的话——不致全毁，很可能在轴心国垮台后就乞降。但我们得警惕，不要过早地议和。

再讲欧洲，我看，德国一开始有崩溃之象，被占领国人民，包括法国人民，定会普遍起义。那时土耳其很可能参战，罗马尼亚则很可能背弃轴心国而打匈牙利，以夺取特兰西瓦尼亚。意大利也将很快从舞台上消失。

上述一切当然是把未来的图象描写得很美，但我觉得这些假设并不是强词夺理。纵使结局不会来得象我们所希望的那样快，轴心国倒台后，终必导致我国全胜的进程，仍将立即开始。

美国北方佬的回忆往事

1942年3月10日

父亲诞生一百周年。他生于1842年3月10日。正餐时我举杯祝酒，以资纪念，并略致短词，提到一些往事。其中说了我祖父的一件轶事，他临终时在病榻上老为一个问题烦恼着，快咽气时终于说出来了：有天早上(我记得是个元旦日，他要照例送书，作为礼物)，他从海德公园来波士顿时，忘了带钱包，遂在火车上向列车员借了五分钱付马车费；他要在死前嘱妥，这笔债一定要还。后来确实还了。

521

再记一点大使馆的事：社交及其他

1942年3月24日

有个牙齿坏了，镶边脱落，去牙医小谷大夫处就诊。遇见英国大使馆的豪斯顿-博斯韦尔和肯尼迪夫妇，谈了一会；这个诊所我们称之为东京社交俱乐部，因为在这里常常会碰见一些外交界同僚。

我们有个叫藤本的译员，是个十足的、非双重国籍的美国公

民，今天竟被警察从大使馆拐走而加以逮捕，罪名是违犯日本法律，究竟犯了什么法，我们不知道。最后一次看见他是在他送一个警察出门的时候。一定是警察诈称有人找他，一到门外就悄悄把他抓走了。他的妻儿还在大使馆。他的家族要他留在日本，但他决定要和我一起走，回美国那个家。后来他给他妻子来了一封信，说他早已决定留在日本，我们却认为，这定是警察对他施了压力。瑞士公使已提出强硬抗议，但迄今尚无结果。外务省说，它正在等司法省的报告。这不过是日本警察加诸我们的又一次暴行。

一个美国出生的日本人愿意留在日本

1942年3月25日

杜曼的生日。开茶会，吃蛋糕，举杯祝他健康。我讲了几句话，大意是，再也找不出比他更能干的参谋长、比他更好的行政官了，他经常想的，都不外是如何为我们集体和个人谋福利。后来他对我说，他太感动了，除应付几句、草草了事而外，不知说什么好。

关于那个美国出生的日本人愿意留在日本一事，杜曼的日记有所叙述，现又摘录如下：

> 昨晚将近6时，本宁霍夫向我报告说，译员藤本失踪了。藤本是在美国出生的，原持双重国籍，几年前返美时已放弃日本国籍。后又回到日本，从此就一直是大使馆的人员。
>
> 据本宁霍夫说，最后看见藤本是在上午10时半。他妻子虽已发现他不在，但也不怎么惊慌，到下午3时左右，她才紧张起来，跑来报告本宁霍夫，说找不到她的丈夫。本宁霍夫和特纳随即到处寻觅，搜遍各房舍和场地，均杳无踪影。本宁霍夫便去找驻使馆警察队队长清河。他见清河正在办公文，问他是否知道藤本在哪里。清河继续写他的公文，头都不抬，只问

了一声："他不在这里吗？"本宁霍夫把怎么找也找不着的情况讲了一遍，并说藤本显然不在使馆内了。清河一直只顾写他的，没有抬头望过一眼。平时有谁不告知清河而擅自离馆，他定会激动万分，可是这次藤本失踪，他却漠然置之。本宁霍夫明白了，这事清河是晓得的。

本宁霍夫来报后，我立即往见清河，问他，藤本的失踪，他是否多少知道一点。清河直视着我，说他一点也不知道，但可以打电话问警视厅。他走进隔壁放电话的房间，通过开着的门，我听见他在电话上说，我正在询问藤本的事，又听见他请示，他应该采取什么态度。他很快又回到原来的房间，说这就去警视厅，调查此事。我要清河马上打电话给瑞士公使，请公使来见大使。清河火了，说他没有义务服从我的命令，说罢扬长而去。

晚饭后，大使给我一张条子，要请瑞士公使今晨一早就来，我拿着条子去找值班的警察，问他是否允许立刻送这张条子给瑞士公使。他又打电话问警视厅，然后告诉我，条子要到今晨才能送。

今晨清河一到使馆，我就问他藤本的事可有什么消息。清河此时说，他能告诉我的情况只是，藤本已经被捕了。我告诉清河，昨晚他矢口否认知道此事时，我就完全明白了，他是知情的，可能还帮着干，促成藤本的被捕。清河承认是这样，但又说，当时我是以逼人的态度对待他，所以他生气了。过了一会，他才冷静下来，我终于从他那里挤得了不少消息。看来是这么回事：藤本的母亲强烈反对藤本回美国，为了找个借口把他扣留下来，他的族人便出来控告他犯了某种重罪。

523

1942年3月27日

我为"大东亚桥牌马拉松赛"发奖。史密斯-赫顿得头等奖，马金森得二等奖，帕克斯得安慰奖或末名奖。

丹麦公使的妻子蒂利茨夫人致函艾丽斯，谓岸已终于为我们安排停当，可以出外打高尔夫球，他自己也想和我打一回。我把我的想法告诉馆员们，然后写封信给蒂利茨夫人。我知道英、加、澳使馆的人曾去打过一次，但克雷吉没有去。

辞谢玩球的邀请并说明缘故

美国大使馆

东京，1942年3月29日

亲爱的蒂利茨夫人：

岸先生尽力为我们安排打球，且似已办妥，艾丽斯都已告诉我了。他这样做，我衷心感激，你或公使若能找机会向他转致此意，我也将非常感谢。岸一向是我在日本的最值得尊重的朋友之一，任何东西都改变不了我对他的私谊和爱慕之心。无论已经发生或将会发生什么事，这种感情都将永存不渝。他筹办球戏，那样体贴人，厚待人，正是他常以助人为乐的典型表现，我认识他这十年来，他这种特性，只有我最了解，我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在较愉快的场合重逢，继续我们的友谊，一如既往。

遗憾的是，我有许多理由不能接受打球的邀请。岸先生既如 524 此尽力，这些理由我想他应该是知道的。很久以前瑞士公使也作过类似的努力，但我一开始就告诉他我断不会接受这种邀请，请他不必费神。事实上有个高尔夫球俱乐部的干事就曾对公使说过，假如我们到那里去，将会使俱乐部的成员受窘，我也决不愿意到任何俱乐部去而自陷于为难之境。尴尬的感觉是彼此都会有的。

我不接受这次邀请，还有更重要的理由。除看病外不许我们离馆外出，已有近四月之久了。现在，撤退之日将临，当局才降宏恩，准我们去球场玩玩——也许一次，也许两次，我不清楚。可以合理地推断，现在这样做，不过是为了给拘留我们的记录添上一点光彩而已。日本宣传部门的伎俩我是知道的，我若接受邀请，他们就将大肆宣扬，借以表明，在整个拘留期间我们都是受优待的。可是我们所受的待遇决非优惠，在初期还违反国际惯例的一切概念。我们不仅被视为俘虏，且被当作罪囚，在整个拘留期间都不断受到警察的侮辱和压制。我不细说了，以免增加你的负担，但这些事将来是很难忘记的。

撇开在大使馆受到的待遇不谈，我还有美国人所同抱的那种反感，其强烈程度，实难形容。

至于馆员们，我已作如下决定：不希望他们把这次邀请作为游乐或消遣来接受，不过假如他们为了身心健康觉得需要出去走一走，我也不反对他们自己打球。有些馆员，特别是那些不象我那样在苦难中有妻室的人，拘留久了，确实是很不好受；他们希望、也需要到空旷的地方去一下，我完全同情这种需要。他们会不会接受邀请，我不知道，但他们要去，我完全允许。

525 岸先生既有此美意，又那样尽力，我这种态度，我想他定会十分谅解，这封信也可以给他看看。

谨向你和公使致以最热情的问候。

格鲁谨上

1942年3月28日

瑞士公使来访。他今天来到使馆门口时，大门半闭，警察只是袖手站在一旁，瞪眼看着他，既不走过去开门，也不叫汽车司机自己去开。公使遂转赴外务省，将此事告诉木内；木内说，“这可太严

重了。”他打电话给警察队队部，但戈慈坚持要个外务省官员陪他一起来。在官员面前，警察也还是那个样子，司机只得下车来自己开门。我很高兴，外务省官员亲眼看见了这种情况。这也许只是个别警察的态度所致，但故意侮辱的可能性更大，其原因大概是公使来得太频繁，也可能是我们抗议藤本事件，把他们惹火了。戈慈当然很气愤，很恼火，因为这是直接侮辱到他。又一次无礼，我们身在使馆，徒唤奈何。

1942年3月30日

加濑来看我，为一位任高官的日本朋友带来一块羊肉和几个橙子。我和加濑谈到藤本事件及警察侮辱我们的种种行为，希望他转告东乡。

天野医师的夫人来到使馆，给我们全体首次注射伤寒和副伤寒预防针。

1942年3月31日

瑞士公使来访。日本政府已向我国政府提议，我们可于4月25日前后乘船经上海、西贡、也许还经新加坡前往洛伦索-马贵斯，5月20日到达。船可容约一千一百人，因官员约有五百人，所以还有空位，大致可载六百平民，戈慈建议，这六百个舱位大致可分一百个给侨居印度支那和泰国的平民，给侨居日本和中国者各二百五十个。日方希望美方撤侨船亦同时开到洛伦索-马贵斯。

526

撤离计划依旧落空

1942年4月1日

我今天召集全体馆员开会，告诉他们，日方提议，我们可于4

月25日或25日左右离日，载撤退人员的日船将在上海和西贡停泊，接运其他撤离人员，5月20日左右可抵洛伦索-马贵斯。这个传达给了大家很大鼓舞，情绪马上升高。可是，唉，这个方案还是没有实现。

1942年4月5日

在办公处做复活节礼拜，唱了几首复活节赞美诗，有音乐伴奏：琼斯弹钢琴，蒂索和普莱费尔夫人拉小提琴，威廉斯小姐吹长笛。我还读了选自《约翰福音》的日课。警察问我们要不要请个美国牧师来主持礼拜，我们谢绝了，宁愿举行一次非正式的集会。使馆里的天主教徒则被带往天主教堂做弥撒。

1942年4月8日

瑞士公使来访。现在看来，恐怕最早要到5月中旬才能走。想起来真有趣，12月间，艾丽斯说，最好还是把木柴保存起来，因为可能要到2月间才能走，当时大家都笑了，以为是句笑话。我曾和内德·克罗克打赌，我认为圣瓦伦丁节[①]以前定能走成，结果输了十美元给他，他还和另外一些人赌哪个月能走，我想他也赢了。

吉米·杜利特尔[②]空袭东京

1942年4月18日

瑞士公使又来过。午饭前他刚要告辞的时候，我们听见许多飞机飞过头上，看见五六个方面起大火，浓烟滚滚。最初我们以为

① 2月14日。——译者

② 詹姆士·杜利特尔(James Doolittle)，(1896— ；)，美国空军将领，这次空袭的指挥者。——译者

是演习，但很快就知道了，这是美国轰炸机首次大举空袭日本，据报道，这次是先炸北海道，然后依次炸东京、横须贺、名古屋和神户。我们见到一架飞机，看去好似失去了高度，飞得很低，擦着屋顶向西飞去，我们先还怕它已经坠毁了，后来才明白，它是有意实行这种战术，以避开驱逐机的俯冲和高射炮的火力。东面又见一架飞机，尾部拖着一长道黑烟，显然是中了高射炮弹；它样子不象轰炸机，我们猜想，这恐怕是日本炮队一时慌张，打了自己的驱逐机。

这一切都很激动人心，但当时却很难相信这并非日本飞机在搞实弹演习。日本报纸自称击落九架敌机，我们却不相信有什么损失，因为，即使只有一架坠地，报纸也一定会得意洋洋地登满飞机残骸的照片。美机看去很大，不象是从航空母舰来的，想必是从阿留申群岛起飞，而往在中国新建的空军基地降落。我们使馆中人皆大欢喜，而且感到自豪，后来英国使馆的人告诉我们，那天他们喝了一天的酒，向美国飞行员致贺。

巴丹和珊瑚海两役之后

1942年5月26日

日本的宣传实在是太幼稚了，以致成了笑柄。巴丹陷落后，《日日新闻》于4月15日（晚刊）登出一张照片，说那是被占领的基地的入口，但是，大油漆招牌上却写着"U. S. Navy Vase, Mariveles"，竟把"Base"写成"Vase"。第二天，《时报和广告报》也登出这张照片，但显已发觉有错，因为"V"字已经给刮掉了，草草换成"B"字，刮痕犹清晰可见。那块牌子当然是日本人自己写的，用以向公众证明他们确已占领该地。

5月26日，《都报》和其他日文报纸刊登了珊瑚海战役的照片，有一张照出一艘船的尾波，似乎是一直通到一个水雾和烟的喷

口，报上说，这表明有一艘美舰被击沉。但在报纸的另一页，又有一张显然是摄自同一地点的照片，只是稍为移向右边一点，却现出一艘美国航空母舰，正离开“爆炸”处，朝相反的方向前进，很明显，前面那张照片所照的，只不过是这艘船的航迹！

528

准 备 起 程

1942年5月29日

召集馆员开会，宣布一个好消息：我们可望于6月18日起程回国。一片欢腾。

1942年5月31日

“阵亡将士纪念日”，在大使官邸集会，唱《祖国颂》、《共和国战歌》和《美国国歌》，我讲了话。全体出席，共六十三人。

“阵亡将士纪念日”讲话：“我们的祖国”

按纪念阵亡将士的传统，多年来每年5月30日我们都在横滨公墓用花饰祭奠葬在日本的美国陆海军军人和平民的坟墓，我们的海军武官每年都把花圈投入横滨附近的海中，悼念死在海上的人。这些寓有纯朴敬意的祭典，正象征着美国精神：不论是投身于激烈的战斗之中，还是克尽厥职，致力于创造化干戈为玉帛的条件，只要是为我们祖国献出生命的人，我们都没有忘记，也永远不会忘记。葬在日本的这些美国陆海军军人和平民，是幸运地属于后一类的。世上有奋战沙场者，有不待战争爆发而为和平尽力者，谁能说这二者之中哪一种人对祖国的贡献要大一些？有许多美国人生活在国外、死在国外，无声无臭，但他们仍曾忠实地、无私地、满

腔爱国热忱地为他们心目中的祖国最大利益效过力。可是，如果战争爆发，如果自由、正义，法律、秩序同不法、混乱、奴役、原始人的掠夺本能进入直接对抗，那么：

虽然儿女情长，身家念重，
可想起了一句千真万确的话：
在应当为真理而死的时候，
偷生比死亡还可怕！

在被拘留的这几个月里，我们总是举行这样的星期日唱诗会。参加的人想必都会感觉到，这种集会是自发的，是在虔敬的气氛中进行的，可以由此得到鼓舞。我们并没有教堂做礼拜的那套仪式，529 但却能够按《诗篇》里的话，按我们自己的方式，“在圣洁之美中礼拜上帝”，形式虽然简单，却是发自内心。我认为，在此沉闷期间，这种星期日集会有助于增强我们的基督教信仰的光辉；能使我们暂时脱离一个受战祸折磨的世界；能把我们团结在一起。今年的阵亡将士纪念日，在实践上我们是不能举行以花饰祭墓的传统仪式了，但我还是用这次星期日集会来在心灵上纪念那些为我们祖国献出生命的人，结果我们倒可以永远热念着他们。

我曾谈到，在这艰难的几个月里，我们大家都定会偶有沮丧的时刻。就我来说，这种沮丧的时刻，只是一瞬间。对我们在这次各国战争中必获最后胜利，我没有一丝一毫的怀疑。要说这是盲目的信念，那也听便。这和解数学题不一样，不是坐下来一算就可以证明的。无法估量的因素太多了。冷酷的逻辑可以把这种信念仅归因于打如意算盘。但是，除此而外，还有别的。我们可以称之为基于许多明显因素的本能的根本信念，对我来说，其说服力正和数学论证一样，假如我能把这种信念和信仰传给你们，加在你们自己的信念上，哪怕只传十分之一，它也是你们的信念。

现在我们终于就要回国了。我曾说这几个月是艰难的岁月。

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在不同程度上，由于种种原因，这几个月都是艰苦的，在某些方面还极其艰苦。对那些远离家庭的人，我们的同情和体谅可以说是无以复加，假如找不到什么字眼来表达的话。至于我自己，这几个月里，我曾有充裕的时间来考察这一生事业的遗迹，就象一个建筑师在地震和火灾之后凝视一幢大厦的废墟那样，这幢大厦是他设计的，是他一砖一瓦建起来的，力求坚固，能永远顶住暴风雨。唉！这座城堡已经坍塌在我们身边了。这并不是一幅悦目的景象。

我们当中的某些人将来回顾时，无疑会把去年12月以来的这段经历看成一场恶梦。然而在我看来，这决不是一场恶梦，因为，在充满生动经历的长期社会生活中，这是一段最激励人心的经历。这里是一个由许多不同成分——也可以说是异类成分——组成的团体，各有各的兴趣、性格和偏好。人性始终是人性，在监禁中，大家每日每时都密切相处在一起，日子长了，我们这个小团体总会顶不住这种重压，至少也有受不住的可能性。结果是否顶住了，我让你们各自去判断。我自己的印象是，处在同样境地的同类团体，恐怕没有哪个能象我们这样经得住考验了。集体精神，共献共享之心，合作互助，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均能舍己利公，尤其是在空间及活动俱受限制的生活中仍自得其乐，风趣不减平时——这一切都使我深感自豪，这种自豪感，一如我和大家的深情密谊，我将保持终生。弥漫于这个团体的精神，以及由此产生的极其令人满意的合作气氛，本质上是美国所固有的。这种集体精神和互助的特性，是使我国成为伟大国家的天性之一。将来回顾这段经历时，我想我们定会认识到这并不是一个停滞的时期，而是我们每个人都有所收获，每个人都发展了这些似须发展的特性，每个人也许都在精神上长高了一些。梅雷迪斯[①]写道："如果我为很快就要消失的赦免

530

① 乔治·梅雷迪斯(George Meredith,1829—1909)，美国作家。——译者

而痛饮，我的魂灵是多么渺小。”我们没有虚度这段时期，相反，我们关心着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并为此而工作。这就是我感到颇受鼓舞的原因。我冒昧地希望，你们大家都能有这种感觉，那高尚的集体精神还将带着我们回去，直到踏上我们亲爱的祖国的国土。

现在我们就要回国了，去参加我们可能找到的或被号召去做的各种工作，为祖国的伟大事业效力。请和我一样坚信——如果你同意的话——这种努力不会是徒劳的。我们将需要我们的信念所产生的勇气，在国内和同胞们共事时，仍将需要密切合作的精神，在此间这几个月的同舟共济中，这种精神我们已经学到了一点。“信仰、希望、慈悲”，是人类行为指南的相当坚实的基础，但我一向觉得，现在比以往更觉得，若用“信、勇、爱”这几个词，倒可以更好地表达这句圣经文字的本旨。这几个词为我们未来的航程指出了正确的方向，因为信仰和希望需要用勇气来支持，然后才能有生气、有活力，否则就只是虚伪的陈言，而用之于日常生活——为使我们的合作精神亦同样生动活泼——信仰和希望也需要用我们的赞歌《美国，美丽的国家》中所说的“四海之内皆兄弟”这句名言来加强。

在我的大半生里，我遵守着两个小小的个人传统。一个是幼年时开始的，我把它带到我们的家庭里，当孩子们渐渐长大、我们不时从海外归国、经过纽约港的自由女神铜像前时，我们常把四个小女孩带到船头，大家一齐朗诵司各脱①的感情炽烈的诗句，就是爱德华·埃弗雷特·黑尔——其实他还是我们祖上的姻亲——在他的《无国之人》一书中沉痛地引用过的那几句：

那个人活在那儿，他的灵魂却已死亡，

他从不对自己说，

① 沃尔特·司各脱(Walter Scott，1771—1832)，英国小说家、诗人。——译者

“这是我自己的故乡”；
当一个人的脚步转向家园，
不再在外国海岸上飘荡，
谁的内心不象火烧一样？
如果确有那种人活着，请你注意，
决不要为他放声高唱。
尽管他地位高，名气大，
称心如意地积起财富满天下，
尽管他有头衔、权势、钱钞，
卑鄙的家伙，想的却全是自家；
他活着，他的名誉将一扫而光，
终于躯壳跟灵魂也都死亡，
来自粪土，仍归粪土，
无人流泪，无人悼念，无人为他做出诗一行。

我说的另一个小惯例是，每逢阵亡将士纪念日，总要背诵林肯的《葛提斯堡演说词》。今天我想借此机会和大家一起念一遍，因为，在英语文章中，我从来没有见过用词有它那样醇美和动人的。它是怎样草拟和发表的，你们定然知道。疲乏而忧烦的总统乘火车前往葛提斯堡，在一个旧信封背面拟出这篇演说的骨架，当晚在旅馆里写成讲稿。第二天，1863 年 11 月 19 日，在战地集会上，先532有一个我国第一流的演说家，按当时的习惯噜噜哧哧地讲了一通。身体瘦削，其貌不扬的林肯站了起来，只讲两三分钟，又坐下去了。听众不禁愕然，满以为在这种场合可以听到一篇他们所习惯的洋洋洒洒的宏言谠论，谁知适得其反，于是大失所望。接在前面那篇演说之后，大杀风景，全场寂然，几乎没有一个人鼓掌，太可怜了。林肯本人也认为这篇演说是一次惨败。只是后来细读讲稿，领会到其词句有雄浑庄严之美，这时世人才发现，这是给历史上的文学

宝库增添了一篇最伟大最鼓舞人心的杰作。在近八十年后的这个纪念日来读这些名言，是多么恰切啊，我们大家都必定会深受感动。

八十七年前，我们的先辈在这个大陆上创立了一个新国家，它孕育于自由之中，致力于一切人生来平等的原则。

现在我们正从事一场伟大的内战，它考验着这个国家，或者说，考验着任何一个孕育于自由和致力于上述原则的国家是否能够长久存在下去。我们在这场战争中的一个伟大战场上聚集在一起。我们在此集会，是为了把这个战场的一部分，奉献给那些在这里献出自己的生命而使国家得以存活下来的人们，作为他们的最后安息之所。我们这样做是完全适合的，非常正当的。

但是，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我们不能够奉献这块土地，我们不能够神化这块土地，我们不能够将这块土地定为圣地。曾在这里战斗过的勇士们，活着的和去世的，已经将这块土地神圣化了，这远远不是我们微薄的力量所能增减的。全世界不会注意到、也不会长远地记起我们今天在这里所说的话，但全世界永远不会忘记勇士们在这里所做过的事。倒是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人，应该在这里把自己奉献于勇士们曾经极为崇高地向前推进的未竟事业。倒是我们应该在这里把自己奉献于仍然留在我们面前的伟大任务，以便使我们从这些光荣的死者身上汲取更多的献身精神，来完成他们已经完全彻底为之献身的事业；以便我们在这里下定最大的决心，不让这些死者白白牺牲；以便使国家在上帝的保佑下得到自由的新生，并且使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永世长存。

533

致美国人民的结束语

——通过哥伦比亚公司广播网发表的广播演说

首先我想说，我们刚乘交换外交人员的船只"格里普斯霍尔姆号"回来，许多朋友即来致候，全国各地又纷纷来信表示欢迎，我们——我的同事和我——是多么深受感动。这种欢迎，暖人肺腑，令人难忘，同时，在日本和日本占领区度过许多艰难日子以后重返家园，欢忭之情，真是无法形容，这也是难忘的。各方慰问函电，要一一答谢，恐怕难以做到。现在，在所有听众面前，请允许我为此盛情表示最深挚的感谢。

在我眼里，祖国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美丽。重返祖国，从来没有象这次这样意义深长。撤退侨民的船在最后驶离日本海域之前，曾在横滨港停泊七天，假如我把这最后七天的情况告诉你们，得归故里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你们就可以理解一点了。当时关于交换人员的谈判还没有结束，我们在那里等着，不知道谈判能否成功，倘若不成功，不知道我们会不会全被押回日本，重受监禁。我们当中有许多美国人——传教士、教师、新闻记者、商人——上船前，都受过单独监禁，关在酷寒的小牢房里，少吃缺穿，还不时遭到最残酷、最野蛮的拷打，如此者过了六个月。拷问的花样很多，我不想细说，只说一件就行了：在"格里普斯霍尔姆号"船上，有三个美国老人，其中一人已年逾七十，给我表演了他们多次受过的灌水刑。清晨，我们走到船头，一个朋友就在那里表演受刑的样子。人被捆着，膝部拉到频下，颈子贴着膝盖，手紧紧反绑在背后，拷534 打时绑手的绳子竟至深陷到肉中。然后把他翻过来，脸朝天，向

他的鼻和嘴灌水。这是一次实况表演，不过，单从那些人的口述，拷问的情景，我已经可以想象了。日本警察用水要用六大桶之多，因此受刑人每次都会失去知觉，然后还是泼水，使他醒过来。老传教士中有一个被指控为间谍，挨了六次灌水刑，要他把诬他得到的情报供出来。

美国传教士、教师、新闻记者和商人，几乎全都被视为有可能成为间谍。日本警察之愚蠢，仅次于他们的残暴。这个美国人又告诉我，有一次他被捆着躺在地上，有个日本人用靴底在他脸上磨擦，然后又狠狠踢他，伤了一根肋骨。最后松绑时，他只能勉强站起来，他说，有根肋骨恐怕已经断了。有个日本警察问他，断骨在哪里，就去摸他的身子。摸到断骨时，警察问道，"是这里吗？"这人答道，"是"，于是那个警察便把手缩回去，挥起拳头，使劲打那根断骨。还有一件，有个美国知名人士因在狱中受虐待，生了坏疽，变成严重残废。我是多年前认识他的，当我在船上看见他时，不禁猛吃一惊，他从前的模样，只剩下一点影子了。

日军夺占南京时干下了骇人听闻的暴行，在香港又用刺刀刺死战俘：这些都是间接听到。在船上我却有了直接证据，因为有个女乘客曾亲耳听见那些战俘临死时的惨叫声，她把这个可怕的故事告诉了我。这决不是第二手证据，而是可靠的证人的直接叙述，至于拷打，其直接证据则是受刑者本人提供的。

在横滨港等候的七天里，有几个人对我说，如果关于交换人员的谈判失败，他们就宁愿自杀，死也不肯再回到日本去坐牢：这话你们觉得奇怪吗？我知道，他们是会这样做的。

最重大的时刻终于来到了。6月25日凌晨1时，我醒了，感觉到好象有点响动，望舷窗外边，只见一片树林在水中慢慢移过去。又有一片树林移动，比先前的快。我们终于启航了，航速慢慢加快，直到开足马力猛进，离开了横滨，离开了日本，往家乡走啦。 535

啊，这是个多么令人激动的时刻，尽管还得航行一万八千英里，历时七十天，才能在纽约港的自由女神铜像前经过，泪流满面，暗诵

那个人活在那儿，他的灵魂却已死亡，

他从不对自己说，

这是我自己的故乡。

今晚我有些话要说，要讲到日本的军事机构，它发动了这次战争，现在我们正在和它战斗。但在转到这个话题之前，有些事我不能不提一下。我在日本住了十年。我在日本交了许多朋友，我钦佩、尊敬、爱戴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他们不是发动这次战争的人。他们作为爱国者，将会为他们的天皇和国家而战斗，必要时还将奋战到底，但他们并不希望打仗，战争也不是他们发动的。我们被拘留在东京期间，警察想把我们同外界完全隔离开来，经常设置障碍，甚至在这个期间，也仍有许多朋友时常设法给我们送礼物来。那些礼物不是通常的鲜花之类，而是食物，有时送一块肉来，这是他们能送的最珍贵的礼品，因为他们自己也很少能够得到肉类。我和他们互相酬酢了十年，他们个人，是对我忠实到底的。

但是，情况还有另一面，丑恶的一面——残酷、野蛮、行同禽兽，亦即发动这次战争的日本军事机构的那种残忍和贪婪。为了美国和联合国家未来的安全和幸福，为了文明世界和全人类未来的安全和幸福，必须彻底粉碎日本的军事机构、军阀集团和军事体制，必须彻底摧毁它们的信誉和支配地位。简言之，在太平洋区域，一个爱好和平的美国，联合国家中任何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同一个穷兵黩武的日本，没有共存的余地。

536 现在，在结束这个话题之前，我还想讲一点关于我们现正与之战斗的日本军事机构的情况。这个机构是多年培植和改善起来的，因为，甚至在1931年入侵满洲以前，它就已经抱定一个目标，不仅要北扫俄国，而且还要西侵和南进，以便控制日本人后来所谓的

“包括南洋在内的大东亚共荣圈”。不用说，“共荣圈”的实际含义，就是日本要在政治上经济上绝对主宰这个辽阔的地区。

1931年，入侵满洲。1937年，入侵长城以南的全中国，由于蒋介石及其勇敢的军队和坚强的人民斗志高昂，日军终于在中国陷入泥淖，辗转不能自拔，尽管如此，这种战斗还是被利用了，用来对日本陆海军士兵进行实战训练，他们不断发展和改进战术，后来在南洋各地登陆和征服这些地区时，这些战术就用上了。

不要以为日军在中国失败，日本国民就泄气了：千万不要抱这种想法。正相反，这种失败适足以锻炼他们的意志，加强他们愿作更大牺牲的决心，使他们有了更好的准备，去进行那一心要征服东亚的战争，这场战争终于已经开始了。他们懂得，必须作越来越大的努力，因此，对国家按战时需要必然要实行的各方面的改组，他们都以他们所特有的那种镇静而坚决的态度来接受。

日本所有武装力量都充满着进攻的精神，日本人之所以在这次战争初期取得胜利，这也许是最主要的因素。军事专家公认，这种精神，乃是克敌制胜的最重要的无形因素，所以日本现代陆军自建立以来，即注意培养和保持这种精神。假如敌人不大有进取心，进攻的精神就成了一种优势，日本统帅部对这种优势寄以很大的期望。他们认为白种人软弱无力，他们非常强调这一点。他们认为，我们美国人不过是些体质虚弱的人，要求生活舒适，不愿在一场对付以斯巴达式的简单方式准备和训练起来的军事机器而进行的战争中作出牺牲，不能按战争的要求吃苦耐劳。他们非常重视以前美国国内在战争问题上意见不一，而且仍然指望，要过一段相当长的时期，美国国民才能奋起，才能发挥自己的特长，培养出自己的斗争精神。他们料想，在这个时候到来以前，日本已经完全控制整个东亚了。他们发动这次战争时，并没有为失败作准备，没有给自己留退路。他们用全部力量出击。在彻底毁灭以前，他们都将

537

继续用这种方式作战。

到适当时候，我们定能摧毁这个军事机构、军阀集团和军事体制，但是，假如我们美国人——集体和个人——以为，我们仍旧可以过正常的生活，自我牺牲的精神是陆海军军人的事，加紧执行生产计划也可以听其自然，那么，这场美日战争就肯定会有陷入僵局的危险。我这样说，是根据我旅日十年的经验，根据我对日本陆海军实力及日本人的顽强精神和战斗意志的了解。我觉得，把这些事告诉我的同胞，是我应尽的责任。我对我的祖国比对日本了解得更清楚，对我们终将获得胜利，我没有一丝一毫的怀疑。但是，我不希望看到我们流血流汗流泪的日子**无限期地、不必要地拖长**。我国人民必须知道我刚才讲的这些实况，必须认识到，我们是面对着一个强大的战争机器，面对着这样一个民族：甚至在接连战败时，他们的士气也打不垮，经济困难也压不倒他们，他们作为集体或个人，都将乐于为他们的天皇和国家献出自己的生命，只有着实打败他们，把他们全部赶出他们暂时征服的地区，或者逐渐消耗他们的海军力量和商船，从而最后割断其本土同周围地区的一切联系和通道——总之，只有在战斗中把他们彻底打败，才能使他们回到现实中来。

我不用多说什么了。我已把我经过长期体验和观察所了解到的实况告诉了你们。我已经带着我在远东工作的同事们回国来参加战时的工作，和你们一起努力。我们只有在进攻战中作为个人和集体最大限度地发挥我们的能力，才能使我们亲爱的祖国安全渡过深海，到达渴望已久的胜利和平的彼岸。

538 我们进行这次战争，是为了维护正义、法律和秩序，但首先还是为了自由，为了我们美国公民的光荣传统所赋予我们的自由，为了联合国家中其他国家的同类自由。我们作战，是为了反对世界上的邪恶势力、不法行为和混乱扰攘，但主要还是为了防止受奴

役，倘若我们失败，受奴役的厄运就会落到我们头上。我确信，这不是过甚其词。毫无疑问，我们的事业，是值得为之牺牲的事业，值得为它而生、必要时为它而死的事业。“虽然儿女情长，身家念重，可想起了一句千真万确的话：在应当为真理而死的时候，偷生比死亡还可怕！”

日本主要官员及各国派驻日本的主要外交使节人名一览表

（圆括号中日期为就职时间）

1932年（6月）

首相：斋藤实子爵，海军大将（1932年5月23日）

外相：斋藤实（1932年5月23日）

内田康哉伯爵（1932年7月6日）

外务次官：有田八郎先生（1932年5月23日）

内阁成员：

陆相：荒木贞夫中将（1932年5月26日）

海相：冈田启介海军大将（1932年5月26日）

藏相：高桥是清先生（1932年5月26日）

商相：中岛久万吉男爵（1932年5月26日）

大使：

比利时：阿尔贝·德·巴索姆皮埃尔男爵（1921年9月15日）

苏联：亚历山大·托洛雅诺夫斯基先生（1928年2月1日）

德国：恩斯特·阿瑟·福雷奇博士（1929年1月22日）

意大利：若凡尼·切撒尔·马若尼先生（1930年6月17日）

法国：达免·德·马特尔伯爵（1930年7月7日）

巴西：斯维诺·古热尔·多·阿麻拉尔先生（1931年6月8日）

英国：弗朗西斯·林德利爵士（1931年7月8日）

美国：约瑟夫·C·格鲁先生

公使：

荷兰：J·C·帕布斯特将军（1923年7月7日）

波兰：兹斯劳·奥克奇先生(1928年6月13日)
瑞士：埃米尔·特拉维斯尼先生(1928年10月26日)
智利：恩芮克·加拉德·涅托先生(1928年10月31日)
瑞典：J·E·胡尔特曼博士(1929年4月12日)
加拿大：赫伯特·马勒先生(1929年9月18日)
墨西哥：密格尔·阿农佐~罗默洛博士(1929年11月25日)
挪威：路德维格·凯撒·奥伯特先生(1930年3月22日)
葡萄牙：茹斯提诺·德·蒙塔尔沃先生(1930年9月17日)
古巴：奥勒斯特·费拉拉先生(1931年5月28日)
中国：蒋作宾将军(1931年10月5日)
阿根廷：罗多尔福·弗雷尔博士(1931年12月24日)
波斯：哈桑·阿里·赫达雅特先生(1932年2月25日)
西班牙：圣地亚哥·门德斯·德·维戈先生(1932年4月25日)
捷克斯洛伐克：弗兰蒂塞克·哈夫利采克先生(1932年5月6日)

代办：

罗马尼亚：乔治·史托依策斯科先生(1929年7月18日)
芬兰：乔治·温克尔曼先生(1930年4月22日)
土耳其：内比尔·贝伊先生(1931年12月22日)

美国大使馆：

参事：埃德温·L·内维尔先生
陆军武官：詹姆士·G·麦基尔罗伊中校
海军武官：艾萨克·C·约翰逊海军上校
商务参赞：哈勒克·A·巴茨先生
一等秘书：厄尔·R·狄考福先生
三等秘书：威廉·T·特纳先生，S·沃尔特·华盛顿先生
总领事：阿瑟·加勒尔斯先生

1933年(1月1日)

首相：斋藤实子爵，海军大将(1932年5月23日)
外相：内田康哉伯爵(1932年7月6日)

外务次官：有田八郎(1932年5月23日)

内阁成员：

陆相：荒木贞夫中将(1932年5月26日)

海相：冈田启介海军大将(1932年5月26日)

藏相：高桥是清先生(1932年5月26日)

商相：中岛久万吉男爵(1932年5月26日)

大使：

比利时：阿尔贝·德·巴索姆皮埃尔男爵(1921年9月15日)

苏联：亚历山大 托洛雅诺夫斯基先生(1928年2月1日)

德国：恩斯特·阿瑟 福雷奇博士(1929年1月22日)

意大利：若凡尼·切撒尔·马若尼先生(1930年6月17日)

法国：达兔·德·马特尔伯爵(1930年7月7日)

巴西：斯维诺·古热尔·多·阿麻拉尔先生(1931年6月8日)

英国：弗朗西斯·林德利爵士(1931年7月8日)

美国：约瑟夫·C·格鲁先生(1932年6月4日)

公使：

荷兰：J·C·帕布斯特将军(1923年7月7日)

波兰：兹斯劳·奥克奇先生(1928年6月13日)

瑞士：埃米尔·特拉维斯尼先生(1928年10月26日)

智利：恩芮克·加拉德·涅托先生(1928年10月31日)

瑞典：J·E·胡尔特曼博士(1929年4月12日)

加拿大：赫伯特·马勒先生(1929年9月18日)

墨西哥：密格尔·阿农佐-罗默洛博士(1929年11月25日)

挪威：路德维格·凯撒·奥伯特先生(1930年3月22日)

葡萄牙：茹斯提诺·德·蒙塔尔沃先生(1930年9月17日)

古巴：奥勒斯特·费拉拉先生(1931年5月28日)

中国：蒋作宾将军(1931年10月5日)

阿根廷：罗多尔福·弗雷尔博士(1931年12月24日)

波斯：哈桑·阿里·赫达雅特先生(1932年2月25日)

西班牙：圣地亚哥·门德斯·德·维戈先生(1932年4月25日)
捷克斯洛伐克：弗兰蒂塞克·哈夫利采克先生(1932年5月6日)
暹罗：弗雅·英德腊·维吉特将军(1932年10月6日)

代办：

罗马尼亚：乔治·史托依策斯科先生(1929年7月18日)
芬兰：乔治·温克尔曼先生(1930年4月22日)
土耳其：内比尔·贝伊先生(1931年12月22日)

美国大使馆：

参事：埃德温·L·内维尔先生
陆军武官：詹姆士·G·麦基尔罗伊中校
海军武官：艾萨克·C·约翰逊海军上校
商务参赞：哈勒克·A·巴茨先生
一等秘书：厄尔·R·狄考福先生
二等秘书：威廉·T·特纳先生
三等秘书：S·沃尔特·华盛顿先生
总领事：阿瑟·加勒尔斯先生

1934年(1月1日)

首相：斋藤实子爵，海军大将(1932年5月23日)
外相：广田弘毅先生(1933年9月14日)
外务次官：重光葵先生(1933年5月16日)

内阁成员：

陆相：荒木贞夫中将(1932年5月26日)
海相：大角岑生海军大将(1933年1月9日)
藏相：高桥是清先生(1932年5月26日)
商相：中岛久万吉男爵(1932年5月26日)

大使：

比利时：阿尔贝·德·巴索姆皮埃尔男爵(1921年9月15日)

巴西：斯维诺·古热尔·多·阿麻拉尔先生(1931年6月8日)
英国：弗朗西斯·林德利爵士(1931年7月8日)
美国：约瑟夫·C·格鲁先生(1932年6月14日)
苏联：康士坦丁·尤勒涅夫先生(1933年3月20日)
意大利：日亚钦托·奥里蒂先生(1933年7月10日)
法国：费尔南德·皮拉先生(1933年11月30日)
德国：赫伯特·冯·迪克森博士(1933年12月27日)

公使：

荷兰：J·C·帕布斯特将军(1932年7月7日)
瑞典：J·E·胡尔特曼博士(1929年4月12日)
加拿大：赫伯特·马勒先生(1929年9月18日)
墨西哥：密格尔·阿农佐-罗默洛博士(1929年11月25日)
挪威：路德维格·凯撒·奥伯特先生(1930年3月22日)
中国：蒋作宾将军(1931年10月5日)
阿根廷：罗多尔福·弗雷尔博士(1931年12月24日)
波斯：哈桑·阿里·赫达雅特先生(1932年2月25日)
西班牙：圣地亚哥·门德斯·德·维戈先生(1932年4月25日)
捷克斯洛伐克：弗兰蒂塞克·哈夫利采克先生(1932年5月6日)
暹罗：弗雅·英德腊·维吉特将军(1932年10月6日)
满洲国：丁士源先生(1933年5月18日)
芬兰：雨果·瓦尔万先生(1933年10月5日)
波兰：迈克尔·莫斯奇茨基先生(1933年10月5日)
阿富汗：哈比布拉·塔尔兹先生(1933年10月18日)

代办：

罗马尼亚：乔治·史托依策斯科先生(1929年7月18日)
土耳其：内比尔·贝伊先生(1931年12月22日)

美国大使馆：

参事：埃德温·L·内维尔先生
陆军武官：威廉·C·克兰少校

海军武官：弗雷德·F·罗杰斯海军上校

商务参赞：弗兰克·S·威廉斯先生

一等秘书：厄尔·R·狄考福先生

二等秘书：爱德华·S·克罗克先生

三等秘书：威廉·T·特纳先生

莫里斯·N·休士先生

乔治·D·安德鲁斯先生

总领事：阿瑟·加勒尔斯先生

1935年(1月1日)

首相：冈田启介海军大将(1934年7月4日)

外相：广田弘毅先生(1933年9月14日)

外务次官：重光葵先生(1933年5月6日)

内阁成员：

陆相：林铣十郎将军(1934年1月21日)

海相：大角岑生海军大将(1933年1月9日)

藏相：藤井贞先生(1934年7月5日)

高桥先生(1934年11月27日)

商相：町田忠治先生(1934年7月5日)

大使：

比利时：阿贝特·德·巴索姆皮埃尔男爵(1921年9月15日)

美国：约瑟夫·C·格鲁先生(1932年6月14日)

苏联：康士坦丁·尤勒涅夫先生(1933年3月20日)

意大利：日亚钦托·奥里蒂先生(1933年7月10日)

法国：费尔南德·皮拉先生(1933年11月30日)

德国：赫伯特·冯·迪克森博士(1933年12月27日)

英国：罗伯特·克莱夫爵士(1934年6月28日)

巴西：卡洛斯·马丁斯·苏撒先生(1934年9月17日)

公使：

荷兰：J·C·帕布斯特将军(1923年7月7日)

瑞典：J·E·胡尔特曼博士(1929年4月12日)
加拿大：赫伯特·马勒先生(1929年9月18日)
墨西哥：密格尔·阿农佐-罗默洛博士(1929年11月25日)
挪威：路德维格·凯撒·奥伯特先生(1930年3月22日)
中国：蒋作宾将军(1931年10月5日)
西班牙：圣地亚哥·门德斯·德·维戈先生(1932年4月25日)
捷克斯洛伐克：弗兰蒂塞克·哈夫利采克先生(1932年5月6日)
满洲国：丁士源先生(1933年5月18日)
芬兰：雨果·瓦尔万先生(1933年10月5日)
波兰：迈克尔·莫斯奇茨基先生(1933年10月5日)
阿富汗：哈比布拉·塔尔兹先生(1933年10月19日)
哥伦比亚：多明各·埃斯格腊博士(1934年4月28日)
暹罗：弗拉·拉克夏先生(1934年6月18日)
葡萄牙：托马兹·里贝罗·德·梅洛先生(1934年7月2日)
波斯：密尔札·巴格尔·阿兹米先生(1934年10月18日)

代办：

罗马尼亚：乔治·史托依策斯科先生(1929年7月18日)
土耳其：内比尔·贝伊先生(1931年12月22日)

美国大使馆：

参事：埃德温·L·内维尔先生
陆军武官：威廉·C·克兰少校
海军武官：弗雷德·F·罗杰斯海军上校
商务参赞：弗兰克·S·威廉斯先生
一等秘书：厄尔·R·狄考福先生
二等秘书：爱德华·S·克罗克先生
三等秘书：威廉·T·特纳先生
莫里斯·N·休士先生
乔治·D·安德鲁斯先生
总领事：阿瑟·加勒尔斯先生

1936年(1月1日)

首相：冈田启介海军大将(1934年7月4日)

外相：广田弘毅先生(1933年9月14日)

外务次官：重光葵先生(1933年5月6日)

内阁成员：

陆相：桑岛査元将军(1935年9月4日)

海相：大角岑生海军大将(1933年1月9日)

藏相：藤井贞先生(1935年7月5日)

商相：町田忠治先生(1934年7月5日)

大使：

比利时：阿尔贝·德·巴索姆皮埃尔男爵(1921年9月15日)

美国：约瑟夫·C·格鲁先生(1932年6月14日)

苏联：康士坦丁·尤勒涅夫先生(1933年3月20日)

意大利：日亚钦托·奥里蒂先生(1933年7月10日)

法国：费尔南德·皮拉先生(1933年11月30日)

德国：赫伯特·冯·迪克森博士(1933年12月27日)

英国：罗伯特·克莱夫爵士(1934年6月28日)

中国：蒋作宾将军(1935年6月20日)

满洲国：谢介石先生(1935年7月4日)

公使：

荷兰：J·C·帕布斯特将军(1923年7月7日)

瑞典：J·E·胡尔特曼博士(1929年4月12日)

加拿大：赫伯特·马勒爵士(1929年9月18日)

西班牙：圣地亚哥·门德斯·德·维戈先生(1932年4月25日)

捷克斯洛伐克：弗兰蒂塞克·哈夫利采克先生(1932年5月6日)

芬兰：雨果·瓦尔万先生(1933年10月5日)

波兰：迈克尔·莫斯奇茨基先生(1933年10月5日)

阿富汗：哈比布拉·塔尔兹先生(1933年10月19日)

哥伦比亚：多明各·埃斯格腊博士(1934年4月28日)

暹罗：弗拉·拉克夏先生(1934年6月18日)
葡萄牙：托马兹·里贝罗·德·梅洛博士(1934年7月2日)
伊朗：密尔札·巴格尔·阿兹米先生(1934年10月18日)
瑞士：沃尔特·特恩希尔先生(1935年2月7日)
墨西哥：弗朗西斯科·J·阿吉拉将军(1935年3月14日)
阿根廷：爱杜瓦多·拉塞多先生(1935年11月28日)

代办：

罗马尼亚：乔治·史托依策斯科先生(1929年7月18日)
土耳其：内比尔·贝伊先生(1931年12月22日)

美国大使馆：

参事：埃德温·L·内维尔先生
陆军武官：威廉·C·克兰中校
海军武官：弗雷德·F·罗杰斯海军上校
商务参赞：弗兰克·S·威廉斯先生
一等秘书：厄尔·R·狄考福先生
二等秘书：爱德华·S·克罗克先生
卡博特·科维尔先生
三等秘书：莫里斯·N·休士先生
乔治·安德鲁斯先生
总领事：阿瑟·加勒尔斯先生

1937年(1月1日)

首相：广田弘毅先生(1936年3月19日)
外相：广田弘毅先生(1936年3月19日)
有田八郎先生(1936年4月2日)
外务次官：堀内谦介先生(1936年4月1日)

内阁成员：

陆相：寺内寿一将军(1936年3月9日)
海相：永野修身海军大将(1936年3月9日)

藏相：马场锳一先生(1936年3月9日)

商相：川崎卓吉先生(1936年3月9日)

大使：

比利时：阿尔贝·德·巴索姆皮埃尔男爵(1921年9月15日)

美国：约瑟夫·C·格鲁先生(1932年6月14日)

苏联：康士坦丁·尤勒涅夫先生(1933年3月20日)

意大利：日亚钦托·奥里蒂先生(1933年7月10日)

德国：赫伯特·冯·迪克森博士(1933年12月27日)

英国：罗伯特·克莱夫爵士(1934年6月28日)

满洲国：谢介石先生(1935年7月4日)

巴西：佩德洛·勒奥·维洛索先生(1935年12月24日)

土耳其：R·胡斯雷·格勒德先生(1936年3月23日)

中国：许士英先生(1936年4月6日)

法国：阿尔贝·坎梅勒先生(1936年7月2日)

公使：

荷兰：J·C·帕布斯特将军(1923年7月7日)

瑞典：J·E·胡尔特曼博士(1929年4月12日)

西班牙：圣地亚哥·门德斯·德·维戈先生(1932年4月25日)

捷克斯洛伐克：弗兰蒂塞克·哈夫利采克先生(1932年5月6日)

芬兰：雨果·瓦尔万先生(1933年10月5日)

波兰：迈克尔·莫斯奇茨基先生(1933年10月5日)

阿富汗：哈比布拉·塔尔兹先生(1933年10月9日)

哥伦比亚：多明各·埃斯格腊博士(1934年4月28日)

暹罗：弗拉·拉克夏先生(1934年6月18日)

葡萄牙：托马兹·里贝罗·德·梅洛博士(1934年7月2日)

伊朗：密尔札·巴格尔·阿兹米先生(1934年10月18日)

瑞士：沃尔特·特恩希尔先生(1935年2月7日)

墨西哥：弗朗西斯科·J·阿吉拉将军(1935年3月14日)

阿根廷：爱杜瓦多·拉塞多先生(1935年11月28日)

丹麦：鲁道夫·伯图锡伦男爵(1935年12月19日)

罗马尼亚：乔治·史托依策斯科先生(1936年4月14日)
智利：马丁·菲格洛阿先生(1936年5月14日)
挪威：芬·科伦先生(1936年5月28日)
加拿大：R·伦道夫·布鲁斯先生(1936年11月7日)
秘鲁：里卡多·里维拉·施雷伯博士(1936年12月18日)

美国大使馆：

参事：埃德温·L·内维尔先生(离职)
陆军武官：威廉·C·克兰中校
海军武官：哈罗德·比米斯海军上校
商务参赞：弗兰克·S·威廉斯先生
一等秘书：厄尔·R·狄考福先生
约瑟夫·F·麦格克先生
二等秘书：爱德华·S·克罗克先生
卡博特·科维尔先生
三等秘书：乔治·D·安德鲁斯先生
总领事：阿瑟·加勒尔斯先生

1938年(1月1日)

首相：林铣十郎将军(1937年2月2日)
近卫文麿公爵(1937年6月4日)
外相：林铣十郎将军(1937年2月2日)
佐藤尚武先生(1937年3月1日)
广田弘毅先生(1937年6月4日)
外务次官：堀内谦介先生(1936年4月1日)

内阁成员：

陆相：中村孝太郎将军(1937年2月2日)
海相：米内光政海军大将(1937年2月2日)
藏相：结城丰太郎先生(1937年2月2日)
贺屋兴宣先生(1937年6月3日)
商相：伍堂卓雄海军大将(1937年2月2日)

吉野信次先生(1937 年 6 月 3 日)

大使:

比利时：阿尔贝·德·巴索姆皮埃尔男爵(1921 年 9 月 15 日)
美国：约瑟夫·C·格鲁先生(1932 年 6 月 14 日)
意大利：日亚钦托·奥里蒂先生(1933 年 7 月 10 日)
巴西：佩德洛·勒奥·维洛索先生(1935 年 12 月 24 日)
土耳其：胡斯雷·格勒德先生(1936 年 3 月 23 日)
法国：夏尔·阿塞尼-亨利先生(1937 年 3 月 12 日)
满洲国：阮振铎先生(1937 年 3 月 12 日)
苏联：米海尔·斯拉乌茨基先生(1937 年 9 月 2 日)
英国：罗伯特·克雷吉爵士(1937 年 9 月 11 日)
波兰：塔德·德·罗梅先生(1937 年 11 月 2 日)
德国：尤金·奥特将军(1938 年 4 月 28 日)

公使:

荷兰：J·C·帕布斯特将军(1923 年 7 月 7 日)
捷克斯洛伐克：弗兰蒂塞克·哈夫利采克先生(1932 年 5 月 6 日)
芬兰：雨果·瓦尔万先生(1933 年 10 月 5 日)
阿富汗：哈比布拉·塔尔兹先生(1933 年 10 月 19 日)
葡萄牙：托马兹·里贝罗·德·梅洛博士(1934 年 7 月 2 日)
瑞士：沃尔特·特恩希尔先生(1935 年 2 月 7 日)
墨西哥：弗朗西斯科·阿吉拉将军(1935 年 3 月 14 日)
阿根廷：爱杜瓦多·拉塞多先生(1935 年 11 月 28 日)
丹麦：鲁道夫·伯图锡伦男爵(1935 年 12 月 19 日)
罗马尼亚：乔治·史托依策斯科先生(1936 年 4 月 14 日)
智利：马丁·菲格洛阿先生(1936 年 5 月 14 日)
挪威：芬·科伦先生(1936 年 5 月 28 日)
加拿大：R·伦道夫·布鲁斯先生(1936 年 11 月 6 日)
瑞典：威达尔·巴格先生(1937 年 3 月 12 日)
暹罗：弗雅·斯里·塞纳先生(1937 年 11 月 11 日)

美国大使馆：

参事：尤金·H·杜曼先生

陆军武官：哈里·克雷瑞尔中校

海军武官：哈罗德·比米斯海军上校

商务参赞：弗兰克·S·威廉斯先生

一等秘书：约瑟夫·C·麦格克先生

二等秘书：爱德华·S·克罗克先生

卡博特·科维尔先生

乔治·D·安德鲁斯先生

总领事：查尔斯·卡梅伦先生

1939年（1月1日）

首相：近卫文麿公爵（1937年6月4日）

外相：广田弘毅先生（1937年6月4日）

宇垣一成将军（1938年5月26日）

有田八郎先生（1938年10月29日）

外务次官：堀内谦介先生（1936年4月1日）

泽田廉三先生（1938年12月1日）

内阁成员：

陆相：杉山元将军（1937年12月）

板垣征四郎将军（1938年5月26日）

海相：米内光政海军大将（1937年2月2日）

藏相：池田成彬先生（1938年5月26日）

商相：池田成彬先生（1938年5月26日）

大使：

比利时：阿尔贝·德·巴索姆皮埃尔男爵（1921年9月15日）

美国：约瑟夫·C·格鲁先生（1932年6月14日）

意大利：日亚钦托·奥里蒂先生（1933年7月10日）

巴西：佩德洛·勒奥·维洛索先生（1935年12月24日）

土耳其：胡斯雷·格勒德先生（1936年3月23日）

法国：夏尔·阿塞尼-亨利先生(1937年3月12日)
满洲国：阮振铎先生(1937年7月2日)
英国：罗伯特·克雷吉爵士(1937年9月11日)
波兰：塔德·德·罗梅先生(1937年11月2日)
德国：尤金·奥特将军(1938年4月28日)

公使：

荷兰：J·C·帕布斯特将军(1923年7月7日)
捷克斯洛伐克：弗兰蒂塞克·哈夫利采克先生(1932年5月6日)
芬兰：雨果·瓦尔万先生(1933年10月5日)
阿富汗：哈比布拉·塔尔兹先生(1933年10月19日)
瑞士：沃尔特·特恩希尔先生(1935年2月7日)
阿根廷：埃杜瓦多·拉塞多先生(1935年11月28日)
丹麦：鲁道夫·伯图锡伦男爵(1935年12月19日)
罗马尼亚：乔治·史托依策斯科先生(1936年4月14日)
智利：马丁·菲格洛阿先生(1936年5月14日)
挪威：芬·科伦先生(1936年5月28日)
瑞典：威达尔·巴格先生(1937年3月12日)
暹罗：弗雅·斯里·塞纳先生(1937年11月11日)
埃及：阿布德尔·瓦哈布·贝伊先生(1938年1月17日)
秘鲁：里卡多·里维腊·施雷伯博士(1938年9月8日)
葡萄牙：华奎姆·佩德洛索先生(1938年9月8日)
西班牙：圣地亚哥·门德斯·德·维戈先生(1938年10月6日)

美国大使馆：

参事：尤金·H·杜曼
陆军武官：哈里·I·克雷斯韦尔中校
海军武官：哈罗德·M·比米斯海军上校
商务参赞：弗兰克·S·威廉斯先生
一等秘书：约瑟夫·F·麦格克先生
　　　　　爱德华·S·克罗克先生
二等秘书：卡博特·科维尔先生

三等秘书：弗兰克·A·舒勒先生
马克斯·W·施密特先生
总领事：查尔斯·卡梅伦先生

1940年(1月1日)

首相：平沼骐一郎男爵(1939年1月4日)
阿部信行将军(1939年8月30日)
外相：有田八郎先生(1938年10月28日)
阿部信行将军(1939年8月30日)
野村吉三郎海军大将(1939年9月25日)
外务次官：泽田廉三先生(1938年12月1日)
谷正之先生(1939年8月30日)

内阁成员：

陆相：畑俊六将军(1939年8月30日)
海相：吉田善伍海军中将(1939年8月30日)
藏相：青木一男先生(1939年8月30日)
商相：伍堂卓雄先生(1939年8月30日)

大使：

美国：约瑟夫·C·格鲁先生(1932年6月14日)
意大利：日亚钦托·奥里蒂先生(1933年7月10日)
法国：夏尔·阿塞尼-亨利先生(1937年3月12日)
满洲国：阮振铎先生(1937年7月2日)
英国：罗伯特·克雷吉爵士(1937年9月11日)
波兰：塔德·德·罗梅先生(1937年11月2日)
德国：尤金·奥特将军(1938年4月28日)
巴西：弗雷德里科·德·卡斯特罗-布朗科·克拉克先生(1939年4月10日)
比利时：皮埃尔·福托姆先生(1939年11月6日)
苏联：康士坦丁·斯梅坦宁先生(1939年11月20日)
土耳其：费里德·特克先生(1939年12月14日)

公使:

荷兰: J·C·帕布斯特将军(1923年7月7日)

瑞典: 威达尔·巴格先生(1937年3月12日)

泰国: 弗雅·斯里·塞纳先生(1937年11月11日)

秘鲁: 里卡多·里维腊·施雷伯博士(1938年9月8日)

西班牙: 圣地亚哥·门德斯·德·维戈先生(1938年10月6日)

哥伦比亚: 阿尔弗雷多·米歇尔森先生(1939年2月24日)

阿根廷: 罗道夫·莫勒诺博士(1939年4月7日)

墨西哥: 普里莫·维拉·米歇尔先生(1939年4月7日)

丹麦: 拉斯·P·蒂利茨先生(1939年4月10日)

希腊: 阿塔纳斯·G·波利蒂斯先生(1939年4月24日)

阿富汗: 佐尔·法卡尔·汗(1939年6月12日)

罗马尼亚: 乔治·帕拉锡维斯科先生(1939年6月12日)

芬兰: 查理·古斯塔夫·伊达曼博士(1939年11月6日)

智利: 阿曼多·拉布腊·卡拉瓦雅尔先生(1939年11月30日)

匈牙利: 乔治·德·吉卡先生(1939年12月21日)

美国大使馆:

参事: 尤金·H·杜曼先生

陆军武官: 哈里·I·克雷斯韦尔中校

海军武官: 亨利·H·史密斯-赫顿海军少校

商务参赞: 弗兰克·S·威廉斯先生

一等秘书: 爱德华·S·克罗克先生

斯图尔特·E·格鲁芒先生

二等秘书: 威廉·T·特纳先生

三等秘书: 弗兰克·A·舒勒先生

马克斯·W·施密特先生

詹姆士·埃斯皮先生

总领事: 查尔斯·卡梅伦先生

1941年(1月1日)

首相: 阿部信行将军(1939年8月30日)

米内光政海军大将(1940年1月16日)
近卫文麿公爵(1940年7月22日)

外相：野村吉三郎海军大将(1939年9月25日)
有田八郎先生(1940年1月16日)
松冈洋右先生(1940年7月22日)

外务次官：谷正之先生(1939年8月30日)
大桥忠一先生(1940年8月19日)

内阁成员：

陆相：东条英机中将(1940年7月22日)
海相：及川古志郎海军大将(1940年9月5日)
藏相：河田烈先生(1940年7月22日)
商相：小林一三先生(1940年7月22日)

大使：

美国：约瑟夫·C·格鲁先生(1932年6月14日)
法国：夏尔·阿塞尼-亨利先生(1937年3月12日)
英国：罗伯特·克雷吉爵士(1937年9月11日)
波兰：塔德·德·罗梅先生(1937年11月2日)
德国：尤金·奥特将军(1937年4月28日)
巴西：弗雷德里科·德·卡斯特罗-布朗诺·克拉克(1939年4月10日)
比利时：皮埃尔·福托姆先生(1939年11月6日)
苏联：康士坦丁·斯梅坦宁先生(1939年11月20日)
土耳其：费里德·特克先生(1939年12月14日)
意大利：马里约·英德利先生(1940年7月20日)
满洲国：李绍庚先生(1940年12月24日)

公使：

荷兰：J·C·帕布斯特将军(1923年7月7日)
瑞典：威边尔·巴格先生(1937年3月12日)
泰国：弗雅·斯里·塞纳先生(1937年11月11日)

秘鲁：里卡多·里维纳·施雷伯博士(1938年9月8日)
西班牙：圣地亚哥·门德斯·德·维戈先生(1938年10月6日)
哥伦比亚：阿尔弗雷多·米歇尔森先生(1939年2月24日)
阿根廷：罗道夫·莫勒诺博士(1939年4月7日)
墨西哥：普里莫·维拉·米歇尔先生(1939年4月7日)
丹麦：拉斯·P·蒂利茨先生(1939年4月10日)
希腊：阿塔纳斯·G·波利蒂斯(1939年4月24日)
阿富汗：佐尔·法卡尔·汗(1939年6月12日)
芬兰：查理·G·伊德曼博士(1939年11月6日)
智利：阿曼多·L·卡拉瓦雅尔先生(1939年11月30日)
匈牙利：乔治·德·吉卡先生(1939年12月21日)
瑞士：卡米尔·戈热先生(1940年3月5日)
葡萄牙：路易兹·埃斯特夫斯·弗南德斯先生(1940年3月29日)
澳大利亚：约翰·G·拉撒姆爵士(1940年12月24日)

美国大使馆：

参事：尤金·H·杜曼先生
陆军武官：哈里·I·克雷斯韦尔中校
海军武官：亨利·H·史密斯-赫顿海军少校
商务参赞：弗兰克·S·威廉斯先生
一等秘书：乔治·A·马金森先生
爱德华·S·克罗克先生
斯图尔特·E·格鲁芒先生
二等秘书：威廉·T·特纳先生
三等秘书：马克斯·W·施密特先生
约翰·K·埃默森先生
查理·A·库珀先生
詹姆士·埃斯皮先生

1942年(1月1日)

首相：近卫文麿公爵(1940年7月22日)第二次内阁
近卫文麿公爵(1941年7月18日)第三次内阁

东条英机将军(1941 年 10 月 18 日)

外相：松冈洋右先生(1940 年 7 月 22 日)

丰田贞次郎先生(1941 年 7 月 18 日)

东乡茂德先生(1941 年 10 月 18 日)

外务次官：大桥忠一先生(1940 年 8 月 19 日)

天羽英二先生(1941 年 8 月 15 日)

西春彦先生(1941 年 10 月 21 日)

内阁成员：

陆相：东条英机将军(兼任首相)(1941 年 10 月 18 日)

海相：岛田繁太郎海军大将(1941 年 10 月 18 日)

藏相：贺屋兴宣先生(1941 年 10 月 18 日)

商相：岸信介先生(1941 年 10 月 18 日)

大使：

美国：约瑟夫·C·格鲁先生(1932 年 6 月 14 日)

法国：夏尔·阿塞尼-亨利先生(1937 年 3 月 12 日)

英国：罗伯特·克雷吉爵士(1937 年 9 月 11 日)

德国：尤金·奥特将军(1938 年 4 月 28 日)

巴西：弗雷德里科·德·卡斯特罗-布朗诺·克拉克先生(1939 年 4 月 10 日)

比利时：皮埃尔·福托姆先生(1939 年 11 月 6 日)

苏联：康士坦丁·斯梅坦宁先生(1939 年 11 月 20 日)

土耳其：费里德·特克先生(1939 年 12 月 14 日)

意大利：马里约·英德利先生(1940 年 7 月 20 日)

满洲国：李绍庚先生(1940 年 12 月 24 日)

泰国：弗雅·斯里·塞纳先生(1941 年 10 月 2 日)

中国(汪精卫伪政权——译者)：徐良先生(1941 年 11 月 27 日)

公使：

荷兰：J·C·帕布斯特将军(1923 年 7 月 7 日)

瑞典：威达尔·巴格先生(1937 年 3 月 12 日)

秘鲁：里卡多·里维腊·施雷伯博士(1938年9月8日)
西班牙：圣地亚哥·门德斯·德·维戈先生(1938年10月6日)
哥伦比亚：阿尔弗雷多·米歇尔森先生(1939年2月24日)
丹麦：拉斯·P·蒂利茨先生(1939年4月10日)
希腊：阿塔纳斯·G·波利蒂斯先生(1939年4月24日)
阿富汗：佐尔·法卡尔·汗(1939年6月12日)
芬兰：查理·古斯塔夫·伊德曼博士(1939年11月6日)
智利：阿曼多·拉布腊·卡拉瓦雅尔先生(1939年11月30日)
瑞士：卡米尔·戈热先生(1940年3月5日)
葡萄牙：路易兹·埃斯特夫斯·弗南德斯先生(1940年3月29日)
澳大利亚：约翰·G·拉撒姆爵士(1940年12月24日)
巴拿马：安吉洛·费拉利先生(1941年3月13日)
伊朗：阿博尔加塞姆·纳吉姆先生(1941年3月13日)
罗马尼亚：乔治·巴古勒斯科先生(1941年4月28日)
匈牙利：尼科腊斯·德·维格先生(1941年6月11日)
墨西哥：霍塞·路易斯·阿美兹夸将军(1941年9月18日)

美国大使馆：

参事：尤金·H·杜曼先生
陆军武官：哈里·I·克雷斯韦尔中校
海军武官：亨利·H·史密斯-赫顿海军少校
商务参赞：弗兰克·S·威廉斯先生
一等秘书：乔治·A·马金森先生
　　　　　爱德华　克罗克先生
二等秘书：威廉　T　特纳先生
　　　　　查尔斯　E　波伦先生
　　　　　H·梅勒尔·本宁霍夫先生
三等秘书：约翰　K·埃默森先生
　　　　　查尔斯　A　库珀先生
　　　　　詹姆士　埃斯皮先生



索　引